# 社会主义体制



## The Socialist System

## 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匈牙利〕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著
张　安　译



## 著名经济学家对本书的评语

雅诺什·科尔奈是一位在中国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以匈牙利经济改革为背景写作的理论专著《短缺经济学》就已经是参与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家人手一册的宝典。眼前这本书，更可以说是科尔奈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实际观察和理论探讨的总结。毫无疑问，科尔奈的这本著作将和他先前的著作一样，给正在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进行系统改革的中国同行以启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吴敬琏**

---

匈牙利因盛产对当代经济思想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家而名闻遐迩，波拉尼、冯·纽曼、卡尔多、希托夫斯基等经济学家都是匈牙利人，科尔奈显然也应被纳入这个伟人的行列。不过，科尔奈很特别。他起初是一家共产党机关报的经济新闻记者，在工作中近距离观察到了集权的计划经济是如何扭曲了厂商效率的。在保持对实际经济问题密切关注的同时，他转向了面向全世界的学术研究和教学。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他对社会主义体制研究的巅峰之作，这部著作既有深刻的理论思想，又有广博的实际知识，从中还能看到作者饱含提升人类经济福利的激情。这是一部有志于了解社会主义体制的人的必读之作。

——斯坦福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国际经济协会当选主席　**青木昌彦**

---

雅诺什·科尔奈的《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是在恰当的时候由恰当的作者所写的一本恰当的著作，该书对社会主义的早期成就及其逐渐瓦解进行了学术的、现实主义的和见解深刻的分析。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斯坦利·费舍尔**

---

雅诺什·科尔奈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敏锐的共产主义问题的批评家和分析家，过去若干年的巨变产生了很多见解，这部著作阐述了共产主义的演进过程以及它应该和将会如何演进的问题。本书必将成为经典。

——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劳伦斯·萨默斯**


ISBN 978-7-80211-301-5

定价：68.00元

领导干部参考译丛

# 社会主义体制

## The Socialist System

## 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匈牙利〕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著
张 安 译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6－6426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by János Korna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匈)雅诺什·科尔奈著;张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9
ISBN 978－7－80211－301－5
Ⅰ.社…
Ⅱ.①科… ②张…
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
Ⅳ.D03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89405号

**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 **雅诺什·科尔奈 著**

| | |
|---|---|
| **出 版 人** | 和 龑 |
| **出版发行**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
| **电　　话** | (010)66509360 66509366(编辑部) |
| |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
| **网　　址** | http://www.cctpbook.com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新丰印刷厂 |
| **开　　本** | 680×980毫米 1/16 |
| **字　　数** | 515千字 |
| **印　　张** | 38.5 |
| **版　　次** | 200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68.00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 出版说明

雅诺什·科尔奈——世界经济学界大师级人物,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几部经典之作——《短缺经济学》、《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均是其重量级著作。

读者面前的这部经济学著作是科尔奈1995年以前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作者将传统社会主义(即文中的“经典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分析和研究的对象,对其“所有主要领域:政治架构、意识形态、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和对经济的监管、体制内部的信息流动、典型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塑造的典型行为特征”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解读。这是该书与目前流行的许多其他著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应该说,在宏大的国际背景下对“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微观分析是作者在本书中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科尔奈写作本书的宗旨,正如他在本书中所言:“我要做的是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其中不包括个别的东西和特殊现象,有的只是一般性结论和共同特征。”作者在书中使用了大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料,亦即他所得出的每个结论均建诸于实证的基础之上。有鉴于此,他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在对这些资料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之上厘清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共同的体制特征。他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位解剖学家,而不是艺术家”。作为一个“节俭而吝啬”的建构者,他希望“能够发现社会主义体制与其他体制最少、但又最关键的特征差异,同时在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的历史发展中,清晰辨别不同的体制发展阶段。

鉴于科尔奈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卓越建树,他这部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著作目前已是许多国家大学中有关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必选教科书之一。

我们出版这部研究和分析社会主义体制的力作,希望读者能像科尔奈先生所说的那样,“能够认真思考本书所表达的观点,从而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当前的社会主义变革”。让我们在纷纭复杂的世界形势下,清醒地思考

一下我们自己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中有哪些体制特征?同时又受到哪些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其他一些因素在塑造中国独特的历史方面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当然,正是因为科尔奈的研究主要基于东欧的材料,基于历史的材料,所以不能简单套用到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的考察上,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超越了科尔奈在本书中所分析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局限和制约。尽管如此,本书仍然不失为中国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必备参考书。

本书中有大量出自英文文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引文。鉴于我国目前的马、恩、列、斯著作与之在翻译上的出入,故我们一律没有按例行的编辑原则对照中文原著译出,而是直接在脚注中标出引文的英文文献页码,特此说明。

中央编译出版社

# 英文版序言

## 1. 目　的

写作并出版本书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当我开始动笔的时候，柏林墙依然屹立，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领袖们还身陷囹圄，东欧仍是共产党执政。而当我在1991年春天写这篇序言的时候，这些国家已经在几个月前进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组建了新的国会，合法政府也开始担负起后社会主义的转轨重任。当本书面世或者当读者数年后再读起它的时候，谁还敢说自己能够预言未来呢？尽管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本书仍然希望能对这一体制的本质特征做出一般性的总结和描述。

请让我引用西蒙·谢玛（Simon Schama）在其杰作《法国革命》前言中的一段话："当问及中国总理周恩来对法国革命的重要性有何评价时，这位总理曾这样回答：'现在就下结论，为时尚早'。也许再过200百年，依然是'为时尚早'，或者是'为时已晚'。"我也想借用西蒙·谢玛这段耐人寻味的评论：对于一个社会研究者而言，即使再过200百年，要对（社会主义运动）这一宏大事件做出评价，同样是为时尚早，或者为时已晚。

但本书的作者却不想再等下去。至于能否接近历史真实，作者愿意承担所有的风险和不足：社会主义即使从1917年开始算起，也不过七八十年而已，而且现在每天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如果要用穿越几个世纪的历史眼光来加以评判，作者也许会理解不当，也许会夸大或削弱社会主义体制的某些特征。尽管本书力争做到客观公正，但不免会带有个人偏见。然而我无法抑制（也不想抑制）来自内心深处的冲动：我必须说出我要说的话。在阐明本书的意义之前，我想首先向读者坦白自己的个人写作动机，因为这必然会涉及到对我以前作品的评价。

作者所有关于社会主义体制方面的文章都以专题和论文的形式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每项专题研究都有其自身的重要价值,如扭曲的增长战略、持续短缺、改革的失败等等。作者当时对每一个专题都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但那毕竟只是整个社会主义体制的组成部分之一。[1] 现在,我想把自己在不同文章中所表达出的思考连成整体,从而可以有一个更为全面的综合。本书对我以前作品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其中既包括了我本人思考后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有从别人那里吸收的思想。

在系统整理本书的时候,我将指出每一种思想的先驱者是谁,从而将读者引向每个专题研究领域的总结性著作。我本人的思考也受到了许多人的影响,文中的注释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在此我还是想特别提到四个人的名字: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和哈耶克,因为他们不仅对我的思想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而且还影响了本书的研究方法。可能有人会因此而批评我:上述四位伟大的思想家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观点和科学哲学。的确如此。我还想加以补充的是(不再一一列举有关人士的名字),我还大量借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关内容,例如,当前西方制度学派的社会科学分析方法。批评者或许会认为这种过于多元化的思考方式很可能使本书成为折衷主义的大杂烩。当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各种方法之间有的相互冲突,有的互为补充。但我仍然希望得到一些有益的评论,支持我去尝试这一综合性研究。

我以前的著作都对社会主义体制提出了批评,但我没有像很多人那样从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或是领导机关(计划者)的错误来解释问题。我在文章中指出,(社会主义)体制带来了它自身根本无法解决的冲突,致使运行机制出现了功能性障碍。但我的分析主要限于经济领域,最多会涉及到政治领域的问题。本书试图跨越经济和政治的分界,出于研究的需要,关于政治权力结构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讨论在本书中占有一定的篇幅。毫无疑问,读者一定会感觉到,书中对政治权力结构或所有权关系的论证以及对体制表现的总结性评述决非作者的即兴之感(或是有感于最新的见闻),这一切

---

① 在迄今为止最综合性的论著《短缺经济学》的前言中,我曾强调指出,这里所做的讨论没有涵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问题。

都建立在严谨的理论大厦基础之上,更是作者自己多年来研究和思考的结果。

当然,我知道现在写这本书并不是一个“勇敢的行动”;但在今天谈起研究社会主义体制时,至少要有这样的勇气:应该抱着科学客观的态度,避免一味的攻击谩骂;要告诉人们为什么社会主义体制能够在这么长的时期内相对平稳运转并不断复制自身。我在书中把政治方面的问题也纳入了分析之中,在以前的著作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但这绝不是出于所谓的“勇敢和无畏”。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政治对于真正理解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至关重要。

最后,我还想说些纯属个人的想法。今年我已经63岁了,我们这一代人是历史的见证者,有义务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后人。有人已经用回忆录或历史纪实的形式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但我仍然想以自己的方式来见证这段历史:即进行专业分析。当身处于社会主义体制之中的时候,我们都已长大成人了,我们在这一体制下生活了四十多年,年轻人可能经历有限。对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上苍可能还允许我们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社会进行深入分析,但毕竟岁月不饶人,我们恐怕也没有信心等到生命中的风风雨雨都尘埃落定时再提起记忆之笔。正是这种想法让我有了序言开头的那句话:时不我待,我必须立即动手写作并出版这本书。

在叙述完写作本书的主观动机之后,我还要向读者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有关内容。社会主义体制的发展、停滞和衰落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事件。社会主义鼎盛时期,它曾统治着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社会主义不仅在过去和现在影响了体制之内的人,还深深地影响了社会主义世界之外的人们。千百万人都曾经心存恐惧,担心终有一天自己也将处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或者在爆发战争时,他们将不得不抵抗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在世界的一些地方,这并不是想像中的危险,而是真实的苦难经历:在一些国家内部或者不同国家之间,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不惜兵戎相见,相互残杀。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命运影响了无数人的世界观,特别是知识分子,包括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吸引的人和那些思想极端反共的人。社会主义体制所带来的现实后果同样让那些决心退出政治和意识形态之争并宣布奉行中间路线的人无法独善其身,因为他们不可能对冷

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且不管是否愿意，他们都要为冷战中的军备竞赛付出高昂的代价。有鉴于此，我相信，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朋友，还是社会主义的敌人，都需要了解这一体制的本质特征。

可能会有很多人对这本书感兴趣，我猜想主要有四类读者，而在这四类读者中，可能又以大学生和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为主。

首先，本书将献给那些曾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而如今走上了民主、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之路的人们。对旧体制的分析决不仅仅是为了回忆过去，而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

我希望那些仍生活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们也能读一读这本书。在此，我并不是要夸大这本书(或者任何其他的文字)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是相信它或许能够在方法上帮助他们分析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澄清自己的思想并最终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希望那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人们也能从书中受益。对他们而言，了解社会主义体制的过去和现在是职业和工作所需。例如，从事比较制度研究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研究当代史的历史学家、为金融和企业界提供咨询的专业人士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等等。

最后，还有一个理由让更多的人去关心社会主义体制，即使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职业兴趣范围。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言，这两个世界并非在所有领域和任何事情上都是截然对立的，有些现象既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出现，也同样会在资本主义体制里发生，只是程度和频率有所不同。让我仅仅举一些经济领域的例子。无论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还是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中，都会出现一些可称之为“社会主义萌芽”(这是马克思所用的术语)的趋势，如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政府开支不断膨胀、基层组织内上下级之间的讨价还价；人们也会遇到“短缺”现象，特别是享受国家补贴的部门；具有“父爱主义”倾向的政府替公民做出决策；中央计划和价格控制失控；救助陷入财务困境并处于破产边缘的大企业。没有必要再列举下去了。社会主义体制将这些现象以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为研究此类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环境背景。医学研究者发现最好能够在一个可以让疾病充分发展的“纯净实验室”里对某一疾病进行观察研究，这样，研究人员将来就能够在疾病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敏锐地观察到哪怕

是极为轻微的发病征兆。

当前，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和现状的书籍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了解是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拟的。本书力图帮助读者在这一片“知识汪洋”中把握自己的航向，从而能够更加轻松自如地驾驭滚滚而来的“信息洪流”，进行观察和思考。当代许多人士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详尽记述社会主义体制的历史（或是某个国家的历史，或是某一阶段的历史），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我无法也不想与他们竞争，我的目标是想在一个严谨的结构下研究这一领域内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分析的规范性。鉴于本书的内容是对社会主义体制的考察、总结和综合，我也希望它能够成为一本有用的教科书。①

我还希望本书能够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一些新的东西。但必须说明，这本书绝不是仅仅写给那些非常重要但人数不多的专业人士看的，我写的是一本综合性著作。我相信经济学或政治学的学生、经济咨询人士、外交官，或是打算去东欧或苏联作首次访问的记者，以及那些仅仅想看一本关于社会主义体制书籍的读者，本书都能够起到指点迷津的作用。②

如果今天有位作者想写一本书来简单介绍资本主义体制的微观或宏观经济学（作为教科书或其他用途），他完全能够确信已经出版过一系列此类的综合性书籍。但就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而言，综合性研究著作却少之又少。③ 读者不难发现本书有诸多不足之处：有些问题没有全面展开，许多争

---

① 乍一看，这些目标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仅就我自己的判断而言，这本书并不符合通常的分类规范。按照一般性的分类要求，写给本科生的介绍性教科书要通俗易懂；而研究生教材则要强调较高的技术性，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区别。同样，为广大知识阶层人士所写的书和让专家学者阅读的东西也是完全不同的。可是非常抱歉，由于本人能力所限，只能写这样一本综合性的作品，并力图简单明了。但我相信心胸宽广的研究生或其他研究者并不会仅仅因为在其中找不到数学模型便将其束之高阁。只要各位对社会主义体制这一问题感兴趣，相信阅读本书一定会有所裨益。

② 鉴于本书的综合性特征，篇幅有限，因此，不可能对某些问题进行详尽讨论。脚注里的参考文献及书目能够帮助对有关问题感兴趣的读者进行深入研究。仅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似乎有些片面性，因为大部分参考文献都是用英文写成的。对于其他语言的参考文献，只是在作为思想来源或数据材料时，或是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并无法在英语文献中找到时，才会出现在本书中。

③ 这里必须提到是 P. Wiles(1962)的开拓性著作。

议仍未定论。有关社会主义体制的许多档案刚刚公开,大量伪造的数据正被逐一曝光。如果若干年以后,能再有一本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学的书问世的话,它一定会比本书更好。可万事总要有人开个头,去做那些综合性的研究工作。

## 2. 经典社会主义、改革和后社会主义转轨

本书第一部分的前半部分内容主要是讨论社会主义体制中被称为"经典社会主义"的有关问题。关于"经典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后文中将进行详细阐述,这里我仅限于讨论以下国家的"经典社会主义"政治结构和经济体制: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处于同一时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少数国家。

这里有必要再回到序言开头西蒙·谢玛提出的那个问题:现象之间的时间距离。本书的前半部分对一段相对封闭的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总结。除了极少数国家之外,"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已经成为过去,但仅从分析视角而言,"经典社会主义"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但是,由于"经典社会主义"在其存在的时期过于封闭,以至于很难将它概括为一个特定的历史主题。尽管"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早已远去,但它仍然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今天的世界。本书在第二部分里将重点讨论这些影响。了解经典体制对于我们认识这些国家的改革进程和后社会主义转轨中的种种复杂现象至关重要。而对经典体制的考察则显示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受到其他体制的"污染"之前,是如何在"纯理论模式下"运行的。一旦理解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读者就自然会得出政治和理论上的结论。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如 1968 年卡达尔在匈牙利开始的改革和 1985 年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重新激发社会主义体制的活力,因为社会主义体制总是时而前进、时而停滞。改革带来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开始松动,尽管存在种种严格限制,私人企业还是有可能悄然而出的。此前许多潜在问题如今都已浮出水面;改革与反改革之间的冲突导致了相互矛盾的状态,新的困难又接踵而至。本书最后对改革持有非常悲观的结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无法**

**走出自己的影子,局部改革永远不可能突破自身,因此,必须要有体制上的彻底变革**。

很容易就可以总结出本书关于政治问题的结论:尽管斯大林式的经典社会主义是高度集权型的和无效率的,但是它构成了一个连贯统一的整体。然而当该体制开始改革自身的时候,这种连贯性同时也就被破坏了,内部矛盾也将不断加深。尽管改革带来了一系列好的变化,但它注定要失败: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无法从内部进行自我更新,从而长期保持活力。因此,当最终发生真正的革命性变革之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将一去而不复返,社会也将从此迈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虽然我感到进行综合性研究并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及其改革进行实证分析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我不敢说,现在就可以对后社会主义转轨进行类似的综合性实证分析。[①] 在第三部分对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一再强调了后社会主义时期所继承的经典社会主义遗产,但是我并没有继续深入下去,读者也不应期望其中会对后社会主义转轨有深刻的分析。[②] 对于那些仅仅想快速了解社会主义转轨及其现状的人来说,阅读本书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对那些真正理解社会主义之后的转轨以及转轨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内在问题的人而言,本书值得一读。"转轨"一词清楚地表明了自身的含义:从某个地方开始向特定方向前进。显然,出发点就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这一体制将对打算告别它的社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那里的人们将会继承所有的制度、思想和本能。

肯定会有部分读者急于了解现状,他们免不了要从第16章开始阅读。我理解这种心情,但还是希望读者能够花一些时间研究改革之前的经典体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透彻理解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危机

---

① 我的另一本书《通往自由经济之路》(1990)从规范分析的角度讨论了与后社会主义转轨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该书总结了我自己的经济政策行动建议,但这不同于对后社会主义转轨进行综合性的实证分析,因为转轨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感到时机尚未成熟。

② 尽管本书没有对后社会主义转轨进行实证性分析,但我希望帮助读者(特别是教师和学生)了解相关文献。我在书最后的附录部分列出了补充参考资料,其中包括了经过选择的后社会主义转轨研究英文文献。其中有几篇文献本书没有参考,因此,也就没有列在参考书目中。

和整个变革历程，理解国家事务，理解后社会主义改革开始时所面临的困难。

当本书面世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后社会主义转轨国家仍将处于巨变之中，未来究竟如何，恐怕很难进行准确预测。但我相信，不管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本书的主要论点依然成立。虽然根据特定时间和特定地方所发生的事件的说明性评论总结出一般特征，这并非难事，但是我本人无意根据 1988 - 1991 年间新出现的各种数据和现象来对本书中的观点进行"最新"的阐释。

## 3. 致　谢

我从 1983 年开始准备本书的研究工作。这些年里，我有时在社会主义国家，有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研究，这样一种经历更激发了我通过比较的方式来更好地理解和分析社会主义体制。

自 1984 年以来，我一直在哈佛大学担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教学工作，该课程的讲稿在 1986 年有了复印本，这也可以看做是本书最早的一个初稿。面对课堂上那些严谨认真的学生，我更深切地感到，把这方面的知识传授给他们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聆听一系列课堂讲座的听众来自世界各地，讲义几易其稿，每次都要进行新的修订。在课堂上，不乏来自西方的学生，他们可能对社会主义一无所知，其中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他曾被下放到农村生活了很多年；也有来自波兰的研究人员，他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有着亲身的经历，熟知其中"奥妙"。还有不少保守派的年轻人，他们对共产主义抱有极端的偏见；也有丝毫不了解社会主义体制荒谬之处的"新左派"幼稚分子。听众来源的多元化促使我尽力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让他们了解我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我要再次感谢学生们的积极参与、踊跃提问和他们极富启发性的考试论文。有了课堂上的教学实验，才有了这本书。

衷心感谢为我写作本书提供帮助并为我创造了启发思维的环境和良好研究条件的所有机构：匈牙利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哈佛大学经济系、联

合大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研究所。特别要提到发展经济学国际研究所所长 Lal Jayawardena 博士及其他工作人员,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还要感谢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厚资助的基金组织,它们分别是:斯隆基金会、福特基金会、麦克唐纳基金会以及匈牙利国家科学研究基金。

感谢我的妻子 Zsuzsa Daniel,是她一直鼓励着我并给了我无私的支持,而且在本书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有机会能与她共同讨论。作为初稿和手稿的第一位读者,作者对她提出的评论和建议始终感激在心。

在同事中,我必须首先提到 Maria Kovacs,她的献身精神、严谨的学术态度、无比的耐心、高效的合作以及一丝不苟的工作对我而言是无可替代的。我还要特别感谢 Carla Kruger,她为本书的写作花费了大量心血,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评论以及其他各种帮助。同样感谢 Judit Rimler,她在数据图表的整理过程中为我提供了出色的帮助。

本书的大部分手稿是在匈牙利完成的,Brian Mclean 承担了英文版本的翻译工作,Julianna Parti 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为作者(母语是匈牙利语),我可以说,本书的翻译准确充分地表达出了我的想法。对两位翻译者细致耐心的工作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不仅翻译了本书的最初稿,而且对此后的大量改动都进行了重新修订。

我还想特别提一下以下同事的名字:Janos Arvay, Attila Chikan, Mairann Dicker, Piroska Gerencser, Zsuzsa Kapitany, Janos Kollo, Goohon Kwon, Aladar Madarasz, Peter Mihalyi, Laszlo Murakozy, Jozsef Palfi, Jane Prokop, Yingyi Qian(钱颖一), Istvan Salgo, Judit Schulmann, Anna Seleny, Gyorgy Such, Ivan Szegvari, Istvan Janos Toth, Jane Trahan, Agnes Veszi, Xu Chenggang(许成钢)。他们在收集数据、整理注释、表格及参考文献,以及其他编辑工作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为此,我衷心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当然也包括许多未能提及姓名的人。我还要感谢 Hona Fazekas, Ann Flack 和 Liisa Roponen 出色的打字工作。

很多同事或早或晚都阅读了本书的手稿,他们的评论意见使我受益匪浅。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以下各位:Tamas Bauer, John P. Berkett, Timothy J. Colton, Ellen Commisso, Ed A . Hewett, Mihaly Laki, Ed Lim, Frederic L. Pryor, Andras Simonovits, Robert C. Stuart, Martin Weitzman。从同事和其他

读者的批评中,我吸收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当然,书中所有的错误都将由我自己承担。

最后,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正是在它们的帮助下本书才得以迅速出版。为此,我也要对 Jack Repcheck, Anita O'Brein, Karen Fortgang, Jane Low, Andrew Schuler 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的热情鼓励和细致的编辑工作。

于 坎布里奇

马萨诸塞

布达佩斯

# 中文版序言

《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作为作者，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我用了五年时间写作本书英文第一版，当然，所投入的精力远远不是时间所能说明的。本书总结并综合了我本人自 1955 年以来的所有研究成果（那一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研究著作《过度中央集权化的经济管理》）。

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充分关注本书中的三个基本思想：

第一个思想从题目中就可以直接看出：本书的主题是社会主义**体制**。可以用“体制（制度）范式”这一概念来表述本书的研究方法，它很好地概括出了以下主要特征：[①]

1. 采用“制度范式”的研究者把体制（制度）看成一个整体，强调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尽管知道局部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些学者在其研究领域内基本不采用单纯的局部分析方法。

因此，本书在内容上涵盖了社会主义体制的所有主要领域：政治架构、意识形态、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和对经济的监督管理、体制内部的信息流动、典型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塑造的典型行为特征。这一点构成了本书和许多其他著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它们一般都局限于分析某

---

① “范式”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哲学和科学史学家库恩引入到科学理论中的（见《科学结构的革命》，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如果一群科学家都在研究并力图解决同一类（或密切相关）“难题”，而且他们所使用的概念工具和研究方法也都相同或紧密相关，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些科学家都是在同一范式内进行研究和教学的。

我在“制度范式”一文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更详细的介绍（见：Altraud Schelke, Wolf - Hagen Krauth, Martin Kohli 和 Georg Elwert 等人主编《社会变迁的范式：现代化、发展、变革与演进》，法兰克福/纽约 2000 年版：Campus Verlag/St. Martin's 出版社，第 111 - 34 页）。《制度范式》一文的中文版见中信出版社《比较》杂志 2002 年第 1 期。

一领域的问题——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

2.“制度范式”不属于任何传统的分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或政治学),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宽泛的社会科学流派,其重点是研究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各个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

3.相对于短期经济、政治或文化问题,以“制度范式”为指导的研究者更关注长久的制度,所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都是在特定制度框架内发生的,而且制度对它们的发展历程具有重大影响。本书所定义的“制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其中包括法律制度、伦理规范、产权安排、权力配置、社会成员的激励机制以及制度内部的信息结构,等等。

“制度范式”特别关注的是:社会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否具有特定的体制特征。换句话说,这些特征是与体制本身有关,还是源于其他环境因素(如政治领袖的个人品质、日常的政治或经济活动、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人口分布特征)?

4.“制度范式”希望人们认识到,现存结构与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特征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制度范式”研究在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现实和过去)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5.与目前主流经济学不同的是,“制度范式”研究从一开始并不假设个人的偏好是事先决定的,它所关注的重点是社会条件和个人偏好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塑造了处于特定位置的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模式及相关动机。

6.“制度范式”的研究者认识到了与特定体制密切相关的低效率以及功能失调。例如,马克思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的各种负面特征归结为工厂主的邪恶本性,而是看到了其中的体制根源。每一种体制都能够在制度内部修正其具有巨大危害的体制特征,但是它们无法完全克服并彻底消除这些体制特征,因为这些特征深深地植根于制度自身,并且具有自我复制的倾向。

7.每一种范式都有自己的方法论和典型的分析方法。“制度范式”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比较**:通过与其他体制相对应特征的比较研究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体制特征,并分析其中的异同所在。

“制度范式”具有很长的历史,尽管很多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人并没有使用这一说法。“制度范式”研究第一个伟大的先驱者是马克思,他的著作充分体现了上述7点所概括的内容。“制度范式”研究者中还包括其他许多

伟大的社会科学思想家，如冯·哈耶克、卡尔·博兰尼、约瑟夫·熊彼特，尽管这些人在世界观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

在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开始使用“制度范式”分析方法（非常不幸的是，为数并不多）。在《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我有意识地努力尝试使用“制度范式”的研究方法。如果这本书的出版能够鼓励更多的中国研究者采用类似的视角和分析方法来研究和理解自己的国家，我将深感荣幸。

我想提醒读者关注的第二个基本思想是：能够在更高层次上进行一般性概括和抽象研究。

我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分为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指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体制内诞生后一直到建立起稳定的社会主义体制；第二个阶段我称之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第二个阶段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改革阶段，改革的目标是进行体制的自我更新。对于每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这三个阶段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日期都各不相同，并且都具有各自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例如，苏联的经典社会主义阶段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1953）。我们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清晰地辨明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之处，更无法复制自己的历史。本书没有讨论个别国家的具体特征。在进行社会主义三个阶段的分析中，为了找出不同国家所具有的共同体制特征，我们有意忽略了每个国家的个别特征。艺术家在创作肖像作品时，会努力把握主人公区别于他人的个性特征，但在进行人类分析的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却需要阐述人类具有的共同特征。如果要研究阿尔巴尼亚或蒙古的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者就要力图用最大限度的细节描述和丰富的资料分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本书志不在此，作者更想成为一位解剖学家，而不是艺术家。我要做的是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其中不包括个别的东西或特殊现象，有的只是一般性结论和共同特征。

作为一个模型的建构者，他没有必要竭力让自己的作品丰富多彩，那份工作可以留给历史学家，他宁愿成为一个极为“节俭而吝啬”的创作者。理论概括的最大成功就在于，它能够发现社会主义体制与其他体制最少、但又

最关键的特征差异,同时在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的历史发展中,清晰辨别不同的体制发展阶段。换言之,它必须找出充分而又必要的体制特征。正是遵循这种力图"节俭吝啬"的想法,本书在第15章概括出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特征。本书在后半部分主要描述了偏离经典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的基本轮廓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典型特征。

中国既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波兰和越南。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发现《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概括的一般特征并没有以特殊的方式在中国表现出来,就轻易地下结论说,本书不适用于中国。

我坚信中国的读者能够认真思考本书所表达的观点,从而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当前的社会主义变革。这里我就可以引出本书的第三个基本思想,它能够为分析下面的问题提供一个平台和基础:中国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中具有哪些体制特征?同时又受到哪些其他因素的影响?本书的研究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进行因果分析,这样才能够区分体制因素和其他因素。从一方面看,社会主义制度支配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这为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从另一方面看,其他一些因素在塑造中国的独特历史过程中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因素包括:独一无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广袤的国土面积、地理位置、伟大人物的个人品质(毛泽东或邓小平)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这本著作或许有助于理解不同的发展道路以及体制特征上的因果关系,同时它也可能无法为人们提供所谓的"指南"。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中国读者必须认真考察其他各种因素。在这方面,国际上也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但我想,最终还是要依靠中国学术界自己进行最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的问题所在。

借此机会,我还想表达对那些让本书得以在中国出版的各位人士。首先要向我最亲爱的朋友肖梦女士表达最诚挚的谢意。在出版本书的过程中,她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指导并校对了翻译文稿,其中包括编辑整理工作。可以说没有肖梦女士的努力,就不可能有本书中文版的问世。

我还要感谢本书的译者张安,为此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还要感谢布达佩斯索罗斯基金会为本书的翻译提供了资金支持。

此外,我还要感谢汪辉先生、孙宽平先生、赖海榕先生,他们为本书能够

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也要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和龚社长和责任编辑邢艳琦女士。

对于中国人民我始终充满敬意和热爱。想到通过本书又能够和你们进行思想上的交流，我在此深感荣幸。


经济学教授　雅诺什·科尔奈

布达佩斯

哈佛大学

布达佩斯学院


2006 年 1 月

# 目录

## 第二部分 经典体制剖析

# 第三部分 偏离经典体制

# 第一部分

# 出发点



# 第一章 内容与方法

本章的目的之一是想解释一下这本书的题目。我们认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清楚地告诉读者：这本书要研究哪些问题以及是用什么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当然，在这短短的一章里也不可能进行过于详细周密的阐述。

## 1.1 历史发展的特殊路径与一般特征

首先我们用“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引例来说明本书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虽然很多学者都在研究中国，但是几乎每个研究者都感到想真正了解（并理解）这个如此宽广博大而又纷繁复杂的国家是多么的困难。这里我仅列出现今中国的几个主要特点：

1. 共产党已经在中国执政40多年，这给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各个层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2. 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所谓“第三世界”就是指与发达的工业国家相比，属于这一世界的国家相对贫穷、落后。

3. 就地理位置而言，中国是亚洲的一部分。在历史发展、文化遗产、宗教与哲学传统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关系等方面，中国都带有许多典型的亚洲国家特色。

4. 上述三个特征表明，中国与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有相似之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国家），但中国在很多地方又是独一无二的，无法与其他任何国家进行比较。就国家规模而言，中国有十几亿人口，

这使它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由此成为其他亚洲文化的摇篮。与任何国家的历史一样,中国极具特色的历史发展也使它明显有别于其他国家。上述分析也适用于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历史发展,毛泽东不是斯大林或铁托,同样,邓小平也不是卡达尔或戈尔巴乔夫。在每个阶段,中国所采取的政策都与其他国家的政策(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其他类型的国家)有很大差别。

不少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强调每个国家及其社会、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上述第四个特征中所指出的),他们通常认为寻找所谓的一般性规则或阐述普遍的历史规律都将劳而无功。

也有人认为采用一种更为一般性的方法会有所收获。他们试图研究不同国家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例如,许多中国问题的研究者都强调第二个特征,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他们眼里,这一特征可以很好地解释所观察到的大部分现象。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第三个特征最值得关注,即中国与日本、韩国以及印度的相似性模拟研究。

本书并不完全排斥归纳总结"共同规律"的方法,当然也不认同所谓每个国家的特征都是独一无二的。本书认为,尽管许多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但是某些东西还是以相似的方式对其产生了一般性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说,本书避免采取任何一种单一因素解释论,而且坚信,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必须运用多因果关系和多因素分析方法。为了对中国的现状进行全景式描述并更好地解释其现有制度和历史发展,必须考虑上文提及的所有特征(当然也应包括尚未提到的其他特征和影响因素)。

尽管多因素分析方法必不可少,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但是本书还是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某一类因素分析:即第一个特征中所涉及的有关问题。我们的目标是想针对中国、苏联、朝鲜、南斯拉夫等所有共产党(曾经或仍然继续)执政的国家,深入研究具有共性的社会现象、因果关系和一般性规律。没有人可以宣称(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这样宣称),这种研究方法能够解释中国、苏联或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所有问题。我们确信,对上述共性问题、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以及一般性规律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考察,为研究此类国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当然也包括其他有用的分析工具)。

## 1.2　社会主义国家

表1.1列出了共产党执政较长时期(至少是数年以上)的所有国家。纳入此表的唯一标准就由共产党的执政。此后,本书把表中列出的所有国家都称为**社会主义国家**。

截止到本书写作的时候,表中所列的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共产党执政,而有些国家的政治结构已经出现了变化[16.3]。①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一词仅指曾经或仍然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图1.1是一幅世界地图,图中的阴影部分标明了截止到1987年社会主义体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社会主义大家庭"在1980－1987年间达到了顶峰状态,此后就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萎缩。

至此,我认为有必要提前阐述一下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一观点作为主旨将贯穿全书的所有章节:尽管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各不相同,但它们绝对不乏相似之处,并且显示出了非常重要的共同特征。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运行体制在细节方面确实有很多差异,但所有这类国家都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将其明确纳入同一类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本书称之为"社会主义体制")。这里可以借用一个生物学上的模拟:某一个社会体制是某类社会体制的一个"种"。正如生物学中某一"种"个体和另一"种"个体会出现差异,但它们仍然属于同一"类"。因此,我们说单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但它们都属于同一类的社会体制。本书所探讨的主要内容是:清晰概括"社会主义"这一类体制的本质所在;描述(并从理论上解释)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用本书中的话来说,这些共同现象和特征都可以称之为"特定制度"。就这一点而言,本书有意进行了单一层面的考察,目的是想从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找出其有别于其他体制的特定制度特征。因此,本书不打算在一开始就对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而是想归纳出某种具有普遍性的结论,使之可以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

① 方括号里的数字系可参看的本书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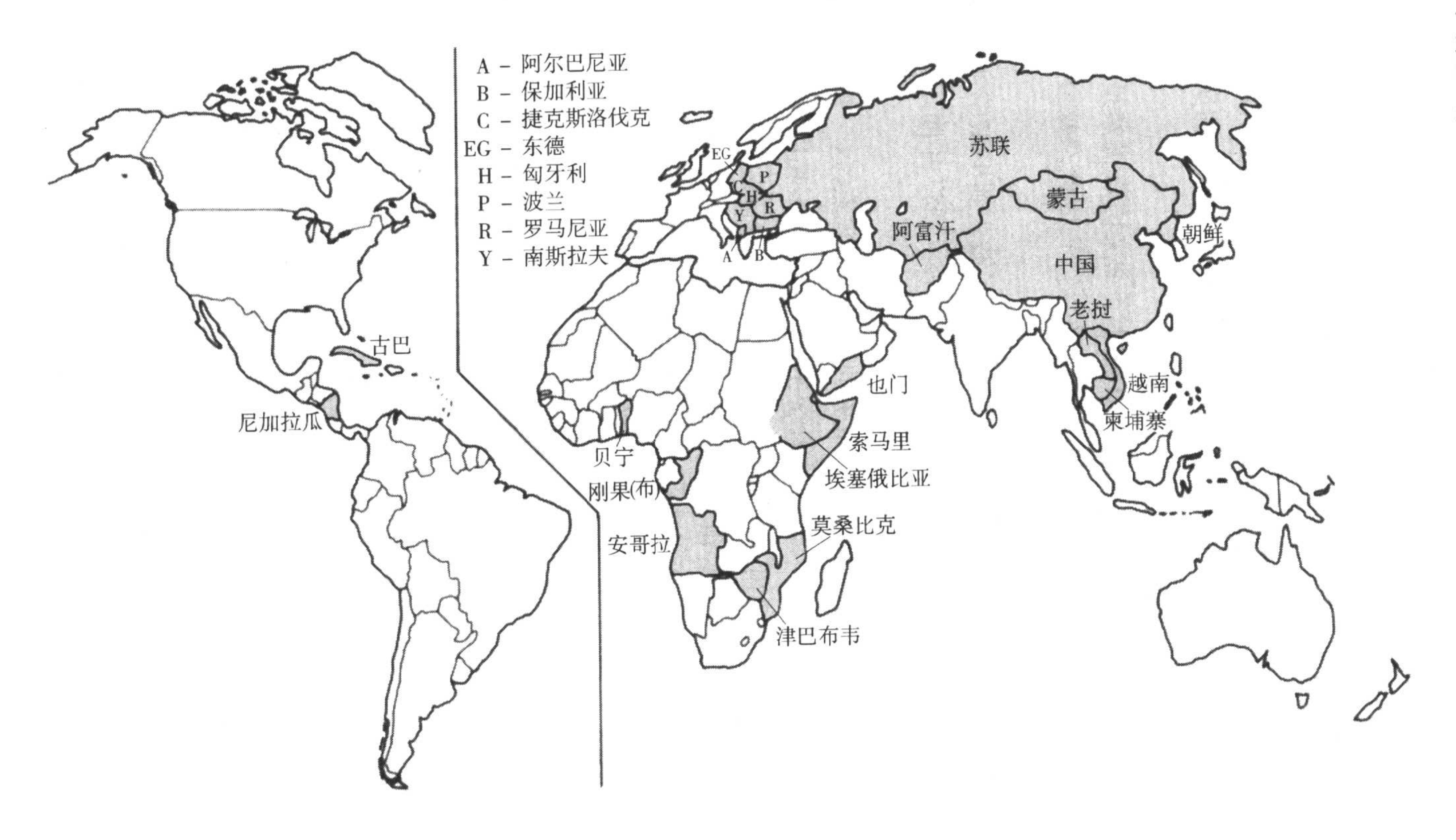



图 1.1 1987 年的社会主义国家

表 1.1　社会主义国家(1987)

| 1 | 2 | 3 | 4 | 5 | 6 | 7 |
|---|---|---|---|---|---|---|
| | 国家 | 开始执政时间（年） | 人口 1986（百万） | 面积 1986（千平方米） | 经济发展水准人均 GNP 或 GDP 1985（美元=100） | 农业人口所占比例 1985（百分比） |
| 1 | 苏联 | 1917 | 281.1 | 22.402 | 50.0 | 19 |
| 2 | 蒙古 | 1921 | 2.0 | 1565 | — | 53 |
| 3 | 阿尔巴尼亚 | 1944 | 3.0 | 29 | — | 50 |
| 4 | 南斯拉夫 | 1945 | 23.3 | 256 | 40.4 | 30 |
| 5 | 保加利亚 | 1947 | 9.0 | 111 | 40.8 | 23 |
| 6 | 捷克斯洛伐克 | 1948 | 15.5 | 128 | 59.2 | 12 |
| 7 | 匈牙利 | 1948 | 10.6 | 93 | 46.0 | 20 |
| 8 | 波兰 | 1948 | 37.5 | 313 | 39.2 | 30 |
| 9 | 罗马尼亚 | 1948 | 22.9 | 238 | 34.1 | 28 |
| 10 | 朝鲜 | 1948 | 20.9 | 121 | — | 48 |
| 11 | 中国 | 1949 | 1054.0 | 9600 | 19.5 | 74 |
| 12 | 东德 | 1949 | 16.6 | 108 | | 10 |
| 13 | 越南 | 1954 | 63.3 | 330 | — | 70 |
| 14 | 古巴 | 1959 | 10.2 | 115 | — | 25 |
| 15 | 刚果(布) | 1963 | 2.0 | 342 | 8.7 | 90 |
| 16 | 索马里 | 1969 | 5.5 | 638 | 3.1 | 82 |
| 17 | 也门 | 1969 | 2.2 | 333 | — | 44 |
| 18 | 贝宁 | 1972 | 4.2 | 113 | 4.1 | 60 |
| 19 | 埃塞俄比亚 | 1974 | 43.5 | 1222 | 2.4 | 86 |
| 20 | 安哥拉 | 1975 | 9.0 | 1247 | 4.5 | 60 |
| 21 | 柬埔寨 | 1975 | 7.7 | 181 | — | 90 |
| 22 | 老挝 | 1975 | 3.7 | 237 | — | 76 |
| 23 | 莫桑比克 | 1975 | 14.2 | 802 | 4.1 | 85 |
| 24 | 阿富汗 | 1978 | 18.6 | 648 | — | 83 |
| 25 | 尼加拉瓜 | 1979 | 3.4 | 130 | 15.6 | 65 |
| 26 | 津巴布韦 | 1980 | 8.7 | 391 | 7.6 | 35 |
| 1-26 |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 | 1692.6 | 41654 | | |
| | 社会主义国家占世界同类资料的比例 | | 34.4% | 30.7% | | |

**资料来源**:第 4 - 5 列:《世界发展报告》(1988,第 221 - 23 页)和 Kozponti Statisztikai (中央统计办公室,布达佩斯)(1989,第 9、14 - 15 页);第 6 列:R. Summers, A. Heston (1988,表 3、4);第 7 列:G. Balo, I. Lipovecz (1987)。

注释:1. 武装暴动取得政权的时间或者是以暴动发生的年份确定(如苏联是 1917 年),或是以取得胜利的年份确定(如南斯拉夫,1945;越南,1954)。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东欧国家则按照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的年份确定。

2. 与本书中其他地方一样,这里所提到的国家名称是根据其地理位置来确定的,而不是根据其官方名称。例如,朝鲜的官方名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东德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等。

3. 1987 年的数据。

4. 农村人口。

5. 有些国家(如缅甸、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圭亚那、马达加斯加、圣多美和塞舌尔)很难清楚界定,因此,没有列入本表。根据本书的标准,很难说在 1987 年时这些国家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就表中所列出的前 14 个国家而言,共产党在那里执政最少已超过 30 年,这一时间长度足够让社会主义体制稳定和巩固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足以让其体制特征完全发展成熟,因此,也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科学观察、论述和分析的主题。本书正是以巩固稳定下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共同经历为基础展开全部研究的。①

从表 1.1 的第 15 行开始,在这些国家里,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相对较短,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其中有些国家的共产党执政已经结束,其他一些国家也即将结束。对这些国家而言,社会主义体制并没有巩固和稳定下来,而且社会主义制度能否继续保留或得以巩固还将取决于迅速变化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鉴于上述原因,我们无法从这类国家的经历中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总结。在本书的论证中包含这样一个假设:如果第二类国家(表 1.1 中位于 15 行以下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发展巩固,那么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得到巩固和稳定的国家(表 1.1 中 15 行以上的国家)中所观察到的一

---

① 本书中的大部分解释性案例、资料和参考文献都是指建立了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集团中的一部分国家。按照表 1.1 中的顺序,这 9 个国家分别是: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中国和东德。

般规律迟早会在此类国家出现。但本书不打算检验这一假设的真实性。①

## 1.3 对“社会主义”一词的解释

“社会主义”这一提法所引发出的思考可以在两个方向上加以延伸:一个是社会主义传达着某种思想;另外一个是让人想起某种已有的社会存在。第一个方向涉及到“社会主义”所传达的思想,其范围很广而且各有不同,因此本书不打算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对于真实的历史存在,前文已经清楚地表明本书主要探讨的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许多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无数社会民主人士、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很多新左派的拥护者,他们认为表1.1中所列出的国家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外,最近几十年以来,表中所列的26个国家不断有个别国家的领导人指责别的国家背弃了社会主义事业。谁都不会忘记斯大林谴责过南斯拉夫的铁托,而苏联和中国也都曾相互指责对方。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领导人更是认为,由共产党领导的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者。

本书有意避开上述争论。表1.1中的每个国家的官方领导人都声称自己的国家是社会主义体制。既然这些国家自己都把自己称做社会主义国家,那还有什么必要替他们另贴标签呢?!本书在后面的部分还会提到,有不少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派别也认为上述国家具有社会主义的体制特征。本书不想去研究这些国家究竟是不是“真”的社会主义,我们只是探讨这些国家建立了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依据某些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的标准去判定它们是不是社会主义。

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和新闻媒体经常使用“共产主义体制”或“共

---

① 至于我们在前面没提到的国家的研究资料也相当丰富,其中包括对特定国家经济状况的概括性描述,如阿富汗:B. Sen Gupta(1986);阿尔巴尼亚:A. Schnytzer(1982);安哥拉:K. Somerville(1986);古巴:C. Mesa-Lago, M. Azicri, A. Zimbalist, C. Brudenius(1989);哥伦比亚:M. Vickery(1986);老挝:M. Stuart-Fox(1986);蒙古:A. J. K. Sanders(1987);莫桑比克:H. D. Nelson 等(1985);尼加拉瓜:D. Close(1988);朝鲜:F. M. Bunge(1985);南也门:T. Y. J. S. Ismael(1986);越南:M. Beresford(1988);津巴布韦:C. Stoneman(1989)。

产主义"一词来称呼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让那些还没有读过本书的人更容易理解,我用"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本书的副标题。但贯穿本书,我还是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体制"①一词。

在讨论社会主义体制这一问题的文献中还有其他各种名称,如"苏联体制"、"中央管理型经济"、"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经济"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等。总而言之,名称的选择只是一个语义学上的问题,只要能够准确界定其含义,对此不必过于在意。

上面的内容只讨论了问题的一半,即为什么要用"社会主义"来称呼表1.1中所列出的26个国家。问题的另一半是:为什么"社会主义"一词只适用于这些国家。例如,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社会主义"来称呼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型国家,这些国家几十年来一直被社会民主党政府所控制,而且有高水平的平均再分配。再如,为什么不能把一些非洲和亚洲的国家称为"社会主义",尽管它们没有当权的马列主义政党,但它们自己却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并且也确实具有某些社会主义体制特征。

本书无法为这类问题提供答案。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本书不打算纠缠于上面所提到的国家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避免产生误解,需要指出的是:书中在使用"社会主义体制"一词时,仅指那些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当讨论到其他体制时,其目的也只是为了进行体制比较,否则都不在本书的主题范围之内。

## 1.4 "政治经济学"

在本书的副标题中,我们使用了"政治经济学"一词,而没有用"经济学"。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没有什么区别,

---

① 我在选择是使用"社会主义"还是使用"共产主义"时,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作为共产党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列主义是在很多不同意义上使用"共产主义"一词的。它用"共产主义"来指称未来的乌托邦社会,在那里每个人都将按需分配社会产品。当权后的共产党支持者从未把自己的体制叫做共产主义。因此,仅仅由于社会主义体制外的人用"共产主义"这一称呼,就把共产主义一词加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是非常不合适的做法。本书力图从"内部"来讨论社会主义体制,因此,本着这一精神,当然要用"社会主义"一词,社会主义国家也正是这么称呼自己的。

但近些年来，这两个术语却有了非常不同的政治和理论含义，尽管两者之间也存在许多相互重合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关于它们之间的区别[1]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但我必须在此对本书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做出明确的说明。

就本书的内容而言，我们主要是在较为狭义的概念上对有关经济问题进行探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关于生产与消费、投资和储蓄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经济活动的效率如何？当然也会考察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现举例如下：

◆ 政治和经济领域之间存在哪些联系？政治机构的体制框架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工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 哪些社会特征塑造了决策者的价值体系和选择标准？

◆ 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本书不打算局限于研究“事物”之间的联系。本书主要关注点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其中将着重分析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使用权力者和服从权力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东西塑造了上述关系，而后又对经济活动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正因为要对上述全部问题都进行考察，所以读者能够想到，本书肯定会超越更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边界，而且必然涉及政治科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和道德哲学以及历史等诸多领域，这种学科的延伸恰好是“政治经济学”一词所力图表达的含义。

毫无疑问，研究领域的扩展必然有其缺陷，因为它不免会侵占某些可以进行深入阐述的经济学分析空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扩展为研究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内部关系提供了空间，从而可以做出更为全面的考察分析。

## 1.5 实证分析

本书的主旨是对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主义体制及其历史沿革进行实证分析。

---

① 例如，公共选择理论的支持者、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当今西方的左翼经济学家都对此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对此问题更全面的历史性介绍可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P. Groenewegen 编著，1987 年版第 3 卷第 904 – 907 页)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词条。

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自己使用的官方教科书在教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常常把现实和愿望混在一起，把现存体制的真实特征与想像中可以公平有效运行的体制特征混在一起。本书将放弃这一做法以避免出现扭曲。我们的目标是要描述经验展示出的东西，力图刻画出体制内的常态和特征，而不是去讨论，如果体制能够有效运行，将会发生什么。书中将多次回答下面的问题：体制的常态是什么？体制的习惯是什么？体制的一般规律又是什么？本书将不涉及那些规范性的问题，如从公共福利和社会利益出发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本书的任务是要描述和解释长期适用于某些地方的规则。社会科学家并没有制定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永恒不变的规则，规则则是一个更一般性的概念，规则的产生依赖于环境的不断变化，而环境的变化又塑造了行为模式、经济代理人的决策路径、政治和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及经济过程的发展趋势（这些现象都可以进行解释）；一项规则并不是始终有效的，它受制于创造规则的制度。但我们还是能够找出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制度环境中一直保持稳定的某些规则。本书在一开始便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存在足以让某种行为规则发展成熟并最终稳固下来。①

至于本书的实证描述及一般结论是否正确，唯一的检验方法就是参照现实进行对比。但必须提醒读者的是，目前很可能还无法进行这种严格检验。因此，我们还是希望，读者能够将书中的很多观点作为有待证实的假设。当然这并不是说本书无法为其论点提供支持。最重要的是，作者确信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术研究者能够彻底推翻书中的主要结论。②

在很多情况下，支持某个假设的结论性“证据”是由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士提供的。他们认同书中所描述的情形吗？纸上所写的东西与他们（作为消费者或生产者，经理或雇员，以及购买者或销售者）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东西能够吻合吗？我把自己也视为这样的“证人”。此外，几十年以

---

① 本书在谈到普遍有效的规则时会使用现在时，而在谈到在某一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内的现象和事件时会使用过去时。

② 如果有其他专业著作对某个假设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只要是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我都会在脚注中提醒读者。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我在脚注中提到的这类问题时，那都表明这些假设仍处于争论之中。

来，我一直和许多其他“证人”进行交谈，阅读了大量案例、报导、会议记录、书面报告、采访纪实以及社会地理研究报告，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①] 我之所以提出自己的假设，是因为我坚信书中所提出的论点与真实的生活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如果有任何论点与其重要“证据”相违背，我随时准备进行重新思考。

对于那些更一般性和更抽象的论点，常常无法直接检验其正确与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根据一般性结论与特定结果及部分规则（它们从一般性假设中得出并且能够在实践中加以充分证明）的吻合程度来检验其正确性。在不少地方，本书都将采用这种一致性程度分析方法来处理上述问题。

书中也利用了统计材料（其中包括86份统计表格、7张统计图标以及大量的其他数据[②]）来支持部分论点。此外，在脚注中我也列举了支持书中有关论点的更详细的实证研究文献，其中还包括一些经济计量分析。

我还想加以说明的是，到目前为止，相关的专业文献仍然无法从实证的角度清晰阐明本书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很多官方资料都存在有意扭曲的现象，因此，会产生明显误导。当然，因为情况的变化，许多资料正在进行重新审查和修改，这一过程很可能持续下去，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以前所有的错误资料都得到更正。对一些资料进行更正，再加上对统计报告的经济计量分析，或许有一天会让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者重新修正他们从前得出的结论，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认为只有等到收集完所有必要的观察内容和资料并进行了认真客观的统计分析之后，我们才能够开始尝试理论探讨。再说理论分析本身就会促进我们对某些现象进行考察、衡量或实证检验。

---

① 许多研究者往往对此类“证据”不屑一顾，认为这些东西不过是些逸闻轶事，不应进入科学人士关注的视野范围。但事实是，这类证据常常更容易让我们理解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像很多更宏大的分析研究，那类研究尽管站得很高，但其立足点却是被严重扭曲的官方资料。

② 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统计资料是基于我自己的研究，其他大部分资料都来自其他学者发表的文献。由于本书的综合性特征，让我不能仅仅依靠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因此，哪怕是第二手资料，只要它深入扎实并能够很好的阐明书中的有关问题，我也会加以充分利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资料来源仅指那些提供了资料或表格的文献材料。这些公开发表的文献为读者提供了原始资料的补充参考材料，如国家和国际统计资料等。

在此，我要感谢所有允许我引用他们文中表格的作者和出版机构。关于引用文献的详细说明都被放在了书中最恰当的位置上。

## 1.6 模　　型

研究内容自身就决定了在分析过程中必须采用某种方法论原则。我们的研究任务是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经验，因此，和许多其他科学著作一样，本书也是基于其自身的研究目的（总结性研究）采用了相关的模型。[①]

举例来说，如果想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控制投资资源的机构与要求投资资源的机构之间的一般性关系（而不是具体介绍苏联在1951年或捷克斯洛伐克在1985年时，国有工业企业和工业部委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必须对此进行宽泛的抽象。这时，我们不得不忽略国与国之间以及某一国家不同时期之间的具体特征差别，也不再考虑某一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不同部门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具体差异，只有这样才能说明所有特定情况下都具有的典型特征。这类模型无法准确周密地反映特定国家、特定时期或特定部门的具体状况。那些熟悉具体细节的人往往会指出事情并不像作者所宣称的那样，尽管很可能存在这样的反驳意见，但本书还是将遵循抽象、建模和进行理论总结的研究思路。

作者不打算反反复复地强调本书是在演示"模型"，而不是直接观察现实，但读者最好在通读之前记住这一点：本书是对现实的简化和抽象。在词语的用法上也多有变化，有时会说某个"典型情况"，一个"典型结构"或"原型"，但书中出现的所有这些说法基本上都可以看做是"理论模型"的同义词。

书中还会谈到大量规则，这些规则不是相互孤立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

---

① 在这里"模型"一词必须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加以理解，今天的经济学家们总是倾向于把这个科学哲学上的技术术语专指为用数学语言表达的模型。尽管利用数学建模也是创立模型的方式之一，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建模方式，而且数学建模本身也是有利有弊。在准确严密与全面描述现实之间总存在权衡取舍的难题。

本书是在词语本身的意义上使用"模型"一词的（如"理想模式"或"原型"），这也是有所得，必有所失。在这一过程中肯定会出现非常不严密、甚至有时是模糊不清的说法。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做法能够对真实世界进行更丰富的描述和更贴近的分析，因为它能够建立在读者思维联想的基础上。这样，我们就更容易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以及对不同的假设简化组合进行转换。

的联系。有些规则具有较深刻的本质特征，有些则能够解释更表面化且不太重要的其他规则。我希望在本书结束的时候，这些规则的“层次体系”能够逐步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这个角度而言，读者将不仅碰到联系非常松散的现象观察，而且还会看到一系列的演绎性思考（这种思考可以让作者从几个基本前提引导出一个完整的结论性思想脉络）。在其他文献中，也会出现本书中一系列思想所包含的各种要素，但本书的特点恰恰在于用一种演绎的方法将这些或那些不为人所知的各种要素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15.1]。

## 1.7 评 价

看过上述讨论以及作者对实证研究和模型安排的一再强调，读者可能会认为本书是一种“与价值判断无涉”的分析，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对所有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进行评价时，我们都要依据这种体系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一系列伦理要求的发展，以及它在实现某些特定价值的过程中发挥了多大作用来做出判断。

本书无意将作者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给读者。尽管在选择特定主题，安排重点内容以及如何组织事实等方面都会不自觉地体现出作者自己的价值体系，但是作者一直试图尽量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自由、平等、社会正义、福利以及其他许多终极价值都在评价社会体制时具有相同的权重。可能会有人打比喻说，上述各种价值也都是“不同的研究科目”。本书在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评价时将认真考虑所有这些值得严肃对待的价值“科目”。在进行体制比较时，作者会尽最大努力对所有经常探讨的“价值科目”进行评价，而且还将评价社会主义体制意识形态自己所提出的“价值科目”。

再打个比喻来说，当面对学校的成绩单时，与此有关的人——父母、老师和学生对每个科目都会赋予不同的评估权重，有些人认为数学成绩是最重要的，有些人则认为体育或历史成绩是最重要的。

如果能够客观而又令人信服地做出判断（例如，就某个“价值科目”而言，社会主义体制应该得多少分？它在促进某项价值方面究竟做得怎么样？），作者将毫不迟疑地给出答案。这种“科目研究”式的评价是一项科学

任务。至于本书是否令人满意地完成了这项科学任务,作者相信具有各种不同世界观和党派观点的人会对此达成一致。如果本书确实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那么它就能够帮助所有持不同世界观以及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澄清他们各自的思想。

即使做到了这一点,读者仍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和道德信念。至于对各种不同的“价值科目”赋予多大权重,以及根据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比照社会主义体制的总体表现,就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了。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将留给读者自己。

人们经常会谈起一连串的社会主义思想:乌托邦、未来社会建设的“伟大蓝图”、远景以及行动计划。但所有这些思想在本书中都是些次要问题,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检验意识形态的实际效果;或者说是要把一些先验概念与现实进行对比。本书不涉及方法论的全面考察,或者说不对社会主义思想史进行评价。

本书不打算超越实证分析,也不会对社会主义体制做出价值判断,更不想建立一套规范性理论。作者在书中将描述并解释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历程,但不会提出作者自己的改革建议。但作者坚信:只有在进行了体制变革之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才能最终克服它们在社会和经济领域面临的严重问题。

# 第二章　社会主义体制的前奏和原型

在开始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及改革体制(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考察研究之前,必须首先介绍这一体制的"前奏"。尽管我不打算详细叙述社会主义的学术思想史,但是鉴于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大致描述一下马克思所想像的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对革命前的体制进行简短的分析,之后再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原型稍做阐释,最后,我将把社会主义之前的社会与制度化和固定化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联系起来,简单回顾一下那个时代的基本状况。

## 2.1　马克思心目中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大部分科学著作①都在研究资本主义,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很少提及。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够通过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勾勒出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蓝图。在此,我仅从这幅蓝图中挑出与本书主题相关的部分加以介绍,在本书的其他部分还会多次提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资本主义的革命批判家,马克思始终高度评价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消除中世纪的蒙昧落后以及促进技术进步方面表面出的非凡能力,并且称赞资本主义采用了更好的组织形式进行集中生产。马克思认为,恰恰

---

① 读者如有兴趣,可参见以下几个人的著作,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很好的概括和总结:T. Bottomore 等(1983),L. Kolakowski(1983),G. Lichtheim(1978),D. Mclellan(1980)。

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受到了剥削和压迫,资本的不断积累将导致被剥削阶级日益贫困,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必然会带来一场革命:资产阶级的统治将被推翻,"剥削者将自食其果"。

很显然,这一思想中包含着社会主义将"超越"(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的观点。一旦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它不仅变得成熟,而且已经腐朽。当资本主义生产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必将替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自身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从而也就为更高发展阶段的生产体制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资本主义将为在现代技术条件下,通过高度组织化的公司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做好了准备,这种高度组织化和集中化的生产方式将使生产集中于少数资本所有者,而在他们被推翻之后,无产阶级就能够自己进行生产。①

在这样一幅社会主义图景中,控制生产将是一件非常简单的工作,一旦不再有处于无序状态的市场和以货币为媒介的复杂的商品交换过程,生产关系将变得极为简单,清晰可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按照不同的任务进行社会分工,直接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

按照这一思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与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活动的简单平稳运行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这一点不言自明。

## 2.2　体制原型

社会主义体制有三种不同的原型:

---

① "英国能够单独引发一场严重的经济革命",马克思在1870年曾这样写道:"只有在这个国家里,资本主义方式,即大资本家们将劳动者大规模地组织起来,实际上控制了全部生产;只有在这个国家里,绝大部分人口是由赚取工资的劳动者组成;只有在这个国家里,阶级斗争以及工会领导的工人组织已经相当成熟…… 如果说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是英国的传统特征,那么导致它们灭亡的物质条件在这里是最成熟的。"卡·马克思[1870](1975b,第118页)。

恩格斯以类似的方式说道,"那些刚刚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也可以建立社会主义,但"只是一个样本而已,它必须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帮助"。他接着说道,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只有实现以下条件后,才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即"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起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经济体制,或资本主义已经十分成熟"。弗·恩格斯[1894](1963,第428页)。

1. 革命过渡体制（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2. 经典体制（或经典社会主义）

3. 改革体制（或改革社会主义）①

这样就有三种模式。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特定国家与这三个模式完全雷同，而且模式本身也并非理想状态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它们只是对社会主义历史现实的抽象概括。

人们首先可能会发现这三种原型似乎是按照历史阶段依次排序的。革命之后就进入过渡时期，过渡期成熟以后，便开始了经典体制时期，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又让位于改革社会主义。

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来阐释这些原型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并非十分准确的研究方式，真实的历史过程要复杂得多。

就某些国家而言，不同原型阶段出现的时间顺序也有差别，各个阶段会相互替代出现。例如，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可以被看做革命过渡阶段，紧接着经历了一段特殊的改革阶段，即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此之后，苏联才开始全面建设经典体制。在中国，经典体制出现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的状况与本书所介绍的革命过渡体制有许多相似之处。

历史已经表明，第一种原型无法永远存在下去，它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迟早会让位于经典体制。但没有任何一致性证据和结论性经验表明经典体制一定会让位于改革社会主义体制。就在写作本书的时候，还有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经典体制阶段（如朝鲜和古巴）；而还有其他的国家（如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则完全没有经历改革社会主义，而是直接从经典体制跨入了后社会主义转轨阶段。

就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国家而言，没有任何一种社会主义原型以最纯粹

---

① 我们将在第 3－15 章中展开有关经典体制的讨论，在第 16－24 章里讨论体制改革。本书尽量按照这一分类标准来排列各类图表的顺序，但难免会出现不统一的地方，例如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在同一时期会有不同类型的国家。在第 3－15 章里有不少图表列出了处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相关资料。

当图表所要说明的现象既适用于经典体制，又适用于改革体制时，这种变通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样，社会主义体制的某些特征也可以用改革经济中的有关资料来加以说明。

在一般情况下，各种图表本身就表明了经典体制和改革体制有很大的差别。就图表的综合特征而言，改革时期的数据有必要在第 3－15 章中提前列出。

的形式出现。当一种原型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必然同时存在其他原型的一些特征，这种混合状态往往伴随着内部的矛盾，不断出现相互冲突的趋势。

尽管很容易确定某一原型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存续时间，但没有人会认为该体制在其整个历史时期都是一成不变的。就苏联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而言，自斯大林掌权开始，一直到他逝世（准确地说一共是25年，即从1928年到1953年），它都表现出了极为明显的经典体制特征，但体制在最初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当那些主要特征逐步发展并稳固之后，则是另一番情形；当该体制走到尽头的时候，情况又有所不同。在赫鲁晓夫时代（1953－1964年），苏联进行了过渡性的改革实验，而当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经典体制再次复活。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在此，原型表现出了跨阶段的共同特征。让我们继续用上面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可以发现，斯大林统治的初期、中期和末期与勃列日涅夫的整个执政期都具有相同之处。因此，我们应该集中关注社会持续和长久的状态，并对这些状态进行相互比较（如对经典体制与改革体制进行比较，或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比较）。至于特定原型或社会经济体制在存续期内发生的短期变动和其他变化不在本书的考察范围之内。

之所以要构筑原型这样一个理论大厦，其目的是为了以浓缩的方式精练概括几十年的历史变迁。所谓原型，并非静止不动，因为它是要在不断运动的过程中动态地表现出体制的各种变化，正如我们以后会看到的，它们通过行动铸造了自己的模型。也许用一个文学上的模拟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一点：原型就像一部小说，它把很长的一段历史浓缩为四幕独立的剧目。小说中的大部分内容都会消失，但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人物和冲突将以最精练的形式让每一场剧目映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无论是阐释历史事件，还是预测未来，对原型的理解终究无法替代对历史的具体考察。当然，这些原型会是非常有用的概念工具，有助于我们进行阐释性研究并做出预测。

## 2.3 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体制

现在让我们来关注真实的历史过程，首先从介绍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社

会体制开始。第一个问题是,当不同的国家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每个国家的内部冲突有何相似之处?这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区分,哪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由内部力量引发的,哪些国家是由外部力量引发的?需要同时考察这两类国家。这里我们只能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做出明确的判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没有得到任何外部力量的帮助。但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革命力量或多或少都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之后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至少是道义上的支持。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得到了更多的实际支持:从政治到组织,直至财政和军事援助。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纯粹是"出口"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一说法可能过于夸张,但我们却可以说,绝大多数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内部力量和外部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力量结合的比例有所不同。①

考虑到本书的主要目标,没有必要对这些比例进行详细考察。我将按照下列程序开展研究:

表2.1列出了表1.1里26个国家中的14个国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这些国家里,外部支持对社会主义革命所起到的作用相对小于内部力量,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主要是依靠内部力量取得政权的。表2.1可能并没有将这些国家全部列出,但它排除了所有有疑问的国家。表2.1并不表明外部的政治、财政和军事支持对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夺取政权无足轻重,而是指内部力量发挥了主要作用,至少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表中所列出的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方面都具有以下主要特征,这构成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前奏:

1. 这类国家都处于贫穷和经济不发达状态。② 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

① 至于苏联的最初状态以及后来的历史发展对社会主义体制一般性特征的形成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苏联模式和苏联的干预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稍后再进行讨论[15.4]。

② 毛泽东(1977,第306页)对此作出了透彻的解释。他在1956年这样说道:"我们的两大不足也是我们的两大优势。我在别的地方讲过,我们是一穷二白。穷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工业,我们的农业还不发达。穷是指我们象一张白纸,我们的文化科学水准还很低…… 这不是一件坏事。穷人才要革命,但想让富人革命就比较难。具有较高科学技术水准的国家正被骄傲冲昏了头脑。我们像一张白纸,好做文章。"

是这些国家革命前的人均生产总值仅仅是当时最发达国家的很小一部分。

表 2.1 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由内部力量发动革命

| | | | | 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的状况 | |
|---|---|---|---|---|---|
| 1 | 2 | 3 | 4 | 5 | 6 |
| 个数 | 国家 | 取得政权的时间 | 经济发展水准人均 GDP（美元 = 100） | 对外依附类型 | 武装斗争类型 |
| 1 | 苏联 | 1917 | 21.8 | 独立国家 | 第一次世界大战 |
| 2 | 阿尔巴尼亚 | 1944 | — | 独立国家，意大利占领 | 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 |
| 3 | 南斯拉夫 | 1945 | 14.0 | 独立国家，德国和意大利占领 | 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 |
| 4 | 中国 | 1949 | — | 独立国家 日本占领 | 第二次世界大战，革命战争在解放战争之前和之后 |
| 5 | 越南 | 1954 | — | 法国殖民地，日本占领 | 第二次世界大战，革命战争，首先是反抗日本，然后是反抗法国 |
| 6 | 古巴 | 1959 | — | 独立国家 | 国内游击战争 |
| 7 | 刚果 | 1963 | 12.8 | 法国殖民地（至 1960 年） | 殖民地独立斗争，军队夺取政权 |
| 8 | 索马里 | 1969 | 5.4 | 意大利殖民地 | 军队夺取政权 |
| 9 | 南也门 | 1969 | 6.0 | 英国殖民地 | 殖民地独立斗争 |
| 10 | 贝宁 | 1972 | 5.0 | 法国殖民地（至 1960 年） | 军队夺取政权 |
| 11 | 埃塞俄比亚 | 1974 | 4.5 | 独立国家 | 军队夺取政权 |
| 12 | 莫桑比克 | 1975 | 12.4 | 葡萄牙殖民地 | 殖民地独立斗争 |
| 13 | 尼加拉瓜 | 1979 | 21.4 | 独立国家 | 武装起义 |
| 14 | 津巴布韦 | 1980 | 14.7 | 英国前殖民地，实际处于独立状态 | 7 年游击战争 |

**资料来源**:第 1 列:S. N. Prokopovich(1918,第 66 页)。其他列:I. B. Krabis, A. W. Heston, R. Summers(1978,表 4)。

注释:1. 如果能够一一列出每个国家在革命前和平时期的有关资料,那么就能够很好地说明当时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准,但由于资料缺失太多,这项工作无法如意完成。表中提供的资料是 1970 年的。

2. 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是以英国 1913 年的国民人均收入为基础计算的。

3. 此处选用的资料是 1937 年的。

2. 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非常低。它们基本上都是农业国家,农民和没有土地的农业劳动者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3. 构成现代工业部门的大型工厂(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的规模相当小。

4. 社会关系和所有权形式保留着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大量特征。

5. 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非常严重,甚至远远超过了当时发达国家。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鸿沟对群众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6. 就政治体制而言,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起了稳固的议会民主制度,当时各国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都压制政治自由,不少国家还处于血腥的专制独裁统治之下。

7. 在表中所列出的国家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半依附或全部依附于其他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处于军事占领状态;或是在经济和政治上依赖于某个更强大的发达国家。因此,取得民族独立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8. 大多数国家在革命爆发之前都处于巨大的社会动荡之中,严重颠覆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反对外部敌人的战争、内战、游击战争或是一再发生政变。在不少情况下,这些动荡中的战争往往与第七点特征有密切的联系。

前四个特征与马克思的期望完全不符:社会主义没有首先出现在非常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那里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量已经被耗尽。如果我们将那些规模有限的现代工业部门忽略不计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几乎没有继承资本主义大工厂高度发展的组织化和集中化生产方式。此外,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这些国家处于极端动荡之时取得成功的。

上述八点特征基本概括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前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在本章的后面部分和本书其他章节中,我还将多次提到社会

主义革命和新体制诞生之前的社会特征。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状态以及其他初始特征为社会主义体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些落后状态的印记深深地扎根于苏联、中国以及其他主要依靠内部力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些基本不是依靠内部力量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如果参照上面列出的8个主要特征,这些国家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异:有些国家具有表2.1所列国家的特征,如蒙古和阿富汗。但绝大多数在二战后被苏联占领的东欧国家在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都已经超越了表2所列国家所处的落后状态,其中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实际上属于当时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之列。这些国家是在苏联公开和隐蔽的干预之下接受了社会主义体制,因为这种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首先是在落后的社会里建立起来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后在考察究竟是哪些因素塑造了此后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特征时,不能把那些"依靠外部力量发动革命"的国家的初始特征作为研究基础。研究的起点应该是表2.1所列国家的初始特征,首当其冲的就是苏联。

## 2.4 迈向经典体制的革命过渡时期

这一部分将简单介绍一下由前社会主义体制走向制度化经典体制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尽管每个国家的过渡方式都各不相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观察到一些共同特征,特别是那些主要依靠内部力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这里我们重点讨论这些共同特征。以下内容并不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描述,而是综合概括了一些国家过渡模式的基本轮廓。

仅仅回顾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活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了解当时的社会公共氛围和政治气候。那时的革命领导人满腔热血,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他们认为革命是历史的正义之举,他们冒着被捕入狱、严刑拷打、甚至牺牲生命的危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愿意做出更大的牺牲,为集体而奋斗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革命热情不仅仅局限于少数革命积极分子,大批群众也都深受感染。正因为如此,这

个时期通常被视为社会主义的“英雄年代”①。

“剥削者”终于开始“自食其果”了。部分工厂、银行和其他机构很快就被收为国有或变为集体所有,然后就开始进行集中生产和集中分配。

再分配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将地主的大量土地没收充公,然后分给无地和贫穷的农民。

与国有化和社会化相伴而来的是财产和收入的再分配。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革命之前的体制处于非常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状态;而新制度恨不得一夜之间彻底消除这种不平等的状况。于是,取消了上层阶级的高收入并将他们的大部分财产没收充公。在有些地方,实际上是穷人搬进了富人的家里,而宫殿则变成了学校和工人度假村。

在多数国家,最初的革命转型都发生在内战或抵抗外部敌人的时期,此时整个经济已陷入崩溃状态。因此,革命初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确保平均分配食品。这样就引入了配给制,以确保穷人能够得到基本的食品,那些企图规避配给体制的黑市商人遭到追捕和起诉。

尽管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困难,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激活了覆盖全国人口的国民教育运动,许诺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保障,并组织孩子们度假。

实现历史正义绝不仅仅表现为经济物品的重新分配。贵族、富人和旧体制的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都受到了惩罚,其中许多人被关进监狱,送入劳改营,或者被处死。在革命年代,到处充斥着暴力和恐怖。

在剥夺旧社会统治阶层的财产和镇压他们的时候,一般都是在不遵循法律的情况下为所欲为,或是仓促通过新的法律加以执行,各种法律同时并在,甚至相互矛盾。整个社会不再有任何法律和秩序,或者没有丝毫司法保

---

① 这一称呼来自研究苏联经济史的历史学家 L. N. Kritsman 的著作:《俄国伟大革命的英雄时代》(1926)。在这本书里,作者在研究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时用到了这个词。“战时共产主义”是原型的历史实践之一,本书将它命名为“革命过渡体制”。“战时共产主义”具有这一部分所概括的模型的大部分特征(当然不是全部特征)。

关于早期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如苏联的研究可参见 M. H. Dobb [1948](1960),A. Nove(1969,第 3 章)和 L. Szamuely(1974);中国的研究可参见 H. Harding(1981)和 M. Meisner(1986),南斯拉夫的研究参见 D. D. Milenkovitch(1971)和 F. B. Singleton,B. Carter(1982),匈牙利的研究可参见 I. Peto S. Szakacs(1985)。

障,这一切往往是由于革命前的内战和对外战争造成的。无政府状态的症状随处可见。

从这时起,社会开始分化。除了革命的支持者、那些对革命漠不关心的人、或是仅仅是想活命的人之外,也有积极反对革命的“反动分子”。在一些地方,“反革命”活动只是小规模的地方性运动,而在另一些地方则爆发了有组织的反抗行动,引发了起义和内战。这使得双方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血腥的报复之后便是更加残忍的复仇。

人们常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切如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社会主义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胜利,那么又将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如果社会主义在和平的年代获得资本主义创造的大规模现代生产力,那么它是否能够从一开始就为人们提供充足的物质产品呢?

可事实是,在历史上没有一个社会主义体制能够通过内部力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政权。恰恰是由于前文提到的那些社会特征(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贫穷、极端的不平等、残酷的压迫、战争以及深刻的社会危机)才引发了革命,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正是这些导致体制变迁的条件诱发了下面一系列行动:胜利一方满腔热情,充满自我牺牲精神,坚决抵抗反对派,并迅速进行再分配,彻底摧毁旧的社会秩序。

革命前的各种事件有助于人们理解革命时期的许多特征,并能够对这些特征做出很好的解释。如果考虑到支撑革命体制的诸多因素都是暂时性的,那么也就不难理解这一时期必然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革命热情和自我牺牲无法长久维持。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在伟大事业和群众运动的激情鼓舞之下,带着必胜的信念,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他可以为了集体而不惜牺牲个人,但他不可能永远这样。激情过后,他仍然要回到日常生活之中,关心自己的工作、所做出的牺牲以及相应的物质福利。此时,对整个社会而言,最重要的是通过物质奖惩来鼓励人们更好地生活和工作。

当所有富人的全部财产都被没收充公之后,这种形式的再分配也就走到了尽头。由于革命前的动荡,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过渡时期的混乱[1],必然导致生产的衰退。显然,只有依靠生产活动,而不是没收充公,才

[1] 例如在苏联,1920年的工业产值只有1917年的21%,见L. N. Krisman(1926,第80页)。

能不断改善人们的物质状况。这时,生产活动已经掌握在公众和集体手中,然而想进行生产,就需要组织和有效的控制。

革命前的体制曾让国家处于落后状态,革命者在夺取政权之前就郑重许诺,一旦掌权,他们将彻底消除这种落后状态,当社会从内忧外患的血战中走出并有可能开始进行和平建设的时候,掌权者认识到必须通过迅速提高国家的经济生产能力来完成先前的承诺,他们渴望尽早实现经济腾飞的奇迹,他们还感到社会主义受到军事威胁,为此必须迅速增加军事实力,这也要求高速的经济增长。

然而,无政府状态、缺少法律和秩序、各行其是的地方行为都严重阻碍着上述目标的实现。没有一定的规则和纪律,任何社会都无法正常运转。因此,恢复秩序的要求与日俱增。

所有这些情况的变化为整个国家走出革命过渡体制准备好了条件。革命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逐渐褪色,直至彻底消失,即使那些曾对革命满怀激情的人也不例外。新体制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其制度的官僚特征日益明显,生活恢复到了正常状态。经典体制时代开始了,并逐渐稳固下来。①

这里有必要单独提一下东欧特殊的历史发展状况。②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基本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上述模型所总结的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体制的主要特征同样适用于这两个国家。但正如我们在**2.3**部分所强调的,由于苏联红军推翻了德国对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军事统治,又在打败德军后占领了东德,苏联的军事和政治存在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毫无疑问,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苏联主要通过向当地政治环境施压,让共产党最终取得了集权统治地位,从而将社会主义体制强加给这些国家。

---

① 不少历史著作都涉及到了从革命过渡体制走向经典体制的转型过程(可参见注释6中的参考文献)。

② 关于东欧战后民主极为痛苦的两难境地,可参见匈牙利杰出的政治学家 I. Bibo 在1945和1946年撰写的文章(1986年重印并收录于他的文集中)。关于1945-1949年东欧政治史及苏联的影响等方面的文献,应参考 Z. Breezinski[1961](1967)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后来 T. T. Hammond(1975)和 C. Gati(1984)的著作。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一段时期内，东欧国家实行了多党议会民主制度。这些国家组成了联合政府，其中共产党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它获得的选票比例。整个经济开始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混合结构，一边是“常规”的资本主义部门，一边是社会主义部门。国有化稳步展开，土地改革也开始大规模实施。

1949年之后，共产党与社会党进行合并取消了多党民主体制，这一阶段宣告结束。于是，这些国家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体制建设，由此进入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阶段。

1945—1949年期间，东欧国家具有革命过渡体制的不少特征，同时，在很多关键方面又有很大不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恰恰是因为这些国家1945年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由其内部力量引发的，1945年之前的体制完全是由外部力量即苏联将之彻底摧毁的。

# 第二部分

# 经典体制剖析



# 第三章　权力结构

理解社会主义体制的关键是要考察其权力结构，但许多关于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都忽略了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均根源于社会主义的权力结构特征①。

本章（“权力结构”）与第4章（“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这一章主要讨论权力机构及其运作方式，下一章研究掌权者政治行动背后的目标、价值体系和思想意识形态。也可以这样说，本章是介绍权力的肌体，而第4章将触及权力的灵魂。

本章的描述与分析将紧紧围绕全书的主题（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集中介绍与之相关的关键特征并尽量做到简洁明了。这里就不再讨论政治结构的其他重要特征，相信对此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会进行深入研究。

---

① 我建议读者按照以下顺序进行阅读：在开始第3章之前，可以先阅读第15章，这一章对第二部分关于经典体制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尽管在没有读过3-14章之前，可能无法清晰透彻地理解第15章中所涉及的一些概念。但第15章对主要结论进行了基本总结，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3-14章的有关内容。

我的意见是，读者在读完第15章之后，阅读3-14章，并按照顺序再看第15章，因为在研究了第二部分3-14章的内容之后，有必要重新阅读第15章。

当然，不提前阅读第15章也不会影响对整体思路的清晰把握。

## 3.1 执政党

社会科学的通常做法是要区分特定组织或机构的正式运行规则(公开宣称的东西、内部的章程以及国家法律的官方解释)与实际的运行规则。这两套"游戏规则"之间有哪些相似之处?又存在哪些不同?下面我们在介绍党、国家和群众组织如何运作的时候,将阐明这两套规则之间的不同之处。

权力结构的基本组织机构是共产党(为方便起见,下文中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一般都简称为"党")。[①] 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实行一党制,不存在其他政党。[②] 在处于权力顶峰的时候,党员总数占有非常高的人口比例(见表3.1)。

党的主要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入党是自愿的,党支部[③]负责管理入党申请人的有关事宜。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它包括了某一地理区域内(如一个城市或城市的一个区)或某一工作单位(如一家工厂)内的所有党员。领导机构由支部党员会议选举产生,有一定任期。支部书记是党支部的领导。

支部受上级党组织的领导,通常以地区原则安排。例如,区党委由区党委书记领导,它的上级组织是市党委及市党委书记。处于最高层的是中央委员会(或是联邦制国家的中央委员会,如苏联;或是联邦中央委员会,如南斯拉夫)。国家(或联邦)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选举产生一个规模更小的执行机构,一般称为政治委员会(即苏联最为人所知的"政治局")。中

---

① 长期以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版本的党史)在苏联一直被奉为神谕,强化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后来,这本书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关于共产党历史及功能的学术性著作可参见以下作品:苏联,J. F. Hough 和 M. Fainsod [1953](1979)以及 J. F. Hough(1969);中国,H. Harding(1981)和 J. W. Lewis 等(1970);东欧,S. Fischer Galati 等(1979)。

② 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和波兰,即使在经典体制阶段也存在其他政党,但这些政党不掌握实际权力。

③ 不同国家可能采用不同的名称(如"支部"、"党的领导"、"书记"等等)。本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并不特指某一特定国家,而尽量能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除了个别情况之外,本书避免使用每个国家自己的说法。同样,对于意义相同但非标准化的其他用语(各国均有不同),本书也采取了上述办法。

央委员会还要选举产生党的最高领导(总书记)和他的同事,即中央书记处书记。

**表 3.1　社会主义国家党员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1986 年)**

| 国家 | 党员人数(千人) | 党员总数(占人口比例%) |
| --- | --- | --- |
| 阿尔巴尼亚 | 147 | 4.9 |
| 保加利亚 | 932 | 10.4 |
| 中国 | 44,000 | 4.2 |
| 古巴 | 524 | 5.1 |
| 捷克斯洛伐克 | 1,675 | 10.8 |
| 东德 | 2,304 | 13.8 |
| 匈牙利 | 871 | 8.2 |
| 蒙古 | 88 | 4.5 |
| 朝鲜 | 2,500 | 12.2 |
| 波兰 | 2,126 | 5.7 |
| 罗马尼亚 | 3,557 | 15.6 |
| 苏联 | 18,500 | 6.6 |
| 越南 | 1,700 | 2.7 |
| 南斯拉夫 | 2,168 | 9.3 |

**资料来源**:R. F. Staar (1987, pp.45 –47)。

注释:表中的资料是以党自己宣布的党员人数为基础的。党员比例是指党员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如果考虑所占成人人口的比例,数字会更高。

按照正式规则,各个级别的领导机构和书记都要由党员选举产生(或是直接选举,或是由代表间接选举,或是由已当选的领导干部选举)。选举程序以及党的任何决定必须获得经选举产生的机构的同意,这两项内容构成了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中民主的一面;另一面是集中制,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对下级党组织具有约束力,所有党员必须服从。党在做出决策之前可以公开讨论,但党的决定一经通过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不允许再有任何争论或抗

议。

而在现实生活中,集中制更为普遍和强大。按照党的正式规则,党组织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但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进行运转的。

中央领导机构有一大批工作人员,他们构成了官僚化的等级体制,其中包括部门一把手、部门副手和其他人员。按照党的规则,任命就职的党员干部没有任何权力,因为只有经选举产生的机构才享有决策权。但事实是,党员干部在事务管理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根据正式规定,总书记只是中央领导机构的决策执行人,以及在中央委员会休会期间负责执行政治局的决策。但实际上,总书记集大权于一身。典型的例子就是斯大林在苏联的独裁地位。① 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入经典体制阶段之后,总书记迟早会以极端或不太极端的方式掌握绝对权力。

对规模较大的支部来说,书记是一份全职工作。所有党的中级机关和规模较大的支部都要建立负责任命干部的组织。

最终将出现一个覆盖全党的官僚等级体系:下级组织必须严格执行上级指示。在这样一个等级的体制中,选举产生的领导和上级任命的领导没有区别。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那就是经选举产生的党的领导和受命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全都是党委领导。

## 3.2 国　　家

处于经典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像其他现代国家一样拥有正式的宪法、法律和司法制度。国家分为三个独立的权力机构:立法、国家行政(负责执行法律)和司法。立法机构(以下将称为议会)的成员由公众选举产生,议会负责任命政府成员,地方立法机构(以下称为地方议会)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联邦制国家内的州以及州内所辖的地区、市和乡镇)行使权力,地方议会在法律范围内是独立的并拥有自己的行政机构。

---

① 有关斯大林的传记文献非常丰富。例如,可参考 I. 多伊彻(1966),R. Tucker(1973,1990)和 A. Ulam(1973),其中 Tucker 特别研究了布尔什维克运动的本质特征与斯大林的领袖魅力型恐怖统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都规定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但没有具体说明党在国家实际管理中如何发挥领导作用。也许有人会说党的活动和国家事务密不可分,这样就可以确保党在各项活动中都处于支配地位。[①] 尽管国家法律没有进行明确界定,但党实际上具有以下权力:

1. 所有重要岗位的人员任命、晋升以及解除职务都是由党的各类机构决定的。国家法律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但党自己通常会详细规定不同的职务任命需要由党的哪个机构决定。换句话说,人事决策是政治局的特权,由它来决定地区和城市党委或重要机构党委的领导。[②] 这一特权包括任命国家行政部门首脑和所有主要经济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党委决定谁将是共和国的总统,谁可以担任议会成员,以及谁可以参加地方选举。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一个职位都只有一个候选人,所以实际上所谓代表都是党选出来的。同样,党组织还负责任命法官和检察官。

前文已经提过,党委在选择选举机构成员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党委领导还要提前准备党委的其他人事安排决定,所以党委也不过是对领导们事先做出的选择加以确定而已。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党委领导在选择谁担任议员、国家行政机构成员和司法人员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在国家行政机构进行决策之前,党组织已经对所有重要的国家事务做出决定。中央政府的主要政策都事先由党中央或政治局定好了,地方政府主要政策的制定则是地方党委说了算。

3. 党委直接参与政府管理,这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双重体制。在党委中有专门的干部或一部分干部来负责所有的重要政府活动。中央委员会设有各类机构分别负责工业、农业、教育、文化、外交、军事等等。这种双重体制并非完全对等[③],区别之一就是规模不同:党委中负责特定领域事务的干部人数要少于与它平行的政府机构的人数。但从另一方面看,党内的小人物

---

① 1950 年前后我曾听匈牙利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权威人物 Jozsef Revai 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辩证法式的评论:"党和国家不是一个东西,但它们也不是两个东西。"

② 在苏联,这一管理机构被俗称为人事任免部门,人们又把它形象地称为领导阶层。

③ 低一级的党组织按区域原则设置,但每一个地区党委机关也都有与政府部门(工业部,农业部等)相对应的机构。

却手握大权,他们的话往往是一言九鼎,有时根本都用不着发表正式的指示。

此外,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党委班子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监督政府管理,当它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时,都要立即报告。

宪法中从未规定政府官员、议会成员、地方议会或法官必须要服从党的指示,但他们几乎全都是党员,因此必须执行党的命令。实际上,这些人并非仅仅服从党的决定(由经选举产生的党的机构做出的决定),他们还要按个别领导干部的指示办事。说的直白一些,就是要按照领导人的指示来执行党的决定。

在谈及党和国家是"水乳交融"的时候,我只说明了党(更确切地说是党委领导)是如何统治国家的。至于为什么用"水乳交融"这个词,我们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说明:

在经选举产生的党的机构中,有不少人都在政府机构或国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如部长、副部长、国有企业总经理、大使、将军、警察局长和议会成员。

"水乳交融"还表现在个人职业生涯方面。有人从党的低级干部开始做起,然后在党内不断晋升,直到成为高层领导。同样也有人从政府低级职员开始做起,然后就一直在政府部门内工作。但党员的工作职位调动十分普遍,例如一个工厂的经理很可能会被提升为地区党委书记,然后再调入政府当副部长。当然也可以反过来,先是做党委书记,然后成为大企业的总经理或警察局长,最后变成党的高层领导。由于这个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党委成员"、"领导"或"干部"基本是一个意思,并不特指从事某项具体工作(不论是在党内还是政府,都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有人用"党国"一词来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关系。

尽管从上述论证来看,党和国家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自然分工",党管政治,而国家负责行政管理。可这种分工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没有实质意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是"无孔不入"的,它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国家行政管理根本不可能"脱离政治"。共产党认为自己应该对所有的事情负责,它不允许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享有任何自主权。事实上,"党国一家"以及政治与行政职能混合在一

起,这正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

## 3.3 群众组织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各类社会组织和协会一般都被统称为群众组织。[①] 绝大多数群众组织的主要特征是它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处于单一垄断地位。例如只有一个工会运动组织,一个青年团,一个妇女社团。国家科学院自己就代表了科学研究。当然还有各类职业团体,如一家工程师协会,一个作家协会,一个音乐家协会,一个电影协会等等。

这种单一组织垄断特征使得群众组织有可能建立起它在某一领域的绝对权威地位。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从国家预算中获得拨款后,负责工会成员福利基金的发放并对工会成员的福利待遇做出限制性规定。艺术组织的会员身份意味着可以参加职业性艺术活动,如果不是会员,就不能参加这类活动。

按照法律和正式规则,所有群众组织都享有自主权。根据组织的不同性质,其领导成员由会员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但实际上,是由党来决定谁是候选人。[②] 群众组织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与党委领导或政府高层官员没有什么区别。在前面部分我们介绍过政府官员的特征,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同样如此:他们也接受党的领导,群众组织所通过的决定也都是相关党组织事先确定好的。党委成员对群众组织的事务进行各种干预。尽管没有正式的规定,但事实上是党委在命令群众组织采取哪些具体行动。群众组织的主要作用是向特定社会群体(与每个组织相对应的群体,如工人、青年和妇女)传达党的思想和意图。正如列宁所说,群众组织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

---

① 有关群众组织的研究文献,读者可参考 B. Ruble 和 A. Pravda(1986)以及 A. Kahan 和 B. Ruble(1979)的著作。这两本书都谈到了工会所发挥的作用。

② 1929 年,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解除了托姆斯基担任的工会领导职务(后来他自杀了)。与斯大林关系最亲密的卡冈诺维奇对此事曾这样说过:"我们把大部分领导人都换了。有人说,这违反了无产阶级民主。但同志们,对我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而言,对民主也不能盲目崇拜。"(见苏共十六大报告,摘自 R. Conquest[1968] 1973,第 41 页)。

党和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水乳交融”来形容。大型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工会、共青团)一般都是同级党委(国家、地区和支部)的领导成员。在党内,他们代表群众组织;在群众组织中,他们代表党。如果他们不能在群众组织中代表党,那么党就会将另换他人。

群众组织领导人的职业生涯与党的干部没有什么区别。工会或共青团的领导会成为党或国家的高层领导,党或国家的干部同样会当上群众组织的领导人。

## 3.4 凝聚力

当谈到党员干部、国家政府官员、群众组织领导以及国有企业经理时,我们在以后会用到“党委和官僚”这两个词,其实它们都是一个意思。[①] 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本书中的官僚一词适用于所有党政机构(党委、国家行政机关、群众组织如工会)。因此,党委也是官僚的一部分(内在组成部分,而非外在机构),而且还是权力最大的官僚(科层)组织,处于支配地位。

是什么力量将这些官僚机构凝聚在一起呢?

1. *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官僚体系,特别是作为领导力量的共产党是靠着特定的思想、目标和价值观凝聚在一起的。党的许多领导成员在崇高目标的指引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并坚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这里我仅仅是对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凝聚力稍作解释。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述,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主义体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一章我们将专门就此展开讨论。

2. *权力*。官僚部门(包括党)的成员为了保持权力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官僚构成了经典体制的权力精英阶层[②]。由于官僚体制是一种多重的等

---

① “官僚”在口语中和社会学上有几个不同的意义。在口语里,这是个贬义词,指办事拖拖拉拉、工作没有热情以及决策不果断。对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特别是自马克斯·韦伯[1925](1978,第3章,11节)以来,官僚是一个不带有价值判断的技术词汇,是指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其运作的好坏、快慢、热情冷漠无关。本书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官僚一词,不涉及价值判断(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官僚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官僚[6.1])。

② “精英”这一概念可参见R. Michels[1911](1962)和V. Pareto[1916](1935)。

级结构，因此，权力绝不是平等分配的。党委居于最突出的地位，它比其他官僚机构要强大得多。高层领导比低级干部享有更大的权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官僚机构中，每一个人（除了处于绝对高层的领导人）都既是仆人又是主人：他可以对下属发号施令，但同时要绝对服从上级的指示。官僚集团统治着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并分配整个国家的资源。作为权力的拥有者，尽管其具体人员会不断变化，但是整个官僚集团却会无限复制自身，不断拓展自己的权力范围。[①]

3. *威望与特权*。官僚机构的成员享有一定的威望。首先是官僚机构内部的高层成员在低级职员眼中具有一定的威望。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少数职业除外，如学者、科学家、艺术家和运动员，他们有自己建立职业威望的标准），职位高低是衡量官僚成员地位的唯一标尺。[②]（这与建立在多元权力结构和私有产权基础上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有许多并行的威望衡量尺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商业成功、收入和财富）。

将威望与职位联系在一起，容易带来"个人崇拜"的现象。国家的最高领袖被认为拥有超乎常人的才干，永远正确并无所不能。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中出现的典型领袖人物就是斯大林。在斯大林时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党的领袖的个人崇拜也不断形成。即使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仍然能够在处于经典体制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看到个人崇拜的许多特征。[③]

---

① 有些研究者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官僚集团看做其统治阶级。这一观点首先由列·托洛茨基[1937](1970)和 M. Djilas(1957)提出，J. Kuron 和 K. Modzielewski(1968)也有类似的说法。

G. Konard 和 I. Szelenyi(1979)强调了知识分子阶级的潜在力量。但 Szelenyi(1986)后来修正了自己书中的部分观点，认为官僚集团也愿意与新兴的企业家阶级分享权力和机会，此后他又再次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见 Szelenyi(1988)。

争论的关键是如何定义"阶级"(Class)。关于阶级、阶级冲突的定义，以及这一概念的现代应用可参见 R. Dahrendorf(1959)。

当我们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精英阶层时，必然在"阶级"的定义方面遇到很大困难。例如，我曾提到过官僚机构在权力分配上是非常不平等的，因此，在本书中避免使用"统治阶级"这个词来指称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掌握权力的官僚集团。

② 这里不仅有"同级"的非正式定义，而且出于礼仪上的考虑，还有正式的规定。例如政府行政级别（部长、副部长，及下属部门的负责人）与党的各级干部、军队首脑、企业经理和群众组织负责人等等都享受同等级别。

③ 例如，罗马尼亚的尼·齐奥塞斯库、古巴的卡斯特罗、朝鲜的金日成。

除了对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之外，还有对地区领导或党委书记的个人崇拜（尽管程度较弱），这些人头顶上照耀着神秘的光环，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视为绝对真理。

威望还意味着按照级别享有相应的物质生活特权[13.5]。高级职位和低级职位之间的工资级别差额与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机构大体相似，实际收入也不是很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除了工资收入之外，还有与级别相联系的附加福利，其中包括免费或以很便宜的价格获得各种福利待遇。官僚机构人员还可以获得短缺商品和服务，他们还能到内部商店购买普通大众商店里所没有的特殊商品。官僚机关都有自己的住宅①。官僚机关的工作人员在设备更好、条件舒适的医院里享受医疗服务，他们在自己内部的疗养所休假，那里的豪华程度是普通企业工人度假中心不能比拟的。这些特殊服务也是根据不同级别提供的：更高层的领导干部可以在更高的医院里接受治疗，到商品更丰富的商店里购物，坐着由专职司机驾驶的部门专车，有私人的度假别墅等等。领导干部的家庭成员也同样享受着这些物质生活特权。

4. *严明的组织纪律*。前面我们曾提到过，每一位党员都有必须在实际中认真贯彻党的决定和指示。在官僚机构里，下级人员也必须执行上级命令。这样，党和国家的纪律都得到强制遵守。

党内有一整套严格的惩罚机制：不同程度的批评、降级，直到开除出党。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开除出党是非常严厉的惩罚，因为一旦被开除，就意味着这个人党内职业生涯的彻底结束。在多数情况下，此人很快就会受到国家的起诉。

至此，我只是提到违反“党纪国法”之后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但在经典体制下，所谓“党纪国法”的概念非常宽泛。对党员干部而言，除了要绝对服从各级指示之外，还必须坚决拥护现行的政治路线，如果偏离了所谓的政治路线（或是真的想偏离当时的政治路线；或是被人怀疑企图偏离政治路线），那么其性质就是违反了党纪国法，将受到党内纪律或国家法律的严厉处罚。这就将我们引向了下一个问题：官僚体制的内部冲突。

---

①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有些词是无法翻译的（如俄罗斯的公房：служебная квартира 或匈牙利的 Szolgalati Lakas）。单位（如企业或政府机构）拥有自己的住宅和车辆（或者是租用），然后作为福利分配给自己的职工。

## 3.5 内部冲突

虽然有党作为其背后的原动力，官僚体制自身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它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冲突。在极端残酷的镇压时期，这些冲突可能会全部消失，但一旦镇压有所松动，它们又会以各种形式浮出水面。

最激烈的内部冲突是党内的“派系斗争”。尽管党内派系采取了非常松散的组织形式，但是它们实际上相当于“党内之党”。党内派系是指一派集团代表着它自己的政治路线与其他派系的政治路线截然不同。例如，苏联共产党内反对强制快速推行农业集体化的领导人就建立了这种所谓的“党中党”。

共产党的内部规章是严禁建立不同派系和独立政治派别的。当权的政治派系总会找机会在特定时期对攻击其政治路线的其他派系进行彻底清洗[①]。因此，在党内组织政治派系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当然，在遇到新的根本性问题时，又会产生新的派系（或至少是松散的党内政治小集团）。但在经典体制下，任何一个党内派系都不能够长期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稳定的反对派。

党内冲突还表现在其他许多领域，例如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分歧，上一代领导人与下一代领导人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当涉及到究竟由谁来全面继承党的最高领导权时，这种斗争就变得尤为激烈）。

另一种形式的党内冲突是，政府部门负责人和群众组织的领导对党委的干预日益不满，而党内领导人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又认为政府部门负责人和群众组织的领导没有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同样无法避免诸如美国出现的利益集团或游说团体之类[②]的社会现象。不同方面的利益代表，如工业部门、专业团体、商业部门

---

① 斯大林曾使用无情的恐怖手段来解决与所有政治反对派之间的宿怨。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 R. Conquest[1968](1973)的经典著作，也可以参考由史·科恩撰写的《布哈林传记》。在东欧，那些真正的（或所谓的）“民族共产主义”代表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彻底清洗。

② H. G. Skilling(1966)和 F. Griffiths 以及 H. G. Skilling 等(1971)人首先提出这一观点并用来分析苏联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广泛争论可参见 J. F Hough(1972)，W. Odom(1978)和 S. Slolmon(1983)。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讨论可参见 K. Lieberthal 和 M. Oksenberg(1988)。

以及各个地区,都会向中央机构施加压力(例如要求资源分配和人事任命)。有些利益集团甚至跨越了党、政府和群众组织之间的界限,在各个位置上都有"自己的人"。例如农业游说团体就包括了出身农民的中央领导,来自农业省区的党委领导和政府官员、农业部长、议会中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以及农业学院的教授。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矿业利益集团"、"文化界游说团体"等等,不一而足。每个利益集团都会通过自己的人事关系突出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并以各种形式施加政治压力(派出代表,在会议上大声疾呼,安排报纸发表相关文章等等)。

前文曾提到,各种凝聚力量把社会主义官僚体制的不同部门紧密地连在了一起,这里所谈到的内部冲突削弱了这些凝聚力。冲突的确无处不在,否则我们就无法全面了解社会主义的官僚体制。

## 3.6 经典体制下统治精英与社会的关系

在介绍了社会主义统治阶层(党)的本质特征之后,下面我们将探讨一下统治精英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

官僚集团采取了各种手段让人民相信他们并支持他们的政策,其中包括全面的国民教育和现代政治宣传[4]。大型集会和群众游行是经典体制下带有典型政治色彩的活动,但如果对国民教育的内容提出反对意见并强调什么启蒙之类的话,那就会遭到约束。约束行动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且还包括其他各类社会成员:富裕的农民、一些宗教派别、城市知识分子以及那些要求更高待遇的工人,等等。当经典体制的政治结构逐步稳定巩固之后,党的管理和指示才能够得以贯彻执行。也正因为如此,统治精英确保了社会纪律。

官僚体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在任何社会体制下,国家总要发挥一定的作用:通过立法限制某些活动,通过政府规章干预社会生活,购买产品或者成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等等。在其他社会体制下,还存在着国家无权干预或不愿涉入的一些"私人领域",但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与"公民社会"以及国家事务与个人事务之间的界限却彻底消失。当然,官僚机构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无所不管,但这只是因为在实践中它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就

原则而言,没有什么事情它不可以管,或者说它不想管[6.7,19.5,19.6]。

这样,官僚体制的影响甚至扩展到了传统的私人领域,诸如文化、宗教、家庭生活、应该有几个孩子、邻里关系、业余生活、职业和工作选择……这里我还没有提及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任何经济交易活动都是党和政府所“关心的事”。[①]

之所以说官僚体制的权力是集权主义还因为它无孔不入,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当地的党支部、群众组织、政府机构以及警察当局掌握了每位公民和职工的所有资料。举个例子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每位成年人都有一份个人档案,其中盖有工作单位的公章,记录了家庭住址和家庭成员状况。任何情况变化都要记录在案,只要有关当局要求,就必须提供个人档案。再举一个例子,不管公民从事什么工作,以及担任什么样的职务(从党的基层干部到群众组织、政府或企业的普通工作人员),都要由相关人事部门将这些信息登记存储。档案将伴随一个人走完一生。当某人调换工作岗位时,无所不在的官僚机构就把个人档案及所有材料转给新的部门。

在经典体制下,官僚机构不受任何法律制度的约束。确实有一部宪法,但其中的有关规定完全可以让立法者为所欲为。根据正式规定,法律是议会通过的,但实际上这是党管的事情,法律的内容由党中央来决定。此外,还有大量没有正式法律地位的规章制度:它们多半是政府或部门的条例规定和政策规定,或者是根据特定官僚机构有关人员的个人裁决,这种形式最为普遍。各类规章的法律形式完全由官僚机关自己决定。

官僚集团,特别是某些特定部门和机构,自己就常常违反法律(“写在纸上的法律”),这导致了极端严重的后果。有人这样说,如果当权者想这么做

---

① 有些研究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比做“军事独裁”。我认为这个比喻并不准确,原因如下:首先,在军事独裁统治下,权力集中在军官和军人手中。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尽管军队和警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官僚机器的推动力并不是高级军官阶层,而是党。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极权体制里,军队在党的控制之下。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毛泽东[1938](1967,第272页)。

另一个原因是,尽管军事独裁(如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对国民进行了可怕的恐怖统治,但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它并非“极权主义”。军事独裁统治阶层并没有力图干预所有的社会和个人生活。

的话,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使大自己的行为具有"法律依据"。法律、政府命令和法庭判决都可以变为正式的司法处罚,这些都很清楚地说明官僚机构不受任何法律制度的约束,而且情况恰恰相反:正式的法律制度服从于官僚机构。

在政治学理论中,已经有非常好的理论模型①来描述选民、立法机构和官僚组织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推导出官僚组织的行为规律。根据这一模型,由于立法者关注的目标是能否再次当选,他们被激励去赢得投票人的信任。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激励,立法者将向官僚机构发出相应的指示,并监督它们的执行情况。在这类模型中,官僚机构服从于立法者。

但这一模型不能用来分析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因为模型的两个主要假设在此都不成立。(1)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机构与模型的假设截然相反,它完全独立于投票人;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的"议员们"是由党委提名并指定的,立法机构由此变成官僚体制的自身组成部分之一。(2)出于同样原因,立法机构也无法独立于党的官僚组织,更不能监督或控制它;立法机构自己就是整个官僚体制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且在讨价还价过程中还处于劣势地位。

这样一来,议会民主体制中防止官僚机构攫取并长期垄断权力(或将自己置于其他竞争力量之上)的制衡机制就无法发挥作用。由于没有独立的法庭来审查法律、法规或政府行为是否违背了宪法和以前的法律,因而公民也就无法通过法院要求国家赔偿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在整个国家里也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保护个人不受权力的侵犯。

在前面部分我们曾提到,在经典体制下,权力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它内部也存在不同派系和相互冲突。但就狭义层次而言,以及根据这里所提出的三个标准,我们完全可以说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权力结构是权力高度集中的统治。

① 见 W. Niskanen(1971)。

# 第四章　意识形态

本章及本书的其他部分都不打算对所谓经典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学术思想史进行系统分析。我们的目标仅限于以下内容:对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稳固和维系而言,意识形态在思想、信念、承诺、价值以及道德要求方面发挥了哪些实际作用?这些意识形态包括哪些内容?

## 4.1　官方意识形态

这里所关注的官方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下列作品里:党的决议、领导人的讲话和著作、意识形态方面的教科书、报刊、杂志上的重要文章以及其他官方声明。

在发展成熟并稳固下来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里,不存在不同意识形态为赢得人民的真心支持而展开的公开竞争,官僚集团几乎完全垄断了意识形态。当然也还容忍其他意识形态的存在,例如传播宗教思想并不违法,但维持教堂的运行却会遇到很多行政和经济上的障碍,而且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时期甚至宗教活动也遭到了迫害。虽然不时也会出现与官方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但是多半会很快消亡,而且基本上都是半合法或不合法的。与此同时,党的各级机构、政府以及群众组织不遗余力地通过新闻舆论、其他媒体宣传、教育、科学和文化活动等各种方式向人们灌输官方意识形态。

官方意识形态的来源多种多样并深深地植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之中。正如地质学上地层的形成,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也是一个逐步沉积

凝固的过程。

最底层是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然后主要是马克思、其中还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前的欧洲劳工运动思想传统。

紧接着的一层是与各国（后来都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有关的各种思想、憧憬和价值取向。

再往上的一层主要来自共产党在革命过渡阶段获得的经验。此时，共产党已经完成了从反对派革命党到全面执政党的转变，并向人民做出了许多郑重的承诺。

在经典体制的建设过程中，所有"层面"都涂满了意识形态的涂料。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发展、稳定并最终固化密不可分，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为现实中出现的东西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就苏联而言，官方意识形态的最后一层与斯大林个人有密切的关系，许多说法也都被冠以"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不仅限于苏联境内，而且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有自己的贡献，因此，经典社会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在不同国家都有所不同，其他各种变化则都与时间变迁有关。

各个层面之间都相互关联，官方意识形态在形成过程中往往是靠近上面的一层会从更早形成的那一层里选择部分思想，有些思想在被遗忘之后，进入了社会主义体制的"潜意识"之中，其他一些思想则获得了新的名称和意义。

本章的最终目标是想对不同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进行归纳总结，然后找出处于经典体制阶段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一般都具有典型性和长期性。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只对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进行客观描述和分析，不进行价值判断。因此，这里唯一的要求就是真实准确，不能有任何歪曲。本书是在对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进行阐释分析，不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这一点我不想一再重复。

## 4.2 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感

官方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怀有救世主般的信念，认为社会主义注定要拯

救全人类。坚信社会主义体制比资本主义更优越是官方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要素之一。这背后的主要假设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其中包括以下几个原因:

社会主义能够彻底消除资本主义损害效率的体制特征。资源分配由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市场和供求波动决定,这将带来总量上的错误配置。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计划来克服,同时还能够解决大规模失业并避免随着而来的对人类最重要生产力的极大浪费。有了计划,就能够防止因过度生产而产生的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损失。[①] 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自由竞争必然会有商业机密,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创新(产品)将成为公共财产。自由竞争还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浪费,例如日益增长的巨额广告开销,持续不断地调整产品种类和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将消灭这些浪费行为。最后,社会主义还将结束由于剥削阶级过着寄生虫般的奢侈生活而造成的资源浪费。

除了能够防止私有产权、竞争和市场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之外,社会主义还具有其他优势。处于被剥削状态的无产阶级工人将不再受到劳动剥削,从此他们会以更大的热情自觉地进行生产。这样的工作热情会提高生产业绩并降低监督成本。工作热情和责任感将不断提高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是社会的最高发展阶段,到那时劳动已经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所需。因此,共产主义社会不再需要为了让人们工作而花费社会成本,也不必为了金钱而出售商品,这样就可以完全取消市场。

社会主义的优越感还与下面的信念有关:资本主义对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时代已经结束,种种腐败堕落的迹象随处可见。[②]

马克思和列宁则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体现在其经济成就上,而

---

① 历史上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体会最深的时期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那场危机使西方国家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生产严重倒退,成千上百万的人失去了工作,而与此同时,苏联却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② 阿尔巴尼亚的老牌社会主义领导人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曾这样说过:"资产阶级把所谓的'消费社会'都捧上了天,仿佛那才是'未来社会的典范'。其实他们都是在胡说八道,那是一个腐朽堕落的社会。资本主义总是想掩盖这一切,但它们长久以来存在的腐败和骯脏之物却不断大白于天下。我们的社会永远不会有这些东西。"恩维尔·霍查(1975,第9页)。

不是(或主要不是)体现在道德层面上。[1] 经典社会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反映出了这一信念: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优越性来自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并不是因为人民在需要的时候愿意做出巨大的牺牲,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明,而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这将始终保证社会主义在克服了最初的缺点之后,其优越性将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2]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发生变革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对社会主义体制经济优越性的过度信仰开始动摇。甚至那些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也开始怀疑社会主义是否真的在经济上必然(或自动)取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成就,他们不得不承认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中,资本主义已远远领先。一旦官方也普遍认为社会主义需要模仿或引入资本主义的某些体制特征时,社会主义就开始偏离经典体制状态。

社会主义优越感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因素是其道德优势,尽管这不是衡量两种体制竞争胜负的主要标准。官方意识形态宣称,社会主义是更纯洁更高尚的体制,它可以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人们会进行自我改造,从而自觉自愿地为公共利益服务,这样就能够战胜自私和个人主义。这又将我们带回到先前曾讨论过的问题:人性的彻底改造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书可能将反复提到价值[1.7]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哲学用语,本书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主要是列举出特定社会集团认为其具有“内在价值”的社会现象,并区别所谓“基本的善”和那些仅仅是为了获得基本的善或内在价值而使用的工具或手段。官方意识形态认为,建立并维护社会主义体制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是一个基本的善。即使社会主义体制在某一时期无法完全实现基本的善,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保证了它最终将实现其内在价值。所有的单个因素(如物质福利、效率或公平分配)在本质上只是工

---

① 例如,列宁曾有如下名言:“社会主义应该有比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所取得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弗·伊·列宁[1918](1969b,第248页)。

② 正如匈牙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乔治·卢卡奇所说:“我时常这样想,即使生活在最差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要比生活在最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好。”乔治·卢卡奇(1971,第58页)。

具,它们存在的真正目的都是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这些东西必然成为社会主义体制的副产品,尽管在时间上可能会有长有短。其实很简单,社会主义胜利了,这是最重要的。

## 4.3　基本承诺

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曾向人民做出过郑重承诺,这些基本承诺也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体制究竟能够为人民带来些什么呢？即使不能立刻实现,那么至少10年或20年之后,它可以取得哪些主要成就呢?

社会主义体制通常都是在革命前处于贫穷和落后状态的国家里建立起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刚刚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过渡时期都非常混乱,再加上内外战争,它们与处于经济增长中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增大。党对人民的许诺包括:这种差距将迅速消失,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很快赶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切就在于前面曾提到过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但只有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出来才能实现承诺。这就需要集中资源来刺激经济增长,并且要为高速增长做出牺牲。

赶上资本主义经济的承诺是说了一遍又一遍。[①] 尽管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各自的豪言壮语,但是就其本质而言,[②]基本没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国家必定会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准,而且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还将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体现了经典体制阶段官方意识形态的几个重要特征:自信,坚信社会主义体制所具有的优势,相信今天的问题都是暂时的,明天的生活一定会更好;保证,动员人民为了美好的未来不怕牺牲,努力工作。

---

① 长期以来,东德的口号是“不是赶上,而是要超过它”,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不仅会打败资本主义,而且不会带来资本主义任何不好的东西。

② 这一思想首先是由斯大林提出来的[9.1],然后赫鲁晓夫又开始继续使用,他在谈到苏联第七个5年计划(1960－1970年)任务时曾这样说:“到1967年,也许会更早一些,苏联将成为世界上物质总产量和人均产量最高的国家。这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和平竞争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尼·谢·赫鲁晓夫(1960,第56页)。

另一类承诺涉及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主义体制的责任与义务。社会主义体制在一开始就继承了原有国家的贫穷和落后状态,在争夺政权的过程中,又要同时面对国内国外的敌人。当整个国家仍然是满身伤痕之际,党就许下诺言,它将扮演起经济水准已经相当发达阶段的福利国家的角色。每个人只需干好自己的那份工作,剩下的事全都由国家来负责。官方意识形态中的这部分内容主要有以下来源:劳工运动和欧洲社会党的思想传统,极端不平等体制下的革命运动(革命者曾发誓,一旦夺取政权,他们将彻底消除那种不公正的财富分配)。

第一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承诺便是提供工作。即使不能马上就实现全民就业,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一定会让所有人都有工作。每一位具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参加工作,这是宪法规定的权利。

其他一些承诺也都是公民的权利,如国家有义务为所有人提供基本需要:食品、住房、医疗、教育、休假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为了表明实现这些承诺的郑重决心,首先做出了以下典型姿态:在国家提供补贴的情况下,以非常低的价格出售基本食品。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通过配给制来平衡购买力。城市公寓楼被收为国有,提供高额的租金补贴,然后由政府分配租期。整个国家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或是半国家和半工会),并为人们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① 教育也是免费的,工会免费或以极便宜的价格为工人提供休假场所。书籍、唱片和电影票都有大量补贴。

尽管一开始通过价格和税收政策以及建立各种组织(例如食品分配局、住房办公室、社会保险中心、国有企业经营的文化和休假场所)采取了不少实际措施来完成这些承诺,但社会主义国家未能完全实现这些承诺[13.7]。在整个经典社会主义时期,官方意识形态许下的诺言与实际经济状况之间积累了巨大的矛盾和紧张。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法兑现最初的承诺就成为一种极为沉重的负担。

---

① 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里,医疗保障作为一项公民权利较晚即直到经典体制稳定之后,才逐步覆盖到所有人群。最初,只有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人才享有这项权利。国家承诺提供的其他"基本需要"基本都是这种情况。

## 4.4　权力的自我合法性与“父爱主义”特征

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就是它如何看待权力结构以及党在这一权力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①

官方意识形态宣布社会主义体制是一个专政政体，问题的关键是谁对谁实行专政。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资产阶级在实行专政。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官方意识形态宣称农民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都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他们支持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但自己却不能当政，当权者公开承认他们实行的是阶级政策。

工人阶级并不直接行使权力，党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而最终也是全社会的先锋组织。因此，党必然要领导整个社会。

如果当权者的政策遭到某些政治团体的反对，这并不意味着政策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那些反对派是内部和外部阶级敌人的代言人，他们愚蠢、恶毒或者根本就是公然敌对。大规模的群众反抗也不能说明有一部分群众不支持党的领导。党比群众更了解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求：这也正是“先锋”的意义所在。是党发动了革命并最终击败了革命的敌人，这已经充分证明党有能力领导群众。这些思想和方法在官方意识形态中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掌握并懂得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在思想和方法上都高于任何其他思想和方法论者，因为科学社会主义为他们提供了可靠的指南，能够充分理解任何新情况并发现它提出的新任务。因此，党完全能够比党外的广大人民群众更了解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在，此时还让党受制于有其他政党参与的选举程序，岂不是画蛇添足？事实上，如果真那么做的话，将是一个非常

---

① 在讨论官方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时，我们没有必要深究革命爆发前最早阶段的情况。马克思对此也几乎没有什么说法，对革命前的权力问题，他只有寥寥几句话而已，而且都是一般性的描述。马克思所预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意味着某种集体主义的自我管理，根本不涉及官僚权力。

这里所描述的观点（体制的官方意识形态必然包括权力问题）是党取得政权之后，为了替已经出现的情况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支持而不断发展起来的。这些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与列宁和斯大林的努力有关。

严重的错误,是对人民的犯罪,因为大多数人可能投票给没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斯大林就曾说过:"如果党仅仅是工人阶级情感和思想的应声虫,如果党总是尾随于自发的群众运动之后,那么它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党…… 党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的最前列,党一定要比工人阶级看得更远……"①

斯大林还引用了列宁的话:"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广大农民和小业主,成千上百的政府职员,行政干部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让他们都'服从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服从无产阶级的领导……'同时我们也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斗争,进行无产阶级自身的再教育,因为无产阶级也无法在一夜之间就彻底摆脱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反对小资产阶级影响的群众斗争将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过程。'"②

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就是这样一个极为奇特的自我合法性构建过程。统治集团是否真的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而人民又是否真的支持他们,这些都没有任何可以量化的衡量指针(如投票统计)。当权者认为自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并且始终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用相对晦涩但简洁的学术语言来说,那就是党通过"概念界定"完成了权力的合法性构建。③

经典体制的家长制特征显然也源自这种自我合法性:当权者坚信他们比被统治阶层更了解自己(被统治阶层)的利益要求。官僚集团处于家长的位置:所有其他社会阶层、团体或个人都是孩子,作为他们的成年监护人,必须对"孩子"的心灵成长肩负起监督职责。这种体制与官僚统治集团所担负的"看护"角色密切相关(前面所讨论的福利国家角色)。只要公民按照指示干好自己的工作,他们就不必再担心没人照料,因为党和国家会把一切都管好。当某一领袖位于权力顶峰并产生个人崇拜的时候,这种家长制特征就显得尤为突出。伟大领袖不仅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科学家,而且他还是全国人民的父亲。家长制为社会主义国家将权力集中并交给官僚组织

---

① 见约·维·斯大林(1947,第82页)

② 同上,第41-42页。

③ 可参见F. Feher、A Heller和T. H. Rigby的文章,由T. H. Rigby和F. Feher等人编辑(1982)。

提供了主要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 4.5 纪律、牺牲精神和警惕性

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道德责任。道德责任并没有正式的成文规定，但在官方声明里会以各种形式对这方面的内容做出规定，其来源既可以是实践中的奖惩决定，也可能来自经官方批准的文艺作品。

在其他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里，当然也会有许多道德责任。例如，道德规范会涉及到家庭生活，一般都相当保守并与西方文明中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要求[①]关系密切。然而这里所强调的道德责任主要是指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特定道德规范，并与本书的主题（政治经济学）有关。

所有公民都要严格遵守纪律，特别是党员。"创见"很容易就会被贴上"怪诞"的标签；"独立"则意味着不服从和个人主义（一个贬义词）；批评性的观点被认为是不尊重上级领导，不守纪律和具有破坏性。虽然没有明文禁止这三种行为，但如果在实际中这么做的话，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无条件地服从纪律才是受到赞赏的行为。必须紧跟现行的政治路线，对已经通过的决议和上级命令要毫不犹豫地加以贯彻和执行。统治阶层认为这才是应该加以肯定和褒奖的行为，在官僚体制中，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成功升迁。选任的主要标准是政治上是否可靠、忠诚，是否忠于党组织和党的思想（也就是官方意识形态），这方面的衡量比个人能力和专业水准重要得多。一旦政治上有疑问，如不够忠诚、不可靠或不听从指挥，那么即使能力再强或专业水准再高也不能任用。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经典体制之前的意识形态来源，就会发现不论是马克思，还是革命前的欧洲劳工运动传统，都没有提到过所谓"忠诚"或"服从"的问题。官方意识形态这方面的内容最早来源于社会主义体制建立前各国（主要是那些依靠内部力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2.3]）的革命运动时期。这些国家在革命前几乎都是专制政体，那里的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员，大部分时期都是在非法状态下开展工作的，并且受到各种迫害。如果

① 多指故作正经、固执己见或因循守旧。——译者注

没有严格的纪律,革命运动是无法取得成功的。而且,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主要就是武装斗争、游击战争、革命暴动和国内战争,所有这些都需要严格的军事纪律。在革命胜利之后,和平时代的公民统治权就转移到了那些在革命中成长的人的手中,他们已经习惯了命令和服从。

在革命过渡时期,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处于混乱状态,社会分裂,急需建立新的秩序,同时为了反对国内外敌人还要进行军事斗争。面对这一切,党势必要求党员、干部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养成严格遵守纪律的作风。然后就开始了工厂和其他组织的国有化运动,对它们的管理也要求服从纪律。

纪律和忠诚成为道德责任,这其中最重要的历史原因是社会主义经典体制的建立。本书后面还会详细谈到官僚对社会和经济活动的管制,这类管制措施与上述道德责任密不可分。

服从纪律的美德和牺牲精神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官僚集团确定的特别情况下,个人必须随时准备为更高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如果需要,他们在官方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仍要加班加点。如果需要,他们应该放弃改善自己物质生活水准的要求。如果需要,他们要将家庭生活置于国家利益之下,因为所有成年家庭成员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工作和政治活动填满了。就这一点而言,官方意识形态包含着某种"军人精神",所有公民都要被动员起来。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经常引用军队比喻:"劳动战线"、"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生产斗争",等等。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场漫长的战役,每个人都要完成自己的职责,那些完不成任务(或者被怀疑没能完成任务)的人被视为胆小鬼、逃兵或叛徒。

这种"战争意识"还要求具备其他"美德",例如对内部和外部敌人的警惕性。由于不能够用和平文明的方式来表达政治支持或政治反抗(例如,向不同的政党投票),因此,无法确切知道谁是真心支持社会主义体制和现行的政治路线。如果有人反对,那怎么办?必须要有人密切关注隐藏着的敌人。

之所以对外部世界和资本主义充满不信任感主要源自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艰难处境。许多周边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政治运动组织都强烈反对共产党掌权以及在本国建立社会主义体制,他们都企图(或已经有了实际支

持)支持针对社会主义的反抗活动。这种外部敌对和压力就孕育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孤立倾向。因此,必须反对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影响,不管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甚至是外国的生活方式都要一概反对。无论是政治联系、还是经济联系(包括商业联系和金融联系),到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因为外部敌人会不择手段,利用各种联系进行敲诈或者施加政治压力。这种普遍弥漫的氛围就像是对内架起一排排防御性战车,随时准备抵抗进攻。那些能够始终表现出这种孤立奋战倾向的人都是值得赞赏的。

## 4.6 权力与意识形态

一旦党夺取了国家权力并成为唯一的掌权者,那么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放弃权力。斯大林曾这样表达,他先是引用列宁的名言:“权力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然后又加上了自己的话:“夺取权力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要保持权力、巩固权力,让它战无不胜。”①

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中,权力不仅仅是实现其他重要目标的工具,权力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是最终的善。当评价社会主义体制的表现时,必须将这一点牢记于心。在第一章[1.7]里,我们曾用模拟的方式来说明如何为社会主义体制打分,下面的内容也应该是其中的一门课程或者说评价的标准之一:共产党是否牢牢地掌握了手中的权力?官方意识形态表明权力这门功课在学校的成绩汇报单上应该具有很大的权重。正如第三章所提到的,经典体制在这门课上拿了高分,因为经典体制建立起了使权力得以维系的制度框架。

在此之前我们就曾强调过,权力和官方意识形态就像身体和灵魂,两者须臾不可分离。是制度和组织建立了经典体制,还是思想鼓舞着制度和组织中的成员?究竟谁在前,谁在后,就像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其实不必费力深究。在整个过程中,无论是革命之前,过渡时期,还是经典体制的演化阶段,语言和思想都活生生地体现在人的行动之中。反过来说,人的行动以及体制的逐步发展都要求为自己提供合法性和正确解释,行动本身又不断

① 见约·维·斯大林(1947,第39页)。

对思想进行调整和修正，直到经典体制的官方意识形态发展成熟。一边是制度、组织和运动；另一边是计划、构想、信念、道德责任和价值，所有这些都捆在了一起，共同维持着经典体制。

# 第五章　财产(权)*

在本章里,我们首先将对相关概念进行一些解释,然后系统考察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财产(权)问题。

## 5.1　概念解释

通常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区分:资本主义是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而社会主义是以公有财产(权)为基础的。这种说法基本没错,但如果想更准确地把握现实,还需要对概念体系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首先必须区分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例如衣服就是私人产品,而海上的灯塔信号就属于公共产品。当一个人在穿上一件衣服时,另外一个人就不能再穿上同一件衣服了。而当一位船长根据灯塔信号调整航向的时候,他并不能阻止另一位船长使用同一灯塔的信号来调整航向。当阳光、语言和生产知识进入公共领域之后,它们都是典型的公共产品。①

---

* 关于"Property"一词的译法,译者主要参考了国内翻译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1996 年版)和《牛津法律大词典》(2003 年版),其中《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将该词翻译为"财产",但在词条解释中又使用了"财产权",而"产权"相对应的英文则为"Property rights";而《牛津法律大词典》则将"财产"和"财产权"两个词同时列出。——译者注

① 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并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分界线,而往往依赖于不同的技术水准和社会经济状况,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深海是公共产品,但邻海国家享有对大陆临近海域渔业的管理特权。这种财产(权)是依靠国际法庭、法律与经济制裁协议来保证执行的,并以海军力量作为最后保障。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但实际上普通人却无法运用上流社会的语言:因为这种上流社会用语是该阶层的私人产品,其财产(权)受到"培养"及"教育"等社会机制的保护。

但不能把“公共产品”和“公有财产(权)”的概念相互混淆。公共产品的标志是在特定时期无法确定其所有者,而私人产品的所有者是非常清楚的(所有者可能是个人、团体或国家,但所谓国家所有,是指私人产品为集体共同拥有)。这样就引出了财产(权)概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要素:排他性。非所有者只有在得到所有者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所有者的财产(权)。当一个人宣称他/她拥有财产(权)时,必然要有一套社会机制来保障他/她能够行使自己的财产(权),换句话说,要确保不经所有者同意,任何人都不能随意使用他/她所拥有的东西。

因此,从一方面看,财产(权)意味着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例如,一个人的衣服是他/她的财产。从另一方面来看,财产(权)又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①: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的特定关系需要有某种社会机制来支持,这样财产(权)才能够得到有效实施。

财产(权)是一个复杂综合的概念,最好是先把它分为不同的组成部分,然后再进行分析。下面我们将根据几种不同的分类标准对财产(权)进行细致的分析考察。②

第一种分类主要关注所有者究竟可以拥有哪些财产。以下是几种较为重要的财产形式:

◆ 物品(如衣服或机器);

◆ 资源(如土地或自然资源);

◆ 信息(如发明或生产知识);

◆ 个人能力:个人所具有的某种身体或脑力上的能力,可以利用这种能力提供服务(这种个人能力未必一定是归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所有,一个最明显例子就是奴隶)。

通常一位所有者可能同时拥有很多物品,资源和信息。例如,一家工厂

---

① 马克思在研究财产(权)问题时,特别关注社会关系层面的问题。

② A. A. 阿尔钦(1965)以及阿尔钦和 H. 德姆塞茨(1972)的著作对“产权学派”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财产(权)学派的主要思想来源于较早时期的各种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包括:F. 奈特关于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理论[1921](1965),R. H. 科斯在企业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1937,1960)。

E. G. Furubotn 和 S. Pejovich(1972)最先将财产(权)理论用于分析社会主义企业的行为。可参见 F. L. Pryoe(1973)。

的所有者不仅拥有各类机器设备和厂房,而且还可能具有生产程序方面的专利。需要注意的是,还有很多“属于”工厂的东西并不归工厂的所有者所有。例如工人,工厂的所有者只是雇佣了工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能力。有人可能仅仅是出租了生产场地和部分设备,也有人可能是用贷款的形式为工厂提供了部分资金,等等。

在研究社会经济体制时,弄清楚究竟是谁拥有生产工具(用以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是非常重要的。本章在余下的部分将着重探讨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本书也不打算讨论所有者个人物品的财产(权)问题。[①]

第二种分类主要关注所有者是谁。所有者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个人、家庭还是特定的一群人?或者说所有者是一个法律实体、公司、大学、养老基金或者国有机构、中央政府或者地方当局?

第三种分类主要关注所有者有哪些权利,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来研究。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财产(权)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即a类、b类和c类。这里想提前加以强调是,这三类财产(权)中每一类都包括大量具体和特定的财产(权)形式。

个人可以完全独自行使财产(权),或者在特定情况下,与他人分享所有权并行使相同的财产(权),后者的一个例子就是股份公司。在股份公司里,个人的所有权是根据他/她所拥有股份的数量来确定的。在接下来关于三种财产(权)类型的抽象讨论中,我们对上述这两种情况没有进行区分,在谈到“所有者”的时候,也都采用单数形式。本书在后文中还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5.2]。

a.剩余(收入)索取权。所有者有权支配其财产所产生的收入。这项权利可以更准确地定义为所有者对收入剩余部分所享有的支配权,意思是使用该财产所获得的收益在扣除了与之相关的所有成本之后,剩余的部分都属于财产的所有者。[②] 所有者可以自主决定如何使用剩余收入,如用于个人和

---

①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政治经济学教程中这被称为个人财产。

②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剩余收入这一概念,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个农民为了租用地主的土地而向地主支付了固定租金。这里所谓的剩余收入就是指土地产生的收益,减去所有的成本,其中就包括土地租金成本。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位农民享有对土地产出的产权,而不是地主具有产权。

家庭消费、投资、购买其他财产,等等。①

所有者对剩余收入享有完全支配权,他/她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将所有剩余收入用于个人消费(在后面部分我们将会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剩余收入支配权方面受到很大限制)。

对剩余收入的完全支配权还包括所有者有义务承担起财产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债务,而且债务负担完全有可能超过所有者个人财富的总量。②

对剩余收入的完全支配权能够自发为所有者提供最强有力的激励。如果所有者成功地使用自己的财产,那么他/她就可以获得正的收入剩余,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支配。如果所有者没能从某项财产获得相应的收入并造成了损失,那么在一定条件下,他/她很可能需要用其他个人财富来弥补损失。对于那些通过合作使用部分财产但却不享有剩余收入完全支配权的人,必须事先提供某种人为的激励来保证他们对相关财产的有效利用。这里存在的关系其实非常简单,剩余收入索取权所涉及的每一项权利都与所有者自己的“钱包”息息相关:所有者从正的剩余收入中获利,因为负的剩余收入而遭受损失。反过来说也就是,只有当财产的使用仅仅与所有者自己的“钱包”密切相关时,才会有完全的剩余收入索取权。③

b. 转让权。转让权是指所有者可以将财产出售获得金钱,可以将财产出租,作为礼物赠送或留给后代。这四种权利并不必然完全一致。例如,某类物品或资源可以出租,但却不能够出售,反之亦然。

这些权利也会自发地提供激励。如果所有者购买了一份财产,然后可以将它出售,那么在两次交易的间隔期内他/她就会努力提高财产的净价值。同理,如果他/她通过礼物或遗产的形式获得了一份财产或者将把一份财产作为礼物或遗产赠予他人,他/她也会努力增加这份财产的价值。如果所有者决定将自己的财产出租,他/她也会尽可能以最有利的条件将这份财产出租出去。

---

① 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时,马克思对剩余收入索取权是这样界定的:资本所有者控制了剩余价值。如果加以类推的话,可以说在其他类型的社会体制中同样存在这种产权。

② 现代的股份公司以及其他类似的法律实体的兴起就是为了将这种债务负担限制在一定范围内[5.2,第三类财产形式]。

③ 如果一个人无权使用自己所获得的赢利收入,或者不用为自己财产所产生的任何债务负责,而是仅仅能够支配剩余收入,那么这样的人也需要某种“人为的激励”。尽管他/她拥有部分的剩余索取权,但由于财产的使用方式与他/她自己的“钱包”关系不大,他/她也不是所有者。

c.控制权。财产权还包括其他一些重要的权利,主要涉及到财产的使用(管理、决策和监督)。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家私人作坊,作坊的老板将自己决定雇什么人,生产什么,以什么样的价格出售产品等等。

从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发现,没有所谓"单一控制权",而是包括一系列具体的控制权。所有者可以将这些权利(甚至是大部分权利)委托给其他人,通常是拿工资的雇员。所有者也可以将不同的控制权委托给不同的人。他/她可以建立起一个具有分层结构的等级式控制组织。所有者可以使用各种激励计划来确保雇员能够有效地行使控制权①。

尽管a、b和c三类财产权中所谈到的各类权利都紧密相连,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权利还是可以相互分离的。特别是c类财产权中有很多权利都可以与a、b类财产权相分离,如所有权和控制权相互分离。

完全所有权提供的自发激励与局部产权提供的人为激励之间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对于经济体制而言,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决定,哪里需要依靠自发的激励来完成哪一项社会功能,哪里又需要人为激励?

第四种分类是指所有者在行使财产权时受到了哪些限制。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绝对的财产权,许多财产权都要受到政府和法律的管制,或者说至少会受到习惯法、传统和道德规范的影响和制约。即使经济体制允许企业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并充分竞争,所有者仍然会面临一系列的限制。

最后一种分类涉及到法律所确定的名义财产权与实际财产权之间的区别。

## 5.2 社会主义体制出现之前的一些典型产权形式

有了前一部分关于财产权分类标准的讨论,可以说基本形成了一系列

---

① 有大量文献对委托—代理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涉及到越来越多的领域。这方面研究的先驱者包括K. J. Arrow(1964)、T. Groves(1973)、S. A. Ross(1973)和J. A Mirrlees(1974,1976)。全面的理论总结可参见O. Hart和B. R. Holmstrom(1987)以及B. R. Holmstrom和J. Tirole(1989)的研究,初步了解可参见J. E. Stiglitz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词条(1987,3:966-72)。

关于科层制,也有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研究,其中的先驱者是O. E. Williamson(1967,1975)。科层制的理论分析与数学模型可参见G. A. Calvo和S. Wellisz(1978)、T. C. Koopmans和J. M. Montias(1971)、Y. Qian(1990)和S. Rosen(1982)。

不同的产权结构(或者用一个同义词来说,叫做一系列产权关系)。根据哪些东西(或者说哪些东西组合在一起之后)构成了财产,所有者是谁,他/她具有哪些财产权以及面临哪些限制,以及"一组"财产权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名义上的财产权,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享有的财产权,我们就能够清晰地刻画出每一类产权结构。从理论上说,产权结构的种类是无限的,①但事实上,体制的历史决定了产权结构的类型是有限的。在下文中,我们把这些产权结构称为产权形式。每一种产权形式实际上都是一个理论模型,这样,我们就可以忽略前面财产分类中的具体特征,而重点研究其中的一般性特征。

在正式转入本章的真正主题(即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产权形式)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当代资本主义体制的三种典型产权形式。

1. 家庭企业。在家庭企业里,主要是家庭农户,当然也还有从事工业、贸易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家庭农户。

下面以家庭农户为例来加以说明:家庭拥有土地、耕种土地所需要的主要工具、牲畜,家庭还有自己的房子和农场建筑设施。

家庭生活与生产活动没有明显的区分:一部分产品由家庭自己消费使用,另一部分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家庭农户一般只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基本不雇佣外来的劳动力。②

在更高一级的经济发展阶段,会出现高度机械化、资本密集型的家庭生产企业,我们也很难把它称为"小作坊"。但在一般情况下,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主要依靠内部力量发动)都没有发展到这一经济发展阶段[2.3]。在这些社会中,家庭企业基本都是真正的"家庭小作坊",那些家庭也属于社

---

① 这是对无条件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类观念提出的最有力的挑战之一。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一般性定义是:社会中具有相同产权关系(主要是指与生产工具的关系)的一群人。但产权关系是多种多样数不胜数的,因此,在根本无法确定特定的产权关系之间究竟具有了多大程度的相似性之后,就能够把不同的人归为一个阶级。一个绝对贫穷的人和一个有银行存款并出租了夏季村舍的人都属于"工人阶级"吗?某个人拥有一家家族企业,雇了几个人干活,同时具有了a、b和c类财产权,而另外一个人拥有大量股票,但他仅仅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从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即拥有c类财产权),这两个人可以不加区分地归为"资产阶级"吗?如果有一个工资很高的高层职员,而他同时又掌握大量股票,那么他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的成员呢?

② 为了简化起见,我们没有考虑临时雇佣的外部劳动力。如果一家农户拥有长期雇佣的劳动力,那么它也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家庭农户了。

会贫困阶层。

就家庭企业而言,所有者同时拥有 a、b、c 三类财产权,所有权和控制权没有分离。家庭(在传统社会里,通常都是家长)既是名义上的所有者,又是实际的所有者,同时还是所有生产经营活动的决策者。家庭利益与企业的成功经营直接相关,因此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激励。[①]

家庭农户的情况基本适用于从事其他行业活动的家庭企业。

在下面讨论的产权形式 2、3 中,所有者通过雇佣其他劳动力使用自己所掌握的基本生产工具来从事生产。[②] 这些所有者都是资本家。这里本书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家"所下的定义,即雇佣了劳动力的企业主,"企业"一词则是指长期雇佣劳动力的组织。产权形式 2、3 讨论了资本主义企业,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的情况,我们将在 5.3 部分进行讨论。

2. *承担无限责任并由所有者管理的私人企业。*产权形式 1 和产权形式 2 最大的不同就是有没有从外部雇佣劳动力。雇佣人数的多寡并不重要,那只意味着是小企业,还是大中型企业。

企业主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家庭,但有外部人的加入之后,才构成了企业主的财产(是否有外部人员是产权形式 2 与产权形式 1 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产权形式 1 中,企业仍然严格控制在家庭范围之内)。企业主享有完全的所有权(a 类和 b 类财产权)和基本的决策权(c 类财产权)。生产和市场销售由所有者直接负责,他/她只是将次要的管理岗位让给雇佣职员,而且授权非常有限。因此,企业主一般都是面对面地与所雇佣的工人一起工作。

全部的净利润都属于所有者。如果企业面临破产,那么所有者有责任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清偿企业债务,而不仅仅限于企业本身的财产(以后我们会看到,这是此类企业与公司制企业最主要的区别)。企业主的个人收入和个人财富与企业的收入与财富密切相关。

---

① Lester Thurow 有一篇文章(Financial Times,1986 年 9 月 6 日)的标题《谁为病牛彻夜不眠?》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对一个家庭农户而言,显然是这家人(或者更具体地说,就是那个对家庭成员负有责任的家长)将"彻夜不眠"。

② 按照定义来说,"产权"的分类也包括个人对自己的劳动力有多大的支配权,或者对别人的劳动力具有多大的支配权:奴隶主、封建地主、雇佣劳动力的资本主义企业或国家。

3. 私人所有的股份公司。在这种产权形式下，有一群人共同拥有一家企业。有时大部分股份会相对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主可能会“清晰可辨”。但通常个人股东并不显眼，与产权形式2相比，这类财产权已经变得“非人格化”。

这里我们不讨论大部分股权由国家所掌握的公司，而只研究大部分股权为私人所有的公司、非国家所有的法律实体或者私人机构。①

公司的剩余收入属于股东，其中一部分以股票分红的形式进行分配，另一部分则用于再投资（a类财产权）。股东可以自由处置他/她所拥有的股份，这类财产权的多少取决于每股股票所代表的公司权重（b类财产权）。

公司制企业与形式2企业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公司制企业承担有限责任：所有者对公司债务的偿还义务仅限于他/她所投资的金额（例如，所有者股票的价值）。公司并不是个人所有者的简单联合，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即使公司面临破产并且股票低于公司价值时，股东的个人财产也不会受到影响。因此，公司制企业与形式2企业相比，个人收入和个人财富与公司的收入和财务并不完全对应，但仍然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股东非常关心公司能否赢利以及是否具有良好的商业前景。

最后谈一下剩余收入的分配比例问题。公司剩余收入的分配一般由股东大会决定，但即使是在股东大会的准备过程中，主要的管理人员都享有很大的发言权。从名义上看，公司管理者只是所有者的雇佣职员，他/她可以在任何时候解雇现有管理层，让其他人接替他们的位置。但由于股东常常无法很好地组织起来，于是管理层就有可能掌握很大的独立决策权。这样也就出现了产权形式1和产权形式2中所没有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②

事实上，有一类产权，即那些控制权（c类财产权）大部分都转到了高层管理者的手中。尽管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掌握了很大的独立决策权，但在很

---

① 英美国家的词汇常常会误导那些不太熟悉这些国家情况的读者。如果一家公司在满足了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后挂牌上市，那么这家公司就被称为“公众”公司。这里的“公众”一词并非指公共所有，而是指公众可以在股票市场上买卖该公司的股票。公众公司的股票既可能被私人持有，也可能被国家持有。

②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A. A. Berle和G. C. Means[1932](1968)，他们研究了管理层如何掠夺了股东的权利。此外，还可以参见J. Bernham(1941)，他首次提出了管理层革命的概念，以及A. D. Chandler(1977)的开创性著作也提到这类问题。

多重要问题上,他们还是依赖于股东,这里有一系列的激励机制。如果公司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良好的商业表现,那么高层管理者就会获得很高的工资和奖金。但更重要的是,同样存在负面激励,因为股东也有可能用脚投票:如果管理层将公司管理得很差,那么管理层很有可能一无所获。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与竞争者相比,公司的经营状况恶化,那么股东可以将手中持有的股票出售,股票的价格就会下跌。此时,很可能出现新的投资者将这家公司收购,然后换掉原先的管理层。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这家公司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也不论所有者能否获得高额利润,管理者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将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

上述三类产权形式都属于一个更宽泛的产权结构,即私有产权。私有产权还包括其他产权结构,这里就不再一一详细讨论了。在了解这三类产权形式之后,可以说,我们对产权形式也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①

## 5.3 国有企业

考虑到本书的整体安排,这里就不再讨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产权形式特征的历史形成过程,我们将立刻转入“最终产品”,即经典体制下已经成熟和稳定的产权形式。当然,在需要的时候,也会对经典体制各种产权形式的发展过程做一些简单介绍。

我们首先介绍经典体制中最重要的产权形式:官僚化的国有企业②(为简单起见,下文中省略了“官僚化”一词)。表5.1列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国有部门所占的比重。

---

① 在非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也同样存在国有企业,有些完全为国家所有,有些是混合公司,但国家所有权处于支配地位(例如,国家拥有一家公司的大部分股票)。对这类国有企业的情况,我们就不做详细讨论了。

②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表现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一系列显著特征。(例如,本部分所讨论的财产的“非人格化”,官僚体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7.3-7.5],以及国有企业财务纪律的软约束[8.4])。

表5.1 公共部门所占比重:国际比较

| | 年份 | 公共部门所占比重(百分比) |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 保加利亚 | 1970 | 99.7 |
| 古巴 | 1988 | 95.9 |
| 捷克斯洛伐克 | 1988 | 99.3 |
| 东德 | 1988 | 96.4 |
| 匈牙利 | 1988 | 92.9 |
| 波兰 | 1988 | 81.2 |
| 罗马尼亚 | 1980 | 95.5 |
| 越南 | 1987 | 71.4 |
| 南斯拉夫 | 1987 | 86.5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 奥地利 | 1978－79 | 14.5 |
| 法国 | 1982 | 16.5 |
| 希腊 | 1979 | 6.1 |
| 意大利 | 1982 | 14.0 |
| 西班牙 | 1979 | 4.1 |
| 英国 | 1978 | 11.1 |
| 美国 | 1983 | 1.3 |
| 西德 | 1982 | 10.7 |

**资料来源**:P. Mihalyi以官方统计年鉴为基础,其中包括Finansy I Statistika(1989 b,第49页)和Savezni Zavod za Statistiku(联邦统计办公室,贝尔格莱德)(1988,第93页)。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料主要引自B. Milanovic(1989,第93页)。

注释:所占比重是指占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占资本主义国家GDP的百分比。社会主义国家的数字不仅包括国有企业和组织,还包括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业的净产值(例如农业合作社就使用了私人的土地)。在此忽略了没有统计资料的非正规部门。由于包括了家庭农业的产值并排除了非正规部门,表中的数据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出私人部门的地位。

古巴:只有国有部门;南斯拉夫:以1972年价格为基础计算的总产值。

国有企业产权形式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占据着“制高点”(Commanding heights),①这意味着在以下领域中非国有部门只能处于被支配地位:采矿、能源生产与加工、交通、国内批发贸易、对外贸易、银行和保险。而农业、零售贸易和其他公共服务则不是“制高点”,其中虽然也有国有企业,但也允许其他产权形式的组织广泛存在,甚至占主导地位。

国有企业的名义所有者是国家,由中央政府代表。根据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国有部门是“全体人民”或“全社会”的资产,因此,它不同于其他非私人的产权形式,例如地方组织所有的企业,或是合作社(按照官方意识形态的定义,合作社的所有者只是一部分人民,如当地人民或合作社社员)。

如果想要对国有企业名义所有权背后的真实产权形式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必须认真考察其中各种具体的产权含义。

a. 第一类重要产权是使用财产获得的剩余收入的支配权。在经典体制下,国有部门的剩余收入都进入了国家中央预算。这里没有资本主义体制里公司上缴给国家的“税收”和公司利润的区分,上缴给国家预算的全部收入构成了由中央集中掌握的国有部门净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准确界定到底什么是“剩余收入”就成了一个问题。获得“剩余收入”的中央官僚机构同时又决定着国有企业的产品销售价格,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生产工具的价格以及企业应该向国家预算上缴多少收入。官僚机构还要根据中央的净收入来决定其中多大比例应该返还每家国有企业(或者说,企业应获得多少预算支持,企业负的净收入是多少)。当然,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也同样如此:官僚机构决定了在总预算收入中,有多大比例应来自国有部门的净收入,以及剩余部分从哪些渠道、以什么名目获取。预算开支比例也这样分配。从中央预算中以什么名义、支出多少给每一家国有企业(或全部国有企业的拨付总额)都与从每一家国有企业获取的收入(或全部国有企业总收入)无关。

可以这样做一个总结:在国有企业的产权形式下,剩余收入的规模完全由官僚机构任意决定。但一旦决定(按照财政管理的技术标准)上缴国家中央预算,这时所谓的所有者其实就是“国库”。一定会有人接着问到:那么又

---

① 这个词最先出自列宁之口。

是谁控制着国家预算呢？是谁设定了所有的经济参数（价格、工资、税收等）？而正是这些参数决定了剩余收入的规模。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样的：支配权属于官僚机构。在非人化的机构“国库”背后，是掌握权力的官僚集团，他们拥有剩余收入支配权。

与私人所有者相比，经典体制下的剩余收入支配权在某些方面要宽泛得多，而在另一些方面却又受到很大限制。事实上，只有对私人所有者而言，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剩余收入支配权，私人所有者能够获得多少剩余收入不仅取决于他/她自己的行动，而且还依赖于所有者自己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因素（如市场价格和政府税收），但从国有企业集中获得的净收入则几乎完全是由官僚机构自己决定的。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官僚机构所掌握的剩余收入支配权非常有限，因为在官僚机构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拥有剩余收入支配权。剩余收入支配权的行使受到各种约束和禁止性规定的限制。

剩余支配权完全集中于那些对计划制定、国家收入与支出、价格和工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的手中。但在这些决策层次上，那些最有影响力的决策者的个人收入与财富却和国有企业的收入与财富毫不相关。国有企业的利润一分一厘都不会自动进入官僚机构成员的腰包，当然，他们也决不会为国有企业的损失拿出自己一分钱。这样，“个人钱包”与国有企业的剩余收入之间的联系已经荡然无存，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些对如何使用剩余收入拥有很大决策权的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所有者。私人产权自发产生的激励机制在此毫不适用，整个社会必须全部依赖于各种人为激励。

在经典体制下，为了鼓励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以及所有职工能够关心企业利润，通常也会有一套激励计划，但往往是收效甚微。激励的程度（一般都很弱）和具体标准都是由更高当局一手制定的，这就完全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控制手段，即前文中所说的人为激励，而不是所有者掌握全部剩余收入支配权的产权形式。

b. 国有企业是不能买卖的物品，不能出租、赠送或继承。在经典体制下，任何人（即使是“国家”这样的名义所有者）都不能行使国有企业的转让权。

c. 控制权由官僚机构行使。国有企业内部的科室式官僚组织控制着企业的各类活动，这类官僚组织构成了整个社会官僚科层体制中最基层的部分。在此之上还有一系列的等级组织，直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即体制中的最高

领导人。尽管 c 类全部是由官僚机构来行使,但行使权并不是平等分配的,而是要根据官僚体制中不同机构以及机构中个人的相对影响力大小来决定。关于官僚控制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详细研究,这里只是就与本章主题有密切关系的内容稍做说明。

对国有企业行使直接控制权(c 类产权)的官僚机构与负责管理国家财政事务的官僚机构是相互分离的(并拥有另一类财产权)。只有在最高层,这两类官僚机构才受到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和政府首脑的统一直接领导。

至于官僚机构在行使 a 类和 b 类产权(剩余收入支配权和控制权,它们与财产权的特征分类无关)的时候,到底是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还是代表了它们自己狭隘的集团利益,这是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私人资本所有者仅仅是一个私人资本所有者,哪怕他/她把自己的所有收入都用于利他用途,哪怕他/她经营企业的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为人民服务。同理,即使社会主义官僚领导阶层自己愿意过苦行僧般的禁欲生活,即使他们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即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完成任务,然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基本特征就是官僚化。

按照这一逻辑思路,所谓"全体人民的财产"在本质上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说法而已,它根本没有说明经典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的实际产权关系。

前文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私有产权形式下的非人格化财产以及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如家庭企业向股份公司的演化)。很显然,对于经典社会主义的企业而言,这两种趋势都发展到了各自的极端状态。

财产的非人格化走到了极致。以国有企业为例,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一群人,都可以成为所有者。没有人能够从国有企业的利润中让自己受益,更没有人用"自己的钱包"为企业的损失承担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财产不仅被非人格化,而且变成了无主之物。国家财产属于所有人,但又不属于任何人。

在抽象和非人化的官僚体制中,拿走剩余收入的官僚机构与控制生产的官僚机构泾渭分明。这里需要加以补充的是,这种分离在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下,已经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融合"。总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官

僚机构是一个集中统一的社会组织,它按照科层等级标准进行责任分工,行使一系列具体产权:一部分所有权和全部控制权。

## 5.4 其他国有产权形式

在讨论了中央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产权形式之后,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其他形式的国家产权。

较为普遍的一种形式就是地方组织拥有的企业(如各联邦、省级地方政府或市、镇、乡村政府)。这些企业与**5.3**部分所介绍的国有企业情况差不多,只不过名义上的所有者是下一级地方组织。但所谓的地方组织实际上也是整个官僚权力体制的组成部分,并受到上级组织的控制。

另外一种较为普遍的形式是资产归国家所有(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组织)并受到国家控制的各类机构。但根据国家法律,这些机构不是"企业",通常被叫做"预算单位"①。对这类单位,国家不要求它们收支相抵(即使在名义上也没有这样的要求)。所有收入都纳入国家预算,而国家预算将负责它们的全部开支(在这一点上,它们与国有企业不同,国有企业只有在出现收支不平衡时,才会出现企业与国家预算之间的资金流动)。这类预算单位包括国家办的大学、医院和博物馆等等。

有人曾把这类单位比做资本主义国家的非营利机构,它们与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种比喻并不合适。事实上,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连国有企业都没有真正的利润动机[8.4],一家机构在法律上是界定为"企业"还是"预算单位"其实相当随意。② 就本章的主题(产权关系)而言,国有企业和预算单位之间没有本质区别。所有产权均适用于这两种机构,每一种产权都是不同类别的官僚国有财产而已。

---

① 即中国所称的"事业单位"。——译者注

②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官方分析中,区分了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如教育、文化供给、医疗等等)。一般而言,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组织是企业,而从事非物质生产活动的组织在法律上被定义为预算单位。

## 5.5 合作社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第二类基本产权形式是合作社。[①] 这类合作社在农业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下面我们将进行详细讨论。

不同国家都采用了不同的名称,例如,农村合作社在苏联就被称为"集体农庄"(колхоз)。考虑到本书的整体安排,我们将着重考察这类合作社的共同特征。[②]

在大部分国家里,传统的农业合作社基本上都是生产和销售合作社。从名义上看,这是一种以合作社成员自愿联合为基础的组织形式,生产工具是合作社的集体财产,成员自己选出领导。但实际情况与上面描述的情况有很大区别。

几乎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直到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最终稳固下来才停止。[③] 表5.2和图5.1列出了苏联进行农业集体化的有关资料。在集体化之前,已经存在一些自愿建立的农业合作社,但它们的产量非常有限。在农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产权形式是家庭农户,一般都不雇佣外部劳动力。此外,也有一些雇佣外部劳动力的小型私人家庭农场,但数量极为有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类标准,前者属于小商品生产者,后者则是资本主义农场。除了是否雇佣外部劳动力之外,还有其他标准来判断一家农场是否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拥有土地的面积,或者有几头牲畜,有几台打谷机或者其他设备,拥有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让某个家庭变成资本家。在苏联,那些农民"小资本家"被称为富农(кулаги),这一名

---

① 以下将要讨论的由国家控制的合作社与后来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小型合作社有所不同,后来出现的合作社类似于私人合伙制组织[19.2]。

② 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都使用了集体产权这个词,而本书则没有采用这种说法,因为这会产生误导:前面部分所介绍的官僚国家财产也具有"集体"性质(不论是名义上,还是事实上具有这种性质)。如果与个人的私有财产进行比较的话,这种集体特征就更为明显。

③ 南斯拉夫和波兰的历史发展过程有所不同。尽管这两个国家也出现了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但是并没有始终坚持下去,因此,它们的农业部门中还留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进行集体化改造的家庭农户。就这一点而言,南斯拉夫和波兰一直就没有完全实现纯粹的经典体制。

称后来也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

这些国家在大规模集体化过程中,利用威胁性劝说、恐吓以及残酷惩罚等手段来对付反抗者,诱使小农庄所有者放弃自己的生产,加入合作社并把土地和其他生产工具统统上缴。① 小型的资本主义农场(即富农拥有的农场)都被收为国有。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小农场主备受凌辱,从恐吓、体罚、流放、入狱,一直到被处死,就连从事小生产的农民也都常常被随意划为富农并经历了同样的遭遇。这样就使得周围农民更加紧张,他们也都纷纷加入合作社。

**表 5.2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

| 年份 | 集体农庄 | 集体化农民家庭占总家庭数目的百分比 | 农业总产值(指数) | 牲畜产量(指数) |
|---|---|---|---|---|
| 1913 | — | — | 96 | 87 |
| 1918 | 1.6 | 0.1 | — | — |
| 1928 | 33.3 | 1.7 | 100 | 100 |
| 1929 | 57.0 | 3.9 | 93 | 87 |
| 1930 | 85.9 | 23.6 | 88 | 65 |
| 1931 | 211.1 | 52.7 | 84 | 57 |
| 1932 | 211.1 | 61.5 | 76 | 48 |
| 1933 | — | — | 82 | 51 |
| 1934 | — | — | 86 | 52 |
| 1935 | 245.4 | 83.2 | 99 | 74 |
| 1936 | — | — | 93 | 76 |
| 1937 | — | — | 116 | 83 |
| 1938 | 242.2 | 93.5 | 107 | 100 |

**资料来源**:P. R. Gregory 和 R. C. Stuart(1986,第 109、111 页)。

① 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成功不久就立刻将土地收归国有。因此,在实施集体化之前,尽管土地的实际使用权还掌握在农民手中,但土地在名义上已经是国家财产(例如,苏联就是这种情况)。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南斯拉夫),耕种土地的农民在名义上还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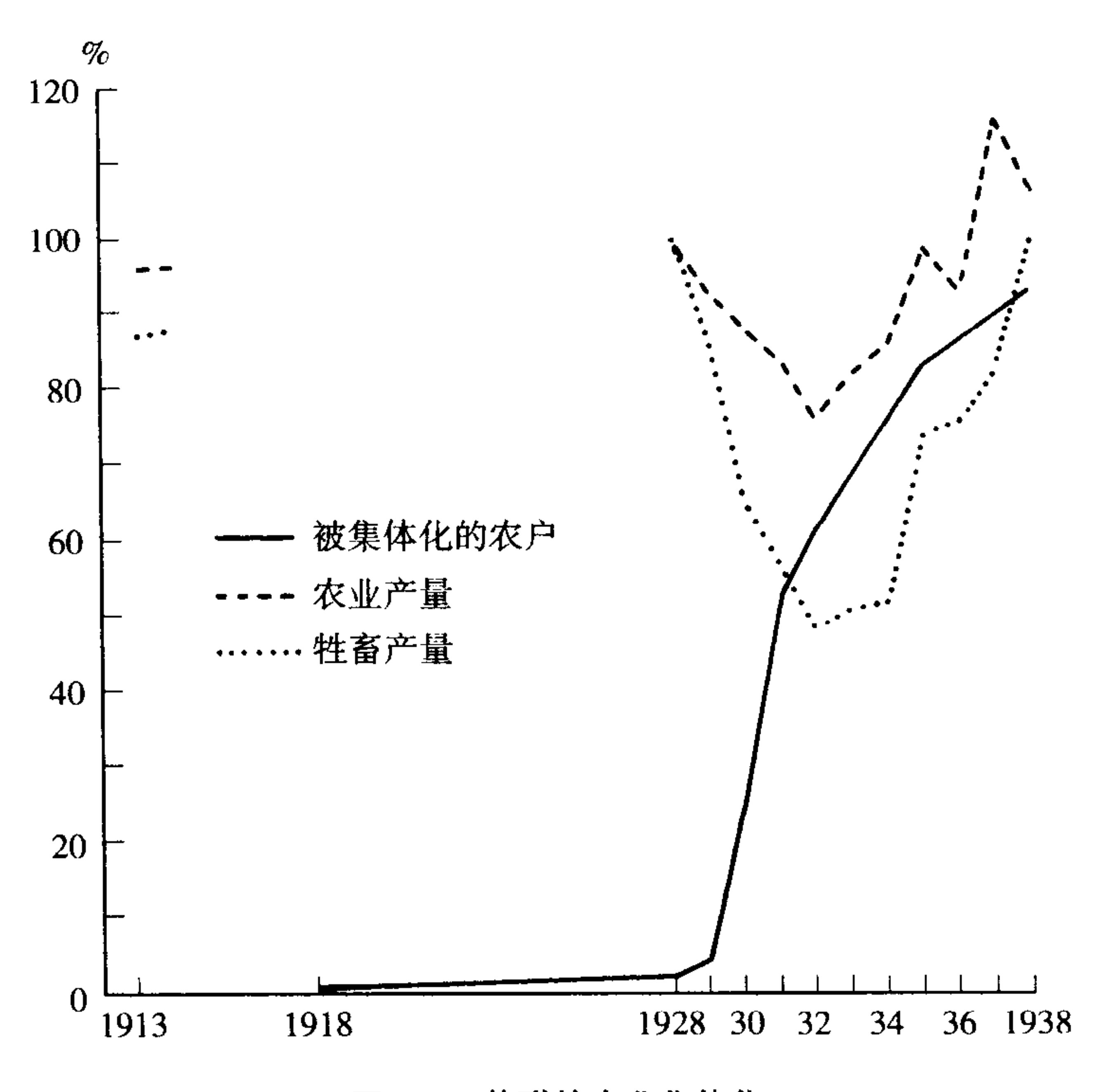



**图 5.1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

**资料来源**:P. R. Gregory 和 R. C. Stuart (1986,第 109、111 页)。

强制集体化所带来的创伤为合作化农业留下了永久的痛苦印记。[①] 当合作社最终制度化和正规化之后,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才随之停止。事实上,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农民们根本没有其他选择,这类合作社即使在实现制度化之后也不能说是真正的自愿联合体。合作社成员无法自由选择是否(1)脱离合作社(或者即使从来就不是合作社成员的人,也必须加入)并在以私人财产为基础的家庭农户中劳动;(2)如果能够负担得起,就可以在自己的农庄里长期雇佣外部劳动力;(3)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合作社(或者,如果已经是合作社成员,自愿继续留在合作社里)。任何想在土地上进行劳动的人都必须成为合作社成员(或者成为国有农场的职员)。

---

① 关于苏联强制集体化运动的记录可参见 R. W. Davies (1980)、M. Lewin [1968] (1974) 和 R. Conquest(1986)。

合作社的领导只是名义上由合作社的成员选举产生。实际上,他们都是官僚组织任命的人,在这方面与所谓经选举产生的党的干部、群众组织领导,国家或地方立法机构成员没有什么区别[3],他们也要完全服从于上级官僚机构。

合作社的领导不能独立决定如何使用合作社的收入。合作社收入的使用不仅要受到各种限制,还有来自上级不定期的具体干预(a 类财产权在此完全缺失)。

合作社的领导无权转让合作社的生产工具。上级机关将决定如何转让生产工具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将某些合作社合并(没有 b 类财产权)。

合作社的领导不能自由决定如何使用生产工具。合作社与国有企业一样,都要受制于官僚机构的集中控制[7](因此也不存在 c 类财产权)。

从这些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经典体制下,合作社与国有企业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区别。合作社或多或少也都是官僚性质的国家财产,尽管具有某种令人莫名其妙的合作特征。实际上,所谓合作社只是"国有化"的合作社,完全可以把它们的财产当作近似国有财产。

在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合作社与国有企业的唯一区别便是合作社成员有权耕种部分私人土地(通常被称为家庭土地)。但这一般都是面积非常小的一块土地,农民实际上只是拥有其中的一部分生产工具而已,就连这一小块土地也是由合作社分配给个人的,合作社可以随时收回这块土地,然后给农民再分一块。农民可以从合作社或国有农场租用部分生产设备。尽管农民家庭只拥有家庭农场的部分产权,但其中也包含了部分的剩余收入索取权(a 类财产权)。这部分剩余收入索取权也足以提供一定的劳动激励:家庭农场所生产的动物产品、蔬菜和水果,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远远高于它们所占土地的比例。表 5.3 列出了苏联集体农庄(колхоз)所拥有的土地比例。①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建立农业合作社呢?这个问题涉及到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什么要消灭私有产权?二是如果真要彻底消灭私有产权,为什么

---

① 可以把表中所显示的有关苏联的情况与保加利亚的农业生产进行比较。在 1985 年,37% 的鸡产量、46.5% 的肉产量、53.1% 的鸡蛋产量来自家庭农户,而它们所拥有的土地只占可耕种土地的 12.8%。R. J. McIntyre(1988,第 105 页)。

不进行公开实施全面的国有化?

**表 5.3 苏联农业中的私人土地**

| 年份 | 来自集体农庄家庭私人土地的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 私人部分对总产值的贡献 | |
|---|---|---|---|
| | | 肉(百分比) | 鸡蛋(百分比) |
| 1960 | 45 | | |
| 1965 | | 40 | 67 |
| 1970 | 35 | | |
| 1975 | | 31 | 39 |
| 1980 | 28 | | |
| 1983 | | 29 | 30 |
| 1985 | 26 | | |

**资料来源**:第 1 列:V. G. Treni(1987,表 A3);第 2、3 列:P. R. Gregory 和 R. C. Stuart(1986,第 270 页)。

当集体化正在进行的时候,官方宣传的重点多半是就事论事(例如,当苏联进行集体化的时候,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向城市供应粮食遇到了巨大困难)。但从一开始官方在宣传集体化时也强调了经济方面的长期考虑:按照规模经济原理,大企业生产比小企业更具优势。根据这个理由,小型家庭农业的生产率低下,而且大部分都被农民家庭自己消费了,于是农场就没有多少东西能够到市场上出售。而大规模生产的效率要高得多。根据官方意识形态对集体化的解释,即使家庭自我消费不降低,供应市场的产品也会大幅增加。[①]

事实上,这种理论依据在西方经济理论中也可以找到类似观念。[②] 如果大企业效率更高的话,那么就应该把小企业合并为大企业,大企业能够赚到更多的利润。对这一理论不能盲目接受,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大企业是否真

---

① 大规模(国家和集体)农业生产能够通过合作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 农民们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和邻居们的劳动集中起来…… 这样就能够比以前生产出更多的东西。"(约·维·斯大林,1947 年,第 312 页)。

② 见 R. H. 科斯(1937)和 O. E. 威廉姆森(1975)的交易成本理论以及科层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的效率更高。就这个问题而言,并没有普遍适用的答案。对于不同经济部门,或者将小企业合并为大企业的不同过程来说,如果不考虑小企业或大企业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结论。至少历史证明,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大规模合作式农业生产的效率水平并不比小规模农业生产高。

而之所以进行农业集体化,其动机也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和生产效率上的考虑,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因素,即要加强官僚集团的权力。① 基于私有产权的农民生产与官僚集团的极权统治是水火不容的,因为前者代表了独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而纳入了集中官僚体制的大规模集体化管理与极权主义权力机构则是内在统一的。个体农民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被取消之后,农村人口也将依赖于官僚统治,这样他们就和同样依赖于官僚统治的所有其他社会阶层没有任何区别了。

此外,在当权者看来,彻底消灭私有财产,建立公有财产制度自有其内在价值。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小型家庭农户,因为这些个体农民将会受到"小资产阶级"不良习气的污染,变得自私,贪婪,成为不愿意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落后分子。还有一个理由是,在小规模生产普遍存在的地方,它最终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最成功或最富有的小型或中型农场都会变成集体农庄(колхоз)[19.3]。

从问题的另一方面来看,利用合作社这种形式(而不是公开的全面国有化)并容忍家庭农场的存在只是最终目标与当前社会实际状况的一种妥协。不管是真正的让步,还是假装让步,都是为了减少农民的反抗,以便更容易地让大批农民接受这个现实: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耕种自己的土地了。

之所以说这不过是一种妥协,还因为官方曾一再强调与国家所有制相比,集体财产形式是更低级的社会所有制。因此,集体所有制仅仅是一个过渡形式,尽管过渡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而最终,所有的生产都必须纳入"全民"所有制框架。②

---

① 关于组织选择与加强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可参见 S. Marglin(1976)。

② 这一思想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为了实现大规模工业生产,集体劳动应该上升到国家层面,然后通过国家生产的方式鼓励它们的发展。"(卡尔·马克思[1864]1975a,第12页)。后来在斯大林的经济学里,他所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将集体财产提高到公共财产的层次上来。"(约·维·斯大林)。

实际上,在经典体制开始建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国有农场(在苏联,它们被称为国营农场(совхоз))。[①] 长期趋势就是逐步取消合作社,这主要表现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与合作社的比例不断提高。[②]

与上面所介绍的内容相比,需要对中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加以特别说明。中国的集体化运动比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走得更远。即使像苏联那种还带有私人生产尾巴的集体农庄都被统统消灭。中国的农村公社不仅仅要从事农业生产,它们还要参与工业生产、商业和其他服务活动。在公社中还实行了部分消费活动的集体化(如农村集体食堂)。极权统治也更胜一筹,农村公社不仅负责经济控制,而且还具有国家行政管理的职能。公社变成了完全凌驾于农民家庭之上的一个官僚组织、一家企业(或者说是一个从事各种活动的大联合体)和一个消费团体。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讨论了农业领域的集体化。其实,人们会发现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其他经济部门中也有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但这些合作组织基本上与集体农庄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在各自经济领域内的产量也非常有限。因此,本书就不再详细讨论这些合作组织了。

## 5.6　私人财产(权)和私人性质的生产活动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几乎没有雇佣劳动力的私人企业,即使有,也都被限制在很小的经济领域内。官方意识形态认为,彻底消灭私人资本主义正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衡量标准,甚至是主要衡量标准。只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才被官方意识形态认可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但即使如此,还是存在着各种私人产权形式(以及与之有关的具有私人性质的生产活动),当然,它们几乎完全处于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的阴影笼

---

①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除了国营农场之外,苏联还有另外一种由国家管理的组织来提供农业产品。这些被称为"机械拖拉机站"的组织向合作社出租大型机械设备(如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合作社无法购买自己的大型机械设备,因为国有机械拖拉机站垄断了大型机械设备供给,这就让合作社更加依赖于国有部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了这种拖拉机站。

② 1953 年国营农场只占苏联耕地面积的 9.6%,到 1983 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 53.4%。见 P. R. Gregory 和 R. C. Stuart[1974](1986,第 269)。

罩之下。典型的私人产权形式有：

1. 小型私人工业与私人商业。在一些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东德、匈牙利和波兰，官方允许小型家庭企业从事生产活动[1]，但它们在工业生产和商业服务中所占的份额极为有限。

表 5.4 列出了东德、匈牙利和波兰私有部门的数据。[2] 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根本不允许有私有部门。

**表 5.4　东德、匈牙利和波兰取消私人部门的状况**

| 年份 | 非农业私人雇佣劳动力占非农业总就业人口的百分比 | | |
|---|---|---|---|
| | 东德 | 匈牙利 | 波兰 |
| 1949 | — | 20.3 | 11.6 |
| 1950 | — | 17.1 | 6.6 |
| 1952 | 34.0 | 4.5 | 4.7 |
| 1955 | 30.8 | 2.7 | 3.6 |
| 1960 | 21.6 | — | 4.8 |
| 1965 | 19.0 | — | 4.3 |
| 1970 | 16.5 | 3.8 | 4.4 |
| 1972 | 8.4 | 3.5 | 4.0 |
| 1975 | 6.8 | 3.1 | 4.0 |
| 1980 | 5.9 | 2.9 | 4.9 |

**资料来源**：第 1、3 列：A. Aslund(1987 年，第 230 - 31 页，247 页)；第 2 列，1 - 4 行：匈牙利中央统计办公室(1959 年，第 65 - 66 页)；第 7 - 10 行：匈牙利中央统计办公室(1971 年，第 104 - 05 页；1973 年，第 109 页；1975 年，第 111 页；1980a 年，第 128 - 29 页)。

说明：a. 非农业私人雇佣劳动力占非农业总就业人口的百分比：数据是从 1949 年开始的，此时发动了第一次国有化运动，经济上的“制高点”已经收归国有。

b. 东德：其中包括半私人部门—国家参与的私人企业，到 1960 年，这部分企业雇佣的劳动力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7%。而到了 1971 - 1972 年，它们也都被国有化。见 A. Aslund(1985)。

c. 匈牙利：只包括在职的雇佣职工。因为供水和林业被划为农业，所以没有包括这两个部门的数字。

d. 1973 年 1 月 1 日。

---

① 尽管按照定义，小型家庭企业是不能雇佣外部劳动力的。在现实中，官方也允许私人工匠或小商贩雇几个工人，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雇佣人数一般都不能超过一两个人。

② 从表 5.4 可以看出，消灭私有部门的过程在东德经历的时间比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要长。

2. 家庭农场。这实际上是混合所有形式。在前一部分我们已经解释过,家庭农场的生产工具部分是集体财产,部分归私人所有。对于土地和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农民家庭只拥有使用权。土地和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可能随时被收回,家庭也无权转让(换句话说,他们没有 b 类产权)。但家庭农场生产所获得的税后剩余收入归农民家庭所有(a 类产权),它决定着农民的劳动力投入量(c 类产权)。[①] 因此,这种产权形式基本上还是可以归为私人所有权和私人经济活动。

3. 非正规私人经济。[②] 这其中涵盖了各种活动。[③]

◆个人为他人提供产品或服务后获得收入(货币或其他收入)。例如非体力劳动,其中包括看病、法律咨询、打字、翻译、私人语言教育、幼儿看护。部分体力活动包括:修理和安装工作、房屋修筑、清洁、人和物品的运输。

◆食品生产与销售(肉、水果和蔬菜),做这类工作的人不用将全部时间花在农业生产上。

◆转租个人所有的房屋(或租来的房屋)。

◆在国有企业、合作社和官方许可的私人商业之外从事贸易活动,其中包括黑市商人的活动、出售非法进口的商品,以及买卖出国旅游私自携带回来的东西。

---

① C 类产权也是受到了很大限制的,因为农民家庭必须为合作社工作若干小时或者投入一定量的劳动力,但他们还是能够将剩余时间投入自己的家庭农场生产。

② 在有些经济学文献里,用"第二类经济"来描述本书中所说的"非正规经济"。我同意第一类经济与第二类经济具有以下区别:所谓第一类经济包括了所有被经典体制官方意识形态认可的"社会主义部门",即官僚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所谓第二类经济则包括了所有的私人部门,其中包括官方许可的私人经济部门、小型家庭企业和非正式的私人部门。

③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私人部门、第二类经济,特别是非正规活动的研究已经有大量文献,这里仅举出几例:一般性回顾可参见 S. Alessandrini 和 B. Dallago 等(1987)、B. Dallago(1990)、E. L. Feige(1989)、I. R. Gabor(1979)、G. Grossman(1985)、M. Los 等(1990)、V. Tanzi 等(1982)。苏联:G. Grossman(1977a)、T. I. Koriagina(1990a,1990b)、以及 Berkeley - Duke Occasional Papers,这里包括了有关第二类经济的理论研究并对采访苏联移民的有关内容进行了总结。中国:W. Zafanolli(1985)。波兰:A. Korbonski(1981)、S. Taigner(1987)和 J. Rostowski(1989a)。匈牙利:P. Galasi 和 G. Sziraczki 等(1985)。保加利亚:D. C. Jones 和 M. Meurs(1991)。

有不少经济学家试图利用模型在一般均衡框架内分析私有部门对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均衡的影响,其中可参见 R. Ericson(1983,1984)、D. O. Stahl 和 M. Alexeev(1985)、S. Wellisz 和 R. Findley(1986)、B. G. Katz 和 J. Owen(1984)以及 C. Davis(1988)。

上述活动都需要从事这类活动的人投入劳动,有些还需要有一定的设备。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的人有些是使用自己的设备(或者是使用委托人的设备),有些则使用国有企业或合作社的设备(例如,运输"黑货"的司机使用公家的卡车)。

有不少在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工作的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一些非正规经济活动[①],有些非正规的经济活动是利用"上班时间"进行的。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内,哪些非正规活动是官方认可的,哪些是法律禁止的,执行禁令的力度如何,这些都各不相同。此外,非正规经济的规模大小以及在经济中所处的相对地位对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而言也都有所不同。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存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即使禁令再严格,也无法彻底根除非正规经济。[②]

其他经济体制中也存在所谓的"影子经济",主要原因是为了逃税。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之所以出现非正规经济却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官僚统治集团总是力图把所有私人产权形式和私人经济活动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即使它们正常纳税也改变不了当局的目标。非正规经济代表着人们想要突破这种官僚限制,即使得不到许可,也要从事这类活动,或者是努力寻找法律上没有明确禁止的机会,或者哪怕违法,也甘愿冒这个风险。因此,本书用了"非正规"这个词来囊括所有这类行为,其中既包括没有违法并且是官方容忍的活动,也包括明文禁止但并不严格执行的非法活动,以及绝对禁止并严厉制裁的活动。[③]

## 5.7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财产(权)

到目前为止,本章基本是在讨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产权关系,其中也

---

① 英语里把这叫做"从事第二职业"。

② 作为见证人,F. Burlatskiy 在 Literaturnaya Gazeta(1988 年 9 月 18 日)中曾引用了勃列日涅夫的话:"你不了解生活。没人单靠工资活着。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就靠从火车上卸货挣钱。知道我们怎么挣钱吗? 卸下来三箱东西,有一箱是归我们自己的。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这么生活。"引自 V. G. Treml(1990,第 2 页)。

③ 见 A. Katsenelinboigen(1977)关于"不同颜色"的市场及活动的文章,其中包括白色(合法)活动、粉色(非正规活动并有国家官员的参与)活动、灰色(非正规)活动和黑色(违法犯罪)活动。

有私人产权形式,但范围极为有限。占支配地位的产权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官僚化公共所有权:国家所有制以及集体所有制,其中分布着各种具体的产权形式,这是经典体制的突出特征。按照经典体制的官方术语,公有制框架内的所有活动构成了整个经济的"社会主义部门"。

在前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各种类型的私人所有权,其中包括经济自发演进所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所有权。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形成同时伴随着法律制度的发展,法律保护私人所有权并强制执行私人合同。尽管国家的管制在某些时期推动了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发展,但是没有人可以说是国家组织和维持了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产权关系,建立稳定的经典社会主义产权关系却不是经济自发演进的结果。社会主义产权关系是"党国"革命行动的结果。至于在改变产权关系的时候是否已经有明确的法律支持,还是事后才立法承认,这并不重要。因为,不论是哪种情况,官僚集团事实上已经强行将大部分私人财产没收,将生产工具收归国有,威胁利诱拥有土地和生产工具的农民和小生产者加入合作社。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马列主义政党行动纲领的核心之一就是要"剥夺剥夺者",换句话说,一旦在政治上可行,那就要消灭私人所有权,并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上组织一个新的社会。这又回到了关于价值体系的老问题上。在共产党的价值体系中,有三个密切相关的价值处于最高层,它们相互支持并部分重合。首先是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一个内在的最终价值,而不是服务于其他最终价值,因而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只有当党掌握政权之后,而且只有在党掌握政权的地方,才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因此,权力是基础,也是最终价值。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以公有产权替代私人所有权。这样,消灭私人所有权,建立稳定的公有产权制度也是最终价值之一。当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同样具有工具性价值:它能够比资本主义所有权带来更高的生产率,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具有其内在价值:从此以后,资本家将再也不能剥削工人,工人也不再附属于资本家;资产阶级将从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此外,公有制和权力还有着最为紧密的关系:官僚集团所获得的财产(权)是官僚集团所享有的重要权力之一。

在财产(权)问题上所持有的立场以及采取的实际行动(如农业集体化)只是前文所阐述的“党的先锋队性质”、“权力的自我合法化”以及“家长制作风”[4.4]的具体表现之一。以集体化为例,当权者坚信消灭私人财产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农民们放弃独立并加入合作社将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但农民的落后和短见使他们无法认识到自身的利益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他们反对集体化,也必须强制实行的原因。掌握权力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强迫人民接受他们不喜欢的生活方式,因为最终还是为了他们的利益。

这一价值体系深深地影响了共产党的追随者们,从最高领导人一直到那些在党内默默无闻的真诚的普通党员。这种信念激励着他们努力工作,奋斗牺牲,接受不受欢迎的任务,实施党的纲领,哪怕是遭遇到大规模的群众反抗,也仍然要革命到底。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和行动纲领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重要区别。这也是它们与其他社会民主党派的显著区别所在。例如,社会民主党在阐述社会主义思想、公有制生产方式和分配制度时,这些东西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在它们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内在价值:福利、社会公正以及保护自由。如果私人所有权能够比国有化或集体化更好地服务于上述内在价值,那么未必一定要消灭私有制。不能够在违背大多数民众意愿(民众意愿可以从选举箱中表达出来)的情况下,采用强制措施改变产权形式。

本书并不打算对价值问题展开辩论,而只是想描述不同的体制特征是如何促进和违反每一项价值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在实践着共产党意识形态中最为重要的三项价值,这并非是语句上的同义反复,而是可以进行检验的,历史经验和历史事实会证实或推翻这一论述。运动背后有思想在支撑:共产党的集权统治、彻底消灭私人所有权、广泛建立公有制,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变成了现实。

既然讨论到了价值问题,在此有必要提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在**1.3**部分,我们已经明确了本书所使用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什么概念。因此,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体制”,我们也应做出相应的概念解释。

当人们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时,从产权形式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社会实际上都是一个“混合体”。历史从来没有造就过一个只有纯粹单一产权形式的静态社会。可能某一学派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不想再听下去了,

谈论所谓的体制谱系和种类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事物在本质上都是混合体,而且实际可见的混合种类以及各种变化是没有穷尽的。

本书并不认同上述观点。本书认为,就体制类型而言,确实有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分。[①] 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将 1.2 部分中所介绍的社会主义国家概念进行充实和扩展。

正如前文所述,社会主义体制的核心特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集中行使权力。现在可以再加上一个特征:党立志要彻底消灭私人所有权,党利用集权统治和对国家政权的渗透,它迟早会将这一纲领付诸实践,或者至少是大致完成。

前面已经讨论过前社会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的区别所在,这一区别也正是执政党想要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实现并且已经成功实现的东西。在非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只能把社会自发形成的历史轨迹作为一切行动的起点。所谓资本主义体制是指在该社会中,资本主义形式的私人所有权占据着支配地位。[②] 还有一个否定性标准:不可能存在一个掌握着绝对集权的政党,而且该政党立志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的支配地位。

按照上述论证思路,本书对资本主义体制这一概念采用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其中既包括像美国和瑞士那样具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国家,也包括如斯堪的纳维亚岛上及北欧地区的福利国家那样具有很强集体主义色彩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社会民主党已经执政数十年,并实行了大量带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管制措施),还包括采取了一系列中央计划的国家(像某一时期的法国和印度)以及没有中央计划的国家;有大量国有部门的国家(如奥地利)和很少有国有部门的国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区别也都非常重

---

① 大批认同这种学术术语传统的学术界人士和政治家在世界观以及理论和政治观点上具有很大差别。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是一个褒义词,而资本主义是一个贬义词;而对反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则正好相反。学术界人士和政治家们都是如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赞成者和反对者们完全属于不同的阵营。

上述情况间接说明本书在此进行的讨论与价值判断无关。

在使用概念时,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概念本身必须清楚,不能含混,这样才能做到把概念作为有用的分析工具。

② 这当然不能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所有重要区别都概括进去。例如,在对社会主义体制进一步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在社会主义里占主导地位的官僚协调机制与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市场机制也是两种体制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

要,而且在进行比较分析时,应该加以重点研究。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现实:在20世纪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有两大阵营,或者说有两种最基本的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①]

---

① 当然,也不能将这种划分绝对化,因为在20世纪里,有些社会经济体制很难将它们简单地划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例如,在非洲或亚洲,有些社会的资本主义产权形式还非常不发达,占主导地位的是前资本主义产权形式,因此,就不能简单得把这些社会划入资本主义体制。

进行这种社会体制分类的另一个挑战来自所谓"非洲社会主义"或"伊斯兰社会主义"(前者如坦桑尼亚,后者如阿尔及利亚)。尽管在那些国家也有独裁统治,掌权者也实行了反对私人所有权,赞成公有制的政策,但与本书所描述的社会主义体制类型并不完全一致,这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上,而且实际建立的社会经济体制也在很多重要特征上也与本书不符。

为了进行科学分析,不免要进行分类,但总会出现"不纯"的东西,如模糊不清的案例、混合体以及特殊情况。但简单的二分法还是能够帮助我们在较大的范围内总结一般性规律,也有助于建立模型和理论。

# 第六章　协调机制

政治权力的本质特征、盛行的意识形态以及产权形式共同决定了不同协调机制在社会中将扮演的角色(或者至少是决定了所扮演角色的主要特征)。在本章中,我将首先介绍协调机制的一般概念;然后考察几种主要的协调机制类型,最后转入本章的主题: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各种协调机制所处的位置,发挥的功能以及不同协调机制之间的关系。

## 6.1　主要类型

每一种协调机制都是整个社会体系的附属子系统。所谓协调机制就是指它可以协调相关人士或组织的活动。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或组织之间发生了关系,他们(它们)的活动必然需要某种形式的协调。

本书将重点讨论5种主要的协调机制:(1)官僚协调;[①](2)市场协调;(3)自律协调;(4)道德协调;(5)家庭协调。

每一种协调机制都有自己的一系列特征:参与者是谁,他们之间存在什

---

① 对于 bureaucratic coordination 一词的翻译,译者同意钱颖一教授在《科尔奈的理论与经济改革》一文注释6中提出的观点:"官僚"一词在这里纯粹是一种描述,毫无贬义。只是在1985年巴山轮会议后,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张卓元将此译为"行政性协调",国内经济学界基本接受了这一说法。(《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2003年第1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58页),而且,作者在本书中多处指明,官僚协调机制的运用范围决不仅限于行政机关的官僚机构,还包括军队、大型公司管理等等,因此,译者还是采用了"官僚协调"这种译法。——译者注

么样的关系，为了进行协调，他们之间如何交流，鼓励参与者进入协调过程的动机是什么。每一种协调机制都有属于自己的典型程序，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也具有某种特定的“风格”，以及存在着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

每种主要的协调机制都包括一些变体。在进行一般性定义时，首先是要找出所有官僚协调机制、市场协调机制等每一种协调机制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因此，这里我们只是在抽象的层次上讨论一种纯粹的理论模型，不再考虑各种具体特征。

1. 官僚协调。[①] 进行协调的个人或组织与被协调的个人或组织之间是上下级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纵向联系”。在很多情况下，会出现多层次的上下级官僚结构。往往是处于某一层次上的个人或组织是下一层次个人或组织的上级，同时又是位于另一层次上的个人或组织的下级。纵向联系并不是对称的。尽管有时上级也要依赖于下级，但是下级对上级的依赖却多得多。上级并不是由下级选出的，而是由他们的上级领导任命。

纵向信息流动包括各种交流方式，其中最典型的协调方式是命令，下级必须服从来自上级的命令。

下级在执行上级命令时有各种动机，其中最重要的动机包括努力获得上级的认可、得到奖励、避免因不服从命令而受到惩罚。下级心里清楚命令是有法律依据的，如果不执行命令将带来法律上的制裁。

2. 市场协调。[②] 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平行关系或横向联系，其中双方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当买者和卖者之间发生交易时，卖者将一些东西转让给买者。交易过程同时伴随着各种信息的交流，其中最关键的是价格。

买者和卖者自愿达成了一个契约，其中写明了有关交易的各类条款。双方各自都有接受契约条款的各种动机，其中最重要的是都要从交易中获

---

① 本书中使用了官僚体制和官僚协调两个概念术语，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官僚体制是指一个组织体系，而官僚协调是一种协调机制。官僚体制主要通过官僚协调机制来控制社会，但它也可以运用其他协调机制实现自己的目标，例如市场机制。反之亦然：个人（非官僚组织成员）也可以使用官僚协调机制。例如，股东也可以利用官僚协调机制来管理自己的公司。

② 与介绍官僚协调一样，本书在介绍市场协调时也只是尽量描述一般特征。换句话说，此处关于市场协调机制的定义并不仅限于某一种或几种具体的子类型（例如专业文献中对市场协调机制的定义）。

得边际收益。

市场协调的标志是货币化：当商品从卖者手中转到买者手中时，货币同时从买者手中转到了卖者手中。（当然，也可能是直接的物物交换。[①]）

3. 自律协调。这种协调关系的参与者处于平行的位置，都是自律协会的平等成员。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之间是一种横向联系。

这种协调是根据成员们制定的特别规则（守则）来进行。在多数协会中，全体会员无法（或不愿意）在所有方面直接行使自我管理的权利。因此，会员们会委托一个实体机构（如委员会）来具体完成协调任务。就这一点而言，自律协调也并非只包括横向关系，在会员与负责管理的委员会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纵向关系。但在进行理论分析时，必须将这种协调机制与第一类协调机制（即官僚协调）进行严格区分。在自律协调机制下，成员有权直接或间接选举管理机构并且可以随时将之解散。这使得管理机构成员完全不同于官僚协调中的上级领导或上级组织，他们是被任命为下级成员的领导的，而非由下级成员选举产生。

同样，就自治管理而言，在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管理机构之间有很多的信息沟通方式，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会员投票和集体决策。

此外，动机也各种各样，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集体利益的认可，也就是说，参与自律协调的成员们认识到每位成员的利益与集体利益休戚相关。

4. 道德协调。道德协调机制的参与者是捐助人（个人或组织）和受益人（个人、组织或匿名团体）。受益人在法律上并不附属于捐助人，因此，这一协调机制的参与者之间是一种平行的横向联系（和市场机制一样）。[②]

在道德协调机制的诸多沟通方式中，最典型的就是申请和奉献。

当然，这背后也有许多动机，但其中主要的动机不包括受益人会担心害

---

① 本书所说的“市场协调”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学教科书和专业文章里被称为“价值规律起作用”或“商品和市场的关系”，这些词都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借来的术语。当使用这些关键词语时，很容易把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例如，当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在讨论“劳动是商品吗？”这个问题时，特别是涉及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他们其实是在问市场协调是否真的可以调节劳动的供给、需求和就业，以及市场协调机制是不是真的有用。

② 个人或组织也可能同时发挥着两种功能，或者说既是捐助（别人）者又是受益人（接受别人的捐助）。（用博兰尼的话来说，他们之间是一种互惠关系）。

怕(如果有担心害怕的因素,就会产生附属关系)。捐助者想要获得物质利益回报也不可能是主要动机(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完全变成了买者和卖者的关系)。这两个否定性特征是道德协调区别于官僚协调和市场协调的关键所在。捐助者的动机包括:基于政治或宗教信仰的利他主义,从事高尚行为或慈善活动的内在动力,出于友谊、伙伴情义、团结精神、集体感,或者仅仅是因为礼貌或礼节。

从一般性定义而言,具体的捐赠形式(金钱、物品,行动、姿态或交流)并不重要。道德协调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横向联系,特别是以货币化为特征的市场关系,就在于这里通常没有金钱利益。

5. *家庭协调*。家庭协调机制的参与者是依靠家庭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在前面4类协调机制的定义中没有特别加以强调,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在那四种协调中通常没有家庭作为联系纽带[①]。)

在家庭范围内,家庭成员之间是什么关系(不管是上下级关系、还是平行关系,或者说是纵向联系,还是横向联系)取决于特定的家庭结构。

在家庭协调中,很难找出最典型的沟通方式。动机也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动机肯定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爱,同时还包括道德、宗教和法律所规定的家庭责任。

下面将给出上述5种协调类型的几个具体例子,这些例子或多或少都非常接近纯粹的理论模型。

官僚协调机制运用于军队、警察、大型现代公司内部管理以及铁路交通监管中。

市场协调机制活跃于城市中的市场或交易大厅、集市、商店或百货商场、期货或股票交易所。

自律机制主要适用于乐团、自治型大学或职业协会。

道德协调机制出现在救济组织或人们自愿拣起别人在公共场所丢下的垃圾。

---

①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定义中严格强调这一点。在特定官僚体制中,上下级之间也可能受到家庭关系的约束,或者在市场关系中,也会有人向家庭成员出售物品获得收入。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也许会都参加某一自律性的协会。为了避免重合,有必要指出的是,在道德协调机制中涉及利他关系时,我们排除了受益人是捐助者家庭成员的情况。

家庭协调机制可以组织好一家人的集体消费。

这些特意选出的例子是为了能够更简洁明了地说明每一类协调机制的主要特征。每种类型所采用的名称都如实反映了它们的真实含义，没有比喻的意思。可以会有人过于纠缠于文字表达，例如，他们会说，所有的人类行为在本质上都是市场行为，都基于某种形式的交换。即使对那些宗教献身者，他们都会说这些人是用生命来交换天国的幸福。也可能有人会狡辩道，命令和义务很难区分，因为任何市场交易背后的最终动机都是经济需要。但这种“咬文嚼字”地讨论问题往往不利于我们正确把握社会现象之间的区别。上文在定义中所使用的关键词语基本是根据人们的一般理解，而不涉及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专业词汇。[①]

## 6.2 主要类型情况介绍

相关文献中所使用的某些其他类似概念（或同义概念）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协调机制这种说法。例如，“控制过程”一词就强调了协调机制控制着参与者的行动。“调整机制”或“调整过程”侧重于协调机制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调整以及根据外部环境进行自我调整。“整合机制”突出了社会通过各种机制将其构成要素凝聚在一起，从而避免出现分裂。

新古典经济学家常常使用“配置机制”一词，他们认为分析稀缺资源的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所在。本书所使用的协调概念包括配置，但重点强调了生活中的人，正是他们将自己所拥有的无生命物品、资源和信息转让给其他人，正是现实世界中的人在使用着这些无生命的物品、资源和信息。也恰恰是这些人需要协调，如果我们想通过他们来完成既定方向的资源配置，就需要协调机制。每一种协调机制都代表着一组特定的社会关系。

---

① 如果采用如下描述，本部分的类型分类就会达到专业要求：(1)官僚协调：命令、纪律、服从上级、奖励和惩罚、严格、法律规定；(2)市场协调：价格、货币、收益、利润、业务；(3)自律机制：会员、选举、手册、规则；(4)道德协调：无私、非成文指令、牺牲精神、关注他人；(5)家庭协调：父母和孩子、兄弟和姐妹、家庭责任、共同的家族。

相应的形象描述是为了加深印象，它们无法代替本部分中的定义，但形象化描述有助于传达出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用于刻画典型关系的理论分类模型。

前一部分所介绍的类型分类并不是对可观察到的所有协调类型的唯一分类模式,或者说是仅有的一种分类模式。[①]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曾出现过其他各种类型的协调机制。如今进行社会主义体制研究时,如果还能够在上文中提出的5种类型之外,再增加其他类型的协调机制,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研究。曾有过不少关于协调机制的分类,虽然与这里的分类有关,但并不完全相同。[②] 之所以得出今天这种分类模式,主要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是逻辑标准,主要类型之间应该是相互独立的,任何一种协调机制都不能够成为其他协调机制的一个特例。第二个是适用于本书。这样一种分类模式既可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协调机制进行有效分析,又能够对社会主义所提出的其他远景目标、方案计划和蓝图做出准确分析。

为了更加简明清晰地说明问题,我们在结尾部分选出的例子尽可能地接近了主要类型的纯粹形式。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协调机制是几种主要类型的纯粹形式结合并相互叠加的。例如,在一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控制过程中,自律协调与官僚协调是结合在一起的。而在一个教会团体中,道德协调、自律协调和官僚协调共同发挥作用。在通常情况下,各种协调机制都是相互配合的。就内部协调而言,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一家私有大型公司会按照官僚体制的要求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体系,一个类似于以色列合作农庄(基布兹)的合作组织则会采用自律协调机制,而小型的家庭生产企业将主要依靠家庭协调机制来进行管理。与此同时,这三种组织又都参与了外

---

① 在以前的著作中(1984),我本人就采用过不同的分类体系,而且当时认为这已经是比较完整的分类了。后来我更正了这一观点,这从本书6.1部分的分类以及随后的相关评述中都可以看到。

② K. Polanyi(1944,1957)曾区分了三种基本的交易和整合模式: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在他1944年出版的著作中,他也指出“家庭”具有独立的行动准则。C. E. Lindblom(1977)曾使用过这样的分类:权威、市场和导师体制。这两种分类方法都启发了我的思考,但我觉得需要进行调整。这些分类都有相似之处,有必要指出它们的区别所在并加以说明。官僚协调比Polanyi的再分配概念要更宽泛一些,同样,道德协调所包括的内容也要多于互惠。Lindblom的导师体制似乎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协调机制,它更应该是一种方法,而且适用于本书所提到所有5种类型的协调机制。Polanyi和Lindblom都没有把自律机制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型,而且也没有把它作为不同于其他机制的特例。

部的市场协调,有卖方为它供给所需,有买方从它那里购买产品。[1]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只有家庭协调以某些形式一直存在着,但其他四种类型的协调机制也都有很长的历史。有些人预测说,未来可能只会(或应该)剩下一到两种协调机制,而其他类型的协调机制都会不断萎缩,甚至消失。[2] 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五种协调机制都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但这也并不是说它们始终会"和平共处"。随着社会体制的变迁,在某些生活领域,一种协调机制会逐步弱化,而另一种协调机制则会发挥主导作用,甚至某几种协调机制会联合起来将另外一种协调挤出它曾经占据的领域。建立在自律协调基础上的运动、政党或协会也可能会在某一天演变成官僚机构或商业机构。官僚机构的职能也许有一天会被商业模式所取代,或者相反:企业的功能由国家行政机构来完成。所有这些变化或协调机制之间不同程度的混合都可以在前社会主义社会中找到。

## 6.3 官僚(科层)协调机制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官僚协调是运用最广泛、发挥作用最大的协调机制。虽然其他四种主要类型的协调机制并没有完全消失,但都受到了极大压制,甚至不断畏缩,而官僚协调机制却在不断进行着自我复制。

官僚协调机制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前就一直存在。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它在国家行政机关、军队、大企业和其他大型组织内部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些官僚化组织也掌握巨大的权力。但经典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把上述所有官僚组织合并成了一个单一的机构并将全部社会生活都纳入其中。这构成了它与其他部分官僚化体制的一个关键差别。

到目前为止,本书在不同章节中分别讨论了权力、财产(权)以及协调(机制),目的就是想要从不同的角度更深入地阐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系列

---

① 关于企业内部的官僚科层体制与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可参见 O. E. Williamson(1967,1975)的文章。进一步的参考文献见本书 60 页的注释①。

② 例如,有人会说所有的社会都会殊途同归,走向市场之路;官僚机制是历史上的非常态产物,终有一天会被彻底铲除。还有一些人认为未来将最终走向自律,官僚机制和市场机制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

相互关联的现象。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极权统治的权力结构(集权)、社会生产的国家所有制和官僚协调相对于其他协调机制的支配性地位,这三种现象都是紧密相连的。权力集团(按照官僚科层结构进行组织并不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对国有生产工具享有绝对支配权。权力集团在自己的控制领域内尽力取消其他协调机制,直到它们完全依附于官僚协调。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不依靠市场来协调,企业内部的关系也不采取自律协调机制。取而代之的是官僚协调机制,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由官僚协调来完成,内部则建立起自下而上的纵向管理体制来控制企业的活动。处于金字塔最顶端的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处于最底层的是没有在统治集团内担任任何职务的普通公民:各类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从上到下都连续贯穿着一条纵向锁链。

在有关官僚科层体制的理论研究中,对"完美的官僚体制"已经有非常清楚的定义,即每位成员有而且只有一位上级领导,至少在从事一项特定工作的时候,只能有一位上级。从这个观点来看,经典社会主义的官僚体制并不完美。通常来说,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对每个人或每个组织,或者更准确的说,对个人或组织的每一项活动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但管理和控制这些个人(组织)或各项活动的上级领导或上级组织却有好几个。我们已经提到过党、国家和群众组织之间在其行为方面的相互重合[3.2,3.3]。[①] 党组织和党委对所有其他组织和机构的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此外,党内还有许多功能和地区上的纵向联系,它们都彼此重合并相互控制。各级党的领导都会指挥政治警察来检验干部候选人的政治可靠性,防止出现任何政治上的联盟,清除那些政治上可疑的人。所有这些防范措施也都延伸到了党内,在某种意义上说,党也要受到政治警察的监控,而这些警察又受到向他们下达这一任务的党的领导和相关组织的管理和控制。[②] 个人或组织的各项活

① 关于平行机构问题的研究,可参见 T. Dunmore(1980)。Dunmore 还引用了 H. Simon 的观点:在官僚体制中,每个机构(或部门)都有自己的目标和动机,而且都它自己的信息背景,这些都会带来分立倾向并产生了各个机构或部门之间的冲突。

② 在经典社会主义最极端的年代里(如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时代),对党员也会进行最严酷的恐吓。必须强调指出,经典社会主义官僚协调机制运行并不一定伴随着党内的严密监控。但毫无疑问的是,所有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政治警察在控制所有官僚机构并维持纪律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动之间相互重合，监督相互重合，功能和地区上的纵向联系相互重合，这些现象也都出现在国家行政管理当中。监督任务往往由特殊部门来承担，如检察机关，政治和经济警察。[①] 工会和群众组织对政府机关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具有一系列的控制措施，发现有任何不正常的行为，它们都可以向上级机关汇报。还有一套以居民为基础的公众控制网络。每个家庭或居住区都有党组织任命的管理人员，这些人负责很多行政事务（批准申请，盖章，出示证明）并监测其辖区内的各种情况。

乍看起来，这种多重交叉的监管和控制体系会产生很多相互矛盾的行为，造成组织内部的冲突，从而导致整个体系无法正常发挥功能。但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组织形式来完成官僚协调又是很容易理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怀疑：没有上级可以完全信任自己的下级。冯·诺伊曼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理论来解释，如何将不可靠的元素组织起来成为一个自动运行的装置[②]：必须将组成元素多向并联。体制内的重复冗余可以防止由于随机个体元素运行不稳定所带来的错误，或者恰逢其时地让其他正常运行的个体元素进行纠正上述错误。

纵向链条的主要影响方向是从上到下。上级会向下级发布命令，但下级永远可能指挥上级。[③] 当然，这并不是说下级对上级就没有任何影响力。用赫希曼的理论来说，下级也有“声音（Voice）”。[④] 各级党组织成员，甚至是那些位于金字塔底层、没有任何职务的普通公民也能够通过提出建议和批评让上面听到他们的声音，但在这方面有着严格的限制。普通党员和一般民众不能批评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原则、党的主要政治路线或经济计划中所阐述的总体经济政策。对个人进行批评会有多大危险，要取决于所批评

① 苏联的工农检察院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声名显赫。

② J. V. Neumann（1956）。他在文章的题目中就直接表明了这一思想：《Probabilistic Logics and the Synthesis of Reliable Organisms from Unreliable Components》。

③ 这是官僚协调机制与自律协调机制最主要的区别：在自律协调中有一个范围很小的决策机构所做出的决策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自上而下的影响）。与此同时，成员委托其代表支持他（们）在该决策委员会的辩论中支持某一观点，如果委托的代表（们）不能始终代表成员的意见，那么下一次选举就会取消该代表（们）的代表资格（自下而上的影响）。

④ 在 A. O. Hirschman（1970）的经典著作中，他对比了两类回馈信号。如果一个人想要表达对组织运行的不满，他/她可以采用两种回馈信号：退出或发出声音，所谓发出声音，就是提出批评、抗议和建议进行改革。

的人在官僚机构中的职务高低和他/她的容忍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情况都会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确实可以听到来自下面的声音，但声音都非常微弱：不满的音量必须要足够大，才能够让人听到或者产生影响。

我们继续用赫希曼的理论术语来进行解释。上文所描述的情况与"退出"(Exit)的缺位紧密相关。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公民的"退出"(即选择离开)权利被多次否定。如果不离开雇佣他们的企业或机构，任何人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工作[10.4]。如果没有得到批准，任何人都不能更换工作岗位，因为一般来说，实际上整个社会最终只有一个雇主：国家。由于行政限制和房屋的短缺，公民很难改变居住场所。党员不能退党；如果公开示威，那么就很难保证再有安静的生活，甚至失去自由，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出现威胁和恐吓。从工会、青年团或其他任何群众(职业)团体中退出都是冒风险的举动。党、国家机关和群众组织的干部更不能以辞职的方式表达不满。① 也没有最终的"退出"形式，即移民他国，即使申请移民都是非常危险。每种退出方式都会遇到阻碍、困难，甚至危险，这些都影响了"声音"的表达效果，往往导致了沉默或者更加谨小慎微。这样，社会主义体制自己就将自下而上的回馈信息压制到了最低点。

## 6.4 市场协调

如果想要了解市场协调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占据哪些领域，那么可以看一下整个产品和资源的流动。表6.1根据社会部门分类列出了投入—产出流动。表中的纵列代表了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方(市场关系中的卖方)，横行代表了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市场关系中的买方)。表中只涉及了两种协调机制(市场协调和官僚协调)的分工，从这个比较中，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出市场所扮演的角色。② 在设计本表时，我们希望能够更加综合地表明各种协调机

---

① 马克斯·韦伯[1925](1978，第3、11章)基于议会政治结构和私人企业对官僚科层体制进行了研究。在这种官僚科层体制中，官僚作为个人是自由的，他/她只在相关的工作范围内服从于上级。官僚机构的工作岗位是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选择职员的标准是职业能力。

② 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们还会介绍其他协调机制在表中所扮演的角色。

制所发挥的作用。本书在后面还会简单提到投入—产出的流动范围。[①]

**表 6.1 社会部门各个单位之间的投入—产出流动:官僚协调和市场协调的作用**

| 供给部门 | 消费品部门 | | | | |
|---|---|---|---|---|---|
| | 1 | 2 | 3 | 4 | 5 |
| | 国有企业 | 合作社 | 正规私人部门 | 非正规私人部门 | 购买消费品和服务的家庭 |
| 1. 国有企业 | B | B | B + M | 0 | B + M |
| 2. 合作社 | B | B | B + M | 0 | B + M |
| 3. 正规私人部门 | 0 | 0 | M<br>(有 B 的干预) | M | M<br>(有 B 的干预) |
| 4. 非正规私人部门 | 0 | 0 | M | M | M |
| 5. 购买劳动力的家庭 | B + M | B + M | 0 | M | — |
| 6. 投资资源的分配 | B | B | 0 | 0 | — |

注释:此处 B = 官僚协调,M = 市场协调,0 = 没有发生交易

表中的 1.1 代表了国有企业之间的流动。[②] 官僚协调机制在此基本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在下一章我们将进行更详细的讨论。[③]

在商品和物资的官僚化管理之外,还残留着一定的市场关系。如果一家企业生产数据不足(物资、中间品和零件),它可能会通过给好处、送礼物、甚至用钱来贿赂供给厂商的代表。这些行为实际上是以扭曲的形式取代了市场关系中的价格关系(给供给厂商更高的价格),除非在交易中还有除供给厂商以外的政府官员也接受了贿赂。国有企业常常会专门培训一批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员,他们能够通过积极干预或腐败行贿的手段加快企业之间

---

① 这里没有讨论对外贸易的问题[14]。因此表中没有列出国与国之间的商品流动,即进出口方面的内容。

② 部门 1 包括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为了简便起见,没有列出非企业(即预算单位)部门[5.4]。国有企业的情况也基本适用于非企业部门。

③ 国有企业之间的交换即使在名义上是按货币计值的买卖,实际上也是由官僚协调所支配。在接下来的两章里,我们还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产品的流动。①

合作社的情况和国有企业差不多[5.5],特别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表中1.1的情况同样适用于1.2,2.1和2.2,即国有企业与合作社之间的投入—产出流动以及合作社之间的投入—产出流动基本相同。

如果存在正规的私人部门(如获得当局许可的工匠、零售商以及家庭农户),在官僚机构的限制范围内,它们可以从国有企业和合作者那里购买生产资料。它们通常要付出比官方价格高得多的市场价格,或者说能够通过行贿的办法获取生产数据。因此,在表中1.3和2.3里既有官僚协调,又有市场协调。除了特殊情况之外,一般不允许它们将产品出售给国有企业或合作社,所以表中在1.3和2.3里都用了0值。

市场协调基本运用于表中的3.3、3.4和3.5,即正规私人部门,而正规私有部门主要是向非正规私人部门和家庭提供产品。但除了表中3.4之外,几乎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市场协调,官方干预无所不在,特别是对价格的干预。我们在表格中用括号中的文字说明了官僚协调的影响。

真正的市场协调出现在非正规私人部门,它们把产品出售给家庭和正规私人部门(表中4.3、4.4和4.5)。非正规私人部门不能公开向国有部门提供产品。

在表中1.5和2.5里(卖方是国有企业或合作者,买方是家庭),官僚协调和市场协调构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组合。长期以来,在不少国家里,这一领域中的投入—产出流动部分是采用行政分配或配给制度来进行管理的,其余部分则仍然通过传统的商业流通渠道,但仍要受到官僚协调的各种干预,特别是产品分配的地点和价格设定。家庭作为消费品和服务的购买者,还要像市场参与者一样进行交易[表中8.7,12.6]。

在表中5.1和5.2里,家庭是劳动力的出售方,国有企业和合作社是劳动力的购买方。同样,这里也出现了市场协调和官僚协调的奇特组合[10]。

一般来说,除非得到官方的许可,正规私人部门不能雇佣外部劳动力。即使获得了许可,仍然有非常严格的人数上限规定。但本表基本没有考虑这方面的情况(所以表中5.3用0值来表示)。

---

① 这些负责原材料供应的人在苏联的经济俗语中还被称为“卖货的”。

如果非正规私人部门雇佣了外部劳动力,那属于半非法或违法行为(如表中5.4)。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市场协调就会起作用。

在劳动力的配置方面,市场协调至少发挥了部分作用,但投资资源("资本")则是通过官僚协调在国有部门和合作社内进行分配(表中6.1和6.2)[9.2]。这一领域的分配问题我们还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进行讨论。大体而言,正规和非正规的私人部门基本只能依靠个人储蓄来进行资本积累。在一般情况下,私人商人(企业家)既无法获得银行贷款,也得不到外部融资。因此,在表中6.3和6.4中,我们以0计值。

从以上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官僚化公有财产(权)"吸引"着官僚协调机制,而私人财产(权)"吸引"着市场协调机制。我们要特别注意这种特定产权形式与特定类型的协调机制之间的亲和关系[15.2和19.4]。

## 6.5 自律协调

从名义上看,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很多领域都采用了自律协调机制。

在政治上,"民主集中制"被写入了党章,这其中就包含了基本的自律思想[3.1]。"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所有群众组织、利益代表团体和职业协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提供了基本的运行原则。

国家权力建立在自律原则的基础上。所有立法机构的成员,从最低的区代表或公社代表,到最高的议会代表都是选举产生的。各级国家行政管理当局都要向本级的立法机构负责。主要的经济监督管理规定包括国民经济计划,都要经议会通过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从正式规则上看,似乎是选举人选举出了议会代表,然后由议会代表制定监督管理政策,从而实现了自我管理。

从经济组织来看,合作社名义上是一种自律型机构,由选举出来的领导成员负责经营管理。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明确指出:在所有上述领域中,实际上都是官僚协调机制在发挥作用[3.1-3.3,5.5]。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那些被选举出来的人究竟依附于谁:是投票选他们的人?还是更高一级的官僚机关,

上级机关事先就挑选好了要选什么人，然后向选民施压，并在选举后确认当选资格。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选举是否真正有意义取决于以下问题：能否在超过一个候选人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候选人是否能够拉选票以寻求支持；掌权的候选人能否被选下去，而又有其他人被选上，投票人是否能够经常性地获得这样的机会；投票人可否随时罢免对其工作不满意的当选者。而事实上，在社会主义体制下，选举是这样的：能够被选上的只有当权的候选人，官方的候选人毫无例外地都要当选；禁止反对派候选人寻求投票者的支持；如果上级机关对当选领导人不满意，完全可以将他/她赶下台。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事实胜于雄辩。在革命过渡体制时期，尽管不是无一例外，但在许多领域还是实行了自律协调。革命者确实是选举代表进入革命政治运动的领导机构。在革命胜利后不长的一段时期里，很多地方的国家权力机构都是经过真正的选举产生的，其中还常常伴随着不同政治运动和党派之间的暴力斗争。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一旦政治开始官僚化，选举成了表面文章，官僚监督取代了真正的自律管理，社会主义社会也就完成了向经典体制的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和“官僚”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角色、职业和个人质量类型就变成了一个东西。那些追求职业政治生涯的人变成了官僚机构的成员，而所有的官僚行为都带有了“政治动机”。

在传统社会体制下，自发产生的合作组织都或多或少带有自律的色彩。但那些通过大规模强制性集体化，依靠行政手段建立起来的城市和农村合作社完全变成了官僚化管理机构，和国有企业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自律机制并没有消失。“声音”以及来自底层的建议和批评支撑着一些自律机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但这些自律机制始终非常弱小，经典体制的权力结构与自律机制在本质上是水火不容的。

## 6.6 道德协调

道德协调具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我们这里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分类：捐助者的动机是什么？

第一类动机与政治信念有关：有许多人愿意为了党、工厂和国家的事业

无私奉献。在革命胜利后的过渡时期，成千上百万的革命群众在工厂或城市里自愿参加各种义务劳动。[1] 城市居民和大学生到农村里帮助农民收割庄稼；医生免费为病人看病，演员为工人和农民提供演出服务。这些现象也都发生在革命英雄主义年代。

这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献身热情后来就逐步消失了[2.4]。[2]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从事义务劳动，更多是因为有来自外部的压力，而不是出于内心的政治热情。

留存下来的是更小范围内的奉献精神：当地的幼儿园、学校和医院提供的一些义务服务，或者修修操场之类的义务劳动。

这就出现了另一类动机：绝大多数人的无私奉献行为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慷慨、热心和乐于助人。这种对他人需要的主动适应、关心以及提供无私帮助极大地抵消了官僚协调摩擦所带来的各种困难，或至少让人们有时还能够忍受这种僵化的官僚体制。上述行为的影响范围很难用数字来统计，但在日常工作、出行、购物、居住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层次上，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意义也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因为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官方意识形态并不认同所谓的“慈善活动”，认为那些行为都是与资本主义妥协的产物，不过是为了治疗剥削所导致的创伤而提供的一些社会救助罢了。官方道德教育根本不重视这类微不足道的“好人好事”，它所提倡的是要献身于伟大的事业。

即使某些互惠互利的行为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利他动机，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一家企业的经理向另一家企业提供了机器设备零件，帮助企业经理度过了难关，他/她心里想的是：希望下一次他/她也能获得同样的帮助。朋友同事之间相互帮忙维修住房，因为他们知道当自己需要的时候，其他人也会来赶来帮忙。这种互惠机制不仅有助于填补官僚协调相互摩擦所产生的裂缝，而且可以补充由于市场机制不断萎缩所留下的狭窄空间。

---

① 在苏联，这种自愿性质的义务劳动被称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有在类似精神鼓舞下而开展的义务劳动。

② 当然，在战争年代，所有人都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和领土完整做出更大牺牲，远胜于和平时期。但这是一种例外情况，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

## 6.7 家庭协调

作为一种协调机制,家庭具有最强大的生命力。在历经了各种政治和经济重大体制变迁之后,它仍然在协调人类生活和行为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前社会主义体制下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同样如此。

在如何对待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方面,官方意识形态的态度和实际的社会、地域及经济政策之间往往相互矛盾。在革命过渡时期,大多数流行观点倾向于取消传统的家庭形式。到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阶段,这些观点大都被放弃,主流意见相当保守,认为家庭应该具有更多的道德和法律约束力,甚至比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家庭就是要以家为基础,负责抚养孩子和组织消费(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组织消费绝不是一项可以从容应付的任务[11,12])。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经典体制下,总有非常强大的趋势试图限制家庭在某些重要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并破坏它的功能基础。下面将要提到的所有趋势在其他非社会主义体制中也都存在,如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和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这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强度不同,以及在很多领域这些趋势的巨大力量。

1.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建立社会主义体制的社会都处于工业发展的落后阶段[2.3]。因此,在革命之前,家庭企业(农庄)在城市和乡村中都占有很高的比例。革命过渡时期的土地改革又进一步提高了家庭农庄在经济中的比例。后来,随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家庭企业(农庄)几乎被全面消灭。

从那时起,生产就开始与家庭分离开来,只遗留下很小一部分的残余家庭生产形式(范围很小的正规私人部门和范围大一些但处于非法或违法状态的非正规私人部门)。

2.强制增长[9.5,10.1]迅速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常常是跳跃式的需求增长。许多在农村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在快速工业化的驱动下进入了工业小区,很多人都不能带上自己的家庭成员。最重要的是,妇女就业水平

迅速提高。在通常情况下,妇女都是因为家庭经济状况窘迫才不得不去工作的。从一方面看,妇女在参加工作以后,眼界和经济独立性都得到了提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就业使妇女肩上的负担日益沉重:除上班之外,她们仍然要完成一个家庭主妇和一个母亲的传统职责。这样,家庭生活又有了新的压力,妇女为家庭所贡献的力量必然不断下降。①

3. 另外一个趋势与第二个趋势紧密相连:许多传统的家庭活动都转移到了受官僚机关控制的机构(有时是企业)那里。“大型组织”将日益取代家庭,负责为人们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服务:日常护理、幼儿园、学校夏令营、医院、老人之家。② 在家庭生活中,有一大部分时间都要参加各类根据年龄和职业进行组织的活动,工作单位安排的外出和剧院演出,以及企业和机关自己的休假活动。有时候吃饭都安排在单位食堂。③ 如果家庭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即使达到了资本主义家庭的生活水平),那么下一步并不是像资本主义家庭那样去购买私人汽车,而是增加公共交通。拥有自己住房的家庭只有在农村才能找到。城镇居民大都住在国有(或合作社)公寓里。住房发展计划所提供的大部分新建公寓都是单一形式的合租房。所有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导致出现了以下情况:“私人生活”和由家庭协调的活动不断受到限制,而与此同时,“集体领域”和由官僚协调的“制度化”、“组织化”活动却在不断扩张④。

## 6.8 自发变迁与人为变革

官僚协调在社会主义体制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在诸如军队、铁路的集中管理以及流行病防治等领域

---

① 由于打破了传统家庭的生存基础(消灭了家庭作坊,妇女就业飞快增加),家庭离婚率也迅速上升。

② 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曾许诺,国家将在这方面为人民提供更多的东西[4.3]。事实上,这些承诺远远超出了它的实际能力。这部分没有兑现的承诺——日常护理、幼儿园设施、医院病床和养老院始终处于长期短缺状态——引发了各种紧张和矛盾。

③ 中国的农村公社甚至建立了“集体食堂”[5.5]。

④ 本书在后面还会涉及到家庭财产以及家庭经济作用(包括妇女的经济作用)等方面的问题。这类分析也都是在探讨家庭协调机制,尽管文中未必会直接用“协调”一词。

引入了部分官僚化体制。国内市场的运行和对外贸易都曾受益于中央立法,保护私人契约的法律对私人之间签订合同具有重要意义。中央立法对家庭也做出了相应的法律规定。中央立法还为自律组织的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基本的法律和宪法都对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进行了限制。

但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建立之前,不管中央权力有多大,并不是中央立法决定了每一种协调机制对社会活动的协调范围,这一协调范围完全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发确定的。国家可能采取特定的措施来推进或减弱某一协调机制所发挥的作用,但任何措施都无法决定协调范围的大小。

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让中央权力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的发展进行自上而下的人为干预:市场协调必须结束,或者最多只能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而取而代之的是集中式的官僚化协调。这种根本性的变革并不是自动自发的。① 这一变革来自中央权力,伴随着火与剑。随之而来的种种现象却具有了自动自发的特征,不再需要中央权力的明确指示:自律机制逐步萎缩,为集体自愿工作的热情日益消退,家庭和小区生活开始处于附属地位。还有一样东西也接踵而至:官僚机制的自我繁殖和极度扩张,这一自发趋势甚至远远超出了发动并指挥这场划时代变革的始作俑者的想像。②

①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是两类对立发展模式——“建构式发展”和“演进式发展”——的最好例证,换句话说,也就是人为发展与自发秩序的鲜明对比。这些概念都来自冯·哈耶克,见冯·哈耶克(1960,1973,第 1 章)。

② 列宁[1917](1969a,第 473 页)曾写到:“所有公民都将变成国家的雇员,其中包括军事人员。所有公民都将成为单一国家托拉斯的职员和工人。”

我们可以把列宁的这段话与他在 1921 年 12 月写给所有苏联中央机构领导人的信中所表达的愤怒之情做一个对比,信中是这样说的:“现在必须立刻结束你们机关中存在的令人厌恶的官僚主义作风…… 我的建议是你们马上集中起来建立一个机构。自己只顾着发官样文章,然后再传达给其他机构,这也是官僚主义,浪费纸张。”列宁[1912](1970,第 423 页)。

# 第七章 计划与直接官僚控制

在上一章中,我们讨论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中主要协调机制的分工情况。第7章和第8章将着重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协调机制——官僚协调。第7章对该问题所涉及到的领域进行一次综合考察,第8章则重点探讨与之相关的价格与货币问题。

## 7.1 社会主义计划的先驱者

社会主义体制的思想先驱们将计划视为社会主义的一大优势。马克思特别强调了以下论点:①

资本主义造就了企业内部高度复杂的组织体系,但却使连接企业的市场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关系,就无法消除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通过消灭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权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可以在国家层面上组织经济生产。马克思认为集中配置社会劳动是一项非常简单的工作。当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产品之间的关

① 在《法兰西内战》[1871](1940)一书中,马克思认为未来共产主义体制的本质特征就在于"联合起来的合作社会将根据统一的计划管理国民生产,这样就可以将生产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彻底消除经常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震荡,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致命伤"(第61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这样写到:"当社会掌握了生产力之后,生产工具和产品的社会特征将由非常了解情况的生产者加以利用,"(第266页)"为了能够成为所有生产工具的主人并根据社会计划来使用,整个社会应该结束生产工具使用者相对于生产工具所处的附属地位"(第279页)。

系不再被市场"拜物教"所蒙蔽,配置问题将变得清晰透明,很容易观察清楚。人们的需求和供给决定也就不再复杂难办了。

在1917年之前,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他的后继者们都没有提到过在进行国民经济计划时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例如,在收集和处理信息时会碰到哪些问题。这些思想家们通常关注的问题是需要有什么样的动机让人们努力工作。但对于那些计划者和实施计划的机构而言,又需要附加什么样的激励来促使他们完成这项特殊任务呢?对于这个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的思想先驱们却从未提及。

在本章的结尾部分,我还会回到这个问题:经典体制的实际经验与社会主义思想先驱们的期望有何不同?

## 7.2 初始方法:编制计划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研究计划是如何编制的,在**7.3**里,我们会讨论计划是如何实施的。这两部分描述了如何根据官方政策来完成上述过程。在**7.4—7.6**中,我们会探讨真实的"游戏规则"以及参与者的利益、动机和冲突。[1]

为方便起见,我们先从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编制开始谈起。在大多数国家里,计划都是先由最高级别的官僚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准备,然后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党,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审核批准,最后经国家议会立法通过。

就计划的时间长短而言,有短期的年度计划和中期计划,如五年计划[2],其中年度计划是经济运行的真正实施工具。尽管五年计划中投资项目规划会对投资过程的进展产生实际影响,但它更多的是表明经济政策的取向。在以下的部分中,我们主要讨论的就是年度计划,如果没有特别指明,"计

---

① E. A. Hewett(1988,第4章)详细介绍了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是如何进行计划和管理工作的。关于中国改革前的计划和管理情况可参见H. Harding(1981)。

② 在某些国家和特定时期内,最重要的是季度计划。有些时候,一些国家还会制定15—20年的长期计划,多数情况下,这类长期计划只涉及经济的某一部分(例如,苏联的第一个电子计划)。

划"通常是指年度计划。

国民经济计划几乎涵盖了经济生活中的所有活动。[①] 这里我们仅讨论生产领域的计划编制。由于篇幅所限,所谓非生产领域(如服务领域)的计划编制问题就不在这里进行讨论了。

计划的第一部分(章)[②]是生产。总量指标(例如,国内生产总值)规定了国民经济的生产总量以及各主要经济部门(工业、农业、交通等等)的产量分配。除此之外,还包括了最重要产品(即所谓的优先产品)的数量指针,这些产品可能有成千上万种之多。在计划文件中,上述产品的数量都会尽可能地用物理单位一一表示出来。只有在无法使用物理单位情况下,才会用总产值标出。

计划的第二部分涉及到产品的使用。其中主要规定了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在各个领域的分配,各部门都会得到相应的投入品配额。配额是一个上限。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计划本身就包括了某种"配给"机制:它分发出"票证"或"配给券",如果使用者(如某一部委管辖的所有企业)没有这些票证,那么即使它有购买能力,也无法得到所需要的投入品。

为了分配优先产品,必须考虑平衡问题(物资原料、半成品和成品)。[③]所谓平衡,一边是指来源(生产、进口、存货的减少),一边是指使用(生产消耗、出口、消费,存货的增加)。在经典体制的计划编制方法中,非常重视平衡问题:它们之间的均衡是判断计划是否协调连贯的主要标准之一。取得平衡是一个不断取舍进退的过程,要经过生产方与使用方计划领导部门之间的多次讨价还价,这一过程被称为编制计划的"平衡方法"。[④]

第三部分是劳动力问题。在各个领域分配人力配额和工资基金;对名义工资主要指标的任何变化都做出了相应规定。

---

① 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通常有6万个独立的小标题,见阿·格·阿甘别吉扬(1989,第91页)。

② 这里的排序(部分和章)只是为了便于研究。实际上,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计划文件的主题分类都会有所不同。

③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国家计划办公室需要进行2000多项平衡,国家物资供应局和各部委要进行几万项平衡,见E. A. Hewett(1988,第125-126页)。

④ 多年以来,苏联和东欧国家曾进行过无数次的实验,并采用数学模型来帮助实现平衡[17.4]。

第四部分是投资计划。将投资总量进行了配额分解，根据建设能力和资本品的进口情况，规定了不同的配额指标。这一部分还包括了所谓的优先投资项目，即那些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投资项目。

第五部分包括了技术发展目标：需要引入哪些新技术，在哪些领域应用新技术，应该生产哪些新产品。

第六部分涉及到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设定了进口配额以获得平衡，同时也包括了出口目标[14.2]。

第七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主要是财政和金融问题，其中包含了财政预算的主要科目，银行体系的目标以及价格政策[8.5]。

如果计划中想要将每个领域的所有企业和机构都纳入其中，那么可能会需要几百万个指标。显然，集中做出这么多的计划指标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就有了计划分解。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根据对象将计划分解。例如，在对房屋建设总量目标进行分解时，计划中会列出建设部应该建多少房子，重工业部应该建多少房子，轻工业部应该建多少房子等等。在这个例子中，各个部门就是“对象”。这样每一个指标在统计部门所做的各部门分项目录中就不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了。计划中列出的所有没有生命的数字指针都对应着现实中有生命的官僚机构负责(责任)人。

官僚机构在控制国民经济时也在不同层次上采取了这种分解方法。让我们来看一个四层结构的例子：在第一层次上，计划委员会将国民经济计划分解到各个部委；然后各部委将计划分解到自己的主管部门(每个主管部门都控制着自己的下属企业)；主管部门再把计划分解到自己负责管理的企业；最后每一家大型企业都有了自己必须完成的几千个年度计划指标。

计划分解是自上而下传递信息的基本方式。下级机构从上级机构接受到的计划任务是命令，而不是建议。[1] 下属机构必须完成计划指令。

也有相反方向的信息流动：在计划完成之前，下属机构会对计划初稿提出建议并做出评论。如果需要，它们还可以在计划执行过程中修改计划指

---

① 斯大林曾这样说过：“我们的计划不是预测性的计划，不是猜谜式的计划，而是指令性计划。”约·维·斯大林[1927](1954，第335页)。

标。最后,它们必须汇报计划的实施情况。

除了纵向的信息流动之外,还有横向的信息流动。处于同一层级的机构制定计划的过程中也要在相关问题相互协调:例如,作为生产部门代表的部委和代表使用部门代表的部委会就某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争论,或者生产者和使用者的主管部门进行争论。一般而言,这种同级部门之间的讨价还价都要在上级机构的指导下进行。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说计划的编制是一项规模庞大的官僚协调工程,其目标是事先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协调并达成一致。在成千上万涉及到各个层次的计划指令最后确定之前,有数不清的党委成员、政府机关职员、企业和合作者管理人员以及群众组织领导会一再地讨价还价,反复计算,直到计划编制完成为止。

## 7.3 初始方法:计划的实施与管理

研究计划实施的起点是我们在上一部分曾提到过的一个原则:执行计划是一项义务。这一原则非常重要,因此,有不少研究者把它看做社会主义体制最关键的特征,并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称为"指令性计划经济","强制经济"或"命令经济"。

计划主要由特定机构进行编制:国家计划委员会、各个部委、主管部门、企业和其他机构的计划部门。但这类机构与负责管理的组织机构是捆绑在一起的,特别是每一层次上的领导人(部长、主管部门领导或企业的负责人)对计划工作的每个阶段(从最初准备计划、然后执行计划,直到最后汇报计划实施情况)都要负责。计划编制部门在计划的修改(正式或非正式)以及总体管理方面也都要发挥积极作用。

本章在剩下的部分里将会探讨公共部门(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的管理。[①] 对计划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决策问题也将进行简单介绍。

1. 企业的成立。在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经济中,"进入"问题在市场竞

---

① 官僚控制对私人部门的影响我们将在以后谈到[19.5]。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没有介绍非企业国有机构(预算单位)的官僚控制情况,但其主要特征都类似于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

争的框架之内可自行决定。只要企业家认为可行,他们就可以成立新的企业。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是否成立企业是由官僚机构决定的。

2. *企业的清算*。与成立企业的情况类似,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的"退出"也依赖于竞争。如果一家企业长期没有清偿能力,那么它就会破产。在反垄断法的规定范围内,企业的所有者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将企业合并或分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企业的清算、分拆或合并都由官僚机构决定。

我们可以这样对1和2进行总结:作为一个集体组织(或有机体),企业"是生还是死"并不取决于市场竞争的"自然选择",而是由官僚机构掌握。这里完全没有熊彼特所说的"经济健康发展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企业家的出现,他们引入新的产品或新的技术,建立新的组织,占领新的市场,只有这样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僵化的组织形式才会被赶下历史舞台。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体制没有为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留下任何空间。①

3. *领导者的任命、提升和撤职*。我们在第3章已经介绍过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但为了完整起见,还是有必要在此重复一下:领导的选任完全由官僚机构决定。

前面部分在谈到计划问题时,已经介绍了决策和控制方面的情况。可以这么说,企业管理层将努力确保每一项计划任务都得到实施,也会找出即使是最严密的计划也无法事先进行详细规划的任务。

4. *生产的管理*。创建者(通常是相关部委)从一开始就为新企业设定下了"范围"限制:即允许(规定)企业从事哪些领域的活动。企业无权生产"范围"之外的东西。

最重要的限制就是年度计划,年度计划不仅规定了当年的总产量,而且还规定了优先产品的年度产量(对一家生产各种产品的企业来说,可能会有几百种产品)。

此外,上级机关会经常直接干预生产过程,更改原先的方案,增加新的任务,取消其他任务,对某类产品的生产施加特别的压力,如此等等。

---

① 见J. A. 熊彼特[1912](1968)。

5. *产品和原料的分配*。在前面讨论计划编制时,我们已经介绍过优先原料、半成品和成品的分配问题,以及与产品平衡之间的关系。计划分解为产品和原料的分配提供了一个整体框架,但更具体的分配任务是由管理层完成的。就这一点而言,显然是官僚协调取代了市场协调。官僚机构把生产者生产的许多产品分配给使用者,并且规定了某一类产品生产者必须提供多少,使用者能够获得多少。对某一类产品的生产企业(或贸易企业)来说,它们都拥有一定的法律权限,有权决定哪些企业或预算单位可以获得某一类"产品券",而其他机构则无法获得这类产品。

上级机关也经常干预产品和原料的分配。它们可以改变计划中(或下级组织)已经确定的分配方案。如果它们认为某类交易特别重要,也可以直接下达命令,改变传递方向。

6. *劳动力的分配*。这里同样是计划进行总体限制,但管理层进行具体干预,甚至有可能改变计划。可以把工人从一家企业转移到另一家企业,也可以强迫企业增加或减少工人数量。根据不同的级别,制定了极为详细的工资等级,对工资总额有严格的限制。

7. *对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这里只是为了完整起见,提一下名称,以后再进行详细讨论[9.2]。

8. *技术发展*。从表面上看,计划仅仅为投资任务定下了一个基本框架。技术发展的优先投资领域是上级机关决定的:哪些工艺流程可以实现机械化,哪些地方可以安装新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哪些领域应该引入新产品。

9. *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上级机关利用各种方式控制着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其中包括进口审批,出口指导,在对外贸易领域实行严格的外汇控制[14.2]。

10. *价格制定和* 11. *财政管理*。这里只是为了完整起见,提一下名称,以后会进行详细讨论[8]。

上级机关在控制下一层所有决策和管理领域时,使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命令。尽管也会采取劝诱、说服和规劝等手段,也进行奖励和惩罚,但目的都是为了迫使下级执行命令。主要执行人员的奖金取决于能否很好地执行计划和上级机关的其他命令。如果违背计划或没有执行其他命令,那么就

要受到惩罚,惩罚措施包括批评、撤职、入狱和以"蓄意破坏"的罪名起诉。[①]因此,奖励和惩罚与业绩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更多的是要强化纪律和要求服从上级。

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产生部分自主权,下级单位在接到上级单位分配的计划任务时,它们完全可以等到要进行汇报(并接到下一个计划)的时候再执行计划。除了计划以外,如果出现矛盾,上级单位还可以干预下级单位的日常活动。西方文献中经常把社会主义经济称为"中央计划经济"[②]。尽管中央编制的计划确实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提法只说明了事物的一面。如果用"中央管理式经济",可能会更贴切一些,因为这种提法更加突出了官僚协调和集中控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计划特别重要,但是它毕竟也只是官僚协调形式的手段之一。

本书在**7.2**和**7.3**部分已经介绍过有关协调机制的问题,而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典型协调机制就是经济上的官僚直接控制[③]。官僚直接控制包括了以下内容:编制计划,然后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执行;采取命令式管理;上级机关对下级单位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以及日常经营定期进行具体干预。[④]

这种协调机制同样充满"活力",整个经济的运行完成了自己的基本功能:生产、分配、向消费者提供产品。计划大致都如期实现。社会主义体制运行部门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也可以圆满完成。这一业绩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独一无二:在公有制部门,官僚机制协调着所有活动并将整个体系整合在一起,而这一切都是在完全取消了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完成的。

但必须认识到直接官僚控制在很多方面都是无效率的:官僚体制是非常僵化的;面对需求、技术、国内政治状况或外部世界的变化,官僚体制在进

---

① 1959年匈牙利曾根据刑法发布法令来维护计划经济,I. T. Berend(1979)对此有过介绍。Berend写到:"在没有重大理由的情况下,如果严重偏离计划命令,那么就可以判处两年监禁。对于涉及严重威胁国民经济计划或任何具体计划(或造成了巨大损失)的犯罪行为,可以判处5年以上的监禁。"(第117页)。

② 这个说法是E. Zaleski(1980)提出的。

③ 这是匈牙利在改革时期所使用的词汇。在匈牙利语中,"直接控制"一词首先出现在K. Szabo(1967),T. Nagy(1966)和L. Antal(1985)等人的文章中,常常与体制改革时所采用的间接控制一词相对应。

④ 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编制和直接官僚控制的开创性研究,可参见J. Berliner(1957)、D. Granick(1954)、J. Kornai[1957](1959)和J. M. Mntias(1962)。

行调整时会一再拖延，从而导致巨大损失。

## 7.4 经济领域官僚机构领导人的动机

假如能够获得关于过去情况的完备信息，假如可以精确预测未来，假如每一项命令都没有任何错误并且毫无瑕疵地得以执行，那么官僚直接控制机制将会完美运行。但在现实世界里，信息始终是不完备和不精确的，而在预测未来时，也面临着无数的不确定性。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的不是时钟里的机器，而是活生生的人，他们都会出错。7.2 和 7.3 部分所介绍的各种机制之所以会出问题，主要根源于参与者的动机和冲突，以及收集和利用信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信息扭曲。

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官僚机关的官员努力工作呢？在以下部分，我们将集中研究那些领导人，从部长、部门负责人一直到商业机构领导和工厂的党委书记，即直接领导着下属职员的干部们。①

在此，没有对企业管理者的动机和其他官僚机构领导人的动机进行区分。② 我们的目标是要找出适用于所有经济领域官僚机构领导人的一般动机。③

这里应该避免将动机问题过于简单化或者任意挑选出一个目标动机。④

---

①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就不再讨论职员的工作动机。在很多方面，下属职员的工作动机与领导的动机都非常接近，当然也不完全相同。

② 在资本主义体制里，所有者不同，单位也就完全不同。如果“企业”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单位的话（正如在本书中，我们也可以把资本主义的企业称为单位元），就需要对所有者雇佣的高级经营管理者的动机进行单独分析。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企业高级管理者的动机在很多重要方面都与其他高层官员有明显区别。

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里，根据法律也把生产单位元的集合称为“企业”。根据上面的标准，“企业”与“企业”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有者是相同的）。正如下文所述，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人的行为和上级机构领导人的行为大致相同；企业领导人和上级机构领导人的关系与上级机构领导人与主管部委领导人的关系也大致相同，如此等等。

③ 这里不再探讨负责全面工作的国家领导人。所有其他的领导人都有一个上级（或上级组织）和下属人员。

④ 当然，这里并不反对研究者为了便于某一问题的讨论（当然，首先要假定忽略其他动机并不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在模型框架之内只挑选一项动机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研究。

我们将尽可能研究所有的动机。[1]

1. 政治和道德动机。主要动力包括:忠诚于党的思想,赞成官方意识形态,对完成计划目标充满热情。

2. 工作认同感。这一点适用于在任何体制下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这样的人愿意从事体面的工作并具有“职业荣誉感”。如果是一位企业管理者,他/她至少想顺利完成生产任务。如果是一位工程师,他/她至少想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并负责技术上的监督管理。如果是一位总会计师,他/她也想将财务账簿整理得清晰有序。

3. 权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想拥有权力。有些人还会对权力非常反感。但这样的人不会接受领导职务。成为领导的人都被权力所吸引,这些人喜欢看到别人服从他/她。一旦这样的人掌握了权力,他/她就想保持权力,而且还想获得更大的权力。

4. 威望。在任何社会里,级别和社会地位都紧密相关。其他体制有许多平行的梯子。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实际上只有一个梯子:官僚机构中的职业生涯。想要获得更高威望的人必须在这个梯子上爬得更高。

5. 物质福利。报酬包括:更高的工资、奖金、特殊福利、获得某些商品和服务的特权。

6. 平静的生活。领导人都想躲开麻烦,不要到处受阻,避免与上级、供货商以及消费者产生冲突。

7. 害怕惩罚。就是被上司骂一顿也会让人不愉快,但正如前文所述,还有更为严厉的惩罚。

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这些动机在社会生活中都有不同的比重。[2] 当然,对不同的人而言,各种动机的相对力量也会有很大差异。不同动机之间有的是相互加强,有的则相互冲突,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们还会进一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官方意识形态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以“主人翁(所有者)”的态度认

---

① J. Berliner(1957)也提出过一个类似的“清单”。关于东德和罗马尼亚企业管理者动机的研究,可进一步参考 D. Granick(1975,第1、2部分)。

② 同样是在经典社会主义阶段,财务激励在中国和古巴所发挥的作用就要小于苏联或者东欧国家。

真完成委托给他/她的任务。事实上，在官僚体制的各个等级中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主人翁精神”动机。不论是企业的管理者，还是企业的上级机关领导，他/她都无法将剩余收入归为己有。他们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承担全部决策责任，因为他们也要听从上级的指示，而且指示下达之后，上级机关还要经常干预其日常活动。没有任何必要冒险去得罪上级机关（不管是企业、主管部门还是国家部委），一旦触怒它们，很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无法引入新技术和新产品）。这是因为在官僚管理体制下，不论是单位本身，还是领导人自己，都不可能分享收益或者从剩余收入中获得好处。如果官僚机构成员的实际社会地位根本就不是什么“主人”，那么光靠劝说鼓励根本就无法建立所谓的“主人翁”动机。

当面对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时，促使领导人工作的主要还是内在激励。他们要应对三类“伙伴”——上级（向上的纵向联系）、下属（向下的纵向联系）、供货商和获得其产品的企业，名义上就像市场关系中的卖方和买方（“向前”和“向后”的横向联系）。这些关系之所以对领导人非常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联系。例如，无论是下属还是客户，只要对领导人有所不满，全都可以径直向该领导人的上级反映情况。由于整个经济都处于短缺状态[11,12]，领导人自己也依赖于他们的供货商。就这四种关系（向上，向下，向前，向后）的依赖强度而言，最强的就是向上的纵向联系，领导要依赖于他们自己的上级领导。

前面所列出的所有动机都与如下现实密切相关：下级依赖于上级，对下级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得到上级领导赞许的目光。下面让我们把这些动机再重新梳理一遍。

中层干部的上级领导经常要宣传“党的路线”，在这一思想教育的过程中，上级领导会把政治信念和精神鼓舞转化为日常任务，来指导中层干部的具体工作。上级领导也通过这种方式来确保下级认真执行计划和其他命令，从而为党和社会主义做出贡献。上级领导会具体解释，如何才能令人满意地完成计划，并提出相应的专业要求。上级将决定他/她能爬到梯子的哪一级，进而就决定了他/她拥有多大权力和享有多高的威望，奖金是多少或者会受到什么处罚。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上级是否满意，由此也就意味着他/她是否可以平静地生活或者将遭遇狂风暴雨。下级始终会感觉到对官

僚体制的依赖，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活动过滤之后，就把上文提及的 8 类动机从内在动力转化为实际行动。

所有这些都对日常的管理工作产生了直接影响，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对官僚机构每一位成员的行为特征造成了长期影响。[①] 没有必要一味埋怨上级领导，责怪他们突发奇想（弄出这么一套办法）或者说他们才是始作俑者。也不必认为每个人其实只为自己着想，或者换句话说，风险就应该自已承担。这些观点都意义不大。想要做事的下级人员总要提前“保护好自己”，他/她需要事先得到上级的同意并尽量利用更多的上级领导来分散风险，这样才能避免遭受挫折和失败。再者说，大部分人都有那么一点虚荣心，拍马屁也是人之常情。

这些行为特征（或品格特征）并不是只有进入官僚体制之后才会培养起来。那些在一开始就具备了这些特征的人在进入官僚体制之后，会很快在其职业生涯中迅速攀升。特征的形成和培养与官僚控制的选择标准是相互加强的，于是到处盛行着奴性思维，到处都是奴仆关系。

## 7.5 讨价还价与内部冲突

领导在行动过程中始终受到相互矛盾的动机的困扰，他背负着太多的价值冲突。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

假设一位领导认为他接到了一个错误的指令，出于对党的忠诚或职业荣誉，他是应该坚决执行，还是提出抗议？领导人发现某项计划任务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但如果他一声不吭地接受了任务，那么结果就是他和他的同事们就拿不到奖金，甚至会被贯以“蓄意破坏”的罪名。他也想过平静的生活。反对可能会破坏他平静的生活，但不反对也可能让他麻烦不断。

面对这种相互冲突的局面，领导人究竟会怎么做还取决于他/她的个人品

---

① 苏联作家 A. Bek（1971，第 76 页）曾写过一部名为《新的任命》的小说，书中描写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一位工业战线的领导人。作者是这样形容经济干部的：“他们身上被深深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士兵的最高美德已经内化在他们的血液中：不许怀疑，坚决执行命令。”

也可参见 G. Kh. 波波夫（1987a），他研究了这种态度的根源所在，苏联作家将之称为行政命令体制。

格。此外,领导人具体所处的体制环境(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容忍反对意见(行为)也会对他/她的选择具有很大影响。不管什么情况,我们会发现典型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就是缓和这些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冲突。

行为模式之一是纵向的讨价还价("纵向"有别于市场的"横向"讨价还价,即买方与卖方之间的讨价还价)。[①] 为此,我们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一位部门主管将其所辖企业的年度计划分解为生产、物资分配和人力安排。在这一过程中,部门主管将扮演分配者的角色,而企业管理层将提出建议,要求一定的资源。为此,部门主管需要了解企业生产能力以及投入—产出关系的有关信息。在理想状态下,企业将向上级主管领导准确汇报有关信息,然后主管领导会客观地分配任务,让每家企业既能干得了,又能干得好,同时尽量节省材料和劳动。但事实上,企业领导并不是这样汇报情况的。企业的领导想的是任务越轻松越好,物资和人力供给则是越多越好。这样就可以使冲突降到最低,将拿不到奖金的风险最小化,或者避免因完不成计划而受到惩罚。这些利益动机将促使企业故意歪曲信息,低估自己的生产能力,报高投入需求。在第一轮的计划起草过程中,就会出现讨价还价:先是抱怨,然后会要求党组织和更高机关进行干预;企业会努力争取更轻松(或更少)的计划任务,即产出量相对要小,投入品供应相对要多。此时,企业领导人和他的同事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同事们也鼓励企业领导人这样做:一个好老板就是要争取更轻松的计划任务。

但经验丰富的部门主管在起草计划时对这种倾向早已心知肚明。因此,在分解计划的第一阶段他们就会提出更高的计划任务要求,通常要比他们心中认为实际可行的计划高出0—20%左右,因为他们也知道企业肯定会要求降低任务。另一个办法是上级主管事先把企业的计划任务设定在去年的产量水平以上。例如,如果一家企业的产量从40个单位提高到了去年的50个单位,那么今年的任务至少应该是50个单位。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

① 在达尔(R. A. Dahl)和林德布罗姆(C. E. Lindblom,1953)的经典著作中,讨价还价是协调的基本形式之一,并独立于其他基本形式(如价格机制、官僚科层机制等)。这种分类(包括本书中的分类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把讨价还价作为几种主要协调类型的附带现象,而不是把它作为独立的协调机制,这似乎更为妥当。纵向协调涉及到上级与下级之间的讨价还价,而横向的讨价还价则发生在组织内部的同一层次上。

划术语里被叫做“计划到能够完成的任务的基线”。[1] 西方文献[2]中使用了“棘轮效应”一词，来对应另外一种现象，即不断给只能向前而无法后退的齿轮加大计划任务。

任何高明的武器都会引出与之针锋相对的好办法。当上级组织“计划到能够完成的任务的基线”时，企业便采取了“将业绩固定”来应对。即使一家企业完全有能力超额完成计划任务，它也不会这么做，因为到下一年计划任务就必然会抬升至它的最高产量。因此，最优的计划完成量就是100%，或者是101%、102%。于是，计划就变成了自我完成的计划。综合而言，完成计划的秘密之一恰恰就在这1—2%。

部门主管在讨价还价中的行为往往是相互矛盾，就像那个有着两副面孔的门神。在“向下”关系上，他/她希望迫使企业能多生产，少投入。但在与自己的上级（部委）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他/她是下级。此时，他/她所处的地位与自己的下属企业也就没有区别了。部门主管会尽力对上级部委隐瞒自己的实力，他/她也要发发牢骚，争取更低的产量目标和更多的投入品。如果部门主管真的想这么做的话，那他/她和自己下属的企业就成为了天然的盟友，因为摘录的数字和汇报材料都来自企业。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部门主管在和下属企业讨价还价时就不会针锋相对了。于是这个过程到最后就演变成了采取技术手段来扭曲向最高层传达的信息，目标是低估生产能力，始终保持业绩不变。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总结出一般规律。讨价还价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三个层次（首先是部门主管与下属企业之间的联系，然后还有部门主管与上级部委之间的联系）。在官僚体制中，任何一层的上下级之间都会出现类似的讨价还价过程。这里选出的例子主要谈到了年度生产计划和相应的投入品配额。但可以推而广之的是，只要有上级机构期待从下级机构那里获得些什么，同时又必须向下级提供些什么，在这一决策过程

---

① 我在1959年自己所写的书[1957]中第一次描述了计划中的讨价还价过程。西方研究者也在同时独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特别需要强调的是J. Berliner(1957)的研究。

② 见J. Berliner(1957)、J. R. Thornton(1978)、M. L. Weitzman(1980)、M. Keren、J. Miller和J. R. Thornton(1983)、X. Freixas、R. Guesneerie和J. Tirole(1985)。

中必然都会出现类似的讨价还价。[1]

讨价还价的实际结果将主要取决于上级和下级之间的权力关系。体制越严格,就越具有"军事化"特征,讨价还价的风险也就越大,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讨价还价。否则,上级就更要迁就下级,[2]毕竟下级那里掌握着上级所需要的信息。如果下级在生产或销售上处于垄断地位,或者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产品使用者非常依赖下级的生产,那么下级就具有更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

让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看讨价还价的过程。在分解计划时,部门主管做出了分配决定:他/她将各种原料分配给下属生产企业,其中每一家企业都会针对原料分配展开竞争,它们将尽力争取在计划任务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原料。生产者的态度与市场上花钱买东西的人完全不同,他们都是在争夺免费的礼物。只要多余的投入品可以不用于完成更多的计划任务,那么分配到更多的投入品就会取得绝对优势。这好比在公地上放牧的农民,[3]他们知道公地不是自己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节省和维护土地。这种方式带来了资源管理的严重低效率并导致出现了过度需求现象[11,12]。

这就是资本主义大型公司内部官僚科层管理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控制整个社会的极权式官僚体制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在一家资本主义大型公司里,不论它内部有多少科层结构,公司却始终受到个人或集体所有者的约束,而没有所谓的官僚首脑。在公司最高层,总经理要对所有者负责,他/她的工作是好是坏直接影响到所有者的收入(变穷还是变富)。但在社会主义官僚体制下,每一位领导都有他/她的上级领导,没有真正的所有者,业绩的好坏与所有者的收入没有任何关系。作为国家领袖,他/她的动机显然是政治上的,而不是以"财产主人"的眼光去看待问题。

---

① 正式的计划讨价还价模型可参见 J. Hlavacek(1986,1990)、J. Hlavacek 和 D. Triska(1987)。作者引入了引入了"自我保护"一词来说明命令经济和计划讨价还价条件下生产者的行为特征。

② 见 R. W. Cmapbell(1978)。

③ 英格兰"公地悲剧"(公地变成了所有人的猎物)的历史可谓众所周知:公地被无限制地开发直到全部破坏殆尽。见 G. Harding(1968)和 T. C. Schelling(1978,第 110ff)。

## 7.6 计划、管理和政治

在资本主义体制里，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即商业世界）界限分明，尽管存在部分重合。然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里，两者之间没有区分，经济完全处于政治的笼罩之下。

正如我们在7.2部分曾提到，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都要得到最高政治当局的批准。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准备计划的早期就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它首先确定了基本框架，并在决定计划的主要趋向方面拥有最重要的发言权。所谓“计划法”，其本身就是一个表达党的总路线和经济政策的政治档案。在计划的制定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党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最后形成的计划往往反映了获胜者的立场（或者是胜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妥协）。①

政治事件并不总是与计划周期相吻合，很可能因为某一年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就需要对计划进行修改。特别是在实施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原来确定的计划目标往往会因为政治变化而过时。

上述关于计划所谈到的所有情况也都适用于计划的执行以及整个的经济管理工作，这些活动也都是政治的附属品。

我已经提到过大型资本主义公司内部官僚等级体制的领导人所处的位置与社会主义官僚机构的领导人所处的位置具有很大差别。在此仍有必要指出它们之间的另一个主要差别。尽管资本主义企业高层经理的活动也可能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但他们基本上都是以商业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他们始终面临着经济责任：他们必须提高公司现在和未来的利润水平、财富和“净价值”，他们必须改善公司的市场地位和商业前景。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任务只是共产党制定政策时所考虑的因素之一，经济上

---

① 有些关于计划制定的理论模型假设计划者都拥有清晰明确的偏好次序，并长时间保持不变，计划者将根据计划的具体实施情况来优化该计划。

事实上，计划决策（包括计划执行过程中所做出的修正）常常会随着现行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有时整个路线都会完全改变。事后的政治路线或多或少都会反映在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政治偏好的变化。当然，这也并不是全部事实，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现象完全不是当初政策制定者想要的东西。

的考虑往往要服从于其他国内和国外政策目标。不同的政治任务和经济目标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比重，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比重体系——领导层的偏好次序，“党的路线”——常常会发生变化，有时甚至会出现重大转折。

下面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一谈动机中的利益冲突问题。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经济目标之一就是强制增长[9]。最高领导层设计了严密的计划来强制实现生产的高速增长。① 不论是官方宣传，还是日常的管理和控制，党始终在努力实现数量目标。② 片面追求数量驱动不仅有来自上层的指示，而且一直受到产品使用者的鼓动。但数量驱动会带来很多有害影响，例如忽视产品质量，很少考虑扩大产品的种类等等。

这里有一个涉及动机冲突的生动例子。领导人把一半心思放在提高产量上，因为他/她知道这是自己主要的政治任务。但他还要留着另一半心思琢磨其他事情。他也要刻意保持产量不变（见关于讨价还价和“计划编制”的讨论）。当他不顾质量或没有采取措施节约投入时，他同时也损害了自己的专业荣誉。他也不能指望上级领导永远只关注产量而不管别的。如果有一天质量下降或成本提高，他也会遇到麻烦。所有这些都会让领导人心中产生一种不安全感。③

基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说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区分所谓的“政治家”、“官僚”、“技术专家”或“管理者”等社会角色没有什么意义。这些角色都是重合在一起的：党的总书记、整天忙着运输原材料的企业党委书记、监

---

① 关于严密的计划编制，可参见 H. Hunter(1961)和 M. Keren(1972)。

② 匈牙利“斯大林”式的独裁者马加什·拉科西在 1950 年曾这样说到：“一个严密的计划才是一个好的计划…… 一个好的计划只有掂着脚小心翼翼地走才能实现。”引自 I. Birta (1970，第 140 页)。

③ 这些利益冲突是导致无法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的部分原因之一。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见本书，第 60 页注释①）通常都假设所有者的目标是清晰和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建立一种鼓励代理人尽力实现委托人目标的激励机制。但这一假设对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上下级”关系是不成立的。

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类似问题的早期讨论可参见 M. L. Weitzman (1976)、J. P. Bonin (1976)、A. Bergson(1978b)、B. R. Holmstrom(1982a)以及 D. Conn(1979)等。最近的研究可参见 P. Liu(1986)和 K. Osband(1987)。

督新的生产单位开工的党委书记，如此等等。[1] 与此同时，企业或部委的领导人也要采取政治方式激励同事努力工作。如果某一领导想为自己的单位争取额外的资源，他/她需要说明这样做的政治理由何在，如果可能的话，去争取党组织的支持。作为一项"游戏规则"，纯粹的经济或技术理由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政治理由来加以补充，有时侯政治上的理由完全可能替代经济计算或技术原因。经济管理过程的"政治化"常常会导致信息扭曲（本章在开始部分就提到的信息扭曲问题）。

## 7.7 信息问题

前文中已多次提到过信息方面会出现什么问题，特别是信息扭曲的问题。但这里我们暂时忽略信息扭曲的问题，即使如此，官僚协调所需要的巨大信息量就足以导致非常严重的问题。先是要收集和整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然后再以这些信息为基础进行协调，将要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对于这么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任务，中央计划和集中管理是根本无法有效承担的。

在计划的准备阶段，呈递给更高层机关的只有一份计划建议书，没有其他可替代的不同计划，而且计划的编制者们总是力图表明这是唯一可行的计划，也是"不可避免"的计划。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计划编制要经过好几个层次上的妥协过程。这就仿佛是让计划者一步一步去求解一个由无数联立方程组组成的庞大系统。唯一的办法只有不断试错。即使有最强大的计算机，也只有采用迭代法才能解出大型的方程组系统（事实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所涉及到的问题是如此庞大，计算机也根本无能为力）。此外，编制计划的时间是有限的，在全部计划完成之前，必须采用人为方式分割校对。因此，这一计划必然处处

---

① 很难区分谁是企业的一把手：是党委书记还是厂长？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时期，大多数国家在多数时间里都没有把党委书记正式排在厂长之上，但实际上一把手还是党委书记。中国是个例外，它公开宣布党委书记是一把手。党委书记一职使他们成为了监督者和政治家，至于他们介入企业事务的程度，可以从叶利钦（1990，第 69 页）（他后来在 1990 年成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随后就脱离了共产党）下面的一番评论中看出一些眉目："当戈尔巴乔夫担任斯塔夫罗波尔州委第一书记的时候，我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党委第一书记…… 那时我们常常相互帮助，从乌拉尔可以得到矿石和木材，而斯塔夫罗波尔有粮食。"

隐藏着前后矛盾的地方。

这些错误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都会一一显现出来。这样,就不得不在实际执行中随时进行修正,有时候甚至要根据现实情况调整原先的计划。一旦修改了计划的某一部分,那么其他部分也必须做相应的变动,因为所有计划目标都是相互关联的。但事实上,根本没有时间或精力来完成这一系列的调整。

修改计划所面临的这些技术难题是导致人们反对官僚机构在遇到计划中不可预见的情况时做必要调整的原因之一。不仅在应付事先没有计划到的问题时,人们会强烈反对调整,即使是提出了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建议,很多人也都会不赞成对原先的计划进行修改。如果与最初制定的计划有冲突,那么就很难运用新发明或引入新产品。计划指导着执行者的行动,但同时也束缚了他们的手脚,这是导致经济制度僵化和无法灵活调整的根源之一。

如果任务过于复杂以至于根本无法操作,那么执行者唯一的选择就是自己将任务简单化。常用的办法就是强调主要任务。我们在7.2部分曾指出过,单是涉及国家层面的计划指针就数以万计,当总量指标往下分解后,数目还会继续增加。这样,在计划指标中就出现了"根据重要程度进行的排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产数量的总产值,以及最重要产品的产量(这种优先产品生产体制与前一部分提到的"数量驱动"是相对应的)。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里,还增加了强制出口任务。对于优先投资的工程,一般都要求它们必须按时完工,工程所需要的全部原料、零部件和机器也都要及时到位,必须严格执行工资基金的限制性规定,为完成优先任务计划建立激励机制(奖惩制度)。但与此同时,其他任务就很容易被放在次要的地位上,从而根本得不到重视。

调整排序往往无济于事。不管把什么列为重点,重点计划的顺利完成必然要以忽视其他任务为代价。从表面上看来,问题的关键不过是确保计划的完成和处理相关的信息问题。但实际上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只能带来片面的扭曲。

这也不仅仅是一个计划指标的问题。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里,进行管理的一般原则就是"要抓住主要关系"。[1] 要针对主要关系即最紧迫的重大

---

① 这个说法是列宁提出来的,斯大林和毛泽东都特别强调了这一原则。

任务开展工作。此时,包括政治动员、劝说、奖励,强制在内等各种手段都会采用。[①] 而其他任务则会退居次要地位,直到能够被提上议事日程("主要关系"),发动一场新的运动。

在"抓重点"任务的时候,往往是首先宣布这是主要关系,然后会发起一个运动,但这种方法会留下一定的"控制真空"地带。在官僚机构不愿意投入精力的地方,会出现一些自发的活动。如果国家管制不够严密的话,那么必须要有一系列的新的管制规定出台来封锁这些"漏洞"。于是,官僚体制的自我繁殖也就不可避免,而且这一过程会持续扩张下去。从行政机关人员和经费的增长,以及法规数量的增加中,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一趋势的扩张速度。虽然政府一再强调要减少计划和管理,但都徒劳无功。在官僚协调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条件下,官僚体制的自我繁殖总是会不断走向全面、综合和严密。

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关于计划和市场的著名辩论中曾强调过信息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所有经济体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如何利用社会成员所掌握的信息(用哈耶克的表述,是知识的运用问题)。如果满足了以下条件,那么就能够以分散化的方式来利用信息:私人企业可以不受阻碍地自由进入,这一过程应该得到资本市场和司法体制的帮助;充分保护私人财产和私人契约;大部分活动主要由市场来进行协调。那些使用信息的人会直接受益。让我们看一个私人企业家的例子:这位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了工厂面临着巨大的技术和市场机遇,如果他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机遇,那么他就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不仅是拥有工厂的老板可以利用信息谋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使用思想和知识中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获取信息、处理信息以及实际利用信息的激励机制,这三者不是相互分割的,而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这完全不同于中央计划。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统治者总是力图将分散在各个方向上的零散信息(知识)集中起来,而掌握在下级部门的信息必须"向上传递"。但掌握信息的人可能根本没有动力传递信息,也很可能仅仅因为懒惰就不愿意传递信息。有时侯,以扭曲的方式向上传递信息反而符

---

① 见 A. Nove(1969)和 K. A. Soos(1986)。

合他自己的利益(如前文所述)。如果任务需要以传递上来的信息为基础进行设计,那么就必须在利用信息之前建立起一套特别的激励机制。而这套激励机制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片面性,或者本身就会是一套扭曲的机制:我们已经举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了。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使用与激励机制是相互分割的,这就是官僚协调所固有的严重问题之一。

讨论至此,我们就回到了本章开头所提到的问题,社会主义思想先驱者们关于计划的观点。他们希望通过计划手段为整个社会创造出一个稳定的秩序。但计划却与直接官僚控制走到了一起,官僚体制掌管了计划,这构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组合:秩序与混乱,远见与短视,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服务与不受限制的部门利益。

马克思及其后继者认为计划将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事实证明那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或许纸上的计划是可行的,但在实际过程中,计划却充满了摩擦、功能紊乱、效率低下、内部冲突层出不穷。

# 第八章　货币与价格

“货币流通将逐步消亡，取代它的将是自然交换，也就是直接的产品分配。有此预见，人民财经委员会将致力于取消货币。”苏联计划办公室的领导人之一 N. 科瓦列夫斯基在 1926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①] 带着一种对战时共产主义革命年代的怀旧情绪，作者不乏感伤地总结到：“但我们就看不到这一天了。”

从正式特征来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货币化经济。但如果沿着本书的研究思路去分析一下正式框架背后的实际过程，那么就会发现在很多方面货币化不过是一种表象，因为货币在不少关系中只是发挥着非常微弱的作用，或者说处于次要地位。上一段开头引文所表达出的取消货币的想法至少已经实现了一部分。经典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半货币化体制。此外，与资本主义体制相比，价格的作用范围也相当狭窄，而且受到了很大限制。

本章 **8.1**、**8.2** 和 **8.3** 部分考察了金融体系和财政结构，在 **8.4** 和 **8.5** 中将介绍财政结构所涉及到的社会关系。剩下的部分主要讨论了价格问题。

第 11 章和第 12 章还会谈到财政金融和价格水平方面的微观经济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通货膨胀问题。

---

① 引文和相关内容均来自 L. Szamuely(1974，第 7 页)。

## 8.1 银行体系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整个银行体系都是国有的。从表面上看,银行体系包括不同的机构:中央银行和各类专业银行(投资银行,外贸银行,公众储蓄银行)。各类专业银行在名义上都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它们都受到中央银行的监督管理,它们是中央银行延伸着的"手臂"。这也就是为什么可以把这种银行体系称为单一银行制。①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银行(除了中央银行和其他特殊金融机构以外)都是追求商业利润的企业,与客户之间是一种市场关系。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即使在名义上银行也不需要有利润目标,它们构成了中央集权式官僚管理体制的一部分并享有一定的官方权威。整个银行体系相当于无所不在的官僚机构的分支,由中央银行负责管理,甚至没有名义上的独立自主权。国有银行是政治—经济领导部门(名义上是政府)的下属机构,必须服从上级领导的指示。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央银行也具有资本主义中央银行的一个主要日常职能:发行货币。它还发挥着资本主义体制下商业银行的功能:向国有部门提供全部的短期信贷(在一些国家里,还包括向合作社提供短期信贷)。每家国有企业都在中央银行里有一个账户。一家企业能够自己保留多少现金以及用这些钱从事哪些活动都有详细的规定。其他所有剩余的现金都必须存入企业在中央银行开设的账户里。企业存在银行里的钱不能像储户那样随意动用,这些钱要根据集中制定的安排次序用于各种开支。

这一账户被分为不同的"子账户",但子账户之间没有先进的自由流动。

---

① 列宁曾这样设想:"一个国家银行,巨大无比,每个村庄每个工厂都有它的分支机构,占到全部社会主义银行体系的十分之九。这将是一个全国性的大账簿,登记着全国范围内产品生产和分配的会计信息。"弗·伊·列宁[1918](1964,第106页)。

在走向双层银行体制之前,苏联的国家银行体系在1986年拥有406,300个职员。见N. V. Garetovskii(1989,第10页)。

关于银行体系的综述性研究可参见:苏联:G. Garvy(1977)和H. Sigg(1981);东欧G. Garvy(1966)、Y. M. Laulan等(1973)、T. M. Podolski(1973)和A. Zwass(1978);中国G. C. Chow(1985);更一般性的观点,可参见G. Grossman(1968)。

用于购买原料和半成品的钱不能用于发工资，发工资的钱不能用来买原料，如此类推。所有的钱都必须“专款专用”。

投资（固定资产积累）资金与其他资金（例如日常生产所需的原料投入品开支）实行严格分离。在一些国家和特定时期里，投资资金与其他用途的资金在中央银行就进行了分离，另外一些国家（或其他时期）则由投资银行专门负责投资资金的使用（这里所谓的“投资银行”，其实是中央银行专门负责管理投资的延伸机构）。

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货币基本没有发挥协调所有交易的功能，它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交换的一般工具”。国家发行的货币在国内是不能“兑换”的：“投资货币”不能转换为“原料货币”或“工资货币”，反之亦然，即使在国有部门内部也是这样。[①] 这种“内部的不可兑换性”使得经济活动更为僵化，并常常阻碍了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合理替代。

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之间的兑换就更为严格。所有的对外金融联系都由中央银行（或其延伸机构，外贸银行）集中管理。货币是不可兑换的，所有的兑换都受到严格管制并视具体情况个案处理。

下面我们再回到企业的银行账户，银行部门掌握着企业全部的货币交易情况。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所有社会体制里，从来没有过如此全面和集中的货币运动信息。但事实上，对于由官僚直接控制的经济体制而言，如此庞大的金融财务信息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是成千上百万的直接微观干预（规定生产任务，提高运输速度）。

在官僚直接控制体制下，官僚机构常常委托银行体系来监督企业存货。短期信贷不仅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基础，而且提供了一种对企业进行简单粗暴干预的手段。如果根据各种实证标准判定一家企业的存货已经过量，那么银行就会限制对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更为重要的是，银行会派出监督人员并向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汇报有关情况。这实际上是发挥着“存货监督警察”的功能。从市场协调和商业动机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银行纯粹在进行着官僚协调活动，与真正的银行业务没有任何关系。

单一银行体系的另一项工作是负责处理公众日常交易。公众只能把钱

---

① 见 W. Brus[1961](1972)，G. Grossman(1966)、J. Kornai(1980)和 M. Tardos(1981)。

存在这些银行里（如果他们还有钱的话）。为公众提供的银行服务是极为简单和落后的。公众除了保留现金以外，唯一的合法投资方式就是到银行储蓄。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时期，公民也可以要求处于垄断地位的储蓄银行提供房屋贷款和购买耐用消费品按揭贷款。但与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家庭信贷的规模几乎微不足道。

银行对储蓄支付利息并收取贷款利息。所有的利率都由中央统一制定，利率通常都很低，在某些国家和某些阶段，实际利率甚至为负。

## 8.2　国家预算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国家预算。[①] 表8.1比较了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和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预算结构。表8.2说明了苏联预算的一些特点。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里，国家预算中收入和支出类别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国家预算基本类似。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具体的类别，而在于相对规模的大小。下面我们就对主要类别逐一进行分析：

1. *行政开支*。这包括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开支水平远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

2. *军事开支*。[②]

3. *国家投资*。其中包括了非企业性质国有单位（预算单位）的投资支出，这与其他体制大致类似。更带有社会主义体制特征的是为国有企业投资提供融资支持。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依靠银行贷款和企业自身资金进行投资所占比例非常有限。对一家国有企业而言，它几乎所有的投资项目都是靠国家预算提供资金。[③]

---

① 这里的国家预算只指中央政府预算。与中央预算相比，地区政府预算的收入和开支规模都非常有限，而且它们的收入和开支也都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从这方面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体制比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更为集中。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预算问题更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 F. D. Holzman(1955)（税收问题）, R. Hutchings(1983)、L. Murakozy(1985,1989)。

② 这类分项开支往往无法反映真实比例，正如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会故意低估自己的军事开支。只有在进行改革并认为到必须缩减军事经费的时候，这些方面才会有更多的透明度。

③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时期，中国的国家投资在1968年至1978年间占到其国家预算总开支的33－46%。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5，第40页）。

**表 8.1 国家预算的规模与经济开支:国际比较(1981 年)**

| | 预算总开支(占 GDP 的百分比) | 预算中经济开支(占 GDP 的百分比) | 预算中经济开支(占预算总支的百分比) |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
| 保加利亚 | 47.0 | 22.2 | 47.2 |
| 中国 | 31.2 | 18.9 | 60.6 |
| 捷克斯洛伐克 | 53.1 | 22.8 | 42.9 |
| 匈牙利 | 63.2 | 26.9 | 42.6 |
| 波兰 | 53.2 | 32.5 | 61.1 |
| 罗马尼亚 | 43.5 | 22.2 | 51.0 |
| 苏联 | 47.1 | 25.8 | 54.8 |
| **高收入资本主义国家** | | | |
| 奥地利 | 33.6 | 2.8 | 8.3 |
| 丹麦 | 59.2 | 7.7 | 13.1 |
| 法国 | 46.4 | 4.6 | 9.9 |
| 瑞士 | 35.9 | 4.9 | 13.7 |
| 美国 | 34.8 | 3.5 | 10.1 |
| 西德 | 49.8 | 4.8 | 9.6 |
| **中低收入资本主义国家** | | | |
| 阿根廷 | 32.5 | 4.0 | 12.4 |
| 智利 | 29.5 | 3.4 | 11.5 |
| 希腊 | 41.5 | 6.9 | 16.7 |
| 印度 | 21.3 | 6.8 | 32.2 |
| 肯尼亚 | 29.2 | 8.6 | 29.6 |
| 巴拿马 | 34.7 | 4.7 | 13.6 |
| 突尼斯 | 33.6 | 11.2 | 33.3 |

**资料来源**:L. Murakozy 根据以下资料为本书编辑整理:国家预算:欧罗巴出版社,1980、1987 年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7)。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4,第 109－61 页)。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出:由 P. Mihalyi 以联合国统一数据库为基础整理而成。

注释:开支分类如下:(1)经济;(2)社会与文化;(3)国防;(4)行政支出。第 2、3 列仅包括经济开支,国家预算数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进行计算,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的资料是按国民统计体系进行计算的。捷克斯洛伐克:1980。

表 8.2 苏联的国家预算结构

| | 1984 | 1985 |
|---|---|---|
| | | 收入(所占的百分比) |
| 营业税 | 30.4 | 27.2 |
| 利润收入 | 31.9 | 29.4 |
| 公民纳税 | 8.4 | 7.6 |
| 社会保险 | 5.2 | 6.6 |
| 其他收入 | 24.1 | 29.2 |
| | | 开支(所占的百分比) |
| 经济支出 | 51.6 | 57.8 |
| 社会、文化和科技支出 | 35.9 | 31.8 |
| 国防 | 8.1 | 4.6 |
| 行政 | 0.9 | 0.8 |
| 其他支出 | 3.5 | 5.0 |

**资料来源**:莫斯科财政与统计(1985,第 54—55 页)。

预算还为合作社部门的投资提供了大量资金(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合作社基本上是“准国有企业”)。

资本主义国家预算中也提供部分投资资金,但占国家投资总额的比例非常低,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预算却为整个经济中的投资提供了很高比例资金支持。这也是确保投资过程高度集中的手段之一。

4. *企业补贴*。其中包括了提供给国有企业和合作社的所有免费供给、价格支持或负税收收益。这构成了很大一笔支出。

5. *消费品价格补贴*。只要国家制定的消费品价格低于实际成本,其中的差额都将由国家预算来弥补。可以把这种补贴看成是一种负的营业税。[①]

我们把 3、4、5 所涉及的开支统统纳入了表 8.1 的“经济支出”项目中。从表中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预算中,经济支出与其他开支的比例远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类比例。

---

① 在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之前的 1981 - 1985 年期间,苏联这两类补贴(4 和 5)的总额达到了预算开支的 18% 左右。见 G. Ofer(1990,第 39 页)。

6. 为免费的公共服务提供资金。这其中包含了教育、教育和文化服务、医疗卫生、儿童看护、养老金体系和社会保障[表13.7]。①

尽管从字面上看,部分支出项目对应着特定的收入项目(例如养老和社会保险收入),但实际上,收入和支出是完全分割开来的。为某一目的确定的收入和支出无法独立运作。例如,养老和社会保险收入是不同的税种,但公民对税率的决定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此外,官僚机构不仅决定了中央预算,而且它还有权决定向哪些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以及提供多少资金。在公共服务领域,官僚协调控制了一切活动,既没有市场协调,也不存在自律协调。②

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类别包括:

1. 国有企业产生的收入。其中包括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税和费[5.3]。上缴收入的基数和名目都是随意制定的,而且常常变化(例如比例的变化)。对企业的负税收(4所列出的补贴支出)和正税收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再分配网络,其中包含了许多"收入流动管道"。中央预算会以各种理由从企业那里"收钱",然后又以各种理由把钱送给它们。这就非常清楚了,企业在卖出产品并扣除成本之后所获得的收入根本不是企业自己的,如何支配完全要听从中央指示。

2. 合作社的税收。合作社的情况和国有企业基本类似。

3. 营业税。这是一项主要的收入来源,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它在国家预算收入中占很高比例。营业税包含在价格里,这样商品购买者甚至不知道每一次交易中他们到底交了多少税。③

4. 个人税。公民也要缴纳很多税(例如房产税)。某些阶层,例如个体户,还要交收入税。但与预算收入的其他来源相比,向公众直接征收的税收收入还是非常有限。

5. 预算借款。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向公众发行的债券,一般都通过

---

① 在有些国家里,部分公共服务(如儿童看护或医疗)并不是全部免费提供的,消费者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

② "不规范"的行为随处可见,最著名的就是医疗卫生领域里出现的各种违法或半非法的,被扭曲的市场行为。例如,为了得到特殊照顾或及时治疗,给医生"送红包"。

③ 1978年,中国的营业税收入占GDP的11.3%左右,而同期经济发展水平与之类似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有4%—5%。见M. I. Blejer和G. Szapary(1990,第457页)。

政治运动强迫公民购买,而并非提供了优惠的金融条件。这是一种行政性的强制储蓄,要与短缺所导致的强制储蓄区别开来[11.1,11.2 和 12.6]。

另外一种形式是中央银行直接为财政预算提供贷款。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相当于通过发行货币形成的通货膨胀来弥补预算赤字。这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时期,规模都相当庞大。① 但在公开出版的预算报告中,这种方式的预算收入通常都是隐藏不露的。

## 8.3 货币流动

表 8.3 可以让读者更容易了解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货币流动,在本章后面部分还会提到表中的有关内容。②

**表 8.3 货币持有人之间的货币流动**

| 货币流动的发行方 | 货币流动的接受方 | | | | |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 | 银行部门 | 国家预算 | 预算单位 | 国有企业 | 合作社 | 正规私人部门 | 非正规私人部门 | 家庭 |
| 1. 银行部门 | C | 0 | C,R | C,R | R | 0 | C,R | |
| 2. 国家预算 | S | B | B | B | 0 | 0 | 0 | |
| 3. 预算单位 | 0 | 0 | 0 | P | P | 0 | 0 | W |
| 4. 国有企业 | D,S | T,N | 0 | P | P | 0 | 0 | W |
| 5. 合作社 | D,S | T | 0 | P | P | 0 | 0 | W |
| 6. 正规私人部门 | D | T | 0 | P | P | P | P | W |
| 7. 非正规私人部门 | 0 | 0 | 0 | 0 | 0 | P | P | W |
| 8. 家庭 | D,S | T | 0 | P | P | P | P | |

注释:字母和数字所代表的意思如下:B = 优惠提供,C = 提供信贷,D = 银行账户中的存款,N = 支付净收入,P = 支付商品和服务,R = 从银行账户中取出的货币,S = 负债,T = 缴税,W = 支付工资,0 = 没有货币流动。

---

① 在出现长期预算赤字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提供的贷款通常都作为支出项目,但新贷款和旧贷款的偿还之间是正值,即预算的负债率不断在提高。这种净负债的增长正好弥补了预算赤字。

② 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货币流动模型,可参见 M. Augusztinovics(1965)、P. H. Dembinsk 和 W. Piaszczynski(1988)以及 P. H. Dembinski(1988)。

表中区分了八类不同的货币持有部门。[①] 表中的行代表了货币的发行方，即货币将从这些部门流向其他领域（表中的列所代表的接受方）。部分货币是在一个部门内部流动的，即在本部门的各个单位之间流动。另外一部分货币的流动发生在不同部门之间（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不同部门的单位之间流动）。

表中只列出了本国货币在国内的流动情况。这里忽略了本外币之间的跨国流动和兑换。[②]

表 8.3 包括了全部国内货币流动。但是也有些产品（和服务）的流动并没有伴随着相应的货币流动，这些也都没有在表中列出。例如，非企业预算单位（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合作社都为职工个人提供了免费的福利，但并不要求职工提供相应的服务。[③] 非正规私人部门中在互惠基础上进行产品和服务的直接交换，或者个人（组织）出于利他目的向他人（组织）赠送产品和服务。尽管这些非货币交换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④]，但就总的数量而言，它们还是远远少于名义货币交换。

## 8.4 软预算约束与硬预算约束

在考察了金融体系、货币流动结构以及运行的原则和实际程序之后，下面我们将分析研究金融领域所涉及到的真实社会关系。如果读者对“软预

---

① 这里所谓的“货币持有者”是指名义上的货币持有人。对于货币持有人到底享有什么样的财产权，读者可以根据表中的分类进行研究。

② 为了便于研究，我们还进行了其他一些简化工作。例如，没有考察银行部门内部的货币流动，这基本上属于技术操作，而与本书的主题关系不大。涉及利息支付方面的货币流动也没有列出。一小部分非企业国家预算单位也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但数量相对很小，因此，也没有特别列出。

③ 国家预算主要是向非企业预算单位（事业单位）提供财政资金，然后由这些单位向公众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或支付现金。例如，国家预算提供公共教育资金，免费向公众提供教育。这类货币流动在 2.3 中列出。国家预算直接向公众提供的免费资助的总额很小，因此，在 2.8 中以 0 值表示。

④ 本章在一开始就曾提出过经典社会主义是一个半货币化经济，但这并不是指这类非货币化交换。在下面两部分中我们将介绍那些名义上的货币化交易，但其中货币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所谓“半货币化体制”主要是指这类交易。

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这两个概念很熟悉的话，那么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这方面的有关情况。[①] 下面，让我从国有企业开始谈起。

“预算约束”的概念与有关家庭的微观经济理论类似：决策者的收入总量约束着消费者的支出选择。现在我们将这一概念引入社会主义企业。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如果一家国有企业的支出超过了它的预算约束，那么将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而非个别现象），那么结果又会是什么呢？从观察中我们会发现，约束将根据不断出现的超支来调整。企业会经常得到外部帮助，主要包括以下四种主要形式：

1. 软补贴。“软”这个词意味着在长期内国家补贴没有一个明确规定的数量。补贴的数量将取决于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里以及以后讨论到预算软约束时，我们会反复提到纵向讨价还价这一现象[7.5]。一家企业（或者是代表很多企业的主管部门，或者是代表很多主管部门的部委）在讨价还价中都会要求更多的补贴来弥补它（它们）的过度支出。讨价还价的过程有时在补贴数额确定之前进行，有时在数额确定以后进行；或者在补贴期内进行，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了已经确定的补贴数额[②]。

2. 软税收。“软”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企业应上缴的净收入（“税”）很少，而是指上缴的数额可以在事前和/或事中进行讨价还价。通过施加压力或请求将企业应上缴的“税”打压得越低，税也就越“软”。当税是“软”的时候，应上缴预算的净收入就不可能根据统一稳定的原则来确定。最后只能是一家一家地进行个别处理，相当于要对每一家企业或主管部门“量体裁衣”，确定它们各自的利润和税收。

3. 软信贷。一方面，这里所谓的“软”是指与银行签订的信贷合同并不需

---

① 我本人首先引入了这一概念，见科尔奈（1980，1986a）。S. Gomulka（1985）区分了预算软约束和预算的灵活性。如果一家企业只是期望会有财务帮助（预算的灵活性比价格的灵活性小），那么它对相对价格的变化就很敏感。如果企业确信预算将立刻进行调整（预算的灵活性比价格的灵活性更高），那么它对相对价格的变化就不敏感。参与讨论的还包括 K. A. Soos（1984）、J. Szabo（1985）和 J. Winiecki（1991）。

关于预算软约束问题的正式模型可参见以下文章：M. Dewatriponthe 和 E. Maskin（1990）、S. M. Goldfeld 和 R. E. Quandt（1988）、J. Kornai 和 J. W. Weibull（1983）、A. Lindbeck 和 J. W. Weibull（1987）、J. Mitchell（1989）、Y. Qian（1986）以及 M. E. Schaffer（1989）。

② J. Szabo（1985）着重区分了事前的和持续（同时或随后）的预算约束软化过程。这里只是简单介绍了这两种现象。

要遵守统一的原则,陷入困境的企业还可以继续向银行申请贷款,这实际上隐含着免费赠款的意思。从另一方面来看,"软"意味着银行并不会严格要求企业履行贷款合同,按期偿还贷款。合同的履行变成了讨价还价的过程。

4. 软价格管制。关于价格的制定,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再进行重点研究,但这里我想特别指出一点:在经典社会主义经济里,大部分价格都是由官方制定的。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官僚机构向企业下达"价格命令",但实际上企业通过与价格当局的纵向讨价还价,也可以将价格管制"变软"。首先有事前的讨价还价:企业、主管部门或部委的目标是让价格制定部门"了解"价格中的成本(不管生产效率有多低),然后也包括事中的讨价还价。如果成本又有增加,那么就要提高价格,有时候还会有隐蔽的价格上涨。当价格被固定之后,不难想像多半会带来质量降低和偷工减料的现象。

上述四种"软"手段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相互结合使用,完全可以在不同的官僚机构中进行"活动":直接负责控制企业的部委、财政部门、银行部门和价格当局。①

下面我们将对以上内容做一些补充性说明。

当然,任何静态分析都只能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这里是预算软约束)提供一个高度简单化的解释。在此,我们只描述了静态选择的问题,但实际上,预算软约束问题显然是一个涉及到收入流动和支出流动的动态过程。

在讨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时,不能把特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也不便于用以下方式提问:这家企业的约束是软的还是硬的? 预算软约束这一概念是指一大批企业的集体现象,即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提高利润能力而言,②国有企业对未来的预期是什

---

① 这种"活动"是指到各个机关中跑关系,找熟人。预算软约束产生了克鲁格(A. O. Krueger)所说的"寻租行为"。尽管寻租也要花费成本,而且费时费力,但肯定是有利可图的。多花一点时间站在"权力机构的走廊上"要远好于呆在车间或销售办公室。见 C. Scott(1990)。

S. M. Goldfeld 和 R. E. Quandt(1988)用数学模型证明了软预算约束会诱使企业将更多的精力花在讨价还价和争取补贴上,这就会分散他们花在提高生产和销售方面的时间和精力。

② 这里把所有国有企业作为一种集体现象仅仅是为了将问题简化。实际上,这种集体现象并非完全是铁板一块,其中也会有不同的情况出现。例如,比起那些相对次要的部门而言,受到中央高度重视的企业享有更大的预算软约束(C. Davis,1987);与小企业相比,大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也更严重。

么？在给定的概率分布条件下，是否能得到外部扶持是一个随机变量，对此企业决策者（和他/她的上级领导）都有一个主观上的“认识和判断”。主观概率越大，企业就越坚信自己能够获得外部扶持，这样预算约束也就越软。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官僚机构不会容忍长期亏损，因此，它会要求企业必须严格遵守预算约束。预算是软还是硬主要要看官僚机构能否做到“言必行，行必果”。[①]

关于“软”预算约束的问题我们暂时就介绍到这里。实际上，所谓软硬也有一个衡量尺度，从最软的一端到最硬的一端中间还存在着无数的过渡状态。

“预算硬约束”与“利润最大化”密切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决策者的目标或内在动机：他/她希望获得什么？而预算软约束或预算硬约束是指企业的外部条件：外部环境的容忍度。尽管内部动机和外部条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在抽象层次上还是应该将两者区分开来。在社会中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能否认识到，如果一旦持续亏损并出现财务困难，那么它就将面临失败并不得不退出？[②] 外部环境能否接受这一点，而不是去救助这些失败者呢？存在预算软约束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取决于市场，而是取决于官僚协调和与有关当局在财务问题上的讨价还价。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预算软约束这一现象，下面让我用一个家庭作个模拟。这个家庭有五层家长关系。我先从最高的第四层开始：父母照料孩子，孩子消极地接受所有东西。在这一层关系上，孩子是刚刚出生，他/她还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无法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愿。紧着是第三层关系，父母照料孩子，但孩子已经能够表达出自己想要什么。在第二层，孩子已经

---

① 缺乏可信的承诺是预算软约束综合症博弈论模型中的一个关键组成要素。可参见以下研究 M. Dewatripont 和 E. Maskin(1990)、A. Lindbeck 和 J. W. Weibull(1987)、M. E. Schaffer(1989)，以及 Y. Qian(1986,1988)。

② P. Wiles(1962，第 20 页)曾这样描述资本主义企业：“也许它们并不像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去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它们肯定要避免亏损，因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亏损者必须退出。”

上学并从父母那里获得了可以自由支配的零花钱,但还是要完全依赖父母生活,因为他们自己不挣钱。第一层关系里的孩子已经成人并能够养活自己。但此时父母还活着,如果孩子遇到困难,他们仍然会出手相助,而且孩子也知道他们还可以依靠父母的帮助。最后是零层关系,父母已经不在人世,孩子也已成人,而且他/她知道只能依靠自己。

我们可结合这五层关系来分析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第四层次是一种极端情况,在那种关系下,企业甚至什么都不敢说。讨价还价至少会在第三层次上就出现(而且会非常普遍),然后部分延伸到第二或第一层次上。尽管上级机关还是把企业当婴儿看待并照料它们的一切,但此时企业已经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并竭力要求提供"更好的东西"和"更多的零花钱",也就是更多的资源和更软的预算约束。企业也知道来自父母的控制可能是一种负担而且常常有损自己的尊严,但它明白父母同时也提供了安全保障。一旦企业陷入困境,上级机关不会袖手旁观,让它破产倒闭。

预算软约束只是父爱主义(家长制作风)的表现形式之一,父爱主义是上级与下级之间、上级机关与企业管理层之间一种典型的社会关系。预算软约束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上级领导机关无法严格执行财务纪律,或者税务部门、银行、价格当局过于慷慨。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根源于经典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具有普遍的规律性。

本部分到现在为止只讨论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下面让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社会部门的情况。

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基本也适用于合作社,换句话说,合作社的预算约束同样是软的,只不过程度比国有企业稍低一些而已。

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的预算约束都是非常硬的。官僚机构总是限制或干扰它们的活动,自然就不会对它们有父爱倾向,更不会在它们出现财务困难的时候给予援助和支持。从这方面来看,私人经济完全要依靠自己。

家庭的预算约束也是硬的。他们的购买活动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例如,很多想要购买的商品都买不到[11,12]。但家庭的情况与企业完全不同:企业主要是想获得所需要的产品,它们总是能采取各种办法弄到钱。而对于家庭而言,根本没有买东西的钱是真正的硬约束。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只要不是官僚化的公有制部门,它们的预算约

束就都是硬的。

## 8.5　收入与价格反应

在讨论了预算软约束和预算硬约束之后，我们接下来研究一个范围更大的问题。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不同经济决策者如何对各自的收入及价格做出反应？

首先还是从国有企业开始。按照官方经济原则的正式规定，国有企业也要根据收入水平来安排支出，也要追求利润。[①] 这也是国有企业与由单独依靠预算资金支持的非企业预算单位（事业单位）的重要区别。但在实际中，这项原则根本无法落实。

企业完全依赖于上级机构。事实上，上级机关以各种方式向企业传达了哪些原则和指示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哪些原则和指示并不重要。数量目标是最重要的计划指标[7.7]。完成了数量目标，企业就能够得到奖金、表扬和提升。完不成数量目标，企业就会遭到上级的批评、拿不到奖金，甚至受到惩罚。此外，企业还需要按时完成某些投资任务，遵守工资纪律并实现出口任务[9.2,10.3,14.2]。

降低主要成本和实现一定的利润水平也是计划任务的一部分，但并没有被要求强制执行。事实上，各种软化预算约束的方法使企业完全能够弥补成本过高和"利润原则"之间的差距，这样就能够隐瞒亏损。如果一家企业创造了很多的利润，那么不仅这些利润要被拿走，而且还会下达更高的利润指标。这与我们在前面章节中讨论的有关数量目标计划任务的下达情况基本类似[7.5]。当然，企业领导人以及上级机关也并非对生产成本和利润漠不关心。[②] 毕竟，降低成本和实现利润也符合一般原则和计划要求。更确

---

① 这一原则在苏联被称为"经济独立核算"。在苏联的经典社会主义教科书里，经济独立核算是这样定义的：经济核算是社会主义企业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计划管理的方法，它要求采取货币标值的形式比较支出和生产，企业要根据自己的收入确定支出并保证生产的创利能力。

② 如果他们一点都不在乎成本和利润，那么他们也就没有必要花工夫去软化预算约束。即使如此，他们还需要采取某些形式，利用某些资源来隐瞒亏损。

切的说法是，企业在面对着其他更强大的利益动机事，对成本、利润和收入的反应非常弱。

这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后果，下面我们仅举其中几个例子加以说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国有企业对价格的反应非常弱。例如，如果有两个可以完全替代的投入品，其中一个投入品比另外一个投入品便宜，那么国有企业在选择投入品组合时根本不会关注这个变化。

让我们看一下企业的投入品需求曲线。在预算硬约束的条件下，需求曲线通常是向下倾斜的。预算约束越软，需求曲线越陡，如果预算约束完全变软，那么需求曲线就会变成一条垂线：需求对价格没有任何反应。这里请不要产生如下误解：企业对某些价格的反应弹性较低。预算软约束使企业对所有价格的反应都变得迟钝。企业确信一定能够获得外部援助，这就像是一剂安眠药，大大降低了企业反应的灵敏度。

对价格反应弱是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预算软约束不仅是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影响着企业的效率。预算硬约束、强烈的利润动机（以及下一部分将讨论到的合理的价格体系）将促使企业从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采用最合适的技术。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企业的推动力将大大减弱。[①] 即使生产成本要高于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即使使用落后的技术，即使产品根本不符合购买者的需要，企业领导人还是相信企业能够继续生存。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不是购买产品的人是否满意，而是要获得上级机关的支持，在企业陷入困境的时候可以得到外部支持。

预算软约束是导致国有企业投入品需求不断上涨，甚至失去控制的主要原因之一[9.2,11,12]。

一家企业在购买投入品之前必须考虑很多因素（为简化起见，这里投入品以某种原材料来替代）。年度计划的配额中允许购买这种原材料吗？负责原材料分配的管理部门有没有将这种原材料分配给了企业？原材料的供货商是否还有这种原材料，是否愿意提供或者是要优先提供给其他企业？但企业却没有必要考虑原材料的价格、是否有足够的钱购买这些原材料或

---

① 参见 S. Gomulka(1986)、S. Gomulka 和 J. Rostowski(1988)、P. Desai(1986a,1987b,1987)等人的文章。

者未来的收入能否弥补原材料的成本。只要能够把原材料弄到手，买材料的钱总有办法筹集到。

以上所有有关国有企业的描述都适用于合作社。[①]

这些微观行为所产生的微观经济效果是，货币在官僚化公有制企业中扮演着极为消极的角色。[②] 在一般情况下，是根据经济决策者的财务手段（手中掌握的现金、贷款以及能够获得的货币总量）在实际操作中做出调整，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形：手中的现金、信贷和能够获得的货币总量要根据经济决策者的实际行动进行调整。如果要调整经济政策，基本都会采取直接官僚控制的各种手段来完成[7.3]（调整产量目标和投入品配额，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等等）。如果企业或部门的信贷需求和利润水平出现下降或上升的情况，那么就要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12.5]。

直接官僚控制的手段还包括计划指令、产量任务和投入配额的产值目标。如果无法采用物理单位（大的总量指标只能用产值来标明），那只好用价格来进行计算和汇总。因此，对国有企业进行官僚控制和干预时也用到货币，但这里要与市场协调中的货币功能严格区分开来。货币、利润和价格是市场协调中的主要演员，而在官僚协调中，它们只是毫不起眼的配角。[③]

现在我们可以对本章开始提出的“经典社会主义是一个半货币化体制”这一论点进行一下总结。在表8.3的4.1、4.2、4.4和4.5中，货币并没有发挥一般交换媒介的作用；在5.1、5.2、5.4或5.5中（官僚化公有制国有部门即国有企业和合作社内部之间的金融交易、国家预算和银行部门），货币发挥着消极的作用，处于补充和次要的地位。

---

①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就不再讨论预算单位的情况了。它们有自己的独立特征，但不影响我们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② 这一提法首先出现在 W. Brus[1961](1972)和 G. Grossman(1966)的著作里。

③ 有人曾争辩说，货币在衡量生产总量方面所发挥的功能就有力地表明了货币的积极作用。K. A. Soos(1986)就引述了这种观点。

赞成或反对这种观点关键在于是否同意这样一个术语解释——货币的“积极和消极”。所有货币都发挥着货币的功能，还是货币只有通过市场协调中的价格—收益—成本—利润机制才能主动发挥货币的功能？本书采纳了第二种观点，当然也不否认货币在价值总量计算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影响着经济活动。

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其他部门,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说明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以及家庭都面临着预算硬约束。前面谈到的关于公有制部门的所有倾向在这些部门都表现出了相反的结果:

◆ 私人企业和家庭对价格和收入的反映非常强,它们的购买决策主要受到当前和未来预期收入的影响,以及它们想要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的影响。在此,货币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 私人部门的生产者面临着预算硬约束,因此必须提高生产效率,而且他们具有很强的动机增加利润。

◆ 私人企业和家庭的需求面临着可获得收入和财富的硬约束。

简单地说,可以从财务角度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分为两个主要领域:预算软约束 + 消极的货币;预算硬约束 + 积极的货币。

## 8.6 生产者的行政价格管理

下一个问题是价格决定。我们将根据谁是卖方和谁是买方来分别研究各种不同交易中所采用的价格。

首先分析公有制部门的内部价格,也就是说,在这一领域中,买方和卖方都属于公有制部门(表 8.3 中 4.1、4.2、4.4 和 4.5 所使用的价格)。一般把这类价格称为"生产者价格",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这些都是"行政性价格"。① 这些价格都是纵向官僚协调的产物,而不是横向市场协调中买卖双方自由协议所产生的价格。集中制定价格,经济处于落后状态,但生产的日益多样化使这种方式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于是,价格就完全被庞大而多层的官僚机构掌控。②

经济理论已经明确表明,需求、供给、产出、质量和价格都是不可分割。

---

① 严格地说,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内部所有生产工具的销售价格都是一种"生产者价格"[8.8]。

② 实际的组织形式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从正式规定上看,最高机构(中央价格办公室)是一个部级单位。在更低层次上(部内主管机构和地方价格主管机构)是双重监督体制下的独立价格部门(即包括各部的价格主管部门或地方价格主管部门,也包括中央价格当局)。

理论模型证明价格和数量是同时决定的。① 尽管这样,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这两者还是在实际中被完全分割开来:数量和价格完全由不同的官僚机构负责。他们只关心家庭消费品(服务)购买过程中的价格和数量关系(下一部分将讨论这一问题),而在企业内部交易中,价格和数量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受关注。

从表面上看,生产者每一个产品的价格都是由官方制定的,但实际上价格当局根本无法清楚了解所有产品的信息。因此,价格当局在制定价格时必须依靠生产企业或它们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企业的监督管理)来提供有关计算信息。这就意味着,价格当局实际上只是制定了一个伪行政价格,而非真正的行政价格,因为他们不过是批准了生产者自己设定的价格而已。这种价格也不是通过横向市场协调产生的,它们都是纵向官僚体制讨价还价的产物。②

价格当局必须依据官方确定的原则来制定价格,其中最重要的几条包括:③

A. 价格必须反映社会必要成本。官方借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达这一原则。④ 但这一原则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却变成了西方商业和经济活动中的"成本—加成"原则。价格必须包含实际的成本、企业的正常利润和其他应当上缴预算的净收入。

当运用这一原则时,价格制定者会遇到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 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价格的计算是以平均成本为基础。这样就会有一大批低于平均水平的生产企业成为亏损企业(尽管必须满足这些产品的需求)。(单单这一个原因就足以导致预算软约束)。

◆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土地和资本的使用不能计入"成

---

① 即所谓的"不动点模型"(例如,H. Scarf[1973])和各种便于实际计算的简化版本即"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可参见 K. Dervis,J. de Melo 和 S. Robinson(1982)。

② 如果其他价格都下降了,那么生产者实际上就在进行隐性涨价[8.4]。如果生产者认为官方制定的价格过低,那么它就会适度降低产量。

③ G. Grossmanye(1977b)也列出过几条类似的标准。

④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价格应该且只应该反映社会必要成本。但由于缺少竞争,因此,无法促进效率的提高,这样也就没有办法知道生产者有没有在产品中投入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在实践中,马克思的这一原则被平均成本所取代。

本”，地租和利息也不能计算在内。①

◆ 与其他要素的价格相比，名义工资的水平非常之低，极不合理。

◆ 进口成本没有在成本计算中充分反映出来，因为国内进口品的价格与进口的实际成本是相互分离的，汇率的确定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这些扭曲本身就使得原则 A 无法在实际中加以落实。

B. 价格应该成为经济管理部门促使生产者完成特定任务的工具。例如，某些现代化农业生产工具（化肥，农用机械）必须维持很低的价格，目的是为了鼓励推广现代技术。

尽管官方在陈述价格政策时不愿意采用与市场机制有关的表达方式，但经济管理部门毕竟还是想根据自己的偏好，通过价格来影响生产者的需求和供给。但这种愿望彻底落空了。正如前文所述，公有制企业对价格根本不敏感。

由于可以使供给、需求和价格相互调整的市场机制在此完全失效，原则 B 必然会与原则 A 发生矛盾。人为制定的低价格是对生产的长期补贴。而从相反的一面看，那就意味着在提高了价格之后，为了拿走企业额外增加的净收入，就要征收特别税或者提高企业应上缴的利润。

C. 价格应该稳定。为了维持个人收入的购买力水平和从技术层面有利于编制计划，需要有稳定的价格。经济管理部门对通货膨胀极为恐惧。② 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它甚至可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保持价格不变（在某些地区达到了十几年不变），③哪怕是导致极度僵化也在所不惜。很显然，这与原则 A 发生了严重冲突。价格长期不变必然使得价格无法与成本相适应，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复杂的补贴和税收体系来弥补价格长期稳定与成本不断变化之间出现的裂痕。

同时运用这三个原则来制定价格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后果之一我们已经反复提到：即必须创建与之相配套的复杂的财政再分配体系。④ 这样，社

---

① 即使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时期，利息实际上也计入了成本，但利率也都非常低。

② 不少国家的领导人（苏联、中国、东欧国家）对社会主义刚上台时的经济状况仍然记忆犹新，那时整个经济遭受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打击，在恢复稳定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③ 例如，东德的很多价格在 30 年内都没有任何变化。

④ 详细的介绍以及匈牙利的有关资料可参见雅·科尔奈和 A. Matits（1987，1990，第 54－98 页）。

会主义国家就发展出了一个严密的补贴网络,其中包括各种资助、额外征税以及不同形式的税收减免,分别体现在国家预算的收入科目和支出科目之中[8.2]。财政再分配既为预算约束的软化提供了手段,也是造成预算软约束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后果是:由于在经济管理中同时遵循几个相互矛盾的原则,其结果便是没有一个原则可以真正落实。在市场协调中,价格的功能之一就是以简明的形式传递有关资源和产品相对稀缺状况的信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价格体系根本无法传递这种信息。事实上,这种价格体系几乎传递不了任何有用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在各种价格制定原则之间的冲突过程中已消失殆尽。换句话说,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形成的相对价格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且是非理性的。

在价格体系中,成千上百万个价格都是相互关联的。只要其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价格是随意确定的,那么就会扭曲整个价格体系:随意确定产量价格会影响使用者的成本,而使用者的成本又会影响使用者产量的价格,如此类推。由于一部分价格被扭曲之后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此,这种随意性(任意确定)所产生的影响将被无限放大。

一方面是预算软约束和缺乏利润动机,另一方面是随意确定价格,这就会导致恶性循环。赢利能力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几乎毫不相干,这样,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都没有愿望和动力去努力争取合理的价格。如果大家都知道价格基本上都是随意制定的,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对价格做出反应,完全可以宣称之所以会亏损都是因为成本和销售价格的扭曲,因此,要求补偿也在情理之中。

人们无法以随意确定的价格为基础进行任何合理的计算。当决策者面对不同的投入(品)组合时(例如,不同的生产技术、投资或新产品),他根本不能依靠计算成本和利润来判断哪一种投入(品)组合更有效率。

更严重的后果还包括,价格体系不能够促成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均衡。这不是"市场出清价格",而且官方的价格指导原则也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实际上,内在的因果联系完全是反方向的:因为市场协调、供给之间,以及买方和卖方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强制排除在价格确定的过程之外,这样,价格的制定必然没有任何合理依据。即使官僚协调机制想获得合理的价格,

它也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其结果只能是随意确定的价格。[1]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价格的真正作用是为了实现总量指标而创造出一个衡量体系。从直接官僚控制的角度来看,如果所有的计划指针都能够用物理单位来衡量,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为了减少信息要求,总量指标也是不可或缺的。官僚协调也面临着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衡量不同质量的东西。如果必须进行衡量,那么只有使用价格。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就意味着采用了一种随意确定和非理性的价格体系,从而导致以价值形式来衡量的所有数量指标和每一个总量指标(产出、资本积累等等)的经济含义都是似是而非的。

## 8.7 消费品的行政价格管理

下面让我们转到消费品的价格问题,即由公有制部门生产、由家庭(表8.3中的8.4、8.5和8.6)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构成了消费品价格的主体。[2] 消费品价格同样是行政性管制价格:与大多数生产者价格的制定相比,消费品的价格受到更严格的集中控制,因为这更多地是一个政治问题。

除了称呼不同,上一部分所介绍的关于生产者价格制定的各种情况同样也适用与消费品价格。在制定消费品价格过程中,不仅要遵循**8.6**部分提出的那三项原则,而且又增加了两项新的原则:

D.消费品价格的确定必须能够按照国家经济管理当局的意愿来影响公众需求。

与第二个原则(通过价格来影响生产者的决策)不同的是:在原则B的执行过程中,由于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这一原则基本形同虚设;而家庭的预算约束都是硬的,家庭会对相对价格的反应最敏感,D是实际可行的原则。因此,消费品价格政策将对家庭产生重大影响。

在这里,需要进行争论的是该原则从伦理上看是否合理,而不是在实践

① 这一想法主要由兰格(O. Lange)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辩论中提出的,即价格当局应该制定出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

② 消费品价格也包括由私人部门生产,然后出售给家庭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我们在下一部分再进行讨论。

中是否有效。毫无疑问,这一原则是父爱主义的生动体现。国家的经济领导人相信他们比消费者自己更了解什么真正对消费者有利,他们要防止消费者自己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策,他们必须保护消费者。所有认为个人自主权和消费者主权至高无上的人都会反对这项原则。至少在一个尊重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价值体制中,这一原则几乎是不可能被接受的。[①]

E. 消费品价格的制定应用于实现收入再分配,因此,对奢侈品必须课以重税,借此提高它们的价格水平,而对于基本的生活用品和服务则要通过大量补贴来降低它们的价格。这一原则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绝大部分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和教育)都是免费提供的。在某些情况下,消费品价格也是一种"阶级政策",例如,把农村的收入通过再分配转移给城市。

可以说第五项原则在实践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它确实实现了收入的重新分配,但这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首先,收入再分配的目标在政治上和伦理上就值得争论,即使是那些赞同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人,对于是否应该采用价格手段(而不是收入手段)也充满怀疑。通过消费品价格政策来完成收入再分配很难准确"命中目标":那些不应得到收入再分配政策支持的人也享受了补贴;那些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也承受了很重的税负[13.6]。

下面的评论同时适用于原则 D 和原则 E。通过补贴人为降低消费品价格(在极端的情况下,几乎成了免费赠送)导致需求出现了极不合理的增长。供给跟不上,必然是长期的短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官方意识形态的承诺之一便是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4.3],这也是消费品价格政策(特别是原则 E)应该完成的目标。但事实恰恰有力地证明了在如此低水平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个承诺根本不可能实现。当局最想"便宜"的产品和服务往往成为人们始终感到最短缺的产品和服务。

原则 D 和原则 E 的贯彻实施加重了 **8.6** 部分提出的其他原则之间的矛盾冲突。消费品价格不仅没有与生产者价格相互偏离,反而还以各种方式反作用于生产者价格。首先,企业也要购买主要由家庭消费的产品,这样,它们也要受到消费品价格政策的影响。此外,消费品价格政策影响着名义

---

① 限制消费者购买毒品和武器的自由往往是合理的,但即使如此,对消费者主权的限制也必须通过一个有效的民主制度加以实施(如经自由选举而产生的议会)。

工资水平。由于工资中没有反应那些免费或进行大量补贴的消费品的真实社会成本，于是，与其他成本相比，劳动力就显得“便宜”得多。消费品价格政策所产生的反作用就使得我们在**8.6**部分提出的问题——价格的随意性和无法进行合理计算——变得愈加严重。

**表8.4 东德和西德的消费品相对价格比价(1989年)**

| 消费品 | 相对消费品价格（1公斤面粉为标底） | |
|---|---|---|
| | 东德 | 西德 |
| 1公斤牛肉(煮) | 4.39 | 8.04 |
| 1公斤牛肉(烤) | 7.42 | 14.26 |
| 1公斤猪排 | 6.06 | 9.02 |
| 1公斤马铃薯 | 0.13 | 0.85 |
| 1公斤黑面包 | 0.39 | 2.63 |
| 1公斤白面包 | 0.75 | 2.61 |
| 1公斤面粉 | 1.00 | 1.00 |
| 1公斤咖啡 | 53.03 | 7.23 |
| 1公斤牛奶 | 0.51 | 1.01 |
| 1公斤鸡蛋 | 0.26 | 0.20 |
| 1公斤黄油 | 7.27 | 7.03 |
| 1公斤干奶酪 | 5.45 | 10.02 |
| 1公斤糖 | 1.17 | 1.54 |
| 1千瓦电 | 0.06 | 0.25 |
| 1吨灰煤 | | |
| 配给价 | 1.29 | |
| 市场价 | 2.66 | 16.57 |
| 1张市内公共汽车票 | 0.15 | 1.69 |
| 1套女性内衣 | 10.60 | 4.23 |
| 1台洗衣机 | 1,742.42 | 791.13 |
| 1台冰箱 | 1,079.50 | 450.80 |
| 1台彩电 | 3,712.12 | 1,241.13 |
| 1封国内信件 | 0.15 | 0.80 |
| 1平方米新公寓租金 | 0.6-0.95 | 3.22-6.45 |
| 公共幼儿园1个孩子的开销 | 11.36 | 72.58 |

**资料来源**：Kruger根据以下资料整理：统计年鉴(柏林，东德)(1990，第309,311页)；统计年鉴(斯图加特，西德)(1990，第549页)；R. Gotz-Coenenberg(1990，第15页)。

国家的价格政策并不能保证消费品需求与国民经济计划中所规定的供给相一致。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进行调整的全部负担都落在了消费者身上。在市场协调机制下,市场上的价格和利润变化会自动提醒生产者关注供求之间的差异,从而迫使生产者做出相应的调整。但这一切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是不起作用的。消费者的偏好对生产者没有任何影响(或者说,影响根本微不足道)。

现在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表6.1中当公共部门作为卖方、家庭作为买方时我们会用“M(加上B的干预)”标出。商品和货币的交换是一种横向市场关系,市场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没有人知道买方到底想要什么,他/她是自愿决定进行市场交换关系的。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这种市场协调完全被官僚协调压制着,官方价格当局可以自己随意确定消费品价格(行政性价格)。

表8.4通过比较东德和西德的消费品价格进一步证明了上述观点。在东德,大部分价格都是行政性价格,当然也包括一些市场价格。社会主义价格体系的随意性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马铃薯是如此便宜,而黄油和女性内衣竟如此之贵,这其中的道理何在呢?!

## 8.8　市场价格

价格一定是以横向市场关系和买卖双方的同意为基础的,因此,也只会出现在卖方是非正规私人部门,买方是家庭(或正规、非正规私人部门)的领域内(表8.3中的6.7、7.7和8.7)。

由于一旦被发现从事了半非法和违法的生产、服务和贸易活动,销售者很可能会受到惩罚,那么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必然会有一个风险溢价,受到惩罚具有不确定性,只是一个概率事件。因此,风险加大是一旦受到惩罚所带来损失的预期价值。受到惩罚的概率越高,价格也就越高。

对于正规的私人部门,价格当局力图让得到官方许可的私人手工艺者和私人小商贩也遵守行政性价格。但在实践中却很难执行,[1]因为此时买卖

[1] 这是官僚机关限制正规私人部门的手段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表6.1里用“M(加B的干预)”来标明3.3和3.5。

双方的价格都是在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确定的。

一个比较特殊的中间市场是农产品自由市场。市场上的主要买方是家庭部门,而卖方则包括不同的社会部门:合作社,它们的部分产品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出售;[①]家庭农场;非农业部门的人,他们可以把自家花园和小块土地上种植的产品(水果、蔬菜,大米等)拿到市场上出售。[②] 此时,买卖双方都是以真正的市场价格完成交易的。一般而言,农产品自由市场上的价格要高出行政性价格,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公共部门供给不足以及行政性价格普遍偏低(达到了不合理的程度)。[③]

以后我将用平行市场这个词来统一指称合法的自由市场以及各类半合法和违法(灰色和黑色)的市场。

## 8.9 非价格信号

本章讨论到目前为止一再阐明,所有等级上的官僚机构,包括公有制企业的领导人,很少会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此外,除了真正的市场价格之外,我们在**8.8**部分所讨论的所有价格几乎无法传递任何有用的信息,因此,关注这些价格往往会一无所获。

所有的协调机制都需要有信息。尽管很可能会再次重复以前的内容,或者会提前说到以后章节仍将讨论的东西,但我还是想在这里简单(不求面面俱到)介绍一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流行的主要的非价格信号。[④]

1.计划信息交流。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上面的计划指令,当然也包括

---

① 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的合作社必须要为此交税(如果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的话),或者它们就将特定比例的产品以非常低的官方价格卖给国有商贸单位。有一部分产品是合作者自己进行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如种子),另一部分分给社员作为家庭消费以及用于社员家庭耕作。如果还有剩余的部分(在大部分时期剩余都很小或根本没有剩余),合作社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这部分产品。

② 在**5.6**部分,家庭农场被归到了正规私人部门,而那些不在农业部门、但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则属于非正规私人部门。

③ 例如,1988年罗马尼亚自由市场上的牛奶价格是行政性价格的220-230%,其他食品的比例通常为:鸡蛋—330%;马铃薯—320%;奶酪—180-220%。见P. Ronnas(1989,第554页)。

④ 参见R. P. Powell(1977)。

来自下面的计划建议、批评意见和汇报[7.2]。大部分交流都是纵向流动的，当然在计划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横向的交流：例如，部委之间的讨论、主管部门之间的讨论以及企业之间的讨论。

2. 其他直接来自官僚机构的信息。这主要包括经济管理框架内部的信息交流：向下传达的临时指令、提醒、禁令以及电话分析，同时也包括向上表达的建议、要求和抗议[7.3]。

3. 横向流动信息。尽管纵向交流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还是存在着经常性的横向信息流动。同一级别的官僚机构会相互通气，企业也进行直接沟通：订单确认或者相反的行动，对交货条件表达不满、催促信件、提出要求，等等。

4. 短缺和过剩信号。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会在第11章和第12章进行详细讨论。这里想要提前说明的是，尽管短缺和过剩都没有反映在价格变动中，但这两种现象还是可以观察到的。如果卖方的存货开始减少或已经完全用完（或者当定单数量远远超过通常的存货规模）时，那么这很可能就意味着相对于供给而言的需求的增加。同样，当人民开始排队购买某些商品的时候（以前是不用排队的），或者当队伍比以前更长时，这也都表明需求在增加。如果出现与上述情况相反的现象，那么就说明相对于供给，需求正在下降。①

这种形式的信息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就本质而言，这是分散化的信息：每一家企业和工厂都能够观察到它们自己的存货、订单以及排队等候购买自己产品的人群。

5. 灾害信号。在一般情况下，问题总是逐步累积，但通常只有当它们酿成大祸后才为人所知。有了洪水，才注意到以前忽略了防洪措施；出现撞机事件，才知道平时在飞机维护上存在问题，等等。尽管这种形式的信息代价沉重，但它也确实有效。

6. "声音"。赫希曼用这个词说明来自下面的建议、批评和抗议所发挥的重要作用[6.3]。事实上，这似乎只是上面1—5每一类信号传递方式的

---

① 在理论上可以证明，给定某些简单的假设条件之后，存货、订单和排队现象为社会主义体制提供充分的信息来控制基本的数量协调。见雅·科尔奈和 B. Martos 等(1981)，B. Martos (1990)，A. Simonovits(1981)。

组成要素之一,尽管主要限于官僚机构内部的信息回馈。但来自“最底层”的声音究竟能否发挥更多的作用取决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容忍度:公众的抱怨、低声发牢骚或者大声抗议,有吗?如果有,能起多大作用呢?

当某些经济变量达到了一个关键值(换句话说,达到了临界值),就会发出许多信号。在一些领域里,这些关键值是多少取决于惯例或习惯(如投入品存货的关键值),而在另外一些领域,经济活动者的容忍限度决定了关键值的大小(例如,真实工资降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就会引发公开的抗议行动)。[①]

对于不同的体制而言,不同类型的信息是如何流动的?3—6所描述的非价格信息流动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②] 人们对第2点介绍的信号类型也不陌生,一方面,不同的官僚部门之间就存在这种信息交流;另一方面,国家官僚机关的干预总是无处不在,它也要利用这种方式传递信息。但对于第1点所描述的信息流动方式,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只有在那些引入了国家经济计划的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出现,而且一般都非常零散。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详细研究了价格信息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内所发挥的作用。

换句话说,根本的差异并不在于价格信号只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发挥作用,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则只有非价格信号才起作用。问题的关键是,这两种体制对价格信号和非价格信号所赋予的地位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价格信号传递着最重要的有用信息;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非价格信号发挥着这种作用。

在很多方面,价格信号和非价格信号相互补充。但如果非价格信号取代了价格信号,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在存在私有产权和市场协调的情况下,价格信号会自动产生激励,而非价格信号只有通过间接方式才能产生

---

① I. Grosfeld(1989a)根据容忍限度,运用控制论数学模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她利用这一模型分析了投资的波动。

② 长期以来,理论经济学家一直忽视非价格信号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所发挥的作用。但最近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例如,A. Spence(1974)研究了教育在求职市场上的信号作用。最近的研究可参见J. J Laffont(1989)。

激励。价格和成本很容易进行相互比较，但对于不同的非价格信号，人们很难直接进行相互比较。这样，非价格信号所传递信息的重要性完全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判断。总而言之，非价格信号也能够保证协调机制的运行，但它们却不能使整个体制和谐运转，或者说无法保证这个体制有效运行。

# 第九章　投资与增长

第7章和第8章主要考察了对经济的短期控制，而对于中长期的问题只是顺便提及。本章将主要研究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中长期经济控制问题。

第1、2部分描述了参与者的动机和投资过程的制度框架，接下来主要探讨增长的结构及其动态变化。① 在各类研究文献中，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增长模式有很多不同的称呼：强制增长、跃进(rush)、追赶(haste)。② 在这里，我们想要说明的是：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强制增长所产生的社会成本是什么？

结尾部分列出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增长数字(见表9.10、9.11、9.12、9.13)，之后对增长表现进行了简单的总结性评价[9.7—9.9]。

---

① 关于增长的一般理论，见索洛(R. M. Solow)[1970](1988)。现代增长的历史研究，见E. F. Denison(1962,1967)、A. Gerschenkron(1962,1968)、S. Kuznets(1964,1971)。增长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应用，见A. Bergson和S. Kuznets等(1963)和A. Bergson(1974,1978a)。本章在接下来的内容里会涉及到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经验。

② 我自己发明了"跃进(rush)"这个词。"追赶(haste)"一词见M. Lewin[1968](1974)和G. Grossman(1983)。G. Ofer把它作为"强制增长"的同义词。

本章使用了G. Ofer(1987)精彩的总结性回顾。尽管Ofer主要是对有关苏联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但其中也包含了一些一般性论述。

## 9.1　扩张冲动与投资饥渴

强制增长(或跃进、追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了解社会主义体制的最高领袖们对增长的看法。

一般而言，社会主义革命者都是在贫困、落后的国家里夺取政权的。在所有落后国家里，不管有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体制，都有一种所谓“后来者(late arriver)”的急迫和压抑心态，深切地感到严重落后于那些更为发达和富裕的国家。[①]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者曾在革命前承诺：一旦掌权，他们将很快彻底消除国家的贫穷和落后状态，因此，这种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急迫心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也正是这一承诺让革命者获得了大多数社会阶层的支持。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摆脱贫穷和落后状态的口号被反复宣传。革命者自己非常心急，他们同时也感到来自大众的迫切要求实现国家富强的强大压力。

最初的承诺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就一定能够迅速赶上发达国家。这一信念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领导层必须坚持高速增长，因为只有高速增长才能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最后，从军事和国防的角度考虑，也必须以更快的速度赶上发达国家。为了创建一支具有攻击能力的强大军队，需要国家的现代化和经济力量的支撑。

这里我们引用斯大林在1931年的一段演讲：“从俄罗斯的历史来看，之所以总是要挨打，就是因为落后…… 我们现在还落后先进国家50年，甚至100年。我们必须用10左右的时间消除这一差距。不是我们成功，就是被他们彻底摧毁。”[②]斯大林的后继者们也反复提到这一主题(赫鲁晓夫那个众

---

① 关于这种落后状态和“后来者”所引发的后果，可参见A. Gerschenkron(1962)的经典著作。

② 约·维·斯大林(1947，第356页)。

所周知的威胁始终让人难以忘怀：社会主义制度将埋葬整个西方世界[①]），毛泽东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有类似的言论。在中国的经济史上，毛泽东又给追赶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大跃进"[②]。

最高领导人想通过铁碗政策尽可能实现最快速度的增长，这就是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的关键所在，其中主要是产量计划，目的就是实现增长价值的最大化。产量计划比其他任何指针都重要，数量驱动也表现在经济管理和雄心勃勃的庞大投资计划上。

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实行强制增长政策并不是最高层领导违背中下层干部的普遍意愿而强迫他们推行的。恰恰相反，广大中下层干部自己就具有很强的内在扩张动力。让我们再回到**7.4**部分关于官僚机构动机的分析。

官僚体制中的中下层干部与最高领导人具有同样的政治信念，他们也觉得需要有快速的增长。与此同时，庞大的官方意识形态宣传机器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动机1）。

对自己工作岗位的认同使得他们倾向于扩张。任何一位单位领导，只要他/她认为自己单位所从事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他/她都真心希望单位的事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世界上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想让自己的大学有更多的教授、更多的学生、更多的报告厅和更好的教学设备。医院的院长们希望有更多的医生、病床以及更多更好的医疗器械。军队指挥官也会要求更多的现代化武器来装备队伍（动机2）。

官僚机构中所有层级的领导干部都知道，随着单位的不断扩张，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声望也会不断上升，当然也包括很多物质上的奖励（动机3、4、5）。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还有一个主要因素：广大中下层干部非常清楚自己所在的部委、主管部门或企业的长期短缺状况。无法满足的需求压力促使他们不断要求扩张。此外，在获得投入品时遇到的各种困难也推动着

---

①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这样一番对话：

提问："赫鲁晓夫先生，一直有传言说您在一次宴会上曾告诉一位外交官，您要埋葬我们？"赫鲁晓夫说："如果是指我本人的话，我想我活不了那么长，把你们每个人都埋葬…… 在那次宴会上，我说的是历史进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终将被埋葬，共产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尼·谢·赫鲁晓夫（1959，第76－77页）。

② 中国在大跃进时期的主要口号之一就是："15年内赶英超美。"

他们在自己的企业或部门内部自行进行投入品生产,这也需要扩大投资。

上述扩张动机有些是社会主义体制所特有的,也有一些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官僚机构领导,而不仅仅限于社会主义官僚。有人可能会提出,不光是那些被任命的官僚领导,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们也有很强的扩张冲动,他们希望通过扩张赚取更多的利润,同时也能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声望。

体制之间的主要差别并不在于实际上是否进行扩张,而是在于内部产生的自我约束机制。在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者看来(或者是受他们委托负责管理企业的经理层),扩张确实具有诱惑力,但其中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为此,他们必须慎重考虑公司扩张后的产品是否有销路,即使有销路,价格和赢利水平如何也是必须加以衡量的因素。任何一项错误投资所造成的损失都会影响他们自己的收入。尽管他们希望通过扩张不断拓展商业机会,但是失败的风险将限制他们盲目扩张的冲动。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完全拆除了这套控制装置。由于长期短缺,因此,扩张所增加的产品一般都能够卖出[12.2]。因为存在预算软约束,企业知道,任何错误的投资决策(不管成本有多高,损失有多大)都不会导致企业被破产清算。各级官僚干部也都参与了投资决策,但由此带来的任何损失却不会影响他们个人的财富和收入[5.3]。

扩张冲动对官员而言是很自然的事,[①]而且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只有官僚而没有真正的所有者,这样就几乎不存在任何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来控制这种扩张冲动,[②]投资饥渴必然泛滥成灾。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列举资本主义经济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时,其中之一就是企业家缺乏强烈的投资愿望,其原因就在于这种自我约束。解毒剂就是刺激企业家的"动物精神",即促使他们扩张。[③] 这个问题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完全不存在,而且那里的投资饥渴永远没有满足的一天。当

---

① 已经有模型深刻地分析了官僚成员的这一基本行为特征,官僚的目标函数就是将他/她所能支配的预算最大化,见 W. Niskanen(1971)。

② 有两类内部自我约束机制。一类与动机6有关:领导人想要过宁静的生活,任何新投资都会让他更烦心并增加了额外的责任。另一类与讨价还价过程中的"策略"有关。一位精明的官员不会给人一种总是想要东西的印象,而是要一步一步地树立起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形象。

③ 见 J. M. 凯恩斯(1936,第 162 页)。

然,社会主义也有很强的有效控制机制,但那不是来自企业内部或者中下层决策者自身(担心投资失败)。约束来自外部,即官僚机构的投资分配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确定了投资配额和允许投资的项目。

## 9.2 集中分配与投资紧张

与日常生产相比,对投资的集中控制更加严格。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投资计划和投资项目的决策过程。

从一方面来看,在制定计划和决策过程中,国民经济计划把投资资金分配到各个部委。投资资金将按照惯例从上到下进行分解[7.2]。投资配额用货币价值标明,通常会分别列出主要的开支项目(例如,建筑投资总额,机械设备投资总额;在机械设备项目下又会分为国内生产的设备和从国外进口的设备)。从另一方面看,中央计划是逐个进行决策的,在所有投资项目中,首先是优先投资项目。在中央计划中会涉及以下内容:为了完成每一个优先投资项目,应该生产哪些装置和设备?项目建设应采用什么技术?项目应该建在哪里?什么时候完工?完成该项目需要花费多少成本?

正如上一部分最后所说,由于所有的企业和机构都是公有制部门,因此,投资饥渴永远无法满足。在计划最终确定之前,下级单位通常会要求更多的投资资金,资金量往往远远超过上级机构所能分配给它们的资金。[1]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有太多的优先投资项目,以至于没有那么多资源能够支持这些项目。这种形式的过度需求是纵向短缺的表现(之所以是“纵向”是因为这发生在上级与下级的讨价还价过程中)[11.3]。上面和下面都会给制定投资计划的人施加很大的压力,于是就出现了很多雄心勃勃但却不切实际的庞大投资计划。

上述问题又因为以下情况而变得更为严重:投资项目的计划设计者常常会故意低估预期投资成本和预期完工时间,这样做更有利于批准投资计划。中下层管理人员的愿望是他们的建议能够被批准并纳入计划。一旦投

① 当然,并非所有的企业和机构都会在这场“争夺战”中勇往直前,那些觉得自己可能无法获得足够资源来完成庞大投资任务的单位会相对谨慎。

资项目上马，就没有人会在中途停止建设，哪怕是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的预期。这种现象在东欧国家被称为"慢慢蹭到计划里"。[①]

那么高层领导在决定如何分配投资资金或批准优先项目时的决策依据是什么呢？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将认真考虑每个项目的预期赢利能力、贷款利息、偿还期限以及投资风险。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资本市场，没有人进行利润估算，至少没有人会通过计算现行价格、利率和汇率来衡量计划项目的效率问题。

尽管缺乏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衡量标准，但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选择也并非全然无章可循。在投资资金的分配中也有明确的优先次序[9.4]。其他的门坎包括计划编制中的平衡要求，官僚机构接受到的短缺信号（从这些信号中可以发现需要哪些新的生产设备来满足预期需求）。当然，正如我们以前曾提到的，投资分配还要受到政治压力和不同利益部门游说的影响。

在投资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对投资品（服务）的过度需求在经济中被称为投资紧张。一般而言，官方批准的投资项目所需要的投入品往往超过实际可供给的水平。这样就造成了投资品供货商和投资品使用者之间的横向短缺关系。在多数情况下，就会导致体制内部官僚机构采取直接控制的办法进行处理：上级机关介入，临时决定谁可以获得目前处于供应短缺状态的产品或资源，谁暂时不能获得。

一般来说，在建项目都不会中途停止，因为每一个项目背后都在官僚体制内拥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一个项目的停工往往会导致好几个不同的项目同时被拖延下来，出现这种情况必然会造成投资的浪费，批准被长时间搁置，完工期限无限延长，[②]成本也将大大提高。

任何投资决策都要经历漫长的讨价还价过程，其中要涉及到很多主管部门和各级官僚机构。因此，当遇到事先没有纳入计划的行动时，就很难做

---

① 见 T. Bauer(1981，第 500 页)。

② 如果获得批准的过程过长，那么在做出最后决策的时候，项目也就过时了。苏联在 80 年代里大约有 25% 的项目是在 10 - 20 年以前规划的，见 R. Judy 和 R. Clough(1989)。据一项有代表性的调查，在 1973 年和 1974 年开始兴建的大型项目中，其中有一半到三分之一的年度开支被削减，这大大延长了投资时间，见 T. Bauer(1981，附录，第 172 页)。

有一项不同产业投资项目比较研究表明，在 60 年代，匈牙利完成一个项目所花费的时间是日本同类项目所花费时间的 2 - 5 倍，见 Z. Pacsi(1979，第 630 页)。

出迅速和灵活的反应。在任何情况下,新项目都无法自由使用各类资源(例如,迅速应用新发明或者及时抓住出口机会)。前面所提到的僵化问题[7.3]在投资过程中表现地尤为突出。[①]

## 9.3 投资与消费

下面我们将考察投资过程中的结构问题。首先看一下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分类和用于投资的比例。在多数时期内,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比例都远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②] 表9.1列出了相关的比较数据。

**表9.1 GDP中投资所占的比例:国际比较**

| 国家 | 投资占GDP的百分比 | |
|---|---|---|
| | 1980年 | 1988年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 保加利亚 | 28 | 27 |
| 中国 | 24 | 32 |
| 捷克斯洛伐克 | 27 | 26 |
| 东德 | 24 | 27 |
| 匈牙利 | 29 | 21 |
| 波兰 | 25 | 23 |
| 苏联 | 30 | 30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 巴西 | 23 | 22 |
| 法国 | 23 | 21 |
| 西德 | 23 | 20 |
| 印度 | 19 | 21 |
| 意大利 | 24 | 22 |
| 荷兰 | 21 | 22 |
| 西班牙 | 22 | 24 |
| 美国 | 17 | 17 |

**资料来源**:P. Marer等(1991)。

① 钱颖一和许成钢(1991)在一个正式模型中证明,由于预算软约束,社会主义经济要高度依赖官僚程序预先审查投资项目,这是他们应付投资饥渴问题的最优组织反应。而这种官僚程序往往会拖延项目投资并有可能造成有前景的项目被否决。

② 由于这里是在讨论经典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型,我们没有考虑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投资比例,也没有考虑随着时间所发生时高时低的变化。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维持官僚机构运转的费用和军事开支占 GDP 的比重也不比资本主义国家少。只有减少消费，才能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这意味着家庭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为公共福利做出了贡献。①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国家领导人有意识地想让经济按照这个模式发展。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们急切地想尽可能实现最快的增长。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些领导人认为实现快速增长的主要手段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参照经济增长理论来说，他们似乎在按照一种哈罗德—多玛模型前进（即使他们从未听说过这样一个模型），那里只有一个生产要素：资本。他们有自己极为简单的理由，投资比例越大，增长速度就越快。

**表 9.2　GDP 增长与资本投资增长：国际比较**

| 国家 | 年平均增长率，1950—1979 年 | |
|---|---|---|
| | GDP | 固定资本投资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 保加利亚 | 5.43 | 10.89 |
| 捷克斯洛伐克 | 3.67 | 6.11 |
| 东德 | 3.77 | 8.52 |
| 匈牙利 | 3.64 | 8.85 |
| 波兰 | 4.12 | 9.70 |
| 罗马尼亚 | 5.81 | 11.33 |
| 苏联 | 4.95 | 8.02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 澳大利亚 | 4.54 | 4.43 |
| 加拿大 | 4.57 | 4.36 |
| 芬兰 | 4.48 | 4.54 |
| 希腊 | 6.20 | 4.43 |
| 意大利 | 4.92 | 4.79 |
| 荷兰 | 4.58 | 5.10 |
| 挪威 | 4.15 | 4.93 |
| 瑞典 | 3.69 | 4.18 |
| 西德 | 4.85 | 5.69 |

**资料来源**：F. L. Pryor（1985，第 76 页）。

① 这里的分析没有考虑特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使用了外国资源[14.3，14.6]。

表9.2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要远远快于资本主义国家。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社会主义国家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差额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额要大得多。这也间接证明了投资的强制性扩张。表9.2同时显示出了投资的低效率:如果想要实现每年4—6%的产出增产率,那么投资的年增长率至少要达到8—11%,这也是迫使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人进行高比例投资的因素之一。

国家领导人不仅想进行高比例的投资,而且他们完全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强行实施这一想法。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种体制,其中一个小集团竟可以如此严格控制全国范围内的投资—消费比例。

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投资和储蓄具有某种事前的因果关系,但投资和储蓄一定是成千上万个决策者高度分散化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投资决策和储蓄决策是相互分离的,尽管自愿储蓄会影响投资,反之亦然。这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投资决策高度集中,同时也就包括了储蓄决策。储蓄(即非消费部分)相当于中央计划当局从消费中拿走并用于投资的部分,他们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比例抽走储蓄,而根本不用顾及作为个人收入所有者的家庭是否愿意这样做。①

如果投资增长率受到了限制,而消费比例也随之下降,那该怎么办呢?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个人的储蓄和投资决策是相互影响的,而且还有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体系。而经典社会主义完全没有这种自动的经济调节机制。社会主义的国家领导人最多能从公众能够忍受的程度感觉到这种限制,公众的容忍度构成了削减消费的约束条件。

这并不意味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最高领导人对公众的物质福利有多么关心,而是因为党总是在公开出版的政治宣传品中一再强调要重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迫使他们必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爱民之心,以便维持社会主义体制的合法性并保证他们继续掌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削减消费

---

① 当然,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投资=储蓄"这个公式在事后都适用,但这只是财务报表上的确认,与事前的因果问题无关。而所谓事前的因果关系是指决策者的投资水平要受到过去和预期未来储蓄的影响,而反过来,储蓄决策又受到投资机会和相关激励的影响。

不能无限制地超出公众的最低容忍度。[1] 然后就取决于政治状况，主要是镇压的力度，这真正决定了公众的最低容忍度：当权者能否长期保持生活水平的停滞，甚至削减人均消费，还是在某些时候不得不提高一下消费水平。

就那些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已经相当稳固的国家而言，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会发现其消费水平都有相当大的提高[13.1]。但即使在这些国家里，消费增长率也远远落后于 GDP 增长率。在有些国家，如中国，人均消费水平甚至长期停滞。[2]

即使官僚机构想要提高消费水平，即使公众的最低生活要求决定了削减消费的程度限制，然而这些最多抑制了最高领导人企图最大化投资比例的内心冲动。问题是，不只是那些最高领导人或者一小群领导集体想达到更高的投资—消费比例，广大中下层领导干部也倾向于提高投资增长速度[9.1,9.2]。想一想我们提到过的扩张冲动、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一切就一目了然了。官僚机构的微观动机和中央领导层的宏观政策目标在此完全一致，中央领导层进行高比例投资的决定表达了整个权力统治阶层的愿望和目标。

按照历史"功能学派"的哲学观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和官僚机构动机相互配合默契，恰恰因为这是帮助一个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最佳方式。对于那些迫不及待地想要追赶的贫穷落后国家而言，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机制与强制快速增长是须臾不可分的。[3] 尽管这种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但我并不完全赞同，因为它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按照本书的论证思路，一方面是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和产权关系，另一方面是强制型经济增长模式，两者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的主要因果联系方向是从第一层

---

① 在中国的大跃进期间，有一句中国谚语很生动地刻画了当时领导人的心态："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② 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在 1957 年至 1978 年间下降了 11.6%，见国家统计局(1985，第 556 页)。

③ 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可参见 A. Nove(1964，特别是第一章《斯大林是不可或缺的么?》)。E. H. Carr 和 R. W. Davies[1969](1974)在研究苏联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历史时隐含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斯大林是特定增长战略的产物。苏联经济学家曾论证在 20 年代实行强制增长在当时情况下是一种必要手段，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参见 A. Erlich(1960)。A. Nove(1989)对苏联此类问题的最新争论进行了一个综述，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因素导向第二层因素。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和官方意识形态,再加上官僚化公有制,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其结果必然是强制增长[15.1]。

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所讨论的决策者的时间偏好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官方意识形态一再宣称领导层的“未来导向”,也就是要求现在这一代人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做出牺牲。斯大林时代的匈牙利领导人马加什·拉科西曾非常通俗易懂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不能在今天把明天会下金蛋的母鸡给杀了。”①

在总结强制增长的时间偏好特征时,我们可以发现三种不同的现象。首先是公众做出的牺牲。他们必须放弃部分当前消费,更确切地说,是放弃那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但又无法积累和推迟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在前十年里,人们喝的牛奶只相当于生理上所需要的一半左右,当局曾保证十年后就能喝上比现在多1倍的牛奶。可十年过去了,情况依然如此,而且没有任何补偿。整个经济在第一期储蓄下来的东西就永远“石沉大海”了。

第二个现象是推迟。如果说牺牲意味着消费的减少,那么所谓推迟就对应着消费的存量积累:房屋建设、零售商店、消费品工厂等等。推迟与牺牲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是在抑制当前的消费。但推迟并不等于将“节约”下来的消费一直“节约”下去。从一方面看,推迟节约出了一部分资源用于当时认为更重要的其他投资任务;但从另一方面看,当时没有完成的任务必须在以后完成:推迟的任务将逐步积累。这类似于从下一代人那里借钱,每一次新的延迟还款都会进一步增加内部债务负担。②

第三种现象是“玩忽职守”(neglect)。如果真的只是推迟,那还不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公寓或制衣厂没有建起来,以后还可以再建。如果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那就是“玩忽职守”了。这一现象在需要有机发展的领域显得尤为突出(例如高等教育、卫生或环境保护)。如果这类发展在数十年里一直得不到重视,那么即使以后再分配资源进行建设或再采取行动进

---

① 见马·拉科西[1950](1955,第244页)。

② 推迟现象并不是社会主义体制所特有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它也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其中的一个例子是,许多发达国家在利用预算资金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时,也会出现“玩忽职守(neglect)”的现象。

行弥补,都将无济于事。[1]

强制增长的标志就是公众所做出的巨大牺牲[13.1]、公然一再推迟和某些发展领域内的"玩忽职守"。本章在后面的部分还会反复提到这些现象。强制增长的政策并非极富远见:最大化未来一、二十年内的增长速度不过是更倾向于牺牲当前和未来的消费,以及现在就为更遥远的未来打下生产基础。

## 9.4 优先(项目)

下面我们将讨论投资分配中的优先原则,首先从部门结构开始:

1. *投资品优先*。这一部门的发展主要将直接带来固定资本的增加,即投资品生产的增加。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复制和自我推动过程:投资品生产的提高造成了更多的固定资本投资,这样必然又扩大了投资品的生产,然后又进一步增加固定资本投资,如此往复。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有一个内部螺旋助推器,螺旋器运动加速,就会导致更多的投资,更多的固定资本,最终导致总产量的增长。

高速运转的内部螺旋器把周围其他所有部门吸引过来,尽管它们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投资计划分配部门认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就在决策中把其他部门的发展作为维持内部螺旋器高速向前转动的必要手段。这样就有了一个一般性的优先原则,然后再把它转化为特定的优先项目或部门,并根据经验在编制投资计划时加以调整即可。

2. *国内生产优先于进口*。部门结构的发展立足于所谓的"自给自足"。这里只是简单提一句,以后再详细探讨[14.1]。

3. *生产活动优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5.4]。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和统计工作中,其实际的含义是:有形物质产品的生产被看做是"生产性活动",而大部分服务被看做"非生产性活动"。[2] 优先原则:生产性活动应该在投资上优先于非生产性活动,换句话

---

① 我在1972年出版的书中详细探讨了牺牲、推迟和玩忽职守之间的关系。

② 运输是一个明显的例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运输是生产性活动,它不过是把生产延长到了工厂的大门口。商业活动的划分往往非常模糊,因为它既包含了生产性活动,也包括了非生产性活动。关于统计上的分类问题,见J. Arvay(1973)。

说，就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要优先于服务。[1]

之所以忽视非生产性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部分服务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是由私人生产者提供的，部分由预算单位和非营利组织提供。就前一部分服务而言，在市场协调下，消费者享有充分的权利：只要有需求，私人生产者愿意提供诸如住房、私人教育、私人医疗等各项服务。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则要遵循政治民主程序，至少是议会民主制。只要代表大多数公众利益的政党愿意投票争取公共服务发展资金，那么公共服务就不可能被忽略。而与之相反的是，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掌握资源配置的部门不受任何民主程序的控制。此外，它们必须做出的许多分配决策在资本主义体制下都是最终由消费者做出的。许多消费决策权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都转到了官僚机构的手中，在控制经济的官员们的眼中，总是有比发展服务业更重要的事情，他们认为服务可以推迟提供，甚至完全忽略。

4. *第一类产品优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第一类产品和第二类产品进行了重要区分。所谓第一类产品是指生产工具，第二类产品指消费品[2]。优先原则：第一类产品在投资上应该优先于第二类产品。

5. *工业优先。*工业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强制增长战略主要是指快速实现工业化。优先原则：在投资上，工业必须优先于其他任何经济部门，可参见表9.3。

6. *重工业优先。*根据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流行的官方观点，机械化是提高生产率和促进生产技术发展的主要手段。大量的钢铁和其他金属被用于机械制造和军事装备。优先原则：工业化主要偏重于重工业，其中的重点是

---

①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献中还有一种分类：狭义上的生产型经济中不包括基础设施。见 E. Ehrlich(1985b)。篇幅所限，这里我们就不再详细讨论基础设施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国家一般所定义的服务部门。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基础设施处于非优先的次要位置。

② 第一类产品不仅包括投资品，还包括可以用于当前生产活动的物资和半成品。

这种分类（包括优先排序）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纯粹以物理性质作为划分标准，那么许多东西即可以作为生产工具，又可以归为消费品。如果考虑到对外贸易，情况就更加明显：如出口消费品来进口生产工具，这样，第二类产品也可以间接生产生产工具。（或者反过来说，第一类产品也可以通过外国贸易中介提供消费品）。

鉴于上述原因，原则4的部分内容无法与原则1的基本要求完全吻合。

机械和钢铁。[①]

**表 9.3 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百分比:国际比较**

| 国家 | 年均不变价格 | |
|---|---|---|
| | 1965 - 1973 年 | 1973 - 1983 年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 保加利亚 | 44.5 | 42.3 |
| 中国 | 51.5 | 54.0 |
| 捷克斯洛伐克 | 37.6 | 38.0 |
| 东德 | 50.2 | — |
| 匈牙利 | 34.8 | 34.2 |
| 波兰 | 38.8 | 38.0 |
| 罗马尼亚 | 47.9 | 49.3 |
| 苏联 | 35.0 | 35.3 |
| | 1965 - 73 | 1973 - 80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 比利时 | 28.7 | 24.9 |
| 丹麦 | 16.1 | 16.7 |
| 芬兰 | 24.6 | 27.1 |
| 法国 | 24.6 | 23.9 |
| 爱尔兰 | 25.9 | 29.0 |
| 英国 | 31.3 | 32.4 |
| 西德 | 25.6 | 24.4 |

**资料来源**:P. Mihalyi 根据联合国(1986c,表 13 和 16)和布达佩斯中央统计办公室(1986,第 8 页)有关资料为本书整理。

注释:工业投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业包含了制造业、能源和油料生产部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业包括制造业、能源和油料生产、电力、天然气和水。

中国:国家投资以现行价格计算

51.5:1953 - 1962 年

54.0:1971 - 1980 年

16.1:1966 - 1973 年

---

① 首先是苏联,在 1917 年至 1976 年间,该国工业投资中有 84% 投入了重工业。莫斯科,统计资料(1977,第 436 页)。其次是中国,重型液压机的数量相当于欧洲经济联合体所有国家的总和,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 GNP 只有欧洲经济联合体的二十分之一。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说法:“重工业的结构和规模远远超出了经济可承受的规模。”,见 S. Zhou(1982,第 30 - 31 页)。最后是罗马尼亚:根据部分资料,1951 年至 1981 年间,该国的工业投资超过了全部投资额的 50%,其中有 77 - 80% 投入了重工业,见 M. Shafir(1985,第 108 页)。

严格遵循上述优先排序导致出现了一种极不协调的扭曲的部门结构。在强制增长早期的十多年里，高度集中进行资源分配似乎成功地使内部螺旋器不断加速旋转，优先部门得到了迅猛发展。而与此同时，其他部门却远远落在了后面，有些部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它们离螺旋器距离越远，越是无法阻挡它的旋转，在一段时期之后，它们也就越来越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主要生产消费品的部门落在了后面，服务部门更是如此，诸如住房建设、小区服务、贸易受到的负面影响最为严重。农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也相当落后。

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在前面曾提到的那三种现象：让生活在强制增长时期的整整一代人做出了巨大牺牲；那些不予优先考虑的次要任务被一再推迟，它们不断累积直至伤害到下一代人；“玩忽职守”（忽略）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1]

7. 军事工业优先。比起社会发展任务[2]而言，军事力量包括军队和警察的投资需求总是享有绝对的优先权。优先原则3、5和6都与此有关，这些优先原则不仅是为了让原则1所提到的内部螺旋器加速旋转，而且是为了发展军事工业。此外，军事工业也有自己的独立项目：在分配投资资金时，专门用于军事目的的工厂的建设需要给予高度重视。这些投资只能在公开发布的计划中看到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很大一部分用于军事和警察方面的投资都是保密的。

8. 新工厂（设备）优先。管理经济的人总是想尽可能建设更多的新工

---

① 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都严重忽视医疗卫生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造成了极为不利的人口趋势：低寿命和高婴儿死亡率。在1960年至1984年间，千人死亡率从7.1%上升到了10.8%，平均寿命从70下降到了67.7，而西方国家的同比数字是74和78。苏联的每千个婴儿死亡率为25人，而同期西方发达国家的每千个婴儿死亡率只有6-10人，见A. G. Aganbegian(1989，第228-229页)。

即使再重新进行资源分配投入卫生医疗领域（目前还没有发生），也至少需要十多年以后才能遏制上述可怕趋势。

②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军事部门在当时生产协调中所处的地位。为军事目的所组织的大规模生产与社会生产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管理。但只要有冲突，军事任务享有绝对优先权，即使在出现极度短缺的时候也是如此。见C. Davis(1990)。

厂,而根本不重视维护现存的老厂,其主要动机是来自政治方面。[①] 建立了新工厂就可以成为摆脱落后、实现快速发展的典范,这远比劳心费力地维护旧厂房里的机器和车间划算得多。这样就可以很得意地向上级汇报,而且盛大的开工庆典往往会在全国引起轰动。强制增长政策需要这种建设激情,因为工人们的热情也被看作鼓舞生产的因素之一。

尽管新工厂(设备)优先在生产投资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更多的资源用于新的房屋建设,而不是用于维护古老的建筑遗产。新的学校、新的大学、新的铁路、如此等等。

优先建设新的东西也具有某种推迟的特征。它只是暂时将应该用于维护和更新的资源挪出来进行短期优先项目建设。但这种推迟迟早会"自食其果",反而成为抑制增长的因素。

9. 大型企业(装置)优先。负责经济发展的人往往被那些大型、超大型、甚至是巨型企业(装置)所吸引,常常会出现"规模崇拜"和"巨人迷恋症"。[②]

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物质生产。如果有可能的话,各类服务机构(不管是大学,图书馆,还是医院)同样是尽可能建设得越大越好。

有几个因素促使决策者优先考虑这类建设。[③] 首先是期望大规模和高产量能够实现规模经济。[④] 但实际上,更大的规模在获得节约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额外的成本。从纯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两者之间的平衡决定着企业的最优规模。[⑤] 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里,最具优势的企业规模要取决于部门特征、技术、管理者的能力、市场结构以及其他许多因素。这也就是为什

---

① 这一现象恰好证明了以前曾提到过的一个观点[5.3]:官僚机构领导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所有者。没有所有者会在可以维修的情况下看到自己的财富不断贬值。

② 这种偏好不仅表现在新工厂(设备)的规模选择上,而且还表现在现有企业的组织发展上。事实上,这一过程起源于对农业和小工业进行的国有化和集体化运动,在那时就建立起了大型的公有制企业和合作社来取代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和资本主义小企业。国有化运动结束之后,又出现了国有企业或合作社之间的合并浪潮。这样,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就出现了强大的集中生产趋势[17.2,17.6]。

③ 在分析集体化的时候,也出现了与之相关但不完全相同的问题[5.5]。

④ 马克思和列宁都非常强调集中生产和大工厂(相对与小企业)的优势,他们的观点在灌输这种规模经济思想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⑤ 见74页注释②。

么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不同规模的企业相互并存的原因。而在强制增长的过程中,往往会在巨型企业和机构中出现几个更有效率的中小企业的情况。可以肯定地说,不分情况一律建设大型工厂无助于实现更快的增长。

其次,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权力方面的考虑往往等同于经济标准,甚至超出经济上的考虑。高层领导人发现控制数量较少的下级部门相对容易。对下级部门的领导而言,譬如一家企业或公共机构的领导,如果他们所控制的单位能够变得更大,那么他们的权力和声望显然会随之上升。

10. *优先考虑的产品和投资项目*。有几千种优先产品[7.2],其中还会有一些被列为“最重要的产品”。这些产品不仅在年度计划和执行过程中受到特别的重视,而且在投资资金分配和投资决策的实施中也被给予充分的关注。钢铁行业的重点是那些直接产钢的单位,一定要保证最常用的轧制钢材的及时供给。对于农业机械制造业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完成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完整出厂前最关键部分的生产。所有为制造优先产品提供辅助工作的工厂,如零部件供货商、运输系统、维修部门以及按时按量运转的仓库都得不到同样的重视。使用者(在上面的例子中,就是使用钢材的工程建设部门和使用农业机械的农场)不仅需要优先产品,而且也需要成百上千的配套产品。但这些产品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优先产品的增长。

这经常会导致生产过程的中断,而且也是造成持续短缺的原因之一[12.1]。尽管从经济角度考虑有许多明显的缺点,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倾向还是可以用外部环境特征来加以解释,其中信息问题又是关键所在[7.7]:中央集权式的官僚化决策不可能对按金字塔形状排列的各级任务都给予同等程度的关注。只有进行了“优先排序”才能够管理。此外,还有大量的群众动员、政治运动和宣传工作。为了有效工作,官僚化决策必须集中精力用于少量活动。

优先投资项目的选择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事实上,优先投资项目和优先产品往往是相互重合的,因为大部分优先投资的项目完工之后也都要生产优先产品。优先投资项目是权力统治精英们的心爱之物,每一个新工厂的建设都令人着迷,新闻报纸会大肆宣传,所有主管机构都会去视察好几次。优先投资项目的需求总是会随时得到满足,即使在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也不例外。本章在讨论强制增长、跃进、狂热追赶等问题时谈到的所有一般

特征都会在优先投资工程建设的过程中生动地体现出来。

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可以把“优先产品”和“优先投资”的一边倒倾向看作是一种推迟现象。如果优先产品的产量增长很快，那么立刻就会写入计划汇报。一旦某项优先投资胜利竣工，就会马上成为取得伟大成就的象征。至于其他产品和非优先产品生产上的相对滞后、对辅助性生产设备建设的忽视，以及半心半意地对待非优先投资项目，它们对增长产生的抑制作用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为人所知，尽管这种严重的负面影响迟早会出现。

11.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生产的增长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森林和其他绿地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水和空气受到严重污染，动物自然生长区不断被侵蚀。其他人类活动（运输、供暖、城市化等等）也都进一步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投资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

第一，能否确保为生产或其他目的而建设的投资项目及其大型装置设备不对环境造成破坏？保护环境往往需要额外的投入（例如，排放或过滤废气的方法可能相当昂贵）。在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里，答案是否定的。在强制增长的过程中，用于保护环境的额外投入完全被忽略。一般的观点认为，由于处在低发展水平阶段，所谓工业、城市交通对空气和水造成污染的问题几乎不存在，那些只是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问题。

第二，在计划中（特别是优先投资项目中）是否包括了以保护环境（或修复以前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为目的投资项目？例如新的排污工程或生产环境保护设备的工厂。在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里，答案通常也是否定的。这类项目很早就被从那些重点优先项目和优先原则 1 的内部螺旋器里排除出去了。节约下来的环境保护投资都被用于其他重点优先项目的建设。

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并不是社会主义体制特有的现象。所有其他社会体制也都容易这类问题，而且这也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严重弊病之一。很多人认为，通过彻底消除私人产权的贪婪和自私就能够避免对环境的破坏。但这并没有实现。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急于实现强制增长和狂热追赶的官僚机构在环境保护方面比其他任何体制的决策者都更为短视。环境问题又因为体制的弊端而更加严重：无法建立独立的社会组织开展强大的环境保护运动来对抗经济部门的决策。表 9.4 比较了这两类国家的二氧化硫排

放量，二氧化硫是形成酸雨的重要物质。

**表 9.4 空气污染：国际比较（1983 年）**

| | 二氧化硫（平均每人） |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捷克斯洛伐克 | 203 |
| 东德 | 300 |
| 匈牙利 | 132 |
| 波兰 | 116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奥地利 | 18 |
| 芬兰 | 73 |
| 法国 | 31 |
| 爱尔兰 | 39 |
| 葡萄牙 | 32 |
| 西班牙 | 75 |
| 英国 | 65 |
| 美国 | 90 |
| 西德 | 42 |

**资料来源**：P. Mihalyi 根据联合国有关资料（1987，第 I－30）和就欧洲问题与联合国经济委员会秘书处的直接交流为本书整理。

注释：工业发展水平与汽车的密集度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污染显示出了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如果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严重忽视环境保护，那么空气污染将越来越厉害。

缺少对环境的保护也是推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玩忽职守的行为）的例子之一。对环境的破坏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迟早会造成生产的减慢，而且其严重后果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生活质量，从而引发公众的不满。

在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优先（项目）进行一番考察之后不难发现，尽管我们列出的各项内容肯定会有一些遗漏，但就总体而言，已经将所有重要事项都包含在内。官方意识形态总是一再强调某些优先项目的建设情况，而对于另外一些优先项目则闭口不谈，认为它们不值一提，甚至干脆予以否定。但那些被认为是丢面子并加以否认的优先项目依然在建。

对于那些喜欢在最优化模型框架内考虑问题的研究者而言，可以这样

来定义强制增长的目标:从广义上看,目标并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最大化任务的时间维度不是无限长,甚至都不是真正的"长期"(如果用历史维度加以衡量的话)。实现强制增长的目标时间相当有限并非常短视:根据官方统计指针,最大化总产量增长速度,以某种历史维度来衡量的话,那就是要在"中期内实现目标",也就是花10到20年左右的时间。前面提到的优先原则都服务于这一目标,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特定时间要求以内促进高速增长。[①] 实施优先原则1-11的结果是,整个经济的结构变得极不协调,并完全嵌入了一种扭曲状态之中而无法自拔。

## 9.5　外延式(增长)与集约式(增长)

现在我们开始考察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研究领域已经有了大量的一般性理论文献。有不少人尝试着利用专门针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分析方法(主要是生产函数和基于生产函数的增长模型)来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看一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更清楚地说明问题。[②] 其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数据,或者数据不可靠。测量方面的问题我们后面还会谈到[9.7]。无论如何,我本人都不打算就涉及到上述问题的各种争论(或者某些数字计算结果)进行总结。本部分只是想对生产要素和产量之间的主要关系进行一个分类,然后就这类关系在社会主义体制中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一些有益的见解。

为简化起见,我将分两组列出各种生产要素—产量关系。第一组包括

---

① 即使实现了这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究竟该如何衡量这种"增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在很多方面都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9.7]。

② 关于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关系的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首先需要参考 Abram Bergson 的著作,他对其他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于他最近的一些文章,其中对苏联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1983)的研究值得认真参考。对苏联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还包括 P. Desai(1976,1986a,1986b,1987)、V. Kontorovich(1986)和 M. L. Weitzman(1970,1983)。E. A. Hewett(1988,第2章)在他关于改革的书中对苏联经济增长背后的各种要素进行了全面介绍。有不少研究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例如,世界银行报告(1985)和 K. Chen 等人的研究。关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不是很多,可参见 T. P. Alton(1977)的一项综述性研究。在 F. L. Pryor(1985)的著作中有一篇较为全面的综述,其中可以找到许多与这里所采用的分类有关的内容。

要素(自身)增长所带来的效果。例如,用于生产的资本存量和劳动总量不断增长,由此导致产量的增长。第二组包括要素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效果。例如,资本和劳动的使用效率不断提高,由此导致产量的增长。这种区分以及相应的术语在西方学者那里使用得非常广泛,但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者却更倾向于采用另外一对概念及其表达方式,即外延(extensive)和集约(intensive)方式。事实上,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说法都是同一个意思:要素增长相当于外延方式,而要素—生产率增长相当于集约方式。在下文中,我们也会经常用到这种“东方”的术语。

在进行详细分析之前,还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所谓对各种外延方式和集约方式的严格区分只是在抽象分析的框架内做出的,在实际生活中,两者往往结合在一起。在使用数字形式对实际影响进行分解时,哪怕是采用最细致的计量经济学检验方法也会遇到很大困难。这里没有这么做,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社会主义体制的一般规律,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外延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体制大多是在落后和低增长的国家里建立起来的,即使从外延的观点来看,那些国家的资源利用水平也相当低下。因此,外延增长方式大有用武之地。

1. *雇佣劳动力人数的增长*。当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时候,那些国家通常都存在着大量的公开失业,而农村主要是隐藏着的低就业,妇女的就业水平非常低。即使只考虑生产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资本和劳动,那么整个经济就可以形成很高的投资比率,与此同时,又存在着充足的剩余劳动力。社会主义体制充分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机遇”,雇佣劳动力人数迅速增长[10.1]。

这两个现象结合在一起,即高投资比率加上不断快速增长的雇佣劳动力,就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特别是头10年或头20年的增长。

2. *更多的轮班制和延长劳动时间*。尽管投资数量巨大,但相对于充足的人力资源而言,固定资本还是非常稀缺的。于是经济管理者力争为固定资产安排尽可能多的劳动力,工厂的开工和工作时间达到了每天24小时和每周168个小时。大体来说,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工厂和其他机构工人的轮班次数要比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多得多。

劳动时间的延长也是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之一。[①] 在一些国家里，即使经济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工人们也要求工作时间能更少一些，但官僚机构却始终不愿意在工作时间上做出让步。那里也没有独立的工会组织来为工人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满足工人的要求。

1 和 2 中所提到的外延增长潜力毕竟是有限的，一段时期之后，劳动储备就基本被耗尽了。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这种外延增长方式就会成为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的最主要的因素。[②]

3. *耕地的增长*。没有开发的土地变成了可耕种土地。当然，耕地的增加在一段时期以后也就停下来。

4. *矿产资源的不断开采*。尽管在很多地方，矿产开采的成本不断提高，或者最终也会彻底枯竭，但外延式矿产资源利用还是有了很大的增长。

对外延增长方式，我们还想加一点总结性评论。这种增长类似于其他社会体制在战争时期的情况。而经典社会主义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处于一种动员经济状态。[③] 前文中我曾提到过官方意识形态经常向人们灌输"战争意识"：经济建设是针对落后和内外敌人的一场战斗，没有人能够从战场上撤退[4]。战争需要动员所有成年人和全部资源。

下面我们来探讨集约增长方式。需要事先说明的是，在实际的强制增长过程中，各种集约方式都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

1. *劳动强度(效率)*。在给定物质投入品的情况下，产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工人是否用心和努力工作，换句话说，就是取决于工人在工作时的劳动强度(效率)。社会主义者在革命前和革命胜利后都坚信，摆脱了资本主义压迫的工人将以极大的热情努力工作，其劳动效率将远远高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挣工资的雇佣劳动者。在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确实出现过这种迹象[2.4,6.6]。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这种工作热情始终没有彻

---

① 这一趋势在不同经济部门也并不完全一致。在家庭农场和家庭作坊工作的农民和手工艺者会为了家庭拼命工作，但在实行了国有化和集体化之后，这种工作态度就有所变化。对农业合作社的社员来说，他们在合作社里的工作时间就少于他们在自己土地上劳作的时间。

② 关于这个问题，很多文献里都会出现以下公式：当劳动储备被耗尽之后，"外延增长时期"就会结束，从而开始进入"集约增长阶段"。尽管我在以前的著作中也使用了这种"时期划分"，但本书没有继续使用，因为这不是一种很准确的说法。

③ 这是 P. Hanson 总结出的一个很贴切的说法。

底消亡。[①]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初的热情逐步消退直至冷漠,后来只是希望干多少工作就挣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设计一套可以有效运行的物质和道德激励机制来促使工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并遵守纪律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社会主义体制在这方面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因为它无法找到有效的激励机制。

2. *技术进步*。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其中部分与社会主义的建设热情有密切关系:村庄里第一次有了电灯,耕地里第一次出现了拖拉机,工厂里第一次有了自动生产线。

但仔细观察后会发现,尽管在技术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相对有限。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典体制阶段的后期技术进步的速度逐步减慢。[②] 大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进步基本上都是以模仿为主,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技术和新产品通常要延迟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被引入国内[12.11]。

3. *劳动技能的发展*。尽管技术水准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对于人力资源的问题还需要进行单独考察。在强制增长过程中,生产领域,特别是工业领域吸收了大量没有技术、缺乏经验的劳动力。尽管经过很长一段时期之后,劳动者的技能也得到了提高,但其整体素质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生产快速增长的要求。

4. *组织的改善*。这里需要区分固定的停工时间(如夜间或者星期天)和被迫中断生产的情况,例如,由于原材料未能及时运到,工人不在岗位或者机器出现故障造成的生产中断[③]。如果能够更有效率地组织生产,加强纪律,将产品及时供应给使用者,那么所造成的时间损失就会减少很多[④]。

---

① 苏联把此类行为称为斯达汉诺夫运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的运动(如社会主义工作竞赛等等)。在这些运动中,既有那些真正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的优秀工人的辛勤劳动,也有幕后操纵和人为制造的虚假成绩刻意用来鼓舞士气。波兰导演 A. Wajda 在他一部名为《大理石人》的电影中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这一奇特的矛盾现象。

② 可参见 V. Kontorovich(1986)关于苏联技术进步的详细资料。J. Klacek 和 A. Nesporova(1984)证明了捷克斯洛伐克技术进步的速度不断减慢,而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不断降低。更多的参考文献见 12.11。

③ 在有关固定成本使用的研究文献中将之区分为外延式使用和集约式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第 2 点中就讨论了外延式方法,而在第 3 点中讨论了集约式方法。

④ 在微观经济学文献中,使用生产函数的模型通常对第 2 点和第 3 点不进行区分。一般用剩余要素这一概念来概括第 2、3 点带来的所有影响。

就生产的组织而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非常糟糕的。生产的内部组织和管理水平都相当落后。这既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通病(例如,刚从农村来的劳动力一般都很难适应现代化工业生产),也有社会主义自身在体制上的问题(例如,投资紧张和持续短缺造成的供应滞后)。因此,组织改进对生产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

5. *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数量增长*。这里所使用的"质量"一词就是指日常意义上的质量,如工程师眼中的一台机器或一种材料的质量,消费者所认为的商店里商品的质量。质量包含着许多方面的内容:现代化水平、外表、材料和加工的优良程度、耐用性等等。如果生产者想制造出符合上述各种条件和满足其他使用要求的高质量产品,那么通常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反之,如果在给定产量要求的情况下,牺牲产品的质量就可以节约资源。

资本主义产权形式和市场协调为改善质量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熊彼特就曾指出:如果企业家能够以新的和更好的产品占领市场,那么他/她就能够处于优胜者的地位。质量的提高和改善取决于微观层面的内部激励,中央计划往往对此无能为力。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这种内部激励作用几乎完全消失。各方面的要求都促使经济领导人在质量和数量的权衡取舍中选择数量指标。前面我们也曾提到过这种数量驱动[7.6]。计划和官僚直接控制都把数量指标放在最核心的位置上:只要有可能,都是用物理指数或总量来计算产量,这种非常粗糙的数量衡量根本无法反映出质量上的好坏差别。提高质量只是在官方的宣传中一再出现,但官僚协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愿去执行质量要求。

当然,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取得的数量增长确实为官方统计中显示出的高速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

6. *服务能力的过度集约使用*。尽管也可以把这一点看作第5点的一种特殊情况,但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单独列出。更多的居民被挤进了狭窄的住房里,更多的病人被安排到一家医院里,更多的学生被安排到一间教室,这些都远远超出了保证基本质量的底线。交通运输和电信的发展根本不受重视,火车和道路拥挤不堪,电话线更是寥寥无几。为了说明服务能力过度集约使用的情况,表9.5列出了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铁路系统运载状况,差别极为明显。

表 9.5 铁路系统的超载状况:国际比较(1979 年)

| | 货运密集度(每千米/千米-吨,百万) |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保加利亚 | 4.07 |
| 捷克斯洛伐克 | 5.56 |
| 波兰 | 5.55 |
| 罗马尼亚 | 6.84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芬兰 | 1.21 |
| 希腊 | 0.34 |
| 爱尔兰 | 0.32 |
| 意大利 | 1.14 |
| 葡萄牙 | 0.24 |
| 西班牙 | 0.78 |
| 土耳其 | 0.71 |

**资料来源**:G. Kwon 根据联合国有关资料(1981,表 6,8B)为本书编辑整理。

注释:表中数据是指以千米计算的铁路总长度的运载量.按运载量吨/千米距离计算。

运输和服务负担过重,拥挤状况不仅得不到改善,反而持续恶化,而经济领导层仍然尽力压缩对服务部门的投资和资源分配,将更多的投资资金用于优先项目的建设。[①] 从这方面来看,上述现象与投资的优先原则紧密相关[9.4]。[②]

之所以把服务能力的过度使用列为集约增长方式的一种,是因为它使同样的固定资本投入获得了更多的产出。但必须加以补充说明的是,和第 5 种集约增长方式一样,这里所谓的产出增长是按照非常粗放的数量标准来衡量的(主要是物理指标:多少家庭有了房子住,多少人能够去医院和上学,等等)。

---

①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卫生医疗部门负担过重和拥挤不堪的现象尤为突出,可参见 C. Davis(1989)对苏联卫生医疗问题的研究。

② 按照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理论分析,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也可以这样进行描述:在特定时期内,生产领域不同部门之间的相关系数是刚性的(现期使用和资本)。而服务领域(生产和公共消费)现期使用的相关系数(现期投入相关系数,特别是资本系数)是可变的,完全能够在很长时期内大幅度削减投入—产出比例,从而降低使用者所获得的服务量。

总体而言,在强制增长的条件下,外延方式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再加上第5种和第6种集约方式的补充,这样就带来了严重后果。第1—4类集约方式所做出的贡献几乎微不足道。

**表9.6 要素生产率对产量增长的贡献比例:国际比较**

| | 平均年度变化率 | | | 要素生产率对 |
|---|---|---|---|---|
| | 时期(年) | 产量 | 要素生产率 | 产量增长的贡献比例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 |
| 捷克斯洛伐克 | 1960-1975 | 3.0 | 1.0 | 0.33 |
| | 1976-1980 | 2.2 | 0.7 | 0.29 |
| | 1981-1988 | 1.4 | 0.1 | 0.07 |
| 波兰 | 1960-1975 | 5.1 | 2.4 | 0.47 |
| | 1976-1980 | 0.7 | -0.6 | — |
| | 1981-1988 | 0.8 | 0.2 | 0.40 |
| 苏联 | 1960-1975 | 4.6 | 1.2 | 0.26 |
| | 1976-1980 | 2.3 | 0.5 | 0.22 |
| | 1981-1988 | 1.9 | 0.5 | 0.13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 |
| 法国 | 1960-1973 | 5.8 | 3.9 | 0.67 |
| | 1973-1979 | 2.8 | 1.7 | 0.65 |
| | 1979-1988 | 1.9 | 1.5 | 0.75 |
| 日本 | 1960-1973 | 10.8 | 6.6 | 0.61 |
| | 1973-1979 | 3.6 | 1.8 | 0.43 |
| | 1979-1988 | 4.1 | 1.8 | 0.43 |
| 英国 | 1960-1973 | 2.9 | 2.2 | 0.76 |
| | 1973-1979 | 1.5 | 0.5 | 0.60 |
| | 1979-1988 | 2.2 | 1.9 | 0.95 |

**资料来源**:社会主义国家:1960-1975年:P. R. Gregory和R. C. Stuart(1980,第378-379);1976-1980年和1981-1988年,产量:苏联,1976-1980年,A. Aslund(1989,第15页),其他数据均来自P. Marer等(1991);要素生产率:M. Mejstrik(1991,第27页)。资本主义国家:1960-1973年:J. W. Kendrick(1981,第128页);1973-1979年和1979-1988年,产量:OECD(1990,第48页);要素生产率:M. Mejstrik(1991,表2a)。

注释:除了1973年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产量是用GDP衡量之外,其他均以GNP衡量。

以上结论得到了很多计量经济分析的支持。正如我们在本部分开头所提到的,计量经济分析在方法上会出现很多问题,而且在很多情况得出的数据结论也往往相互冲突,但我还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计量经济分析与本书得出的

定性结论有矛盾之处。表9.6摘要列出了部分计算结果。从最右边一列,可以清楚地看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集约方式的使用——对经典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表9.6也显示出了体制特征:同期内,资本主义体制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高于社会主义体制。

## 9.6 增长的波动、周期

下面我们将讨论经济增长中的一些动态特征。这里有三类不同的波动:

1.“日历式”波动。这与年度计划直接相关。因为有很强的物质和道德激励去完成年度计划中所规定的数量目标,所以在接近年终的时候工作速度明显加快。表9.7列出了年底的“井喷”资料,此时生产会有极大的增长,根本不考虑成本、人员精力和质量的降低。在年初的时候,产量水平会急速下跌。[1]

五年计划造成的这种波动相对不是那么明显。每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一般都会有几个新的投资项目同时上马。

**表9.7 年终波动:国际比较**

| 国家(年) | 12月产量占下一年平均月产量的百分比 |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捷克斯洛伐克(1968-1982) | 102.4 |
| 匈牙利(1968-1982) | 114.0 |
| 波兰(1971-1981) | 106.7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奥地利(1955-1981) | 99.9 |
| 芬兰(1976-1981) | 94.5 |
| 以色列(1958-1977) | 93.4 |
| 意大利(1974-1982) | 92.8 |
| 葡萄牙(1968-1981) | 98.1 |

**资料来源**:J. Rostowski和P. Auerbach(1986,第297,301)

注释:数据来自制造业。月产量:下一年1-11月的平均数。

---

① 见A. Brody(1956)、M. Laki(1980)、J. Rimler(1986)、J. Rostowski(1988)以及J. Rostowski和P. Auerbach(1986)。

2. 内生投资波动。这种波动在东欧一些小国、中国和古巴的特定时期尤为明显。第一,图9.1和表9.8中有关波兰和中国的资料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它们都有很大的投资波动。表9.9提供了一个变差相关系数的国际比较,其中衡量了长期平均增长率的波动情况。这一国际比较还不能得出十分肯定的结论。有些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地相对平缓,有些则出现了很大的波动,甚至超过了许多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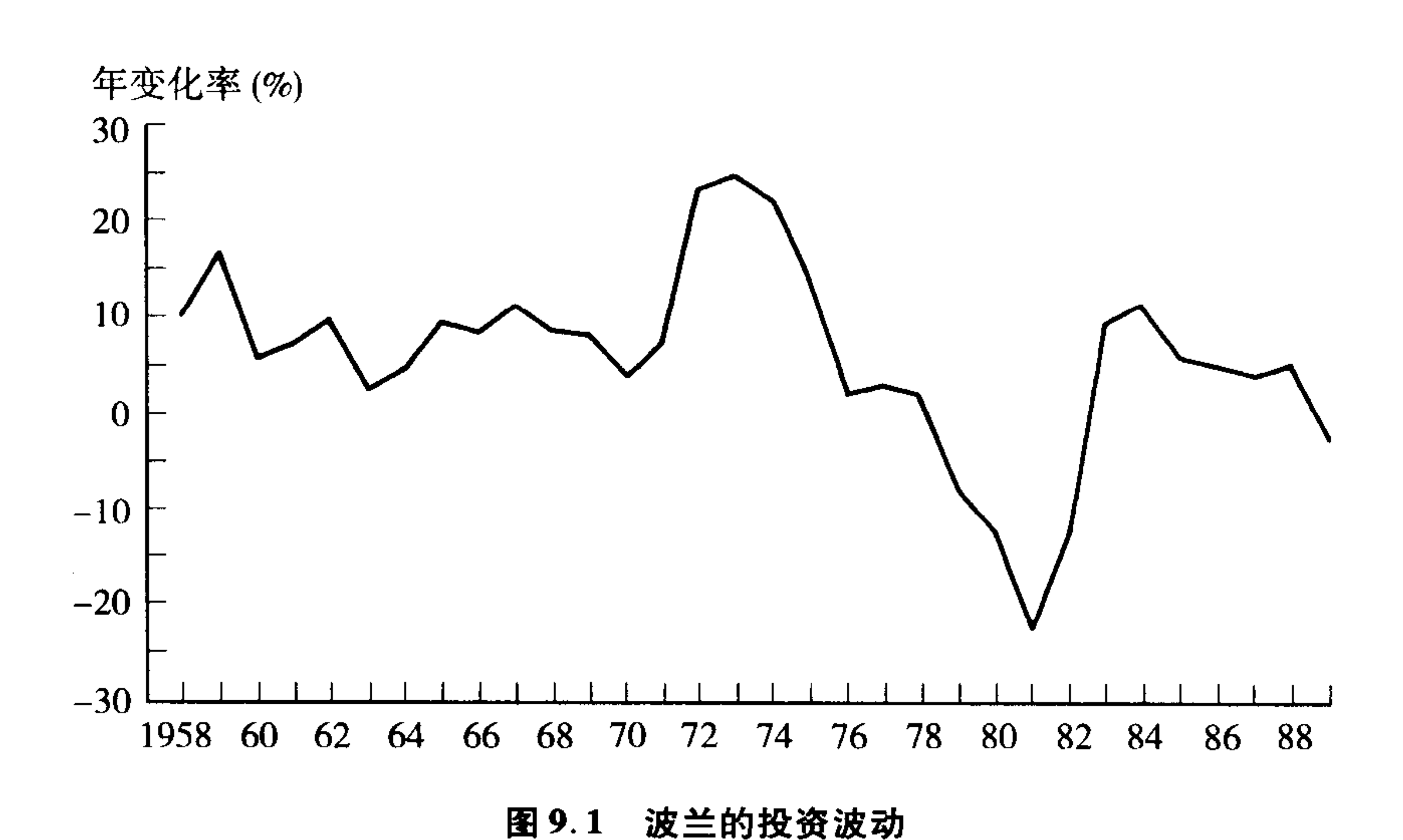



**图9.1 波兰的投资波动**

**资料来源:** 1958-76, T. Bauer (1981、第156、176、187页); 1977-1989, Glowny Urzad Statystyczny (1990)

波动通常都是从投资开始的,同时也表现在用于投资的年度总开支上。生产的变化相对平缓一些,就业的波动最小。[①] 有些波动没有规律可循。其他一些波动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某些时期表现出了与体制有关的周期性特征,从"停止"然后到"前进"。经济增长过程中还会反复经历突然的中断、下降和停滞,谨慎的恢复和不受控制的扩张,这一周期性波动会不断往复。接下来又会开始一个新的周期,同样是这种波动方式。

---

① 这是社会主义体制保证就业和工作的主要间接证据[10.1,10.2,13.3]。

表9.8　中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波动情况

| 年 | 年度变化(百分比) | 年 | 年度变化(百分比) |
|---|---|---|---|
| 1951 | 106.9 | 1969 | 62.9 |
| 1952 | 85.7 | 1970 | 49.1 |
| 1953 | 110.3 | 1971 | 13.4 |
| 1954 | 12.1 | 1972 | -1.1 |
| 1955 | 2.5 | 1973 | 6.1 |
| 1956 | 52.8 | 1974 | 5.7 |
| 1957 | -6.0 | 1975 | 17.6 |
| 1958 | 84.5 | 1976 | -3.9 |
| 1959 | 31.9 | 1977 | 4.6 |
| 1960 | 13.2 | 1978 | 22.0 |
| 1961 | -62.5 | 1979 | 4.6 |
| 1962 | -44.1 | 1980 | 6.7 |
| 1963 | 33.7 | 1981 | -10.5 |
| 1964 | 42.2 | 1982 | 26.6 |
| 1965 | 30.7 | 1983 | 12.6 |
| 1966 | 17.5 | 1984 | 24.5 |
| 1967 | -26.3 | 1985 | 41.8 |
| 1968 | -19.3 | 1986 | 12.2 |

**资料来源**:根据以下资料进行计算:1950 - 1982 年:H. Chang(1984,第 1287 页);1983 - 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7,第 60 页)。

很多研究者都曾尝试着阐述这种现象并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解释。①

① 最早的研究者包括 A. Brody(1969b)、J. Gacs 和 M. Lacko(1973)以及 J. Goldmann 和 K. Kouba(1969)。T. Bauer 的综合性著作为以后的研究和讨论提供了一个起点,全文只有匈牙利文版(1981)。Bauer 的部分观点已经用英文出版(1978)。Bauer 的著作是本书中有关投资和波动周期观点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不少研究者都利用了他的理论,如 K. A. Soos(1975,1986)。其他比较重要的研究还包括 P. Mihalyi(1988)和 B. W. Ickes(1990)。有些研究者也对投资波动和其他经济变量是否存在规律表示了怀疑。

部分研究者以统计资料为基础或者利用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了单个国家的投资波动。可参见,匈牙利:M. Lacko(1980,1984)、M. Marrese(1981);中国:B. Chavance(1987)、M. Harrison(1985)和 C. Hsin(1984);苏联:G. Roland(1987)、M. Harrison(1985)和 V. Kontorovich(1990);波兰:I. Grosfeld(1986);古巴 C. Bettelheim(1987)。A. Simonovits(1991a,1991b)设计了研究投资周期的数理模型。B. W. Ickes(1986)对某些问题的讨论进行了一次总结性评论。

顺便提一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学家通常也没有一个一致被接受的理论,这一点并不奇怪。近一个世纪以来,无数学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商业周期的波动进行了研究,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可参见见 V. Zarnovitz(1985)的回顾性综述。

这里的观点很多都来自其他一些研究者。[①]

**表 9.9　投资波动:国际比较(1960 - 1989 年)**

| | 年度投资平均增长率<br>变差相关系数(百分比) |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捷克斯洛伐克 | 131 |
| 东德 | 98 |
| 匈牙利 | 171 |
| 波兰 | 187 |
| 苏联 | 47 |
| 南斯拉夫 | 278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奥地利 | 127 |
| 加拿大 | 94 |
| 法国 | 106 |
| 爱尔兰 | 159 |
| 日本 | 90 |
| 西班牙 | 122 |
| 瑞典 | 130 |

**资料来源**:由 P. Mihalyi 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统一数据库的数据为本书计算。

注释:变差相关系数是指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率。西方国家的数据以 1985 年不变价格和当年美元汇率为基础。东方国家的数据按不同年份的不变价格计算。

乍一看去,社会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周期性波动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如果仔细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其中有极大的差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下降和紧缩一般都与需求不足有关。生产高速扩张是因为现期需求和对未来的需求预期。商业前景变得非常不确定。当经济决策者认识到这一点时,经济往往又突然进入了衰退阶段。这种波动是一个分散化的过程,没有什么"上级"发出命令,经济恐慌很快就会在市场上横向传开。

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种波动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央计划特征。经济突然下滑根源于中央控制,指令按照官僚体制各个等级由上到下纵向下达。

① 主要包括 T. Bauer 和 M. Lacko 的部分观点,以及我自己的早期著作。

需求不足并不是引发经济衰退的原因。相反,领导人之所以下达收缩的指令,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资源已经不足以维持不断加速的经济增长。整个经济周期包括跃进、扩张冲动、投资饥渴、投资紧张和持续短缺。这些都是各级官僚机构决策者的行为特征。他们希望尽量增加投资,增长速度越快越好,但与此同时,在周期顶峰的时候将遇到各种约束而无法继续加速增长。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最高领导人收到了进一步加速增长的受阻信号,其中主要包括三类:

第一,进口和债务不可能无限增加[14.3]。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对东欧的一些小国而言,这构成了实现进一步加速增长的有效约束。

第二,投资紧张已经到了无法接受的程度。负责经济和技术管理的领导人感觉到将会出现更多的生产中断现象,运输问题和时间延误实在负担不起了。

第三,投资扩张严重影响到了居民个人消费,已经超出了公众的容忍限度。不满情绪日益滋长,发展下去将危及统治阶层的权力。

在有些情况下,只要收到了其中的一个信号就足以让经济管理决策层"踩刹车"。当上述两个或三个约束条件同时出现并阻碍投资的时候,经济状况就会极度恶化,将发生最严重的下滑。这种极端情况在波兰就曾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现象,如中国和匈牙利。

对投资领域的所有干预措施都会经过一层由各种延缓因素构成的网络进行传递。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的上升和下滑会分为几个阶段,以及经济增长在减速之后也只能慢慢加速攀升的原因所在。

由于始终存在着强制增长的动机,一旦国内经济状况和外国经济条件允许,那么加速增长又将重新开始。只是因为出现了极度恐慌,以及经济管理者意识到继续严格执行计划已经不现实,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才被暂时遏止。当各级领导确信紧张状况已经缓解,或者稍做休整之后,又有了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此时就又会开始新一轮的生产和投资扩张。

3. *政治路线的变化*。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些基本特征是始终不变的(本书第2部分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些基本特征展开讨论的),但这并不能阻止政治斗争和官僚体系内部的派系争斗[3.5]。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或者最高领导人立场的改变都会导致突然的转向和剧烈的震荡(即使是同一个人掌权期间也不例外)。例如,列宁时期苏联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

政策;在斯大林统治下,缓慢发展合作社变成了迅速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在中国,毛泽东先是提出"百花齐放"的自由政策,然后很快就走向"大跃进"。此外,当老的领导人去世,新的继任者上台并采取了新的政策路线,那么也有可能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化。无论什么情况,政治路线的突然变化都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致使各类指标发生很大的波动。例如,苏联在集体化之后,农业生产急速下降;中国的"大跃进"陡然提高了投资水平,特别是加速发展重工业。

有人曾提出这些政治路线的变化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或者说有一定的节奏:相对较"软"的克制时期之后,就会进入相对较"硬"的激进阶段。平缓的政治路线更为谨慎一些,而强硬的政治路线会要求上马更多的投资项目。①

以上所描述的这些波动都是相互关联的,②它们本身可能会互相叠加在一起,相互加重各自所产生的影响。例如,投资扩张周期的最后阶段会与新的五年计划的实施重合在一起,或者内生经济周期的停滞阶段可能成为改变政治路线的原因,其中包括人事的变动。波兰在1970年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曾满怀希望,认为它们能够实现平稳增长,避免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停滞和倒退,但这一愿望彻底落空了。尽管社会主义的经济波动是由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机制引发的,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但波动毕竟是存在的,而且带来了许多极为严重的后果。

## 9.7　总产出的衡量

在进行总结之前,我想暂时偏离一下主题,谈一谈产出衡量的问题。考虑到本书的主题,我会尽量避免详细讨论统计方法方面的问题,而集中关注

---

① A. Ungvarszky 研究了匈牙利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所有的政治路线变化。根据她的发现,不同"节奏"的政治时期的轮流更替与增长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变动之间具有明显、密切的相关性。也可参见 D. M. Nuti(1986b)和 E. Screpanti(1986)。

② 也存在其他波动,见 J. C. Brada(1986)。例如,5 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波动就远远超过了它们还处于资本主义体制时的波动。这种波动主要与生产政策频繁变动有密切关系。

最重要的内容。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统计里，充斥着虚假和扭曲的数字。这不仅仅是因为计量不精确，而且是因为官方总是力图“粉饰太平”。① 这里我们特别关注那些扭曲产出总量指针(以数字价值衡量)的主要因素。表9.10列出了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总产出的计算方式。第一行是官方统计资料，其他行是另外的估计资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去支持争论中的哪一方(关于数据扭曲)，只需要指出其中的一个共同特征：所有的其他估算数据都要低于官方的经济增长率。采用其他方法进行资料估算的研究者主要是想剔除在统计方面存在的以下扭曲：

**表9.10 经济增长的官方统计和其他估算结果：国际比较**

| | 1961-1970 | 1971-1980 | 1981-1985 | 1986 | 1987 | 1988 | 1989 |
|---|---|---|---|---|---|---|---|
| 保加利亚 | | | | | | | |
| NMP(官方) | 7.7 | 7.0 | 3.7 | 5.3 | 4.7 | 2.4 | -2.0 |
| GDP(官方扩展) | — | 6.8 | 3.4 | 4.2 | 6.0 | 2.6 | -1.9 |
| GNP(替代估算) | 5.8 | 2.8 | 0.8 | 4.9 | -0.9 | 2.0 | — |
| 中国 | | | | | | | |
| NMP(官方) | 4.0 | 5.8 | 10.0 | 7.7 | 10.2 | 11.1 | 3.5 |
| GDP(官方) | — | 5.5 | 10.1 | 8.3 | 11.0 | 10.9 | 3.6 |
| GNP(替代估算) | — | 5.8 | 9.2 | 7.8 | 9.4 | 11.2 | — |
| 捷克斯洛伐克 | | | | | | | |
| NMP(官方) | 4.4 | 4.7 | 1.8 | 1.8 | 2.7 | 2.6 | 1.2 |
| GDP(官方扩展) | — | 4.7 | 1.7 | 3.2 | 2.7 | 2.2 | 1.2 |
| GNP(替代估算) | 2.9 | 2.8 | 1.2 | 2.1 | 1.0 | 1.4 | — |

① 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统计资料的扭曲问题也存在着很多争论。例如，A. Bergson(1961,1978a)、A. Brody(1964,1979)、Z. Daniel(1975)、A. Eckstein(1980)、M. Ellman(1982)、P. Marer(1985)、和A. Nove(1983)。

两位苏联研究者(V. Seliunin和G. Khanin,1987)的文章曾引起了极大关注，他们揭露了苏联产出统计资料被严重扭曲的事实。Khanin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部分统计资料的扭曲现象，但那时没有机会让他公开发表这些发现。Khanin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做出了不同的估算(1988)。有关苏联问题的综述可参见A. Aslund(1990)、B. P. Orlov(1988)、R. Ericson(1990)。

最近以来，对东德的GDP数据又进行了好几次重新计算，结果是一次比一次低。见DIW-Wochenbericht,1991年2月14日。

| | 1961－1970 | 1971－1980 | 1981－1985 | 1986 | 1987 | 1988 | 1989 |
|---|---|---|---|---|---|---|---|
| 东德 | | | | | | | |
| NMP(官方) | 4.3 | 4.8 | 4.5 | 4.3 | 3.6 | 2.8 | 2.0 |
| GDP(官方扩展) | — | 4.8 | 4.3 | 3.9 | 3.3 | 3.1 | 2.3 |
| GNP(替代估算) | 3.1 | 2.8 | 1.9 | 2.2 | 1.1 | 1.1 | — |
| 匈牙利 | | | | | | | |
| NMP(官方) | 5.4 | 4.6 | 1.2 | 0.9 | 4.1 | -0.5 | -1.6 |
| GDP(官方) | 5.3 | 4.7 | 1.8 | 1.5 | 4.1 | -0.1 | 0.2 |
| GNP(替代估算) | 3.4 | 2.6 | 0.7 | 2.2 | 1.1 | 1.1 | — |
| 波兰 | | | | | | | |
| NMP(官方) | 8.4 | 5.4 | -0.8 | 5.2 | 2.0 | 4.8 | 0.1 |
| GDP(官方扩展) | — | 5.3 | 0.1 | 4.2 | 2.0 | 4.1 | -1.0 |
| GNP(替代估算) | 4.2 | 3.6 | 0.6 | 2.7 | -1.7 | 2.1 | — |
| 罗马尼亚 | | | | | | | |
| NMP(官方) | 8.4 | 9.4 | 3.0 | 3.0 | 0.7 | -2.0 | -7.9 |
| GDP(官方扩展) | — | 9.1 | 3.2 | 2.3 | 0.9 | -0.5 | -5.8 |
| GNP(替代估算) | 5.2 | 5.3 | -0.1 | 2.9 | -0.9 | -1.5 | — |
| 苏联 | | | | | | | |
| NMP(官方) | 6.9 | 5.0 | 3.2 | 2.3 | 1.6 | 4.4 | 2.4 |
| GNP(官方) | 7.6 | 5.5 | 3.7 | 3.3 | 2.9 | 5.5 | 3.0 |
| GNP(替代估算) | 4.9 | 2.6 | 1.9 | 4.0 | 1.3 | 1.5 | — |

**资料来源**：由 J. Arvay 根据 P. Marer 等(1991)的研究为基础为本书编辑整理。

注释：官方资料基本来自各个国家的统计年鉴或各国权威部门提高给世界银行的报告。官方扩展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咨询专家，他们考虑了官方 NMP 水平和增长率以及特定国家 NMP 与同期 GDP 数据之间的关系或于其他国家数据的比率。因此，官方增长率中的扭曲问题也会反映在 GDP 增长率的扩展资料中。替代估算主要来自中央情报局(1989)。替代估算主要利用了官方出版的物理数量指针，然后根据产品要素成本或调整后的要素成本进行加权后得出。CIA 的估算以很多资料来源为基础，其中包括 T. Alton 及同事在中东欧国民收入研究项目中得出的一些资料。

罗马尼亚：其中 NMP(官方)1981－1985、1986、1987、1988、1989 各年的资料在该国 1990 年出版的年鉴中对上述年度原先的数字(国民核算账户数据)进行了很大修改。

苏联：其中 GNP(官方)列出的 1961－1970 年资料应为 1966－1970 年的数据。

1. 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的会计体系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一样：即"物质

产品体系”(MPS)和“国民核算体系”(SNA)。[①] 下面仅指出其中几个或大或小的不同之处:MPS 的出发点是要区分“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9.4,优先原则 3]。因此,宏观层面的总产出和净产出(“国民收入”,“物质产品”,NMP)仅仅是指生产领域,而服务领域的产出则忽略不计。背后的理论依据是服务领域的生产并不创造“价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意义上价值概念),因此,服务消费只意味着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而在 SNA 中,产出的衡量(国民生产总值、GNP 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包括了服务。[②] 如果某一体系对服务部门的发展根本不予重视,那么就会导致总产出指标被严重夸大[③]。

2. 价格体系的随意性特征造成了计算的严重扭曲。例如,人为制定的极不合理的基础设施服务(这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被完全忽略)和房屋供给低价格,以及对许多工业产品价格的高估。

3. 价格体系没有合理地反映出质量的缓慢提高、停滞、甚至是下降。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数量增长[9.5]过分夸大了产出总量指标。

4.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一直存在着隐性通货膨胀,但却没有在官方统计中表现出来[11.7]。这样,为了剔除价格水平上涨因素而使用的转换指数(通缩指数)也就非常低,因此,官方宣布的增长率也要远远高于实际增长。

尽管专家们很早就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了“粉饰太平”,经常会

---

① 关于这两种体系不同之处的详细讨论,可参见 J. Arvay(1973)和联合国资料(1977)。

②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统计办公室(以及部分研究者)曾将 MPS 的原始数据转换为 SNA 的数据。这样(再加上其他一些调整)就可以与 SNA 中的有关项目进行比较。见 A. Bergson(1961)。

V. Nachtigal 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 NMP 和 GNP 之间的转换计算工作。

匈牙利是 1968 年之后,唯一同时公布 MPS 和 SNA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国家。

③ 让我们看下面这个虚构的例子。A 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生产性部门而非生产性部门都增长了 6%;而 B 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生产性部门增长了 6%,非生产性部门仅增长了 2%。如果这两个国家都采用 MPS,那么它们的增长率都是 6%。如果采用了 SNA 来计算,那么 A 国的增长率仍然是 6%,但 B 国的增长率将是 6% 和 2% 的加权平均,这肯定会大大低于 6%。

Z. Daneil(1975)用所谓的“增长光学”考察了 1、2 所出现的扭曲问题,并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进行了计算。这项研究得出了匈牙利产出统计资料扭曲程度的估计值。

扭曲和大量编造官方统计资料,但其扭曲和造假的程度始终不为人所知。直到最近一系列原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公开了秘密档案,真相才开始大白于天下。因此,还需要根据新发现的更多的资料来重新考察原来的数量分析。

在此之前,我们还只有继续努力做大量的计算工作,才能逐步修正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统计数字,尽可能使它们接近西方国家的标准。表9.10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限的工作,还有许多其他研究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力图尽量克服各种扭曲因素所造成的影响。[①]

## 9.8 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增长模式:强制增长

本章尝试着描述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增长过程的主要特征。部分特征也出现在其他体制的国家里,特别是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如此,基本的框架特征还是社会主义体制所特有的。这些特征概括起来就是我们在本章开头就提出的强制增长模式。这里"强制"一词,是指发展速度的加快并不是源自社会整体运动的自发推动,而是由官僚体制自上而下强迫执行的。"强制"还意味着社会主义体制想要跑得更快,而它的双腿却根本达不到这样的奔跑速度。

强制增长的主要特征归纳如下:

◆ 高投资和低消费;

◆ 一系列优先原则;

◆ 采用外延发展方式加速利用各种可见的资源潜力;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数量驱动。

---

① 由I. B. Kravishe和他的同事主持的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ICP)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尝试剔除国家价格体系的扭曲影响,并根据购买力平价虚构了一种货币来为所有国家建立数据库。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很多报告,见I. B. Kravis、A. W. Heston和R. Summers(1978,1982)

此外还有中央情报局(1989)的估算和由T. P. Alton领导的东欧国家国民收入研究项目,见T. P. Alton(1977,1981)。

F. Janossy首先引入了采用物理标值的平均指数衡量方法来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该方法后来主要由E. Ehrlich加以运用(1981)。

世界银行赞助的各种统计工作也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见P. Marer(1985)。这项研究工作仍在继续开展,由P. Marer为世界银行所收集的数据是本书中不少表格的主要数据来源。

我们不能把上述主要特征的结合定义为一种"增长战略"。所谓"战略",是指军事指挥官有意识地选择出一套计划方案,而强制增长在进行有意识的选择时,还伴随着各种自发现象,甚至趋势的发展根本不以领导人的意愿为转移。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以及其他官方意识形态思想的影响,有意识地贯彻了1－6项优先原则。但没有人刻意去执行忽视质量、过度使用服务、破坏自然环境以及降低消费等政策。但这些主要特征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计划好的优先项目和自发选择的优先项目,有意识采用的方法和本能使用的方法,希望得到的结果和不希望得到的结果都同时出现。这些特征也不是某位计划者根据自己的偏好独自选择的结果。强制增长模式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参与者的行为与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状况所导致,那个社会构成了他们进行决策的约束条件。盛行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产权关系、协调机制,再加上贫穷落后的初始特征,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便注定了社会主义体制必然要走上这样一条强制增长之路。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再结合各种有关增长的理论文献对强制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下面我们将主要依据三种理论趋势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总结。

第一,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曾有过一场关于增长政策的激烈辩论。[①]当时最激进的"左派"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ii)提出了他著名的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理论。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即残酷地将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执行高储蓄政策,这样就形成了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次"巨大的推动力"。根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这种积累方式,社会主义体制也同样无法避免。必须将投资集中于工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同时必须主动推迟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严格控制消费,甚至不惜降低消费。必须以很低的价格从农民那里购买产品,与此同时,通过税收和制定很高的工业品价格削减农民的购买力。加快实行农业的集体化,这样才能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劳动力。

① P. R. Gregory 和 R. C. Stuar[1974](1986)以及 A. Erlich 对这场争论有过一个很好的综述。

仿佛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悲剧，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及其支持者成为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牺牲品之后，这位独裁者却立刻开始实施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提出的建议，有些做法甚至连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本人都不敢想像。

第二、刘易斯·阿瑟用自己那篇经典文献的题目表达出了他的一个主要观点："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①] 刘易斯分析了资本主义体制发展中国家增长过程中的二元经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部门与逐步衰退的、落后的传统部门同时并存。前一个部门将成功地吸纳从后一部门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流入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工资取决于社会规范所规定的生活水平，而不是由内生的市场力量所决定。

从本章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典社会主义强制增长与刘易斯所阐述的增长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的地方(在第10章中还会继续谈到这一比较)。无论是刘易斯的理论，还是强制增长的实践，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都是第1种外延增长方式，即快速扩张的就业水平和无限的劳动供给(直到被耗尽)。这里我们重点讨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现代化的部门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按照刘易斯的分析，资本主义部门的发展和利润动机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从4—5%提高到12—15%。而根据本章所介绍的情况，再加上社会主义官僚机构能够动用各种手段(这些手段在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储蓄率强行提高到了30—40%。[②]

第三，A. O. 赫希曼和 P. Streeten 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③] 这是一个规范性理论，有人建议将它称为一种增长战略，因为其中有一些所谓的"驱动型"部门，这些部门的过度需求会驱动其他部门迅速追上。本书并不想去讨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采取这种战略。这里想要指出的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实践中遵循了这种增长战略，其中包括前面提

① 可参见 A. W. Lewis(1955)的更多文献。

② 工资方面也有本质区别[10]。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制增长时期，工资既不取决于社会规范，也不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资水平是根据官僚机构认为合适的积累与消费比例进行调整的。官僚机构的决策同时也决定了社会消费模式。

③ 见 A. O. Hirschman(1958)和 P. Streeten(1959)。

到的优先原则。不平衡增长战略的支持者提出的“拉动落后部门”与社会主义体制的持续短缺在概念上有很多重合之处。

## 9.9 增长绩效(表现)

在本章结束之前,我们将强制增长的实际效果进行一个总结。表9.11、9.12和9.13列出了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指标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类增长指标进行了比较。

**表9.11 总产出增长:国际比较**

| | 年平均增长率 | | |
|---|---|---|---|
| | 1961-1970 | 1971-1980 | 1981-1988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
| 保加利亚 | 5.8 | 2.8 | 1.2 |
| 捷克斯洛伐克 | 2.9 | 2.8 | 1.4 |
| 东德 | 3.1 | 2.8 | 1.8 |
| 匈牙利 | 3.4 | 2.6 | 1.0 |
| 波兰 | 4.2 | 3.6 | 0.8 |
| 罗马尼亚 | 5.2 | 5.3 | -0.1 |
| 苏联 | 4.9 | 2.6 | 2.0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
| 奥地利 | 4.7 | 3.6 | 1.7 |
| 法国 | 5.6 | 3.2 | 1.9 |
| 希腊 | 7.6 | 4.7 | 1.5 |
| 意大利 | 5.7 | 3.8 | 2.2 |
| 日本 | 10.5 | 4.6 | 4.0 |
| 荷兰 | 5.1 | 2.9 | 1.3 |
| 葡萄牙 | 6.4 | 4.7 | 2.2 |
| 西班牙 | 7.3 | 3.5 | 2.6 |
| 美国 | 3.8 | 2.7 | 3.2 |
| 西德 | 4.5 | 2.7 | 1.7 |

**资料来源:**由J. Arvay为本书编辑整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数据数据来源,见表9.10,替代估算资料。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料来自OECD(1991)。

注释: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出资料指GNP,但在给定时期内基本与GDP估算值一致。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出资料指GDP。前面曾提到过,研究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数据和

替代估算数据都有不同意见,但都一致同意替代估算数据能够更好地反映真实增长水平。因此,在这里就使用了替代估算数据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

**表 9.12 苏联和美国的总产出增长率**

| 年 | GDP 年均增长率(百分比) | |
|---|---|---|
| | 苏联 | 美国 |
| 1900 - 1913 | 3.5 | 4.0 |
| 1913 - 1950 | 2.7 | 2.8 |
| 1950 - 1973 | 5.0 | 3.7 |
| 1973 - 1987 | 2.1 | 2.5 |

**资料来源**:W. D. Nordhaus(1990)以 A. Maddison(1989,第 36 页)为基础计算。

注释:由于某些原因,Maddison 的估算不能与表 9.10 中苏联的增长估算进行直接比较。例如,分期不一致。与苏联官方统计机构给出的增长率相比,Maddison 的估算更接近表 9.10 中的替代估算。

**表 9.13 总产出增长率:中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

| | GDP 年均增长率(百分比) | |
|---|---|---|
| | 1965 - 80 | 1980 - 87 |
| 中国 | 6.4 | 10.4 |
| **中低收入资本主义国家** | | |
| 阿根廷 | 3.5 | -0.3 |
| 巴西 | 9.0 | 3.3 |
| 印度 | 3.7 | 4.6 |
| 印度尼西亚 | 8.0 | 3.6 |
| 墨西哥 | 6.5 | 0.5 |
| 巴基斯坦 | 5.1 | 6.6 |
| 韩国 | 9.5 | 8.6 |
| 泰国 | 7.2 | 5.6 |
| 土耳其 | 6.3 | 5.2 |

**资料来源**:J. Echeverri - Gent(1990,第 105 页)。

这里只限于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阶段的评论[①]:的确有不错的增长业

---

① 对部分国家来说,其中有两个表格包括了改革时期的数据。对于这部分数据,我们以后还会谈到[16.1,23.2]。

绩,但并不突出。相比来说,许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取得了更快的增长。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经典体制的早期,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都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确实让许多国家摆脱了严重落后的状态,进入了中等发展阶段。如果将表中的数据重新下调,那么所取得的成绩可能会变得差一些,甚至会严重缩小。

当然,这种判断往往值得怀疑,因为这还要取决于将来再对社会主义国家统计资料进行重新审核调整后的结果。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得出部分结论。

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对快速增长赋予了很高的内在价值,甚至盲目迷恋高增长率所带来的总产出增长,为此可以不惜任何代价。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察者,我们不能接受这样一种短视的价值衡量标准。即使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很高的经济增长(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以下问题依然无法回避:为了实现这样的经济增长率,到底应该做出什么样牺牲?在这些增长指标的背后,是什么样的经济结构?

强制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太大。它强迫人们"节衣缩食",让那一代人承受了太多的苦难。[①] 与此同时,这种增长模式还往往"自食其果",即使最初阶段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经济增长率迟早会逐步下降,而且越来越明显。每一代人都会为下一代人留下沉重的包袱(由于总是推迟,紧急和繁重的任务将不断累积)和极不协调的经济结构。

① 在讨论短缺和消费时,我们还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11,12,13]。

# 第十章　就业与工资

根据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人的劳动力是一种商品，如同一件可以在市场上用货币进行买卖的东西。获得自由的条件之一就是取消劳动力的商品属性。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官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已经取消了劳动力的商品属性，一个人的劳动能力再也不是一件商品。[①] 把这个概念转换为本书的语言，那就是劳动力的配置将不再由市场机制协调。

本章考察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劳动力配置问题。[②] 在结尾部分，我们还会再回到上面官方所宣传的观点，看一看经过本书的分析之后，这种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站得住脚。

本章首先介绍劳动力配置的长期特征，然后是其短期特征，接着研究短期劳动力配置参与者的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章只涉及公有制部门（国有企业，非企业性质的国有单位，合作社）的就业问题。[③] 前文已经说明，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其他社会部门几乎微不足道，因此，我们将在后面改革阶段时再讨论其他部门的就业问题[19.2,22.2,23.1]。

---

① 下面一段文字引自斯大林时代的官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的工资与资本主义的工资有本质的区别。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力已经不再是一种商品，工资也不是劳动力的价格。它不是反映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而是反映了由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所代表的整个社会与为了自己和社会而工作的个体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54，第452页）。

② 一般性综述，见参见 J. Adam(1982,1984)、A. Bergson(1944)、J. G. Chapman(1963)、M. Ellman(1985，第9章)，以及 A. Kahan 和 B. Ruble 等(1979)。

③ 本章在使用诸如"就业"和"劳动需求"等词汇时，就是指公有制部门的就业和劳动需求，此后就不再进行特别说明。

## 10.1 通往全面就业之路

强制增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外延增长方式就是动员剩余劳动力[9.5]。[①] 各个国家的剩余劳动力比例都有所不同,但下面基本列出了所有可以被公有制部门吸纳的劳动力供给来源:

1. 公开失业。这包括所有曾经有工作、但由于某些原因而失去工作的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城市里),其中部分失业可能源自仍然残存的资本主义体制。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类公开失业都有官方记录,例如,职业介绍所里的登记。

2. 潜伏(隐藏)失业。这种失业主要出现在发展落后的国家(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夺取政权的时候都是贫穷落后的国家)。这类失业者一般都只有一份临时工作,或者依靠出售一些零散商品或服务获得收入,但他们都没有长期稳定的职业。他们也会在家庭农场里工作,但家庭农场可能随时都不再需要他们。这种大规模的"半就业状态"主要出现在农村,但城市里也同样存在。与公开失业不同的是,隐性失业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不会登记在职业介绍所里,尽管人数可能会比公开失业人数高出几倍。越是贫困、工业落后和处于停滞阶段的国家,潜在失业人口的规模就越庞大。

3. 家庭企业工人。大规模集体化[5.5]和国有化运动将那些在小型家庭农场或中小工商企业工作的人都变成了公有制部门的职工。

对农业部门而言,即使在集体化之前,也有人从事全职工作,但他们都是为自己或家庭工作,现在却要为公有制单位工作。其他一些农村劳动人口实际上属于第2种情况,但他们的劳动没有充分利用,劳动地位也没有得到公开认可,因为他们是在"家里"干活,集体化使他们未能充分利用劳动的情况逐步显现出来。这样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到当地的合作社或村里和城市里的其他国有企业里找工作。农业集体化为其他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提

---

① "剩余"是与"短缺"对应使用的。我特意选择了一个中性词,"储备"一词有增值和批准的含义,而"过度"又带有贬义色彩。因此,只有在确实需要表达批准和谴责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才会使用劳动力储备和劳动力过度这两种说法。

这一术语使用上的问题在更广泛意义上同样适用于其他所有商品、服务或资源[11.4]。

供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4. *“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通常是革命过渡阶段,就剥夺了大资本家、地主和其他有钱人的财产。后来,在经典社会主义阶段,又紧接着没收了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工具,即使没有将他们的个人财产充公,但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将这些财产慢慢瓜分了。大规模集体化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彻底消灭富农阶层并剥夺他们的全部财产[5.5]。

这一社会阶层的人部分被流放,部分被处死、关入监狱或送进劳改集中营。那些有幸逃脱厄运的人或后来从集中营释放出来的人都进入了公有制部门。

5. *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这部分人与2、3、4都互有重合。

新的家庭生活模式和相应的工资水平是导致妇女大规模就业的重要诱发因素。随着强制经济增长的不断推进,所有家庭越来越感到按照新社会规范所设定的标准要求夫妻双方都上班才能维持基本的家庭生活。单单靠一个男人的工资根本无法维持妻子及其家庭成员的平均生活水平。

6. *人口增长*。这是通常意义上的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剩余劳动力。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人口普遍出现了大规模的增加,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适工人口也有大幅上升。

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某些时期往往对人口增长速度不满意并采取了行政措施来提高人口增长率。而另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政策却恰恰相反:使用极为残酷的手段人为抑制人口增长。[①]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个传统上一直由家庭机制进行协调的领域也采取了官僚协调的手段来进行干预。

1—6 构成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外部剩余劳动力来源。[②]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剩余劳动力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公开失业人口,而这其中很多所谓的“剩余劳动力”从来就没有“就业”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把他们称为“失业者”。

---

① 例如,匈牙利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都采取了强制性人口增长政策。典型的行政干预手段包括人为制造避孕产品的短缺,严格禁止流产(并非出于健康、伦理道德和宗教等方面的考虑,而是公开宣传是为了社会的经济利益和劳动力生产的需要);国家还为鼓励生孩子出台了物质奖励办法。而中国在70年代后期采取了相反的干预措施,实施了严格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② 这里之所以使用“外部”一词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工厂内部的失业”,这构成了“内部”的剩余劳动力。

表 10.1 40－44 岁年龄组妇女的参与率：国际比较

| | 1950 | 1960 | 1970 | 1980 | 1985 |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 | |
| 保加利亚 | 78.6 | 83.4 | 88.5 | 92.5 | 93.3 |
| 捷克斯洛伐克 | 52.3 | 67.3 | 79.9 | 91.3 | 92.4 |
| 东德 | 61.9 | 72.7 | 79.1 | 83.6 | 86.1 |
| 匈牙利 | 29.0 | 51.8 | 69.4 | 83.2 | 84.7 |
| 波兰 | 66.4 | 69.1 | 79.5 | 83.2 | 84.7 |
| 罗马尼亚 | 75.8 | 76.4 | 79.5 | 83.1 | 85.1 |
| 苏联 | 66.8 | 77.9 | 93.2 | 96.9 | 96.8 |
| **北欧国家** | 30.9 | 39.9 | 53.8 | 69.9 | 71.1 |
| **西欧国家** | 34.5 | 39.5 | 46.4 | 55.1 | 55.6 |
| **南欧国家** | 22.4 | 25.3 | 29.7 | 35.7 | 37.1 |

**资料来源**：由 J. Kollo 以国际劳工组织(1987)的数据为基础为本书编辑整理。

注释：西欧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西德、荷兰、瑞典、卢森堡、英国；南欧包括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西班牙；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北欧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地区平均值没有进行加权。本表按地区进行的分类不同于 ILO 的最初分类。

表 10.2 苏联劳动人数的增长

| 年份 | 劳动人数(百万) | 分期 | 劳动人数<br>年均增长率(百分比) |
|---|---|---|---|
| 1927 | 11.3 | — | — |
| 1932 | 22.8 | 1927－1932 | 15.1 |
| 1937 | 27.0 | 1932－1937 | 3.4 |
| 1950 | 40.4 | 1937－1950 | 3.1 |
| 1955 | 50.3 | 1950－1955 | 4.5 |
| 1960 | 62.0 | 1955－1960 | 4.3 |
| 1965 | 76.9 | 1960－1965 | 4.4 |
| 1970 | 90.2 | 1965－1970 | 3.2 |
| 1975 | 102.2 | 1970－1975 | 2.5 |
| 1980 | 112.5 | 1975－1980 | 1.9 |
| 1985 | 117.8 | 1980－1985 | 0.9 |
| 1986 | 118.5 | — | — |
| 1987 | 118.5 | — | — |
| 1988 | 117.2 | — | — |
| 1989 | 115.4 | 1985－1989 | －0.5 |

**资料来源**：由C. Kruger根据以下资料为本书编辑整理：1927和1932：A. Nove(1969，第192页)；1937：A. Nove(1969，第226页)；1950和1955：A. Nove(1969，第342页)；1960、1970、1980和1985：Financsy I Statistika金融统计(1987，第411页)；1965和1975：Financsy I Statistika金融统计(1987，第463页)；1986和1987：Financsy I Statistika金融统计(1988b，第38页)；1988和1989：Financsy I Statistika金融统计(1989 a，第48页)。

注释：劳动人数包括集体农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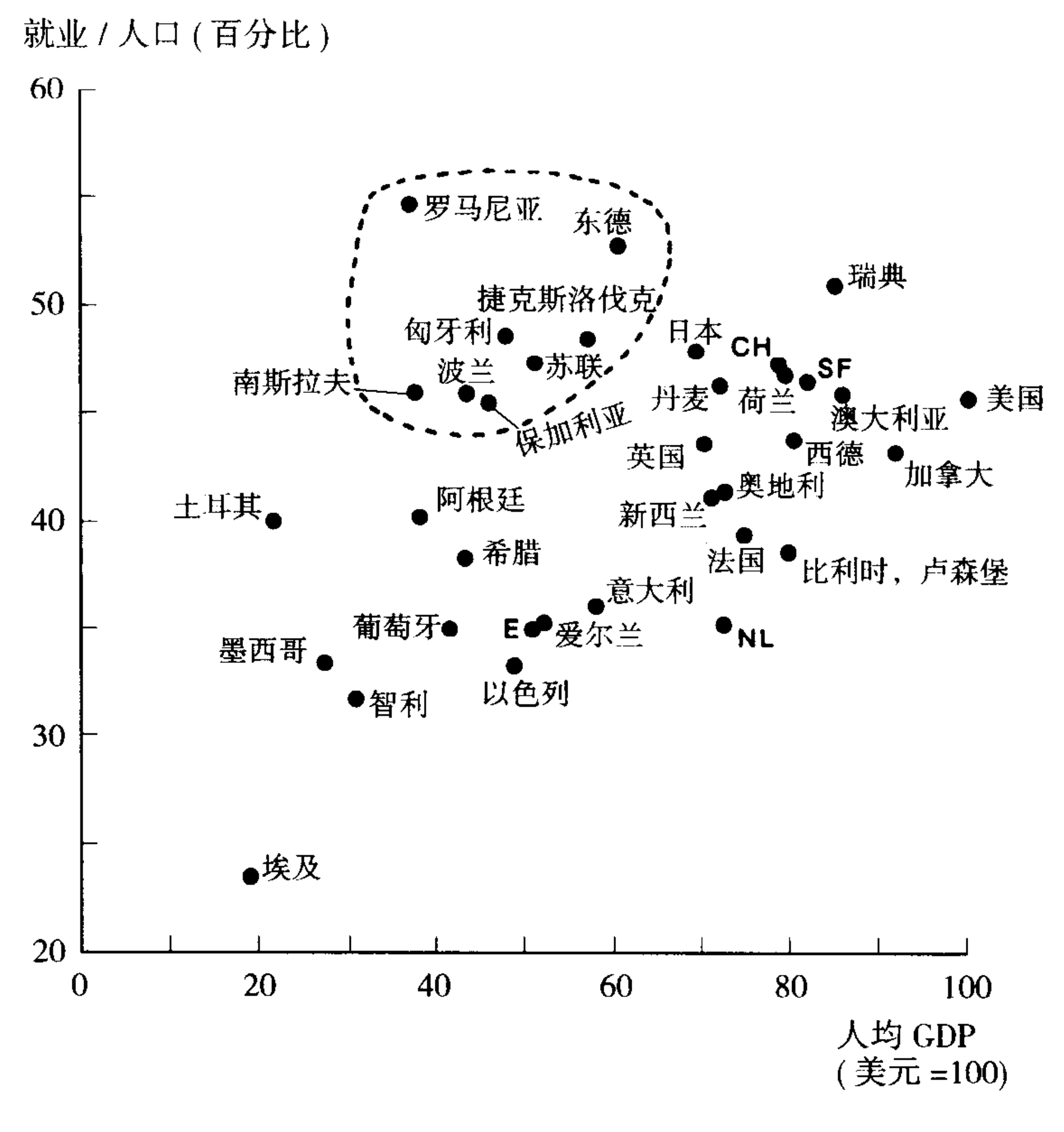



**图10.1　就业率与发展水平，1980**

**资料来源**：图中数字以J. Köllö整理的资料为基础。

随着强制增长的不断向前推进，它从上述6个来源中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直到最大承载限度，更准确地说，是直到这种外延增长方式已经无

法继续为止。[①] 表10.1和10.2列出了有关资料。[②] 实际就业人员占可就业总人口的比率,即所谓的参与率,已经达到了最高极限。图10.1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达到了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参与率,主要是因为大量的妇女就业。[③] 这里需要对图10.1中的数据作一个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参与率之间没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如果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参与率进行对比的话,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国家在任何一个经济发展水平阶段都拥有最高的参与率。图10.1中的数据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剩余劳动力只是潜在的劳动力供给,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变成真实的劳动力。这种转化需要有以下几个诱导因素:

第一,现实中的机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在附近的新工厂建起来之前,只能在村子里懒散地晃荡着。机遇就像一个磁石,许多人在没有碰到好机会之前都会积极地寻找工作。这样,他们就成为劳动供给的一部分,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需求创造了自己的供给。

第二、长期工作岗位的物质保障(利益)。第1组中的失业人员急于找到工作就是为了生活。长期稳定的工作对失业者而言是巨大的宽慰和救助。生活同样迫使第4组劳动力(他们曾经是社会精英阶层)去寻找工作。出于物质收入考虑(前文提到过的社会生活模式的改变),原来在家中操持家务的妇女也要出来工作。

第三,官僚机构的各种强制措施。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规定工作不仅是一项权利,而且也是一项义务。在实际中,这意味着(除了后文提到的少

---

① 考虑到第6个来源(人口增长),我们不能够说人口外延增长方式会被全部耗尽。即使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吸纳了所有的剩余劳动力,只要人口继续增长,它就能够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供给。

② 苏联的参与比率(即就业人口占中15-64岁总人口的比例)1980年为86.6%,而同期OECD欧洲国家的比率为66.5%,美国为70.9%。妇女的工作参与比率为87%,而同期OECD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比率分别为48.5%和59.7%。见G. Ofer(1987,第1793页)。

③ 从表10.1的40-44年龄组的分布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妇女工作参与率相当高。这一年龄段的妇女已经超过了进行自我接受再教育的年龄,孩子多半10多岁(不太需要父母照顾),而此时离退休还早。正如表中所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参与广度也要远远大于资本主义国家。

数特殊情况之外)在公有制部门工作是一项义务。那些不工作的人被称为“寄生虫”,当局会强迫他们工作。

在微观层次上,供给关系常常发挥着重要作用:提高工资就会刺激劳动供给[10.5]。但在本书所关注的宏观层面上,就看不到这层关系了。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并不是因为雇佣者愿意提供更高的工资。即使平均名义和真实工资长期保持不变,甚至下降,劳动力总供给仍然会增加,[①]因为诱发劳动力寻找长期稳定工作的因素依然存在。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曾承诺要彻底消除没有工作的现象并保证实行全面就业计划。当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逐步稳定下来以后,这一承诺被写入了宪法。但必须加以说明的是,这一体制从来没有有意识地设计过一个旨在实现全面就业的政策,从而可以最终吸纳剩余劳动力,那只是强制增长的一个副产品。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曾经详细讨论过的那样:社会主义体制将不惜任何代价追求最快的增长速度,实现这一目标所采用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第1种外延式扩张,即尽快将剩余劳动力投入公有制部门进行生产。

一旦这一进程开始起步(而且官方意识形态将之列为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成就之后),工作就成为了工人们“已经获得的权利”,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既不能也不想否认这项权利。这样,全面就业也就变成了一项得到保证的权利(以及有永久性的工作单位)。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权利,而不是名义上宣称的权利。这项权利不仅有就业政策原则和实际实施的保障,而且得到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运行机制的支持(毕竟那里总是存在持续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

就社会主义体制的某些最终道德价值而言,长期全面就业是该体制的重要成就之一。这项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可以获得稳定的物质收入,它还在以下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给人们带来了收入的安全感,坚定了工人们为单位工作的决心和恒心,帮助妇女获得了同等的权利。

但这一成就也有其负面影响。首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走上全面就业之路的。第1、2和6组的剩余劳动力,即那些处于公开失业和潜在失业状态的人以及刚刚开始寻找工作的人,他们是受益者。但对于

①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妇女们之所以要去工作,恰恰可能是因为男人们的工资太低。

第3组剩余劳动力(其中包括成千上百万的农民和独立职业者)而言,他们的生活方式被集体化彻底改变。大多数人是在当局的铁碗政策下,被迫进入公有制部门工作。第4组剩余劳动力,即那些旧社会的富人和所谓“特权”阶层,遭受了极为悲惨的折磨。第5组的妇女们则离开了家庭,她们有所得,亦有所失。这些就是走上全面就业之路的部分代价:有牺牲者,也有半输半赢的人。此外,当全面就业逐步稳定下来,而且下一代人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时,这种劳动配置方式就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后面部分我们将对此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最后还需要提一下增长与全面就业之间的关系。有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部分国家)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框架内实现了全面就业。但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实现,例如中国。当剩余劳动力还远没有被全部吸纳到公有制部门的时候,这些国家就走上了改革的进程。

## 10.2 劳动力持续短缺的形成与发展

在实现全面就业之前,社会主义体制能够动员大量的外部剩余劳动力,但同时也无法避免出现局部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 大部分剩余劳动力都缺乏技术,这样就使得快速增长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严重缺少拥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9.5,集约增长方式3]。[①] 这种短缺出现在各种职业中:需要更多的技术工人,更多的中级和高级教育专业人士,更多有经验的管理者。

◆ 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居住在农村,而短缺主要是在城市里。在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前,就需要尽快发展城市住房和其他相关服务,但这些工作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属于次要任务,常常会被推迟。

◆ 劳动力短缺的另一个原因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些地区发展很快,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剩余劳动力往往集中在其他地区。如果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地区是人们不想去的地方,那么问题就更为严重。例如,如果新的

---

① 也会出现非技术工人的短缺,这主要发生在需要强体力劳动的领域,或者需要在恶劣条件下进行的工作。在传统上,这些工作都是由男性承担的,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剩余劳动力中主要包括大量妇女。通常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妇女们也去从事这些艰苦的体力劳动。

工业位于气候条件差、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人们当然不愿意去那样的地方工作。[1]

上述三种现象可以称之为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任何体制都会出现这种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现象，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它们具有明显的体制特征。

如果认为一个经济体只能是或者有劳动力剩余，或者有劳动力剩余，两者不可能并存，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当然，倘若只是考察微观层面的劳动力配置问题，短缺和剩余确实不可能并存。例如，一家工厂在特定时期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工作岗位，符合条件的人就会被雇佣。在工厂的周围地区也有居民能够而且愿意从事这些工作。对这些比较具体并可以准确说明的劳动供给和需求而言，我们可以说在特定场所和特定时期内是存在短缺，还是存在剩余。但如果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观察，如加上好几个工厂，好几个地区，以及更长的时间段，那么就会同时出现过度供给和过度需求的现象。考察的范围越广，同时出现这两种现象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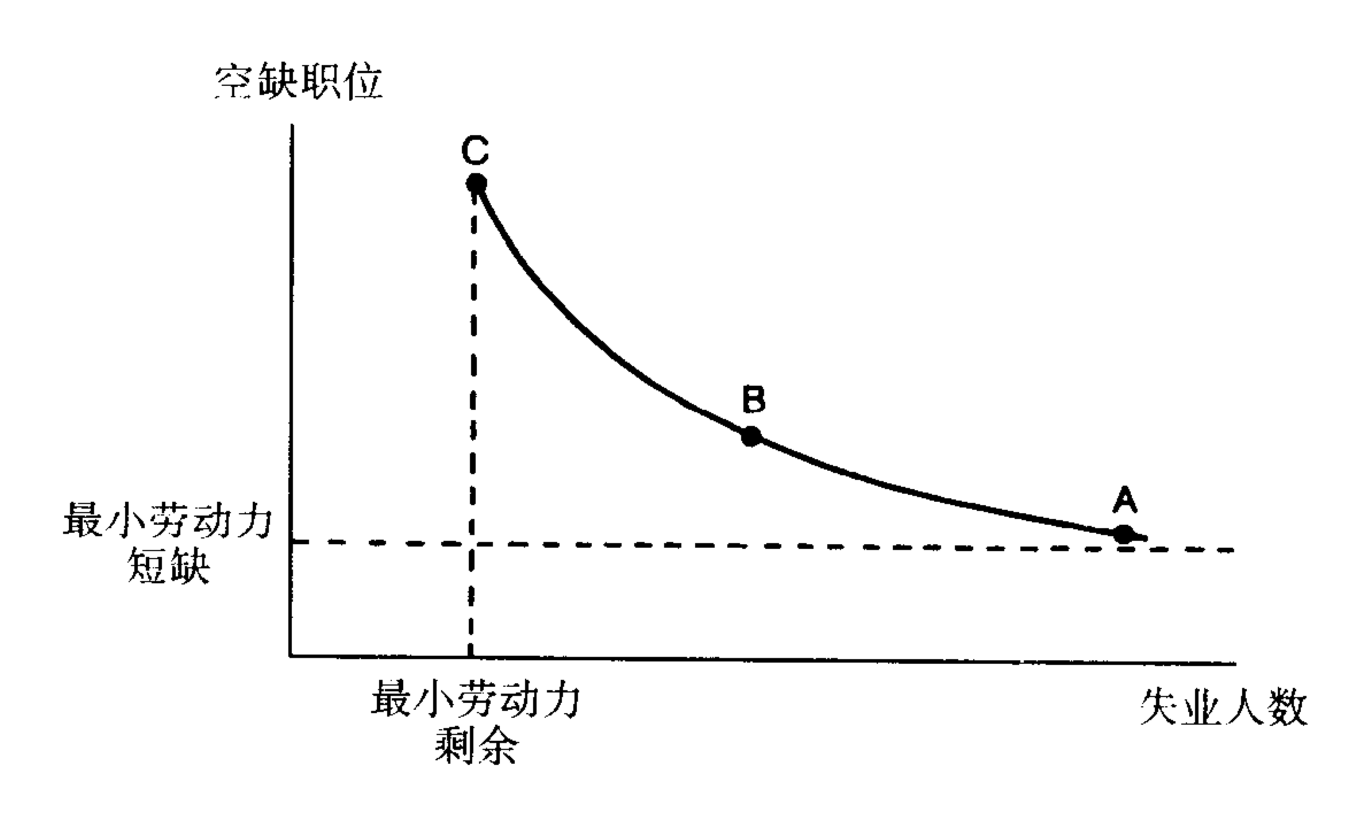



**图 10.2 贝弗里奇曲线**

图 10.2 画出了贝弗里奇曲线（Beveridge curve）。[2]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

---

① 如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建设和发展。

② 以英国劳动经济学家 W. Beveridge 命名。这一曲线广泛应用于劳动经济学。见 K. G. Abraham 和 J. L. Medoff(1982)的文章。

指社会主义国家总的劳动力水平,即考察特定时期国家宏观层面上的劳动力配置。横轴衡量了可能存在的劳动力剩余:实际就业人口总数与适龄人口总数之间的差额。纵轴衡量了可能存在的劳动力短缺:工作空缺的数量。曲线上的每一点都表示剩余与短缺的特定组合。

强制增长从A点开始:大量剩余(劳动力),但也有部分短缺。随着增长过程的推进,剩余劳动力逐步缩减,短缺增加。B点是一个中间状态,[①]C点表明无法再动员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就业,劳动力短缺非常严重。

可以把C点所代表的状态看作是全面就业,因为它构成了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最大可能的就业水平。但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的问题。如图中所示,即使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实现所谓的"全面就业",因为全面就业是要求所有具备工作能力的人都有一份工作。那么为什么会存在有工作能力的人无法就业的现象呢?其中包括以下原因:

1. 有些人自愿选择不就业,如果能够符合一定的标准,当局会适当考虑免除他们的工作义务。例如,大家庭的妈妈可以不必到公有制部门工作。但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一方面,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当局批准或拒绝个人要求免于工作的标准也有所不同。

2. 存在临时的摩擦性失业。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类型的失业在任何体制下都存在。当某人离开工作岗位后(不管是他/她主动辞职还是被解雇),他/她通常都不可能立刻就找到新工作,即使存在大规模的劳动短缺也会如此。这种失业现象与前面提到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失衡有密切的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与体制的适应能力有关:即体制运行本身的摩擦程度以及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调整速度。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劳动力流动存在着很多限制,有些(如住房短缺)在前面已经提到,还有一些限制(职工与单位的关系,以及妨碍流动的其他问题)在后面还会讨论到[10.5]。社会主义僵化的官僚协调严重阻碍了生产和劳动的重新配置,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调节能力非常有限。图10.2中的贝弗里奇曲线也显示出

① 这一点可以用实例代表,例如中国,但它在此时已开始进入改革阶段。

了这种摩擦性失业,即在C点还存在剩余劳动力,没有达到全面就业。①

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把“剩余”和“动员”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为了计算剩余劳动力,必须减去那些有工作能力、但没有被动员到公有制部门工作的人。②

再让我们回到图10.2,纵向虚线代表了最小剩余量,即那些有工作能力、但没有就业的人:这一障碍是劳动力吸纳过程所无法逾越的。横向虚线表明了最小短缺,即不管有多大剩余,空置岗位不可能比这个数量还少。整个经济的就业水平基本位于这两条虚线以内。

如果增长使得经济达到了C点,而且始终维持在C点附近。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出现了持续性的短缺。图10.2中的C点是经济中的常态:正常的劳动力剩余和劳动力短缺结合在一起。这里的“常态”或“正常”等词语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也许没有人会认为处于C点状态是一件好事。所谓“常态”仅仅是指在该体制下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整个社会认为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尽管有关劳动力剩余和短缺的长期数值经常会发生变化,但C点表明了现实中跨期平均水平。③(关于正常劳动力剩余和正常劳动力短缺的概念,我们还会在下一章进行详细讨论)。

从图10.3中有关波兰的一系列数据中可以看出劳动力短缺不断增长的情况。图10.3标出了空置岗位与求职者之间的比例。当指数为1时,表明

---

① 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有人花了几个月时间都找不到工作,尽管整个经济中仍然有大量的岗位空置。

有些研究者把在一个月内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归为公开失业,而非暂时的摩擦性失业。P. R. Gregory和I. L. Collier(1988,第617页)以对苏联流亡者的调查问卷为基础,计算出苏联在1974－1979年的失业率为1.1%而I. Adirim(1989)报告了更高的失业比率,特别是在亚洲地区。

②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其中的一些原因,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尽管本章并不是专门要探讨这个问题,但需要说明的是,有些人在得到了当局的许可后,可以在各类私人部门工作(知识阶层的自由职业者,私人手工艺者等等)。这些人是不在公有制部门工作的。

③ 下面是存在持续性短缺的重要间接证据: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周期性波动[9.6]。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波动非常剧烈,生产波动相对较小,而就业几乎没有变化,即使在经济衰退期,就业率也很少下降。

表9.10把投资波动作为平均增长率的标准差进行了衡量,表中数据显示6个东欧国家(合在一起)的投资标准差为5%,而就业的标准差(按同一方法计算)却只有0.4%。(资料来源,见表9.10)。

劳动力短缺和剩余实现了整体平衡。波兰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就已经到达了这一关键平衡点，在后来的20多年里，几乎上升到了100。换句话说，此时1个求职者对应着100个空置岗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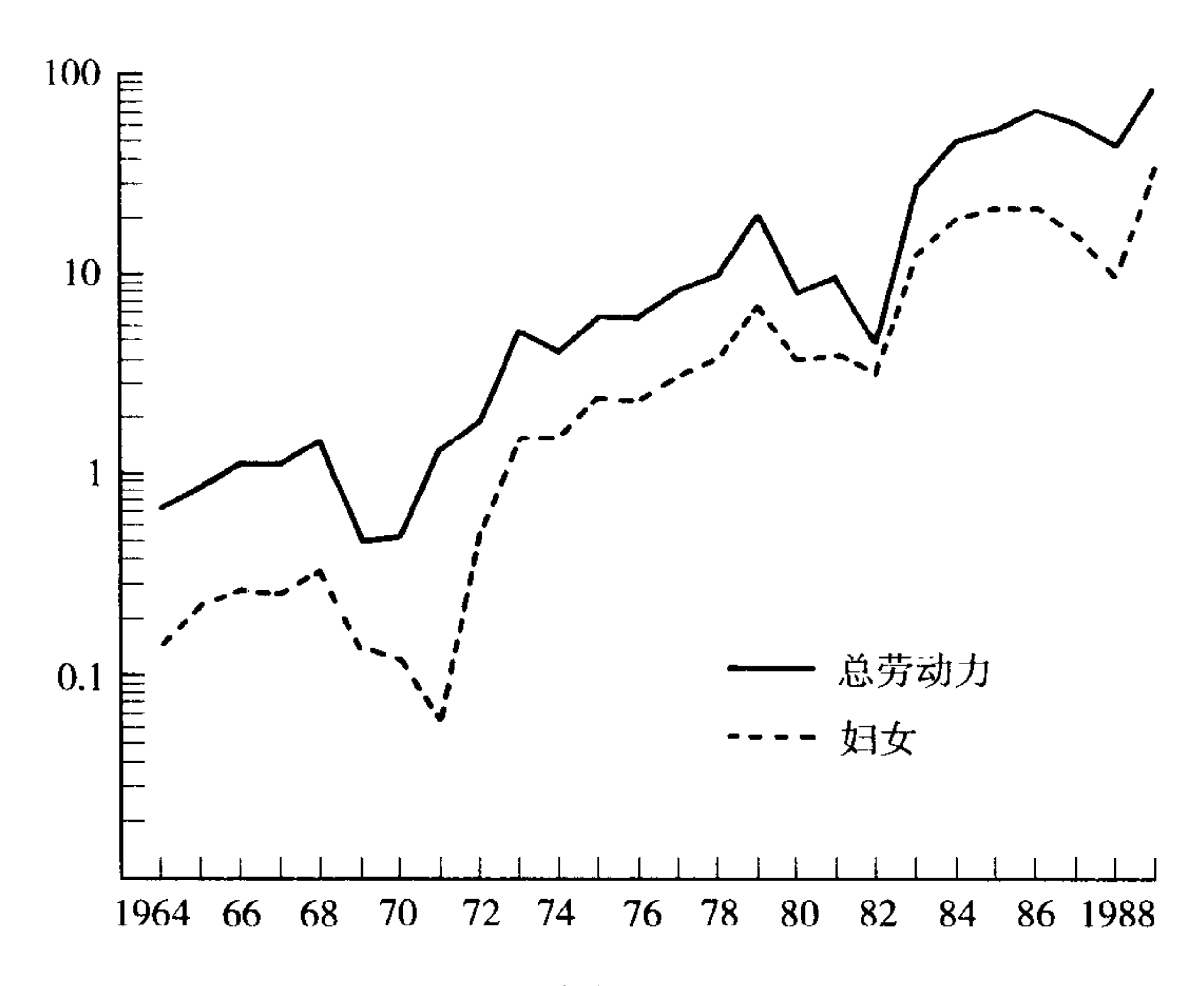



**图 10.3 波兰空缺岗位/寻找工作者比例**

**资料来源：**本图由J. Köllö整理绘出，数据来自Z. M. Fallenbuchl（1985，第33页）和R. Holzmann（1990，第6页）。

如果能在没有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同时实现全面就业，那当然最好不过。但彻底消除劳动力剩余和短缺只会出现在理论模型里，现实的经济运行中总是存在很多摩擦。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保障实际的全面就业恰恰偏离了这种"完美均衡"，而形成了严重的持续性劳动力短缺，想要工作的人太容易找到工作。

劳动力短缺促使管理经济运行的决策者不断努力用资本来替代劳动力，也就是说，相对使用更多的资本密集型技术来释放劳动力。决策者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利润计算，即与使用资本的价格相比，相对稀缺的劳动力已经变得更贵。即使价格反映了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决策者也很少会注意价格信号[8]。（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信号几乎无法反映稀缺性的

变化[10.5])。

决策者更多是受到了非价格信息的影响。日复一日,他们不断收到短缺信号。例如,招聘广告无人问津,自行要求离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因为人们知道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体制发现经济已经达到了人力供给的最高上限(人力是最重要的资源)。决策者明显感到"这种情况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必须采取措施来应对持续的劳动力短缺。

## 10.3 就业和工资的直接行政控制

鉴于篇幅所限,本章在后面部分将只探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实现全面就业之后的问题。在社会主义体制实现全面就业以前,劳动力的配置机制既与下面将要考察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但在此就忽略不谈了。

本部分和下一部分主要分两个层次来研究纵向控制。**10.3** 部分集中关注官僚体制内部的控制过程,从中央管理层到车间领导。而 **10.4** 部分主要研究官僚机构与普通职工之间的关系。

**10.5** 部分考察了官僚协调机制和市场机制对工资的综合影响。最后一部分从其他角度分析了工资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当讨论官僚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时,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以前提到过的年度计划和日常经济管理。对劳动力配置的官僚控制与年度计划和日常管理紧密相连,构成了一个整体,因此,这里就不再重复很多细节问题。我们将重点探讨经济管理过程中对劳动力的管理。

这一过程从开始受教育阶段就开始了,即为社会主义事业教育和培养年轻人。对于父母和年轻人来说,他们的选择受到了严格限制,很少有进一步深造和转换专业的机会,或者当局对未来的学习会有严格的规定。年轻人在完成学业之后,也同样受制于各种限制:官僚机构会进行各种干预,从"分配输送"到某个工作场所,直至强制安排工作岗位。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劳动者完成学业进入工作后的情况。在这一阶段,劳动力的配置主要包括控制就业和工资。在进行计划和经济管理时,官僚机构不会对每一项计划指标和各种经济活动给予同等关注[7.7]。他们会

优先处理部分问题，其中职工人数和工资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它们都要遵守极为严格的管理规定。

熟悉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情况的人可能会产生误解，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其目标居然不是鼓励国有企业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工人，而且恰恰与之相反，对国有企业的人数有严格的上限。[①] 我们不要忘记，此时经济已经处于劳动力持续短缺的状态，但当局仍然使用各种行政手段来限制就业的增长。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纵向短缺：企业对劳动力的总需求超过了分配者的总配额。[②]

工资也同样有最高限额，其中包括以下几类形式：工资发放总额的上限（称之为工资基金的绝对数量限制）；规定平均工资（总额数或职位数）；根据生产完成情况决定工资发放数量，如此等等。事实上，工资也是“专款专用”[8.9]。不管一家企业节约了多少物质或其他支出，它都无权用这些节约下来的成本超出国家规定的上限来为职工多发工资。企业总开支的预算约束非常软，但工资支出的预算约束却非常硬。

编制计划过程中关于劳动力的问题也是讨价还价的主要内容之一。需要人员的单位希望能够招进更多的人以及可以支付更高的工资，这样才更容易完成生产计划（或者，对投资项目而言，是更容易完成项目建设任务）。这时，分配者又会扮演“双面门神”的角色，对下级部分严格要求，同时又向上级机构争取更宽松的目标。

在纵向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就需要考虑各级领导的利益和行为特征。他们总是想争取更多的投资（导致扩张和投资饥渴）和更多的工资基金（更容易获得劳动力并让职工满意）。也可以这样说，他们既想有更多的投资，又想要更多的消费，而这两种需求在宏观层面上明显是相互矛盾的。实际上，最终只有最高层领导才会意识到这是两个相互冲突的要求，即将生产划

---

① 在剩余劳动力没有被完全吸纳之前，许多国家规定了国有企业的招工配额，即它们必须吸收多少新工人。庞大的招工计划很快就将这些配额填满。尽管在宏观层面上依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部分企业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这促使经济领导人采取扩大招工计划的办法来解决企业的短缺问题（见上一部分对结构性短缺的评论）。

② 例如，在某一地区，只有一家上规模的企业。在为企业职工人数上限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纸上所规定的劳动力配额往往影响不大，真正起作用的是实际中的约束因素，譬如该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水平。

分为投资(以及其他国家开支,如军队)和消费所产生的矛盾。他们享有决定权,但在那种政治和经济结构条件下,必须由他们做决定,然而不管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抑制投资或消费,或者根据资源情况满足下级的要求),都不会有天然的盟友来支持他们。每个人,甚至包括自己的下属,都会强烈要求他们既增加投资又提高消费水平。此时,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只有通过行政指令、奖励及惩罚措施人为地建立起同盟军,促使人们执行决定。

## 10.4 工厂里的“雇主”—“雇员”关系

现在我们将目光从权力中心转向工厂。[①] 从很多方面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似乎与其他体制下的工厂(企业)情况类似。至少,乍一看去,技术流程、生产的组织(这里没有对此展开进一步研究)和人际关系都有相似之处。有工厂老板、管理层、生产管理人员、领班,这些人负责下达工作命令,然后就是执行任务的工人们。尽管社会主义工厂的老板和资本主义企业的老板一样,实际上也是拿工资的雇员,但他们同时也是雇主的代表,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在很多方面又和工厂的职工处于对立地位。

从扮演的角色来看,社会主义的工厂老板和资本主义企业的总裁在行为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鉴于本书主题,我们在此重点研究社会主义企业具有哪些特有的体制特征。[②]

在一家社会主义工厂里,雇员和雇主的行为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明显处于一种非常模糊不清的状态。首先来看雇员,我们先讨论有哪些因素增强了他们在与雇主相处时的地位,然后再看看哪些因素又削弱了他们的地位。

在实现了全面就业之后,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借用市场机制的术语来说,那里出现了所谓的“卖方市场”,即在真正的市场环境下,卖方(这里卖方就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能够要求买方接受买卖条件(这里

① 本章轮换使用了工厂和企业这两个称呼。当然,所谓工厂或企业也还有更小的企业(如工厂内部独立的商店或单位),这里的有关描述同样适用于它们。

还需要指出的是,对工厂的讨论也同样适用于非企业国有机构。

② 关于老板与工人之间冲突问题的出色研究可参见 M. Haraszti(1978)。

买方就是购买劳动力的企业)。尽管官僚控制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对劳动力持续的过度需求仍然产生了类似于市场压力的强大影响,并最终影响到工人的行为。如果工作条件和工资始终令工人们不满意,他们通常也会离开工作岗位,而且并不担心到别的地方就找不到工作。[①] 由于意识到能够"退出"(借用赫希曼的话),工人们有了更多的勇气批评上级领导和反对他们的命令。从这一点来看,经典社会主义可谓独一无二,从来没有过一种经济能够在这么长时间内处于全面就业与持续劳动短缺同时并存的状态。

除了辞职以外,工人们保护自己利益的另一个武器涉及到工作表现,即"怠工"行为。有时候,怠工仅仅是因为不喜欢很繁重的劳动,而且即使不努力,也照样拿工资。有时候,工人故意怠工是为了从老板那里争取更高的工资和其他优惠的工作条件。工人们之所以使用这种武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不可能被开除(需要他们干活),另一方面是因为老板在惩罚工人之前总是瞻前顾后,不敢轻易下令。

在官方意识形态里,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政治体制是工人阶级权力的具体体现。不管工人们对此是真信,半信半疑,还是根本就不相信,他/她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公开或暗中反抗工厂老板。

但还有一些因素也削弱了雇员们的谈判(或反抗)地位。由于没有独立的工会组织,自发捍卫工人利益的行为无法得到补偿和支持。官方的工会运动公开宣称自己是党的群众组织,它们的任务就是向其成员传达党的政策路线。很多任务会往往使领导人感到非常矛盾,行为上左右摇摆,一方面他们想代表工会成员(工厂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服从官僚机构和党内上级领导的命令。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忠诚于上级领导更为重要。

雇员们在很多方面还是要依赖于企业老板和工作单位。当然,在任何体制下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种依赖性。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工厂所适用的一系列法律、经济和政治关系都具有明显的体制特征(我们在讨论雇主的地位和行为时将会详细谈到这些特征)。下面我还是先从雇员谈起,看看这些体制特征对工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上文提到过由于持续性劳动力短缺和其

① 当然,如果一个工人的职业培训和工作经验只适合于他/她目前所从事的岗位,那么也会增加他/她自愿离职将要承担的风险。

他因素都可能会导致雇员反对工厂的老板,但他们在选择故意怠工或威胁辞职之前也要左思右想,因为老板们同样有对付反抗者的有效武器。

这两股相互冲突力量的最终斗争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以下因素: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官僚统治集团所采用的压制手段的力量强弱,工厂对特定工作人员的依赖程度,甚至个人特点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尽职尽责的工人也许会和怠工者并肩“战斗”,要求实行计件工资(不考虑工作质量),这样他们就可以和那些懒懒散散的人一起干活。所有这些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频率和规模都有所不同。①

硬币的另一面是雇主,也就是企业和工厂的老板们的行为。他们每个人都面临着来自不同领域的各种压力。前面描述过的有关官僚机构领导人的动机[7.4]基本也适用于他们,当然老板们也还有自己的一些特征。大部分老板都要处理好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因为正是这些人决定了他/她的晋升、工资和奖惩。上一部分我们曾介绍了企业内部要遵守和执行有关职工人数和工资水平的计划,事实上,在企业层面以上,情况大致相同。

但老板们处处要依靠雇员。在企业和工厂里,老板和工人之间都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越严重,工人们的力量越强大,老板对工人的依赖程度也就越高。为了维持工厂的稳定生产和正常秩序,他/她会尽可能地满足工人们提出来的要求。如果他/她完全坚信官方所宣传的东西,他就会认为自己并不是什么“雇主”,而是工人的代表,应该站在工人们的一边和他们一起行动。这些因素都促使老板提请上级组织考虑工人们的抱怨和要求,他/她要代表工人发出“声音”。从这一点而言,老板在某种程度上又扮演了传统工会代表的角色。

然而老板们的行为始终处于矛盾状态。老板的情况和员工基本相同,只是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个人,两组相互冲突的动机之间的相对力量有所不同。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企业和工厂领导的官僚动机始终占据着上风。

工厂和企业老板们的手上也有很多武器。在以前讨论权力和财产(权)时已经提到,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或“商业”与政治及国家行政管理

---

① 关于工作强度(效率)的问题前面已经有过讨论[6.6,9.5]

是须臾不可分的。企业的领导层——党委书记、厂长，再加上工会书记——同时履行着以下职责：

◆ 生产管理。生产管理者要向工人们分配具体任务，同时根据上面制定的一般指导原则发放工资和奖金[10.3]。他们有各种办法对一部分人给予特殊照顾，对另外一部分人则进行歧视。任何体制里都会存在这种做法，在此就不再详细讨论。

◆ 监督工人不能随便离开工作单位。大部分工人的工作都是被分配的，工人不能做自己的选择。企业保证工人就业，但同时也将职工限制在企业里。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的严格规定，即使工人可以自己提出辞职，但也必须得到管理层的同意。国家在法律上禁止“任意”辞去工作。在有些国家和有些时期里，职工甚至都不能随意离开居住地(乡村或城市)，除非得到单位的许可。①

◆ 本单位(地区)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代表。单位是许多政治宣传活动的舞台：灌输意识形态并借此鼓舞群众，提供道德激励，批判官方认为不正确的观点。

◆ 官僚体制所有“挑选”活动的本单位(地区)代表。单位可能是专业领导人、议员或部长的诞生地，也可能是列入国家黑名单人员从事不良活动的场所。

◆ 当局防止犯罪行为的本单位(地区)代表。企业领导很容易以另外一种方式“逮捕”或“审讯”那些阴谋分子和捣乱分子(或是当地领导人心目中的反动分子)。

◆ 国家行政组织的本单位(地区)代表。在很多行政事务中，公民都要取得单位的同意或由单位来开证明，其中包括更换居住场所、申请护照，装电话以及找银行贷款。

◆ 收入分配机关的本单位(地区)代表。职工必须向单位汇报自己所得到的每一笔收入，到外面打零工首先要得到所在单位的批准。

---

① 苏联和中国长期实行这种政策。

◆ 为本单位职工提供“父爱主义”关怀。许多单位都有自己的公寓[①]、医务室、度假村、幼儿园和日常护理中心，老板们将决定如何分配这些服务。在许多国家和时期，企业还负责配给食品的发放，以及分配其他短缺商品（如彩色电视机或轿车）。

◆ 指导家庭生活。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时期，企业领导人还要干预职工的家庭生活：他们可以阻止职工离婚，劝职工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帮助或阻止工人的孩子上大学。

所有这些职能[②]使企业和工厂的领导人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单位往往变成了实行极权统治的小城堡，而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场所而已。

在前面章节里，我们已经介绍了企业和工厂领导人的各种行为动机及其相对力量的不同。这些都和他们各项职能的特定组合（以及所采用方法的相对比重）具有密切的关系。具体到每一家企业和工厂采取什么样方法来完成上述职能，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个人都有所差别。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工厂里的所有职工都要服从老板。与此同时，官僚机构让企业享有某种特定的社会地位，[③]因此、老板们能够利用这种优势为职工争取特殊待遇，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就获得了很多特权。

如果艰苦劳动能够成为所有人的生活必需，[④]那当然万事大吉。但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大部分人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于是，就要有老板们利用各种激励措施来促使人们遵守劳动纪律和执行工资纪律。

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既带来劳资双方的合作，也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冲

---

① 分配到一套单位的住房[3.4]（或者仅仅是希望分配到一套住房）是将工人拴在企业里的一个主要手段。那些不听话的职工，如主动辞职，很可能会失去住房，这在住房严重短缺的年代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② 中国毛泽东时期的人民公社除此之外还发挥着两项职能：当地国家行政组织的全权代表，以及负责开办集体大食堂。

③ 例如，不少国家都为产业工人（或者一部分产业工人，如大型企业的职工）提供了比其他阶层更优厚的待遇。这些特殊待遇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等，类似的优惠还包括单位内部的消费品分配。

④ 即使马克思本人也认为只有到达了共产主义的很高阶段，才能让劳动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见马克思[1875]（1966）。究竟能否实现，我们谁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也不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就能看到这一天，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仍处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时，就想让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几乎是不可能的。

突。所有者会感到付给工人的每一分钱都是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的,而工人哪怕浪费一分钟时间都会减少他们的利润。他们不必采取下命令的方式来维持纪律。资本主义的所有者——雇佣者的劳动工资合同就代表着工资纪律和劳动纪律,而且符合双方的利益。而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官僚机构既不是真正的所有者,也不是真正的雇主。官僚机构成员并不能从维持劳动和工资纪律中自动获得直接的好处,相反,如果严格执行规定还会恶化他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但既然他们已经成为官僚组织中的一分子,他们就必须强制推行工资纪律和劳动纪律,取消私人产权后留下的纪律真空需要由官僚机制来填补。

上述老板与雇员、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还影响了企业的内部就业。由于一旦有工人离开就很难找到人来顶替,而且上级机关的未来招工计划又可能非常严格,因此,企业必须要有内部剩余劳动力。正如商品短缺会导致人们过度囤积,劳动力短缺也会引发囤积剩余劳动力的行为。必须把目前还不需要的人留住,以备将来不时之需。这样就会有一部分劳动力根本不认真工作。事实上,"怠工"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所有这些现象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所谓的在职失业。因此,除了我们在 **10.2** 所谈到的问题以外,持续的劳动力短缺不仅仅与劳动力的结构性剩余、摩擦性剩余以及外部剩余并存,而且还伴随着在职失业所产生的内部劳动力剩余。

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有人宣称,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短缺,因为只要动员内部剩余就可以轻易解决短缺问题。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内部剩余并不是某个经济领导人所犯的个人错误,它根源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本质特征,而且只要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存在下去,它就会不断复制自身。经典社会主义可以让社会实现全面就业,但它却无法保证所有就业职工都能够全力以赴地工作。

## 10.5 官僚协调和市场协调对工资的影响

从前两部分可以看出:在劳动力的配置上,同时存在着官僚协调和市场

协调,两者相互结合一起,其中官僚协调占据着支配性地位。[①] 在考察这两种机制如何影响工资的时候,首先要区别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相对价格。举例来说,总劳动和总资本之间的价格比率就是宏观层面的相对价格;而按职业、劳动难度、危险程度或其他标准来衡量的不同劳动工资比率就属于微观层面的相对价格。

官僚机构基本决定了整个经济的宏观(平均)工资水平。目标是编制与投资和消费的宏观规划相适应的年度平均工资增长计划[9.3]。当中央管理层确定了投资数量之后,它必须同时防止消费的增长,以免侵占投资资源。由于要有效地控制住价格,[②]因此,工资计划就非常重要。中央管理层在这方面拥有广泛的自主决策权:它能够控制住名义工资、价格水平以及真实工资的上升、不变和下降。其他任何体制下的中央行政当局在如此关键的领域都没拥有这么大的决策和管理权力。

基本生产要素的宏观相对价格(包括平均工资)无法反映出它们的相对稀缺性和对社会生产做出的贡献[8.6]。在决定这些相对价格时,很少考虑每一种要素是充足还是稀缺,没有资本市场、生产者或投资者或者是免费得到资本,或者是支付随意确定的利息(尽管资本非常稀缺,但利息水平却很低)。正如前文所述,最高当局的工资政策是根据计划实际消费比率(以及市场上消费品的正常短缺规模)来调整平均工资规模的。

根据本书的计划,我们主要是通过实证描述来研究这一问题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与它们的相对边际生产力没有任何关系。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衡量生产效率。随意确定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就使得在技术选择上根本无法以成本和价格为基础进行合理的计算。在进行日常生产和长期投资决策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③]

与工资制定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个人消费占集体消费的比例[13.3]。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有很强的倾向去缩减家庭用货币直接购

---

① 这就是为什么表6.1中关于国有部门的工资支付我们用了“B+M”来表示。

② 但价格往往没有像工资那样规定得特别严格。见8.6关于隐性价格上涨的叙述。

③ 现实中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无论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们对收入极不敏感,而且面临的是预算软约束),还是他们的上级机构都没有进行这种计算。

买个人消费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当局会不断增加由官僚机构分配的集体消费比例。①

当然，按规定工资拿到家里的钱根本不足以支付政府提供的集体消费和服务。用官方意识形态的术语来说，国家“提供”住房、休假和医疗。但如果这些产品和服务在扣除了成本、平均利润和税收之后按照市场价格出售的话，那么工人仅仅靠日常工资是根本买不起的。所以每个家庭都别无选择，只有把所有这些产品和服务作为国家免费提供的资助。

这进一步扭曲了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与劳动力耗费的真实社会成本相比，工资成本非常之低，极不合理。

对工资的行政控制还包括整体的计划和相应的管理（前面两部分所讨论的内容）。为了避免重复，这里我只再强调一点，对工资的控制包括了成千上百万的局部工作和各种措施，但制定工资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官僚机构的手中。

下面我们转向讨论市场因素对工资的影响。

上面的分析主要是关于在宏观层面上平均工资是如何确定的。那么平均工资在微观层面上又是如何决定的呢？不同工作领域的工资比例如何确定？不同地区的工资差别如何确定？与业绩相关的不同工资水平如何确定？一句话，相对工资水平如何确定？

经验研究发现，相对工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即使在剩余劳动力还没有被全部吸纳之前，劳动力供求关系还是会对相对工资水平产生影响。在劳动力持续短缺时期，供求关系则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工人们在进行短期决策时，会极为认真地衡量各种情况，如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工作条件如何，劳动的艰苦程度和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工资水平。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事实上，很多人都做出了选择），他们会“用脚投票”，离开工作很差的地方而去更好的单位。他们不仅会在舞台上发出不满的“声音”或者消极怠工，还会直接与上级领导进行大肆的讨价还价。工作任务越

---

① 本书从协调机制、预算资金和企业内部的父爱主义等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6.7,8.2,10.4]。

重要、越紧迫，对职工的依赖程度越高，他/她的谈判地位就越强。

市场力量同样影响着个人的长期决策，如职业选择和地点的选择。有些工作的申请者越来越少，有些则越来越多；有些地区人口不断减少，有些则越来越拥挤。出现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收入前景和一些其他条件对申请者产生影响。

各级官僚机构不得不对这些信号做出反应。企业内部必须要认真评估所有工作岗位的劳动力需求，同时也要考虑具备哪些优惠条件或不利因素。上级机构在决定工资比例时，也要考虑这些因素。可以说，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和相对的过度需求对相对工资水平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相对工资水平也对劳动力的相对供给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不同职业、工作单位和地区劳动力总供给分布的变化（但对需求影响不大，原因前文已有讨论）。总而言之，市场协调在此发挥了重要影响。

现在我们已经在抽象层次上区分了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相对工资，以及平均工资水平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孤立的。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名义工资几乎处于完全刚性状态，很难下降，公开削减工资非常罕见，尽管在特定时期也会这么做（例如，斯大林时期进行生活模式调整）。[①] 因此，上文所介绍的相对工资的调整通常是一部分人的名义工资保持不变，而另外一部分人的名义工资则不断提高。相对工资的调整是通过一系列的局部工资上涨实现的。首先是第一组人的工资得到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第2组人的工资会落在后面，随着劳动力短缺状况的不断加重，第2组人的工资迟早也会提高，接下来是第3组，依次类推。每一组都会轮番要求更高的工资，就像蛙跳游戏一样，逐级攀升。

上面的描述有助于理解工资的纵向讨价还价过程[10.3]。蛙跳伴随着工资自下而上的自发攀升。所有中下级的经济领导人都努力要求提高工资，从而进一步加重了相对工资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上面”却反对这种工资上涨趋势。宏观层面的平均工资究竟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将取决

---

①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公开削减工资也同样很少使用了，尽管在萧条时期，一些公司还是会削减部分职工的绝对名义工资总额。

于当时的权力关系。

工资压力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下来,至少名义工资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时可以说是行政力量干预名义工资制定对市场的反作用,即官僚协调的影响。

中央管理当局反对工资上涨主要是想节约资源,把钱用于其他目的(投资、国防开支),而一旦消费能力超出了计划范围就会对上述目标产生负面影响。对此采取的措施多半是有意识地提高价格(或者任由价格自发上涨)。所有这些问题都对通货膨胀(公开或隐蔽)的产生发挥了重要影响。

对劳动力配置和工资问题的考察已经基本结束,这里我们可以回到本章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曾宣称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了。

根据本章的分析,上述断言是不能成立的。市场协调对劳动力配置和工资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如果说市场影响处于次要地位,这是正确的判断,因为官僚协调的影响的确远远大于市场力量。

而又该如何评价官僚协调大于市场作用这一现象呢?马克思思想的早期信仰者幻想着有一天劳动力能够不再像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被买卖,他们也不想看到劳动者在摆脱市场关系之后,又被国家权力和经济计划的武器所统治。而事实是:从很多方面来看,后者的压迫要远甚于单一的市场关系。

# 第十一章　短缺与通货膨胀:现象(分析)

各类文献中对本章和第12章将要讨论的现象有很多不同的称谓:短缺、过度需求、非均衡、卖方市场、抽吸、压制的通货膨胀等等(这里只列出了一些常用说法)。[①] 这些称谓并不完

---

① 第11章和第12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以我以前的著作为基础,例如,我的第一本书《经济管理的过度集中化》[1957](1959)讨论了短缺的问题。后来在《反均衡》(1971)和《短缺经济学》(1980)中也都是以短缺作为主题开展研究的。这两章的概念框架和相关分析也大多源自我本人的上述著作。

在几十年的研究过程中,我对上述问题的观点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其中既受到其他研究者有关著作的影响,也包括我自己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辩论时所写的文章。我尽量将自己所接受的其他研究者的所有观点都吸收进了本书,并努力将自己的观点和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整合为一个整体。在此,我不想一一详细介绍各种不同的观点和争论,除非偶尔在不太相关的地方做一点评论。按照本书的计划,我不想把这里变成一个展开争论的论坛。我也不会详细介绍本书的观点与本人以前的看法有哪些相似和不同之处。

就短缺这一问题而言,主要有两处思想来源,一个是马克思,他是分析长期偏离市场均衡现象的杰出先驱者,主要是对剩余劳动力问题的研究(见《资本论》第一卷第23章和第24章以及第3卷第1章和第15章[1867-1894]1978);另一个是凯恩斯(1936)的著作,他分析了失业、宏观需求和投资之间的关系。

最近有关非瓦尔拉斯均衡和非均衡的文献对该领域的研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学派的先驱者包括R. W. Clower(1965)、A. Leijonhufvud(1968)。进一步研究还可参见J. P Benassy(他1982年的综合性著作)、E. Malinvaud(1977)、J. Muellbauer和R. Portes(1978)、R. Portes和D. Winter (1980)以及P. Portes等(1987)。在很多书中把这些研究称为非均衡学派。

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持续短缺问题,早期的重要研究包括:L. N. Kritsman(1926)、V. V. Novozhilov(1926)、M. Kalecki(1970,1972)、F. D. Holzman(1960)以及H. S. Levine(1966)。

在我进行短缺研究过程中,特别关注过许多涉及到这一问题的文章和著作,其中P. Portes和其他非均衡学派的研究最具影响力。其他比较重要的研究还包括K. A. Soos(1984)和S. Gomulka(1985)。

其他关于短缺问题的研究文献在第11章和第12章的脚注中都可以找到。C. Davis和W. W. Charemza(1989)编撰的文集和J. M. van Brabant(1990)的总结性文章对这一领域的相关争论进行了非常全面的综述。

全一致，后面还需要进行更多的阐释，但基本上界定了我们将要研究的主题。

目标是用体制的内在特征来解释短缺现象。与以前章节一样，我们这里暂时忽略了对外关系的影响[14.3，14.4]。

考察将集中在体制的长期特征，那些影响短缺现象强度和分布短期变化的因素最多会在文中稍加阐述。此外，我们着重关注了经典社会主义长期短缺与资本主义短缺现象之间的区别。

在分析生产时，主要集中于公有制部门。[①] 但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再加上灰市场和黑市也为家庭提供了部分产品。

第11章主要研究短缺和通货膨胀现象，第12章讨论这两种相互关联的现象的起因。

## 11.1 短缺现象和短缺经济

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形式来考察个人消费品购买者所面临的选择，例如一位出门购买食品的妇女，假设她具有非常明确的购买目标，其中包括现行价格和商品清单上牛肉的类型。除非运气很差，她的购买过程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行动，而是一系列的决策（见图11.1）。

情况0是最合意的：购买者走进第一家商店就看见了所需要的商品，然后将它买走。对她而言，购买过程也就结束了。

情况1：有牛肉，但必须排队等候购买。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顾客常常要排队。就某些商品来说，确实要真的在商店门口或柜台前排起长队。有时候，这只是一个比喻。顾客会得到相应的号码，等轮到他们的时候再到商店里购买。对顾客来说，他们完全有可能买不到这种商品（哪怕是排队也

① 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几乎无足轻重，只是在改革阶段才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关于私人生产与短缺、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问题将在后面章节中进行分析[19.1，19.5，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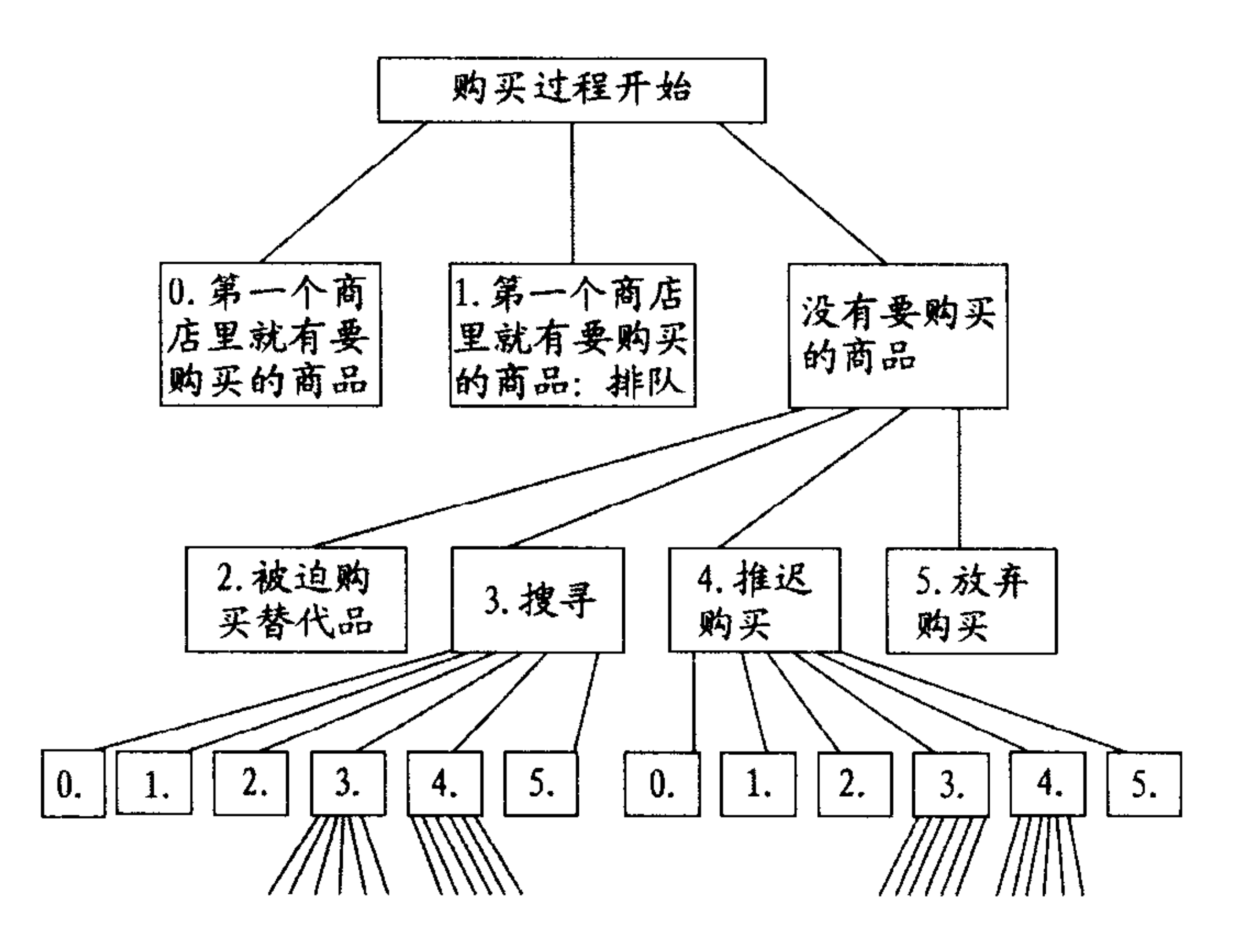



**图 11.1　购买过程**

买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她就要做出其他一系列的选择。

情况 2:强制性替代(被迫购买替代品)。顾客不得不放弃她最初想购买的商品,然后买一种多少可以替代使用的商品。有时能买到比较近似的替代品,如用另外一种猪肉来替代牛肉;有时只能买到一般的替代品:如冷冻肉或罐头肉,甚至是很差的替代品,如任何一种食品。被迫购买替代品有时会要求顾客必须做出质量上的让步,买一种她当初根本就不想要的东西。或者她愿意花更多的钱购买更好的东西,但这样东西并不是她最初想要的;或者她既花了钱,又买了她当初不想要的东西。

强制性替代对于理解短缺综合症非常重要,它与自愿性替代完全不同。如果顾客首先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商品,A 和 B,它们是非常接近的替代品而且供给充足,此时顾客因为自己的偏好或两种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购买了其中一种商品(例如,用 B 替代 A),那么这就是自愿性替代。但如果因为根本买不到 A,才买了 B,那就是强制性替代。有人可能会觉得上述条件并不合适,认为如果 A 变得比 B 更贵,那么顾客就处于一种"经济强制"购买状态。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这种语义上的争论,关键是要弄清楚区分标准。如果 A 和 B 同时都能够买到,那么不管 A 变得多贵,顾客都是有选择权的

(例如,顾客也许会不管花多少钱也要购买 A,然后减少在其他方面的开销)。但如果根本就买不到 A,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短缺会迫使顾客不得不做出另外一种选择。

表 11.1 说明了强制性替代的情况。当一个典型的匈牙利汽车购买者面对着各种供应充足的东欧国家类似车型的进口轿车(无需排队),他/她会买哪一款呢?从表中的主要对角矩阵可以看出,那些想选择自己喜欢的车型的人依然要排队购买。这些人只是一小部分的购买者,大部分人不得不被迫选择替代车型。[1]

**表 11.1 匈牙利汽车市场的强制性替代(1977)**

| 市场订单 | 如果有现货,市场的偏好车型 | | | | | | |
|---|---|---|---|---|---|---|---|
| | Trabant | Warburg | Skoda | Zhiguli | Moskvich | PolskiFiat126 | Dacia |
| Trabant | 47 | 21 | 1 | 19 | 0 | 5 | 1 |
| Warburg | 16 | 7 | 7 | 53 | 0 | 1 | 6 |
| Skoda | 5 | 10 | 0 | 80 | 0 | 0 | 5 |
| Zhiguli | 5 | 30 | 7 | 30 | 1 | 3 | 2 |
| Moskvich | 25 | 25 | 0 | 25 | 0 | 0 | 0 |
| PolskiFiat126 | 25 | 11 | 11 | 39 | 0 | 0 | 0 |
| Dacia | 0 | 25 | 0 | 50 | 0 | 0 | 0 |

**资料来源:**由 Z. Kapitany、J. Kornai 和 J. SzaboC. Kruger 根据以下资料为基础整理:匈牙利市场研究所(1978)、布达佩斯、中央统计局(1980 b)和莫克汽车贸易公司(1980)。

注释:接受调查的人数为 4120 人,有效答案 1406 份。对角矩阵中没有强制性替代的总量比例,但大部分总量都低于 100,因为有些回答问题的人在问卷中选择了“其他”。

让我们再回到那位购买食品的妇女,她也许并不愿意被迫购买替代品。这样,就会出现情况 3:到其他商店进行搜寻。如果很幸运的话,她可能在第

---

① Z. Daniel 和 A. Semjen(1987)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布达佩斯,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房客在租房过程中都被迫选择了替代品;在既定租金结构下,他们所租到的房子在质量和面积上都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住房。

二个商店找到了一些想要的牛肉,购买过程结束。但也可能她要到第三、第四、第五,甚至到很多商店之后才能买到想要的牛肉,究竟会到多少家商店要取决于她的决心和耐力。

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她听说(也许是在第一家店,也许是在后面的店里)自己想买的东西暂时没货,要过一段时间才有。根据这个消息或者以往的经验,她可能决定等一段时间再买。这就是第 4 种:情况推迟。实际上也就是顾客持币等待将来购买。于是,这种推迟(或者很长时间的搜寻)也就是强制性储蓄。①

最后是第 5 种情况:放弃购买。

情况 0、1、2 和 5 都是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购买过程。但正如图 11.1 所示,在情况 3 和 4 时,购买过程可能还没有结束。在继续搜寻的情况下,顾客在第二、第三、第四个商店同样面临着上述选择,如此往复。如果等上一、二个星期之后再出去购买,还是会出现上述各种情况。

情况 1—5 在这里就被称为短缺现象。尽管具体内容和结果会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因为所要购买的商品出现短缺所造成的,都给顾客带来了烦恼、不方便、牺牲以及其他损失。

上面举出的例子是购买个人消费品或服务时出现的短缺现象,受害者是家庭。供应短缺的商品是一种物质产品——牛肉。同样会出现非物质性质的服务短缺:如幼儿园、学校、大学、文化和医疗设施等等。

短缺现象完全可以进一步推广至生产工具、原材料、半成品以及机械设备等很多产品的购买过程,这时受害者就是企业。情况 1:企业加入了投入品供货商的排队行列,那里的订单已经堆积如山。情况 2:企业被迫修改原先的技术改造方案,使用质量较差或更贵的投入品,因为无法获得想要的投入品。情况 3:企业开始到不同供货商那里搜寻它所需要的投入品,或者从恰好还有存货的同类企业那里借用。情况 4:企业推迟购买(或者还有部分存货,或者根本就没有一点存货,但也毫无他法),很可能会因此停止生产。最后是情况 5:企业放弃购买投入品,然后改变生产和原材料的管理计划。

---

① 这里需要区分由于短缺造成的强制性储蓄和采用行政手段进行的强制性储蓄,例如,强迫人们购买国库券[8.3]。

在生产部门中,有一类短缺现象特别值得关注:投资项目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建设能力出现短缺,也就是出现了投资紧张[9.2]。

同样,在聘用和招工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中间物质产品的短缺[10.2,10.5]。①

短缺现象也会发生在对外贸易领域,我们将在第14章关于对外关系的讨论中加以介绍[14.3,14.4]。

下面让我们阐述一下短缺经济这个概念。如果某一经济体制同时满足以下条件,那么就可以将之称为短缺经济:短缺现象(1)非常普遍,几乎出现在所有经济领域(消费者的商品和服务交易,生产工具,包括投资品、劳动力、进出口产品,国际结算);(2)经常发生,并非特殊情况和零星现象;(3)情况严重,对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和环境,以及经济活动的特征和结果具有重要影响;(4)持续、长时期存在,而非暂时出现。

可以用"短缺现象"和"短缺经济"做这样一个经济上的描述: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短缺现象是非常普遍、经常发生、相当严重和长期持续的短缺,因此,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一种短缺经济。

这一判断主要得到了经验上的支持。表11.2—11.4中的数据以及本章和下一章中的其他很多表格都说明了这一点。此外,这一判断还得到了各方面大量研究文献的实证支持。其实,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的人们根本就不需要所谓统计资料的证明。不管是作为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这样的经历,买东西的时候可谓历经"千辛万苦":排队、被迫使用替代品、搜寻、推迟购买。

短缺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样会出现,在某些领域中也经常发生、较为严重,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如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疗或教育部门,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住房)。在特殊情况下,如战争时期,短缺也会变成普遍现象。但如果从一般和基本的状态来判断,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一种短缺经济。

---

① 下面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里的强制性替代和推迟现象。如果某一企业招聘的工人没有及时到达工作岗位,而他/她的工作又非常重要,生产管理者不得不临时让其他人顶替他/她的位置,但替代者的经验和技术很可能都比较差。最后,管理者用别人完成了这项工作。或者,生产管理者也许会改变生产顺序,把目前可以完成的工作提前完成,把前面的工作往后拖延。所有这些行动都会非常仓促,容易造成工作延误并带来损失。

表 11.2 等待住房:国际比较

| 国家 | 20 世纪 80 年代申请登记后的平均等候时间(年) |
|---|---|
| 保加利亚 | 5—20 |
| 捷克斯洛伐克 | 6—8 |
| 东德 | 3—4 |
| 匈牙利 | 4—6 |
| 波兰 | 15—30 |
| 苏联 | 10—15 |

**资料来源**:由 G. Such 和 I. J. Toth 为本书编辑整理。

注释:保加利亚:在大中城市里,住房申请者被分为六类:(1)住房条件极差的家庭(如住在厨房、地窖和阁楼);(2)那些和别人同住一套房子的人;(3)转租居住者或住房极为拥挤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不足 5 平方米);(4)住房条件比较拥挤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 5—12 平方米);(5)住房条件拥挤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 12—20 平方米);(6)住房不是很拥挤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超过 20 平方米)。实际上,只有 1—4 类可以获得国家提供的住房。平均等待时间为(1)5—6 年;(2)7—8 年;(3)9—10 年;(4)15—20 年。捷克斯洛伐克:1987 年大中城市的资料。东德:1982 年的全国平均状况。匈牙利:1986 年布达佩斯的数据。波兰:1987 年购买补贴性合作住房的资料。在以后的年份里,波兰不再修建国有住房。苏联:实际上,国有出租房屋只分配给那些平均人均居住面积不足 5—7 平方米的家庭或个人。

表 11.3 等待(安装)电话:国际比较

| 国家 | 登记安装电话的等待时间(按人数比例)<br>平均等待 5 年的人数百分比 | | |
|---|---|---|---|
| | 1971 - 1975 | 1976 - 1980 | 1981 - 1985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
| 捷克斯洛伐克 | 25.1 | 30.2 | 11.3 |
| 东德 | 23.3 | 36.7 | — |
| 匈牙利 | 36.6 | 47.2 | 55.5 |
| 波兰 | 33.6 | 45.7 | 57.1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
| 奥地利 | 14.1 | 8.5 | 2.9 |
| 比利时 | 0.8 | 1.2 | 0.7 |
| 法国 | 13.1 | 7.9 | 0.9 |

**资料来源**:第一列:国际通讯联盟(1980,第42、52、130、154、260页);第2—3列:国际通讯联盟(1986,第56、66、150、180、280、288、348页)。

注释: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主要路线总需求为基础计算,其中包括新申请者和要求重新安装的人。重新安装是指申请者希望将电话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东德、波兰、奥地利、比利时和法国:以主要路线的登记申请名单为基础计算,其中包括那些由于技术能力短缺(设备,线路等),推迟安装的申请者。

波兰(33.6):1972—1975年。

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电话申请都可以立刻得到满足。

**表11.4 等待汽车:国际比较**

| 国家 | 等待时间(年) | | | | | |
|---|---|---|---|---|---|---|
| | 轿车品牌 | | | | | |
| | Lada | Skoda | Moskvich | Warburg | Trabant | Dacia |
| 保加利亚 | 10-12 | 5 | 2 | 2 | 1 | 1 |
| 捷克斯洛伐克 | 3-4 | — | — | — | — | — |
| 东德 | 17 | 16 | — | 14-16 | 14 | 15 |
| 匈牙利 | 4-6 | 6 | — | 1 | 0 | — |
| 波兰 | 5-6 | 6-8 | — | 3-4 | 2-3 | — |
| 罗马尼亚 | — | — | — | — | — | 4-6 |

**资料来源**:由Z. Kapitany为本书编辑整理,部分以Z. Kapitany和L. Kallay(1989)的研究为基础。

注释:所有汽车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

保加利亚:1988年。

罗马尼亚:只有Dacia车的资料。

## 11.2 需求调整过程

这部分我们将分析短缺经济中购买者的行为,特别是家庭作为个人消费产品和服务购买者的行为。目的是考察购买意愿,而不是实际行动(如购

买、被迫购买替代品、推迟等)。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省略了观察和测量等具体问题,并假设通过询问就可以准确把握购买者在特定时点的购买意愿。

第一个问题是在给定下列条件的情况下,购买者的购买意愿是什么?现行价格、购买者的收入和财富、社会经济条件,没有阻碍购买者实现自己意愿的供给约束。购买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那是想像中的需求。①

简单地说,这个问题关注的是购买意愿的存在状态。实际上,有人可能会问,如果价格、收入、财富等等有所变化的话,购买者的意愿又会如何呢?这样就有可能发现想像需求函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所谓存在状态就是想像需求函数的一点。

讨论被简化还体现在只对局部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更严格和全面的研究需要对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和销售意愿进行详细讨论。②

第二个问题可能是,如果购买者已经清楚了所有的供给约束并相应调整了自己的购买意愿,那么此时他/她想购买什么呢?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称为完全调整(后)的需求。④ 预期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这种购买意愿是基于购买时对供给约束的预期。⑤

我们可以把想像中的需求和完全调整后的需求作为对需求形成过程的

---

① 这个说法来自 R. W. Clower(1965),更详细的阐释见 J. - P Benassy(1982)。

② 事实上,对供给约束假设也要进行更详细的分类研究。当购买者在回答有关商品和服务的情况时,他们可能只是在购买过程中遇到了暂时性短缺,或者不过是听说东西没了而已。

③ 可以设想一个购买者单独做出行动时的情况。从决策角度而言,他/她应该已经掌握了准确的供给信息。如果考虑多个购买者和/或一系列的购买行动(持续重复多次),就可以进行随机分析了。

④ 这个概念与非均衡理论中的"有效需求"不同。产品 A 的有效需求是指购买者回答了这样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他/她考虑了与购买(和销售)行为有关的所有其他商品和服务(B, C 等等)的数量约束,并忽略商品 A 的数量约束之后,他/她决定购买商品 A 的数量。

强制性的需求调整使得我们很难区分需求与供给(有时根本就无法区分),而且无法建立相互独立的需求和供给函数。

这里所遇到的区分难题与罗伯特·卢卡斯(1985)所指出的很难将私人部门行为与国家经济政策(影响私人部门行为)区分开来的问题相似。J. P. Berkett 提醒了我去注意这两个区分难题之间的相似之处。

⑤ W. W. Charemza 研究了非均衡模型的未来发展趋势,特别强调了消费者调整行为与市场状况预期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理论抽象。这其中包含着很多层的中间状态,可以统称为部分调整(后)的需求。它们与想像中的需求不同:购买者在形成自己购买意愿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供给约束,但他/她无法准确掌握供给信息,而且/或仍然拒绝按照供给情况彻底调整需求。此时,他/她还不能或不愿意完全根据需求约束来确定自己的需求意愿。在以后的叙述中,如果没有进行特别说明,我们就用调整过的需求同时指称完全调整(后)的需求和部分调整(后)的需求。

对购买者而言,从想像中的需求通过一系列的部分调整最终过渡到完全调整后的需求是一条极为痛苦的道路:不断受挫、失败、各种关于未来短缺的流言以及被迫做出调整。完全调整后的需求是购买者购买意愿不得不向持续短缺屈服的无奈结局。[①]

当然,把需求的形成过程描述成一系列认识和调整的时间序列过程仅仅是为了简化我们的研究。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有“规律”可寻的连续事件,现实生活中的需求调整和对供给状况的预期是在一个极为复杂的背景下进行的,其中包括相互冲突的信息交流、希望、失败以及许许多多成功和不成功的购买行为。购买者常常是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的购买意愿。他/她总是要进行临时决策,即使非常愿意诚实回答市场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他/她也无能为力。

在调整过程中,购买者可能不得不彻底放弃某些购买意愿,这样他们也就无法再形成什么想像中的购买意愿。用一个模拟来说,他们就像西方失业研究文献中所描述的“绝望的工人”。[②] 不断寻找工作,可始终是一无所获,许多人最后都会在绝望中放弃战斗。这样,他们的名字就再也不会出现在职业介绍所里,因而从失业统计资料中消失无踪。正如失业者在需求不足的打击下从劳动力供给市场上退出后便无法计入剩余劳动力统计,购买者在供给

---

① 如果没有持续性短缺,且购买者意愿不受需求约束,那么实际购买行为就可以真实地反映想像中的购买意愿。在上述条件下,我们就能够把真实的消费函数作为需求函数。

这一假设在短缺经济中是不成立的,因为在这种经济中实际购买行为反映了购买者被迫做出了一系列强制性调整后的购买行为。许多研究认为,只能间接估算短缺经济中的需求函数。例如,Z. Damiel(1989)通过直接询问购买者建立了匈牙利的租房需求函数。L. Podkaminer将资本主义国家的需求函数估算参数代入公式来刻画波兰家庭的行为。

② 这一模拟来自 J. P. Burkett 的文章(1988)。

不足的情况下不再购买也将使人们所能观察到的短缺现象不断减少。

在供给状况较差的时候,购买者调整后的购买意愿要低于想像中的需求;如果调整后的需求高于想像中的需求,那么就可以认为出现了强制性替代。[1] 这两个完全相反的变化很可能(但并不一定)在需求调整的过程中相互抵消。

针对供给状况来调整需求并不是单向的,生产者和出售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可能的需求来调整供给。

最后很可能(但不一定)会出现一个奇特的均衡状态,可以称之为强制调整均衡。当所有家庭对所有产品的总需求根据供给状况进行调整之后,现有的总供给就能够满足调整后的总需求。这种强制调整均衡的出现与购买者的长期受挫感密切相关,因为他/她始终无法满足自己的购买意愿,不得不被迫购买替代品。[2]

上面的阐述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所谓的"短缺经济悖论"。从一方面来看,消费者极度不满,总会抱怨商品供给不足;从另一方面看,又出现了"全面均衡"(东欧国家的学术术语)。正是购买者痛苦的强制调整过程促成了这种"悖论"。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只是有可能而非一定会出现强制调整均衡。购买者或许找不到可接受的替代品,与原来的购买意愿相比,他/她宁愿少花一些钱。这可能是暂时推迟:购买者把没有花出去的钱先放起来,等到供给能够满足他/她的购买意愿时,然后再购买。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强制储蓄所积累下的货币随时在等待购买机会的出现。[3] 但这一切也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强制储蓄存下来的钱也许就不再用于购买原先想要的东西,购买者或者会随意花掉,或者永远等不到合适的消费机会。如果这变成了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家庭由于始终无法实现购买意愿而形成的强制性储蓄将逐

---

① L. Podkaminer 研究了 1965 - 1978 年间波兰想像需求。按照他的估算,如果不考虑供给约束和扭曲的相对价格所产生的溢出因素,那么在波兰对肉类产品的想像需求要大大低于实际需求。

② 这里所讨论的强制调整均衡(来源于购买者的需求调整)与供给方面存货无法卖出并行不悖。这里需要指出的只是并没有出现存货累积的现象,即存货不会不断增加。

③ M. Lacko(1975)利用计量经济分析证明了这一重要关系。全部人口的真实消费或储蓄主要依赖于汽车和住房的供给状况。见 A. Simon(1977)。

步增多,那么家庭部门将一步一步偏离强制调整均衡状态,于是不仅会引发想像中的需求,而且会成为一种真实的过度需求。这样就导致了所谓的“货币悬置”现象在消费和服务领域内不断扩张,造成严重的紧张。

最后,还需要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家庭将把一部分钱用于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即合法的自由市场或灰色市场和黑市[8.8]。尽管部分与公有制部门有关的想像需求得不到满足,但购买者还是能够把这些钱花掉,而不需要始终在一个方向上强迫自己做出调整。平行市场——价格自由的合法市场、灰色市场和黑市——或许可以(部分或全部)防止强制性储蓄。[①] 这样也会出现某种强制调整均衡:这里所谓的强制性替代是指在灰色市场和黑市上购买商品来替代部分国有企业供给不足的产品。[②]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谈到了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交易。但对于经济中的其他领域而言,未必会出现上述强制调整均衡,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持续的过度需求。投资品交易就是其中之一。[③]

至于通常在哪些领域会出现强制调整均衡,哪些领域会出现持续的过度需求,对此我们将逐步展开讨论。但必须加以说明的是,即使在那些最终形成了强制调整均衡的领域,没有得到满足的想像购买意愿(以及部分调整的购买意愿)也不再仅仅是头脑中的想像。它们已经对购买者和销售者的行为产生了实实在在的重大影响。正如前文所述,购买者的最初意愿屡屡受挫,这让他们备感痛苦,正是这种“痛苦”迫使他们做出调整。与此同时,销售者确信始终存在过度需求,因此,他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产品卖出。

最后,我们对上文中出现的有关学术术语做一些解释。有些研究者将“过度需求”与“短缺”作为同义词使用。本书和作者以前的著作中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时,一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短缺现象”或“短缺”一词。这个词不仅包括了过度需求的含义(即未能实现的购买意愿),而且还意味

---

① G. Grossman(1977b)首先提出了这个观点。

② 按照D. M. Nuti(1986a)的研究,非均衡学派(见注释1)对此做出的主要解释是:消费品市场上的宏观均衡是指购买者能够在非正规市场上将他们的货币用掉。

在某些国家,强制储蓄所积累的本国货币可以在黑市上兑换成外国货币。W. W. Charemza和S. Ghatak(1990)以波兰为例说明了这一现象。

③ M. Lacko(1989)研究了匈牙利企业如何根据信贷供给的变化来调整投资信贷需求。但这里需求总是会大大超过供给,也就是说没有进行全面的调整。

着各种强制调整,既有意愿的强制调整,也有实际的行动调整(如强制替代、搜寻、推迟和强制储蓄)。[①]

## 11.3　横向短缺与纵向短缺

**11.1** 和 **11.2** 部分考察的现象主要发生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至少从法律意义上讲,它们之间是一种横向关系。即使卖方具有权力优势,但它毕竟不是买方的上级行政领导。因此,可以将这类短缺现象称为横向短缺。

与横向短缺不同,纵向短缺出现在具有纵向关系的上级和下级之间[9.2]。例如,制定企业的年度原材料配额。企业向上级主管机构(处于分配者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位分配者已经从上级部委那里拿到了自己管辖的所有企业可获得的原材料最大配额总量。正如前文所述,企业希望计划任务越宽松越好,换句话说,也就是最小的产出要求和最多的投入品配额。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所要求的投入品总量一定会超过分配者可进行分配的配额总量,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纵向短缺。

上级主管部门与企业在原材料配给讨价还价过程中出现的纵向短缺现象只是所有官僚部门(如主管部门与部委之间、部委和中央计划办公室之间)和所有资源与产品(半成品、零部件、机器设备、人力、工资基金、投资配额、进口许可等等)分配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短缺的一个例子。

上述情况与买方需求大于卖方需求的现象不同。它只是官僚机构内部随后将要发生的真实交易的前奏,未来的买方得到了上级的许可,以后可以用自己的钱来购买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横向短缺与纵向短缺之间具有明显的联系。横向短缺对企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获得了足够的原材料,它就可以确保在与购买者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横向短缺与纵向短缺也不是相互独立的。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由于下属单位预见到了横向短缺,它会申请更多的配额,这样也就加重了纵向短缺。

当局通过官僚配给体系向消费者分配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会同时出现

---

① 在争论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误解。无论是在本书,还是在我以前的著作中,都不能用“过度需求”来替代“短缺”一词。过度需求仅仅表明了短缺综合症中的一种“病症”。

纵向短缺和横向短缺现象[①]。许多国家都长期使用食品券,有时侯还会有耐用消费品票证。表 11.5 列出了部分实例。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典社会主义时期,下列物品和服务都长期实行配给:国有住房、电话、医疗服务、教育场所以及在国有度假中心休假。有些配给由国家机关负责,有些则是由垄断企业或垄断机构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有些是群众组织(例如,工会),有些是单位自身[10.4]。配给的比例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但在所有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中,配给都占有很高的比例。

**表 11.5 社会主义国家的配给**

| 国家 | 配给产品(每人每月配给量) |
|---|---|
| 古巴 | 大米(2.3 公斤),糖(1.8 公斤),猪油(0.46 公斤),食用油(0.23 公斤),大豆(0.46 公斤),肉(0.7 - 1.0 公斤),鸡(0.46 公斤),烟(4 盒),雪茄(1 卡),西红柿酱(2 罐),6 岁以下儿童牛奶(30 升),6 - 14 岁儿童牛奶(3 罐),65 岁以上成人牛奶(6 罐),香皂(1 块),洗衣肥皂(2 块),洗衣粉(0.23 公斤),洗碗布(1) |
| 波兰 | 咖啡,黄油(0.75 公斤),猪油(2.5 - 8.0 公斤),猪油(0.375 公斤),面粉(1 公斤),大米(1 公斤),糖,巧克力(20 克),烟,酒<br>汽油(24 - 36 升),洗衣粉,肥皂,鞋 |
| 罗马尼亚 | 面包(每天 0.3 公斤),鸡蛋(10),干面制品(0.5 公斤),鸡(0.5 公斤),猪肉或牛肉(1 公斤),面粉(0.5 公斤),玉米面(1 公斤),糖<br>天然气(153 - 203cn. m.),电(43 千瓦) |
| 苏联 | 肉,面粉,黄油,鸡蛋,糖,奶酪 |
| 越南 | 大米(9 公斤),干面制品(4 公斤),肉(1 公斤),糖(0.7 公斤) |
| 南斯拉夫 | 咖啡,食用油,糖<br>汽油(40 升),洗衣粉 |

**资料来源:**由 G. Such 和 I. J. Toth 以报纸和杂志上的大量资料为基础为本书编辑整理。

注释:本表描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配给状况。为简单起见,表中没有说明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每项产品引入配给和取消配给的具体日期。

---

① "配给"一词在非均衡理论中有更宽泛的含义,见 J. - P. Benassy(1982)。过度需求的存在必然引发某种程度上的短缺,即供给分配程序。非均衡理论文献将所有这类现象都称为"配给",即使不是行政主导的分配,本书只是在日常字面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波兰汽油是根据发动机的性能在限额内进行配给的。

罗马尼亚在1984年以后实行了严格的能源限制。在城镇里,如果超过规定用量就会罚款,供应量到月底前会减下来。

苏联的部分加盟共和国和城市实行了不同的票证制度,很多地区都实行了表中列出的食品配给制度。

南斯拉夫不同地区实行了不同的票证制度。例如,塞尔维亚的114个居住区实行了80种票证制度。

所有实行票证制度或其他配给形式的领域都存在短缺。进行分配的国家机关或其他机构都感到纵向短缺的压力,事先申请所要求的总量(例如,住房或度假中心)总是会超过可供分配的数量。同时还会出现横向短缺。在配给领域里,使用者获得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免费的或价格极为便宜。至于到底是短缺导致官僚协调不可避免,还是官僚协调引发了短缺,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分析这一因果关系[12.3,12.4]。

## 11.4　短缺与剩余

前面三部分主要讨论了短缺现象。现在我们开始考察与短缺相对的一面:剩余。[①]

在单个购买/出售交易中,短缺和剩余是不相容的。购买者在走进商店的时候有某种特定需求。与此同时,商店也有一定的存货。如果顾客买到了他/她想要的商品,而且这是商店里的最后一份存货,那么在交易完成之后既不存在短缺,也不存在剩余。但在其他两种情况下,这两种现象是互不兼容的:顾客买不到他/她想要的商品(短缺),或者商店里有商品存货(剩

① 这里又出现了与10.1部分类似的术语问题。在《短缺经济学》(1980)一书中,我用"萧条"来对应短缺,即使在匈牙利版中,我也使用了这个英文词(slack),目的也是为了避免使用"储备"和"过度"。但无论是在英语还是在匈牙利语中,"萧条"都不是短缺最好的反义词。

使用英语写作的经济学家所使用的词汇也并非标准用法,但一般都把"剩余"作为短缺的反义词。尽管"萧条"也很容易理解,但在英语中不太常用,而且最好在另外的背景下使用。考虑到上述原因,这里我还是选择了剩余。在使用"储备"和"过度"时,一般都带有褒义或贬义的意思。

余)。因此,在微观层次上短缺和剩余不可能同时出现。

如果是进行总量分析的话(例如某些产品,某些购买者,某些销售者,或者考虑到更长时期),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在总和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短缺(购买者的某些需求得不到满足)和剩余(某些销售者有卖不出去的产品)共存的现象。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一种短缺经济,但它同样会出现剩余现象。事实上,某些体制特征直接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发生剩余。

对获得商品的预期不确定,购买者肯定会进行囤积。① 企业、非企业机构和家庭都有很强的囤积倾向。购买者往往是只要一有货,就到商店里购买(如果有钱的话),而不是在需要购买的时候才到商店里买。企业会有大量的投入品存货,生产者还会储备劳动力,因为这些都非常短缺,而且会形成瓶颈。

另外一个导致下属单位囤积储备并向上级分配部门隐瞒情况的原因是编制计划中的讨价还价[7.5]。

生产者与销售者的合谋对需求调整十分不利(这个问题下一章再进行详细谈论)。生产调整中的摩擦将导致存货剩余(无法出售,甚至不能强加给备受短缺折磨的购买者)。

有必要分别考察和衡量这两种现象。那些遭遇特定产品、服务和资源短缺的人虽然不会因为已经知道哪里有剩余,就可以从未完全利用的能力和大量存货中受益,但是由于体制的惰性、内部摩擦和极度的不灵活,致使一方面的剩余根本无法及时抵消另一方面的短缺。②

短缺发生的频率以及严重程度往往与剩余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部分现象很容易在类似于贝弗里奇曲线的数据中找到[如表10.2]。下面举一个例子,一位顾客在寻找某种特定商品,每家商店的存货变化

---

① 已经有不少数学模型分析了引发囤积的原因。见 S. M. Goldfeld 和 R. E. Quandt (1990a,1990b)、J. Kornai 和 J. W. Weibull(1983)、以及 R. E. Quandt(1986)。

② 许多经济分析都使用了宏观层面上的"净过度需求"这个概念。换句话说,也就是过度总需求减去过度总供给。可以用这一差额来衡量体制的适应能力,即在该体制中,个别的过度需求和过度供给是否能够很快相互抵消。但这种"净抵消"的计算方式无法揭示出摩擦很强的体制在适应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关于短缺和剩余的总量和非总量衡量问题可进一步参见 G. Roland(1990)。

越大,他/她需要去的商店就越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空置房屋在面积、质量和环境方面的变化越大,寻找房子的人越有可能更快找到合适的住房。可供给存货的变化与短缺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之间存在着某种负相关关系。[①] 在所有经济体制下,总会出现短缺(或多或少)与剩余(或多或少)并存的现象,这是因为生产与消费、需求与供给在相互调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摩擦。只有一个具有完美适应能力的体制才能够无摩擦地运行,换句话说,也就没有任何短缺或剩余。而大规模的摩擦则是社会主义经济独有的体制特征,普遍存在短缺而且情况严重,同时又有大量剩余,原因是无法将剩余很好地动员起来提供给购买者或产品使用者,只得闲置。

## 11.5 市场机制: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

生活在短缺经济中的买方每天都会感到自己受制于卖方。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主题就是买方与卖方之间这种不平等的非对称关系。

这里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市场机制: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机制一词描述的是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关系特征,而非货币行为。表 11.6 列出了这两种机制的主要特征。表格和相关的评论主要是为了解释这两个概念,完全可以根据前文的判断做出如下描述[11.1]: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具有明显的卖方市场特征,而资本主义体制,即使是在不完全竞争的框架内运行的领域,仍然是一个买方市场。[②]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实例来考察卖方市场,通过资本体制及其不完全竞争领域来考察买方市场。为了对两种机制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部分内容可能会与 **11.1—11.4** 部分中的有关描述有重复之处。

---

① 关于这种关系的数学模型,可参见 J. W. Weibull(1983,1984)。

② 在完全竞争的理论模型中,买方和卖方是绝对对称平等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占据支配地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某些领域内,其实际运行也基本接近完全竞争的理论模型。例如谷物市场,那里有大量的买者和卖者在交易市场上进行买卖。

E. Domar(1989)和 T. Scitovsky([1951]1971,1985)的研究表明,尽管资本主义体制存在各种形式的不完全竞争,但买方市场机制还是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些市场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在第 **12.1** 部分进行因果分析时,还将谈到这个问题。

**表 11.6　买方和卖方市场的主要特征**

| 主要特征 | 买方市场 | | 卖方市场 | |
|---|---|---|---|---|
| | 买方的状况与行为 | 卖方的状况与行为 | 买方的状况与行为 | 卖方的状况与行为 |
| 1. 信息活动 | 主要在卖方 | | 主要在买方 | |
| 2. 调整 | 主要在卖方 | | 主要在买方 | |
| 3. 力争取得优势 | 主要在卖方 | | 主要在买方 | |
| 4. 不确定性的后果 | 主要由卖方承担 | | 主要由买方承担 | |
| 5. 相对力量 | 买方支配 | | 买方支配 | |

表 11.6 将可能会有部分重合的各种现象,单独列出进行描述,这样有助于看清每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1. 信息。买方和卖方达成交易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信息活动。在买方市场上,信息活动主要由卖方来承担,他们要做广告或者派出销售人员向买方提供信息。当然,买方也可以从事信息活动。在买方市场上,即使是极为接近的替代品之间的价格差异也会激励购买者去寻找并发现最佳的价格—质量组合(最优性价比)。

在卖方市场上,信息活动主要由买方承担,他/她必须获得信息。在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中,几乎没有广告。当企业作为买方时,它可能会派出代表到卖方那里了解信息。买方通常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寻找和发现合意的产品。

2. 调整。在买方市场上,卖方要尽最大努力去发现买方到底需要什么,然后根据这一信息调整自己的行动。卖方存货的目的是因为他/她预期这些产品会有需求。卖方在争取订单的时候,他/她会十分谨慎小心。

而在卖方市场上,买方要根据卖方的情况进行调整。强制替代、搜寻、推迟、根据供给状况调整购买意愿或者为此彻底放弃购买,这些都是短缺所导致的各种形式的强制性调整。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卖方绝对统治着买方。在某种程度上,卖方也要考虑可能的需求状况。

3. 买方和卖方都在力争取得相对优势地位。在买方市场上,卖方之间

会进行激烈的竞争去博得买方的青睐和信心,最后希望买方能购买自己的产品。因此,完全可以将买方市场称为卖方竞争。

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价格水平的形成是一个非人格化的过程,买方和卖方都是价格的接受者,他们都要按照市场价格买卖。现实中,只有一些高度标准化商品市场才会这样运行,即商品的所有特性都非常清楚(例如前面提到过的谷物市场)。一旦价格和质量确定,买方和卖方就只需要做出一个决策:决定他们想要购买或卖出的数量。当然,他们也可能决定不买或不卖。

在非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由于存在非标准化的差别商品,情况就会完全不同。所有差别商品和服务的卖方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一个"垄断者",不管是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是否相同,以及买卖的时间和地点是否一样,这都会将不同的卖者相互区分开来。价格不再是外生的,卖方是价格的制定者。[①]

如果卖方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提供与其竞争者类似、但并不完全相同的商品,那么他/她就能够赢得买方的青睐。此外,卖方还可以进行非价格竞争。他们可以通过更有说服力的广告、雇佣更精明的销售人员以及更准确的掌握购买者需求(即不断重复第 1 点和第 2 点中的行动)来赢得购买者。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办法,卖方会尽力对买方更加友善,为他们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多更好的特殊服务,如将商品认真包装并更具吸引力,直接运到顾客手中,提前供货,或者提供更便捷的支付方式或各种信贷便利。最为重要的是,卖方将不断向顾客兜售质量更好的新产品。赢得客户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提高质量和产品创新。[②]

卖方在争取顾客的活动中既有正面手段,也有不好的做法:如利用误导性广告,产品的表面更新以及虚假创新来操纵顾客。所有的社会都存在腐败和贿赂。在买方市场上,卖方常常企图贿赂买方。

在卖方市场上,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这里是买方相互竞争,要去赢得卖方,更准确地说,是想让卖方把东西卖给自己。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买方要努力获得信息,而且要做出强制性调整。在卖方市场上,上面所描述的

---

① Tibor Scitovsky 首先区分了价格接受者和价格制定者。本部分对资本主义的描述很多都来自 Tibor Scitovsky 和 E. Domar 的著作。

② 我和 J. W. Weibull(1983)有一篇合作文章探讨了产品质量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M. L. Weitzman(1987)采用模型分析了卖方在两种不同市场情况下争取顾客的活动。

卖方行为特征被完全颠倒过来。卖方对买方的态度非常冷淡,而买方则要竭力讨好卖方。贿赂的方向也正好相反:在零售交易中,买方要私下里给卖方人员一定的“好处”才能买到商品。企业要雇佣“关系人”,他/她负责利用个人关系,通过各种方式(也可能要进行贿赂)为企业弄到投入品。商品的选择范围很窄,包装也极为粗糙,购买者必须自己想办法运货。生产者或销售方会长时间拖延定单配额,而且常常不按时供货。一般来说,几乎没有信贷销售方式。[①] 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由于缺乏竞争,生产者或销售方没有任何动力去提高质量或进行产品创新。

4. *不确定性*。经济活动总是面临着不确定性:没有一个卖方能够确切了解其他卖方或买方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同样,也没有一个买方能够清楚获悉其他买方或卖方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这些问题除了主要与第1点中所提到的信息活动有关,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储备是一个好的选择。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根据谁的情况来进行储备。在买方市场上,主要是卖方要进行储备。生产者或销售方要根据交易的技术特征来决定一般需要有多少存货。交易的技术特征决定了生产或供货定单通常有一个固定数量,买方都具有相应的储备能力。只有具备了存货和储备能力,卖方才能够根据买方的要求迅速进行调整。如果可能的话,他/她会尽量不让任何一个顾客失望或得不到满足,除非顾客选择了其他卖方供货。

但在卖方市场上,很少会出现产品的存货累积,购买者很快就会将产品抢购一空,除非是那些毫无用处的产品存货。生产者没有真正的储备能力,上级机构严格的生产要求限制了生产者储备能力。即使生产者在制定计划的讨价还价过程中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部分储备能力,它也不会为了购买者的缘故来使用剩余储备,因此,生产者并不在乎是否能动员起储备能力。

短缺和供给的不确定导致购买者囤积了大量投入品存货[11.4]。购买者往往自行弥补生产者所缺乏的储备动员能力,如果需要的话,他们甚至会自己生产投入品。家庭也因此出现了很多能工巧匠以及自己动手、“丰衣足

---

① 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买方要向卖方提供信贷。例如匈牙利在1989年之前,等候买车的人要提前支付一半的货款。

食"的现象。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很多企业都具有很高的纵向整合生产能力,①这也是短缺综合症的表现之一。一家工程机械厂会尽可能地自己生产所需要的零件,建自己的铸造厂,甚至修建自己的职工住房,因为它不相信其他企业能够提供零部件或铸件,或者按时完成建设任务。

上述论证为表11.7关于存货的国际比较提供了解释。表中资料清楚地表明买方市场的投入品存货相对较低,而产出存货比例相对较高。在那些具有卖方市场特征的国家里,这两个比例正好相反。表中的数量指标相当稳定,很少随着经济中货币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就可以从统计上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市场机制,换句话说,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区别长期存在。

**表11.7 投入品和产出存货比例:国际比较**

| 国别 | 制造业中平均投入品存货与平均产出存货之比,1981-1985年 |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保加利亚 | 5.07 |
| 捷克斯洛伐克 | 3.07 |
| 匈牙利 | 6.10 |
| 波兰 | 4.49 |
| 苏联 | 3.16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奥地利 | 1.06 |
| 澳大利亚 | 1.36 |
| 加拿大 | 0.92 |
| 芬兰 | 1.92 |
| 挪威 | 1.10 |
| 葡萄牙 | 1.66 |
| 瑞典 | 0.81 |
| 英国 | 1.02 |
| 美国 | 1.02 |

**资料来源**:由A. Chikan为本书编辑整理。

① 这里的"整合"一词与第5章中涉及上下级关系的整合不是同一个意思,而是产业组织文献中的定义,即指生产过程中连续的生产阶段。

在经济活动中,总会有一些人(或组织)因不确定性而遭受损失,即使他们进行了大量的信息活动并储备了相当数量的存货,也无法避免损失。在买方市场上,这些损失主要发生在卖方那里。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有些卖方由于技术落后或预测错误(运气不佳),赚取的利润越来越少,甚至会陷入破产境地。而买方受不确定性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而在卖方市场上,不确定性导致的所有后果都要由买方来承担。如果他们对情况判断失误或者运气不佳(或两者都有),那么就会买不到任何东西,或是被迫做出更多的强制性调整。卖方则什么都不用担心,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产品都能卖出去,如果遇到任何困难,政府的父爱主义和预算软约束也会帮他们度过任何难关。

5. 相对力量。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两种机制的主要特征进行总结。谁更强大?谁拥有支配另一方的权力?谁可以强迫另一方做他/她自己不情愿做的事?卖方在卖方市场上处于支配地位;买方在买方市场上处于支配地位,这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状态。相对力量是一个连续的频谱。① 即使我们无法在某一点上准确衡量,但还是可以说卖方比买方享有较多的、中等的和很强的力量优势,反之亦然。就短缺现象而言,卖方比买方强,还是比买方弱?买方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卖方?这些都取决于短缺的频率、范围和严重程度。

就某个特定的国家来说,相对力量会因为不同时期和不同经济部门而有所变化。1978 年至 1980 年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的卖方力量相对下降,而在波兰,卖方力量则相对增强。在这两个国家里,国有住房部门的卖方力量明显要强于服装市场的卖方力量。这里所进行的讨论并不是想分析短期变化和部门差异。表 11.6 正是比较了这两种机制的长期本质特征。

买方与卖方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马克思曾借用古希腊戏剧人物所使用的面具来做比喻,其中既有悲剧面具,也有喜剧面具,既

---

① 许多研究者都使用了消费者主权这一概念。如果要从理论角度清楚阐释消费者主权,那么它意味着所有权力都属于消费者,这是一种极端状态。现实中不会出现这种状态。即使购买者享有很大的优势,依然有权力分配问题,卖方还是拥有某些凌驾于买方的权力。最好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解释"消费者主权"这一概念,它更多地意味着在某种市场条件下,与卖方相比,买方占据着支配性地位。

有英雄的面具,也有坏人的面具。隐藏在面具背后的人所表达的东西是非物质的,演员通过面具来扮演戏剧中的角色。社会关系具有面具的特征,没有人会认为买方市场上的卖方是慈善家,或者说他/她在卖方市场上就是恶人。现实生活所处的环境、人们自己的利益和扮演的角色决定了卖方在买方市场上对买方采取友善的态度,还是在卖方市场上对买方毫不在乎。同样一个人,当他/她扮演卖方角色的时候,他/她可能会非常冷淡地对待买方;但当他/她处于买方地位时,他/她也会被卖方的冷淡所激怒。正是由买方与卖方之间的权力分配所决定的社会关系最终决定了一方处于优势,而另一方则会受到伤害。

这里我们还需要进行一点学术用语上的解释。在详细的因果关系分析后,文中会有讨论,但有一点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就是大规模的持续短缺与官僚协调占据支配地位紧密相连。在其他经济体制下(或某些经济领域),只要市场协调机制不受制于官僚影响,那么就根本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持续性短缺,这也间接证明了上述因果判断。事实上,虽然用“卖方市场”来描述一种基本(或完全)不具备市场特征的协调形式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我还是用了这个词,毕竟在其他研究文献中这是最常用的一种说法。[①]

## 11.6 正常短缺与正常剩余

在描述任何体制时,我们首先都要清楚该体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即那里运行的市场机制是什么。经典社会主义的一个规律性特征就是,卖方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换句话说,那是一个短缺经济。

---

① 在这里加一些个人的注释。我在《反均衡》(1971)一书中第一次详细描述了11.2部分所定义的“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之间的不同之处,并对它们的不同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在那本书里我试图进行术语创造,把买方市场称为“压力”,而把卖方市场称为“抽吸”。这两个说法也是带有比喻的含义:产品在一个管道系统中流动,一方面产品在卖方的压力下被推向买方,另一方面产品在买方的抽吸下被推向卖方。

采用这两个术语的优点是避免了“市场”一词,因为市场这种说法会令人误解。但我必须指出,“压力—抽吸”这一对概念并没有得到广泛接受。尽管这两个术语能够更清楚地说明问题(至少我本人是这么认为的),但没有必要很固执地坚持使用这两个词,毕竟它们没有成为经济学家们的自然用语。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仍然在这里使用了“市场机制”、“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等词语的原因。

尽管所有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都毫无例外地具有短缺经济的特征，但在不同国家，以及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短缺的程度和卖方相对于买方所具有的优势大小都会有所不同。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还是能够观察到其中的变化和不同之处的。

如果能够引入正常短缺和正常剩余的概念，那么就会使分析更加容易一些。[①] 这种分类并不能广泛运用于各种情形，只有在较长时期内观察到某个处于短缺和剩余状态的国家出现暂时的稳定时，才能够使用这种分类方法进行分析。可以这样理解，在对国家 A 进行跨期分析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很长时期内，消费者通常要平均等待 8 年后才能租到一套公有住房，平均等待 6 年才能买到一辆汽车。尽管在 8 年和 6 年的平均期内可以观察到不同的季度变化，但这些变化偏离平均水平的幅度都不是很大：总有人在等待，排队的最长时间一般也都不会超过平均年限。而在国家 B，就长期而言，人们通常平均等待 3 年就可以获得国有住房，等 2 年就可以买到汽车。这两个国家都是短缺经济，住房和汽车部门也都是卖方市场。国家 A 和国家 B 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 A 国的正常短缺要比 B 国的正常短缺严重得多。当然，排队时间的长短只是一个例子。完全可以根据其他指标的正常值进行类似的分析，例如利用强制替代的比率，购买到商品前要去多少家商店，或者被拒绝的定单与被接受的定单的比例。

正常短缺和正常剩余的数字特征（也可以通称为正常状态，或者用更动态的表达方式、正常路径）不可能永远成立。即使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内部，外部和内部政治情况的变化或者社会内部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变化都会导致出现新的正常状态。这种变化可能源自和平时期向战争时期的过渡或是相反；也可能是因为政策的改变，如高速增长转向稳步增长，等等。

但经典社会主义永远不可能从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而且始终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即使如此，仍然有必要建立不同历史状况下的正常短缺和正常剩余的标准指标。此外，还应该加以考察的是：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内各种短缺和剩余指标是如何围绕正常值上下波动的（年度波动和季度波动）。由于经典社会主义的特有机制，尽管存在上述波动，但短缺和剩

---

① 我和 J. W. Weibull(1978)介绍过正常短缺的这一概念。

余仍然会被不断拉近正常短缺和正常剩余指标。在下一章进行因果关系分析时,我们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些机制。

我们无法进行上述波动的国际比较研究。如果能够对短缺和剩余现象进行有规律地观测、衡量并及时公布结构,那么将是一项非常有建设意义的研究,可惜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做过这样的工作,这就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不公开涉及到它们的体制问题数据(即失业数据)。官方统计机构不能借口说难度很大、不好衡量,就不从事这项工作。事实上,一直有很多公开可用的指标可以用来全面分析短缺和剩余现象、强制调整过程以及买方与卖方的相互关系和行为特征。① 本章和下一章都列出了部分关于短缺的零散资料,即使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例子也说明完全可以观察和衡量短缺现象。②

短缺和剩余都会带来损失,我们在 **12.11** 部分还会对此进行分析,但它们已经成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正常的生活秩序,这也就是为什么将它们称为正常短缺和正常剩余的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们对商品供给短缺和排队等候习以为常,无论是家庭主妇、企业投入品采购部门,还是车间领班、普通工人都已经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并把短缺经济作为了一种正常状态。③

正常状态是与均衡有关的一个概念。所谓均衡,有好几层含义,在此我们需要做一些概念上的梳理工作。从广义上看,均衡是指某一动态系统的稳定状态。在动态系统和自然科学的数学模型理论中,只有这样理解均衡概念,才能将它作为有用的分析工具。均衡是一个与价值判断无关的概念:没有人会认为化学系统中的稳定状态是"好"的,多数经济学家也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均衡概念。因此,当一个系统处于非均衡状态时,是指它偏离了自己的均衡状态,即典型的稳定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恩斯宏观经

---

① 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方法将各种局部指标归纳成为综合性指标用以说明不同阶段的短缺、剩余和强制调整现象,这无论对理论分析还是对经济管理都是十分必要的。

② 对剩余的衡量也并不困难。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实践中已经设计出了衡量失业和使用能力的方法,在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后,完全可以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相关现象的分析。

③ 匈牙利社会学家 J. Kenedi(1981)在他那本在地下传播、后来又译为英文的著作中对某个私人建筑工程做了生动讽刺的描述:寻找材料和技术工人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而且都变成了只有进行贿赂才能完成的事。这本书以平实的手法形象地描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公民是如何被迫去适应短缺经济的。

济学使用了“失业均衡”，这是体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稳定状态，如果被打破，体制内会有某种机制促使它重新回到稳定的失业状态。同理，我们也可以说短缺均衡是正常短缺的同义词。①

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是在狭义上使用均衡这一概念，主要指供需相等时的合意状态。在理论著作中，人们在这种特殊均衡之前加了一个形容词：瓦尔拉斯均衡。当然，从这个狭义层面来看，短缺经济并不是一种均衡，更准确地说，只有在特定时期和经济中的特定领域会出现特定的总量均衡，即**11.2**部分里所定义的强制调整均衡。但在这种均衡状态中，仍然伴随着各种供求不平衡以及造成巨大损失的诸多短缺现象（见**11.1－11.5**部分）。②

## 11.7 公开的、宣布的和隐性的通货膨胀

短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我们留在下一章进行讨论。这里的任务是要阐明与通货膨胀有关的几个概念，然后做一些判断。

通货膨胀并不是社会主义体制所特有的现象，任何体制都会发生通货膨胀。它通常与大量产品（不是少数产品）的价格上涨压力以及整体价格水平有关。物价上涨压力的直接来源包括需求过度、产品和服务成本的提高或者两者的结合。需求和成本的影响通常密切相关。

如果市场均衡通过一次性的价格上升而即刻调整到位，那就不能将之称为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初的价格上涨压力不断循环复制，才导致了通货膨胀。

如果价格水平在没有行政干预的情况下稳步上升，那么就可以称为公

---

① E. Malinvaud（1977）曾在这种更宽泛的意义上讨论了凯恩斯失业均衡与古典失业均衡。J. E. Stiglitz 和 A. Weiss（1981）研究了信贷配给均衡和过度需求均衡。

② 可以说非均衡学派使用计量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与上述论证思路的重要结论是一致的（即使没有采用他们的学术用语）。（见本书第216页注释①中该学派的有关著作）。如果利用他们的分析工具，他们也能够描述社会主义经济的短期（年度）状态是如何围绕自己的正常稳定状态（即短缺均衡）上下波动的。例如，如果真去考察社会主义国家的消费品市场，就会发现那里存在强制调整均衡（按照11.2部分给出的定义）。

在早期著作中，我就曾反对利用非均衡学派的宏观计量研究成果和相关术语来阐释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把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短期波动解释为一般性的“过度需求”或“过度供给”都犯了类似的错误。

开的通货膨胀。如果利用行政价格控制(以及工资控制)致使价格水平(以及名义工资水平)的上升趋势减弱,或者基本阻止了价格上涨趋势,那就是压制型通货膨胀。①

表11.8和表11.9包含了部分国家的官方价格统计数据(至于是否可靠我们稍后还会讨论)。即使从苏联的官方统计数字来看,那里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显性通货膨胀。尽管对价格和工资进行了极为严格的中央控制,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仍然无法保证价格水平的绝对稳定。

当然,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之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成功地稳定了价格水平,至少从官方统计数据来看,价格十分稳定。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常常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高通货膨胀率形成了鲜明对比。

**表11.8 苏联的官方价格指数:长期时间序列**

| 时期 | 官方零售价格的年平均变化(百分比) |
|---|---|
| 1928 - 1937 | 20.5 |
| 1938 - 1940 | 5.9 |
| 1941 - 1947 | 18.1 |
| 1948 - 1957 | -8.2 |
| 1958 - 1976(原文如此) | 0.0 |
| 1971 - 1975 | -0.1 |
| 1976 - 1980 | 0.6 |
| 1981 - 1985 | 1.0 |
| 1986 - 1989 | 2.1 |

**资料来源**:1928 - 1975:D. M. Nuti(1986a,第42—44页)。1976年以后:联合国(1990 a,第136页)。

① 关于通货膨胀的概念阐释和压制型通货膨胀的理论研究可参见B. Hansen(1951)。D. M. Nuti(1986a)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过程以及相关的术语使用问题进行了综述。

表 11.9　通货膨胀率:国际比较

| 国别 | 消费品价格年平均变化 1960-1980(百分比) |
| --- | ---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保加利亚 | 4.05 |
| 捷克斯洛伐克 | 2.79 |
| 东德 | 1.21 |
| 匈牙利 | 3.70 |
| 波兰 | 4.97 |
| 苏联 | 2.30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奥地利 | 4.70 |
| 芬兰 | 8.06 |
| 希腊 | 7.82 |
| 西德 | 3.95 |
| 爱尔兰 | 9.24 |
| 意大利 | 9.08 |
| 葡萄牙 | 10.05 |

**资料来源**:F. L. Pryor(1985,第 123 页)。

但这些官方统计资料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呢?任何国家在衡量价格水平时都会遇到很多方法上的问题。在一个政治自由和学术自主的国家里,官方数据有任何偏差都会受到独立专家人士或特定社会阶层专业代表(如为工会工作的研究人员)的质疑。这与经典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央统计办公室完全垄断了价格统计数据,几乎不可能对它进行公开的批评。此外,负责经济运行的机构和人员也有极力隐瞒和否认存在通货膨胀强烈的动机。如果价格稳定一直被宣传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那么承认价格水平的上涨就会使体制的舆论宣传自相矛盾。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将高增长率视为其巨大成就之一。如果使用较高的通货紧缩指数按不变价格来计算生产总量,那么按当前价格衡量的产出增长率就会降低,换句话说,承认价格上涨将不利于体制的自我标榜。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各种方法来扭曲官方统计资料。这种隐瞒(或扭曲)价格(上涨)统

计数据的现象被称为隐性通货膨胀。

不应将隐性通货膨胀与压制型通货膨胀相互混淆。压制型通货膨胀意味着尽管存在价格上涨的压力,但价格并没有上升;而隐性通货膨胀是指价格已经上涨了,但官方统计数据故意隐瞒了价格的上升。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公开的通货膨胀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官方统计资料中公布出来的通货膨胀和隐性通货膨胀。①

如果深入幕后,研究者肯定会发现当局对总量指针和总体价格数据的有意扭曲。扭曲数据是一定存在的,尽管没有很确凿的证据表明存在大量的扭曲现象。价格指数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虽然还没有达到完全由中央当局随意捏造的地步。四个方面是对比现象的说明:

1. 中央的价格指数依赖于下级的报告以及生产企业和贸易企业的汇报。由于每份报告在上报过程都要经过好几层官僚机构,每一级在向上传递报告的时候都会意识到,如果将价格上涨的情况真实反映上去,很可能对他们自己不利,于是,各级机构都想抹平过高的价格增长数字。② 这样,在中央统计部门进行资料汇总之前,很多数字就已经被扭曲了。

2. 企业常常暗中提高价格[8.4,8.6]。尽管利润对企业而言基本无关生死,哪怕出现了严重亏损,企业也不会陷入绝境,但企业还是会选择通过涨价的办法避免亏损,因为这总比请求上级组织出手援助要好过得多。

如果企业要提高成本,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会选择不去争取官方的认可,然后提高行政管制价格。它们认为,更容易的办法是将产品稍做改进,这样就有了可以适用新价格的"新产品"。在新价格的计算过程中,企业事先就会把提高的成本包括在内,当确定新的行政管制价格时,自然也就得到了官

---

① 把隐性通货膨胀作为公开通货膨胀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但鉴于这一用法已经被普遍接受,我们也就接受了。

如果我们不把所谓"公开"一词理解为对真实情况的准确表达,那么也就可以解决概念上的混淆问题。价格的决定过程始终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没有采取行政手段来控制价格的上涨。

② 当官方宣布的通货膨胀率低于5%时,匈牙利研究者 M. Petschning(1985)在对地方实际做法进行了仔细观察之后,记录下了以下情况:中层统计机构认可了所有价格上涨低于5%的报告,但同时要求下属部门对所有高于5%的价格上涨做出解释。这显然给上报部门施加了压力,最好不要把超出标准的数据报上来。

方的认可。价格部门对此当然一清二楚,但它们的动机(想要表明价格是“稳定”的)与企业的目的殊途同归,这样,价格部门也就心知肚明地默认了企业的行为。

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企业自身也愿意暗中提高价格,因为这样它们就可以更轻松地完成按当前价格计算的产出计划。

3. 在编撰价格指数时要遵循统计上的可比性原则。在进行两年价格的比较时,人们肯定会关注相同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在价格上有什么变化。一般而言,这一严格的可比性标准只适用于标准产品的比较,而对于那些差异产品而言则不能适用,因为差异产品的质量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

如果没有行政性价格管制,而且市场机制能够充分起作用的话,那么标准产品和差异产品的价格运动之间就会有密切的相关性。如果这两类产品的价格可以自由变动,那么标准产品的价格就不可能始终低于差异产品的价格,因为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将没有人生产标准产品。因此,就长期而言,价格指数不同组成部分在计算上不会出现扭曲现象,即使全部生产都由标准产品组成也是如此。

如果当一个体制的生产和价格处于官僚协调之下,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价格当局有权制定标准产品的真实行政管制价格,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可以强制执行这种价格。于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差异产品的价格只能被确定伪行政价格。价格当局无法完全控制差异产品的价格,隐蔽性价格上涨就变得非常普遍。这样,标准产品和差异产品的价格就会严重脱离,实际上,后者的价格上涨往往会大大快于前者的价格上涨。

如果仅仅用标准产品来代表全部的价格水平变动(为了迁就可比性原则),那么价格指数就会由于编制方法而被严重低估。[①]

技术进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必然会提高差异产品在总产品中的比例。这一比例越高,伪行政价格的应用范围就越广,价格指数的扭曲程度也就越严重。

4. 即使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也存在非正规私人部门。官方的价格指数中并不包括非正规私人部门的价格变化,然而灰色市场和黑市的价格上

---

① 即使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用完全相同的产品组合(满足可比性原则并主要包括标准产品)去编制价格指数,那么前者也不会出现很大偏差,而后者肯定会受到扭曲。

涨能够最清楚地反映出国有和合作社部门产品和服务的短缺状况。一个真正全面的价格体系应该是对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真实产量比例进行加权后计算出的平均价格水平。官方价格指数因此会出现严重扭曲,扭曲的程度取决于非正规部门产品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以及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产品的价格差异。

**表 11.10 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指数:替代估算**

| 国家及年份 | 年平均价格变化(百分比) | | |
|---|---|---|---|
| | 官方 | Alton | Culbertson - Amacher |
| 保加利亚 | | | |
| 1963 - 1970 | 1.1 | — | 3.4 |
| 1971 - 1975 | 0.2 | 3.0 | — |
| 1976 - 1978 | 0.5 | 3.2 | — |
| 捷克斯洛伐克 | | | |
| 1963 - 1970 | 1.2 | — | 5.0 |
| 1971 - 1975 | 0.1 | 2.2 | — |
| 1976 - 1978 | 0.9 | 1.6 | — |
| 东德 | | | |
| 1963 - 1970 | 0.0 | — | 3.4 |
| 1971 - 1975 | -0.3 | 0.7 | — |
| 1976 - 1978 | 0.0 | 1.3 | — |
| 匈牙利 | | | |
| 1963 - 1970 | 0.9 | — | 4.1 |
| 1971 - 1975 | 2.9 | 4.1 | — |
| 1976 - 1978 | 4.3 | 4.4 | — |
| 波兰 | | | |
| 1963 - 1970 | 1.2 | — | 5.5 |
| 1971 - 1975 | 2.5 | 5.7 | — |
| 1976 - 1978 | 5.9 | 8.0 | — |
| 罗马尼亚 | | | |
| 1963 - 1970 | 0.4 | — | 6.3 |
| 1971 - 1975 | 0.5 | — | — |
| 1976 - 1978 | 0.7 | — | — |
| 苏联 | | | |
| 1963 - 1970 | 0.1 | — | 8.6 |

**资料来源**:D. M. Nuti(1986a,第 50,52 页)引自:1963 - 1970,第 1 列和第 3 列:W.

P. Culbertson 和 R. C. Amacher(1972);1971—1975 和 1976—1978,第 1 列和第 2 列:T. P. Alton 等(1979)。

注释:尽管表 11.9 和表 11.10 的时期分段有所不同,不能直接进行比较,但还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表 11.10 中的官方数据要低于表 11.9 中的资料。西方研究者往往使用不同的官方统计资料进行分析。

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努力,试图消除上述扭曲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并且利用其他方法进行替代估算。表 11.10 中的两个例子清楚地揭示了官方统计存在着严重扭曲。当然,西方经济学家所做出的努力并不能替代有意识的内部统计审查,因为只有从特定国家之内才能获得所需要的全部数据。

由于没有完全可靠的数据,因此很难得出一般性结论。下面提出的观点可以看作未来的研究计划: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控制机制有可能让价格抵抗住通货膨胀压力,至少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即使不是每个国家在所有的时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非常稳定的价格。

# 第十二章　短缺与通货膨胀:原因(分析)

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短缺和通货膨胀构成一组相互关联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现象,很难用单一的原因加以解释。正如对大多数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一样,对这个问题也需要进行多层次的因果分析。

对于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为什么会出现短缺和通货膨胀,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争论。大部分研究者都同意短缺和通货膨胀是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争论的焦点是每一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联程度。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是:是否有一些因素是主要原因,有一些是次要原因,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链条?

本章试图对争论中所提出的因果关系做一个综合性的解释,[①]其中不仅包括微观层面上的因果关系,而且包括宏观层面上的因果关系。**12.1** 至 **12.4** 部分涉及到微观层面,**12.5** 至 **12.9** 部分主要讨论宏观层面的问题,**12.10** 部分是简短的总结。

大部分研究文献一般都是从分析消费者市场以及家庭所经历的短缺现象开始的,有时候也仅限于对这些领域的考察。这里的研究出发点是生产企业和管理生产活动的官僚机构的行为特征。消费者市场和家庭将会在稍后阶段才纳入我们的分析。

① 本章也将对第 11 章注释①中提出的所有保留意见进行综合分析。

## 12.1 企业行为:短期决策

有必要将在**11.5**部分开始的原型比较继续下去:一个是在非完全竞争框架内运行的一家资本主义私人企业,①一个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为简单起见,下文中将把前者称为一家竞争性私人企业,后者称为一家经典国有企业。表12.1列出了两者的主要区别(利益动机和行为特征),随后会有详细的评论。我们将主要从产权形式的不同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异。

首先讨论企业对供给的短期控制以及相应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然后是企业对需求的短期控制,下一部分将研究企业的长期投资决策。

表中第1行介绍了两类企业的利益动机。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不能下结论说,竞争性私人企业的决策者只有利润动机,而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领导人除了想得到上级组织的认可外别无他求,或者说得到上级认可的唯一办法就是严格执行指令[7.4]。这里最好避免使用"最大化"一词。按照本部分的论证思路,我们并不想告诉读者在进行决策者动机分析时,什么是最合适的模型。但可以肯定的是,表中所列出的目标都对企业的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

第2行清楚地表明了竞争性私人企业面对着很多竞争对手。它的周围有无数竞争企业生产和出售近似的替代品,而且随时可能出现新的竞争者。而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没有丝毫竞争威胁,官僚机构独自决定了每个部门由哪些企业构成以及相应的部门"轮廓"(业务方向)。

---

① 非完全竞争理论的先驱者是E. H. Chamberlin[1933](1962)和J. R. Robison(1933)。在此之后,该理论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可参见H. R. Varian(1978)对非完全竞争理论研究发展现状的一个综述。

该理论区分了非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双寡头竞争是其中的一个特例)等不同的市场形式及其变化形式。在与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进行比较时,这些区分意义不大,尽管在其他相关领域非常重要。

标准的非完全竞争文献很少注意到T. Scitovsky和E. Domar提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他们两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购买者的非价格竞争,参考文献可见本书第232页注释②。

表 12.1 体制比较:企业的短期行为

| 主要特征 | 非完全竞争框架内运行的资本主义私人企业 |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 |
|---|---|---|
| 1. 利益动机 | 主要是增加利润 | 主要是得到上级组织的认可首要评价标准:指令完成情况 |
| 2. 进入和退出 | 市场决定、自由进入、经营失败将导致退出 | 官僚机构决定着所有的进入和退出 |
| 3. 预算约束 | 硬 | 软 |
| 4. 价格反应 | 强 | 弱 |
| 5. 价格决定 | 企业决定销售价格。价格高于边际成本 | 价格当局决定销售价格,但企业也能影响价格制定。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关系具有随意性 |
| 6. 需求信息<br>生产者—销售者假设 | 企业无法确切掌握需求状况并不期望有想像中的过度需求 | 企业完全了解需求状况期望想像中的需求 |
| | 销售量取决于自己的努力 | 销售量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 |
| 7. 想像的过度供给 | 希望在既定价格上卖出更多(比购买方购买的还多) | 不想在既定价格上(由价格当局制定并批准)卖出超过自己生产限量的产品数量 |
| | 有想像中的过度供给并具有相应能力 | 没有想像中的过度供给或相应的能力 |
| 8. 对投入品的需求 | 有节制 | 倾向于用光 |

至于企业的退出,我们需要同时看一下第 2 行和第 3 行所列出的内容。对于一家竞争性私人企业而言,是否能够生存将由市场来决定。但经典国有企业的生与死都掌握在官僚机构的手中。如果官僚机构认为合适,那么它就可以关闭企业,哪怕这家企业能够创造利润;反之,当官僚机构认为一家企业应该继续存在,就根本不会考虑其财务状况是否已经濒临破产。官僚机构拥有软化预算约束的全部手段。

正如前文所述,竞争性私人企业具有强烈的动机去赢得顾客,而这些动机都不适用于国有企业。

企业之间的这种区别与短缺现象密切相关。一家竞争性企业(不论是已经存在的企业,还是潜在的进入者)会根据需求变化迅速灵活地调整其产品供给。如果它发现某些需求还没有被满足,那么它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必须把握的机会。以前我们在讨论信息问题时,就曾引用过哈耶克的论述来说明这一问题。竞争性私人企业对于短缺信息极为敏感,它会利用自己掌握的每一个分散信息,迅速扩大生产来填补短缺留下来的任何一点空隙。

经典国有企业及其上级机关缺乏关注信息的动机。[①] 企业没有任何动机去主动了解哪里出现了短缺,哪里还有未能满足的需求。它也不会根据买方的情况灵活调整生产供给(迅速增加生产或改变产量)。由于存在既定的产出目标,它在进行调整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很多限制。它希望买方能够根据卖方的情况调整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

现在让我们转向价格问题(第4行和第5行)。关于相对价格和总体价格水平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讨论,这里只想谈一个问题:企业与价格的关系。其中最关键的是企业对价格(主要是销售价格)的敏感程度。竞争性私人企业对价格高度敏感,毕竟它是以"市场为生"。经典国有企业对价格极不敏感,虽然价格也并非无足轻重,但是销售价格对它而言,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有企业的"衣食父母"是官僚机构,而不是市场。

至于谁决定了价格以及根据什么来决定价格,这个问题在此居于次要地位。当然,如果是在对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的不同市场形式进行比较研究,而不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体制进行比较的话,那么价格决定的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从一方面看,就严格意义而言,一家垄断企业可以在边际成本之上随意定价,而无须担心会失去顾客,甚至不用做任何努力去寻找客户。[②] 从另一个极端情况来看,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者和销售者都面对着给定的价格,然后生产者根据情况变化来调整产量,它只需确保价格与边际成本一致即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没有任何动力去提高产品质量,但同时企业也要保证始终不降低质量。只要能够符合质量标准(不论有明

---

① K. A. Soo(1984)曾专门针对国有企业的这个特征创造了一个词: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体制不灵活"。

②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才是真正的垄断。一般人认为垄断通常都是指处于非完全竞争状态中的企业并且有面临着替代产品和服务的竞争。

文规定,还是没有明文要求)并按时交货(以及满足其他一些条件),企业就可以以现行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如果连上述条件都无法满足的话,那么它就会被挤出市场。[①] 而我们在 **11.5** 部分所讨论的情况,即生产者和销售者会努力从实际和潜在竞争对手那里赢得顾客,属于非完全竞争状态,它是处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中间市场形式。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没有人能说清楚企业的销售价格与边际成本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非常随意,也不会影响企业行为,因为国有企业对价格不敏感。

在第6行中,我们可以发现竞争性私人企业能够大致预测买方的需求状况,但无法掌握绝对准确的信息。这种不确定性防止了企业骄傲自大。企业在进行生产融资时,不能任意假设存在所谓想像中的过度需求(即买方的购买意愿)。因此,企业必须努力让购买者青睐自己的产品,而不会转向其竞争对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典国有企业认为需求是确定的。在很多情况下,排队购买和定单要求都让企业事先就感到肯定会供不应求。还有很多其他形式的短缺信号,因此,企业可以假设一定存在着潜在的想像过度需求。既然买方能够消化所有的供给增长,那么也就没有必要费心争取客户。

尽管本部分主要在讨论企业及其微观行为,但是这些与需求预期有关的局部微观因素(企业能够准确把握自己产品的需求)是与一般性的宏观因素(总量需求的形成)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提醒了我们不能将因果分析仅仅局限于考察微观单位的利益动机和行为特征。

前文在 **11.2** 部分我们已经讨论过想像中的过度需求现象,基本可以根据类似的解释来理解第7行中想像中的过度供给概念。最简单的方法是采取提问的形式来描述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向卖方提出这样的问题:假设没有需求方面的约束,企业愿意在现行价格下多出售多少产品(比它们实际出售的多多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想像中的过度供给。这一数量可能会(部分或全部)以未出售存货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生产者也可能还根本没

---

① 这是对完全竞争纯理论状态的描述。如果有销售者能够通过努力将自己和其他销售者区别开来(提高质量、提供更好的供货条件,等等),那么就将变成非完全竞争状态。

有生产出来。对企业而言,只要知道自己有能力生产就已经足够了。因此,想像中的过度供给是与想像中的过度需求相关联的一个概念,即想像中的过度(生产)能力,如果企业所面对的购买者能够在现行价格条件下消化所有产品,企业愿意使用且尚未使用的生产能力。

竞争性私人企业具有这种想像中的过度供给或过度(生产)能力。下面的阐述与非完全竞争理论基本一致。企业在定价时往往会让产品价格高于边际成本,然后假设在这一价格水平下它能够卖出多少产品,最后再根据这一数量来确定自己的产量。当然,此时所确定的产量会低于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产量,而两者之间的差额恰好是想像中的过度供给或过度(生产)能力。[1] 许多研究者认为,存在这种过度能力是非完全竞争相对于完全竞争的劣势之一。但 Scitovsky 和 Domar 研究表明,这不但不是劣势,反而是非完全竞争所具有的一个优势,因为它是促使竞争性企业去努力赢得顾客的主要因素之一。

具有过度能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进行灵活调整的原因之一。对购买者而言,过度能力就意味着能够满足他/她的需求,而且这种能力的增长会不断提高购买者对卖方的信心。想像中的过度能力是买方想以“退出”(赫希曼)来威胁卖方的必要条件。这样,当购买者对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不满意而转向其竞争者时,其他企业也有能力为这些购买者提供产品或服务。

经典国有企业既没有想像中的过度供给,也没有想像中的过度(生产)能力。在编制计划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它可能会隐藏部分生产能力,但即使这样做,它也不是为了购买者。甚至在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仍然会保留其生产能力。[2] 由于供给问题所引发的瓶颈效应往往与短缺一起出现,导致企业其他资源的闲置,无法将这种形式的剩余动员起来满足需求。即使有很多因素鼓励企业进行数量扩张[7.6],但是为了要保留生产能力以及各种投入品限制都限定了企业的最高产出。

由于国有企业没有想像中的过度供给或想像中的过度(生产)能力,它们也就没有动力去争取顾客。没有过度能力也使得企业无法灵活调整生

---

① 见 H. R. Varian(1978,第 95 页)。

② K. A. Soos(1984)向人们揭示了这种现象对供给约束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产。而对于购买者来说,他们也就缺乏信心以“退出”来威胁企业。

关于第6行中想像中的过度供给和想像中的过度(生产)能力会在宏观层面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我们会在后文中进行详细讨论。

在讨论了供给方面的问题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企业短期控制在需求方面的问题(表中第8行)。从第1、2、3行的动机描述以及第4行所强调的价格反应,我们不难看出竞争性私人企业具有强烈的投入品节约意识。由于不会受到持续短缺问题的困扰,所以企业通常会购买自己需要的投入品数量,实行灵活的存货政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竞争性私人企业对投入品的需求是有节制的。

经典国有企业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为了获得上级组织的认可以及必须执行上级的指令,企业不能随意中断生产,但投入品供应存在的问题和持续短缺往往会使企业无法正常完成生产任务。于是,企业只能不断增加投入品存货。事实上,只有供给约束是有效的,企业只需获得投入品的管道,它在资金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对价格几乎毫不敏感,尤其对投入品价格更是如此。因此,企业很难节制自己对投入品的需求(当前生产所需要的投入品),而且倾向于用光为止。[①] 很难说清楚企业自己到底需要多少投资品(自愿需求),因为只要投入品稍有减少,就会出现供给约束(或者是官僚机构投入品配给制度所造成的行政性供给约束)。关于经典国有企业投入品需求在宏观层面的影响,我们将在后面部分进行讨论。

投资品分配中的“无节制需求”现象更为严重,下一部分将集中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 12.2　企业行为:长期决策

本部分将继续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私人企业和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进行比较研究。在涉及投资问题时,我们没有必要再将讨论局限于非完全竞争领域。为了更清楚地进行理论比较,这里忽略了国家对私人

① 在以前的著作中,我曾用“无限需求”来说明国有企业的这种情况。鉴于这种说法容易引起误解,我在这里使用了“倾向于耗尽或用光”,希望能表达得更清楚一些。

投资行为的干预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国有企业)投资。

扩张冲动和随之而来的投资饥渴并不是社会主义体制所特有的现象,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同样存在这些问题。体制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投资决策者的自我约束机制。哪些因素使得决策者有能力而且愿意克制扩张冲动?而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并且愿意这样做呢?

前文中我们曾引述过凯恩斯用“动物精神”来形容私人企业家,这种精神不断激励着他/她扩大自己的企业。但私人企业家不可能完全被扩张冲动所支配,因为私人所有者自己要承担投资决策风险。这一机制同样适用于小型家庭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剩余收入属于财产所有人[5.2]。即使投资决策权完全由管理者掌握,但投资成功所获得的收益归所有者,损失也将由所有者承担。一个严重的投资失败有可能吞没家庭的全部财产或者让投资者的股票变得一文不值。因此,投资决策及其实施对于经理人的职业生涯来说可谓“事关生死”。

决策肯定会有风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决策者要确信具有良好的商业前景、未来经济形势看好、(扩张)投资生产的产品会有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产品卖出好价钱,从而获得利润。这些周密细致的投资考虑促使决策者必须自我抑制扩张冲动。

投资热情的消涨是经济活动商业周期的函数。经济复苏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投资热情高涨,投资项目增多带动了需求上升,由此又导致更多的投资项目上马,最后很可能会出现经济“过热”。但在经济过热时期,也会有很多因素来遏制投资的进一步扩张: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致使工资不断上升,信贷需求的增加会导致利率提高,甚至原材料的运输都会出现极度紧张(例如也会出现暂时的短缺)。[1] 这些信号可能足以让经济“冷下来”,当然,也有可能使其陷入严重的衰退。无论如何,商业前景不看好、成本不断提高、投资效率不高等因素最终会让很多企业家主动约束其投资意愿。

结论很明显:对投资资源的需求是受到约束且长期持续存在的,尽管也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投资高潮。

这与经典社会主义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自我约

---

① 关于资本主义商业周期扩张阶段的情况描述可参见G. H. Moore(1983)。

束机制几乎完全失效[9.1]。因为预算约束是软的,决策者丝毫不用担心投资扩张可能造成的财务失败。再加上上级机关同样负有责任,毕竟投资项目都是它们批准的,有时甚至是它们强令企业进行投资,这样,企业决策者就更无须担心投资风险。不管采用何种财务手段去挽救失败的投资项目,最后总会由国家付账,也就是说人人有份,而又无人负责。当发生损失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财务或收入会像私人所有者那样受到直接影响。没有人在花钱的时候慎之又慎,因为那都是国家的钱——这就是缺少抑制投资冲动自我约束机制的真正根源所在。

没有必要担心产品的销售前景:不管生产多少,需求都会根据供给来进行调整。持续性短缺决定了生产者根本无需担心销售问题。[①]“经济过热”不会带来任何让人们感到危险的信号。从一方面看,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所谓的过热(严重的投资紧张已经变成了体制的常态);从另一方面看,当局会采取行政手段控制工资上涨,而且利率也是由中央制定和进行监管(尽管利率对投资决策几乎毫无影响)的。

结论也很明显: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部门对投资资源的需求始终不受制约。越来越多的投资计划会上报给上级部门,然后坐等资金投入。对投资信贷的需求总是超过供给,工程、建设项目和设备安装的纵向安排与横向需求都超出了计划当局所能掌握的配置资源数量和生产部门所能供给的能力。

## 12.3　生产管理部门的行为

前两部分已经对竞争性私人企业和经典国有企业进行了对比,这使我们更容易进行体制之间的比较。事实上,任何时候都不能孤立地看待一家社会主义企业。本书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介绍过,企业领导人是负责生产的低层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在各种讨价还价的决策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影响,但大部分重要决策仍然是由官僚体制内更高级别的机构做出

① 这里的观点(以及本书所论证的其他一些观点)不符合自我实现的预期原则。对投资资源的无限制需求是导致持续性短缺的原因之一,而与此同时,持续性短缺又使得投资项目始终无需担心未来的销售问题,这又是造成投资需求几乎不受限制的重要因素之一。

的。

前面所描述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中国有企业的短期和长期行为特征同样适用于官僚体制中的中下级官员。仅举一个方面:从一般趋势来看,官僚机构对投资品(特别是投资资源)的需求也是无止境的。当然,这里还需要做几点补充。

分配者在计划过程中总是试图向下级单位下达严格的任务,尽量迫使它们能够以最少的投入生产出最多的产品[7.5]。这种想法本身就可能形成纵向短缺,因为相对有限的投入品配给总是很难让企业完成产出计划,同时也满足不了数量驱动型增长。

决策者位置越高,就越倾向于使用总量指标。[1] 这又回到了我们再三讨论到的信息问题。例如,服装厂的厂长在执行生产计划时,不得不考虑衣服的样式、颜色和尺寸。而服装行业的部门主管却只考虑更广义的总量指标:应该生产多少男装,多少女装,多少儿童服装。到了轻工业部,他们的脑海里最重要的东西是整个服装行业对总产出的贡献有多大。企业上级主管部门主要按照以总量指标为基础编制的报告来衡量下级企业领导的业绩,部门主管没有心思去关心与购买者需求有关的细节问题。“计划一定要完成”基本变成了必须实现总量产出指标,甚至可以根本不在乎购买者的需求意愿,是多一点绿色的衣服,还是少一点蓝色的产品;是生产更多宽大的裤子,还是少生产紧身的裤子,这些都无关紧要。这也是为什么短缺和剩余能够同时并存的原因之一。

与安排产出任务一样,官僚化的投入品分配也是以粗糙的总量配额为基础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按计划会分配给服装厂各种定量的棉花或布料(也根据质量划分为不同等级),但不可能根据专门的101种布料质量分类标准进行详细分类,这并不是因为官僚机构忽视了这方面的考虑,而是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官僚制分配体系没有办法完成现代生产所要求的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金字塔式的层层配置任务。粗糙的配给制

① 见A. Banerjee和M. Spagat(1987)。

度导致了大量配置错误、短缺和剩余。[①]

官僚机构不得不常常忙于处理短缺所造成的各种问题，这不仅包括负责生产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而且还包括各级党委组织。当一家企业很可能因为原材料供应不及时而无法完成生产任务时，企业的党委书记有责任去与供应企业的党委书记进行协商，与当地党委联系，甚至要找到中央。这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由采购部门低层管理人员做的事却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高层政治领导的日常工作之一。一个个低层官僚往往通过以下方式来标榜和显示自己的权力：他们有本事让上门求助的下属单位及时弄到配给物资并获得特殊待遇。

还有一种现象最好用相互影响而不是单一的因果关系来解释。一旦出现短缺，最关键的是经常让官僚机构来处理（至少是去处理那些最棘手的问题）。但这种"救火"式的处理办法，往往会加剧投入—产出品的运输紧张，从而使经济中各个环节的短缺状况更为严重。

## 12.4　相对价格

下面我们分两个部分来分析价格的作用。首先是考察微观层面的相对价格；然后是宏观层面的一般（平均）价格水平以及压制型通货膨胀。

按照本书的分析方法，经济主要被分为两大领域：（1）企业领域，其中生

---

① 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往往把一系列由于配置错误所造成的短缺归结为敌人的颠覆活动。这里有必要引用一下对布哈林及其同事的审判记录。当时的总检察官维辛斯基曾这样说道："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我们一方面有那么丰富多样的产品，而另一方面供给却又常常中断，以致这里也缺货，那里东西也不够。这些叛徒们应该对此负责。"Grinko 是这样控告另一位"叛徒"的："Zelensky 在右派集团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指示下，将大量本来应该运往出现严重灾荒地区的物品送到了丰收地区，结果使一些地区的东西束之高阁，而另外一些地区却出现了严重的物品短缺。"这实际上意味着出现严重灾荒的地区没有足够的钱去买设备，而丰收的地区虽然有钱，但没有充足的东西可买。这段文字引自 R. Conquest[1968]（1973，第 563、504 页）。

在另一次审判中，一家食品贸易企业的经理供认，在苏联新宪法颁布时期，一位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曾对反革命分子下达了这样的任务："故意贬低新宪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我们要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抗议……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面包店前组织人们排起长队，造成面包供应的紧张。"斯大林的亲密盟友莫洛托夫在一篇演讲中引用了这段供词[1937]（1950，第 24 页）。

产者和使用者都是企业;(2)消费领域,其中生产者是企业,而使用者是家庭。(前者的特征在表8.2的4.4、4.5、5.4和5.5中列出,后者的特征见4.8和5.8)。

1. 企业领域。企业之间的价格是相当随意和不合理的,几乎没有包含任何信息[8.5,8.6],但这并不是由于短缺和剩余而导致企业不重视相对价格。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它们对价格的反应极不敏感。企业的供给和需求主要依赖于上级机关的指令和审批以及其他非价格信号。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价格"不好",而是因为价格不起作用。换句话说,可以有效协调需求、供给及价格的市场机制已经被彻底取消,企业领域的生产和消费主要由官僚协调控制。

2. 消费领域。这一领域的情况有所不同[8.5,8.7,8.8]。家庭的预算约束是硬的,而且他们对相对价格非常敏感。许多消费领域的行政性价格无法平衡供求关系,而价格的僵化就更难对供求进行调节。随意和不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是造成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一般性的情况介绍之外,我们还需要详细讨论一下社会主义国家消费价格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免费或以非常低的国家补贴价格向公众提供部分消费产品和服务。对大多数处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阶段的国家来说,这些产品和服务包括基本食品(面包、糖、油等等)、公共交通、住房、医疗卫生、文化和教育。

这项价格政策并不是一时兴起的产物,它源于经典社会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基本承诺"[4.3]。社会主义社会曾郑重承诺至少要满足所有工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必须以可承受的价格或免费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上述产品和服务。

目标是崇高而又动人的,但随之却造成了严重后果,其中之一就与本章的主题具有明显的关系:免费或以低价格供给致使需求无限膨胀,而供给根本没有能力去满足这些需求。结果便是产品和服务的严重短缺,这是这项价格政策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为满足基本需要而对上述产品和服务进行分配的职能由市场转给了官僚机构:形成了官僚化的分配体系。说明并解释这项政策背后的主要力量以及所导致的结果是政治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职责所在。如果崇高就意

味着遵循分配原则并设计出可以加以实施的价格政策(然后导致短缺),那么是不是说,为此官僚机构就必须承担起这项分配任务呢?或者说官僚机构的真正目的其实是要把分配这些基本产品和服务作为它主要的权力工具,正如它在取消了市场机制后便立刻就开始实行这一政策。可能的答案是:这两种动机结合在了一起。

官僚机构在实行配给的过程中基本遵循以下几个标准:

1. 需要(家庭的规模,健康状况);

2. 对经济或其他社会成就的承认(没有政治上的考虑);

3. 对政治优越性的承认。政治偏好和政治歧视,如以社会阶级划分为基础;

4. 官僚等级的位置和声望;

5. 收入和财富状况;

6. 关系,贿赂。

这些标准之间既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也有相互矛盾之处。有些配给计划公开宣布了分配标准,有些则没有。但即使是公开宣布,纸上的规定和实际执行的标准往往也存在差异[4.4]。除了官方分配(或官方分配与半合法或非法供给混在一起),[①]仍然会有黑市和灰色市场。

一般认为,制定的相对消费品价格和官僚分配体制不仅仅是针对各种社会集团进行(收入)再分配,即什么人能享受社会产品。官僚机构还通过这项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公民的消费选择。尽管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选择权,但是官僚机构和生产者对消费者实行了专制统治。[②]

这里有必要从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层面来分析涉及基本需要的价格政策及相应的分配体制。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分配体制看作未来历史阶段的先兆,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前奏。众所周知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是这样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们接着论证说,这一分配原则目前只能适用于极少数领域(如初等教育),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所适用的领域将不断扩展。

---

① 对分配制度的详细讨论及评价见第 13 章。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伦理、政治及社会学分析可参见 F. Feher, A. Heller 和 G. Markus (1983)。

事实上,这一原则完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像,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都不可能实现。当然,某项具体的人类需要是能够得到满足的。例如,按照今天的电话技术发展趋势,总有一天人人都有一部电话而且可以随意使用。但问题是,人类对电信服务的要求也将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提高。一旦可以随意使用电话之后,人们又想实现可视通话,在汽车里装上电话,用电话来传递文件,通过电话连接计算机,等等。人类经验无可争辩地表明,技术进步将不断创造出新的需要,人类的需要没有穷尽之时。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纯粹是乌托邦式的梦想,无法为免费分配提供任何合理证据。

## 12.5 企业关系中的压制型通货膨胀

上一部分从微观角度进行了因果分析,下面我们将讨论宏观层面的问题。与上一部分一样,价格依然是这一部分的主题,但关注的重点将从相对价格转向总体价格(水平)。主要目标是要回答下列问题:短缺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压制型通货膨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短缺现象?

这里也将分别从两个领域来进行讨论,12.5 部分是企业领域,其中生产者和使用者都是国有企业或合作社;12.6 部分是消费领域,其中企业扮演着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角色,而使用者和购买者是家庭。

尽管我们的研究目标是想得出宏观层面上的结论,但我们必须从微观层面开始谈起,将表 12.1 第 8 行的有关内容进行进一步地阐述并加以扩展。供给对企业的购买意愿形成了有效的约束:或者是纵向约束(企业没有从上级分配机关获得它想要的资源配给数量),或者是横向约束(生产、储备或分配投入品的企业无法充分满足购买企业所需要的投入品需求数量)。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在投资品、建设服务和高技术机械设备进口等领域显得特别突出。

企业的资金支付能力不是限制其需求数量的有效因素。不管是生产还是投资,现阶段的计划任务都是由上级部门规定的(至少可以说必须进一步完成计划),企业有充分的理由要求获得必要的物资投入。投入品没有分配

到位或供应不足,这是必须接受的现实,但不可能因为缺少资金而无法购买投入品。这是经典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和财政制度公开宣布的原则,也是现实中的实际做法。如果企业能够通过自己的现金留存或相应的贷款支持购入投入品,那么就没有什么问题。但一旦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不足以支付企业的购买计划,企业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融资:要求紧急贷款,[①]推迟偿还贷款或推迟应向财政上缴的有关款项,想方设法盘活企业被冻结的专项留存资金,等等。

从宏观层面来看,这些做法实际上意味着:企业的货币总需求基本上取决于计划任务规定的真实生产活动所产生的融资需求。货币总供给只能被动地根据货币需求来进行调整,即放任型的货币政策。[②]

需要加以补充的是,利息不论是对贷款人还是对借款人都没有什么意义。利率既不会对银行或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也无法影响信贷供给或贷款需求。

金融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完全处于附属地位,扮演着被动的角色。[③] 让我们设想一下,当企业所得税、利率水平或货币总供给上升或下降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上述三个变量的变化会自动影响商业活动,例如,导致企业收缩或扩张实际生产活动以及增加或减少投资。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财政或货币政策的变化几乎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企业的实际生产活动主要受到以下措施的制约:提高或降低生产计划,上级机关向企业派出官员下达指示,中央决定新的投资项目。

从这些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企业部门并没有真正实现"货币化",那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尽管所有生产活动也都以货币形式入账,但企业只是半货币化的部门[8.5]。企业部门的半货币化状态(以及被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造成短缺的重要原因,它使得许多领域的需求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膨胀和扩张。但即便我们把这一点列为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其本身还会有所变化。财政和货币政策的

---

① 例如,可参见 G. Tallos(1976)。

② 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在 1971 年至 1980 年间,银行提供的信贷总量的增长规模是生产增长的两倍。M. Hrncir(1989,第 30 页)。

③ 关于货币的被动特征可参见本书第 125 页的注释①。

被动特征不过表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企业部门的财务完全受制于官僚协调机制，而且主要是官僚机构的直接控制，而主要以价格和货币为调节手段的市场机制丝毫不起作用。

这就引出了压制型通货膨胀问题，但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下前面提到的货币“悬置”概念[11.2]。所谓货币“悬置”，是指经济中暂时闲置的潜在购买力有可能发展成为真实的购买意愿，然后形成有效需求。通常情况下也可以理解为货币所有者口袋里（或银行账户中）没有花掉的、不断积累下来的存量货币，在任何时候，这些货币都可能转化为市场产品需求。问题是经典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并不是享有自主支配权的货币所有者。从一方面看，企业如何花钱要受到各种各样的行政制约，而且企业的所有（或部分）存量货币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冻结。从另一方面看，企业实际上又拥有签发“空白支票”的权力。只要出于“正当”目的，企业可以随心所欲地花钱，因为它知道背后还有国家这个最后的“买单者”。从这个意义说，在企业领域有大量等待支出的“悬置”货币，随时可以转化为有效的购买意愿。因此，我们认为在经典社会主义的企业领域内存在着压制型通货膨胀。但必须加以强调的是，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压制型通货膨胀，在很多方面有别于典型的压制型通货膨胀，例如，资本主义经济在战时可能出现的压制型通货膨胀。主要的区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在战时仍然拥有大量具有很强利润动机的私人企业。当面临过度需求时，企业会极力抬高价格，而战时政府将努力把它们“顶回去”。这里“顶回去”应该是一个比较贴切的说法，因为面对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必须用力把它压住。紧张状况会不断加剧，因为人人都会感到目前正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状态，完全不同于体制的正常运行。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通货膨胀压力所造成的紧张会相对平稳得多，正如前文所述，国有企业对价格极不敏感，过度需求和价格的行政控制已经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 12.6 消费领域的压制型通货膨胀

消费领域是真正的货币化部门。购买者的预算约束是硬的，而且他们对价格极为敏感。这是理解消费领域压制型通货膨胀问题的出发点。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先假设企业领域和消费领域是相互独立的。企业不能购买为家庭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本章在后面部分再讨论取消这一假设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想事先说明的是,本部分所要论证的是事实。消费领域出现的压制型通货膨胀并不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本质特征或基本特征,实际上这一现象的出现和持续存在与社会主义体制是不相容的。在消费领域出现压制型通货膨胀并没有内在的体制根源,它在更大程度上是由经济政策造成的。

下面分两个层次来分析这个问题。第一,就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特征而言,消费领域的压制型通货膨胀与体制本身并不相容;其次,社会主义体制也有可能出现压制型通货膨胀。

**1. 11. 2** 部分所论述的强制调整均衡和 **11. 6** 部分所介绍的正常短缺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持。从需求方面来看,所有家庭都习惯了正常短缺状态,他们知道在一般情况下都要排队买东西,被迫购买替代品,必须跑很多商店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商品,他们要根据供给状况全面调整自己的需求,他们要被迫进行替代,但基本不存在强制性储蓄。[①] 家庭的储蓄倾向一般保持不变。从供给方面来看,生产和销售企业几乎不关心购买者的要求,也不会根据他们的需求进行调整。这样,就形成了消费领域的强制调整均衡。

中央经济管理部门对现行的消费品价格基本不进行调整[②],它不希望利用价格和工资政策来改变消费品严重短缺的状况,因为经济管理部门也和广大群众一样,把短缺视为生活的正常状态,虽然这实际上给公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没有花掉的钱不会在消费领域不断累积。市场上不存在能够随时转化为购买力的“悬置”货币,也没有任何来自家庭的真实过度需求。这样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不存在压制型通货膨胀了。

2. 如果出现了由于短缺引发的强制性储蓄(并非暂时发生,而是不断出现,甚至变成了一种连续状态),那么情况就会有所变化。换句话说,如果家

---

① 或者说最多是暂时性强制储蓄,因为当未来的供给能够满足推迟的想像需求时,这些储蓄就会被消化吸收。

② 请注意:在此没有考虑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的情况。在本部分结束的时候,我会再回到这个问题。

庭中没有用完的钱越来越多,而且不断累积,那么就将出现不同的结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原因:

a. 产品供给结构严重偏离购买者的想像需求,此时,消费者将不再进行全面的强制调整,有一部分钱就不会再花出去。

b. 经济管理部门允许名义收入的增加超过价格的上涨水平,这将加重短缺,从而导致强制性储蓄。

这种经济状况与第1点里所描述的情形完全不同,即出现了家庭的实际过度需求,而且不断累积,甚至累积的速度也将稳步提高,于是就会出现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压力。如果国家价格当局采取措施以对抗这种价格上涨压力,那么就形成了"常规"的压制型通货膨胀。

考虑到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权力结构、产权形式、协调机制,上述两种情况(即消费领域发生或不发生压制型通货膨胀)都有可能出现。事实上,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①]

从第2点b所描述的情况来看,可以说过度需求和压制型通货膨胀都是由于价格和工资政策造成的。但我们不能将过度需求的产生归罪于货币政策,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货币政策的主要特征是被动和放任(文中其他地方已有介绍),而在其他体制下很难发生这种情况。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决定着国家的价格和工资政策,金融当局不过是印出足够的货币执行这些政策而已。

这里我想转到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谈一下它们的作用以及平行市场(合法的自由市场、灰色市场和黑市场)所扮演的角色[11.2]。公众可能会将全部或部分花不出去的钱(由于在公有部门买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用于购买私人部门的产品。这可能会导致出现第2点a所描述的情况,即出现强制调整均衡;[②]但也有可能减轻第2点b中的通货膨胀压力,因为那里存

---

① 长期以来,苏联、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都表现出了强制性调整均衡的特征。J. Goldman(1975)研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但在其他一些国家,如1970年代的波兰和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苏联(在此之前,两国都开始了改革),都表现出了许多压制型通货膨胀的信号。

这里我们只能说"表现出了这种特征或信号"。由于价格指数的扭曲以及在衡量短缺方面存在各种问题,我们无法找到有力的实证证据来支持上述观点。

② 正如前文所述,D. M. Nuti(1986a)认为这是许多非均衡学派计量模型无法证明存在持续性剩余需求的主要原因。

在着压制型通货膨胀。

## 12.7 宏观层面的过度需求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整体经济的真实情况。官僚协调通过设立各种行政壁垒以及采取配额、专款专用等各种方式阻碍了单一市场的形成,整个经济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但尽管如此,各个经济部门结构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多自发的"漏出"和"虹吸抽出现象"。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管理部门有权在各个领域之间调配产品、资源和劳动力。

首先我们来考察宏观层面的需求构成。这里不打算进行全面分析,主要还是集中于与本章主题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领域。下面不仅列出了需求的主要构成成分,而且还根据不同部门的需求依赖程度(以及创造需求的部门自行干预相应产品及服务的力量大小)进行了分类,主要有五类:

1. 企业对投入品的需求(进行当前的生产)。相对于严格的产出计划要求,投入品配给数量不足,供给的不确定性,对纵向和横向短缺的预期,这些都导致企业不断囤积投入品,而且尽可能把未来生产所需要的投入品全部购齐。

2. 企业对投资品的需求;扩张冲动引发了投资饥渴。由于这一现象,强制性增长也成为导致短缺的因素之一[9]。一般来说,无法满足的投资饥渴对过度需求的影响最为强大。

3. 外贸部门对出口产品的需求。这一部门对出口换汇产品的需求特别强烈。尽管国外市场的需求有限,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产品最终能够以相当低的价格销售到国外(如利用价格补贴)。外贸部门的需求(强制性出口要求)也倾向于无限扩张。

4. 对权力有重要影响的国有预算部门(维持运行)对投入品的需求。"弱势"预算部门无法强行要求上级机关满足其需求,它们只能接受按规定分配到的有限的投入品(如医疗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但"强势"预算部门(如军队)一般都不会进行自我约束,在分配过程中,他们会全力为自己争取

到必要的产品和服务。①

5. 来自消费领域的需求。正如前一部分所指出的,消费领域既有可能出现真实的过度需求,也有可能因为形成了强制调整均衡而不会出现过度需求。

这五种需求(以及未能提到的其他经济部门的需求)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总需求并与总供给相互对应。就宏观总量而言,经典社会主义始终存在着过度需求。②

1—4 类中的各个部门对需要使用的产品、服务和资源永远没有满足的一天。它们的预算约束是软的,需求总是倾向于无限膨胀。对第 5 类中的消费领域而言,如果存在压制型通货膨胀,那么就有可能增加过度需求。即使 5 中不存在压制型通货膨胀[12.6],1—4 类所产生的过度需求也足以延伸至整个经济体中,甚至不需要这四类需求同时扩张。实际上,单单是由扩张冲动所引发的投资饥渴就可能形成整个经济的过度需求,而且它通常都会和 1—3 中的各个部门无限膨胀的需求相互结合。

在 **12.6** 部分一开始时,我们曾假设消费领域与经济中的其他部分是相互独立的,这一假设能够使最初的理论分析更为清晰。现在可以考虑放弃这个假设。实际上,1—4 中的各个部门都力图从消费领域"抽走"用于家庭消费的产品和服务,③只有极少数产品和服务具有某种物理特征使它们仅适合于家庭使用。如果产品和服务可以进行交易,那么就可以计算流出的数量。此外,除了家庭之外,国内还有大量购买各种消费品和服务的单位和组织。办公室可能会占用住宅,企业或机构可以雇车,餐饮和酒店行业要购买食品,办公室里也需要家具,等等。

从消费领域抽走的不仅仅包括成品,更重要的是,许多原本应供应给消

---

① C. Davis 通过研究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现象(1989,1990)。

② 对如何衡量宏观层面过度需求的程度一直存在争论。很难从统计上明确界定企业领域的需求。如何将过度需求的不同项目进行加总也还存在着不少经济方法和技术上的问题。很难说是否能够利用现有的统计资料计算出一个可以代表经济中全部需求的全局变量(或者说一个可接受的总量数值)。因此,不论是在以前的著作中,还是在本书中,我都避免用一个数字来代表宏观层面的总需求(或过度需求)。我更倾向于使用一种比喻的说法:需求的构成元素(结合在一起之后也就相当于总需求)都倾向于无限膨胀,远远超出了供给能力。

③ 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为"抽走"与英美国家经济中所使用的"挤出"一词有关。"挤出"是指在某一分配过程中(例如信贷分配),势力较强的集团通过抬高价格或借助于国家干预将弱小者挤出分配。

费品领域用于消费品生产的各种资源(原材料、半成品、劳动力、投资、用于购买进口产品的外汇)也可能会分配给其他经济部门。其中最关键的是,所有领域内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部门都会在资源分配计划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充分利用其政治优势来获得更多的资源[7.5,9.2]。

最终,消费领域的产品供给不仅要满足家庭需求(他们手中的钱受到硬预算约束和自己购买意愿的制约),还要满足各类企事业单位(它们的预算约束是软的,而且具有强烈的虹吸倾向)。

没有从家庭部门抽走全部供给的唯一原因就是经济管理部门采取行政手段制止了这一趋势。经济管理部门认为家庭必须获得一定比例的消费品供给。它们会禁止企业到公众商店里购买商品,也不允许把住宅用做办公室。在此之前,管理部门会按计划将投入品配额分配给生产消费品的工业部门。当然,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官僚协调的方式,采取直接控制手段完成的。

不管是哪种情况,面向消费市场的主要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充分意识到了宏观层面上存在着过度需求。即使这些企业发现不存在来自家庭部门的过度需求(例如,消费市场已经形成了强制调整均衡),它们也不会像处于买方市场条件下的企业那样行动。它们认为销售中所遇到的问题只是暂时现象,消费市场上迟早会出现更多的直接或间接购买者,即形成买方市场。如果整个经济出现了宏观层面上的过度需求,那么卖方市场就会占据支配地位,这些企业同时将向整个消费领域迅速蔓延,任何单个的买方市场都不可能长期存在。

宏观层面的过度需求也影响了劳动力的分配状况(第 10 章讨论的问题)。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较长时期内都处于一种对立分化的状态:在产品上是短缺压倒了剩余,而在劳动力问题上,情况正好相反。这种两分状态一直会持续到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纳为止。但强制性增长最终却会导致出现劳动力短缺占主导地位的情况,而且是劳动力的持续短缺。

最初的两分状态必然会消失并最终变成短缺综合症的一部分,生产的调整和技术的发展都极为僵化,而且不存在以价格和成本为基础的严格计算。即使如此,计划者和企业经理层仍然会感到劳动力和原材料投入之间的替代关系。他们感觉到总是存在某种投入品的短缺,一会儿是工人不够,一会儿又是原材料、机器或其他设备供给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

常常进行临时调整，在各种投入品之间进行强制替代。最后就会导致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已经没有任何长期剩余的生产要素可以用来缓解另一种生产要素严重的持续短缺。此时，短缺已经支配了整个经济领域。

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经讨论过，经济中的各个领域都仿佛是大海中一个个相互连接的岛屿，一旦周围的海域被某一种经济形态所支配，那么任何一个处于另外一种经济形态的孤岛都不可能继续生存和发展。如果整个经济都处于短缺经济状态，那么劳动力的分配也迟早会出现短缺。①

## 12.8　通货膨胀倾向：短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从第10、11和第12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能够引发并维持通货膨胀的各种因素。下面列出的是其中几个主要因素：(1)在宏观层面上，对产品和服务的过度需求长期存在；(2)生产者和销售者有提高价格的动机；(3)劳动力短缺造成了工资上涨的压力；(4)放任的货币政策会不断增加货币供给，直至引发过度需求。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经典社会主义经济具有了通货膨胀倾向。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这个观点想传达这样一个意思：社会主义体制(及其内在特征)具备了发生通货膨胀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通货膨胀一定会“爆发”；而且即使爆发，也很可能是较为温和的通货膨胀。在上面列出的四个因素中，其中几个并不能发挥很大影响。只有因素1(过度需求)的影响力会相当大。因素2(价格上涨压力)的影响力不是很大。由于预算软约束，利润对企业而言，并非事关生死。除了涨价之外，企业还可以利用其他许多方式来弥补所产生的损失。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的利益动机完全在别的方面。因素3(工资上涨压力)的影响力也不是很大。因为没有独立的工会组织或大规模的罢工，因此行政性的工资控制极为严格有效。最后是因素4，放任的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并不是刻意地人为增加货币供给以刺激经济活动，

---

① 相反的情况也同样适用这一规律。通常的观点认为，如果能够在劳动力的分配中维持其卖方市场地位，那么将有利于工人的利益，而如果在产品分配过程中引入买方市场，就会促进消费者的利益。实际上这种两分状态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因为始终存在着替代趋势(而且经济活动必然会利用这种趋势)。

因此,不能将它视为推动需求上升并引发通货膨胀的动力。[①] 货币扩张激励没有什么特别的刺激因素。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出现的持续短缺现象以及通货膨胀倾向都具有相同的根源,而且往往是由相同或相互关联的因素所导致的。这两种现象仅仅是相互伴随的关系,还是存在着权衡取舍的关系呢?经济研究文献中经常会提出这个问题。既然这个问题由两个部分组成,那么也就需要从两个层面来回答。

1. 我们假设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中已经发生了通货膨胀,但国家通过工资和价格政策将这一趋势部分或全部压制了下来。与此同时,出现了短缺现象。如果部分或全部解除了对通货膨胀的压制措施(通货膨胀将继续下去,也就是说,压制型通货膨胀部分或全部转变成为公开的通货膨胀),那么短缺的严重程度会有所降低吗?

我同意那些对这个问题给出否定答案的人。这一政策可能会暂时克服或减轻短缺问题,但过不了多久,短缺又会恢复到正常状态。

如何解释这一预测呢?我们可以沿着上一部分的论证思路继续往下分析。从企业部门来看,由于软预算约束以及对价格极不敏感,企业首先不会对价格变化做出反应。从家庭部门来看,由于硬预算约束以及对价格极为敏感,他们肯定会有反应:他们的需求和实际购买量会降低。在第一轮的价格上涨之后,家庭部门的总支出会下降。但如果体制中没有出现其他变化,**12.7** 部分的 1、2、3 和 4 中的各个部门会强力吸纳家庭部门没有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由于租金过高致使家庭无力入住的房屋成为办公室,因为企业或机构完全可以支付这笔高额租金。家庭没有购买的纺织品会被军队收购。家庭无力负担的汽油和燃气会被国有工厂或运输企业买走。

这里不仅仅是最初应由家庭购买的产品和服务卖不出去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直接行政控制对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家庭需求的下降使得计划部门可以将部门投入品转而分配到那些他们认为最关键的领域,这样就减少了对家庭的供给。

---

①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为了应对经济萎缩和经济衰退,货币当局在实施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常常会采取这种形式投放货币。

最后,被迫减少实际消费的家庭部门承担了价格上涨的后果,但短缺依然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短缺兼通货膨胀将继续存在下去。

2. 假设出现了显性通货膨胀,并且通货膨胀率已经稳定下来(例如,价格上涨率维持在每年5%左右)。除了有通货膨胀之外,短缺现象也始终存在。问题是:如果通货膨胀加速,例如从每年的5%上升到每年的10%,那么短缺的严重程度会随之降低吗?

在此,我还是同意那些给出否定答案的人。这里不需要再进行详细的论证,其基本逻辑与上面的解释大致相同。这里只提出一点。

让我们从宏观关系开始[12.7]。假设在通货膨胀加速之前,经济中已经存在过度需求。即使所有衡量指标(需求、供给、实际销售和购买量)都乘以1.1,下一年再乘以1.1,那么情况会有本质变化吗?! 关键是供给与需求的相互比例出现了变化,但单位衡量指针不会有任何变化(即一单位货币的购买力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最后可以做一个总结,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特征必然会导致短缺经济。至于通货膨胀,社会主义经济只是具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倾向,而是否会发生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公开及程度如何? 压制及程度如何? 公开宣布的通货膨胀有多高,多少被隐藏了起来?)主要取决所采取的经济政策。

## 12.9 短缺的自我诱发和自我繁殖

短缺会生产短缺。当然,这种交叉关系并不是导致短缺的主要原因,因为它首先是短缺的根源。但一旦存在短缺,意识到它的存在就会重新塑造经济参与者的行为。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自我实现的预期。前面章节中我已经多次提到这种现象,这里仅仅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在卖方市场上,买卖双方都意识到了可能出现短缺。这增强了卖方的自信,也就更加不关注买方;同时买方也产生了更多的自卑感和无力抵抗的情绪。一旦买卖双方都有了成熟的心理准备,那么卖方也就真的不会去争取购买者,而买方也会做出实际的强制调整安排。

对买方而言,未来的供给状况充满不确定性,而且预期将出现短缺,这

样买方就会进行囤积。这种囤积行为导致了过度需求。

在分配计划的讨价还价过程中,所有申请人都预料到会出现投入品的短缺。因此,他们会尽量夸大自己对投入品的需要,这使得纵向短缺变得更为严重。

人们还会预期在更远的未来同样存在短缺。投资者感到将来不会有销售问题,这使得他们在争取投资资源的过程中不会进行自我约束。其结果便是投资饥渴几乎成为导致过度需求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上述循环过程(以及其他类似行为)导致了短缺的自我诱发。

许多领域的信息和管制机制都起到了维持正常短缺状态的作用。经典社会主义的相对价格变动无法发挥市场协调下传递信息的作用,因为只有在市场条件下,价格运动才能够反映相对稀缺状况,并以此来提醒分散化的决策者是否出现了短缺或剩余。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短缺和剩余信号以一种相当粗糙的方式部分取代了这种价格信号机制[8.9]。

让我们以匈牙利汽车市场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①] 匈牙利本国并不生产汽车。一家垄断性的汽车供货商负责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口汽车,然后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人们已经习惯了要等上二三年才能买到。如果等候买车的队伍过长,那么当局就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涨价)将队伍恢复到正常长度。反方向偏离正常状态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即如果等候买车的人相对教少,短缺状况有所缓解,那么当局就会控制进口,排队的人数很快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从企业及其上级主管机关的角度来看,这些干预措施都是必要的。排队的人太多,容易造成不满;排队的人太少,又会破坏销售商的优势地位,让购买者变得挑剔起来。此外,队伍"太短"也是一个信号,这意味着,可以将这一领域的部分资源(例如进口配额)转给短缺情况更为严重的其他领域。

上述论证思路具有普遍性。计划部门十分关注短缺和剩余信号。它们会相对扩大对供给太少引发抱怨激增的领域的投入,而对于那些等候时间

① Z. Kapitany、J. Kornai 和 J. Szabo(1984)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介绍过匈牙利汽车市场的情况,之后 Z. Kapitany(1989a)继续研究了该市场的控制机制。这些文章对匈牙利汽车市场进行了详细细致的分析,本书在这里只是以高度简化的方式介绍了它的典型特征,目的仅仅是为了有助于对一般观点的理解。

很长、被迫进行更多替代、但仍属正常状态的领域不管不问。当然,为了扩大对某些领域的供给,计划部门必然要从其他领域转移产品和资源,但实际上很难从所谓的剩余领域转移多少产品和资源(因为短缺普遍存在)。这样,它们只好再去"抢夺"那些已经处于短缺状态的领域的资源,只是程度有所降低而已。[①]

同样,我们也可以想像对整个消费市场的控制。这里有必要回到家庭消费的宏观计划问题[7.2,9.3,12.7]。经济管理部门对消费价格水平、人口的名义收入以及消费供给量都做出了详细的计划。通常情况下,经济管理部门甚至可以预测出公众能够存下多少钱,换句话说,它们可以大致知道总开支是多少。简而言之,负责经济事务的人可以有计划地制定宏观措施,而且确信这些措施能够得到切实执行。

手上有了这些工具,经济管理部门往往可以通过一项重大决定来大幅度降低消费领域出现短缺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此时,它们只需要大规模提高流向消费品生产领域的资源供给,就可以缓解消费品市场的短缺状态。[②]但通常当局都不这么做,它们会立刻从其他领域抽走产品和服务,这样就很可能导致经济中其他领域(如生产、投资活动和外贸)出现短缺和紧张。公众和经济领导人都已经习惯了消费领域的正常短缺。在制定宏观计划的过程中(至少是政治和经济状况相当稳定的时候),他们特别关注要确保消费领域不能出现严重短缺。[③] 但经济管理部门很少会采取措施让供给比需求增加得更快,从而大大缓解消费领域的短缺状况。

实际上,社会主义体制陷入了短缺经济陷阱。一旦处于短缺,短缺会不断复制自身,更为重要的是,这会成为一种习惯性力量并具有相当大的惰性,很难一时改变。

---

① 这种分配机制的理论模型可参见我和 B. Martos 编辑的研究文集,文集的名称就传达出了主题:非价格控制(1981)。其中有几个模型介绍了控制反馈机制,即出现偏离正常存货和正常定单水平的时候,如何促使它恢复到正常的经济状态。以模型为基础,我们通常能够证明这种机制是有生命力的,也就是说,它能够协调投入—产出过程,尽管未必可以确保实现最优配置。更多的参考文献介绍,可参见第 8 章第 148 页注释①。

② 按照前一部分的论证,短缺的缓解仅仅是暂时的。此处忽略了这一点。

③ J. P. Burkett、R. Portes 和 D. Winter 的计量经济研究表明,如果消费市场上出现过度需求,经济管理者就会减少出口并增加消费品进口。

## 12.10　体制本身的原因

因果关系的分析至此已基本结束,我们不会再增加其他的原因。下面的一系列观点是想解释“深层次”的原因:哪些是表面的和随机的,哪些是植根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本质特征。主要分为四类,当然这种分类并不是非常全面,也不可能普遍适用。其中有些看法(关于短缺问题)是来自其他领域,如公众的态度、政治争论和官方声明,而不是来自学术研究。

1. *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犯了错误*。这是官方宣传和媒体最常用的解释,受其影响的公众多半也持有这种看法(尽管学术界并不这么看)。无法获得这些或那些产品是因为商业部门没有及时订货,工厂管理者没能保证生产,经济管理部门计划有错误,以及外贸公司拖延安排进口,等等。

可以说上述每个理由从自己的狭窄领域来看都是有道理的。任何经济体制中的参与者——个人,在工作中都难免出错,但科学解释的目的就是,要发现为什么某种错误会在特定情况下更普遍(相对于其他环境而言),为什么总是会出现一些非常明显的方向性错误?

所有系统,不论是社会组织体系,还是物理体系,总会存在摩擦[11.4]。如果各个零件之间不能很好的配合,那么机器在运转中就会发出咯咯的响声。不管是官僚投资控制,还是资本市场,它们在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都会有摩擦,但摩擦具有明显的体制特征。科学的解释必须告诉人们,为什么某种摩擦现象会出现在某个特定体制之中?这种摩擦与另外一种体制所出现的摩擦为什么会有所不同?

2. *经济落后*。人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解释,短缺经济是贫穷落后国家的一种普遍现象。[①] 这种广为流传的观点混淆了概念上完全不同的两种现象。一个是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之相伴便是低水平的生产和消费。另外一个是短缺,无法满足购买者的需求。就人均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而言,东德曾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它仍然是短缺经济。东德的公民

---

① 我反对这种用贫穷和落后来直接解释短缺综合症的观点。本部分的论述清楚阐明我的观点:体制原因是造成短缺的主要原因。当然,我承认社会主义的诞生及其基本特征的形成与这些国家的落后和贫穷有一定的关系。我在前面章节中就论述过这种关系。[2.2,8.1]。

无法用钱买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与此同时,还有许多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它们都不是短缺经济。购买者的需求或大或小,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水平,但不是供给因素导致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①

3. 错误的经济政策。将短缺归罪于一系列错误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政策。这一观点被很多人所接受,特别是经典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集团以及那些最先倡导改革的先驱者。其中包括几类不同的观点:

a. 生产计划或更多是投资计划过于严格。这没有错,但要求严格执行计划的倾向是内在于体制之中的。

b. 错误的工资政策。这种批评通常是这样论证的:经济管理部门始终不能严格控制工资;相对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工资上涨的速度过快。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它强调了这样的工资政策导致了消费市场的过度需求和压制型通货膨胀[12.6]。但这只是引发部分领域出现短缺—通货膨胀综合症的因素之一,而许多其他因素往往与经济政策的选择无关[12.7-8]。

c. 错误的价格政策:某些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制定得过低。本章 **12.4** 部分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且从整章的论述来看,价格政策只能解释部分问题。

4. 体制原因。通过本章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体制因素是这些具有多重因果关系的现象背后最重要的原因,体制因素本身足以导致短缺综合症的出现。

本章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析了这个问题。但必须注意,宏观分析仅仅是从国家层面以总量形式描述特定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一个分析工具。② 没有所谓单独的“宏观解释”,因为借助于总量指标所描述的宏观过程

---

① 这里主要是想澄清概念,而不是进行价值判断。我们的论证并不是去讨论贫穷或落后在政治上是否正确或者是否符合道德要求。

还需要加以补充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无法分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在某些情况下所遇到的严重供给约束问题。

② 这里请注意一个经常会出现的术语上的混淆:许多人将“宏观变量”等同于中央政府手中的工具性变量。例如,价格。中央政府可以制定单个的行政价格,也能够影响价格水平的发展,但它无法决定价格指数,所有(国家制定或自发的)价格的平均变化,后者是一个宏观变量,但它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性变化。

政府也是经济中的一个参与者。宏观变量包含了所有参与者的行动特征,其中有政府、官僚机构、企业、非企业机构和家庭。

同样也可以用经济参与者的行为来进行解释。[1]

宏观层面上各种形式的过度需求在引发持续性短缺和通货膨胀倾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5,12.7]。但各种导致需求无限膨胀的趋势都可以归结到社会主义经济参与者(官僚机构及其内部下属的国有企业)的动机和行为,而不是由国家经济政策所导致。同样,从微观层面上看,生产者和销售者对待购买者的态度也是一种行为特征。在前面章节中,我们已经阐述了这些动机和行为与社会主义体制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权力结构、官方意识形态、官僚化的公有制部门以及官僚协调相对于其他协调形式的支配性地位。

在讨论短缺综合症时,没有必要再回到第3—6章中所包含的整体因果链条关系。这里仅仅是简单回顾一下最深层的体制因素是如何通过某些"中间层次"导致短缺综合症的。例如,企业经理的利益动机是获得上级领导的认可。其他的中间层次还包括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这三种现象,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是导致短缺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而这三种现象又同样是结果,它们本身就根源于体制更深层次的特征:权力结构、意识形态、所有权和协调机制[15.1]。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体制比较[11.5-6]。表12.2列出了主要内容,之后作了相应的解释,这样更有助于读者了解文献中所使用的术语。

表中对资本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进行了比较。每一行都采用了两分法,即相互对立的特征。需要事先说明的是,这种体制具有较高程度的抽象性,因此,还要做一系列的界定并对各列内容的例外情况、非典型时期和特定部门加以说明。在第1列中,有人可能就会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在战时是卖方市场,在商业周期谷底时期也会出现大规模的劳动力短缺,或者社会化的医疗部门也有短缺现象。同样,针对第2列的内容,有人会说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就属于买方市场。下面我们不再重复列举这些例外情况,而是重点讨论典型情况所形成的鲜明对比。

---

① 在有关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与它的微观基础的争论中,这一观点正是其焦点所在,见G. C. Harcourt等(1977)、R. E. Lucas和T. J. Sargent(1981)以及E. S. Phelps等(1970)。

表 12.2 短缺综合症:体制比较

| 比较的标准 | 资本主义 | 经典社会主义 |
|---|---|---|
| 1. 市场体系 | 买方市场 | 卖方市场 |
| 2. 偏离市场均衡后的主要特征 | 剩余 | 短缺 |
| 3. 劳动力配置状况 | 劳动力剩余 | 劳动力短缺 |
| 4. 有效约束 | 需求—制约体制 | 资源—制约体制(行政配额、供给约束、投入品约束) |

第 1 行无须再做解释,表 11.1 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买方市场是资本主义典型的市场体系;而卖方市场是经典社会主义的典型体系。

从第 2 行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体制是“剩余经济”,而经典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短缺经济。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左右,苏联的经济学界就有过这种比较,克利茨曼(Kritsman)在 1925 年的文章中写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会出现总体剩余,而无产阶级自然经济会有总体短缺。”诺沃季洛夫(Novozhilov)在 1926 年比较了“总体过度生产”和“总体短缺”的现象。[①]

还需要说明的是,第 2 行中的剩余和短缺是指偏离瓦尔拉斯市场均衡后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任何一种体制下,短缺和剩余都是同时并存[11.1,11.6],问题在于哪一种状态处于支配地位。

第 4 行揭示了哪些因素对生产和销售活动产生了有效的制约。[②] 在一般情况下,资本主义体制在产出方面受到需求的制约,因此,可以称之为需求决定的体制。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通常在投入品方面受到制约,其中包括以下几种形式:直接官僚控制造成的分配制约,获得投入品方面的供给制约或瓶颈因素造成的物资制约和生产中投入品短缺制约。如果把所有上述投

① 见 L. N. 克利茨曼(1926)和诺沃季洛夫(1926)。T. Bauer 和 L. Szamuely 提醒我注意到了这些著作。

在 1920 年代,苏联有很多经济学家致力于短缺的理论分析,但大部分研究在斯大林恐怖统治时期都被忘记了。M. P. 阿法纳西耶夫(1990)后来对那次争论进行了综述。

② M. Kalecki 在区分供给决定的体制和需求决定的体制时,提醒我注意到了这一点(1971,1972)。相关观点可参见 R. J. Barro 和 H. I. Grossman(1971,1974)以及 J. Goldmann 和 K. Kouba(1969)的研究。

入品方面的制约综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将之统称为：经典社会主义是一种资源制约的体制。

## 12.11　经济效率与技术进步

在讨论完短缺现象及其成因之后，我们来看一看短缺对生产和消费所造成的后果。当然，这些后果与前面章节所提到的其他现象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因此需要进行更全面的分析。本部分将从国家层面讨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效率和技术发展问题，而消费者的福利问题会留到下一章进行分析。

尽管经典社会主义曾郑重承诺要实现高效率，但它未能实现这一诺言。在生产方面，出现了一个极为奇特的矛盾现象。从一方面来看，计划非常严格，负责生产的部门常常会抱怨，仅凭那些分配到的投入品，他们根本不可能完成规定的产出任务，物资、零部件和劳动力都短缺。表面看来，仿佛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所有的国际比较研究都证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资源利用和投入—产出比例都远远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①]请参见表 12.3、12.4 和 12.5。[②] 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也低于其他经济体制[表 9.7]。此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浪费现象。

**表 12.3　东德与西德的生产率（1983 年）**

| | 采矿和能源生产 | | |
|---|---|---|---|
| | 东德 | 西德 | 东德/西德（百分比） |
| 人均褐煤产量（吨） | 2,699 | 5,905 | 0.46 |
| 人均天然气产量（千升） | 904 | 2,251 | 0.40 |
| 人均电产量（火电，千瓦） | 3,186 | 7,065 | 0.45 |

① 有大量关于效率和生产率体制比较的研究文献，特别要提到 A. Bergson（1978a）和 G. Ofer（1988）的著作。

② 在表 12.3、12.4 和 12.5 中投入品（包括表 12.3 中的产出）都是用物理单位来衡量的，这样就可以减少比较过程中在计量单位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难。

表 12.4 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在同样产出条件下比资本主义经济耗费了更多的能源。J. R. Moreney（1990）所做的计量分析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表 12.4　能源与钢铁消耗:国际比较**

| 国家 | 每千美元产出所消耗的能源（相当于1公斤煤,1979年） | 每千美元产出所消耗的钢铁（1公斤钢铁,1980年） |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 东德 | 1,356 | 88 |
| 波兰 | 1,515 | 135 |
| **6个经互会国家** | 1.362 | 111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 法国 | 502 | 42 |
| 意大利 | 655 | 79 |
| 英国 | 820 | 38 |
| 西德 | 565 | 52 |

**资料来源**:J. Winiecki(1986,第327页)。

注释:美元:以1979年美元计值;产出:GDP;6个经互会国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波兰和苏联。

**表 12.5　物资消耗:国际比较**

| 国家 | 1975年前后每单位总增加值的中间投入 | | | |
|---|---|---|---|---|
| | 经济 | 工业和农业 | 工业 | 制造业 |
| **经互会国家** | | | | |
| 捷克斯洛伐克 | 1.43 | 1.65 | 1.67 | 1.73 |
| 匈牙利 | 1.41 | 1.77 | 1.91 | 2.10 |
| 波兰 | 1.56 | 1.82 | 1.88 | 2.03 |
| 南斯拉夫 | 1.15 | 1.65 | 2.05 | 2.37 |
| **经互会国家平均** | 1.47 | 1.75 | 1.82 | 1.95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 |
| 加拿大 | 1.07 | 1.21 | 1.32 | 1.70 |
| 丹麦 | 0.96 | 1.10 | 1.13 | 1.14 |
| 法国 | 0.73 | 0.93 | 0.95 | 0.98 |
| 西德 | 1.12 | 1.45 | 1.46 | 1.51 |
| 意大利 | 0.93 | 1.24 | 1.40 | 1.40 |
| 日本 | 1.12 | 1.60 | 1.77 | 1.85 |
| 荷兰 | 1.23 | 1.68 | 1.79 | 1.83 |

| 国家 | 1975年前后每单位总增加值的中间投入 | | | |
|---|---|---|---|---|
| | 经济 | 工业和农业 | 工业 | 制造业 |
| 挪威 | 1.15 | 1.44 | 1.54 | 1.80 |
| 葡萄牙 | 0.88 | 1.17 | 1.50 | 1.59 |
| 西班牙 | 1.02 | 1.40 | 1.56 | 1.69 |
| 瑞典 | 0.98 | 1.20 | 1.28 | 1.37 |
| 英国 | 1.16 | 1.59 | 1.59 | 1.74 |
| **资本主义国家平均** | 1.03 | 1.33 | 1.44 | 1.55 |
| 经互会平均/经合组织 | 1.43 | 1.31 | 1.26 | 1.26 |

**资料来源**:S. Gomulka J. Rostowski(1988,第481页)。

注释:经济:物资领域。

**表12.6 钢铁制造中的连续浇铸:国际比较**

| 国家 | 总产量中的连续浇铸(百分比) | | |
|---|---|---|---|
| | 1970年 | 1980年 | 1987年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
| 保加利亚 | 0 | 0 | 10 |
| 捷克斯洛伐克 | 0 | 2 | 8 |
| 东德 | 0 | 14 | 38 |
| 匈牙利 | 0 | 36 | 56 |
| 波兰 | 0 | 4 | 11 |
| 罗马尼亚 | 0 | 18 | 32 |
| 苏联 | 4 | 11 | 16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
| 法国 | 1 | 41 | 93 |
| 意大利 | 4 | 50 | 90 |
| 日本 | 6 | 59 | 93 |
| 西班牙 | 12 | 49 | 67 |
| 英国 | 2 | 27 | 65 |
| 美国 | 4 | 20 | 58 |
| 西德 | 8 | 46 | 88 |

**资料来源**:财务与统计,莫斯科(1986 a,第109页)。

注释:罗马尼亚(32):1986年。

在经典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技术创新的复制，即使是这种模仿型技术进步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① 表12.6列出了最新冶炼过程传播的国际比较情况。

技术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发现和创新性新产品在工业中的应用，这将极大地改变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消费习惯。产品创新的例子包括计算机、复印机、合成纤维和彩电等等。表12.7列出了改变了20世纪面貌的一系列革命性创新产品。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首先创造出大部分这类产品，那么倒可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除了一两个例外情况，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没有任何贡献，②这是社会主义业绩评估中最为不利的负面科目。

很难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低效率和如此缓慢的技术进步给出一个简单的解释，这是一个多层因果关系现象，本书在其他章节中已经进行了各种因素的分析。这里我简单总结一下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社会主义体制的奖惩机制几乎产生不了任何激励。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引入创新（产品、技术和管理等）的企业所有人和经理层完全有可能获得丰厚的收入。同样，如果效率低下、技术落后则可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业绩表现不佳甚至会导致致命的失败。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激励机制，不过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以及价格的市场出清。

然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高效率和技术发展并不能带来任何优势，而业绩不佳也不会导致企业经营失败。预算软约束可以自动为任何缺点或浪费提供借口。

---

①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大量文献，可参见：R. Amann、J. M. Cooper 和 R. W. Davies (1977)等人的综述性著作，R. Amann 和 J. M. Cooper 等(1982,1986)、J. S. Berliner(1976)、S. Gomulka(1986)、P. Hanson(1981)、P. Hanson 和 K. Pavitt(1987)、K. Z. Poznanski(1987,1988)以及 A. C. Sutton(1968,1971,1973)。

钱颖一和许成钢(1991)利用数学模型分析了创新与软预算约束之间的关系。

② 表12.7仅包括了民用生产中的创新。至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在军事技术研究和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里没有进行考察。

专家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对军事技术做出了独立贡献，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模仿性的技术更新（例如，通过间谍活动获取技术发明）始终存在争论。

表 12.7　主要的技术进步第一次在哪些国家出现:国际视角

| 产品或服务 | 国家 | 年代 |
|---|---|---|
| **1. 信息,通讯** | | |
| 部件 | | |
| 晶体管 | 美国 | 1947 |
| 集成电路 | 美国 | 1958 |
| 大规模集成电路 | 美国 | 1968 |
| 微处理器 | 美国 | 1971 |
| 光纤技术 | 美国 | 1973 |
| 记忆,存储 | | |
| MOS ROM | 美国 | 1967 - 1968 |
| 软盘 | 美国 | 1970 |
| 编序语言 | | |
| FORTRAN | 美国 | 1954 |
| PROLOG | 法国 | 1975 - 1979 |
| 计算机 | | |
| 电子数字集成器和计算机(第一代) | 美国 | 1945 |
| 晶体管计算机(第二代) | 美国 | 1951 |
| 集成电路计算机(第三代) | 美国 | 1960 - 1970 |
| 个人计算机 | 美国 | 1975 - 1981 |
| 软件 | | |
| 文本编辑 | 美国 | 1964 |
| 计算机网络 | 美国 | 1981 |
| 商业,银行业 | | |
| 信用卡 | 美国 | 1950 |
| 卫星技术 | | |
| 卫星 | 苏联 | 1957 |
| 通信卫星 | 美国 | 1960 |
| 气象卫星 | 美国 | 1960 |
| 同步卫星 | 苏联 | 1976 |
| 电视技术 | | |
| 电视显像管 | 美国 | 1945 |
| 彩电 | 美国 | 1953 |
| 录像技术 | | |
| 黑白录像机 | 美国 | 1951 |
| 影碟 | 西德 | 1970 |
| 激光影碟 | 日本 | 1983 |
| | 荷兰 | 1983 |

| 产品或服务 | 国家 | 年代 |
| --- | --- | --- |
| 电子消费品 | | |
| 石英表 | 日本 | 1967 |
| **2. 能源(核能)** | | |
| 裂变(核)反应堆(用于发电) | 美国 | 1951 |
| **3. 原材料和产品** | | |
| 环氧树脂 | 美国 | 1947 |
| 不粘性厨房用具 | 法国 | 1958 |
| **4. 机械和技术** | | |
| 钢铁和工程技术 | | |
| CNC 金属加工技术 | 美国 | 1965 – 1969 |
| 可控机器人 | 美国 | 1956 |
| 装配机器人 | 美国 | 1980 |
| 农业 | | |
| 塑料薄膜 | 日本,法国 | 1954 |
| | 苏联,意大利 | 1954 |
| | 罗马尼亚 | 1954 |
| 绿色革命杂交水稻 | 墨西哥 | 二战 |
| 深冻技术 | 美国 | 1950 |
| 印刷 | | |
| 激光投射计算机排版 | 西德 | 1965 |
| 陆地一次成像照相机 | 美国 | 1959 |
| 静电印刷技术 | 美国 | 1952 |
| 激光技术 | 美国,苏联 | 1960 |
| 激光印刷技术 | 美国 | 1979 |
| **5. 航空** | | |
| 超音速飞机 | 美国 | 1947 |
| 民用喷气式飞机 | 英国 | 1949 |
| **6. 医药** | | |
| 盘尼西林 | 美国 | 1945 |
| 胰岛素(生物制剂) | 美国 | 1982 |
| 萨宾疫苗 | 美国 | 1955 |
| 口服避孕药 | 美国 | 1957 |
| 超音检测器 | 英国 | 1955 |
| 激光医疗技术应用 | 美国 | 1964 |
| CAT | 英国 | 1971 |
| | 美国 | 1974 |
| 核磁共振 | 美国 | 1981 |

**资料来源**:由 P. Gerencser 和 A. Veszi 为本书编辑整理。

资本主义为企业家引入新技术、新的组织形式或新产品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他们可以通过现存的组织开展创新活动。如果他们拒绝创新,那么就会有自由进入者创建新的企业,而且新企业完全可以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表12.7中列出的大部分新产品都是这样产生的。熊彼特所描述的社会经济机制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动力所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①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没有新的自由进入者或靠私人利益驱动的企业,任何创新活动都要经过官方的批准及其支持。事实上,官僚协调不仅阻碍了创新,而且损害了日常的生产效率。直接官僚控制非常僵化,它无法形成供需之间的有效协调,也不可能采取成千上百万种措施来实现资源的高效组合。

普遍存在的严重的持续性短缺使一切变得更加糟糕,短缺不断造成生产的中断。由于部分投入品和其他产品不能按时到位(或很快被全部耗尽),企业被迫匆忙调整,强制替代,致使成本增加或严重损害质量,这都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囤积倾向和工厂内部的隐性失业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卖方市场彻底消灭了竞争激励。对企业而言,它根本没有必要为了赢得顾客而去降低价格,提高质量或引入新产品,因为在任何时候销售都是有保证的。②

总而言之,低效率、技术落后、保守和缺乏创新精神都是一系列体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① P. Murrell在相关分析中特别强调了这一思想,他指出缺乏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不仅是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最致命的缺陷,而且也是改革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要害所在。

② 资本主义国家的汽车行业总是不断努力去更新产品。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德的Wartberg和Trabant牌轿车以及苏联的"莫斯科人"小轿车在20多年时间里车型没有任何变化。试想一下,在这两个国家里,人们为买这种老爷车都要等上5年、10年,甚至15年,那么东德或苏联的汽车工厂为什么要劳神费心地进行既费钱又有风险的产品创新呢?

# 第十三章 消费与分配

本章将探讨处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公民是如何生活的。第一部分描述了福利、消费和经济保障的一般特征；第二部分考察了福利、消费和经济保障在社会不同群体中的分配状况。

## 13.1 消费的增长

从更长期的平均水平来看，人均真实消费确实具有很强的增长趋势。但如果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那么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消费增长就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了。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起点不一致，所以很难就一般意义上的消费增长进行比较。因此，我们只是尝试将同一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人生活实际平均消费增长率进行比较。

表13.1中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数字很可能被故意夸大了，[①]但就是从这些数据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几十年来，尽管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消费水平与发展最快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没有缩小，但确实一直在增长。

---

① 扭曲产出衡量的因素[→9.7]同样也扭曲了这里所列出的数字。此外，由于消费数据在宣传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更有理由怀疑这些数字都是经过“处理”的。G. E. Schroeder(1990a,1990b)研究了苏联官方消费时间序列数据的扭曲情况并提供了另外一个替代的估算结果。在1981－1985年戈尔巴乔夫最后执政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项估算认为，苏联的实际消费的年度平均增长率为0.7%，换句话说，也就是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见G. E. Schroeder(1990b，表1)。

表 13.1 消费增长:国际比较(1951-1978 年)

| 国家 | 人均真实消费年平均增长率 |
| --- | ---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捷克斯洛伐克 | 1.6 |
| 匈牙利 | 2.6 |
| 波兰 | 2.9 |
| 苏联 | 3.7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法国 | 3.9 |
| 意大利 | 3.8 |
| 日本 | 6.5 |
| 英国 | 2.1 |
| 美国 | 2.3 |

**资料来源**:G. E. Schroeder(1983,第 315 页)。

注释:表中数据是指私人消费开支的增长;意大利:1952-1978 年;日本:1953-1978 年。

表 13.2 电话密集度:国际比较(1986)年

| 国家 | 每 100 个居民所拥有的主线数 |
| --- | ---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保加利亚 | 15.1 |
| 捷克斯洛伐克 | 12.5 |
| 东德 | 9.8 |
| 匈牙利 | 7.2 |
| 波兰 | 7.0 |
| 罗马尼亚 | 6.7 |
| 苏联 | 9.0 |
| 南斯拉夫 | 11.6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塞浦路斯 | 24.7 |
| 希腊 | 33.0 |
| 爱尔兰 | 21.2 |
| 葡萄牙 | 14.8 |
| 西班牙 | 25.2 |
| 土耳其 | 5.3 |

**资料来源**:由 P. Mihalyi 根据国际通讯联盟(1988,第 401-405 页)数据为本书编辑整理。

注释:保加利亚:1983 年;罗马尼亚:1979 年;苏联:1982 年。

**表 13.3　轿车拥有状况:国际比较**

| 国家 | 每千个居民所拥有的轿车数 | |
|---|---|---|
| | 1980 年 | 1987 年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 保加利亚 | 56 | 127 |
| 捷克斯洛伐克 | 127 | 174 |
| 东德 | 151 | 209 |
| 匈牙利 | 86 | 157 |
| 波兰 | 64 | 111 |
| 罗马尼亚 | 11 | 12 |
| 苏联 | 26 | 44 |
| 南斯拉夫 | 108 | 129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 奥地利 | 298 | 355 |
| 丹麦 | 271 | 309 |
| 意大利 | 302 | 392 |
| 日本 | 202 | 241 |
| 挪威 | 302 | 387 |
| 荷兰 | 322 | 349 |
| 瑞士 | 355 | 418 |
| 西班牙 | 201 | 251 |
| 西德 | 388 | 462 |

**资料来源**:Z. Kapitany 和 L. Kallay(1980,第 165 页);(1991,第 90 页),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统计略有不同。

注释:意大利(1987):1986 年。

表 13.2 和表 13.3 提供了生活水平的国际比较状况。从表中不难看出,

苏联和东欧国家家庭电话和私人轿车的数量远远少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

东德与西德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两国的起点几乎完全一致。[①] 表 13.4 中列出的指标比较了两种不同经济体制下（东德和西德）的公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所有这些比较研究都充分表明，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其主要原因就是东德在 1989 年之前一直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

**表 13.4　东德与西德的消费水平比较（1970 年）**

| | 东德与西德居民消费量比例（百分比） |
|---|---|
| **每 100 个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 | |
| 电视 | 93 |
| 彩电（1973） | 7 |
| 冰箱 | 66 |
| 冰柜 | 14 |
| 洗衣机 | 89 |
| 自动洗碗机（1973） | 3 |
| **人均食品和饮料消费** | |
| 肉 | 86 |
| 牛奶 | 105 |
| 奶酪 | 46 |
| 土豆 | 149 |
| 蔬菜 | 134 |
| 水果 | 44 |
| 茶 | 59 |
| 咖啡 | 51 |
| 酒、香槟 | 29 |
| 啤酒 | 68 |

**资料来源**：1970 年的耐用消费品：东德柏林统计资料（1971，第 345）；西德斯图加特统计资料（1970，第 467）。其他数据：Buddesministerium fu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1987，表 4.3－1 和表 4.3－2）。

---

① 当然在初始阶段也存在细微的不同，但这根本无法解释后来两国所出现的巨大差异，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体制不同。

表 13.5　购买某些消费品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国际比较(1988 年)

| 项目 | 单位 | 购买 1 单位元消费品所需要的工作时间(西德 = 1) | | | | | |
|---|---|---|---|---|---|---|---|
| | | 保加利亚 | 捷克斯洛伐克 | 东德 | 匈牙利 | 波兰 | 苏联 |
| **食品** | | | | | | | |
| 猪肉 | 公斤 | 4.1 | 3.4 | 1.3 | 2.4 | 2.0 | 2.7 |
| 牛肉 | 公斤 | 5.9 | 3.7 | 1.0 | 2.6 | 1.7 | 3.0 |
| 鸡肉 | 公斤 | 5.4 | 4.7 | 2.8 | 3.5 | 2.8 | 5.5 |
| 鸡蛋 | 个 | 5.5 | 3.8 | 2.4 | 2.6 | 6.6 | 4.2 |
| 牛奶 | 升 | 2.7 | 2.0 | 0.5 | 1.8 | 0.7 | 2.9 |
| 黄油 | 公斤 | 6.0 | 3.6 | 1.9 | 2.5 | 3.5 | 4.0 |
| 面包(白) | 公斤 | 0.9 | 0.5 | 0.4 | 0.5 | 0.5 | 0.8 |
| 糖 | 公斤 | 7.1 | 3.3 | 1.4 | 3.2 | 3.6 | 4.5 |
| 土豆 | 公斤 | 3.7 | 1.1 | 0.3 | 3.2 | — | 1.6 |
| 苹果 | 公斤 | 1.6 | 1.6 | 1.2 | 1.4 | — | 7.1 |
| 酒 | 升 | 2.9 | 5.8 | 0.5 | 2.8 | 10.6 | 13.4 |
| 啤酒 | 升 | 3.8 | 2.0 | 1.3 | 2.7 | 7.0 | 2.7 |
| 咖啡 | 公斤 | 18.2 | 10.4 | 6.8 | 7.2 | 17.8 | 11.3 |
| 茶 | 公斤 | — | 3.2 | 1.0 | 0.7 | 0.6 | 1.4 |
| 香烟 | 盒 | 1.7 | 1.0 | 1.7 | 0.7 | 0.6 | 1.4 |
| **非食品消费** | | | | | | | |
| 男式服装(冬) | 件 | 2.2 | 5.4 | 2.0 | 2.5 | 3.7 | 3.1 |
| 男鞋(皮) | 双 | 1.2 | 1.2 | 1.2 | 1.8 | 2.0 | 1.7 |
| 摩托车 | 辆 | 4.0 | 2.5 | 2.4 | 2.3 | 9.2 | 3.6 |
| 彩电 | 台 | 5.3 | 6.6 | 5.6 | 4.0 | 13.4 | 4.6 |
| 洗衣粉 | 公斤 | 1.5 | — | 2.6 | 4.1 | 5.1 | 4.2 |
| 汽油 | 升 | 8.1 | 7.0 | 2.6 | 5.7 | 5.0 | 4.0 |

**资料来源:**联合国(1990a,第 121 页)。

表13.5非常清楚地反映出了两种体制的相对水平。对某件消费品而言,西德的公民只需要工作一小时就可以购买或消费,而一个东欧国家的公民却必须工作更多的时间——5倍,有的甚至是10倍的工作时间。唯一的例外就是面包、茶和香烟。

上述表格清楚地表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个人消费水平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体制的个人消费水平,消费增长远远落后于生产增长。这主要根源于强制增长战略,因为在强制增长战略指导下,投资始终优先于消费。全国人民被迫(在未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牺牲当前的部分潜在消费来支持投资,以实现产出的增长。当然,投资效率低下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完全可以在更少牺牲消费的情况下取得更快的增长速度。

## 13.2　物质福利中的其他要素

通常衡量物质福利的指标是人均实际消费,也就是对人均消费的各种产品,但这一指针并不能全面反映个人物质福利中的所有要素。

当消费者根据供给状况被迫调整自己最初的购买意愿进行强制替代或放弃部分购买意愿的时候,他/她的福利状况已经受到了负面影响(被降低了)。当购买者知道他/她根本买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时,那种最终能够获得某种商品的满足感大大降低。[①] 同理,当消费者必须要排队,并且在不断寻找或者耽搁很长时间之后才能获得某项产品和服务时,他/她的消费快感也会大打折扣。

短缺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有时可能只是一时的不耐烦,但有时也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生活质量,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和特定时期都出现过严重的基本食品短缺。[②] 电话短缺往往夺取了很多老人

---

① I. L. Collier(1986)对强制性替代所产生的效果进行了生动的分析和估算。他向东德的群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现行价格水平下,你愿意支付多少钱来购买满足自己想像中的需求的权利。他测量了东德消费者想像中的购买力与实际购买力之间的差额,然后计算这一差额占消费者最初开支的百分比,计算的结果为13%。

② 例如,罗马尼亚在1980年代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根据P. Ronnas(1990)的资料,罗马尼亚1989年下列商品的人均商业销售量与1980年的人均商业销售数量之比分别为:肉46.6%,牛奶74.6%,日用品47.6%,糖78.8%,大米43.6%(第15页)。

或病人的生命,因为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无法及时通知别人。房屋短缺迫使很多想要单独居住空间的人不得不挤在一起,这往往会恶化了人际关系,而且剥夺了他们享受私人生活的机会。

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无法在统计数字中反映出来,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伤害往往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卖东西的人(或者配给体制中的官员们)常常会极为冷淡和粗暴,而此时购买者还要笑脸相迎,默默忍受,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在下一次就会受到更粗暴的对待。无助的消费者常常会发现自己处于十分卑下的地位,有时会严重扭曲他们的正常心理状态。

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买方市场会大大减少消费者在这些方面的损失。事实上,更好的服务态度也是有价格的。在买方市场上,卖方在决定价格时会把所有为顾客提供良好服务的成本都考虑在内:如广告、销售队伍、舒适的售货环境、包装、送货上门、为安排好存货和具备及时供货能力所花费的仓储成本、为确保加快服务而增添的人手,等等。在很多情况下,消费者可以自行选择是多付一些钱而得到更好的服务,还是少花点钱而只能享受一般的服务。经验表明,有很大一部分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从而可以在买方与卖方的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而当消费者没有这种可以选择的机会时,我们只能大致推测他们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① 我的猜想是:如果可以进行自愿选择,那么很多人还是愿意为了在买方市场上获得优势地位而支付额外的成本。

当购买到商品并使用的时候,如果常常发现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得不到保证(例如根本不能用,很容易坏,很快老化和过时,外表粗糙等等),消费者的满意度将会大大降低。例如,表 13.3 只是列出了经典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所得到的产品和服务在数量上少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但它无法反映出质量上的差别。下面仅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苏联拥有电话的人要比美国或

---

① F. L. Pryor(1977)经研究发现,在 1960 年代,一个苏联消费者逛商店所花费的时间(是指寻找和排队的时间)相当于苏联和美国商店营业员的工作时间之差。换句话说,从整个社会来看,消费者用在购买上的时间与销售者从事销售工作所花费的时间是一样的。在卖方市场上,时间损失由购买者承担,而且通常会占一天工作时间的很高比例,而在买方市场上,这实际上构成了销售者的工作时间(需要支付工资)。

西欧国家少得多。但在苏联即使是那些有电话的人也会在使用过程中遇到更多的麻烦:很难接通,在打国际长途时,要事先等上很长时间。社会主义国家的住房状况比资本主义国家差,这不仅表现在人均住房面积要小得多,而且拥挤的居住环境同时伴随着其他缺陷:建筑质量标准非常低,由于不重视维修,情况还在不断恶化;大部分住房没有自来水或者缺少现代化的排水和供暖系统。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类轿车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汽车普遍存在性能差、舒适程度低、油耗大、外形难看等很多缺点。

质量上的差别根源于体制上的差别。限于篇幅,这里不做详细分析,仅做以下几点说明。

1. 指令经济只能够发布产出的总量指标命令,而无法对质量上的种种细微差别进行统一计划和规定。这样,在纵向官僚控制的框架之内,就无法提供改进质量的激励机制。

2. 由价格当局制定的价格(中央计划控制)不可能像市场决定的价格那样准确地反映质量差别。而且,价格当局在制定价格的过程中也没有试图去反映质量因素。在所有以实际价格为基础进行的价值计算中都没有考虑质量标准问题。

3. 强制增长战略必然导致数量优先,甚至不惜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来获得产出的数量增长。

4. 在卖方市场上,即使质量有问题,生产者和销售者还是能够将产品销售出去。在买方市场上,提高质量是生产者和销售者赢得顾客的主要手段之一,而这种由激励引发的强制力量在持续短缺的经济中几乎完全缺失。

广大公众又是如何评价自己的物质福利状况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公众是否有机会对比其他国家的物质生活条件。长期以来,苏联、中国(改革开放前)和蒙古的大多数人都处于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他们无法到国外旅游,很难与来本国访问的外国人进行接触,不允许观看任何西方电影或阅读西方杂志(从而可以了解西方人的生活)。生活在这些封闭体制里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对自己的消费水平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产生强烈的不满,因为在他们眼中,苦难悲惨的生活是必须接受的命运,任何社会都是如此,而且他们觉得比起前几代人来,生活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在那些闭关自守的国度里,接受并屈从于现实生活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能够得以稳固的重要原因之一。

党国体制在封锁东欧国家人民方面作用相对有限。[1] 只要能与西方国家对比一下,人们就会认识到社会主义体制根本无法达到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所享受的生活水平,尽管社会主义国家总是宣扬资本主义是落后的制度。因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对物质生活的不满程度要远远高于苏联或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就是为什么东欧的改革和革命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早开始的重要原因。

## 13.3 经济安全

从广义上讲,经济安全是能够确保生活无忧(不用担惊受怕)的全部措施。这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政治压迫无处不在,不论是实际出现的反抗,还是潜在的反抗趋势都将遭到残酷镇压,人们的基本政治自由几乎全部被剥夺[3.6]。不仅那些违反了法律和现行规定的人或采取实际行动反对社会主义的所谓"敌人"感到不安全,实际上,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几乎是人人自危,因为暴君式的统治可以将任何人都置于监控之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即使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积极拥护者也无法幸免,特别是那些在政治上较为活跃或身处高位的人,他们更是每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知识界同样处于不安全状态,因为官僚统治者始终对他们充满疑虑。

现在让我们回来讨论最狭义的经济安全,这与物质生活水平有密切的联系。这里的讨论将集中在那些远离政治的人,至少只要他们保持最低限度的顺从就可以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稳定下来之后,大部分普通民众都属于这一群体。

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要确保普通群众获得基本经济安全。下面我将列出这种经济安全的基本组成要素,并指出这种安全十分有限,而且存在诸多缺陷。这里所描述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原型主要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特征为蓝本,因为在这些国家里,经典体制的内

① 东德显得尤为突出,那里的群众可以收看西德的电视节目。这样,东德的公民就可以将自己的生活和西德同胞的生活进行比较。

在趋势得到了最全面系统的发展。而对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和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由于它们还都处于非常落后的经济发展阶段，基本还谈不上所谓经济安全的问题。

1. 在成熟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实现了全面就业，同时普遍存在着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是经济安全中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它消除了人们可能面临的失业威胁，而失业对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2. 免费的公共教育。医疗服务在有些国家里全部免费，在有些国家只对一部分阶层免费。[①] 当然，医疗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仍然很低，但国家毕竟免费提供，这确实提高了民众的安全感。

3. 全面集中的公共养老制度。[②] 尽管养老金的水平一般都很低，但覆盖面很广。在许多国家里，所有公民都可以享受养老金制度，这进一步提高了公众的经济安全程度。

4. 根据官方意识形态和宪法条文，为公众提供住房是国家的任务。[③] 实际上，公民住房属于非优先建设项目，始终得不到重视，住房短缺的状况非常严重[表 11.2]。但街道上没有无家可归的人。参加工作是每个人的强制性义务，而工作的人都有一定的居住场所，即使没有所谓的住房，大型的工人宿舍或某些已经极为拥挤、人满为患的住宅公寓也算是为人们提供了栖息之地。

---

① 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免费医疗制度基本上覆盖了全部人口。中国只向国有部门的职工提供免费医疗，而对于农民而言，尽管名义上他们在重病情况下也可以免费享受各种医疗服务，但实际上大部分医疗成本都需要农民自己负担。

说起来是免费，但向医生和护士送“红包”几乎成了普遍现象，因此，我们也不能说人们完全得到了免费的医疗服务。由于“小费”或“红包”并不是强制性的，所以那些没钱或不愿意送红包的人也可以得到医疗服务。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体制下保证了向个人提供医疗服务，至少是一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② 养老体制与医疗制度基本类似。在成熟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所有职工都可以自动进入养老体制。但中国的养老金体制中没有包括农民，农村家庭必须自己照顾老人。

③ 苏联宪法第 44 条：“苏联公民享有住房权。这项权利将由以下方面的工作加以保障：发展和维护国家和社会的住房建设，改善合作社和个人的住房建筑条件，在社会控制下，按照公平原则分配住房建设用地，实施住房建设计划，为公民提供舒适的住房，同时也要以低廉的租金和收费标准向公民提供小区服务。”1977 年苏联宪法，引自 B. Kotlove(1986，第 17 页)。

5. 建立了覆盖所有无法自立的人的福利网络：孤儿、无人照料的病人和孤寡老人。至于具体提供什么样的福利则没有统一的标准（从最低水平的生存保障，到仍可接受的普通生活标准），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些得不到家庭照料的鳏寡孤独者确实可以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国家福利帮助。

由于有了这些基本的安全保障，如全面就业、强制性工作义务和社会保障网络，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确实看不到街头乞讨者。但必须加以补充的是，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和官方道德宣传不强行禁止乞讨行为的话，那么肯定会出现在街头讨饭或寻求帮助的人。当然，这条禁令之所以能够得以贯彻执行，也是因为社会主义体制确实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是保证提供最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①] 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仍然存在大规模的贫困现象并不矛盾：事实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始终挣扎在极度贫困的边缘，无法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6. 尽管也有犯罪，但公共安全程度要远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状况部分与上面所提到的经济安全保障有关：出于经济动机的犯罪行为有所减少。但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也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实行极权式警察国家统治所带来的“正面”结果：犯罪分子无处藏身，每个人都必须到警察局登记（哪怕他们只在陌生的地方呆一两天而已），如果自己不登记，那么为他们提供栖身之地的人就必须向警察部门汇报。发现他人有违法行为必须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不报告，那么他们自己也要受到惩罚。警察部门的暗探和眼线无处不在，而且当局还要求每个居民委员会或街道办事处一旦发现有非正常状况以及有陌生人长期出现，必须及时汇报。罪犯被抓住和判刑后将受到极为严酷的惩罚，监狱和劳改集中营里的条件极为恶劣，多数情况下几乎令人无法忍受。

第 2—5 点所描述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总体的消费分配情况，即家庭自己负担的个人消费和由国家预算资金支持的集体消费。表 13.6 从不同角度

① 考虑到本书的基本论证方法，这里只是描述了发展成熟的经典体制原型状况。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时期，往往会出现更为糟糕的情况（如苏联和中国发生的大灾荒）。

考察了这一问题。如果从国民产出的使用比例来看,社会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别;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很难说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福利国家"。但最后一列差别很大,而就其所包含的商品和服务的物理特性而言,它们既可以通过官僚协调进行分配,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进行配置。从表中不难看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官僚协调明显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表 13.6 集体消费:国际比较**

| 国家 | 集体消费占 GDP 比例,1976 年(百分比) | | | | 可分离的公共消费占总消费扩张的比例,1969 年(百分比) |
|---|---|---|---|---|---|
| | 教育 | 医疗 | 福利 | 总计 |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 | |
| 保加利亚 | 3.9 | 3.1 | 10.3 | 17.3 | — |
| 捷克斯洛伐克 | 3.9 | 3.8 | 16.3 | 24.0 | — |
| 东德 | 4.9 | 5.1 | 11.7 | 21.7 | 49.0 |
| 匈牙利 | 3.4 | 5.3 | 11.6 | 20.3 | 40.0 |
| 波兰 | 3.2 | 3.3 | 7.1 | 13.6 | 44.2 |
| 罗马尼亚 | 2.5 | 1.9 | 5.0 | 9.4 | — |
| 苏联 | 3.7 | 2.6 | 9.3 | 15.6 | 48.9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 | |
| 奥地利 | 4.6 | 4.6 | 21.1 | 30.3 | — |
| 法国 | — | — | — | — | 15.1 |
| 意大利 | 5.0 | 6.1 | 14.8 | 25.9 | 18.0 |
| 瑞士 | — | — | — | — | 30.7 |
| 美国 | 5.0 | 2.9 | 11.3 | 19.2 | — |
| 西德 | 3.8 | 5.1 | 20.6 | 29.5 | — |

**资料来源**:第 1－4 列:F. L. Pryor(1985,第 224 页)。第 5 列:Cao－Pinna 和 S. S. Shatalin(1979,第 186 页)。

注释:可分离的公共消费:这一项是指所有既可以通过官僚协调进行分配,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分配的所有产品和服务,如药品和医院的医疗服务。总消费扩张是指市场和非市场消费的总和。

匈牙利(40.0):1968 年估算值。

这就令我们陷入了所谓的道德困境。前文中我曾指出经典社会主义体

制在保障经济安全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这也是相当一部分民众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制度并承认其合法性的原因之一,但成就背后同时隐藏着各种阴暗之处。经典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党和国家对人民具有家长监护权[4.4]。其中包括各种形式的干预,首先是税收和补贴(改变了应由公众偏好决定的消费结构),然后是行政配给制度,最后就是与社会安全需求有关的各类现象(我们刚刚在第1—6点里介绍的内容)。这种家长式(父爱主义)的关心与限制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是联系在一起的,从上文有关安全保障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 全民就业和持续性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安全感对应着官僚机构对自由选择职业和工作地点的严格限制;工作的权利与工作的义务结合在一起。大部分父爱关怀直接来自人们的工作单位,这大大加强了单位对职工的束缚。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的代价是:到什么学校就读,去哪家医院看病都由当局强行安排,个人无权选择。如有必要,国家愿意为所有人提供住房,但住在哪里,享有什么样的居住条件,必须听从国家的安排。党和国家关心所有生活无法自立的人,但与此同时,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被纳入了党—国控制系统。国家对公民的"爱护"往往从摇篮(国有医院出生)一直坚持到坟墓(国有养老院送终),但与这种终身关怀相伴的是:公民一辈子受到监视和意识形态灌输。警员保护人们免受犯罪的伤害,但他们同样窥探着所有公民的一举一动。

在很多人的道德体系中,福利、关心弱势群体、社会安全和个人自由都具有很高的内在价值。很多情况下,这些内在价值是相互补充的(倡导某一项价值与拥护另一项价值相互一致)。但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又是相互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衡量标尺来决定哪项价值是第一位的。对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而言,我们可以做如下总结:

就狭义的物质福利而言,社会主义体制远远落后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这不仅包括物质福利水平的发展速度,而且包括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在关心弱势群体和保障社会安全方面,我们很难对社会主义的表现做出判断,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意味着对公民政治、社会和经济自由的严重侵犯,甚至彻底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权利。

---

① 有关对该问题道德伦理和政治哲学层面的讨论可参见 F. Feher(1982)。

## 13.4 货币收入的分配

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要分析福利的分配情况。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立刻进行了大规模的财富和收入再分配运动[2.4]。从历史的角度来衡量,在这一短暂的革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体制最大程度地实行了平等主义原则。①

本书没有考察革命—过渡时期的变化情况,而是直接进入了成熟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阶段。②

首先我们来考察货币收入分配。图13.1运用洛兰兹曲线进行了国际间的比较,③其中很多指标衡量了各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表13.7和表13.8利用基尼系数和其他方法进行了不平等程度的国际比较。④ 图13.1和其他表格都表明经典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比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平等。⑤但必须加以补充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在那些长期由社会

---

① 在前面章节中我们已经介绍过革命前的财产充公以及其他一些再分配措施,因此,这里的分析仅涉及革命后统治阶层(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的物质分配情况。在这一时期,革命者刚刚从非法组织成员而一跃成为众人瞩目的掌权者,大部分领导成员表现出了异常俭朴的清教徒生活方式。他们拒绝任何物质特权,仅仅要求必要的工作条件。人们至今还能在克里姆林宫博物馆里看到列宁当年简朴的住房。新领导人对工人群众的认同还表现在他们的着装都极为简单。毛泽东一生都坚持穿朴素的工作制服。在毛泽东统治时期,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穿着那种毛式服装。

②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大量著作,可参见:A. Bergson(1984)、J. G. Chapman(1977, 1989)、W. D. Connor(1979)以及 A. McAuley(1979)。

③ 可以这样来理解洛兰兹曲线:横轴表示人口的百分比,纵轴是总收入百分比。如果收入分配处于绝对平等状态,那么该曲线与横轴纵轴之间的对角线重合。洛兰兹曲线越接近对角线,收入分配就越平等;越向下弯曲,就表示不平等的程度越严重。

④ 基尼系数是这样计算的:洛兰兹曲线与对角线之间形成的面积与图13.1中以对角线为斜边构成的三角形面积之比。如果基尼系数为0,那表示收入完全平等;如果基尼系数为1,那表示收入绝对不平等。基尼系数数值越大,不平等的程度越高。

表13.8列出了根据图13.1中的洛兰兹曲线计算出的基尼系数,其中也包括其他一些国家的基尼系数。

⑤ 在计算货币收入分配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从一方面来看,高收入者会隐瞒自己的部分收入。从另一方面看,统计分析人员往往不会对最贫困的人进行调查,因为这些人大多受教育水平很低,无法准确说明自己的收入情况。这两种情况造成的扭曲同时适用于资本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扭曲程度可能更高一些。原因如下:就最高收入阶层而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些人的物质优势往往在货币收入以外,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还会谈到。就最贫困的阶层而言,这类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往往比资本主义体制下更容易观察到。

民主党执政的国家里,税收政策带有很强的收入再分配特征,因此,这些国家往往发展成为所谓的"福利国家",它们的税后货币收入要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公平。[①] 例如,瑞典的税后货币收入分配比苏联还要公平。

**表 13.7 收入分配:国际比较**

| 国家 | 占总收入比例 | | 基尼系数 | |
|---|---|---|---|---|
| | 最贫困的40%人口 | 最富裕的20%人口 | Morrisson | Slama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 |
| 保加利亚 | — | — | — | 0.21 |
| 捷克斯洛伐克(1973) | 27 | 31 | 0.19 | 0.21 |
| 匈牙利(1977) | 26 | 32 | 0.21 | 0.25 |
| 波兰(1975) | 23 | 37 | 0.27 | 0.22 |
| 苏联(1973) | 23 | 37 | 0.27 | — |
| 南斯拉夫 | — | — | — | 0.21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 |
| 加拿大(1969) | 20 | 37 | 0.30 | 0.39 |
| 芬兰 | — | — | — | 0.47 |
| 法国 | — | — | — | 0.52 |
| 希腊 | — | — | — | 0.38 |
| 意大利 | — | — | — | 0.40 |
| 日本 | — | — | — | 0.42 |
| 瑞典(1970) | 24 | 35 | 0.25 | 0.39 |
| 英国(1975) | 24 | 35 | 0.25 | 0.34 |
| 美国(1970) | 18 | 41 | 0.34 | 0.40 |
| 西德(1969) | — | — | 0.32 | 0.39 |

**资料来源:**第1、2、3列:C. Morrison(1985,第133页),第4列:Slama(1978,第315页)。

注释:Slama:第4列中的资料为1972—1973年。

① 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衡量的基础都是税后收入。在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个人所得税,因此在进行体制比较时,也就无须做这方面的区分。

**表 13.8 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状况:中国与低收入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

| 国家 | 占总收入比例 | | |
|---|---|---|---|
| | 最贫困的40%家庭 | 最富裕的20%家庭 | 基尼系数 |
| 中国 | 16 | 44 | 0.37 |
| 亚洲资本主义国家 | | | |
| 菲律宾(1971 年) | 17 | 47 | 0.39 |
| 印度尼西亚(1976 年) | 16 | 46 | 0.40 |
| 泰国(1970 年) | 14 | 51 | 0.45 |
| 马来西亚(1970 年) | 13 | 52 | 0.48 |
| 印度(1967 年) | 13 | 53 | 0.48 |
| 非亚洲资本主义国家 | | | |
| 哥斯达黎加(1969 年) | 18 | 44 | 0.37 |
| 墨西哥(1963 年) | 13 | 55 | 0.48 |
| 洪都拉斯(1967 年) | 13 | 55 | 0.49 |

**资料来源**:M. Selden(1988,第 147 页)。

注释:表中资料是指农村地区家庭总收入的分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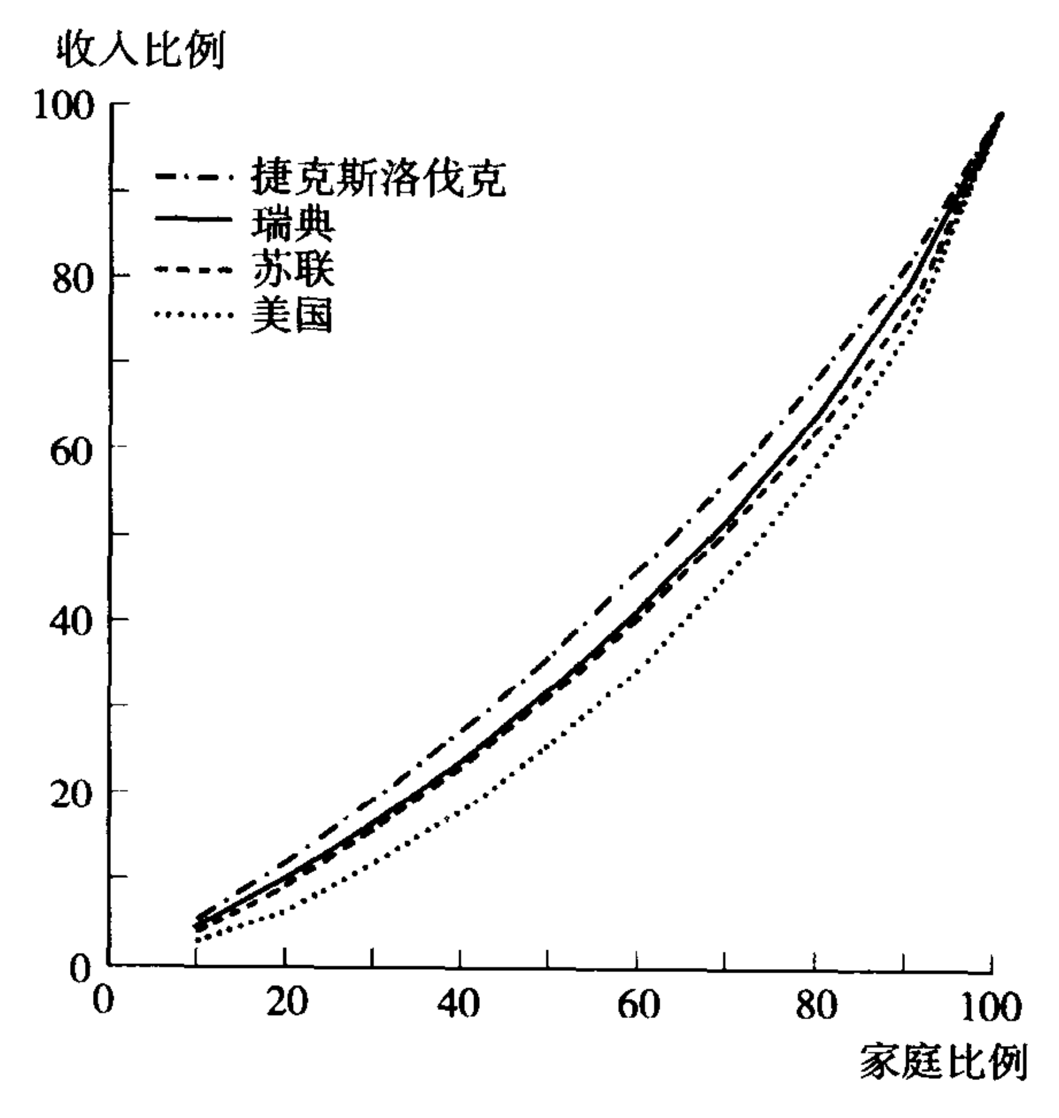



**图 13.1 洛伦兹曲线: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C. Morrisson (1984,第 133 页)。

## 13.5 物质福利的分配:其他表现形式

物质福利的分配不能完全用货币收入的形式来表示,下面我们就讨论物质福利分配的其他表现形式,[①]主要考察三类现象:

1. 营业税与价格补贴。再分配不仅采取了对收入征税的方式,而且还通过营业税和价格补贴的方式来影响各种消费行为。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公共交通的价格常常大大低于实际成本,这里就存在着很高的价格补贴。与此同时,国家又向私人汽车征收了很高的营业税。背后是这样一种逻辑思路:公共交通满足了基本需要,而私人轿车被认为是奢侈品;前者多半由穷人使用,而后者是富人使用。因此,这种形式的价格补贴和营业税就是有利于穷人的再分配措施。

即使是这个相对简单的例子也并不能说明这种再分配是以牺牲富人为代价的。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当轿车的使用变得非常普及之后,仍然有很多人是由于工作需要,同时又因为缺少公共交通工具,才不得不使用轿车的。大部分价格补贴和营业税所产生的再分配效应要比轿车这个例子复杂得多。例如,为了能让中等收入阶层获得更多的文化艺术享受,往往会对书籍、音像制品、戏曲、歌剧以及音乐会入场券提供价格补贴。但经验表明,即使有了价格补贴,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主要消费者仍然是较为富裕的知识文化界人士。由国家提供的价格补贴最终还是使高收入阶层受益,而不是补贴了中低收入阶层。[②]

更为突出的一个例子是降低公共部门住房租金(或价格)所产生的补贴再分配效应。[③] 补贴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让所有人,特别是中低收入者,能够

---

① 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们这里只分析与福利分配有关的现象。至于现象的因果关系分析,见13.6部分的讨论。

② S. N. Zhuravlev(1990,第80页)经过详细计算后说明,尽管高收入家庭在消费这些产品和服务时所交纳的营业税要高于低收入家庭,但同时也享受了更多的价格补贴,例如他们消费了更多的肉类产品、水果和蔬菜,而且在公共交通和电讯服务方面,他们的消费量也都高于低收入阶层。

③ Z. Daniel(1985)研究分析了住房补贴所产生的影响,可进一步参见 J. Ladanyi(1975)、I. Szelenyi(1983)以及 M. Alexeev(1986,1988a,1988b)等人的研究。

购买住房。[①] 实际上,部分住房是归私人所有的,而农村里的住房主要是私人财产,城镇里的住房也多半如此。这些私人房主支付了所有建设成本,如果他们要出售自己的房子,那么新的房主肯定要支付没有补贴的价格。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并非所有的房主都是富人,而国有部门的房客也并不都是穷人。很多私人房主也都属于中低收入阶层,而不少国有住房的居住者都有很好的收入,而且身处高位。这样,再分配实际上是有利于那些居住国有住房的人,而损害了私人房主的利益。如果考虑到收入再分配对不同阶层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把相对贫穷的私人房主手中的钱转移到了相对富裕的国有房客的口袋里。因此,我们无法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这种复杂的再分配所产生的实际净效应或许是一种更为不平等的福利分配。图13.2画出了匈牙利的两条洛兰兹曲线,一条表示了货币收入的分配情况,一条是住房分配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尽管有国家补贴(或者部分原因恰恰就在于补贴),住房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还是要高于货币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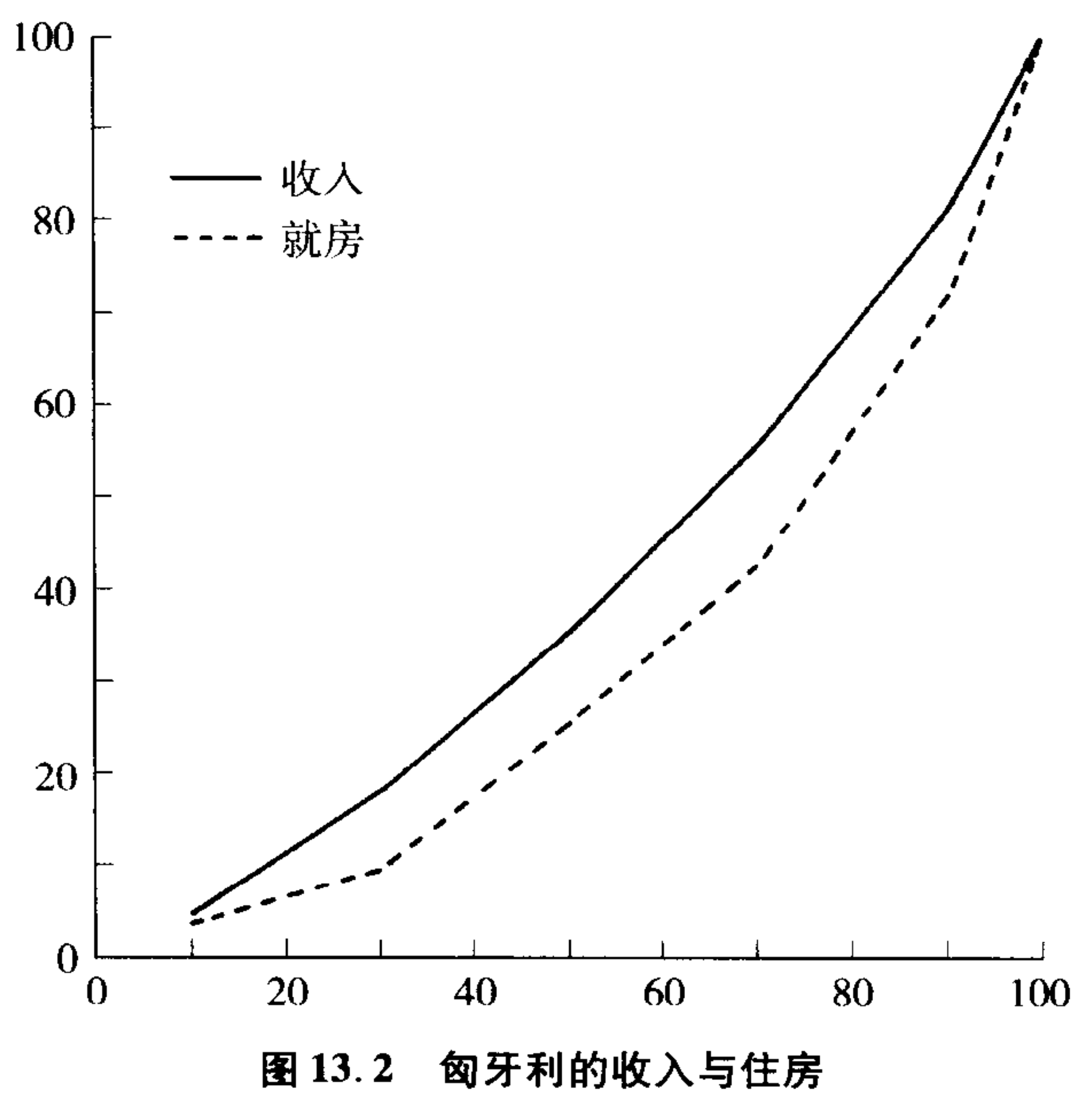



**图13.2 匈牙利的收入与住房**

**资料来源:** Z. Dániel (1985年,399页)。

① 这里我们可以再想一想本书第294页注释③中所引用的苏联宪法条文。

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没有得出非常确定的一般性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营业税和价格补贴能够降低物质福利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理论和实践上的证实。

2. 免费提供产品和服务。这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形式的价格补贴:由国家承担某些产品和服务的所有成本,然后免费提供。这个问题与经济安全要求密切相关[13.3]。免费向所有人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至少满足其基本需要,这提高了人们的安全感,特别是最贫穷阶层的安全感。支持者希望这种分配方式能够对实际消费产生实实在在的均等化效应,但实际上这一美好预期往往不能完全实现。在免费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仍会出现各种不平等现象。

城市的教育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国有企业和国有机构职工享受免费度假的机会也远远多于农村合作社成员。

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可以到设备更好、环境舒适的医院里看病,而这些医院是不向其他公众提供服务的。在很多情况下,高级领导人还享受着各种额外的免费福利待遇:所在单位提供的免费住宅,配有司机的公家小车,比普通企业度假中心豪华得多的休闲娱乐场所。[①]

所有体制都会有类似的福利差别,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在于言行是否一致。社会主义国家在官方意识形态中总是高喊着一切平等的口号,并宣布每个人都有权得到同等水平的免费福利待遇,可实际上它从来也没做到。

3. 获得短缺商品。在持续性短缺经济中,愿意购买某种供给不足的产品或服务的人是否具有同等机会获得这种产品或服务呢?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种机会的分布极为不平等。

有些不平等待遇是公开的。例如,配置制度明显向特定社会阶层倾斜[12.4]。在住房分配和大学招生方面,如果申请者超过了可能提供的房子和招生名额,那么就会公开宣布哪些人具有优先权。在下一部分我们还会详细谈到这个问题。

---

① 在所有体制下,政府高官和企业高层都会享受这类福利待遇。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提供给高层人士的福利享受比起他们的收入而言,几乎微不足道。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货币收入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平等分配的,因此,这类待遇就会产生很大的福利差别效应。

下面是隐藏的不平等待遇，它们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1）这里的不平等与短缺有关，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上文中提到的现象：为官僚机构高级领导人服务的特供商店及其他部门。这些商店提供的商品，如高质量的进口产品，很少或根本不向大众供应。专门供领导人使用的高级饭店和休假场所富丽堂皇，所有衣食住用等方面的商品在面向公众的普通饭馆、休假中心和食品店里是根本看不到的。还有前面提到的专门医院。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某些时期，这种特殊待遇也实行纵向等级制度：与下级官员相比，更高级别的官员可以到商品更丰富的特供商店选购商品，去更豪华的度假场所休闲娱乐，在更现代化的医院里看病就医。

（2）那些享受特殊待遇的人是通过工作单位获得短缺商品的，而不是在商店里经过搜寻自己找到的。主要食品和其他大众消费品短缺的情况越严重，这种分配方式就越普遍。对不同单位或部门的供给水平各有不同，哪些经济部门或地区可以获得优先照顾，都要适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标准。一般而言，大型工厂都会享受优先待遇。

（3）那些与供应厂商（或供应厂商上级主管部门）关系密切的单位就更容易获得短缺商品。[①]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人可以更便宜地获得所需要的产品，而在于他/她能够提前得到消息。例如，供应厂商专门为他保留着，或者把他在等候名单里的次序往前提。有时候，只有某些人才能获得供应信息，但这已经足够了。[②] 有很多东西有助于某些人获得这种特殊待遇：级别很高，与销售人员私人关系很好，或者是使用贿赂手段。

从以上1—3点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实际存在的不平等要远远大于图13.1、表13.7和表13.8所显示的资

①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现象被称为“社会关系”，在苏联叫“声音大”，中国则称之为“走后门”。

② 苏联作家V. 索洛金曾写过一本名为《链条》的小说。小说一开始描述了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他们通过私人关系得到消息，明天要发放购买轿车的排队号码。于是，第二天他们要去排队，但不是为了等候买车，而是去等着领号码。这种先遣队在前一天夜里就已经开始出现，然后人们要为此排队等上好几天。这样，能够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发放排队买车的号码就成为了一种特权。

本主义体制下的不平等。①

## 13.6 对分配问题的解释

几个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福利分配。最好的研究方法是先列出需要解释的现象(福利分配),然后列出各种影响因素,最后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很遗憾,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研究。因此,在这里无法对各种因素的相对影响力进行排序,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列出各种因素,并尽可能地对它们影响的力度做出初步评估。

主要目的是分析现实的因果关系,同时有选择地(无法包括所有因素)说明官方意识形态所宣布的分配原则与实际所执行的分配原则有哪些不一致的地方。此外,我们还会对每项分配原则进行比较分析,因为在某些时候,这些原则所宣称的价值本身就相互冲突。②

1. 劳动和业绩。经典社会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并没有做出实现收入平等的承诺,事实上,它还反对支持这一观点的人。这种倾向于平均主义的观点在西方左派人士那里更为流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每一本教科书都清清楚楚地写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③

但问题是如何衡量劳动业绩(或成果),劳动业绩和收入之间应该具有怎样的比例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说,资本主义也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至少对工薪阶层而言是这样。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业绩的衡量和奖惩主要

---

① C. Morrisson(1984,表13.8吸收了他的研究成果)曾做过一个估算,分析了非货币优惠待遇如何增加了不平等状况。例如,以货币收入分配为基础计算的苏联基尼系数为0.270,但如果加入非货币收入,那么这个数值将变为0.309;同理计算,波兰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70和0.308。

② 关于分配的理论研究,可参见A. Sen(1973,1981)。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分配原则,可参见Z. Daniel(1985)。

③ 在分析这一原则时,通常会引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1875](1966)。马克思自己是这样表达的:"个人生产者,在进行了适当扣除之后,从社会获得的部分应该等于他所付出的部分。获得多少取决于个人的劳动量。不同的劳动量享有不同的权利。"马克思认为必须实行这种原则,因为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才从资本主义的母体中脱胎而出。马克思预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将变成人的基本需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激励人们努力劳动是非常关键的,因此,需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并非绝对)在一个分散化的匿名过程中完成:劳动力市场及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相对工资。[1] 但在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同类型的劳动应该获得什么样的收入,多少劳动应该获得多少收入,都要由专门负责收入分配工作的人来决定[10.5]。当然,控制工资水平的决策者在决定收入差别标准时也会注意到来自劳动力市场的信号,毕竟提高收入是吸引劳动力进入短缺领域的一种手段。

尽管企业高层领导的工资和普通劳动工人的工资之间也有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远远小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即使在大型企业,领导和工人的收入比例通常也不会超过5: 1,而在美国,这一比例可能会高达20: 1,[2]部分原因是两种体制的管理者市场不同。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企业会争夺最好的管理者,管理人员往往供给不足,他们甚至可以自己提出聘用条件。最大的企业和赢利能力最强的企业会提供高额工资来吸引最好的管理者。经理生涯的顶点便是获得最好收入的企业职位。

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情况则完全不同,那里没有必要通过支付高额工资来吸引优秀管理者。每一位管理人员都是同一个中央官僚体制中的成员,每位管理者都是党的战士,党将决定对他/她的任命,而党在做出决定时不会仅仅依据经济标准。哪怕是任命某人担任超大型企业的领导,这也不是管理者职业生涯的顶点,他/她还有望登上更高的职位:被任命为部长、省委(地区)书记或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这些更高的职务任命才是对管理者真正的奖赏。因此,从激励的角度来看,没有必要付给管理者很高的报酬。

尽管官方意识形态并不赞成平等分配原则,但在实际中它还是倾向于将收入拉平。

2. *政治素质(表现)与权力(位置高低)*。在第1点中,基本默认了狭义上的经济业绩标准,但至少在抽象分析层面上,还有另外一种与经济业绩不同的收入差别标准:奖励政治上忠诚可靠和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全心全意服

---

① 不少资本主义国家对工资水平进行了干预,如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但资本主义体制的工资决定机制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围。

② 在1970年代,苏联的这一比例平均为4:1。见A. Bergson(1984,第1085-1086页)。

务的人。

这主要是通过职业生涯与政治待遇之间的联系来间接执行这种标准。那些通过自身能力爬上高位的人始终可以享受特殊的物质福利并获得一定的特权地位。更重要的是,必须无条件为党的现行政策服务,忠诚可靠并严守纪律,这样才能获得相应的福利待遇和政治特权。此外,在不同情况下也可能将政治表现与物质奖励直接挂钩,其中包括授予国家荣誉的同时提高其收入,委派到国外工作(收入丰厚),甚至是奖励一块土地或一幢度假别墅。

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对这一标准往往是半遮半掩,有时也承认所谓的精英统治原则。如果将"按劳分配"中的劳动概念适当延伸,那么在政治上忠诚于社会主义制度并为之而奋斗也可以算做"劳动"。但官方意识形态对此宁愿秘而不宣,即那些在道德力量鼓舞下,全心全意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人也会得到物质奖励。

3. *不同阶级、阶层和地区享受不同的待遇*。在多数情况下,对城市的物质福利分配要优于农村。同样,在资本分配过程中,某些地区处于优势地位,这些地区的工人也比其他地区的工人享受更多更好的福利待遇。

对一些多民族的大国而言,这种分配倾向往往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像苏联、中国和东欧某些国家,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物质福利方面一直保持着巨大差距。

在任何社会里,利益集团往往是决定福利分配的主要因素,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向政治家、立法机关和政府施加压力来实现自己的要求。①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利益集团的作用远远低于议会民主体制(那里更容易组织起利益集团),但也并非没有这种现象[3.5]。代表特定职业(或产业)或地区的利益集团总是要想法设法通过游说或其他政治手段来为自己谋取特殊待遇。

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带有歧视性的分配方式与第1点中的按劳分配原则是相互冲突的。经典社会主义在实际的分配过程中,往往是做同样工作的人得到不同的收入,这取决于各自所在的部门和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① 见 M. Olson(1982)和 A. Nagy(1990)。

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同类劳动和相同业绩所得到的收入基本趋于平等,其公平程度远远高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体制总是把道德—政治体系视为实现平等的先决条件,但事实上,几乎不带有任何道德和政治因素的市场力量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整个社会的平等分配。

4. *需要与贫穷*。对于所谓按需分配的原则,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始终采取了模糊不定的态度。这一原则与马克思所定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明显冲突。[①] 马克思本人认为,只有进入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适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因为在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社会里,人们再也不会出于物质动机而进行劳动,而且生产力已经非常发达,可以充分满足所有人的全部需要[12.4]。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官方意识形态悄悄避开了这一乌托邦式的概念,但在物质产品的实际分配过程中不得不考虑需要问题,这毕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因为总有部分社会成员或社会阶层需要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帮助。鉴于这一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官方认可的分配原则中,除了把按劳分配原则作为主要原则之外,还遵照诸如团结和补偿弱势群体等伦理价值加入了其他一些附属原则。

现在我们从官方意识形态的原则规定转向现实情况分析。在进行分配决策时,当局需要考虑诸如家庭规模、一个人的工资所要养活的人口数量、劳动能力不断退化等各种问题。在进行社会救助的过程中,部分采取了货币形式,部分是给予某种福利待遇,分配住房时也会照顾那些弱势群体。从这个角度来说,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也表现出了福利国家的特征(即利用再分配手段实现收入平等),这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之一。但这一正面判断仍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对此我们必须加以补充说明。

有人可能会辩解说,之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福利总量很少,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还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阶段。但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为弱势群体提供物质支持的公共开支相对比例同样低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这就不能用经济发展水平来解释,唯一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先

---

① 在谈及分配问题时,最常引用的著作就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在这本书中也清楚地提到,在某些情况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会产生不平等现象,例如,一个需要养活好几个孩子的工人,其家庭人均收入肯定低于没有孩子的工人家庭。

增长模式。[1] 福利开支具有剩余的特征：整体经济情况好的时候，开支可能会大一些；而情况不好的时候，福利支出也无法提高。前文在谈论经济安全时，我们就提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贫困（甚至是绝对赤贫）状况始终非常严重。

贯穿本书，“社会主义”体制一词主要就是指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其中没有包含任何规范判断（价值判断）的意思，但在这里有必要暂时偏离这个定义。在世界范围内，很多政治运动是在规范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并赋予了它特定的伦理价值。尽管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有很多不同的阐释，但大部分人对以下观点均有共识：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消灭贫困、帮助贫穷的人、受苦的人和处于弱势的人。按照这一观点，一个自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有责任更加公平地进行物质福利的再分配。如果以此为衡量标准，那么可以说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它的使命。在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里，有些制度有利于更平等地进行物质福利分配，但同样存在一些制度阻碍这项任务的完成，福利分配政策常常是混乱不清和自相矛盾的。如果有人把更为平等的福利分配作为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标志，那么我们可以说，北欧福利国家比那些自诩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更有资格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

5. 财产与市场成功。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个人也可以通过财产（权）而不是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尽管范围相当有限。有些是合法的：在银行存款获得利息收入，或贷款给国家获得利息收入（通常是被迫向国家贷款）。有些通常不合法，但当局也可以容忍：例如将私有住房出租获取租金收入。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私人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受到了严格限制，其中一部分活动还属于非法行为。从这里获取收入也取决于好几个因素（没有包括在上文的1—4点中）。[2] 下面仅列举其中几个因素：私人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短缺程度；[3]私人所有者在把握机会方面的聪明程度；在多大程

[1] 见表13.6中有关福利开支的资料。

[2] 这里之所以用“也“这个词，主要是因为私人企业的工人也是在劳动，因此，按劳分配原则同样适用于私人部门。

[3] 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私人企业“一词的。在这里，它还包括小型服务社、私人手工作坊以及半合法的“第二职业者”。

度上当局能够和愿意干预私人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总之,可以说私人部门的收入分配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在一个对私人财产和市场都充满敌视的政治社会环境中,那些敢于进入私人部门从事生产和服务的人往往会得到较高的收入。在一个持续短缺的经济中,一位农民把在国有商店里买不到的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价格肯定高于所有能进入自由市场进行销售的产品的价格。黑市上的价格就会更高,因为购买者必须补偿销售者因违反法律所承担的风险。市场成功地包括巧妙避开了当局对私人交易的限制。

这里还需要补充另外一种利用市场机制获得的收入(扭曲形式的高收入):在公有制部门工作的职员把单位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然后变成了私人利润。在健全的市场条件下,过度需求会抬高价格,从而让生产者和销售者可以获得暂时的较高利润。这种利润动机会促使供给上升,然后再将价格压低,超额收入也就很快消失。但在短缺经济和官僚协调体制下,上述平衡机制无法发挥作用。销售者在接受贿赂之后会提供短缺商品给行贿者,但这并不能消灭短缺。实际上,正是因为有短缺存在,供货商才有利可图。从经济学意义上看,我们可以把这种额外收入视为一种租金。

上面所描述的收入方式明显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尽管它们在整个社会的收入规模中所占比例不大,但为全面起见,我们还是列出了这种分配方式。当然,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财产和市场成功对收入产生的影响远远不及它们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所发挥的作用。

6. *继承*。个人的物质福利状况往往也取决于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什么东西,以及个人的家庭背景。这其中既包括了实际的遗产,也包括家庭所提供的物质支持。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这类财富的规模累积效应并不显著,也就是说,遗产对当前收入的影响并不大,当然,也不是没有任何影响。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住房分配。一个年轻人从小在非常舒适的住房条件下长大,家庭能够帮助他购买自己的私人住房,或者他/她可以继承父母的房子,[①]他/她不必为分到一套国有住房而等上好几年,或者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自己的住房。可以说,这位幸运的年轻人将以一种完全不同的

① 实际上,国有住房也可以像私人住房一样由子女继承。

心态开始自己的人生旅程(请对比一下,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普通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可能从小就不得不和父母及兄弟姐妹挤在一间狭窄的小屋里,长大以后要等待单位分房,他们又将会以怎样的心态开始自己的生活?!)。

与继承物质财富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从家庭继承的知识财富。就未来生活而言,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在缺少文化的家庭里长大的年轻人与一个出自书香门第的年轻人还是会有很大不同。他们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语言能力和知识训练方面,而且表现在不同的人生追求上。表 13.9 利用匈牙利的有关资料说明了这种关系。

**表 13.9 匈牙利人接受更高教育的愿望**

| 父亲的受教育水平 | 孩子想接受更好教育的愿望(13 岁,样本中的人数百分比) |
|---|---|
| 大学 | 51.5 |
| 中级学校 | 40.1 |
| 初级学校 | 15.2 |
| 不足 8 年义务教育 | 6.4 |

**资料来源:**M. Csako 等(1979,第 124 页)。

一个人的生活还往往受到父母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的影响。孩子可以和他们的家长一起享受到第 2 点中所介绍的特殊福利待遇。"干部子女"在申请学校、上大学以及找工作的时候也会得到特殊照顾。

这些环境因素以及其他因素都对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产生了重要影响。表 13.10 进行了一项国际比较,分别列出不同国家来自工人阶层和农民家庭的孩子将来成为白领工人的比例。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宣称自己是"工人和农民"的国家,但上述比例分布却显示出它们与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没有太大区别。在不少资本主义国家里,下层出身而进入上层社会的

人口比例往往高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①]

表 13.10　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国际比较

| 国家 | 非农业体力工人与非体力劳动工人 | 农民与非体力工人 |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 保加利亚 | 22.6 | 10.1 |
| 捷克斯洛伐克 | 35.9 | 20.6 |
| 匈牙利 | 27.5 | 10.7 |
| 波兰 | 27.6 | 10.3 |
| 南斯拉夫 | 26.1 | 17.1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 澳大利亚 | 31.0 | 19.0 |
| 法国 | 27.8 | 17.2 |
| 意大利 | 24.9 | 11.8 |
| 挪威 | 25.8 | 22.1 |
| 瑞典 | 29.7 | 17.7 |
| 西德 | 22.3 | 18.5 |

**资料来源**:W. D. Connor(1979)。

注释:不同国家的研究并不是同时进行的,因此,表中数据的年份并不相同。

很显然,基于家庭出生和家庭背景的歧视行为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完全冲突的,但这对物质福利分配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抹杀的。

---

① R. Andorka(1988)以详实的统计资料为基础(采取了与西方国家具有可比性的计算方法)考察了匈牙利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研究发现,匈牙利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久,确实提高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但后来逐步陷入停滞状态,而且整个社会变得异常僵化,甚至出现了走向封闭静止型社会的趋势。

## 13.7 均等化趋势与差异化趋势

前面我们主要分六组列出了影响物质福利分配的各种因素。每一种因素都带来了不平等的影响,同时造成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差异化趋势。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严格实行平等的原则。

从另一方面来看,社会主义体制也出现了均等化趋势,主要表现在收入日趋平等,大幅度偏离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情况非常少见。出现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结构[13.6,第5点]。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私人所有权是主要的产权形式,市场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协调者。收入差距主要与财产(权)和市场成功有关。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高级领导干部的物质福利待遇远远高于普通工人,但与最成功的资本主义商人所积累的巨额财富相比却又显得微不足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与公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相比,电影导演、发明家或运动员也可以算是高收入阶层,但比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同行"明星"来,他们就只能是穷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明星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天才和能力获得极高的收入,而且公众自愿把钱放进他们的口袋里。

均等化趋势之所以能够处于支配地位的真正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彻底取消了私人财产(权)和市场机制。此外,意识形态灌输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人们从小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过高的收入是不道德的。"非劳动收入"以及通过"投机"、"做生意"获得收入应该受到谴责,但这些受到责难的"发财方式"恰恰是在利用私人财产(权)和市场成功取得的收入。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们往往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实利润所得与欺诈所得混为一谈。对高收入者(处于分配顶端的人)的猜忌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意

识和思想之中。①

就差异化和均等化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趋势而言，均等化趋势相对较强。最后，如果综合考虑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社会物质福利状况，那么我们可以说，它仍然比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平等。

① 从某种程度上说，官方的道德宣传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统治阶层所享受的特殊物质待遇同样应该受到谴责。在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他们职位相同的上层成功人士往往享受着更为奢华的生活，与之相比，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那些所谓的特殊物质福利待遇也就不值一提了。但按照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道德要求，他们完全违背了自己的清教徒生活标准。

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后期或力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时期，当人们最终发现这些共产党领袖（如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竟然过着如此奢侈的生活，他们的愤怒之情就可想而知了。

# 第十四章　外部经济关系

第 3—13 章对经典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研究分析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考虑对外经济关系（除了几处简单的注释）。当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逐步成型（内部力量和/或外部力量作用）并最终稳定下来之后，它的基本特征将由体制的内部因素所决定，而不再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这样，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就可以把社会主义简单地假设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来加以考察。在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内生基本特征进行分析之后，再来考虑对外经济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前面章节中所讨论过的各种现象。①

所有国家的对外关系都要受到各自环境特征的巨大影响：面积、经济发展阶段、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本章和前面章节一样，在讨论过程中将忽略各个国家的具体差异，而集中关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共同特征。重点分析与体制有关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内在逻辑，这样就可以与前面章节中所讨论的现象构成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许多重要特点都可以回溯到第 3—13 章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本质特征。

首先我们将列出一些图表。表 14.1 和表 14.2 根据主要目的地和主要来源地简单介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出口情况。表 14.3 和表 14.4 列出了

---

① 关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对外贸易的主要特征可参见 E. A. Hewett(1980)、F. D. Holzman(1976,1989)、A. Koves(1985,1986)、P. Murell(1990a)、P. J. D. Wiles(1968)和 T. A. Wolf(1988)。

在本章的写作过程中，曾得到 I. Szegvari 和 I. Salgo 的说明。

国际贸易中的主要产品类型。表 14.5 利用外贸强度指针考察了外贸结构(按目的地、来源地和主要产品类型进行分类)。外贸强度的指标数值越高(大于 1),说明进口或出口越偏离国际贸易流量的平均水平,即"正常流动状态",反之亦然①。后面部分还将对表中的有关问题进行评论。

**表 14.1　社会主义国家主要产品市场的出口结构**

| 出口国 | 时间(年) | 进口国所占份额(百分比) | | |
|---|---|---|---|---|
| | | 社会主义国家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 |
| 社会主义国家 | 1938a | 11.0 | 73.9 | 14.1 |
| (总计) | 1958 | 69.8 | 19.5 | 9.2 |
| | 1970 | 59.4 | 24.5 | 16.1 |
| | 1980 | 47.6 | 33.9 | 18.5 |
| **构成:** | | | | |
| 欧洲社会主义 | 1938a | 12.7 | 75.0 | 11.0 |
| 国家 b | 1958 | 70.6 | 20.8 | 6.9 |
| | 1970 | 62.7 | 24.1 | 13.2 |
| | 1980 | 52.0 | 32.6 | 15.4 |
| 亚洲社会主义 | 1938a | 3.1 | 69.0 | 28.6 |
| 国家 c | 1958 | 65.7 | 12.7 | 21.6 |
| | 1970 | 22.1 | 28.8 | 49.1 |
| | 1980 | 13.7 | 43.7 | 42.6 |
| 苏联 d | 1958 | 71.8 | 17.5 | 10.7 |
| | 1970 | 57.8 | 21.2 | 21.0 |
| | 1980 | 45.3 | 36.1 | 18.6 |

① 举例来说,A 国的出口占全世界进口总量的 5%。如果 B 国从 A 国的进口量达到了本国进口总量的 5%,那么 A 国对 B 国的出口量就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外贸强度的计算如下:实际进出口比例与世界平均比例之间的比率。例如,如果 B 国从 A 国进口的产品量达到了其总进口量的 15%,而不是 5%,那么外贸强度就是 3。偏离世界平均水平的原因很多:出口国可能是在进行倾销,或者向 B 国施加了政治压力要求 B 国从本国进口更多的产品。或者从 B 国通过实行关税优惠鼓励从 A 国进口更多的产品。当然,地理位置会发挥重要作用。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外贸强度比 1 要高出很多的话,那么必然有出口国的"推动"或/和进口国的"拉动"。相反,如果强度大大低于 1,那么就可以认为进口国和/或出口国之间设立了阻碍贸易自由流动的壁垒。关于对强度指标的解释以及其中所可能包含的各种信息,可参见 A. Nagy(1979,1985)。

**资料来源**：由 I. Szegvari 根据以下资料为本书编辑整理：布达佩斯，中央统计办公室（1965，第 172 – 73 页）和联合国（1986b，1：173）。

a：1938 年的资料中包括 1958 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

b：包括蒙古，不包括 1938 年和 1958 年南斯拉夫的数据。

c：1938 年和 1958 年的非经互会成员的社会主义国家。

d：苏联包括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一栏里，但也单独列出了它的资料。

**表 14.2　社会主义国家主要产品市场的进口结构**

| 进口国 | 时间（年） | 出口国所占份额（百分比） | | |
|---|---|---|---|---|
| | | 社会主义国家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 |
| 社会主义国家 | 1938a | 15.6 | 73.6 | 10.8 |
| （总计） | 1958 | 72.1 | 20.7 | 7.2 |
| | 1970 | 58.1 | 31.1 | 10.8 |
| | 1980 | 47.0 | 39.3 | 13.7 |
| **构成：** | | | | |
| 欧洲社会主义 | 1938a | 20.1 | 72.4 | 7.7 |
| 国家 b | 1958 | 74.1 | 19.4 | 6.5 |
| | 1970 | 62.6 | 27.7 | 9.7 |
| | 1980 | 51.3 | 35.2 | 13.5 |
| 亚洲社会主义 | 1938a | 8.0 | 76.0 | 16.0 |
| 国家 c | 1958 | 61.6 | 27.0 | 11.0 |
| | 1970 | 24.4 | 56.5 | 19.1 |
| | 1980 | 18.6 | 66.2 | 15.2 |
| 苏联 d | 1938a | 12.5 | 78.6 | 7.5 |
| | 1958 | 77.4 | 14.9 | 7.7 |
| | 1970 | 58.6 | 26.2 | 15.2 |
| | 1980 | 44.7 | 39.4 | 15.9 |

**资料来源**：由 I. Szegvari 根据以下资料为本书编辑整理：布达佩斯，中央统计办公室（1965，第 170 页）和联合国（1986b，1：172）。

a：1938 年的资料中包括 1958 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

b：包括蒙古，不包括 1938 年和 1958 年南斯拉夫的数据。

c：1938 年和 1958 年的非经互会成员的社会主义国家。

d：苏联包括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一栏里，但也单独列出了它的资料。

表 14.3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结构(根据目的地和主要产品类型)

| 产品 | 时间(年) | 目的地:主要产品份额(百分比) | | | | |
|---|---|---|---|---|---|---|
| |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 |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 苏联 | 亚洲社会主义国家 |
| 所有食品 | 1970 | 17.8 | 9.0 | 8.7 | 10.7 | 10.7 |
| | 1980 | 6.0 | 9.0 | 5.5 | 10.1 | 7.7 |
| | 1987 | 7.9 | 6.7 | 3.8 | 8.1 | 1.8 |
| 农业 | 1970 | 11.9 | 2.8 | 4.2 | 0.9 | 5.2 |
| 原材料 | 1980 | 6.6 | 4.1 | 2.6 | 1.3 | 6.2 |
| | 1987 | 5.9 | 5.8 | 1.9 | 0.9 | 4.5 |
| 矿石与金属 | 1970 | 10.9 | 1.4 | 5.8 | 2.0 | 1.5 |
| | 1980 | 3.9 | 4.1 | 2.6 | 0.6 | 0.6 |
| | 1987 | 3.3 | 3.3 | 1.9 | 0.3 | 1.2 |
| 燃油 | 1970 | 16.6 | 4.5 | 8.1 | 2.6 | 9.4 |
| | 1980 | 49.4 | 13.4 | 18.5 | 1.6 | 9.9 |
| | 1987 | 38.9 | 17.6 | 25.4 | 1.0 | 15.6 |
| 制成品 | 1970 | 36.3 | 57.8 | 67.5 | 82.9 | 69.4 |
| | 1980 | 26.3 | 51.7 | 62.0 | 83.6 | 67.1 |
| | 1987 | 34.6 | 45.4 | 58.1 | 87.7 | 57.3 |

**资料来源**:联合国(1990b,第 80 页)。

注释:表中出口数据包括了苏联在内的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第 4 列目的地一栏包括了从苏联的进口,但苏联在第 5 列单独列出。每一列中的百分比加总后都不到 100,因为总出口中有部分资料没有在表中列出。

表 14.4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结构(根据来源地和主要产品类型)

| 产品 | 时间(年) | 来源地:主要产品份额(百分比) | | | | |
|---|---|---|---|---|---|---|
| |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 |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 苏联 | 亚洲社会主义国家 |
| 所有食品 | 1970 | 10.8 | 42.1 | 8.7 | 7.0 | 22.7 |
| | 1980 | 20.2 | 51.4 | 5.5 | 0.5 | 27.1 |
| | 1987 | 11.2 | 37.2 | 3.8 | 0.4 | 25.5 |
| 农业原材料 | 1970 | 7.0 | 20.6 | 4.2 | 9.1 | 11.8 |
| | 1980 | 3.9 | 8.7 | 2.6 | 4.4 | 11.7 |
| | 1987 | 4.2 | 7.1 | 1.9 | 3.0 | 6.6 |
| 矿石与金属 | 1970 | 3.7 | 9.5 | 5.8 | 12.0 | 8.0 |
| | 1980 | 3.6 | 6.9 | 2.6 | 4.4 | 11.7 |
| | 1987 | 2.0 | 5.7 | 1.9 | 2.9 | 10.8 |
| 燃油 | 1970 | 1.3 | 2.4 | 8.1 | 15.0 | 0.0 |
| | 1980 | 1.5 | 22.3 | 18.5 | 40.8 | 0.0 |
| | 1987 | 1.7 | 15.4 | 25.4 | 52.6 | 2.8 |
| 制成品 | 1970 | 76.4 | 25.0 | 67.5 | 42.7 | 54.8 |
| | 1980 | 69.9 | 10.3 | 62.0 | 32.9 | 49.9 |
| | 1987 | 79.2 | 34.2 | 58.1 | 25.2 | 52.0 |

**资料来源**:联合国(1990b,第100页)。

注释:表中出口数据包括了苏联在内的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第4列目的地一栏包括了从苏联的进口,但苏联在第5列单独列出。每一列中的百分比加总后都不到100,因为总出口中有部分资料没有在表中列出。

表 14.5 外贸强度(根据进出口地和主要产品类型)

| 国家 时间(年) | 初级产品 | | | 制成品 | | |
|---|---|---|---|---|---|---|
| | 社会主义国家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 | 社会主义国家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 | | |
| 1955 | 7.43 | 0.33 | 0.32 | 8.60 | 0.19 | 0.24 |
| 1977 | 5.08 | 0.60 | 0.63 | 6.75 | 0.27 | 0.62 |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 | | | | |
| 1955 | 0.30 | 1.11 | 0.95 | 0.18 | 1.10 | 1.06 |
| 1977 | 0.66 | 1.07 | 0.93 | 0.44 | 1.09 | 1.02 |
| 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 | | | | | | |
| 1955 | 0.26 | 1.04 | 1.24 | 0.25 | 0.81 | 1.53 |
| 1977 | 0.50 | 1.03 | 1.15 | 0.24 | 1.00 | 1.31 |

**资料来源**:A. Nagy 和 P. Pete(1980,第16页)。

## 14.1 外部政治环境

在经典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宣传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企图摧毁它的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4.5]。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有责任抵抗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国家,捍卫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观点不能简单地用斯大林或其他领导人遭受所谓的“迫害情节”来解释,它至少得到了历史经验的部分支持。自从苏联诞生以来,外部政治环境始终对它充满敌意。在国内战争期间,试图推翻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内反对力量始终得到了国外势力在金钱、武器、甚至是军事力量上的直接支持。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也都发生过类似情况。即使在国内战争结束、公开的外部干预停止之后,仍然会常常出现各种不友好的或敌视的行动,其中包括暗中支持反共产主义势力,通过封锁、禁运或其他贸易歧视方式来破坏或中断经济联系。

即使进行最详尽的历史分析(包括对不同国家的分析),我们也很难最终得出结论说,对外部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惧和害怕在多大程度上源于真实的心理体验,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人出于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把这种历史经验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借口。[①] 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对付反抗和不满行动时,都喜欢把外部危险作为采取镇压措施的理由。可以肯定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就进入了冷战时期。实际上,冷战在苏联诞生之后就已经存在,由于各种敌对性质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行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从那时起就陷入了水火不相容的境地。

下面我们将外部世界分为不同类别的国家,借此可以更深入地考察当时的情况。

1.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这些国家的所有经济联系(进出口、信贷交易、聘用外国职员、学术交流等等)都要服从于政治标准。在经典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处于一种“被困心态”之下,其结果

---

① 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当权者常常将自己的政治对手诬陷为国外秘密机构的代理人,不仅控告他们为外国间谍,而且还指责他们在国内推行的政策措施都是受外国主子的指使。

必然是自我孤立,从而导致了自力更生的倾向。但在苏联还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只有它一个国家会这样做。后来,苏联及其盟国都将自己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外,换而言之,自力更生的倾向出现在集团层面,这带来了集团内部贸易的扩张。[①]

经济上的孤立政策同时伴随着科学和文化上的孤立。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关系几乎被完全摧毁,有时仅仅是出于不信任和猜疑。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双方没有了货币、产品和资本上的自由流动,而且经验和思想上的交流也彻底中断。这种孤立政策得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持(在世界范围内大力谴责屈从于西方世界的行为),而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孤立也使得官方宣传变得更为容易,因为人们再也无法通过第一手数据来了解真实情况,从而对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优劣做出真正的比较。

2. *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上面第 1 点中的部分内容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与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补充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一样)都非常重视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并将之作为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往往会出于政治或军事目的,愿意与它打算支持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经贸往来(从经济角度考虑,通常都是不利于本国经济利益的交易)。而一旦没有了政治和经济联系,他们就会停止经济上的往来。

3. *社会主义同盟国*。这里仅从政治背景来讨论社会主义同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从一方面看,在官方声明中他们强调团结和相互援助;从另一方面看,各国政府代表都会竭力提出符合本国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要求。同盟国家国内和外交政策上的考虑也会对社会主义同盟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4.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常会在不同时期发生冲突,例如,南斯拉夫与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分裂,以及后来苏联与中国、中国与越南之间的争吵。当关系紧张的时候(对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和外

---

① 中国在经典社会主义阶段的出口与 GDP 的比例是 5%。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中国改革者的说法)阶段,这一比例迅速提高到了 10%,这也从侧面说明以前所奉行的自力更生政策。

交政策目标不满)，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将经济关系放在次要地位。如果有必要，它会减少经济联系，甚至实行禁运、召回专家，或者采取其他报复行动。[1]

一般而言，在任何体制下本国的国内情况和外交政策都会影响到其外部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特征是：政治上的考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政治因素是决定外部经济关系的主要标准，经济上的考虑居于附属地位。表 14.1 清楚地反映了政治因素的支配性影响。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1958 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进口比例从 1938 年的 11% 上升到了 69.8%。很显然，这种巨大的变化并不是源于它们的经济条件，而是因为在此期间这些国家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

## 14.2 对外经济关系的组织安排

我们首先从专业外贸机构来介绍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组织框架。在经典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明确宣布，所有对外贸易活动都应该由国家垄断。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这种垄断的组织形式。

最好先从一家国有生产企业开始分析。这家企业需要进口部分原料，同时部分产品也将用于出口，这样它在投入和产出方面就都与外部世界有了联系。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严格禁止这类企业与国外贸易伙伴进行直接联系。进出口贸易以及维持与国外贸易伙伴的关系只能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类机构被称为外贸公司。[2] 外贸公司将负责处理与对外贸易有关的所有业务：销售或购货市场的选择、价格谈判、运输条款、时间期限等等。尽管外贸最终会影响生产企业的活动，但它们却没有权力过问上述对外贸易活动。这种权力分工就形成了国内生产与国外

---

① 这里可以看一些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量，中国只占苏联出口总量的 1.5%，进口总量的 1.4%。而中国对苏联的出口只占其总量的 4%，从苏联的进口也仅为其进口总量的 3.3%。见 R. E. Feinberg、J. Echeverri - Gent 和 F. Muller(1990，第 232 - 33 页)。

② 在专业文献中更普遍的称呼是外贸组织。本书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企业和预算单位(事业单位)[5.3,5.4]进行了区分。根据企业和预算单位的定义，经典社会主义国家的外贸组织属于企业，因此，本书也就采用了外贸企业或外贸公司的说法。

市场之间的巨大鸿沟。

一般而言,每家外贸公司都有非常清晰的任务目标。例如,有的外贸公司专门负责某一种或某一类产品的进出口业务;有的则为特定生产部门提供所有的进出口服务;有的只负责进口,有的只负责出口。但不管经营领域如何界定,每家外贸公司都在各自的经营范围内处于垄断者的地位。从法律规定上看,外贸机构属于企业,但它们将全权负责某类产品的所有进出口业务,因此,拥有很多行政性权利。更确切地说,所谓外贸公司也只是整个官僚体制中履行特定职能的分支机构,而不是真正的企业。

如果从价格方面来看,那么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之间的决策分工就更加清晰了。外贸公司向外国厂商支付的进口产品价格(或出口产品销售价格)与国内企业向外贸公司支付的进口产品价格(或出口产品收购价格)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国内价格通常长期保持不变,即使出现价格变化,也多半与进出口产品价格无关。尽管可能有人会解释说,国内某些产品的价格上涨是因为国外相关进口投入品的价格有所上升,但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即使进口价格出现了上涨情况,但国内价格仍然会保持不变(在官方宣传中往往把这一点作为中央价格控制的一大优势)。官方宣称,资本主义变化无常的市场丝毫影响不了国内价格体系的稳定。

进出口产品国内价格与国外市场价格的相互分割与外汇汇率密切相关:社会主义国家为本国货币和每一种外币都规定了统一的汇率。从表面上看,本币与各种外币之间的官方汇率似乎始终维持不变,而实际上,这一汇率经常根据不同的乘数进行调整(大于或小于1)。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这些乘数都会有所变化,但在所有国家和所有时期,这些乘数都会根据国外市场和相关产品的具体情况进行大规模的调整。

影响外贸交易的因素还包括税收和补贴。各种税收、关税、相应的税收和关税减免措施以及临时性和永久性补贴都对进出口产品的国内外价格产生了重要影响。[①] 最终根本无法判断一美元到底能兑换多少卢布。在进口贸易中获得1美元的国内成本可能是30戈比(100戈比=1卢布),也有

① 这里没有专门讨论关税问题,因为它并没有发挥很大的独立影响,而只是连接产品价格与成本的财务桥梁之一(其他桥梁还包括税收和补贴)。

可能是4卢布。至于上述两种兑换比例之间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只是一个次要的财务技术问题：不同的汇率乘数，不同的正（或负）税率或者是两者的结合。问题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国内价格与国外贸易市场价格是完全割裂的。[①]

这种价格割裂状况既是税收和补贴所造成的结果，也是采取税收和补贴政策的原因之一。我们继续用前面的例子加以说明，假设某种进口原材料的价格上升，价格当局在外贸公司的要求下提高了这种原材料的国内价格。这就意味着提高了使用这种进口原材料的生产企业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该生产企业认为它应该获得损失补偿，因为成本的提高与企业无关。这时就需要运用弱化预算约束的办法来解决：允许企业提高产品价格来转移增加的成本，或者采用其他办法来帮助企业弥补财务损失。

上述情况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任何外汇政策都是无效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政府主要通过汇率政策来影响贸易和经常账户。通常是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认为债务过高，那么就可以将国内货币贬值，这最终会减少进口而增加出口。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这套做法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企业对成本和价格都不敏感。无论汇率如何变化，它所产生的影响都会被各种税收、补贴政策以及预算软约束所抵消。如果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经济领导人想要减少进口和提高出口，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进行官僚控制。他们会通过降低进口配额以及减少国内需求（消费需求和中间品需求）来强行扩大出口。[②] 当局只有通过行政措施才能有效地控制贸易和经常账户。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考察汇率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作用。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货币都是不可兑换的，换句话说，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不能进行自由兑换。外汇交易受到严格控制，拥有外汇的部门和个人都必须将它卖给“银行”。[③] 所有外汇交易都必须执行中央统一制定的汇率。

外汇的管理者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可能会将特定任务分配给独立的

---

① 不管怎样，即使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具有更紧密的关系，国有企业对价格也会始终不敏感。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在面对国外市场的价格变化时，不会做出强烈反应。

② 罗马尼亚在20世纪80年代所采取的外贸政策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③ 个人只有得到特批后才能购买可兑换货币，而且有严格的数量限制。这种特权待遇往往是对特定个人或集团的奖励。

机构,例如,专门办理对外贸易融资业务的国家外贸银行,或者将旅游外汇业务委托给为一般大众提供信贷服务的银行。但这些机构都只是单一银行体制下的分支机构[8.1]。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对外财务联系都要受到严格的中央控制。外贸公司以及它们对所有对外贸易活动的垄断构成了隔离国内生产与外部影响的第一层防线。在这道防线之外,还有另外一层:除了控制对外贸易业务往来的外贸公司之外,所有的对外财务往来都要由独立的银行体系负责处理,或者说,每一笔涉外货币交易都需要得到银行的认可。说是银行负责,但实际上还是由外汇管理机关来控制,因此,涉外货币交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业务。

上面所介绍的情况清楚地表明,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对外经济活动完全处于官僚协调机制的控制之下,基本与市场无关。官方观点认为,外贸和国际金融部门与国内其他部门没有什么区别,其经营管理同样应该适用于计划原则并服从于行政控制[7]。对外贸易指标和国际金融关系也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必须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执行(向外贸公司、涉及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的生产企业、银行下达计划任务)。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做法带来了很多矛盾。尽管外贸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部门一样带有很强的官僚协调特征,但它毕竟不同于国内部门。在经济处于封闭状态时,我们已经看到了由于取消了市场而代之以官僚协调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而外贸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国外贸易伙伴,于是,情况就会变得更为严重。国外购买者、销售者和银行没有义务服从国内计划部门或有关主管当局的命令,也不可能因为它们违反计划要求而采取制裁措施。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就人为地建立起一套组织体系,筑成了好几道防线将国外市场和国内生产隔离开来。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政治上的考虑,其次就是要使国内的计划经济体制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绝对统一完美的官僚科层体制[6.3]。所有下属单位都有不止一个上级领导机构。在官僚体制中,不同部门总是有相互重合和相互冲突的地方,进行干预的时候也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外贸领域尤为突出。外贸领域的主管机构是外贸部,但党的中央委员会、外交部以及警察和军事部门也常常会监督和干预对外经济关系;外汇管理部门、生产控制部门、税收、海关以及价格控制部门对贸易问题也都

有一定的发言权。聪明无比的企业经理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这些部门中进行周旋,例如,当在这个部门受阻后,就到另一个部门去寻求支持。最后,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决策也要经历漫长的讨价还价过程。企业会更关注不同官僚机构之间的讨价还价,而不太在乎与国外企业和银行在生意场上讨价还价。复杂而漫长的决策程序使外贸交易和信贷活动变得极为僵化。对于从事外贸业务的企业(以及涉外生产企业)而言,获得上级机关的认可远比让国外客户满意或赚取进出口利润更重要。生产部门根本没有必要(更不用说有动力了)根据国外的市场情况迅速灵活地调整生产。外贸领域的情况往往是瞬息万变,需要企业做出及时、迅速和准确的调整。只有市场协调机制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使命,因为市场对价格极为敏感。僵化、繁复的官僚机制永远不可能拥有如此和谐、精致的协调能力。

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内部建立起了各种防范网络并采取了诸多隔离措施,但国外市场的变化仍然对国内经济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常常会打乱国内的计划。想要从国外进口产品的国家还是不得不考虑外国商人的想法和意愿(对方卖不卖,是否提供信贷支持)。尽管会拖延很长时间并承担了大量的损失成本,社会主义国家此后还是要针对外部市场做出相应调整的。

## 14.3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进口饥渴、出口厌恶和负债倾向

在下面两个平行的部分里,我们将主要介绍外贸和金融领域里参与者的行为特征和经济趋势:首先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然后是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鉴于篇幅原因,在讨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会尽量把范围缩小并进行一些简化。

主要集中于可兑换货币(可以与其他货币自由兑换的硬通货)之间的交易活动。为简单起见,"硬通货外贸"与"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在这里都是同一个意思。[①]

---

① 实际上,这里很少有真正相互重合的项目。原因如下:例如,当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易货贸易时,也就没有货币来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有一部分是用硬通货结算的。当然,重合的部分也可能相当大,这一概念上的差异并不影响本部分所讨论的趋势问题。

事实上,没有理由把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除了前文提到过的政治因素以外,资本主义贸易伙伴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相应的技术水准都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关系发生影响。任何一个进口方都知道这方面存在的差异,例如,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机器肯定与从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机器有所不同。同样,出口方也明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需求完全不同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需求。限于篇幅,这里仅列出主要的不同之处。

1. 进口。与投资饥渴[9.1]和囤积倾向[11.5,12.7]连在一起的就是进口饥渴,特别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具有强烈的需求。①

**表 14.6　东西方投资品贸易**

| 国家 | OECD 国家 a: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比例 | | | |
|---|---|---|---|---|
| | 1971－1975 年 | 1976－1980 年 | 1981－1985 年 | 1986－1987 年 |
| 保加利亚 | 9.5 | 7.3 | 13.2 | 17.8 |
| 捷克斯洛伐克 | 2.5 | 2.9 | 2.5 | 3.3 |
| 东德 b | 1.5 | 1.6 | 1.6 | 2.0 |
| 匈牙利 | 5.4 | 4.5 | 3.7 | 3.9 |
| 波兰 | 6.1 | 3.7 | 2.3 | 2.8 |
| 罗马尼亚 | 7.8 | 5.1 | 1.5 | 1.4 |
| 欧洲国家总计 c | 4.3 | 3.5 | 2.7 | 3.2 |
| 苏联 | 13.4 | 20.3 | 28.5 | 20.2 |

**资料来源**:联合国(1989,第 76—78 页)。

a.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 1960 年成立。目前有 24 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 OECD 的成员国:其中 9 个欧洲国家,再加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

b. 不包括东西德之间的贸易估算。

c. 地区加总是以 1985 年美元加权为基础计算的。

从最高领导人到工厂的车间主任,几乎每个人都患有投资饥渴症,都想获得高质量和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关注国外专业发展并参观过发达国家现

① 就产品差别而言,进口饥渴主要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需求,因为那些产品技术标准高而且质量可靠。但在食品、原材料和标准化产品方面则不存在上述差别。社会主义国家主要从发展中国家那里进口农产品和原材料。

代化工厂的工程师往往最有发言权。种种因素都激发了对发达国家最新机器和设备的需求:专业梦想、渴望现代化、希望使用更可靠的机器进行生产。从表14.6可以看出,欧洲的社会主义小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投资品是其出口额的三倍,而苏联的这一进口比例则达到了20倍。

持续短缺也刺激了进口。无论是生产所需要的投入品,还是消费品,一般都处于严重的短缺状态。如果某些产品的短缺情况十分严峻,那么最便捷和最迅速的替代办法就是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这类产品。① 计划部门(或者处于紧急状况中的企业领导)不会考虑用进口产品替代国内生产是否有利可图。这一进口过程并不是基于价格和成本信号,而是根据非价格信号做出的反应。②

当然,最高政治和经济管理部门、党的中央委员会、总理以及中央银行行长也不可能全然不顾进口总成本,或者对贸易平衡和经常账户平衡情况毫不在意。实际上,他们非常关心这些问题。但出于对其他问题(考虑消费与积累之间的比例[9.3])的考虑,他们不能将决策权下发给更低级别的部门,并最终由企业自己来决定。除了位于权力顶端的决策者之外,所有人都想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更多的东西,而且没有任何内在力量能够限制这种自发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对进口进行直接控制:严格的进口配额,每一项进口业务都必须经过审批。于是就出现一种互动效应:进口饥渴是导致官僚控制的原因之一,而官僚控制同时又引发了进口饥渴,因为在制定计划的讨价还价过程中,每个企业都想最大化自己的进口配额,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产品作为自己的存货。③

2. 出口。这里出现了相反的行为。在官僚体制的各个层面都会自发形

---

① 苏联在大灾荒时期就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谷物和其他食品。

② 部分社会主义国家规定,在决定是否用进口产品替代国内生产(或者增加国内生产以扩大出口)时,必须进行贸易效率计算,但这种计算往往对实际决策没有什么影响,只不过是弄出一个结果来支持事先已经确定的决策而已。

③ 社会主义国家限制进口主要是因为这里所阐述的理由,而不是想要保护国内企业。卖方市场已经足以保护国内企业。

成进口饥渴症,然而却不会形成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产品的热情。[①] 既然国内市场完全处于卖方控制之下,排队的购买者总是会根据供给来调整自己的需求,那么企业又何苦绞尽脑汁去寻找外国购买者呢?! 越是向发达国家出口,对质量和供货期限的要求也就越高。[②]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始终处于竞争状态的私人企业会为发现一个外国市场而兴奋不已。然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国有企业根本不愿意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产品,并且表现出了一种出口厌恶心态,以至于上级主管部门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迫使它们出口,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强制出口,完成出口任务成了计划指令的一部分,而且是必须优先完成的重要计划任务之一。

社会主义国家的外贸公司进入资本主义市场之后发现,那里基本上是一个买方市场。惊讶于产品如此丰富多样之后,它们就更加有进口的愿望。然而作为出口方,它们同时发现自己的产品无论是质量、现代化程度,还是供货条件都无法与资本主义企业展开竞争。[③] 同一个经济体制不可能拥有两副完全不同的面孔,即在国内的卖方市场上是一个样,到了国外的买方市场上又是另一个样。如果国内是卖方市场,那么生产企业就会习惯于对购买者毫不在意,也不会关心购买者的质量要求。[④]。这种懒惰和冷漠的态度同样存在于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只要一个国家的国内经济体制缺乏迫使企业努力提高质量、发展技术、按时供货以及适应买方要求的激励机制,那么这个国家的企业必然会在出口产品时遭遇严重打击。

---

① 即使在最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其长期统治者恩维尔·霍查也不得不这样警告自己的人民:“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什么都想从国外进口的趋势。我们有责任充分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资源,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国内生产更多的设备、零部件和机器,减少对进口的依赖。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出口,增加出口产品的品种,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每位同志都必须明白,为了进口,我们必须要有出口。”恩·霍查(1975,第 10 页)。

② M. Mejstrik(1984,第 75 页)研究认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捷克斯洛伐克只有 2%的产品达到了世界技术标准。

③ 这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然也包括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孤立政策、普遍性的贸易保护措施和/或政治歧视。

④ 经常提出的一个反例就是武器出口。它们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取得了成功,但这并不能推翻我们的论证。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武器买卖从来就不是卖方市场。当军队成为买方时,它有足够的力量将武器买卖变为买方市场,同时会提出自己的质量要求。见 D. Davis(1990)。

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产品吸引力的唯一办法就是降低价格，或者说进行倾销。如果价格足够低，那么很多低质量的出口产品还是可以卖出去以换取硬通货。社会主义国家的外贸公司常常就是这么做的，尽管外国购买者并没有很明显地发觉这一点。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出口产品供给价格的负弹性效应。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是获得支付进口产品所必须的硬通货，因此，出口计划就会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如果出口价格过低，那么就必须大量出口；如果价格较高，那就减少出口。[①] 在制定价格的过程中，已经把税收、关税以及各种补贴因素都包括了进去。别说公众，即便是经济管理部门，也都弄不清楚为了获得1美元或1英镑，国内究竟做出了多大牺牲。他们也不知道与国外竞争者提供的价格相比，自己出口的产品到底有多便宜。至于出口产品的国内投入，更是无从知晓。

我们基本上可以用进出口贸易从业者的利益动机、社会环境和行为特征来解释表14.3和表14.4所显示出的经济趋势。[②]

3. *贸易与经常账户*。正如前文所述，各级经济管理部门，包括生产企业的领导，都竭力想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更多的产品。但问题的另一面却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向资本主义市场出口产品时非常困难。[③] 结果很明显：进口开支很可能远远超过出口收入。

直接资本进口即资本主义企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商业投资，几乎被完全禁止。考虑到由于政治因素所导致的孤立主义政策，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外贸逆差只能通过借款来弥补，这些借款有些是来自资本主义进口企业或银行，有些则是政府担保的国外贷款。于是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中就出现了负债倾向。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经济领导人常常处于矛盾之中。从一方面来

---

① 关于倾销和供给的负弹性问题，可参见F. D. Holzman(1976,1983)和J. Winiecki(1984)。

② 这里我仅举出几个比较显著的趋势。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械出口比例不断下降，而能源出口却不断上升。需要补充的是，在机械出口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占很高的比例。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很少从社会主义国家购买机械产品。

③ 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旅游业所赚取的外汇是对出口商品收入的重要补充，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孤立政策大大减少了这部分外汇收入。同时，处于被忽略地位的服务行业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国家带来可观的出口收入。

看,他们很难抵抗来自各方面的进口压力,而借助于硬通货贷款来解决问题在短期内不失为一条快捷方式。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见14.1部分的有关讨论),负债行为又是非常危险的(当然,这完全是一种过分夸大而缺乏实际根据的心理压力在作祟)。这两方面的影响孰轻孰重,最后的结果如何,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①。

即使在有些国家借款行为遭到了强烈反对,但经常账户的平衡问题仍然在经济管理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反对的效果十分有限。负债国家为了能够偿还贷款(必须支付利息和到期本金)并尽量减少债务余额,不得不改善其经常账户的状况。没有外债的国家往往会有一定的硬通货储备。

沿着上述论证思路,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通常会把进口替代作为改善其外贸和经常账户状况的一个重要措施,而不是去增加出口收入。进口替代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加以执行。在短期内,可以禁止部分进口贸易并强制规定必须使用国内制造的产品。在长期内,必须采取同样的行政性措施要求增加国内投资以满足未来的进口替代。这些现象最终都与孤立主义政治目标和自力更生战略相互吻合。从另一方面来看,采取命令方式不能保证获得充足的出口硬通货收入。直接进行官僚控制只能向企业施加出口压力,但并不能保证一定成功。

在一个持续短缺的经济中,强制出口政策往往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国内的短缺和紧张引发进口饥渴症。为了支持进口(以及偿还外债),必须不惜任何成本来获得更多的硬通货。前文曾经指出,如果价格足够低,还是有很多国外客户愿意出口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外贸部门对能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出售的产品的需求将无限膨胀。而对国内市场而言,外贸部门又变成了此类商品的购买者,而且它们根本不在乎国内的价格和成本。不管国内的价格和成本有多高,国内与国外之间的差价总能通过预算软约束的某些技术手段来加以弥补。这样,对出口产品的巨大需求就成为导致国内宏观层面出现持续过度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12.7]。面向资本主义市场的强制出口政策成为引发国内持续短期现象的因素之一。

---

① 表23.7列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债务资料。

## 14.4　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搭配、出口偏好、追求零平衡

进口和出口。首先，需要区分"硬产品"和"软产品"。这里所谓的"软"和"硬"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物理特征，而是特指两国之间在特定时期的一种商品贸易关系。某项产品在谈判过程中是"软"还是"硬"主要取决于两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如果符合以下条件，那么谈判过程中买方国家的行政机构和卖方国家的行政机构就会认为这一产品是"硬"的：(1)能够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出售并获得硬通货收入；(2)根据买方国家当前的国内经济状况，急需此类产品，但无法从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进口；如果想要，只能用硬通货在资本主义市场上购买（付出极高的成本和做出极大的牺牲）。这两个标准往往相互重合，但也并不总会一致。举例来说，卖方国家正在进行食品出口谈判。保护主义壁垒可能会使出口受阻，因而无法获得硬通货收入。但如果此时买方国家出现大规模的食品短缺，该国领导人也知道为了缓解国内短缺必须用硬通货从资本主义市场上购买所需要的食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进口国的迫切需要，卖方国家（出口国）的商品就会变得"硬"起来。

如果某一商品在卖方国家出现了剩余（因此不得不出口），而且几乎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市场上销售出去，那么这种商品就是"软"的。此外，如果其他社会主义买方国家觉得是否进口某一商品无关大局，那么这种商品也会变"软"。

在澄清了概念之后，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政府贸易谈判代表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贸易谈判代表进行政府间有关进出口产品质量和数量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特征？（这里首先重点讨论经济或外贸部门高层官员的行为特征。稍后再分析低级官员的行为特征）。

在进入谈判过程后，政府贸易代表会把自己国家能够出口的"硬产品"作为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①] 他们自己想获得的东西包括：(1)尽量获得对

① 生产国也会把有些硬产品出售给急需硬通货的国家。

方的“硬产品”;(2)尽量出售自己的“软产品”;(3)尽量少进口对方的“软产品”。[①] 在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价格并不是双方的主要关注点,尽管价格也是考虑因素之一。最最重要的问题是,两个国家的“贸易篮子”里究竟应该包括什么产品?在整个篮子里,“硬产品”和“软产品”的比例究竟是多少?贸易代表如果能够让对方接受自己更多的软产品,而接受其他国家更少的软产品,那么他们就取得了谈判的成功。这种发生在政府层面的谈判过程在商业上可以称之为“搭配销售”。

这里让我们暂时再回到前面两章所探讨的国内市场上短缺和剩余同时共存的问题,因为上文所提到的有关内容恰好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短缺和剩余共存的现象。当一个国家出现硬产品短缺、软产品积压时,它不仅无法通过对外贸易谈判来消除自己的产品剩余,而且有时候为了获得贸易伙伴的硬产品而不得不接受对方的软产品。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中低级官僚机构的行为特征,首先从生产企业开始。如果买方国家发现自己缺少硬产品,那么这就意味着它对进口产品的质量、技术先进程度以及供货条件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这样,能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硬产品的生产企业就会非常轻松。同样,那些在社会主义市场上出口硬产品的外贸公司也会感到异常轻松。在出口软产品的时候,情况就会大为不同,任何一个国家在进行政府间贸易谈判时想让对方接受更多的软产品都绝非易事。但一旦签订出口协议,无论是软产品生产企业,还是从事软产品出口的外贸公司就都不会遇到任何困难。除了不用担心质量歧视之外,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还享受到了另外一个好处:政府间的贸易协议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它们可以“衣食无忧”。此外,国

---

① 当然,这里所谓“软”和“硬”的两分法主要是为了澄清有关概念。实际上,这类现象也可以进行横向比较。尽管大部分机械产品都是软产品(如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较发达国家生产的机械设备),但对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而言,这些机械设备又是比较硬的产品。此外,在特定国家内,同一部门生产的产品质量也会存在差别。

有生产企业借此也了解到进口软产品的社会主义国家显然是一个卖方市场。[①]

出于上述各种原因,社会主义国家中低层机构在面向社会主义国家外部市场时,其行为大致趋同,但在面向资本主义外部市场时,它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不同。一方面是硬产品进口饥渴症,一方面是软产品进口厌恶症。一般而言,对出口没有什么厌恶情绪,而且中低层官员愿意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产品,因为比起资本主义市场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市场要轻松和安全得多。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假设原材料中会有更多的硬产品,而制造品中的硬产品相对较少。如果上述假设正确的话,那么表 14.5 就集中反映了这种趋势所带来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制造品贸易流动强度非常高。此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制造品贸易强度要远远高于它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强度。从贸易强度指标之间的差别还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相互要求对方进口,而它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始终低于正常进口比例。

这里让我们暂时停顿一下。有些研究者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贸易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哪些国家是在剥削其他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中是否隐藏着征税或补贴现象?[②] 本书对这些问题不予评论。尽管上述问题值得注意,但它们只是涉及到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最终再分配问题。我们这里所关注的问题是,就某一项特定交易而言,谁做得相对较好,谁做得相对较差?关键在于没有零和交易,一方获利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效率和进出口生产效率都非常

---

① 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短缺严重程度各不相同。短缺越严重(以及经常账户不平衡的现象越严重)的国家,越需要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更多的进口产品。而出口国往往不愿意向经济状况已经很糟糕的国家出口更多的产品,认为这样的国家没有能力生产可供交换的产品。但生产企业从自己的利益观点出发,就会认为无论它生产什么最终都会找到购买者。这样国际贸易层面上的卖方市场又进一步加重了国内的短缺状况。

② M. Marrese 和 J. Vanous(1983)在一项研究中认为苏联是硬产品的净出口国,而且出口价格低于当时的世界市场价格水平,同时又是软产品的净进口国,价格高于当时世界市场价格。苏联之所以进行这种补贴是为了维持在本地区的政治支配地位。这一观点受到了 J. C. Brada(1985)、F. D. Holzman(1986a,1986b)以及 A. Koves(1983)等人的批评。

低？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体制效率低下。① 由于大部分贸易活动都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因此缺少了改善自己和他国质量发展的激励机制，而这些只能由具有高质量标准的外部市场来提供。

贸易平衡与经常账户平衡。由于无法进行兑换，某一个双边贸易关系中出现的赤字无法用另一个双边贸易关系中的剩余来进行平衡。

如果不考虑少数例外情况（下文中还会谈到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几乎不存在相互投资。这样，经常账户是否平衡主要依赖于贸易账户的平衡。由于一个市场出现的剩余不能转移到另外一个市场，因此没有国家愿意出现太多的剩余或太多的贷款增长。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特殊趋势：追求零平衡。双边贸易关系最好既不要出现持续剩余，也不要出现持续赤字。

从上文中的有关叙述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外部市场与资本主义外部市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社会主义外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导致出现强制出口现象。只有当经济中确实非常需要进口硬产品（同时需要有特定的产品出口来进行冲抵），上级管理部门才会强制出口某类产品。另外一种情况是，根据某项国际协议，本国政府必须不惜成本完成出口任务（出于外交压力或其他政治原因）。上述两种情况下都会导致强制出口。

从 **14.1** 部分和 **14.2** 部分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让我们再回到表 14.1 和表 14.2。正如前文所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之所以会有很高比例的贸易额，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对外贸易明显有利于宏观经济或技术发展，决定性因素仍然是政治上的考虑，即想让自己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外。一旦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伙伴关系形成并稳固之后，维持高贸易额的力量会不断加强（至少在出口方面是这样），因为对经济管理部门和生产企业而言，这种贸易关系在很多方面都符合他们的利益。

---

① 苏联进口商常常对自己的政府非常不满，因为根据政府间的贸易协议，他们必须从匈牙利购买软产品，其中包括许多质量很差的产品。与此同时，匈牙利的出口商也会抱怨说，根据苏匈贸易协议，他们不得不生产很多技术过时的产品。例如，苏联乡村比较落后的电话网络体系只能使用与现存落后设备相适应的转播站。

## 14.5 融合的努力:经互会

本章迄今为止讨论的所有现象似乎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努力走向融合。在分析实际经验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回到意识形态领域。

经典社会主义思想曾公开宣扬国际主义精神。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始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口号。由于以前的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是相互分离的民族国家,很多人希望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联系,国家边界的重要性不断降低,从而出现一个超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联合体。

这种愿望在现实中始终未能实现。唯一进行过的一次重要努力就是力图创建由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经济联合组织——经互会。[①] 对经互会运行情况的分析考察将为上述结论提供有力的经验支持。[②]

国际主义理想与经互会现实情况之间存在的差异从该组织的成员范围就可以看出。除了古巴、蒙古和越南以外,中国和其他所有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经互会成员。这本身就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没有建立起全面的国际主义联盟,除了三个国家属于例外情况,欧洲较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有组织的经济联系[③]。我们可以认为双方对此都非常冷漠。从一方面来看,较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担心,它们不得不把太多的资源转移给较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会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这个问题十分突出。所谓要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发展,必然意味着国家之间的资源再分配,这将有利于落后国家,然而却会遭到较为发达国家的

---

① 经互会于1949年成立,1991年宣布解散。在1990年前后,经互会成员包括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罗马尼亚、古巴、蒙古和越南,南斯拉夫是"有限的参与者"。

② 关于经互会的研究,有大量文献,可参见:S. Ausch(1972)、J. M. van Brabant(1980, 1990)、L. Csaba(1990)和M. Kaser(1965)。

③ 莫桑比克曾经申请加入经互会,但遭到了拒绝。

反对。[1] 从另一方面看,经互会对不少非洲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有些国家担心,依附于经互会可能会损害它们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关系。

与经互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冲突导致南斯拉夫在早期就退出了该组织,后来阿尔巴尼亚也退出。这些都表明,日常政策的实施远远比国际主义道德理想或经济上的考虑要重要得多。

在考察理想(国际主义)与现实(经互会)之间的差距时,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协调机制。市场协调在其中扮演了非常次要的角色,基本的协调机制是官僚协调,而且走到了非常极端的地步:强大的中央计划经济和直接官僚控制。逻辑假设是建立一个超国家的中央计划经济。在各个国家之上也需要有一个超国家的官僚科层体制。位于全体社会主义成员国之上的中央计划部门将负责以下工作:编制计划,将计划分解到每个成员国,为每个成员国规定产出任务和投入品配额,设定国家之间的产品流动目标。这个超国家的中央计划部门类似于一个国家内部的计划部门(为不同部门或不同地区制定计划)。

上述观点并不仅仅是官僚协调逻辑推理的产物,实际上,这是存在于最强大的成员国(苏联)权力欲望背后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不仅与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而且也得到了附属于苏联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其中都特别强调了苏联的领导地位。很显然,从各国对苏联超强地位的认可来看,如果需要在各个成员国之上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计划中心,那么处于最高层的只能是苏联政府。这个中心将编制"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计划",计划分解后便成为约束各个成员国的国内计划。

尽管曾经有过很强的推动力,但这一想法从未实现。严格的中央集权与下属机构的独立自主权是相互冲突的(当然,在任何情况下,独立自主都是相对的)。即使在斯大林处于绝对强权而东欧小国只有逆来顺受的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对外贸易和国际金融协议也仍然要通过政府间的谈判和协商过程方能最终达成。只有当所有国家彻底放弃国家独立地位和全部主权之后,官僚协调才能真正凌驾于相互分离的国家利益之上。如果没有做

---

① 经互会内部之间也经常会出现平等发展的问题,只是不那么公开而且相对平和而已。

到这一点(东欧国家实际上也从未做到),那么就不可能执行强制各国统一完成计划任务的严格纪律。[1]

对外贸易:数量与价格。表 14.1 和表 14.2 显示了对外贸易关系的分布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比例很高,而其中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也很高。除了上一部分所讨论过的原因之外,经互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利用组织力量一直在推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在每次会议和所有公开宣传中,经互会内部成员之间贸易比例的提高都被认为是成功的标志。[2]

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经互会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在那些官方仪式的背后,很少有实质内容。经互会最多不过是为成员国开展对外贸易提供了一个松散的框架,真正的基础仍然是各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协商。

对外贸易关系中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就是进出口交易价格。经互会曾试图制定统一的原则。首先经互会应该根据各成员国的平均成本来制定它自己的价格基础,但这一想法从未实现,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出口价格对成员国政府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13.4,14.4]。这样,经互会接受了一个妥协原则:尽管经互会内部成员在对外贸易中的价格不得不根据资本主义市场上的价格进行调整,但成员国应确保不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3] 这种在逻辑上就有问题的想法,使得经互会成员国很难根据外部世界的情况变化灵

---

① 在一些多民族国家,如苏联和中国就实现了这一点。经互会却从来没有能够通过简单的计划指令将波兰或匈牙利的资源分配给苏联或越南。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莫斯科通过计划指令的方式实现了爱沙尼亚与西伯利亚、格鲁吉亚与白俄罗斯之间的资源调配。

② 成员国的官方学术研究把所有的双边协议都归功于经互会的强大力量和经互会本身的作用。学者们完全有理由这么说,因为在经互会联合会议上,这些双边协议都是有约束力的,而且还包括了跨国企业之间的协议。

③ 这是 1958 年布加勒斯特价格原则之后的指导原则。该原则要求每五年(每个 5 年计划开始的时候)根据资本主义市场价格调整一次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价格。但在这五年之内,价格保持不变。

这项决定从未得到过全面执行,1973 年石油价格大幅度上升之后,这项决定更是难以为继。于是在 1975 年引入了所谓的"滑动"价格机制,即以 5 年平均价格为基础,每年根据平均移动原则进行相应的价格调整。这种滑动价格机制在经互会内部的石油贸易中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在其他很多领域仍然实行以前的价格调整办法,特别是小国之间。频繁的价格变动很难与贸易活动的官僚协调机制相配合。

活调整自己的贸易和生产活动,从而无法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变化或避开不利影响。

劳动分工与投资。尽管在官方宣传中一再许诺要促进经互会内部国际分工的发展,但现实中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在大部分地区,每个国家的生产结构仍是自成体系并得到了默认。部分产业领域也曾达成协议力图实现生产链条的分工与合作,但在多数情况下都被证明不具备经济上的可行性。尽管经互会一再宣布实行分工原则,但在许多领域里,各个国家自己都建立起各种平行设施,发挥着同样的功能。由于对合作开发项目始终心存疑虑,经互会成员国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合作投资和资本流动。[①]

国际金融业务。成员国之间货币自由兑换(至少是双边货币的自由兑换)的问题甚至在官方协商中都从未提及,而只是提出了一个非常有限的目标:逐步建立起一个制度框架,让卢布成为可转让货币。所谓转让实际上是指A国可以将与B国在双边贸易中所积累的剩余用于与C、D等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支付,例如,用于支付A国与C国之间的贸易赤字或A国与D国之间的贸易赤字。但出于种种原因,这种转让制度从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不仅没有一个制度框架,而且不少成员国的经济领导人都反对这种做法(见前一部分有关论述)。允许A国与B国在贸易中获得的可转让卢布用于与C国或D国的对外贸易交易,这种做法与一国之内的官僚协调原则会出现严重冲突。可转让的卢布最多能够成为一种贸易结算单位,但它不能作为国与国之间进行资源和产品分配与交换的真正工具。

既然在成员国内部都不能实现一种货币的自由兑换,那么又怎么能够期望建立起真正的货币自由兑换制度呢?!实际上,与国内的计划与控制过程一样,经互会成员国达成的国际协议基本上都采用物理单位(或者说用价值指针来表示贸易总量根本无法实现)。很难用货币和利润作为对外贸易的衡量单位。

下面进行一些简单小结。在前面章节中,我们介绍了社会主义体制在经济计划和管理控制等方面存在的僵化和不灵活的特征,通过本章前面部

---

① 许多成员国都曾强烈反对这种合作,认为以前为数不多的几个合作项目完工后发现,没有为相关国家带来任何好处。

分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管理方面同样存在这些问题。经互会的成立不仅没有缓解这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反而加重了这些问题。在面临任何决策时，不仅需要两个相关国家进行协商和谈判，有时还需要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双方达成的协议往往还需要得到经互会委员会的认可和同意。

这里有必要对比一下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融合所进行的努力。只要建立了自由市场，实现了产品、资本、劳动力和货币的自由流动，那么就可以实现不同国家经济体之间的超国界融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会把相关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欧洲共同市场所做到的那样。然而，经互会国家是不可能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的，因为每个成员国都是一个独立的官僚计划经济，价格和货币在成员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几乎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 第十五章　经典体制的凝聚力

前面部分已经基本完成了对经典体制的详细分析，这为我们总结相关结论提供了基础。本章的目标是要找出经典体制构成要素之间主要的规律性联系。

理论一词对于不同的科学哲学流派和实践科学家来说，都有不同的定义。我赞同以下观点：如果一个思想框架能够清楚地阐明和解释各种现存的、可观测的和连续的现象之间存在的主要关系，那么它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章力图在经典体制实证理论的主题范围之内总结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

需要加以补充的是，本章的理论阐释并不打算提供一个对经典体制所有问题都能够立刻给出明确解释的普遍适用的综合性理论。事实上，有许多理论方法都在解释经典体制的诸多复杂现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能与这些理论方法相互配合并互为补充。但作者相信，以第3—14章研究内容为基础构建起的理论框架一定能够对研究经典体制重要现象之间的一些关键联系有所帮助。

## 15.1　主要的因果联系

从前面关于经典体制的研究思路来看，尽管各种现象在许多方向上都是相互影响的，但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因果关系脉络。图15.1

刻画出了主要的因果关系链条，目的是想重点强调因果关系之间的关键指向，因此，有意忽略了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即反应）。

解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关键在于理解其政治结构。出发点是执政党的政治集权、党和国家的相互渗透以及对偏离或反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所有反对力量的镇压。如果要找出经典体制最显著的特征，可以说那就是一党专制体制（即使有一、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名义上存在其他政党并正式参加了所谓的联盟，也无法改变党的绝对统治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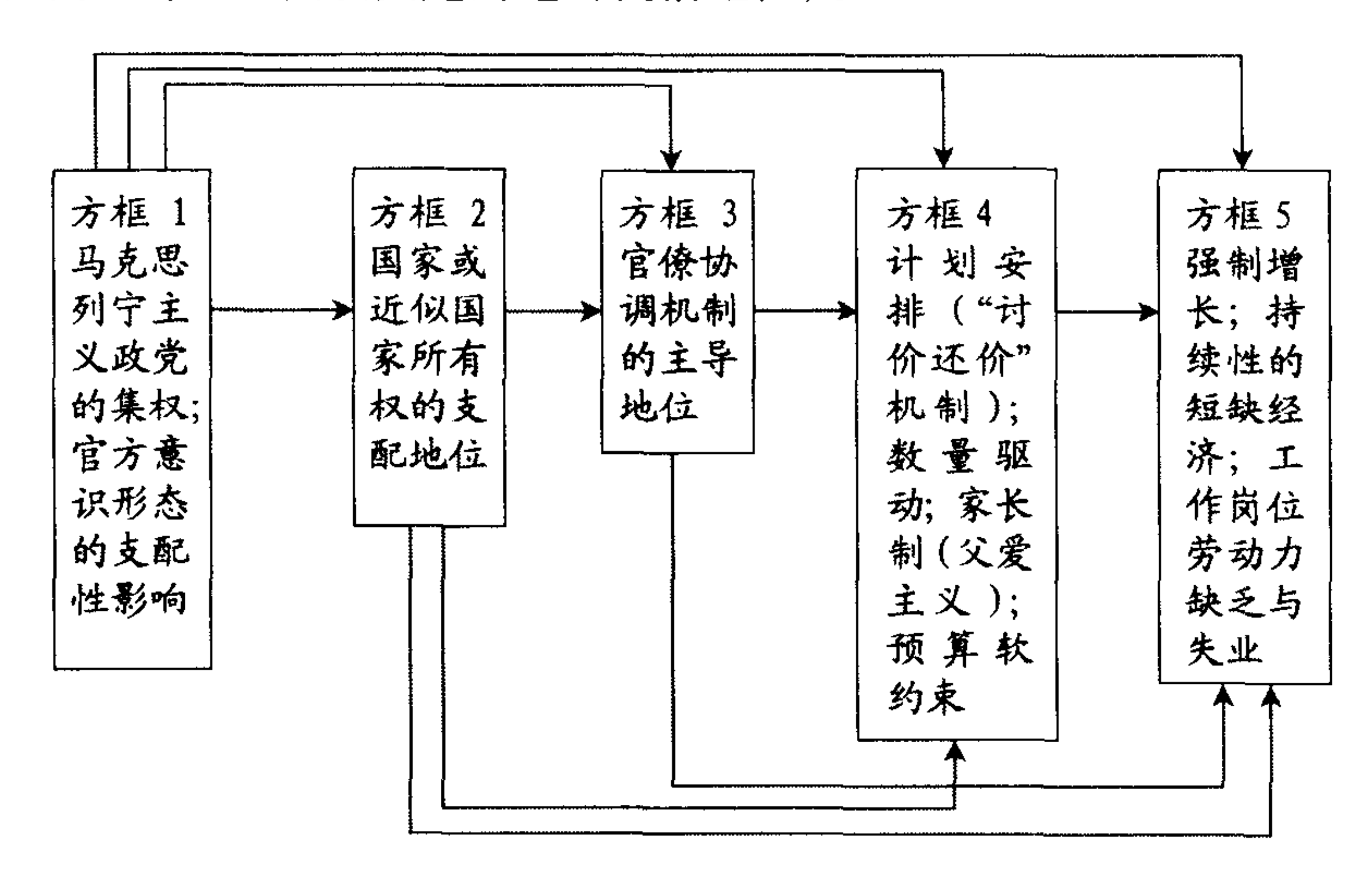



**图 15.1　主要的因果关系**

注释：本图按从左到右的顺序显示出了主要的因果链条关系。箭头方向所指的一组现象不仅受到前一组现象的影响，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所有更深层次因素的影响。例如，方框 5 中的一组现象（发展与生产的持续短缺）不仅仅是因为软预算约束和价格反应不敏感等问题，而且还直接受到国家所有制和官僚协调支配性地位的影响。

方框 4 和方框 5 中的省略号是指本方框只是列出了部分现象。本书中所讨论的其他许多现象都可以根据图中所示的逻辑关系放在相应的方框里。

并非所有的一党体制都会导致建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掌握权力的执政党深受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但我们在第四章介绍官方意识形态时，曾指出它只是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

部分重合。官方意识形态的大部分内容都取自马克思和列宁,所有增加的部分往往也都打着马列主义思想的旗号。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诸多其他现象都源于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集权统治。我们在第四章结束时曾指出:共产党在组织和意识形态上的区分只适用于理论分析。事实上,组织和意识形态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真实存在物,就像身体和灵魂一样,须臾不可分离。因此,我们把这两个现象列入了方框1,处于因果关系链条的最左端。

在经典体制下,或者是国家所有制(包括近似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或者至少在关键领域,即整个经济的制高点应该由国家所有制占据支配地位。

将产权放在因果关系链条的第二位,引起了人们的争论。有人觉得应该将它和政治结构并列,也有观点认为,国家所有制的绝对支配地位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主要的特征。① 这个问题并非只是一个推测性的问题,它完全能够依据历史经验进行分析。如果共产党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获得了绝对的集中权力(如中国和越南),它或早或晚都要开始实施国有化政策并会将之贯彻到底。至于国有化采取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时候暂时停止、什么时候又重新开始,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组织上的困难,以及党的耐心程度。在有些国家,甚至连理发店和乡村店铺也被迅速国有化,而在另一些国家则被当成小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体制共存了一段时间。但掌权者对这类资产阶级的东西只是暂时容忍,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推进国有化。当完成了银行、工业和交通业的国有化之后,当局迟早要开始着手消灭农村的私人所有权。事实上,党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就已经公开宣称要实现这一目标,现在不过是将它的政治计划付诸实践而已。

因此,并不是产权形式即国家所有制,构建起了自己在经典体制下的政

---

① 在争论这些问题时,通常会出现一种趋势,混淆实证(描述性和解释性的)方法与规范方法之间的区别。有些思想流派往往从以下的规范性论证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和剥削。因此,国家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就仿佛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制度最主要的特征。

请注意,本书所关注的正是那些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组国家[表1.1]。按照本书的定义,哪个因素发挥了首要作用,哪个处于次要地位,以及更次要的地位等问题已经属于实证因果分析的范畴。

治结构。情况恰恰相反,是既定的政治结构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起了这种产权形式。就这一点而言,尽管意识形态也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仅仅用意识形态这一个因素还不足以解释因果关系链条的指向。权力集中以及与之相伴的极权主义统治与私人所有权所要求的自治是水火不容的。只有进一步彻底消灭私人所有权,才能不断强制实行"全面臣服"的政策。

迄今为止所讨论的这三类现象——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特有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以及产权形式结合在一起引出了图中下一层(方框3)所列出的现象:经典体制的协调机制。官僚协调在经典体制的协调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其他所有的协调机制最多只是发挥着支持作用,甚至完全萎缩,这是本书经过论证后得出的最为关键的结论之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不能从它不是市场经济这一点中导出,更不能通过价格非理性这一简单事实来说明。只要建立起了经典体制的政治结构、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以及国家所有制的支配地位,它们必然导致官僚控制机制主导整个社会经济生活。

官僚协调的具体形式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对完成计划指示的奖励会出现在不同领域;在有些国家里,某些部门是合并在一起的,而在另外一些国家里,则是分开的。政府官员和职业经济学家对不同的官僚协调机制也会有激烈的争论。但一些关键因素是始终不变的:取消自由企业和市场上的自发机制;不允许企业之间的竞争;决策制定和决策形成的集中制;等级体制的支配地位;纵向联系高于横向联系。

这就将我们引向了方框4,其中包括了经典体制中的利益和动机因素,由此带来的行为特征,以及这些现象之间的重要联系。[①] 在方框中只是以标签的形式列出了部分现象,而且也没打算给出全部名单:计划安排("讨价还价")、数量驱动、领导者的家长式作风、预算软约束、价格反应不敏感等等。其中的任何一种现象都可以分别用前面更基本的因素如权力的本质、官方意识形态、国家所有制和官僚协调机制的支配地位来进行解释。

---

① 有些研究者将我在著作中所采用的这种方法称为"行为主义",但这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描述。尽管许多现象都可以用参与者的行为来解释,但对行为本身也要进行因果分析。图15.1的结构就反映出了这一点:行为特征位于因果关系链条的中间位置,前面有更基本的解释性因素,后面是可以直接观测到的经济现象。

方框5列出了一系列持续存在的典型经济现象，其中只包括了部分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强制性增长、劳动力短缺、失业、持续性的短缺经济以及对外贸易在体制所发挥的作用等等。这些经济现象的主要特征都可以追溯到那些处于更深逻辑层次的解释性因素。并不是短缺才导致了庞大而全能的官僚体系；并不是因为确定了强制增长目标才会有无所不包的严密计划；并不是因为出现了进口饥渴才建立了进口审批制度。尽管上述现象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在下一部分里，我们再详细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但其中的因果关系却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有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结构和官方意识形态，才出现了特定的产权形式，这种产权形式又必然使得官僚协调机制处于主导地位，同时也导致了参与者典型的行为方式，最终便自然引出了方框5列出和未列出的各种经济现象。

这一论证思路中的一部分内容，对于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研究者而言，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但也有一部分论证与这些研究者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思想又截然不同。他/她或许会很熟悉以下研究方式：将现象分为“更深层次的”和“表面的”；在诸多相互作用的现象中找出主要的因果关系方向。① 他们也非常熟悉并接受用社会集团的利益动机和社会地位来解释该集团的行为特征，但却不愿意引入个人偏好。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接近的研究方式是逻辑分析（什么是主要的因果关系）与历史方法（发生重大事件的历史时期具有什么样的秩序特征）相结合。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培养起来的经济学家或许会发现，这里的研究思路并不符合他们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常用逻辑套路。不管人们认为“基础”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都不能认为基础决定了它自己的上层建筑。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几乎都是贫穷和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很少有大型工厂，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也非常低。很显然，它们都还没有达到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这一阶段，或者说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使生产力得到发展。更不用说高度组织化的集中生产体系已经发育成熟，完全可以采用

---

① 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生活在新古典模式里的经济学家的重要区别之一。对于擅长新古典模式分析的经济学家来说，他/她先是有各种假设条件（其中或许有“更深层次”的假设，或许有“表面”的假设，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然后建立模式，最后通过模式得出结论。

中央计划方式，只等着把资本家赶出历史舞台，然后让位于社会主义计划人员。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说法，这些国家完全处于落后状态，恰恰需要资本主义来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经典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哲学史手册中所阐述的模式。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摧毁了原有的上层建筑，人为地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体制，或者更准确地说，革命播下了新的上层建筑的种子，它将按照自己的轨迹破土而生。新的上层建筑将一切与自己不一致的基础统统打碎，然后根据自己的意愿全部重新安排：进行国有化和集体化；逐步消灭私人所有权，将市场挤入越来越狭小的空间。负责经济控制的官僚部门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并遍布各个领域。在这一过程中，产权关系、协调机制和经济秩序都要按照新体制的要求加以改变，这些变化与政治形式不断产生相互影响，并带来了意识形态上的相应变化。

## 15.2　体制各种因素之间的"亲和力"

本章在讨论主要的因果关系链条时，将一再提及现实结果对原因的反作用：体制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前面章节中已经介绍了许多类似的例子，下面仅稍作回顾：

◆ 一旦国家所有制和软预算约束导致了投资饥渴、进口饥渴、囤积倾向以及工资提升趋势，那就只能采取行政措施来加以控制：投资和进口审批、生产数据配额、配给和分配体制以及工资基金。一旦采取这些行政手段，单单依靠口头表扬和物质奖励是不足以维持经济纪律的。必须对那些"投机分子"和"诈骗工资的人"实行严厉的制裁和惩罚。这就对政治气候和官方意识形态产生了影响。（方框4、5作用于方框3、1）

◆ 对国有部门工资的行政控制要求压制工资上涨压力，即使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也必须如此。但这样一来，国有部门的低工资就根本无法与在国有部门之外市场上获得的高工资相比。考虑到这一因素和其他原因，必然要求彻底取消私人部门。（方框3、4、5作用于方框2）

◆ 一旦经济走上了强制增长之路，如何对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性和优势做出解释必然要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中反映出来。（方框5

作用于方框1)

◆ 如果由于国内销售市场方面的问题和其他原因,导致生产管理者没有很强的动机去占领国外硬通货市场,那么就必须建立起某种机制和激励体系强制他们生产出口产品。(方框5作用于方框3)

当经典体制稳固下来之后,各种因素就会发展凝结为一个统一体。不同的行为方式、惯例和规范之间相互影响。借用一个化学术语来说,现象之间表现出了亲和力:它们相互吸引,彼此需要对方的支持。铁板一块的权力结构、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国家所有权的绝对支配地位、直接的官僚控制、强制增长、短缺、因为不信任而与外部世界隔绝,只和具有同样性质的国家紧紧连在一起,相互支持。这些现象并非是松散孤立的,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内在整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这构成一个体系(体制)。

这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自然选择"现象:新的制度、新的管制、新的习惯、新的道德和法律规范都轻易融入了新体制并生根发芽,而其他与新体制不相符的东西则统统被抛弃。① 让我们举个例子,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前,没有人事先计划过要对人事安排——任命、工作调动和解雇进行严格的集中管理。在从前的社会主义蓝图中,也几乎找不到以下思想的蛛丝马迹:建立一种官僚体制,其中任何层次上的人事决策都要取决于相关的党组织,取决于跟踪人们政治态度的警察机构,取决于上级人事管理人员,或者取决于国家行政机关、经济部门或群众运动等相关领域领导人的意志。这一具有各种严密职业控制形式、权力巨大的组织体系也是通过不断地尝试和重组,逐步发展演化出来的。它首先扎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然后又以类似的形式扩展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社会体制像社会主义那样通过统一集中的人事管理机构牢牢控制了人们的职业生涯。可以这么说,这种特殊的形式和组织完全是在体制内自发成长起来的。

上述趋势的兴起和发展显示出了一种强烈的自我完善倾向。例如,当官僚控制占据绝对支配地位之后,它就要发布经济任务指示[7]。但一旦有权对企业的主要任务和各项总体指针下达命令时,官僚机构就再也收不住手。企

① 关于制度自然选择的思想可参见熊彼特和哈耶克的著作。更详细的阐述,可参见A. A. Alchian(阿尔钦)的文章(1950)。

业可以轻易对付这种官僚控制:完成主要任务,但具体细节和其他次要任务则可以不管。从逻辑上来说,下一步便是将每一项任务都具体细化,如果这样还不起作用,还可以把下级人员进一步分解,各自负责更小部门的工作。如果极权统治及其统治工具(官僚控制)所编制的网络过于庞大,那么很多行动都可能轻易逃脱。答案就只能是编制一个更小的控制网络,使之密不透风。社会主义体制的内在逻辑要求官僚权力必须不断趋向"完美"。

构建社会主义体制的积极选择伴随着相应的否定选择。对于经典社会主义来说,私人所有权和私人企业在长期内是不能容忍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集权式国家秩序不但会被大规模的资本所破坏,还会遭到小规模农民私人所有权的侵蚀。中央集权迟早会彻底消灭私人所有权,具体时间则取决于它的容忍程度。苏联在等待了十多年之后才开始发动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而越南在取得军事胜利几年之后,甚至连战争给国家造成的经济创伤尚未得以修复,当局就开始着手消灭私人农庄和其他私人生产与贸易部门,然后就是国有化和集体化,由此造成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埃塞俄比亚政府在一次大灾荒期间展开了对农业部门的社会主义重组,彻底取消了农村人口,并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将他们全部迁移。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私有产权并不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唯一不能容忍的东西,社会主义容不下任何与其体制不相符的制度、惯例、态度和规范。发育成熟的经典体制不能容忍政治上的反对意见、自治机构、独立于上级政治机关的其他组织、不同于官方宣传的文化和世界观以及独立经济实体之间的自由市场交易。当然,经典体制所反对的这些现象还会反复出现,但范围越来越有限。个人行为完全被形式主义所内化:没有了自觉运用思想的能力,企业家精神彻底泯灭,对上级组织唯唯诺诺,根本不可能提出有独立见解的批评意见,更不用说反抗了。[1]

下面对社会主义体制构建过程中的积极选择与否定选择的共同经验进行一下总结:那就是制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然选择,并且会不断进行自我加

---

① 当然也存在着与这些行为相反的活动。即使是在极权统治最为残酷的年代里,已经被限制在极为狭窄领域之内的个人自主权还是遍布于生活的各个层面。企业家精神只是处于蛰伏状态(不时也会以扭曲的形式爆发出来)。还是有人(哪怕是几个人)会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压迫。而当整个社会环境为这些活动提供了更宽松的发展机会时,它们都会即刻变得强大无比。

强，最终凝结为社会主义体制的内在统一性。

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脑海里，社会主义革命在取得胜利之后的过渡期内还会存在一些资本主义的“残余物”。马克思这样说到：“我们所要建设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恰恰相反，它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各个方面，无论是在经济上，道德上，还是在知识上，共产主义社会都仍然带有旧社会的胎记，旧社会是孕育它的子宫。”①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是社会主义。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进了经典社会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之中。资本主义的残余物在过渡期内确实带来了很多问题，因此，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共产主义体制的全部优越性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但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诸多现象和内部矛盾并不是资本主义的遗产，而是恰恰相反，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独有特征引发了自己的问题。

## 15.3 (体制)原型与国家变体

鉴于上文所述，可能会有读者认为本书似乎也赞同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或历史天命论，事实并非如此。这里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特定历史路径的偏离；二是路径自我决定的范围大小。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某个社会是否会走上经典社会主义之路取决于当时诸多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正如前一部分所提到的，共产党必须在获得了绝对的政治统治权力之后，才能够为建立社会主义体制开辟道路。这一历史构建过程就像是携带着一组“基因计划”，它会将体制的主要特征传递给体制内的每一个细胞。② 新社会播下的种子将发育成长为一个完整的生物体。

---

① 卡尔·马克思[1875](1966年，第563页)。

② 这一模拟受到了现代生物学基因理论的启发。根据基因理论，遗传特征是由一种叫做DNA的物质负责传递的，DNA的分子具有控制自我繁殖的能力。它能够在控制别的分子的形成过程中传递遗传特征。遗传基因计划是用一种特殊的DNA化学“语言”进行编码的，这种基因计划将在生物体的所有单细胞体内进行复制。在生物体的发育生长过程中，所有的生物化学特征、解剖结构特征、生理特征，甚至是某些行为特征都取决于隐藏在DNA内部的基因计划所发出的命令。在生物世界里，每一类物种都有自己的DNA。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J. D. Watson的名著(1968)。这里的简单描述基本引自N. A. Campell的大学生物学教科书(1987)。

这种分析方法与人们通常表达的观点多有抵触,一般都认为经典体制的每一项基本特征都是人为强加于社会之上的,而社会始终在抵抗这种强制行为。按照这种肤浅的看法,不过是残忍的独裁者及其后任通过恐吓和暴力手段将他们的统治强加到人民头上而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社会完全可以轻易地将外部压迫阶层彻底摧毁,但这却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反抗行动虽然时强时弱,但从未停止过,而且掌权者每次都使用武力进行了残酷镇压。但新的体制结构是靠着自己的基本要素不断繁殖并复制自身,从而侵入了社会关系的所有领域。[①] 一旦强加于社会的体制构建过程开始启动,它将以一种自发的方式向前迈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自动生根发芽"。如果在某一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起始条件类似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基因计划",那么其结果将完全不同。请想一想南北朝鲜,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经济状况几乎没有差别。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韩国和朝鲜不仅经济起点相同,而且在政治和行政结构方面也相差无几:残酷的独裁统治,不允许有任何反对派;国家官僚机构在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外贸、投资和信贷都要插手干预。但两国之间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韩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与朝鲜截然不同;韩国的集权统治集团不仅无意消灭私人产权,而且愿意与之合作,帮助它更好发展。尽管官僚协调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它不仅没有取消市场,反而让市场充满活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最终具备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所有关键特征,而韩国在经历了若干年的流血牺牲之后,终于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之后,韩国逐步走上了日本式的发展道路,其未来成就与后来的朝鲜可谓天壤之别。

我们再转回到开头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路径自我决定的范围。如果在某些国家里,当共产党的权力稳固之后,社会将偏离其原先的历史发展轨迹并按照自己的"基因计划"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根据本书的理论,它们将来肯定会表现出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

---

① 匈牙利诗人 Gyula Illyes 曾在他的诗《暴君之歌》中生动有力地描写了这一现象:"你是一个囚犯,同时你也是狱卒…… 奴隶亲手打造了镣铐并自己带上…… 暴君到底在哪儿,所有人都被镣铐锁在一起;肮脏腐朽之气同样发自你的身体,因为你也是暴君。"Illyes[1950](1986年,第380—388页),1956年第1版。

的国家迟早会走进社会主义大家庭。当捷克斯洛伐克在1945年之后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人心存疑虑;卡斯特罗在古巴执政之初,人们对这个国家究竟会走向何方也有争论,但到今天,这两个国家显然都变成了"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和"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

尽管本书在第3—14章里探讨了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共同特征,但其中必然会存在偏差,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很多自己的独特之处。仍然可以用生物—基因学来做个模拟:即使是拥有同一父母的单卵双生体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转回到我们的主题来说,有许多因素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特定结构及其内部经济问题:地理和自然条件,新掌权者所采取的政治路线,领袖的个人质量,外国针对本国的政策和行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事件,如此等等。如果认为有了特定的"基因计划",即共产党掌权,那么一切都已注定,历史将从此"安然上路",这种想法是绝对不正确的。就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而言,社会主义"基因计划"的实施力度以及本书所指出的各种趋势的特定组合都会有很大变化。虽然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每个国家在各个时期都曾有过镇压行动,但有些国家可能会采取极为残酷的手段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而在有些国家或有些时期,镇压会相对平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了指令经济,但有的国家过于教条,太注重细节问题;有的国家则懒懒散散,三心二意。到处都会经常出现短缺现象,但食品短缺在有的国家是无法忍受的,而在有的国家,人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

本书描述了社会主义体制的趋向。一种趋向可能会盛行起来,也可能会遇到某种程度的反抗。某些互为补充的趋势的真实组合会受到不同政策选择的影响。例如,经典体制都趋向于强制增长。领导层推进强制增长的力度越大,公众供给的问题就越严重,由此引发的反抗就需要进行更残酷的镇压。如果领导层能够适当控制扩张动力和投资饥渴(某些国家在特定时期出现的情况),那么它就可能放松政治压迫和思想限制。因此,尽管范围和程度有限,但也有"回旋的余地"。

这里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前文提到过的一个观点[1.6,2.2]:本书是在描述一个理论模型,介绍社会主义体制的原型,这并不能代替针对具体国家的历史分析。这类工作将留给其他研究者。本书作者的目的仅仅是想清晰阐明决策选择始终要受到哪些限制,或者更准确地说,哪些限制是来自"基因

计划”,来自社会主义体制的共同特征。

一些社会主义经济的观察家和批评者时常会问道,为什么社会主义不能引入更好的信息体系和激励机制？他们认为完全可以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委托—代理”模型。[1] 如果委托人的目标非常清楚,那么就可以设计出一套为该目标服务的最优激励机制,这样整个体制就能够更好地运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一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在暗示委托人都很愚蠢,他们没能事先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信息体系和激励机制。

本书在一开始就没有去研究领导层的“目标”是什么,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目标本身很难观测。从公众决议和政治讲话中,我们很难发现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些东西不过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了解领导层“真实”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在那里意图(以及对最初意图的修正)已经内化于行动之中。此外,也没有什么集体目标,因为领导层内部就存在着各种冲突。

所有控制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人,从位于官僚体制金字塔顶端的领导到最基层的普通干部,没有一个是傻子。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目标方面,他们不逊于任何人。社会主义体制之所以这样演进,恰恰是因为这种结构很好地完成了它的功能使命。如果认为引入新思想对社会主义进行重组之后就能够改变其主要体制特征,这未免太天真了。

另外一种研究方法则集中关注于极端事例。坚持这种研究方法的人都是社会主义的坚定反对者,他们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所谓最大的敌人、无法无天的全民恐怖统治或极大的浪费等问题上来,认为这些极端事例最有效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一些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也采用了同样的研究方法,他们也乐于探讨这些反面的极端事例,因为他们希望通过抑制这些“极端”或“过度”行为来解决问题。而我力图尝试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着重点

---

① 本书作者主要是通过西方的理论经济学家了解到这一观点的,他们并不熟悉社会主义,但对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却都很感兴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的研究人员也常常有类似的想法。由于一直在西方世界长大,他们立刻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甚至开始出谋划策。事实上,这个想法很早就已经出现在苏联数理经济学家们的头脑中:他们曾费劲心思,想为当时在任的领导人编制出一个“最优的经济体制”。关于这一学派的情况介绍,可参见 M. Ellman(1973)和 P. Sutela(1984)。

是体制的一般规律、典型特征和正常状态。换句话说,是随机波动的可能平均值。尽管这种研究方法可能无法让读者心潮澎湃,但我希望它可以使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在围绕改革以及"摆脱斯大林模式"的讨论中,人们经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年能否避免斯大林式的恐怖统治?为了让社会主义体制得以生存,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斯大林统治造成的巨大牺牲)是否值得?对于这些问题引发的学术争论和道德争论,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我本人却不想回答这类问题。本书所描述的理论模型并不必然导出斯大林式的恐怖统治,但也不排除会出现这种极端事例。本书的社会主义原型分析基本是按照以下思路进行的:在给定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和财产(权)关系之后,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或者说,至少具有哪些趋势或趋向?所谓的"基因计划"(特定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是引发上述趋势或趋向的充分必要条件吗?我认为这一系列问题比本段开头所提出的关于"极端情况"是否必要或能否避免等问题在逻辑上更为严密。

## 15.4 苏联的影响

共产党首先是在沙皇俄国取得了政权,这一历史偶然事件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结构和主要特征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如果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是发轫于另外一个国家,那么社会主义体制又会呈现出怎样一番景象呢?

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想要指出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所具有的特点与俄国的历史传统有怎样的联系?克格勃继承了沙皇秘密警察的一贯做法;严酷无情的党委几乎就是旧时俄国统治官僚的后裔;荒凉的集体农庄以及逆来顺受的农庄农民仍然会使人想起过去俄国农夫的悲惨生活。这种状况同样适用于苏联以外的国家。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即使社会主义不出现在这些落后和处于半文明状态的亚洲国家,它也会在其他国家生根发芽。

然而历史却无法倒退。我们不可能做这样一个实验:如果共产党的极权统治首先不是发生在苏联,而是出现在其他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建立起的新的社会主义体制会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可历史就是选择了苏联。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人能够完整回答本部分开头提出的问题。当

然,在本书的论证过程中,还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假设性答案:

1. 如果考虑到共产党夺取政权时所处的环境条件,人们可以认为革命应该首先在苏联爆发。但事实上,所有主要依靠内部力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处于落后和贫穷状态,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在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之前,这些国家都是实行残酷统治的政体,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极为严重[2.3]。作为先驱者,俄国的自身特点可能在社会主义体制特征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所有国家在革命前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见表2.1)可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它们之中很少有国家建立了真正的议会民主制度,具有了成熟的资本主义体系,并让市场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协调机制。所有国家都是"后来者"。[①] 这些体制前的共同特征必然会对以下现象产生影响:政治结构(彻底消灭民主体制)、为摆脱落后采取强制增长模式、进行极端形式的收入再分配以及其他许多体制特征。这种类型的社会很容易接受将孕育出社会主义体制的"基因计划"。[②]

2. 苏联的模式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特征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官方意识形态、机构和行为规范)。

部分原因是苏联采取了各种手段向其他国家强制推行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军事占领期间,苏联动用军队向所有东欧国家都施加了巨大压力。如果当地人民起来反抗社会主义体制,例如1953年在德国,1956年在布达佩斯,1968年在布拉格,苏联军队都曾采取军事手段镇压并扑灭这些运动。此外,由于担心苏联的军事威胁,其他国家也不得不向苏联"学习"。

除了直接干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苏联及苏联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的紧密联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莫斯科就通过"火与剑"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当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那些曾流亡苏联的领导人就会返回自己的国家并继续受到莫斯科的控制,这些人自然而然就把苏联的做法移植到了本国。苏联顾问们也发挥了重大影响,其

① 见A. Gerschenkron(1962)。

②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一点特别重要:社会主义阵营所出现的危机和社会主义体制内部许多国家之间的分裂并没有彻底结束这种革命倾向。东欧、苏联的共产党常常被拉丁美洲的游击队称为"叛徒",因为这些游击队要为结束他们自己社会中的极端不平等现象战斗到底。他们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夺取政权,从而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体制。

中还包括那些在苏联完成学业的无数本国政治家、军官和经济专家。

自发的热情也加强了这种“强制性模仿”并使之更为有效。最后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一直把苏联当作人类进步的楷模。他们真诚地相信,越是更精确地复制苏联模式,他们就能够更快地进入自己所热切盼望的社会主义社会。

上述原因解释了为什么可以把所有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都看成是苏联模式的跟随者。它们不仅在体制的主要特征上以苏联为师,而且在一些具体的外在形式上(如国徽的设计、军人的服装,一直到企业的管理结构)都模仿苏联。

3. 尽管苏联的影响非常强大,但发挥更大影响力的还是经典体制的内在逻辑。本书在 **15.2** 部分介绍了机构和运行机制的自然选择过程,这最终使社会主义体制凝聚成了一个连贯统一的整体。一旦“基因计划”开始实施(正如苏联影响和内部力量的相互结合),体制内相互关联的各种特征会不断发展并最终融为一体。例如,并不是苏联的短缺经济带来了东德或蒙古的短缺现象,这是体制的内在特征所致。各国都建立了秘密警察制度,利用告密网络将任何反抗迹象消灭在萌芽状态,但这并不能主要归功于苏联安全委员会的顾问们。秘密警察组织是体制的内在需要,因为不进行恐吓,不坚决镇压,不限制公民自由,这个体制根本无法生存。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苏联影响的强弱是各国社会主义体制有所不同的原因之一。但塑造社会主义原型的并不是苏联的影响,而是更多深层次因素的共同作用,即本章在 **15.1** 部分描绘的因果关系链条。

## 15.5 证　　明

前面部分包含了以下几个观点:

1.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区别于其他社会体制的是它所具有的几个基本特征;这些特征都与特定的体制有关。

2. 社会主义各种特定的体制现象之间具有特定的因果关系:在相互关联的复杂影响内部有一个因果关系的主线。

3. 社会主义体制诞生和发展具有某些充分必要条件。“基因计划”的种子是特定的政治结构和与之相连的意识形态:共产党的集权统治和无所不

在的官方意识形态（其核心观念包括建立霸权、公有制占据支配地位）。

4.“基因计划”将根据自己的模式重塑整个社会，它创造出了一个连贯统一的体系，其中各个要素相互关联、相互支持并相互加强。

从一方面来看，这一理论具有演绎推理的特征。最初的基本假设和中间性结论是进行下一步分析研究的前提。因此，完全可以对这种思考论证过程的内在逻辑提出质疑：分析中是否包括了相互矛盾的假设？在逻辑推理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从另一方面看，这一理论又具有某种实证分析的特征，它力图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现实出发来观察各种现象。因此，需要特别关注理论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

本书在研究阐述的过程中一再强调，我们希望给出一个理论模型框架，尽管历史现实总会与理论描述有所偏离，但基本没有脱离这一模型框架所涵盖的范围。因此，即使某一个国家的情况与理论描述并不完全一致，或者历史事件与模型假设有所不同，这一理论并不会被证伪。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本书是一项理论研究呢，还是仅仅是在定义概念（“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哪一个是既不能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的？

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认同科学实证理论的标准，[①]特别是这样一个标准：理论必须能够被证伪。定义和论证不能是结论上的同义反复，因为这样就排除了以某些方式证伪结论的可能。

就本书而言，理论必须要面对许多国家长期的历史现实和经验现象。完全可以（或需要）利用数学—逻辑模型来证明或推翻这一理论。可以利用基于经济统计数据的数学—逻辑分析对部分理论进行经济计量检验。[②] 但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必须得到历史事实的检验。历史（以及研究历史的人）能够回答以下问题：

---

① 见卡尔·波普（1959）。

② 即便是统计检验证伪了部分结论，我们还是需要考察一下现象与理论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是兼容的。如果有必要，就必须进行修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局部现象的统计检验是支持或反驳更一般的理论假设的一个重要工具。

这一过程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非常普遍。有些最基本的理论是无法直接通过实验来证实的。但还是可以对一些从基本理论演绎出来的逻辑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如果检验证实了这些假设，那么就可以成为支持基本理论的间接实证检验。

1. 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它并没有表现出本书在第2部分所介绍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主要特征?

前面章节中曾经提过,本书主要参考了九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1.2]。如果能够了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社会主义体制已经长期稳定下来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蒙古、越南、朝鲜和古巴,那么可能会更有助于说明问题。这些国家所发生的情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实本书第3—15章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呢?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很少能得到这五个国家的可靠资料和相关信息。现在,阿尔巴尼亚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蒙古和越南正在进行改革。相信,在此之后我们就能够得到有关这些国家的更多资料和经验信息。

这里需要再次提醒读者的是,我在很多地方都提到本书只是介绍了基本的趋势和倾向,而不是描述这些趋势和倾向在实际中全面发展的详细情形。例如,波兰没有实现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但这并不能证伪第5章所得出的结论,因为波兰政治领导人一直试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推动农业集体化。

2.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历程提供了最重要的检验机会。图15.1方框1所包含的"基因计划"是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许多社会主义在进行改革时,主要是针对方框2、3、4中的有关内容,但仍然继续维持着方框1中的主要特征。权力结构还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但已经潜伏着深刻的变革。改革过程中的各种限制、内在矛盾、前进过程中遭遇的失败,以及不断出现重回经典体制的倾向,这些都是理论描述的主要间接证据。如果整个体制能够在方框2、3、4内发展出与经典体制完全不同的全新特征,而且在不改变方框1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以一种修正后的体制模式继续生存并顺利成长,那么就会构成对理论的严重挑战,或者说能够将理论完全证伪。

本书提出了一个革命理论。用图15.1来解释,那就是如果方框3、4、5发生了深刻、持久和有效的经济变革,必然要求方框1、2进行彻底变革,即政治结构和产权关系的革命。

在本书问世的时候我仍然坚信,迄今为止的经验证据还无法反驳1—4点中所总结的基本论点。本书在后半部分基本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某几个国家开始偏离社会主义体制的经典模式,然后进入改革阶段,最后就是革

命。后面的这些分析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理论观点，当然，最终能够证实或证伪理论的只能是未来的历史进程以及对此进程所进行的科学分析。

## 15.6　经典体制的生命力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能够永远长期存在下去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时间尺度，以及如何定义“长期”这个概念。

下一章将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典体制的持续情况进行一个概述。经典社会主义阶段最终还是结束了，改革进程开始了或者说更深刻的体制变革出现了。经典体制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是苏联，60 年左右。

现在，只有两个国家仍然处于经典体制阶段——朝鲜和古巴。截止到本书写作的时间，我们唯一能够回答的是，经典体制在这两个国家运行了 30—40 年左右。我并不打算预测这两个国家的未来命运，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周围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所有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最强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都已经走出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

即使我们可以克制住自己不对这些国家做任何预言，但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用世纪作为时间标尺来衡量人类历史，那么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只是昙花一现。比起那些经历了多少个世纪沧桑仍然屹立于世的社会经济体制而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生命非常短暂。

除了用世纪作为衡量人类历史的时间标尺之外，还可以用相对较短的时间标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从诞生到死去大约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生几十年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经典体制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力。从第 3—15 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经典体制正常发挥了维持生存的基本功能，即有效控制了社会活动：它组织起了生产，从而为公众提供了生活所必须的商品和服务；它以自己的方式维持着协调社会活动以及人与人共同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秩序；它找到了一种法律和道德体系使人们还不至于迷失生活的方向和意义。此外，它也得到了部分社会成员的支持，至少这些人认为支持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对他们有利。体制内的各个构成要素也都能够相互支撑，融为一体。在某些情况下，它不仅能够在现有水平上复制自身，而且还可以

不断扩张、成长和发展。它聚集了庞大的武装力量,完全可以防御军事攻击。尽管整个体制充满了矛盾和内部冲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无法威胁到它的生存。

上面这段话没有包含任何价值判断。让我们再回到本书开头的那个模拟,可以为经典体制编制一个“成绩单”,然后依据各种内在价值为它的表现打分[1.7]。在一系列最重要的人类普遍价值领域,如物质福利、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维护个人自由、平等和社会稳定,我们在分析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时,对这些内容都进行了讨论。很显然,在与资本主义体制的竞争中,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很多科目上都没有获得优秀,例如平等和稳定。此外,在其他一些基本的价值领域,如福利、效率和自由等方面,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所获得的分数远远低于民主政治体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然,这只是对实证分析的一项补充。至于体制内部的公众如何评价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部分社会成员喜欢现行体制是因为他们自己分享了权力和利益,并赞成官方意识形态;有些社会成员有所不满,但他们无法对体制的表现做出恰当的评价,因为没有其他体制可以作为参照;还有其他一些社会成员对该体制深恶痛绝,但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一旦公众的不满不断增加,当权者就采取镇压手段来维护体制的生存。

这又回到了前面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只要能够压制住不满,经典体制就可以生存下去。如果用十年作为时间标尺来衡量经典体制(而不是以世纪作为时间标尺),那么至少看起来它仍然具有坚韧持久的生命力。

但必须加以补充的是,确保经典体制能够生存下去也决非易事。一些内在矛盾不断恶化。在与资本主义竞争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体制在很多领域都败下阵来,而且差距持续扩大。所有这些都为开始进行体制变革提供了动力和支持,这也将我们引入了第三部分的主题:经典体制的腐化与危机、改革、革命。

# 第三部分

## 偏离经典体制





# 第十六章 动态变迁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环环相扣的特征既是其优点，也是其弱点。我们甚至可以夸张地说，社会主义体制就像一件缝制得密密麻麻的针织物，只要一根丝线断了，那么整件织物就会全部散落。

在20世纪80、90年代，世界见证了这件“针织物”的解体。除了极少数地方外，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终结已经来临，而且许多国家的变革已经走得更远，因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彻底失败。本书16—24章将回顾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解体过程，并予以评论。作为开头，本章将分析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逐步走向解体的原因并描述其动态的发展过程。

## 16.1 变迁的起因

那些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要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正是因为原有体制所带来的不断累积的紧张和矛盾。[①] 第15章强调了由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具有环环相扣的特征，因此能在一定期间内运转。但就逻辑

① 关于导致改革或者说社会主义体制灭亡的内在紧张的全面分析请查阅联合经济委员会(美国国会)1989年出版的合订本，或者参看T. G. Ash (1990)、Z. Brzezinski (1990)、E. Hankiss (1990)以及J. Staniszkis(1989,1991)。

和经验角度而言,下面的说法也同样成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始终被内部问题所困扰,从而无法有效运转。这些问题在前面已经一一详细讨论,在此只是做简单提示。各种消极因素最终可以归纳为四个原因迫使社会主义体制最终发生变迁。虽然特定的问题或矛盾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在程度上会有区别,但是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所有国家,都是因为这些病症而陷入困境。

其一,日积月累的经济困难。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自始至终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问题:技术发展严重滞后、短缺、消费水平低下、资源浪费和其他损失等等。但与此同时,经济却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因而社会主义体制的拥护者相信,那些问题只是快速发展不可避免的代价。不过,增长速度逐渐放缓(见表9.11),①前面所说的经济发展问题日趋严重。强制增长的战略无法无限期地执行。各项积压的工作积聚成越来越不可忍受的债务:被严重忽视的部门(房产、交通和电信、医疗服务等等)的状况不断恶化,使得经济的有效运行变得愈加困难。经济快速增长时尚可广泛动用的盈余亦已耗尽。在有些国家,劳动力供给几乎已经达到人力资源的底线。(见表10.2)

经济上的巨大问题,尤其是技术发展的滞后以及生产的低效率和闭塞,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权威面临威胁。苏联及其盟国要想在军事方面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则需要付出更多的、甚至是无法承载的牺牲。由于华沙条约组织不仅生产总量小,而且军事实力处于弱势,要与北约维持均势,必须消耗掉其产出的更大比例。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落后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加盟这个组织,对这些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成为苏联及其同盟国的沉重负担。上述这些情况挤占了消费在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因此,只好维持低生活水平。其他未参加苏联阵营的经典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与相似的困难作抗争。

第二个引发变迁的原因与经济状况有关,即公众的不满。社会各阶层,如工人、农民、政府官员、养老金领取者、学生、教师、医疗工作者,都对低生

① 苏联增长放缓的情况,参看 A. Bergson(1978c)、D. L. Bond、H. S. Levine(1983)、P. Desai(1986a,1986b)、G. E. Schroeder(1985)和 M. L. Weitzman(1983);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分析,请查阅 F. Lecik(1986);关于波兰的资料,查看 L. Balcerowicz(1988)和 B. Kaminski(1989)。

活水平颇有抱怨。由于短缺而引起的愤怒、贫困和不安全感更为普遍。产品的劣质与单一，服务部门的落后，人为环境的破旧与荒芜，以及自然环境的破坏都导致失望滋长，夹杂着沮丧甚至痛苦的愤怒情绪不断迸发。

但不满情绪不仅仅迸发于狭义上的经济领域。公民被政府机构傲慢与官僚武断的行为所折磨。每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感到窒息：个人自由受到极大限制；缺乏自由表达权力；政府宣传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宣传不实；存在大量的镇压行为。不管人们从前多么习惯于这些状况，也不管它们融入人们生活的程度有多深，所有这些已经超出了人性所能容忍的限度。

与前两项原因相关，第三个原因是掌权者自信的丧失。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官僚机构几乎掌握着所有的权力，但稳定来源于官僚机构自身对其权力的合法性、所运行的体制的优越性、促使社会转型指导思想的科学基础、救世主般的使命以及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等问题都充满自信。一旦官僚机构以及共产主义忠诚拥护者的上述信仰开始动摇，转型自然而然会提上日程。而且，信心危机的程度越深，整个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面临崩溃的时刻也就越来越近。[①]

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困难日益恶化的同时，资本主义体制却被证明是充满活力的，这的确使得社会主义的掌权者更为不安并对经典体制丧失信心。一些国家如西德、日本以及所谓的新兴工业国[②]在经济增长、技术发展和出口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残酷镇压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维持纪律最关键的手段。不过，这不仅仅使被统治群体感到痛苦；每个人，甚至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拥护者和统治阶层中的精英，也感觉到威胁。至少是为了自身着想，他们也开始要求法律保障及行为的合法性。但这些行为本身已经表明，他们对无条件地使用镇压手段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即便这是经典体制获得稳定的基本条件。

---

①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列宁，这位伟大的革命理论家与实践家曾经说过："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寻求改变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弗·伊·列宁（1966，pp. 84 – 85）。

② 戈尔巴乔夫的最亲密的同事之一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曾在1990年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说道："我们不能揭露如下事实：南韩的劳动生产总量十倍于朝鲜，而且西德的人民比东德的人民生活得好。"引自《纽约时报》，1990年7月8日第4版。

经典的社会主义大厦由各种水泥胶合而成,其中既包括掌权精英阶层的信念,也包括不受任何法律或道义准则约束的赤裸裸的镇压行为。当这两种粘合剂开始分裂的时候,其后果便是"大厦将倾"。

最后一个原因是外部示范效应。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件的影响。苏联和东欧在 1989 年的巨变年代里,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运动始终相互影响。即便在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往往是采取极端集权的形式并长期向民众封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消息,但最终证明这些措施也都是徒劳的。现代通讯方式没有国界,不可能被带刺的铁丝网或边界防护装置所屏蔽:人们收听国外的广播电台,收看国外的电视节目,这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此外,决定性的导火索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这一变化导致苏联放弃了对东欧的统治。[①]

## 16.2 变迁的深度与彻底程度

偏离经典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发生在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例如政治结构、意识形态、财产所有权分配、各种协调机制的相对重要程度、经济增长结构、供需关系等等。许多经济主体的行为都发生了改变。因此把分析仅限于特定领域会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针对各个独立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这个国家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有多远,或者更精确地说,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理论原型有多远,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偏离的距离是个多维的范畴。本书将围绕两个基准维度展开分析,以便使这个问题更易于考察。

第一个维度是变革的深度。关于"深度"的概念阐述可以参照图 15.1。变迁距离解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特征因果关系链的始端越近,则说明变迁越深入;距离越远,则说明变迁越表面化。因此,协调机制(第三层)的改变比仅仅发生在增长优次序上的变化要深刻。财产关系的变化(第二层)则更深刻一些。最深刻的、最根本的变迁是由政治结构(第一层)的改变引起的。

① 虽然从东欧国家的角度来看,苏联外交政策的改变只是一个外部因素,但这是由苏联内部社会主义体制力量的削弱引起的。

因此,“深度”与“表面化程度”的层次划分指的是社会主义体制变迁的领域。

第二个维度是变革的彻底程度。根据图 15.1 的图解,任何一层的变化都可能是彻底的、局部的、无关痛痒的,甚至是假的,只是“替代”行为。这组描述将在第 17—24 章反复使用。为了形象表述这个概念,先举几个例子。当讨论协调机制(第三层)时,就有必要区分是完全还是部分废止短期计划指令。前者显而易见是更彻底的变革,而后者是更为温和的变革。或者,如果政治(第一层)发生变革,在公开宣称多党社会主义体制与默许对立派存在之间也是有重大区别的。后者虽然也是重要的改变,但还称不上影响深远,而前者则会导致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性变迁。

不同深度与彻底程度的变迁之间有着各种关联,对它们的研究引起了许多有争议的话题。在缺少更深层次变革的情况下,更浅层次的变革究竟能维持多久呢? 更深层次的变革是否必然引起所有其他更浅层次的变革呢? 会发生怎样的迟延? 如果更深层次(如财产关系)只发生了部分、缓和的变迁,那么某个层次(如协调机制)上的彻底变革是否能够永久地维持下去呢? 无论如何,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分析,尤其是第 15 章小结,为对变迁的深度和彻底程度进行综合复杂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工具。

## 16.3　改革与革命

在研究社会主义的文献资料以及日常的政治用语中,关于什么叫“改革”、“重建”(俄语表述 перестройка,因戈尔巴乔夫而著名)、“转型”、“转轨”或“革命”,尚没有统一的意见。在此我们只需要搞清楚本书中这些词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我们先举一些反例来阐明这些概念。如果没有使图 15.1 中的第一、二、三层次的基本特性发生适度彻底的改变,这种变革就不能称之为“改革”。任何仅局限于第四、五层次即因果关系链末端的经济活动中的表面变革,即使很重要,但也并不能叫做改革。如果变革影响到因果关系链中的更深领域,但只是使它们发生了一点点变化,甚或一点点变化也没有,只是制造了变革的假象,这也不能叫做改革。在下一章节,我们会讨论这种“假改革”。

让我们回过头来给这个概念下个明确定义:任何永久地、根本性地改变

了第一、二、三层次中至少一项的至少一个基本特征,但又没有将社会主义体制带出社会主义体制大家庭的变革,我就将其称为改革。因此,此定义包含三个要素。

1. 它必须是深入的:即必须对政治体制、财产关系和协调机制这三大领域中的至少一项产生影响。

2. 它必须至少是"适度彻底"的。照一般说法,局部的、缓和的变化也叫做改革。

3. 同时,依然照一般说法,改革一词不包括社会主义体制的彻底变革。[①]

当最彻底的变革发生在因果关系链中最深入的一环(政治结构)即执政党的垄断权力被打破时,变革已是破釜沉舟。这时候就不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换句话说,改革可以涉及重要的、深入的和彻底的变革,但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彻底程度方面,它都不能抛弃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独树一帜的根本性标志:执政党的一党专政。

一旦执政党对权力的垄断彻底结束,这个国家就会经历革命,从而从一个体制谱系进入另一个体制谱系。在这方面,可以使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术语:革命隐含的是"质"变,而不仅仅是"量"变。后革命体制与前革命体制在基本特征方面截然不同。

上述解释关注的是变迁的最终结果,而不是导致结果发生的事件的具体特征。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们在日常用语中对革命一词的定义有几种不同的表述方式:(1)革命的发生是迅速而突然爆发的过程,而演变是一个缓慢而稳定的过程;(2)革命通常从底层开始,通过群众的示威、罢工,甚至是起义等方式施压,而改革通常由上层(对现行政府不满的当权集团中的精英)发起;(3)革命是猛烈的,伴随着死亡、流血,还可能发起内战,而改革是和平的、非暴力的。

毋庸置疑,所有这三种解释被广泛应用,而且人们可以毫无疑问地使用它们。在此要强调的是,本书所使用的革命概念并不是基于以上(1)、(2)、(3)的标准,而是专门考虑变迁的结果,依据前面解释过的1、2、3的标准来判定。

---

① 此处使用的定义比我在此前的研究中使用的要广泛得多(1986b)。

必须补充一下，依据前面提到的关于革命的其他定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变迁是相互矛盾的。(1)有些国家巨变发生得迅速，有时还是爆发性的，但在其他国家则相对缓慢和稳定；(2)“由上层发起”与“由底层开始”、以多种方式联合而导致的变迁并不鲜见；(3)在多数国家里，变迁是非暴力的。但是，血腥、猛烈的变迁也发生过(匈牙利1956年，罗马尼亚1989年)。

彻底推翻第一层次的事件即共产党垄断权力的终结，将引起其他层次的变革。这种转型我称之为“后社会主义转轨”(→2.2)。虽然社会继承了社会主义体制的许多基本特征，但是它在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转轨。本书不打算对此进行详细分析，而只在接下来每个章节的末尾部分简单涉及。[①] 讨论限于积极预测和描述原有政治体制遗产所能带来的后果。因此，本书将直接根据以前所做的分析对后社会主义转轨发表看法。[②]

依照同样的逻辑，在此谈论的改革与革命的区别也适用于资本主义体制。改革是许多重要变迁的综合，它将引发彻底重建，但不会促使社会从一个体制谱系步入另一个体制谱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凯恩斯所倡导的路线即采取积极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福利国家来复兴资本主义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无论是英国工党还是瑞典的社会民主党，都没有跨入苏联、东欧国家和朝鲜所在的体制谱系。而1917年在苏联和1949年在中国发生的是革命，共产党取得了绝对垄断的政治权力，这两个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体制谱系。因此，我用“革命”一词形容1917年在苏联和1989年在东欧发生的体制变迁，二者都发生了质的跳跃：从一个体制谱系走入了另一个体制谱系(虽然这两次跳跃的方向完全相反)。

本书不打算讨论从一个体制谱系跳跃到另一个体制谱系的大家庭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官方意识形态里，革命带有褒义色彩，指的是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跳跃，也就是说，朝着更高级

---

① 参考数据的附录部分列了部分研究后社会主义转轨的英文文献书目。我试图在本书成型后将最近的资料以最新的形式收录进来。为此，没有在接下来的章节末尾的小段落处给出后社会主义转轨某些方面的研究著作的出处，也没有参考附录中包含的文献。

② 正如序言中所说的，我在《通向自由经济之路》(1990)一书中概括过我对后社会主义转轨的规范性评判和经济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大多数是根据本书所总结的积极分析提出的。即便如此，两本书的主题还是显然不同的：本书是对社会主义的实证分析，而另一本书则是对后社会主义体制的规范性建议。

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而“反革命”则受到谴责，被认为是往后倒退的跳跃，也就是说，朝着低层次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如前所述，我拒绝评价孰优孰劣，所以也无须区别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某些社会最根本性的基本特征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且只有这种变化才符合本书所定义的革命。[①]

有了上述系统概念，让我们再回到对远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活动的分析上来。有些国家在革命发生之前，经历了或长或短的改革过程。例如，匈牙利和波兰的情况就是这样。但在其他国家，社会直接进入革命状态，进而经历后社会主义转轨，从而跳过了改革阶段，东德就是一个例子。

本部分所概括的一整套概念引入的都是所谓“纯类型”。有些真实的历史构成可以很容易用一个或另一个“纯类型”来描述，但有些就没这么简单了。下面可以举例说明：

苏联的某些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转变为多党制；首次自由选举后，共产党失去权力。就所达到的程度而言，可以说革命已经发生。但在这两个地方，联盟的未来是不明确的，各加盟共和国实现其野心并独立的时间和程度也都是不确定的。革命将会采取什么方式，将会出现怎样的转轨阶段，以及革命的进程是否会倒退，这些都不确定。

如以匈牙利和波兰为例，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历史事件，可以清楚地划分社会主义改革时期与后社会主义时期。但苏联就不是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这两种过程以各种方式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在政治领域。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巨变的最终结果到底会保存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还是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亦或是形成真正的革命？人们对这几个国家究竟如何走向后社会主义转轨道路依然无法预言。

尽管对上述问题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概念框架的使用。

---

① 社会主义改革中的许多杰出人物称改革（即 перестройка）为革命，перестройка 是个多义词。但如果我们要从许多可能的同义词中挑选出最精确地表达它的本质内容的一个解释，那么我们应该说，перестройка 就是革命。перестройка 是革命进程，因为它意味着社会主义发展和其根本特征的实现在向前跨越。米·谢·戈尔巴乔夫（1987，pp. 50－51）。

为了避免概念混淆，有必要强调一下，本书中 перестройка 指根本地、深入地和彻底地远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换句话说，是真正的改革，但不是革命，它至多，只是为革命打基础，将来可能会进一步发展成为革命。

相反,正是这些单纯的、定义明确的概念类型,使得我们可以对所涉及国家的转型状态予以明确阐述。本书的原稿不可能天天更新。可能当本书印刷成册时,罗马尼亚或者苏联的情形已经完全不像书中所描述的了。不过,不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在将来怎样发展,我希望概念工具和系统分析方法依然有效。事实上,未来发展对理论工具来说是个检验,它们将证实或者否定它在分析最新信息和事件方面的有用性。

即便某些国家的瞬间状态无法非常明确地置于这个概念框架内,甚至许多国家每天都还可能发生大逆转,除了前面提到的两大堡垒,朝鲜和古巴,所有的社会主义阵线国家很可能都已经远离经典的社会主义体制。1977年,大约32%的世界人口生活在经典的社会主义体制下;而到了1991年春天,这个数字只有0.6%了。似乎可以说,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世界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并沿着改革和革命的道路向前,向前。

## 16.4 按时间顺序对改革和革命进行考察

在前面两部分我们引入了概念体系,并通过它们得以考察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进程并对此进行了分类。[①]

表16.1提供了一组国家的情况概览,它们依照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时间顺序排列。此表显示出,转型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候由改革开始(第1列),然后转变为革命(第2列),以及那些直接进入革命、从而跳过了改革阶段的情况(第3列)。[②]

表16.1本身表明这个进程是有其方向性的。没有一步成功的例子,即

---

① 关于各国改革进程的简单考察早有详尽阐述,关于南斯拉夫,请参阅D. A. Dyker(1990);关于匈牙利,请参阅I. T. Berend(1990)、J. Kornai(1986b)和G. Revesz(1990);关于中国,参见D. Perkins(1988)、J. S. Prybyla(1990)和B. L. Reynolds, ed.(1988);关于波兰,参见L. Balcerowicz(1988)和J. B. Kaminski(1989);关于苏联参见J. Adam(1989)、A. Aslund(1989)、P. Desai(1989)、E. A. Hewett(1988)和J. B. Tedstrom, ed.(1990)。对改革进程进行全面分析的杰作有W. Brus和K. Laski(1989)。

② 选择这些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当本书撰写时,资料应当非常清楚。因此,我们只选择了那些确实能将它们的历史划分为不同时期的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是毫不停顿地一往直前，直至达到预期的转型阶段。真实的情形是：运动可能往前，也可能往后，而且在某些地方还可能停滞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像马车卡在车辙里，既无法不向前，也无法不退后。许多运动也会遭到血腥压制或者是镇压（例如1954年对匈牙利第一次改革的镇压；1956年对匈牙利革命的军事打压；1958年阻止苏联的第一次改革；1968年对南斯拉夫改革的镇压）

**表16.1　改革和革命：按时间顺序回顾**

| 革命和后社会主义转轨国家 | 改革 | 改革的继续 | 迂回的改革<br>与年代相关的事件 |
|---|---|---|---|
| 南斯拉夫 | 1949 – | | 1949年：南斯拉夫从苏联阵营中分离出来 |
| 国家的部分地方 | 1949 – 1990 | 1990 | 1990年：某些共和国首次多党选举 |
| 匈牙利 | 1953 – 1954 | | 1953年：总理纳吉·伊姆雷宣布政府改革专案 |
| | 1956 | | 1954年：纳吉被剥夺权力 |
| | | | 1956年10月23日：人民起义 |
| | | | 1956年11月4日：苏联军事干预 |
| | 1963 – 1989 | 1989 | 1963年：政治大赦标志着迫害有所减轻 |
| | | | 1989年：宣布多党体制 |
| 苏联 | 1953 – 1964 | | 1953年：斯大林逝世 |
| | | |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掌权 |
| | 1985 – | | 1985年：戈尔巴乔夫掌权 |
| 国家的部分地方 | 1985 – 1990 | 1990 | 1990年：某些共和国首次举行多党选举 |
| 捷克斯洛伐克 | 1968 | | 1968年1月："布拉格之春"开始 |
| | | | 1968年8月：华沙条约组织干预 |
| | 1989 | | 1989年："天鹅绒革命" |
| 中国 | 1978 – | | 1978年：邓小平宣布改革政策：实行土地承包制从1979年开始 |
| 波兰 | 1980 – 1981 | | 1980年：团结工会组织成立 |
| | 1989 | | 1989年：共产党政府与团结工会组织达成"圆桌会谈协议" |
| 越南 | 1987 – | | 1987年：宣布经济改革 |
| 东德 | 1989 | | 1989年：推倒柏林墙 |

注：上表并没有包含所有情况：它只是摘取了具备表1.1特征的部分国家。选择这些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在撰写本书时，有关本章节介绍的各时期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这些国家按照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时间顺序排列，不管是以改革的方式还是革

命的方式。右列专门用于解释本表中所列年代里发生的事件。

表16.1主要是从即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以及革命三个方面,来描述往前或往后发展的剧烈变革。

特别要注意的是,每一阶段的改革或每次革命是如何开始的,虽然强度有所不同。本书描述了所有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一些消极现象,这就像生物染上了病毒,病毒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潜伏着并不爆发,但患者最终还是会被击倒。要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重大和长期失败与通过剧烈的方式使问题浮出水面、并为随后的变革提供初始动力的突发事件区分开来。枪支已经擦净,子弹也已上膛,只需手指扣动扳机。

各国在事件发生的顺序以及力量格局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规律。就某个国家而言,变革的进程可能是由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某个伟大人物的去世而激发(苏联的斯大林和中国的毛泽东);而在另一个国家,掌控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建设的领袖同时也领导着改革进程(如南斯拉夫的铁托)。无论哪种情况,内外部因素都参与其中,但是它们的相对影响力以及特定的影响方式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由统治阶层中的启蒙精英所贯彻的"自上而下"的措施,对改革的启动和推进以及为革命做出准备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①] 同时,从轻微但清晰可辨的窃窃私语到轰轰烈烈的抗议,从罢工到流血起义,"自下而上"所施加的压力效果也都很明显。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相对力量强弱及其相互影响是不同的。本节开头曾用过一个比喻:经典的社会主义体制就像一件缝制得密密麻麻的针织物,只要一根丝线断了,那么整件织物就会全部散落。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这个比喻:丝线在何处开始断掉,织物的其余部分按照什么顺序以及用多长时间散开,这些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丝线在一个关键点开始断掉,则解体过程必定发生。

---

① 在匈牙利,政党邀请由经济管理者和经济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来规划1968年经济改革的详细蓝图。

苏联党的领导人在1985年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来修订改革措施。G. K. 波波夫(1987b)把这一过程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为"大改革"所做的准备相比,那次改革也同样地伴随着政治商谈。

本书将不对特别事件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这留给其他作品来讨论。接下来的章节将采用横截面式的研究方法，而不采用纵向分割的方法来研究转型过程。其目的是想对所有抛弃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社会中值得注意的转型趋向进行总结，而不想纠缠于如下细节：每种趋向出现在哪些国家，它的前因是什么，以及它是在什么情形下发展的。事实上，在此被称为趋势的每组现象，其本身都是一个模型。每种趋势都是从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复杂多样的历史结果中提炼出来的。

第三部分的研究方法与第二部分有所不同。第3—15章关注的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固定不变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我们研究的是一个在长时间内比较稳定成熟的社会主义体制。因此，能够清楚界定开端和终点，从而总结那段历史。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运动几乎没有任何既定条件，这是一个尚未走到终点的历史重建过程。即使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本身，也比前一历史阶段更富有变动性，因为所有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内在矛盾都在改革阶段爆发了。因此，更实用的办法是将研究重点放在运动本身和转型趋势，以及与它们对抗的“反趋势”上。

# 第十七章 “完美”控制

第一种趋势(完美控制)完全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虽然政府的声明、规章及运动给人们的印象是,真正的转型已经出现,但事实是经典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都未被触动。

## 17.1 (完美控制)趋势概述

虚构这一趋势的发起者被16.1介绍的动机所影响:他们意识到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已经遇到了一些严重的内在矛盾,他们明白应该做点什么来弥补这些缺陷,然而他们仍然坚信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原则和优越性。因此,他们认为,所有的困难都只是(至少主要是)由于没有充分一致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如果替换一些从属的原则、法律措施和制度,使之更为有效并且能够更好地加以执行,那么社会主义体制就可以更好地运行,而主要原则应该保持不变。

许多提出以上一连串辩论的官方决议和经济类论文通常包含如下口号:“让我们完善计划体系”,“让我们完善工作组织”,等等。给人的感觉是,他们

所讨论的现象其实是非常好的,采取一点改进的措施就足以使它们变得完美。[①] 类似的说法使有些作者将整个趋势命名为"完美"控制战略,这里的引号表了一种讽刺的意味。[②]

所有属于"完美控制"趋势的变革都没有触动社会主义体制基本特征的较深层次,即党的权力垄断和财产关系。用图 15.1 的术语来讲,变化主要在第 3 层,但即使如此也只是十分表面化的变革。官僚协调机制仍然处于支配地位,其主要手段还是直接控制和计划指令。完美控制运动只是稍稍触及了指令性(中央管制)经济的方法和制度,这种变革根本没有改变行为规则。[③]

比较不同国家的历史可以发现,尝试完美控制战略和尝试改革在时间方面并没有清楚的联系。像匈牙利和苏联这些国家,在一个或多个时期内,官方首先尝试完善管理,然后开始改革之路。也有像古巴这样的国家,重复宣告完美计划,但他们从未再往前推进。还有类似东德这样的国家,直接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反复完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后就直接跳跃到了后社会主义转轨状态,完全没有经历更深层次和更彻底的改革阶段。

由于这个原因,完美计划的官方或非官方提议,与将其作为党的决议和国家规定以及接下来履行这些决议和规章的行为是不可分离的。通常,决议或规定只是部分地忠实于原提议,而执行又只是部分地遵从决议或规定。当一个尝试

---

① 例如,东德最后一位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在谈到联合企业(Kombinate,德语)运动时(17.3),称它是"使东德的经济机制变得完美(Vervollkommnung,德语)最重要的一步"。I. Jeffries 和 M. Melzer, eds. (1987, p. 57)。朝鲜的标语这样写道:"让我们高举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旗帜。"类似的表述也出现在罗马尼亚独裁者尼·齐奥塞斯库的作品中(1978,pp. 41-42):劳动者在批评社会各部门的某些消极现象或错误时,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社会主义体制产生了怀疑,这只是表明劳动者希望消除这些现象,这与党一心想完善它管理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方法是一致的。

② T. Bauer(1987)对这个趋势进行了总结。对有关阿尔巴尼亚的完美趋势更为详细的研究,可以在 A. Schnytzer(1982, chap. 2)中找到;有关保加利亚,在 R. J. Mcltyre(1988, chap. 4)和 M. L. Boyd(1990)中;有关东德和罗马尼亚,在 D. Granick(1975, parts 2 和 3)中。

③ 旁观者可能会被一些倡导完美控制战略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所误导,他们用"改革"这个词来形容其观念。为什么不呢?改革一词的使用并没有专利权;每个人喜欢怎么定义它都可以。在 16.3 中曾经提过,本书在严格意义上使用改革。但对这一概念性的阐明只是为了使读者适应本书的术语,并不能解决在关于这个话题的政治声明和学术著作里杜绝许多其他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定义。

不成功,下一个尝试又开始了。[1] 完美运动从来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因为问题的真正根源在更深层次,那些修修补补的行为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打破它们。

## 17.2 上层重组

经常有这样的观点:有害现象出现后的反应就是将责任推出去。换句话说,要求指定的政府机构对消除问题负责。例如,1986 年苏联成立了一个政府机构,在监控产品质量上拥有很广泛的法律权力。该组织的活动导致频繁的干预和示范警告,最终使得生产过程放慢,却没有解决任何产品质量问题。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所存在的问题,例如短缺和产品质量低劣,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并不是通过一个政府决议或者任命一个机构来负责监督就能加以解决的。

**表 17.1 苏联高层经济机构的数量**

| 年份 | 经济部门的个数 | 政府委员会、局的个数 | 高层经济机构总个数 |
|---|---|---|---|
| 1939 | 21 | - | 21 |
| 1947 | 33 | - | 33 |
| 1958 | 13 | 11 | 24 |
| 1963 | 6 | 45 | 51 |
| 1966 | 41 | 12 | 53 |
| 1975 | 52 | 14 | 66 |
| 1979 | 55 | 20 | 75 |
| 1984 | 56 | 22 | 78 |
| 1986 | 51 | 27 | 78 |
| 1987 | 52 | 28 | 80 |
| 1989 | 48 | 30 | 78 |

---

① G. E. Schroeder(1979)很形象地将苏维埃 1953 年以来的完美控制运动的反复浪潮命名为“改革循环(the treadmill of reforms)”。这一系列运动中有个阶段在 1965 年被称作“柯西金改革”的计划,它以该计划的推荐者苏联时任总理的名字命名。关于苏联完美运动的更为详细的记录,包括柯西金改革,请参见前面提到的 G. E. Schroeder 和 M. Bornstein's study(1985)的著作。后面还将回到戈尔巴乔夫初期的完美运动这个话题(17.4)。

在东德,关于完美控制提议和运动方面的文献特别广泛,例如,M. Keren(1973)、G. Leptin 和 M. Melzer。

**资料来源**:在如下出版物的基础上由 C. Kruger 为本书编辑:1939 年和 1947 年:A. Nove(1969, pp. 267,295);其他资料根据《苏联国家机关名录:全国组织》的各期出版物(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8,1963,1966,1975,1979,1984,1986 和 1989)。

在官僚协调中,有些活动必须划归职责履行(金融监管、劳动力、技术发展等等)这条线,而其他活动的核心则是领土管辖。组织形式变革的花招之一就是界定职责或领土管辖的优先权。举例来说,赫鲁晓夫在 1957 年突然依据行政区划对整个苏联经济的运行进行重组;后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依照职能管辖优先原则进行新的重组。依据行政区划进行重组将在后面讨论(18.4)。

上层重组运动反复进行,给人留下了仿佛是在进行变革的印象,但实际上却都是一些替代性运动和假改革。财产关系仍然保持不变,直接官僚控制作为基本的社会生产协调手段仍保留着,这些不过是组织形式上的修修补补而已。在针对控制的僵化和迟缓方面的解释总有这样的说辞:在最高层领导和最低层的执行者之间层级太多,因此,当局和企业必须相互再靠近一些。为此,有时通过分拆部门来完成,因为这样就能让每个部门更直接地管理其下属的企业;有时又恰恰相反:部门必须合并以精简机构人员,减少直接干预;有时在新的更大部门的控制下,部门的各部分与企业之间能够更好地协调。表 17.1 列举了高层机构分分合合的变化情况。

## 17.3 企业合并

重组既发生在高层,也发生在低层进行。主要的趋势是国有企业和合作企业的合并。表 17.2、17.3 和 17.4 中介绍了一些国际比较资料。

**表 17.2 工业企业规模分布:国际比较(1970)年**

| | 社会主义国家 a | 资本主义国家 b |
|---|---|---|
| 整个制造业 | | |
| 1. 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 | 197 | 80 |
| 2. 大企业 c 就业人数所占百分比 | 66 | 32 |
| 纺织业 | | |
| 1. 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 | 355 | 81 |
| 2. 大企业就业人数所占百分比 | 75 | 17 |
| 金属冶炼 | | |
| 1. 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 | 2,542 | 350 |
| 2. 大企业就业人数所占百分比 | 95 | 79 |

| | 社会主义国家a | 资本主义国家b |
|---|---|---|
| 机械 | | |
| 1. 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 | 253 | 82 |
| 2. 大企业就业人数所占百分比 | 61 | 28 |
| 化工 | | |
| 1. 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 | 325 | 104 |
| 2. 大企业就业人数所占百分比 | 79 | 35 |
| 食品加工 | | |
| 1. 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 | 103 | 65 |
| 2. 大企业就业人数所占百分比 | 39 | 16 |

来源:E. Ehrlich(1985a, pp. 278 - 283)。

a. 样本,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和波兰。

b. 样本,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

c. 大企业指那些就业人数超过500人的企业。

**表17.3 建筑企业规模分布:国际比较(1980年代左右)**

| 国家 | 企业在整个建筑部门就业人数中所占份额(百分比) | | |
|---|---|---|---|
| | 少于10人 | 10 - 499人 | 500人及以上 |
| **社会主义国家** | | | |
| 东德 | - | 21.0a | 79.0 |
| 匈牙利 | 14.6 | 15.4 | 70.0 |
| 波兰 | 8.7 | 15.1 | 76.2 |
| **资本主义国家** | | | |
| 澳大利亚 | 2.4 | 74.9 | 22.7 |
| 丹麦 | 41.8 | 51.5 | 6.7 |
| 芬兰 | 13.3 | 66.7 | 20.0 |
| 法国 | 48.3 | 47.1 | 4.6 |
| 爱尔兰 | 16.6 | 56.2 | 27.2 |
| 荷兰 | 17.3 | 71.8 | 10.9 |
| 英国 | 28.1 | 45.2 | 26.7 |
| 西德 | 11.6 | 81.1 | 7.3 |

**资料来源**:由P. Mihalyi根据联合国(1986a,表IV.6)以及与联合国秘书处直接联系的结果为本书编辑。

a. 指拥有1 - 499名员工的企业。

表 17.4 东德与西德企业规模:1988 年

| 部门 | 每个企业的员工数 | |
|---|---|---|
| | 东德 a | 西德 b |
| 化工 | 1,419 | 296 |
| 建筑材料 | 712 | 71 |
| 电子工程/电子 | 1,554 | 333 |
| 食品工业 | 480 | 125 |
| 轻工业 | 671 | 95 |
| 机械工程/汽车制造业 | 838 | 217 |
| 金属冶炼业 | 3,209 | 474 |
| 纺织工业 | 1,301 | 169 |
| 整个工业 | 893 | 190 |

来源:C. Schnabel(1991, table 3)。

a. 学徒除外。

上述各表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集中度远远高于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这种区别是有原因的。虽然资本主义经济也赞成规模经济,但也存在着相反的力量,因为"规模不经济"同样存在。在许多行业里,中小规模的企业能够长久并成功的与大企业同时并存,私人自由企业可以不断地加入新的中小企业。对规模分布的主要管理器应该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进行自然选择,甚至依靠政府干预施加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去阻止企业的集中化趋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立法来防止康采恩、卡特尔的出现以及其他各种兼并活动。此外,许多小型企业群,如农场主、自己经营的手工业者及其他从事小型商业的人们,可以得到政府津贴或赋税、关税减免等方式提供的支持。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主要通过改变财产关系,制造了完全不同的情形。新进入的私人企业自然替代原有中小企业的过程被中止。新成立的公有企业从一开始就规模庞大,此后,它们又在政府干预而不是市场力量的推动下(→7.3)再三地合并。政府这样做有政府的动机(→5.5,9.4),[①]在此只强调

① 不仅仅高层领导对合并感兴趣,大企业的管理者也很高兴看到他们自身经济与政治地位的加强。关于匈牙利的情况,参见 E. Szalai(1982,1989);关于波兰的情况,参见 J. Winiecki(1989)。

其中一点。合并使企业的经营状况更明显:需要控制的单位数目越少,控制与监管就越容易。事实上,从控制的角度来看,最容易做的应该是消除企业生产之间的重叠之处,实行最完美的垄断。[①] 上述论证告诉我们:加速合并企业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完美”控制趋势有着紧密的联系。

企业合并取代了更深层次和更彻底的改革。例如,东德就是这样。表17.5表明集中化是如何不断向前推进的。当匈牙利反对变革的人试图用它来延缓改革时,这一过程就进一步得到加强。合并运动带来的影响反映在表17.6中,很快盖过了1968年的其他主要改革措施的作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类似的现象。

**表17.5 东德的企业合并(1950—1970年)**

| 年份 | 企业数量(百分比) | 就业(百分比) |
|---|---|---|
| 1950 | 100 | 100 |
| 1960 | 68 | 135 |
| 1970 | 49 | 138 |
| 1980 | 19 | 150 |
| 1987 | 13 | 153 |

来源:H. G. Bannasch(1990,table 2),经 Kleuver Academic 出版商允许再版。

注:本表包括制造业。

**表17.6 匈牙利的企业规模分布**

| | 规模分布(百分比) | | |
|---|---|---|---|
| | 1958 | 1964a | 1968 |
| 小型企业(少于100名员工) | 27.9 | 13.6 | 11.2 |
| 中型企业(101-1,000名员工) | 62.1 | 57.0 | 54.2 |
| 大型企业(多于1,000名员工) | 10.0 | 29.4 | 34.6 |

来源:I. Schweizer(1982,p.35)。

a. 最大的合并运动发生在1962—1964年期间。

---

① 关于垄断在苏联的某些行业发展,参见 R. I. Mckinnon(1990a)和 V. Tsapelik 和 A. Iakovlev(1990)。

企业合并和垄断以极端形式产生于东德,这种所谓的联合涵盖了分支部门的所有单位,或者包括了特定领域分支部门的所有单位。参见 P. J. Bryson 和 M. Melzer(1987)、D. Cornelsen(1990)和 W. Gossmann(1987)。

## 17.4 计划与直接控制的发展

除了组织重组之外,导致完美控制趋势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计划和直接控制方法的转型。从很多提议、实验以及修正中可以提炼出一些有代表性的趋势。

研究者主动运用数学方法和电脑来制定详细计划,①这将引起预期的反应。于是一些统计机构的成员为了更好地完成计划都加入了学术界。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央计划当局独立出专门从事数学方法实际应用的部门。本书既不打算全面描述这一趋势,也不打算评价其思维和实际的成功与失败。数学方法、理论模型、计量经济学模型以及电脑程式在任何体制下都能为高层、中层、低层决策提供帮助。② 在这方面,只简单提一下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计划方法紧密相关并试图使计划更完美的有关试验。

运用数学编制计划的先驱们希望他们的方法受欢迎,但计划当局经常是粗略臆测,完全拒绝这样一整套精确而明晰的方法,并称之为异类。如果一个人考虑的是计划运行的真正社会学含义,而不是宣布的原则,对数学计划方法的抵制是可以理解的。政治领导并不希望将其真实政治目标用"福利函数"或"计划者偏好"等形式公之于众。计划机构的所有成员,通过隐瞒某些信息和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扭曲某些资讯(向上或者向下调节)的方式,来加强他们在纵向讨价还价和横向调和中的谈判地位。完全坦白将使他们自己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计算的目的不是为了什么绝对的"社会利益",而是支持他们自己的观点。在他们将资料登录电脑之前要仔细进行外部检查和校勘,方能阻

① 关于苏联的最初实验,可参见 L. V. Kantorovich[1937](1960,1965)、V. S. Nemchinov,ed. (1965)和 N. P. Fedorenko 等(1975)。关于匈牙利的情况,可参见 A. Brody(1964,1969a)、J. Kornai 和 T. Liptak(1965)和 J. Kornai(1965)。西方开始使用数学方法作计划的情况,见 W. Leontief(1953a,1953b)和 E. Malinvaud(1967)。关于全面考察和评价,见 M. Ellman(1973)、G. M. Heal(1973)、P. Sutela(1984,1991)和 A. Zauberman(1975,1976)。

② 数学方法包括数学计划模型,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分析里的广泛运用,有助于打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垄断地位,并将经济学家们引入到现代经济学的国际前沿。它教育实践者要尊重严格的逻辑关系、事实以及数据,而不是死的教条。如果达到这样的程度的话,那么它将有助于激起意识形态的变革,不管它起的作用是保存还是转变原有的计划方法体系。

止这些行为;他们的操纵行为会被数学方程式的无情逻辑所扰乱。

不过,我们可以暂时想像不抵制数学计划的情形。即便是最时新的电脑技术也不能完全承担对国民经济中数以百万计的变数进行可靠计算的任务。唯一能够满足这个要求的“电脑”是市场。那些希望用数学和电脑代替市场的人注定要失望。[①] 使计划完美的另一个趋势是试图改变计划指标体系。[②] 这一趋势的代表通常强调过分集中的缺点和分权的优点。许多提议和后来的政府决定建议用别的指标来替换当前使用的指标。[③] 它们的编撰者并不争辩是赞成还是反对保留计划指令的管制特性,他们关心的只是什么方面需要开处方。这里也有一些例子。[④]

1. 指令性计划指标的数量必须削减。对指标进行更大程度的综合,但是更少数量的综合指标必须确保完成。

2. 放宽价值指标的范围,缩小实物指标的范围,因为后者容易引起上层的更多干涉。

3. 计划指标体系不能建立在现有层级的变革指数基础上,因为这将鼓励他们截留业绩,从而产生虚假汇报。

4.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计划指标中“同类中首要的”是“总产值”,即总产出指标;对此的严格规定是当局设法刺激生产者进入数量驱动的主要手段,但这造成了生产资料的密集型生产以及过分强调高产值产品。因此应该让其他指标占据首要地位,如净产出或企业利润。

这些提议通常将新的激励安排结合到所推荐的计划指标体系的变化之

---

① 事实上,运用数学作计划的研究者中,将希望寄托于此的人并不是很多。我自己就曾在匈牙利领导过修订和运用第一个计划模型的工作,但我从来就没抱有被埃冈·纽伯格(1966)恰如其分地形容为“计算机乌托邦”的那种幻想。

② 前面讨论过,将数学引入计划制定的努力,现在谈论的是努力提高计划指标体系,它们被当作各自独立的趋势。当然,两者并不是完全相互排斥;在有些地方,它们并行出现并相互关联。

③ 在此要提一下,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针对长时期(15 年或 20 年期)修订计划。这些操作保持年度或 5 年期计划的方法及相关的管理机制不变。仅凭这一点将它们划入“完美”类型都是有道理的。

④ 关于此论题的概论,参见 J. M. Kovacs(1990,涵盖了大量的文献)和 L. Szamuely(1982,1984)。

中。[①] 在许多情况下还伴随着如下提议：应该通过企业之间签订长期合同的形式来加强企业间的横向联系。

所有这些主张只是把从前那套人为的规则（资讯收集、加工、决策并执行），替换为新的同样是人为的规则和“诡计”。企业事实上可以用诡计击败任何规则，即使政府提出试验性的新规则，他们同样也能智取。当上级机构关注某个指标时，企业就将这个“首要指标”提升为每天的行动纲领，并不惜牺牲别的不太受重视的指标。这在真正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一个企业把事情搞糟或错失机会，另一个企业为了获利迟早会抓住这个机会。自由进入与竞争是目光锐利的检察官，这是任何政府监管者都无法做到的。

上述提议提到的最后一点，即将企业利润提升为“首要强制指标”看似非常彻底，[②]因为它很像资本主义的激励规则。但实际上，经济参与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机制最重要的特性。私人市场机制的主要特征是分权、自由进入和自由竞争。

真正分权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因此1—4点提出的分权与修正建议并不符合官僚协调机制的内在逻辑。如果直接政府控制下的计划指标体系及其补充规定的口子放宽，那么就会为此类思路不满的异己分子进行干预大开方便之门。一旦试验开始支持其结论，相反的完美控制趋势也就出现了：提高集中度而不是减弱集中度。政府管理的放松必须收紧，这样才能保证任何东西都不会落网。如果有些综合指标或其他指标企业可以规避，那就需要更多、更详细的指标。如果管理条例过于概括和全面，则需要更为细化的规则。如果已有的机构不能履行它所有的管理职责，则需要增设新的机构。

---

① 1963年东德引入的新经济体制是“完美”控制趋势的典型案例：计划指标体系的改变结合了新的激励原则。见G. Leptin和M. Melzer(1978)。

② E. G. 利伯尔曼【1962】(1972)的提议引起了世界广泛的关注，他提出：对企业的激励应该与其利润挂钩。在利伯尔曼的鼓舞下，柯西金—勃列日涅夫时期采取的一些含糊措施造成了一些局部改变。按照本书的分类方法，利伯尔曼的观点介于“完美”控制趋势与“市场化的社会主义”【→21】之间，因此在这两个地方都提到了它。

关于利伯尔曼提议，见M. Bornstein(1985)、E. A. Hewett(1988)和G. E. Schroeder(1979)。

官僚协调机制完善自身的方法大多数是不断完善,即设法事无巨细地进行管理。伴随而来的就是更卖力地执行决定和更严格地纪律约束。苏联不仅在安德罗波夫时期,而且在戈尔巴乔夫的初期,对蔑视劳动纪律的无故旷工和酗酒行为予以抨击都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在对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时,可以发现完美控制趋势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体系已经变得非常僵化,官方的意识形态立场根本不容攻击。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完美控制趋势造就的假革命帮助了守旧力量继续维护他们的地位。他们误导了机构中虽然不满但易受欺骗的那帮人,因为看上去好像正在发生一些变革,即便只是制造了变革的假象。但匈牙利在20世纪60年代以及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初期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在那里,政治体系的刚性已经有所松动,某些机构已经开始重新评价过去。即便完美控制运动没有解决那些问题,但它们的失败启发了人们。每一次挫折都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洋洋自得的官方意识形态形成了冲击。

甚至领导层也开始意识到对指令性体制的重组、修正以及致力于强化纪律的措施均无助于解决日益恶化的问题,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更深层次和更彻底的变革开始起步。

## 17.5 预演: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组织结构

后社会主义体制变革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留下的遗产,即主要的制度与组织结构都属于社会主义。完美控制趋势的影响之一就是生产集中程度远远高于市场自然选择的经济。有时,某个特定的国有企业对大范围的生产和交易拥有完全的垄断。即使企业并不是真正的垄断,但企业之间的人为合并给予它比在真正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大得多的市场份额。那些人为形成的垄断企业反对将它们拆分为更小的单位,这阻碍了私有化进程(→19.7)和真正竞争的发展。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政府管理领域。完美控制运动已经使许多机构和中央组织形成,它们将为自身的生存而顽强斗争,这也阻碍了后社会主义转轨改革完成它的任务:精简政府机构。

另一方面，完美控制趋势也留下了有利的遗产。我在前面曾经指出，引入数学方法做计划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方式没有起到任何彻底的改善的作用。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它们至少起了有利的教育效果。新一代的经济学家成长起来，他们拥有最新的数学、统计、计量经济学和电脑技术等方面的专门技术，而且至少其中有些人还相当熟悉当代的西方经济学文献。[①] 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拥有更有利的知识背景去完成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为经济学家们设定的任务。

① 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波兰以及后来苏联那些在其职业生涯早期就投入到数学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们在激进改革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第十八章 政治改革

第 17 章描述了一些改革的趋向，接下来的章节将介绍较剧烈的改革趋向。首先介绍政治改革趋向，是什么力量促成了它的出现？同样重要的是，反对改革的力量是怎样削弱或彻底破坏这一真正改革趋向的？当然，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里，改革力量与反对势力的前沿阵地也各不相同，本书不打算详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最具代表性的情形和冲突。

有必要回顾一下第 **15** 章的主要结论：特定的政治结构在巩固与发展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中起着主要作用；它构成了解释体制因果关系最深层次的部分。因此，政治结构转型的彻底程度也就从根本上决定着整个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偏离其经典模式的程度。

按照社会主义国家学术著作用语和政治术语，所谓权力结构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变革都被称作政治改革。[1] 这与前面对改革所下的定义是一致的[→16.3]。当最彻底的变革发生在最深层次时，它们就不再是改革，而是革命。本章结尾将就此作简短的讨论。

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有着紧密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把政治领域从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分离出来之后，才能进行更为清晰的分析。

---

① 关于苏联政治改革的可行性及其局限性的讨论见 A. Aslund(1989)、S. Bialer(1980)、W. D. Connor(1975)、S. F. Cohen(1984,1985)、T. J. Colton(1986)、M. I. Goldman(1987)，对其外交政策的关注，见 R. Pipes(1984a 和 b)和 M. D. Shulman(1966)。

## 18.1 权力垄断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并不打算事事着墨,而只是研究关于权力的几个重要观点以及权力统一行使的一些表现形式。

1. 干部任命制度(Appointment)。像从前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一样,是党决定改革阶段由哪些人担任所有的重要职务。这不但适用于党的职位,而且适用于更多的政府主要岗位、经济方面的领导管理职位、司法任命,以及群众团体的领导人。

"党任命干部的制度"的存在非常普遍。[→3.2][1]虽然在许多选举程序中有正式运行自治机制,地方政府自治体(苏维埃,委员会,社区)的代表由大众选举产生,地方行政长官由议会决定,地方自治体和群众团体的领导由其成员选举产生。但事实上(在政府其他部门的配合下),候选人的任命权或者起码是能被任命的认可权,仍然掌握在党组织手中。[2]

如何判断多于一个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这种现象呢?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种新现象呢?这确实是很难回答。在某些情况下,这只是虚假的外表,因为是由同一个党组织选定了竞争候选人,他们持有相同的政见。但在某些议会选举中,政府候选人确实真的面临持有不同政见的对手。这些对立的候选人或者是自愿参加选举运动,或者是通过一些准组织或半合法运动获得了提名权。[3] 议会开始吸纳对正在争论的问题表达自己独立政见的人员,他们不但批评政府的政策,有时候还会投票反对党和政府的提议。当然,议会的多数席位仍然紧紧掌握在官方选定的候选人手中;政府的

---

① 在匈牙利,这种制度在1953年第一次改革浪潮后的30年内依然有效。1985年地方政府官员中的党员比例如下:首都市、区级议会——99%;市议会——96%;大乡村议会——91%;乡村议会——79%。参见T. M. Horvath(1988,p. 92)。一个关于波兰的研究项目,包含对1986年政府机关和企业的领导干部的统计,样本的88%是共产党员。参见J. Wasilewski(1990,p. 750)。

②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党仍然对任命有决定权,但是重要职位中党外人士的比例也在上升。因为在改革过程中,共产党领导想表明党外人士也有机会在统治阶层中占一席之地。

③ 举例说,1985年匈牙利和1989年苏联选举的情形就是如此。

决定需要得到确认。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说独立候选人参与民意测验，然后参加议会选举和进行活动是一种新现象，这看起来超出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范畴，似乎是“超越”了它。

2. 政令治国(Government by decree)。权力垄断最重要的标志是不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执行机关不服从立法机关，居民不能向法院上诉行政部门。究其本质是自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以来，改革阶段的形势并没有大的改变。政府基本上是政令治国，即便这些措施也许已经正式通过议会批准成为了法律。但是，只要执政党在议会占压倒性多数的情形仍然稳固不变，它的意志就几乎自动地成为统治命令。[1] 而且有些政令和内部管理规定还与议会通过的法律相矛盾。也还存在大量的秘密政令和指示。

关于改革的争论，尤其改革后期，经常引发对“法治国家(a state of law)”(Rechtsstaat，德语)的呼吁。主要判定标准就是任何人、任何机构都不能高于法律。从狭义上说，不仅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政府，就是改革阶段的政府也不符合法治政府的标准。党高于法律，甚至可以说整个政府不服从法律；恰恰相反的是，法律要依据行政机关的统治意志进行调整。

## 18.2　专政的缓和

上一部分集中讨论了改革阶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政治体制最重要的特征——权力垄断的存在，**18.2—18.5** 将讨论那些确实发生变化的领域。

第一，专政有所缓和。[2]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不仅是反对派，即使是那些服从传统体制的忠诚官员，也经常发现自己遭受错误指控，这是导致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很难维持原状的现象之一。在改革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忠诚的政府官员只要规规矩矩做事，就无须担心会受到惩罚。然而这种心理变化所带来的后果也较为复杂，虽然它减轻了政府机关内部的紧张关系，有助于稳定改革，但也为机关内部的批判和反对观点留下了更大空间，从而削弱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凝聚力之一：由敬畏而产生的铁的

---

① 正是立法机构独立人士的出现削弱了这种状况。

② 斯大林逝世后，虽然在其他方面没有走上改革和自由化道路，但是在大多数仍基本限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框架之内的国家里，专政也有所缓和。

纪律。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有些方法仍然可以用于个人:党可以惩罚或开除党员;反对派容易失去官职或工作、被捕、被监禁、内部流放、强制驱逐出境,等等。反对派集会与示威活动被驱散、社团与报纸被禁止。但在专政缓和的状况下,所有这些手段的使用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要少得多,而且大体上不再那么激烈和残酷。党在进行各种专政时,也会注重遵守法律程序,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缓和。

党在改变警察、司法和刑事程序之前(或同时),通常会指责原有极端形式的专政。揭露苏联恐怖时期罪行的重要里程碑是赫鲁晓夫 1956 年的著名讲话。① 虽然那是在限于少数人参加的党代会上的发言,但消息很快就广泛传播。开始为在斯大林时期被判刑的人平反昭雪,并释放了一些幸存的犯人。当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掀起了第二次浪潮,揭露了更大范围的残酷与恐怖。② 东欧其他国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被这些事件影响的不仅仅是被迫害的幸存者或无辜受害者的亲属,它还深深触动了许多真诚信仰社会主义体制但本人并没有遭受镇压的人。第 3 章和第 4 章在讨论政治结构和权力意识形态时曾强调过:大多数党员和政府官员中都在凭着高尚的使命行事。许多人遭受到了巨大的精神震动。道德危机不仅存在于知识分子之中,很多官员也受到影响。他们想开创社会主义新的、"干净"的历史篇章。官员[→18.4]和知识分子中的这群"改革共产主义者"在组织改革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18.3 官方意识形态中的不变因素和可变因素

从功能上说,官方意识形态应该永远是"最新的"。由于改革进程的政

---

①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英文翻译本可参阅 T. P. Whiteney, ed. (1963)。

② 苏联 20 世纪 80 年代涌现出了大量斯大林恐怖所造成后果的纪实性记录,有的是半合法的地下出版文献,有的是合法出版物。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罗伊·麦德维杰夫的不朽著作,后来也出现了英文版(1989)。

官方也对恐怖统治的受害者给予平反。1988 年党决定恢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和其同伴的党籍。布哈林曾经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和跟随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势力的领袖人物,在 1938 年那次声名狼藉的公开审判中遭受诬陷并被宣判死刑。

治路线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从前官方意识形态的修订则不可避免。不过,这项工作进行得缓慢。官方意识形态的塑造者和宣传者总是试图使支持时下政策变化所需的意识形态思想尽量接近传统声明的原则,有些原则被当作是不言自明的。在这种情形下,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官方意识形态完全保留了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继承下来的教条。这需要我们进行一个简短的回顾,至少以标题的形式去理解那个时期的声音。像在第 4 章里一样,我们只是把它们罗列出来,并不评估其合法性。

1. 共产党是强有力的社会领导力量。它的垄断权力是合法的;保持垄断权力的合法性不变符合人民的利益。与此相关的是党内运行的原则:禁止派系斗争,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党的纪律的必要性。

2.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两个伟大代表人物马克思和列宁永远是正确的。斯大林以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其他执政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错误,主要是因为他们偏离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在许多方面实行了马列主义原则,而恰恰是因为背离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理论。

3. 公有制比私有制先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伴随物。

4. 在与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还附加了其他一些不许驳斥的基本原则:无条件忠诚于苏联,维持与苏联的联盟关系,其中有些东欧国家允许苏联驻军。

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它告知我们,哪些主题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禁区"。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即使是在改革时期,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禁区依然存在。在合法环境下,教授的课程或印刷出版物中不允许对这些话题展开讨论。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有所不同的只是无需在每次讲课和每篇文章中都要重复声明效忠这些原则。这些问题可以回避,这就使得那些在思想禁区上与官方意识形态多少有些抵触的知识分子工作起来更容易些(至少心理上如此)。但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审查仍然可以阻止任何人在这些

思想领域与官方意识形态持不同观点。[1] 因此，讲师或作家要经常实行“自查”以避开那些众所周知的不允许辩论的问题。[2]

传统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观念在改革阶段还是被完整地保存着，其他思想领域则经历了反复无常的修正。变化主要发生在对私有财产和市场功能的看法上，但我们最好在后面有关私有成分和市场社会主义[→19.3，21.1]的章节中再讨论这个问题，这样会更有实际意义。在这里，我们将首先比较一下正统官方意识形态与为适应某些特定改革需求而进行调整后的新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

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非常强调社会主义体制比资本主义体制更具优越性[→4.2]。可如今这一优越感已经动摇了。如果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在过去数十年里不但没有缩小，而且对许多国家而言还是在扩大，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就很难争辩说社会主义体制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官方新闻和大众媒体也多次指出资本主义体制的成功之处，例如市场机制的优点。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试图树立起一种英雄式的牺牲精神[→4.5]。但在进行时，意识形态已经将英雄观念替换成了享乐主义观念。执行纪律的观念开始淡化，转而提倡要为人民提供物质刺激。

另一个变革也与上述内容紧密相关。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官方意识形态曾许诺，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大众的福利将提升。但在强制工业化期间并无可能迅速实现这一许诺。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放弃迅速、稳定地提高生活品质就成为其重要特征[→4.5,9.3]：为了明天，必须牺牲今天消费水准的提高。改革时期的意识形态打破了这一点，至少在经济繁荣时期是这样的。在改革阶段，消费增长是第一位的。在这个领域，经典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被废除了，这就是在匈牙利改革进程的第一阶段被西方报社撰稿人称为“享有有限自由的共产体制”的思想领域。但这种趋势只有当生产

---

① 政府审查机构在有些改革国家依然存在，如苏联。在其他改革国家里，审查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被任命为报社、期刊领导的编辑、图书出版商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阻止不希望看见的作品发表。同样，中学和大学校长被迫保证不要举办当局不希望出现的讲座等等。

② 拥有独立思想的作家、报社撰稿人和社会科学家试图秘密地将不同于政府路线以及批评它的观点放在作品里，作家学会写出言外之意，读者也学会了如何领会。

和消费快速增长时才能持续。一旦经济问题恶化,适度、耐心和牺牲的号召又将从宣传部门的库存中被找回。

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强加于居民并要求他们接受的父爱主义。政府承担了慈善机构的职责,为公众提供廉价的政府补贴住房以及免费的医疗保健、教育和文化服务,而且还提供预算外的基础设施服务和公共交通[→4.3,4.4]。在改革时期,这些承诺被一个一个地取消。当经济困难时,政府会不紧不慢地将住房建设、房屋维护、医疗保健、供水和电话服务的投资以及道路交通的财政负担转移到个人和家庭身上。这样,虽然政府卸下了重担,但却会导致争论:这么做到底是否正确?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与经典意识形态相比,改革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一座一致性要差得多的精神大厦,它包含许多内在的矛盾。[1] 它就像是一块柔韧性极好的合金,既有旧的老式教条,又添加了新的、更实事求是的思想,尽管这种新思想是被真实世界所强行赋予的。

至于改革进程所带来的冲击力,其最显著的特征是稳定状态的逐步解体。原有的教条放松了,严厉无情的教条主义逐渐让位于或多或少的宽容政策。那些已经放弃了从前不容争辩的思维禁区的人不可能再重建禁区。旧的世界观已经在内心坍塌的人再也不可能全力以赴,重新找回他们原来的信仰和激情。当然,不仅过去的失败对意识形态有解体效应,如果能成功抛弃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教条(比如,通过减少公有制或计划方式),这也同样减弱了人们对官方意识形态原有教条的盲目信任。

在讨论官方意识形态时,还要简单提一下制度框架。政府保留了通过正式组织对大众媒体和教育进行全部或部分垄断的特权。当然,这部分内容应该加到前面提到的党的权力地位中加以讨论[→18.1]。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不像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那么极权,其他的社会群体(虽然大多是非正式的)也开始具有一定的影响力[→18.4],外部世界的思维影响也在增长[→18.5]。

---

① 为了避免有任何误解,这里进行探讨的目的不是调查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官方意识形态或改革进程中各种宣传声明的真实性或篡改程度,也不是判断它们的诺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履行。对两幢意识形态大厦的比较,仅仅是针对它们所包含的主张之间相互一致或冲突的程度而言。

另外，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权力中心对新闻界、广播和电视的掌控明显弱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大众媒体的一致性有所减轻，能听见更为独立的观点，其中包括批评，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隐蔽的。这还不能称之为新闻舆论的自由状态，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它已经能够担当起更多的合理功能：对当权者进行社会舆论控制和表达公众的观点。

## 18.4 多元化的萌芽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结构并非坚如磐石：在较弱的体系里，多元化的丝线同样编织其中。在政治改革期间，这些丝线变得特别坚固。偏离中心的力量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时期更强，这股力量抵抗将丝线拉回的向心力，但它们并未成为主流。这里我只介绍一些变化，而且重点是影响经济运行的那些领域。

1. 院外游说(Sectoral lobbies)。即使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也存在代表某个特定部门对上层领导施加压力的团体或游说集团。他们的作用在改革进程中提高了，这是中央集权削弱的结果。它进一步朝着同一方向行动，从而降低了中央的绝对权力。游说试图影响许多方面的决策，从投资额分配到工资增长再到亏损企业的财政援助等等。[①]

2. 地区的、民族的和少数民族的压力集团(Regional, national, and ethnic - minority groups)。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已经存在地方的游说团设法维护某些地理区域或行政区域自身的实际利益或想像利益，大多数是为自己谋取更多的投资资金和财政补贴。这些地区性游说团体大量增加，即使在相当小的和种族统一的国家，例如匈牙利和波兰，这一变化也是可以察觉的。这类问题在多民族国家表现得特别强烈，如苏联和南斯拉夫。在那里，地方利益与特殊民族群体(与国家的多数民族群体相比是少数)的利益往往结合在一起。

来自下面的压力可能与中央组织在分权方面所作的努力(中央集权造成的信息和行政管理困难导致分权不可避免)相互影响。最终，地区性组织

---

① 参见 E. Voszka(1984,1988)和 E. Gaidar(1990)。

（联邦国家中共和国或省的政党委员会和政府；如果将领土进一步往下细分，则是区、乡政党委员会和政府机构）的权力地位不断提高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趋势。[1] 地区性组织权力的增大使得自治性协调机制能够发挥部分作用，其决策领域也在不断拓宽[→6.5]（这里必须说明：只是发挥了“部分作用”，因为在地区性的国家管理组织里，采取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和控制是非常有限的）。

虽然中央组织本身某种程度上迫切要求在地区基础上分权，但如果变成了“民族主义”（就像官方意识形态所称呼的），他们就不喜欢这一趋势了。由历史进化形成的共同体试图保护它的传统、文化、语言或宗教以取得民族自治，地区性分权趋势与上述努力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中央的反对就越强硬。在某些情况下，内乱和流血冲突就会接踵而来。在改革进程中，各成员共和国与联邦政府在权利和义务上根本无法实现平衡与和谐，从而也就建立不起真正的联邦制国家。也没有哪个试图独立的民族能够摆脱宗主国，成为真正的主权国家。[2] 在这些情况下，民族抱负代表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进程中最强大和最具爆炸性的一股力量。

3. 教会。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虽然也容忍教会开展活动，但一般不是试图废除教会就是加以严格限制，只是不同时期力度不同而已。在政治改革期间，废除教会的行动虽然没有停止，但主要趋势已经变成对教会加以限制，而教会的影响力也在增长。很难说这是政府日益容忍的结果，或是相反：教会力量的增强迫使政府不得不允许它们不断扩大活动范围的。总而言之，不管是哪种情况，宗教信仰的传播得到了陷入社会道德危机以及对原有社会主义信仰感到失望的人的广泛欢迎。虽然教会缺少世俗权力，但它们独立于现行权力结构所产生的精神影响却代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4. 工会和其他代表社会利益的团体。波兰团结工会的发展以及它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得到认可，这一事件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整体而言，

---

① 从一开始，这就是南斯拉夫改革背后的主要因素之一。见 A. Djilas(1991)。按区域范围分权在赫鲁晓夫 1957 年的改革中非常显著。见 E. A. Hewett(1988)和 O. Hoeffding(1959)。

② 在 1989—1991 年，前苏联的一些共和国通过他们自己的法律宣布主权独立。类似的进程也发生在南斯拉夫的某些共和国里。但是这些共和国的实际地位仍然非常模糊：虽然它们在许多重要方面不再从属于联邦政府，但仍然没有拥有主权国家的某些基本特征。

它在进行改革的国家中不具代表性。不过,可以这样概括:工会的发展趋势是:其官僚特征不断被削弱。工会的干部不再认为他们唯一的职责是担当拥有指挥权和体现党的意志的人的“传声筒”。他们更普遍地认同其工会会员资格,并开始更多地代表工会会员的利益。

一个令人关注的变化是,不少国家在其改革进程中已经使罢工合法化或至少容忍罢工行动,这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是不可想像的。如果出现罢工,有些是在工会支持下发生的,有些则是自发的或可能是由非官方的工会组织的。

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其他专业组织中,这些组织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都是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这些专业机构包括国家科学院;作家协会,影视人员,音乐家,艺术家和其他艺术团体分支机构;大学学生会;工程师协会;农民协会,手工劳动者和私人业主组织等等。它们总是承担着双重职责,既要“向下”,即充当上层领导和组织成员之间的传达人,又要“向上”,即成为团体的代表。在改革过程中,这类机构“向上”的角色得到了显著加强,而且自我协调机制和组织自主权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增长。

政治改革的另一个特征是:新的协会、俱乐部和其他类似组织大量涌现,涉及面最广的典型组织类型包括:知识分子、退休金领取者、政府住房的租户、残疾人以及那些从事慈善事业的人,他们都成立各自的组织,环境运动也组织了起来。有些新协会也履行其成员代表的职责。有的组织参与到政治活动中,而有些组织则以明显不关心政治的方式行使职责。不管哪种情况,这些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不是由上层指派的,也不立即被赋予垄断权力;与此相反,它们是从下面主动自发形成的。[①] 这些独立于政府权力社会团体的早期表现形成了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巨大反差,因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极权主义特征之一就是阻止社会中任何自发的有组织活动。

5. *另类政治运动*(Alternative political movement)。在改革体制下,在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边界领域里会遇到独立于当权者的政治声明,或政治立场和政策主张都不同于党的官方路线的“另类”运动。政治上的政见不同

---

① 运用第6章介绍的术语来说就是:自治和民族协调机制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几乎已经全部消失,而如今则获得了更大的舞台。

或反对意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它们包括致力于在正式组织中进行讨论，或在非正式的会议中进行讨论；或收集抗议书以及请愿书签名；或发行未经当局许可的出版物和从事地下期刊和图书的出版；此外也包括街道示威、群众集会和政治罢工；等等。

所有这些活动的法律地位都是不确定的。从一方面来看，言论和社团自由都写在宪法里；但另一方面，刑法条文禁止"煽动分裂国家"，"阴谋破坏国家秩序"和"组织分裂国家"的活动。而在进行上述规定时，并没有设定清楚的标准来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上述被"禁止"的活动类别。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执行机构和司法部门有权决定哪种政治活动属于非法活动。

传统体制与改革阶段出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现实做法上，而不在于宪法和刑法条文在文字是如何规定的。在改革阶段，仍然有政治审判，但次数越来越少，而且审判前也不再对被控告者实施肉体折磨。人们仍然会由于政治原因被关押，但人数越来越少，并且判刑通常也较轻。那些观点不同于当权者立场的人也要冒一定的风险，但风险已经小于在斯大林或传统体制其他领导者统治下的恐怖年代。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做出如下论断：政治改革后的社会主义体制已经与各种各样的独立运动以及和政见不同者开始共存，虽然还是有所限制，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容忍了他们的存在。

半合法运动和非法行动所承担的风险常常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和逆转的形势而发生变化。当政府对政治反对派日益增长的影响和激进主义感到惊恐时，它将更猛烈地反对他们，如果它仍然有能力这么做的话。[①] 像苏联的萨哈罗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哈威尔，他们都由于各自的活动遭受了数年的内部流放和监禁。

总而言之，在改革后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公众生活已经无法用简单的两分法来描述，既不能称之为多元化体制，也不能称之为单一制体制。和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一样，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进程中，政府及其官方意识形态仍处于支配地位，但非正式对立政治领域的存在却意味着政府再也无法完全控制人们的心灵。

---

① 在1981年，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大量被捕。

## 18.5 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敌对地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外[→4.5,14.1]。在这方面,改革使上述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与诸如减少国际紧张关系、裁军、缓和地方冲突及内乱等方面的外交政策紧密相关。反对西方势力的宣传逐步减弱,并越来越重视不同体制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在此,官方意识形态变得更加务实: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观念渐渐消退,代表全世界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打败代表全世界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想法也减弱了。

与改革进程相联系的"开放"一词可以广泛地用来形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国家所出现的变化。虽然开放并不彻底并且仍然受到大量行政管理的限制。但每个领域确实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开放。下面关于开放的讨论仅限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域,至于对外经济联系,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进行讨论[→23.6]。

与西方世界发生个人联系的各种方式已经变得非常广泛和深入:通信、电话以及最重要的联系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与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亲戚亲自见面,双向的私人旅游和公务旅行(商务的、科学的、学术的和文化的等等)。政府官员到资本主义国家商谈公务或旅游变得更为普遍。个别国家允许学生、研究者、教师和艺术家在国外呆上好几年,在国外就职也逐步得到认可。这些个人经历对人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大量民众开始收听西方无线电台。西方文献、影视和期刊大量进入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政府很少对它们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筛选。在进行着改革社会主义国家里,虽然有所谓高标准的精英文化,但"大众文化产品"也越来越多地渗入居民生活。西方的舞曲、时尚服装和消费习惯更是大量涌入。有时人们会觉得(不管是有意识还是出于本能),这种"涌入"是别有用心的:大众,尤其是年轻人,必定开始享用他们长久渴望的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产品,这样会转移他们对紧迫公众问题的注意力,避免积极的政治参与。

政府的行为往往不是铁板一块,偏向容忍的时期和更保守顽固的时期

常常交错存在。保守的党内意识形态专家在知识分子中寻找同盟,这些知识分子包括乡村浪漫主义者、美化歌颂过去的人、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们共同成为“反西方”的联盟。

虽然开放是有限度的,但其最终效果却不可阻挡。即使门只是开了一条缝并没有完全打开,但毕竟使外部的空气流入原来紧闭的房屋。过去几十年的教导可能确实取得了成功: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生活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状态中,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一旦人们有机会去直接或间接地去比较这两种体制,上述教导和类似的虚构故事就再也站不住脚了。不仅是“比较经济体制”的学者在进行比较研究,大街上越来越多的人们也在多次进行“比较研究”。这可能是开放最重要的结果,并成为改革进程背后最根本的推动力之一。

## 18.6 公开性和忠诚度的变化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让公开性(гласность,俄语)一词传遍世界。它包含两个紧密关联的要求:一是停止秘密言行,公众应该被告知影响他们的决定以及做出这些决定的准备工作。二是永远要告诉大家真相,必须停止发布虚假声明。

就第一点而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从来没有为其秘密言行感到窘迫,或把它当作必要的恶。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赞赏秘密行动,认为这是提高警惕[→4.5]的基本要求。它还争辩说所有的信息都可能有利于内部或外部敌人。因此,期望每位官员能够最少限度地泄露有关信息。

就第二点而言,公布真相当然是世界公认的道德需要。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道德规范从来没有声明过站在真相的对立面,这一道德戒律只是在实践中被打破。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掌握充分真相的某个人站起来并有意识地撒谎,这种情形是很少的。即便在那种情况下,撒谎者通常也会安慰自己说,这么做的出发点是好的,而且最终结果会证明手段的正当性。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大多数官员内心对于真相和虚假是很困惑的。他们相信自己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他们信任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塑造了他们的灵魂:他们信任领导,他们重复领导的说法,他们不敢以别的方式思考,他们被训练成

俯首听命的人，不能够怀疑也毫无批判精神。

对此也不必抱有幻想：在某种程度上说，秘密言行在所有政治机制中都普遍存在，任何政府对棘手的事实和操纵公众意见的误导都会保持缄默。社会科学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运作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削弱此类行为。在分析公开性时，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改革国家的领导是否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前任更倾向于坚持公正和公开，而是形成了怎样的机制来阻止秘密言行和有意欺骗的宣传。

在这方面，改革使局面有了巨大的改观。虽然并没有完全杜绝秘密言行，可已经使之大为减少。可信赖的信息越来越多，歪曲事实的现象越来越少，这更进一步推动了真实信息的广泛传播。

不可否认，公开政策也遭遇了强烈抵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政府几乎是条件反射式地力图隐瞒所有出现的问题、困难或危机，或者有选择地发布歪曲事实的信息。如果上述情形不再像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那样发生，主要归功于前面部分所提及的改革。举个核电站灾难的例子。20 世纪 50 年代末苏联发生了一次极其严重的核事故，但当时到底发生过什么、有多少人丧生、又造成了多大的健康和环境损失，所有这一切人们至今都不清楚。30 年之后，切尔诺贝利发生了核灾难。政府最初的反应（提到过的条件反射）是守住秘密、对此保持沉默和发布虚假信息。但这种状态只能持续几天。在国内外大众舆论以及国外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压力下，苏联政府不得不公布准确信息。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切回到主题。一旦一个国家对外部世界适度开放之后，被国内掩盖的消息就会通过国外的无线电广播和报纸返回到国内。新闻越自由、国家对外部世界越开放，真相就会不断大白于天下。于是，公正与公开变得越发成为习惯和自然的事情。

在强制和让公众满意之间存在着如何权衡取舍的问题。体制改革可以在一个可容忍的紧张水准上良好的运行，相对的满意在平衡曲线上对应着相对轻的强制。只要改革获得了政治和经济成功，而满意度也在增长，掌权者就可以对言论与社团自由更仁慈些，这样还不至于使他们的权力处于根本危险之中。但一旦政治和/或经济失败接踵发生，情况将会变得非常紧张，而且领导者也面临两难境地：或者再次使用（或试图再次使用）更严酷的

压迫手段，或者面对其不可分割的权力可能陷入危险的事实。

## 18.7 政治改革的局限

不同国家具体政治事件的历史进程各不相同。如同前面所提到的，政治改革的趋向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反对派力图尽可能多地保留传统体制的政治结构。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反对势力的力量组合都各不相同。

在某些国家里政治体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铁板一块，产生了特有的"政治改革均衡"。例如从 20 世纪 50 年代直到铁托逝世之前的南斯拉夫，匈牙利也有 15 到 20 年的卡达尔统治时期，这两个国家的"改革均衡"并不完全一样，均衡时期内特有的自由化与镇压组合也有所不同。但在两个国家里，力量组合都维持了很长一段时期。"原教旨共产主义者"的团体并不打算恢复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而在此期间企图超过铁托或卡达尔改革的民主派力量也没有强大到能将体制从矛盾的均衡状态中转移出来。

不过，即使在这两个国家，均衡状态也并不稳定。[①] 紧张不断加剧，最终的力量平衡还是压倒性地向迫切要求自由化改革的一方倾斜。其他国家的政治改革即使也处于矛盾平衡的中间状态，但它们都无法在更长时期内保持政治体制的统一。1980 年在波兰浮出水面的政治运动背后就存在这样的推动力，以致让执政的波兰统一政党（共产党）感到垄断权力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在 1981 年动用军事力量解散了团结工会。[②]

从执政的共产党的角度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改革和发展使它必须面对失去权力的可能性，因而它必定会想办法阻止这一趋势，不仅在最高领导层之中，而且在党政机构的所有层级都可以发现这种决心，其背后有几个因素。我们应该懂得国家权力对共产主义者而言，具有巨大的内在价值。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完全清楚，国家权力一旦失去就无法夺回，这是众所周知

---

① 与这些说明相连的含义可以在动态体制的数学理论中找到。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体制是否处于动态均衡之中以及均衡是否稳定。前者意味着所有影响体制的力量之和为零，而后者暗示在体制被冲击扰乱失去均衡时，存在着一种内部机制可以使其回复到均衡轨道上。

② 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会判断苏联的说服或压力以及波兰共产党宣布战时状态，在诉诸于军事行动的决定中起了多大的作用。

的最可怕的灾难，官方意识形态早已把这种观点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内心深处[→4.6]。这种担心可能还伴随着某种个人焦虑：如果发生体制的革命性变革将可能使他/她失去工作、地位、个人权力以及物质特权；他/她完全有理由担心受到报复。

在此可以对政治改革的讨论作一下总结。前面描述了政治领域形成的自由化趋势和矛盾状态。政治自由化趋势有时强劲，有时却被击退，有时对它的镇压采取较为温和的手段，有时则是极为残酷。只要体制变革仍然被称作改革并且没有发展成革命，就存在可识别的政治界限。

## 18.8 苏联东欧后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结构

后社会主义体制的未来政治结构取决于许多因素。真正开始转轨的地方已经举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少数几个政党参与选举，这些政党都已经在他们的宣言中接受了多党制和议会民主。这也适用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执政的共产党。在这个程度上而言，继任政党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而更接近于社会主义民主党，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本支柱：不惜任何代价垄断国家权力。

这些事件为体制的变革提供了其所需的基本条件。但必须补充的是，后社会主义今后一系列的发展取决于大量内部和外部因素。

首先，每个国家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举例说，波兰和匈牙利作为一方，罗马尼亚作为另一方，它们之间就存在着巨大差异。前两个国家的反对运动已经组织了一、二十年，并且在本章所描述的自由化趋势许多方面的转折点到来之前，它们已经向前推进了很长一段。而罗马尼亚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却以极端形式被保留了下来，无情的暴政一直持续到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一天。在转轨开始时，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状况与罗马尼亚的极端情形越接近，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的发展就越类似于“从零开始”。[①]

---

① 东德的后社会主义转轨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东德是跳过改革阶段，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骤然过渡到后社会主义的国家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与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情形相似。德国统一使整个情形变得独一无二。在统一后的德国里，迎接东德社会的议会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乎都是现成的。

即便在革命之前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政治改革的地方，其民主制度也是非常不健全的。新的合法政党需要时间来熟悉议会惯例，独立司法体系的建立需要时间，在旧体制下全能的警察机关让位给在法律控制下服务于公共安全的组织机构不可能在一夜完成。起草实行宪政、保护财产和私人契约，以及捍卫公民自由所必须的法律和规章需要时间；媒体要学会如何履行其责无旁贷的职责（如批评当权政府和调查滥用职权）也需要时间。

新体制继承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不仅在于其虚弱的民主制度基础，而且还有那些仍然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残存意识形态。不难发现人们对许多事物抱有很奇怪的两分法观点：多数人准备接受，而且事实上也积极地渴望拥有民主、拥有有保证的公民自由、市场经济、竞争和私人财产安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期望新政权在最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旧政权所没有履行的承诺。

一个根深蒂固的残留物是向政府索取父爱主义的关心，渴望政府保护个人免受转轨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所有冲击。同样残存于人们头脑中的还有平均主义思想情感，它们导致人们对市场经济和私人部门扩大所带来的不平等现象感到痛苦和反感。

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困难掩盖了由于后社会主义转轨巨大经济问题而产生的内在危险。在仍然幼稚的民主政治中会有人成为民粹主义的煽动者，极端民族主义趋向也有可能出现。可以认为，对权力的驾驭依然掌握在民主主义力量的手中，但不能认为反对民主变革就会销声匿迹。经济形势发展得越顺利，危险才会变得越小，也才越有信心期待民主政治的巩固。

# 第十九章　民(私)营部门的兴起

民(私)营部门的兴起是改革进程中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发展趋向。由于它影响了所有权关系(图15.1中的第二层),因此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民营部门以非常激进的方式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在公有产权之外有了私有产权,两者同时并存。但必须补充一点的是,这一深刻而彻底的变革只是在相当狭窄的经济领域中发生的。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私营部门几乎完全消失或者被缩减为经济中很小的一部分,以任何形式雇佣劳工的私人工厂都被废除。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只允许存在少量的私人手工劳动者和私人商贩,规模极小的家庭农场只有在集体农业制度下才得以幸存。此外,就只有非法的私人活动。本章将回顾和分析与上述初始状态点相比所发生的变迁。[①]

其中会遇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私营部门发展的强大趋势与阻碍并限制其发展的反对力量一直都旗鼓相当,相互对抗。我们将尝试介绍变革过程中这两方面的内容。

## 19.1　民(私)营部门发展的背后诱因

民(私)营部门不像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自上而下建立的国有或类似国

① 参见第5章有关私营部门和第二类经济(second economy)的资料,注释36。

有的合作部门那样,是由行政部门"人为"创造的。大多数人自己愿意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从事经济活动,这不需要任何建设性的支持,它只要求废除官僚障碍(或者至少大力削弱此类障碍)。所有官僚机构要做的是:至少逐步取消他们曾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为禁止私营部门运作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或者大幅度减少这些措施)。

如果把所有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说有好几千万人自发地进入了私营部门,各种形式的私人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①] 因此,一定有强烈的诱因促使人们即便在环境还不利于私营部门的情况下加入其中。首先是物质刺激,即对更高收入的渴盼。对许多人而言,私人企业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②] 有些人确实通过它走上了致富之路。即使发财致富的机会并非遍地都是,但仍然对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从前只有一条职业道路可供选择:即在等级制度中一步步地向上爬,而如今突然出现了第二种选择:人们可以在私营部门领域中慢慢走上富裕之路。

进入私营部门的另一个强烈诱因是渴望自主权。私人所有制将 a、b、c 各类型的财产权利交到了所有者手中。[③] 不管私人企业家是赚钱还是破产,他们对剩余收入都有着不容争辩的处置权。运气和官僚干预将大大影响他们的收入,但业绩和收入之间的联系远比与个人无关的、收入均等分配的公有制领域更为清晰明确。私人企业家发现自己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决策,对此他们感到非常满足。这一情感满足不仅仅属于富裕的、高度资本化的所有者,也同样属于极小的家庭作坊或小农所有者。[④] 即使是报酬微薄且不

---

① 关于农村的资本主义进程的详细分析,参见 I. Szelenyi(1988)。

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在民(私)营部门赚大钱的人恰恰因为他们是作为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的社会主义环境中的"外来体"进行经营活动,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运作。出租车司机或者街角蔬菜水果商贩在美国或西欧属于较下等的中产阶级,而在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属于"富人"。推动私营迅速发展的因素不仅仅是对企业家的物质刺激。受雇于私人所有者生产部门的工人也比国有部门从事同样工作的人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③ 在较大的私人企业当中,所有者可能将部分控制权委托给员工,但他本人掌握任命权,也能够辞退他们。[→5.2]。

④ 集体化带来了大量损失,如人类生活,一开始就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以及随后缓慢的增长率等等。但它所遗留下来的从未完全治愈的创伤之一便是打击了人们的自治意识:农民与土地紧密相连并与它融为一体;一旦失去了土地,他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只得从属于合作社,并且会产生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

稳定,许多人还是愿意成立私人企业,因为他们不希望总有个老板时时刻刻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对他们而言,独立自主本身就有其内在价值。

认识到个人有机会创办私人企业以及能够离开公共部门并在其他领域寻求成功和事业发展,能够使人们获得更多的自尊。私营部门的扩张增加了居民选择的机会,并最终扩大了个人自由。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独立自主、承担责任、冒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各种压力。不少人愿意成为某个组织中的员工,他们情愿有来自上面的控制,拿着工资并且能感觉到有人需要他们的劳动。关键之处是改革体制与传统体制的不同,改革为那些希望有机会独立从事商业经营的人们提供了机会。

在弄清楚人们为什么进入私营部门的原因之后,也必须解释一下政府的动机。政府官员的行为是矛盾的,在这个问题上往往有人格分裂的倾向,一部分人抵制私营部门[→19.5],又有一部分人在促进这一部门的发展。倾向于后者的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私人生产能够改善大众供应状况并缓和短缺现象。此外,私人部门的发展减少了一些社会紧张,允许一大批最活跃和最有进取心的人通过从事商业而忙于经济活动能使他们感到更满意。更为重要的是这也分散了他们对政治事务的注意力。政府对这些关系看得越清楚,批准私营部门的规章制度就变得越连贯。

## 19.2 对民(私)营部门的考察

在生产领域,民(私)营部门最典型的生产单位和企业是:

1. *小型家庭农业所有制*。改革所导致的情形各不相同,因此最好对少数几个国家进行单独研究。①

最剧烈的变革发生在中国,在那里,集体化在传统体制下偏离得最远[→5.5]。改革结束了人民公社体制,而且农业生产向小型家庭所有过渡。这一变化并没有明确地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尤其是开始:土地在名义上仍

---

① 接下来的研究选择借鉴了以下各类文献:N. J. Cochrane(1988)关于东欧的概要;有关苏联的情况见 Y. Markish(1989)、K. M. Brooks(1990)和 S. Hedlund(1989);有关中国的研究见 K. Hartford(1990)、N. R. Lardy(1986)、M. Selden(1988)和 T. Sicular(1985);有关匈牙利的介绍见 M. Marrese(1983)和 N. Swain(1987)。

然是社会所有,家庭只对耕地"承担责任",而且最初只获得短期的租用。后来租期逐步延长,而且租借权可以继承,在某些地区甚至可以出售。土地事实上成为小型家庭所拥有的私有财产,而且农场家畜、机器、设备和建筑也同时加入到这一所有制形式之中(某些大型集体农场还被保留着)。

这种制度安排一般被称为"责任制",这是一个真正的私有化进程:从前公有的资产变成了私人所有。中国农业大规模的快速私有化不是"自上而下"决定的。首先,行政部门只是放松了以前人民公社是农业唯一的所有权形式的严格规定,并且允许适度地进行实验。最初,只有少数几种新的所有权形式如集体和个人农场的各种变体,但是"责任制"即私人家庭所有制很快大规模地流行起来。在这种"自下而上"的私有化运动压力下,行政部门排除了官僚障碍,在1980年承认私营部门可以在农业中占主导地位。中国改革第一阶段经济扩张的主要原因就是农业转型。农民们开始表现出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从未有过的勤奋和工作活力。表19.1显示了所有权形式的变化和产量的增长。①

**表19.1　中国农业的所有制形式和产量**

| | 1978-1987 | 1978 | 1987 |
|---|---|---|---|
| 1. 农业分布 | | | |
| 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产出 | | | |
| 国有 | — | 1.7 | 2.2 |
| 集体 | — | 98.3 | 39.1 |
| 私有 | — | 0.0 | 57.7 |
| 2. 农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a(%) | 6.1 | — | — |

来源:第一组:W. Ming(1990,p. 303);第二组:P. Marer等人(1991,国家制表)。
a. 以不变生产价格计算的农业GDP为基础。

南斯拉夫的领导层只是在1945年到1949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试图发

① 部分农产品的产量显示了极高的年增长率:在1978-1984年期间,棉花,18.7%;油料作物,14.6%;甘蔗,11.1%;烟草,15.2%;肉,10.1%。《世界发展报告》(1986,p. 105)。

展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从而实现农业的全面集体化。当他们着手进行改革时（包括引入自我管理），没有打乱农业中的所有制关系，而且整个改革时期基本都保留着带有小农特征的小型家庭所有制形式。

波兰虽然长期处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统治之下，但它却是东欧国家中唯一没有进行实业集体化的国家。在进行改革之前，波兰就宣布农业中的私有产权将保持不变，改革一开始它又重申这项政策并以此作为其改革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匈牙利就采取了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措施。在改革期间，尽管私有的小型家庭农场变得更加安全，但其所占比例依然很小；而合作社成员的家庭农场和农副业生产的地位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苏联的农业改革在一开始就步伐缓慢，至今它也没有决定未来是否应采取中国那种更为激进的道路。1988—1989年出台的政策为农业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与中国相比，苏联农村改革的自发性很差，自下而上的私有产权运动以及私人活动的积极性也不如中国，而来自官僚机构的阻力却比中国大得多。迄今为止苏联的农民们还无法克服集体化给他们带来的可怕的精神创伤。① 即便是亲身经历过集体化的人们早已死去，但他们的子孙后代仍然感觉私有财产是不受保护的，土地也很有可能被再次夺走。如果他们准备通过个人经营农场成为成功的农场主，这很可能意味着他们将再次被污辱为"kulaks（富农）"，然后就是受迫害、被驱逐出境甚至失去生命。政府关于恢复农民私有制的任何表示看起来都带有敌意，甚至政府犹豫不决的态度都加深了人们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

2. *家庭农场经营和农副业生产*。这两种形式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一直存在[→5.5]。可以说，改革为家庭农场经营和农副业生产带来了新的活力，从而带来了产量的巨大增长。在改革过程中，政府当局、合作社和国有农场为家庭农场和农副业提供了种子、机器、运输工具以及其他的生产工具来支持它们。

3. *其他部门的小型家庭企业*。虽然多数国家在小型家庭企业方面的改

---

① 因此，在中国成功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无法很快地在苏联被集体化伤害最深的那些地方生根（乌克兰和俄罗斯）。而其他地方的改革进程则相对较快：如波罗的海诸国旧农场的重新发展。

革突破都发生在农业领域,但小型家庭企业在其他经济部门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见表 19.2 和 19.3),其主要活动领域包括修理维护、旅客与货物运输、建筑物建筑、零售业、公共饮食业以及其他服务类行业。

**表 19.2　中国非农业私营部门的增长**

| | 1981(千) | 1988(千) | 1988/81(%) |
|---|---|---|---|
| 私有企业的数量 a | 1,829 | 14,527 | 794 |
| 私有企业雇员的数量 | 2,274 | 23,049 | 1,014 |

来源:第 1 列:《北京观察》,1989 年 2 月 27 日 -3 月 15 日;
第 2 列:《人民日报》,1989 年 3 月 11 日
a. 个人和/或家庭所有的企业。

4. *非农业部门的补充性私人活动*。这种形式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也一直存在:个人在公共部门有个固定的工作岗位,但除了做分内工作之外,他/她还承担“额外工作”以赚取额外报酬。这种私人活动可以被称作补充性的,因为个人用这种方式得到额外收入以补充其主要工作岗位的收入。就这一点而言,它与第 2 种形式很相似。如果服务的买方是其他个人或家庭[→5.6],那么就可以把这类活动归为私营部门。

这类活动在改革进程中变得非常普遍,有相当多的公共部门员工参与其中,所获得的收入也都成为他们的基本收入来源之一。

**表 19.3　匈牙利私有小型工业和私有零售业的增长**

| | 自我雇佣的手工业者的数量(%) | 自己经营的手工业者的雇员数量(%) | 私人零售商的数量(%) | 私人零售商的员工数量(%) |
|---|---|---|---|---|
| 1984 | 100 | 100 | 100 | 100 |
| 1985 | 104.8 | 108.1 | 113.7 | 121.5 |
| 1986 | 108.4 | 116.1 | 129.3 | 141.3 |
| 1987 | 110.8 | 183.1 | 142.1 | 169.6 |
| 1988 | 121.1 | 263.3 | 154.2 | 188.1 |
| 1989 | 125.8 | 346.3 | 176.9 | 208.8 |

来源:K. Balazs 和 M. Laki (1991,p.504)。

第1、2、3、4种形式的共同特点是家庭基本上只利用了它自己的劳动力，雇用外部劳动力至多是充当临时帮手。正如本书5.2中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常将这种家庭企业归为小商品生产，这种分类方式将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区别开来。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有者将他们占有的（或借入的）资本与外部雇用的劳动力（可能再加上他们自己及其家庭的劳动力）相结合。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的观点，在生产领域是否经常雇用雇佣劳动力是区分这两类社会部门的标准，因为长期雇用雇佣劳动力意味着通过资本占有和剥削雇佣劳动力。下面一种形式(5)就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5. *雇佣劳动力的私人企业*。这个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在改革进程中出现在农业和其他部门中，其中大多数都处于小型家庭企业和小型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模糊地带。在有些国家，例如中国、波兰、匈牙利和越南，还零散地出现了一些中型资本主义企业。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也有了发展，但数量极少。在中型和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得到更为普遍的发展之前，这个国家（就其政治发展水平而言）必然已经完成了民主革命并进入后社会主义阶段，或者至少达到了改革进程与革命性体制变革的各个要素紧密相连的状态。

表19.4和19.5显示出改革期间苏联和匈牙利上述1—5类型私营部门的发展。[①]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有两种部门形式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营部门，但它们却介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模糊地带，并且带有这两个部门的某些特征。

6. *国有资产租赁*。就b类权利而言，政府仍然是资本的所有者，但a、c类权利在租期内则可以赋予私人或团体，以此换得租金。根据a类权利，剩余收入落入承租人的腰包，如果剩余收入为负，那么他必须弥补损失。c类权利是指承租人管理企业并可以雇用和解雇员工。[②]

---

① 正式获得批准的市内私营部门在波兰也得到了迅速增长。这类私营部门包括上述序列中的第3和第5种形式。根据J. Rostowski的数据(1989a, p. 198)，这个部门雇用的劳动力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2-5%的速度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其增长率达到了7-13%。

② 租赁的具体条款决定了c类权利是否完全让渡给承租人。所有者（政府当局或企业）可能保留部分控制权。

**表 19.4　苏联所谓"合作社部门"的增长**

| 年份 | 合作社成员 |
|---|---|
| 1987 年 1 月 | 15,000 |
| 1987 年 7 月 | 39,100 |
| 1988 年 1 月 | 152,100 |
| 1988 年 4 月 | 245,700 |
| 1988 年 7 月 | 458,700 |
| 1988 年 10 月 | 777,000 |
| 1989 年 1 月 | 1,396,500 |
| 1989 年 7 月 | 1,660,000 |
| 1989 年 10 月 | 2,000,000 |
| 1990 年 1 月 | 2,573,800 |
| 1990 年 7 月 | 3,100,000 |

来源:此表由 C. Kruger 为本书编辑,使用的数据来自《真理报》、《经济报》,Ekonomika i Zhizn'、V. N. Beznosnikov(1990,p. 25)、T. I. Koriagina(1990b,p. 145)和 T. Kuznetsova(1989,p. 149)。

注:在改革之初,"合作社"这一说法开始被当作部分私营部门的掩护名称使用。在某些情况下,它意味着私营合伙方式;在其他情况下,它指的是一群雇用雇员的私人所有者。从在这个意义上看,合作社部门包括正文中列出的第 2 种和第 5 种形式。数据不包括 sovmestitel'stvo,即国有和非国有工作的合并。

**表 19.5　匈牙利社会各部门的相对规模**

| | 第一经济(%) | 第二经济(%) |
|---|---|---|
| 1. 1984 年全部活动时间的分配(除去用于家务和交通的时间) | 67 | 33 |
| 2. 社会各部门对住宅建设的贡献(以新房屋的数量衡量) | 44.5 | 55.5 |
| 3. 1983 年社会各部门对修理维护服务的贡献 | 13 | 87 |

来源:第一行:J. Timar(1985,p. 306);第二行:Ko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中央统计局,布达佩斯)(1985,p. 139)、P. Belyo 和 B. Drexler(1985,p. 60)。这两项研究依靠微观调查(访谈和问卷调查)。

注:此表包括全部活动的官方记载和未记载部分。未记载部分的数据以编辑此表数据库的研究者严格估算为基础。第一类经济的数据包括传统(kolkhoz - like)的农业合作

社[→5.5],还包括所谓的“企业业务合伙方式”。第二类经济的资料包括家庭农场和“雇员的副业生产”(正文中的1—5类)。第一行的数据是所有生产部门的总和,其中包括住宅建设。第二行还对住宅建设进行了单独考察。第三行中第二类经济的资料是以下三部分的总和:正式的私营部门,14%;不包括“自己动手”的非正式私营部门,19%;家庭内“自己动手”的活动,54%。

在少数几个改革国家中,租赁形式广泛分布于各类单位(如商店、餐馆和小企业)。[①] 租赁方式易于在具有以下特征的领域推广:即租赁期开始和结束时,容易对资产价值进行评估;而且承租人能对任何损害负责。[②]

7. 混合所有权的企业(Firms in joint ownership)。在这种情形下,特定企业的所有权由政府和个人或私有企业分享。

在某些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会与外国私有资本进行合作。这些企业在享有特权的、人为的法律和组织条件下运行,而且它们的要求往往得到特殊关照。

波兰、匈牙利、中国和苏联都曾有过政府与国内私有资本(或者在某些情形下与国内外两类私有资本)的合营试验。[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农村涌现出的大量乡镇企业。这些企业从事非农业活动,并获得了显著成功;它们的生产增长非常迅猛。财产权利的划分往往不统一或者含混不清:通常是公社和私人的财产权相结合。但乡镇

---

① 租赁安排最早出现在波兰。如前所述,中国的“承包责任制”依照法律术语是作为租赁形式开始的,但其实质却发展成为私有化。苏联在1989年4月批准的农业决议也允许租赁形式(аренда,俄语)。

② 20世纪60年代,匈牙利经济学家Tibor Liska提议把他详细设计的一种租赁体制作为社会主义所有权改革的主导形式。他的提议是,政府的全部固定资产包括工厂,都出租给那些答应经营并在拍卖中给出最优惠租赁条款的人。见T. Liska(1988),还有J. Barsony(1982)和J. Szabo(1989)。Liska的意见不仅在匈牙利而且在国外都得到了强烈的反响。改革进程中的官僚机构无法放弃它对整个政府部门a、c类的财产权利。在现行的权力结构下,很难想像政府会如此“自掉身价”,将自己限定于租赁合同中“拍卖人”的角色。同样无法确定的是,究竟能有多少企业家会在不要求b类财产权利(即拥有充分的、不可逆转的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愿意对租赁大公司负完全责任。

③ 当政府企业以股份公司的法律形式存在并将少部分股份让与或分配给雇员时,也就正式出现了合营企业。

企业中的大部分确实是私有企业。①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处于生产领域私营部门：狭义上它包括第1—5类形式，而广义上包括第1—7类形式。

迄今我们所讨论过的所有形式的私营部门，其收入都来自生产活动和工作。在多数情形下，劳动与私有资本相结合，因此所产生的收入是不同比例的劳动力工资、因企业家身份而得的企业家利润以及所有权租金。除此以外，还有第八种形式，其收入不包含工资和企业家利润，而主要依靠所有权获得的租金(或更精确地说，租金收入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工资和企业家利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8. *所有权收入*。这有好几种形式，其中前四种是指利用个人持有的钱获利。

a. 在国有银行存款的利息。这种形式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就存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其他的投资方式。

b. 国家机构和国有企业发行的债券收益。这在中国、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家较为普遍。

c. 资金有息借贷给个人，偿还条款由贷款者和借款者共同协商确定。

d. 私人企业的部分参与制(Part - ownership of a private enterprise)。个人拿自己的钱来参与一个私人企业的运作，并且在此基础上要求取得部分企业利润，不论他是否为这个企业工作。这大致相当于拥有股份公司的部分股份。但在这些国家里，私有股份公司是法律所不准许的，因此，部分参与制只能在没有法律管制的环境中适用。②

e. 除了货币投资之外，其他主要的收入机会是出租私人不动产：如一块

---

① 见W. A. Byrd和林青松等(1990)。在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官方统计中，缺乏可靠的统计数字将私有企业、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区分开。不过非正式的观察数据显示，其实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的大多数都是私营企业。1984年之后建成的乡村企业尤其如此。而大多数乡村企业都是1984年之后创建的。由于政府政策歧视私营企业，支持集体企业，许多私营企业声称自己是集体企业。然而如果想要政府承认它们是集体企业，它们就不得不以特种营业税的形式向政府交费。

② 这一观点起源于如下的争论中：国有企业应该转变为股份公司，并且将它们的一部分股份卖给个人。不过，在改革阶段只有极其例外的情形下才采取这种做法，这种所有权关系的重建在后社会主义阶段才开始真正加以考虑。

土地、房屋、私有公寓、度假村、车库或商务建筑(出租可能要包括为承租人提供维护和其他服务。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份收入就不仅仅来自所有权租金,因为它还包含了劳动收入和企业家利润的成分)。

私营部门的相对比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加以衡量,其中一种就是确定它所占产出的比例,或者它所使用的投入所占的比例。根据定义,只有第1—7种形式可以计算在内。另一个可能的计算方法是把所有个人的收入加起来,包括货币和实物形式的所有报酬。① 要确定有多大比例的收入源自私营部门,除来自第1—7种形式的收入外,还必须包括来自第八种形式的收入。②

还有一种观点也可以应用于对私营部门的研究。上文曾提到过与中国农业有关的私营部门扩张的两种类型,这里可以用一种更普遍的形式加以强调。

一条途径是私人所有者自己创办新的私人工厂,他可以用自己的钱,也可以贷款、或是用其他投资者的钱来购买资本品。通过这种办法成立私人企业并与国有工厂并存,而国有工厂仍然是国家所有制。

另一条途径是将国有(或合作社所有)工厂卖给个人或一群人。在这种情形下,就出现所有权的"转让",这样私有制就开始代替公有制,这一进程通常被称为"私有化"。这条途径可以与第一条途径相结合。

在改革过程中,多数部门大都采取第一条途径,当然其中也有例外的情况,最重要的例外就是中国农业的重组。私有化也会出现在其他部门(例如,有几个国家将某些国有公寓卖给它们的承租人),但大规模的全面私有化只是发生在革命之后的后社会主义体制下。

## 19.3 民(私)营部门和官方意识形态

谴责私有制并强调公有制的唯一合法地位,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官方

---

① 有关匈牙利实证调查,可参见K. Balazs和M. Laki(1991)。

② 这里又需要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它是如何解释所出现的状况的。因为如果要对私营部门所处的政治环境做出评价,就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对此是如何理解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金钱所有者"剪息票"所获得的收入、地主获得的房屋租金或乡下土地所有者通过他的田地收取租金都是剥削所得,而据此获得收入的人就变成了剥削阶级的一员。

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5.7]。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官方路线认为,任何形式的私有制至多是在短期内可以容忍的资本主义残余。

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经典著作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依照马克思的观点,未来社会将消灭私有制。《资本论》中这段话曾被一再引用:"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物质外壳不能兼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削者就要被剥削了。"①恩格斯则这样说:"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换手段的支配权以及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事实上,废除私有制是全部社会革命最简明扼要的概括,也是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共产主义者把废除私有制作为自己的主要要求,这是不容置疑的。"②

这是改革进程中最令人苦恼和最敏感的意识形态困境。这绝不是微不足道的战术细节,恰如恩格斯所强调的,那是共产主义者的主要要求之一,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石。

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合理的论据反对私有制,其中有些确实指出了这种所有权形式的真正缺点。这样,人们不仅受理性争论所影响,而且被推理过程中更深层次的感情所影响。共产主义者(以及许多非共产主义左翼人士)对私有制极为反感,或者是深恶痛绝。他们在道义上感到愤慨:因为私有制占主导地位与他们认为在道德层面应遭到谴责的富人特权及不公正的收入分配紧密相连,还因为正是私有制导致了工人受到雇主的剥削。他们认为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具有其内在价值,即便是带来经济效率的降低也在所不惜。甚至只是部分放弃这一思想都会造成很大的恐慌,就如同宗教信仰者放弃灵魂不朽的信念一样。之所以存在反对私营部门扩张的巨大反对力量,重要原因之一是隐藏于深处的意识形态信念。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做如下讲话时,就表现出他与传统意识形态仍然完全保持一致:"因此必须通过进行经济关系的改革

---

① 卡·马克思[1867-94](1978,第32章,p. 929)。

② 弗·恩格斯[1847](1964,pp. 74、78)。

(перестройка)来发掘我们体制中各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内在机遇。但众所周知,私有制是人剥削人的基础,我们完成革命正是为了消灭它,为了把一切交给人民。试图恢复私有制意味着倒退,那是非常错误的决定。"①

改革过程中的官方意识形态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出于现实考虑,私有制的传统反对派与当时掌权的改革派之间,以及部分容忍私有制的力量和鼓励私有制的力量之间都力图达成妥协。小商品生产者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体制相适应的,而且需要强调指出它包括勤奋的工人、农民和普通的市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确实有过与他们进行政治结盟的传统,虽然这只适用于前革命时期。因为在当时,为了取得革命的成功和推翻革命前的专制体制,必须支持小农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后来,随着农村集体化的出现和城市小商品生产的灭亡,这一联盟被打破,但这种观念如今作为意识形态的辅助力量又再次出现。

但问题在于,同时也存在着相反的强硬派意识形态。小商品生产在哪里终结,资本主义又将在何处兴起?列宁曾这样警告:"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②而且事实上,当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大批出现时,他们当中最幸运和最聪明的人会改变规则并欺骗买方,于是那些最能干和最勤奋的人终将脱颖而出。他们会想方设法进行更大规模和更高利润的投资,扩大他们的工厂,并最终成长为资本家。

如前所述,这一系列问题与收入分配原则相互关联。社会主义价值体制的信仰者不能接受"非劳动所得"的概念。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他本人就对所谓利息是节俭的报酬的想法极为鄙夷。这深深打动了许多辛苦劳作却收入微薄的人们,他们对那些"不劳而获"的人充满愤怒,这是滋生反对私有制意识形态的肥沃土壤。

反感不仅仅限于"非劳动所得",还延伸至那些通过自己辛勤劳动而致富的人们,比如农民或零售商。一大批企业家迅速致富。许多被私营部门雇用的人比国营部门的同辈要挣得多。对更多财富和更高收入的气愤、羡

---

①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讲话,载于《真理报》,1988 年 11 月 26 日。

② 弗·伊·列宁[1920](1966,p. 24)。

慕以及嫉妒与对私营部门的猜疑、反感和仇恨紧紧联系在一起,前者为后者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外,由于数十年来反对私有制意识形态的反复鼓吹,它已经扎根于无数人的心里,这更加深了对私营部门的反感。只要官方采取各种反对"奸商"、"投机商"或"寄生虫"的措施,通常都会引起大批群众的赞成。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无法坚持如一地推进牵涉到私有制、私人经济活动和通过所有权获取收入等内容的思想路线。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私有制的传统;另一方面是改革的现实要求,两者之间充满了矛盾,根深蒂固的本能反感使得前一种思潮占据着主导地位。

## 19.4 私有制与市场协调的亲和力

让我们回到前面用过的一个比喻[→6.4,15.2]。"亲和力"是一个化学术语,指的是"亲属关系"。可以象征性地将这个词用于政治经济制度:某些所有权形式能够与某些协调机制结合。也存在相反的现象:有些所有权形式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与某些协调机制相互契合。

私有制和市场机制之间存在密切的亲和力。[①] 市场机制的显著特征在 **6.1** 部分中描述过:

任何私营企业都不具备对另一个企业的行政管理权力,它们的关系是平行的。

私营企业根据其定义是自治性质的:产权属于私人个人或者一群个体。因此不言而喻,这些自治经济单位之间自愿订立合同,无需自上而下的命令。以这种所有制为基础的自治要求分散协调机制。

所有者参与生产的主要动机是物质利益。因此,任何私人所有者都不会忽视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入总额以及相应的成本,即产出的卖出价格和投入的支付价格。价格在市场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是赚是赔都要用货币来

---

① 在路·冯·米塞斯[1920](1935)和后来的冯·哈耶克(1935)在关于社会主义的那场争论中,非常强调各种类型的协调机制与所有权形式之间的密切联系。后来"产权学派"[→21.1,21.6](参考数据见第21章,注释43)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种联系上来。

衡量，经营者对此非常熟悉。

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运作和市场的动态变化已经有了很深刻的理解。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的正常运转要求允许新企业自由进入、企业家之间竞争以及在竞争中落败的企业家一定要被淘汰出局。

有必要在转向这部分的真正主题（改革体制下私营部门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之前重复一遍。所有出现在私营企业当中或私营企业和大众之间的经济关系基本上依靠市场机制来协调。通过市场机制自然地向前推进，这与私营部门的扩张密不可分。① 私营企业在互相进入，或它们与家庭之间由市场协调的关系之前，不需要任何中央指令。一切都是自发的；为了让市场发展，唯一要做的就是取消或至少放松管制。

有了真正的市场协调，很多东西都将随之而来。购买者是否有同意交易价格和其他条款的自由决定权。② 就这一点而言，改革体制也不乏动力：企业家紧紧盯住可能的赢利机会，这必然带来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且还可能有公共部门参与）。但如果私人企业家不能做到收支平衡，那么他们只得放弃并可能遭受巨大损失。私营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的；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没有任何政府会紧急援助一家境况不佳的私营企业。③ 因此，市场表现出了它的本性：无情的自然选择。

这便是真正的市场协调。但必须补充两点：一点是市场依然处于官僚协调机制的阴影笼罩之下，官僚机制无处不在，它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干预私营企业彼此之间关系，以及私营企业与家庭的关系[→19.5]。当然，即便是干预最少的资本主义政府也有禁入和限制的措施。在此，我并不打算介入这一复杂的规范性问题，即如果必须以公认的伦理和法律规范为基础，国家的干预、限制和禁入的最低限度究竟是多少。在改革体制下，对私营领

---

① 强调“自然”是为了使它与在国有企业之间人为地引入市场的行为形成对比[→21.7]。这一方法受奥地利学派对市场协调的阐述所启发，即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作以及熊彼特关于企业家作用的理论。关于这点，可以参见 P. 默雷尔(1990a,1990b)。

② 在行政当局想要控制私营部门的价格时，这种状况也存在。除了少许很容易“被确认”的价格之外，其目标带有很大的欺骗性，有许多办法能够绕过行政价格管制。

③ 政府不阻挠退出，即它允许无法支持自身的私营企业破产。然而它设置了许多进入障碍，这必然导致竞争的减少[→19.5]。

域的市场干预、限制和禁止远远超出了最低限度,这是改革体制所特有的,并且主要与权力和意识形态有关。

另一点是,现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市场还是非常原始和落后的。市场是在相当低的文明和技术水准时就出现的制度,已经有上千年历史。无论是在中世纪的西方世界还是50到100年前的第三世界,都可以发现农民带着自己的农产品和牲畜到城市的集市上叫卖;小商贩站在手推车后面兜售商品;店主在狭促的、装备很差的商店里等候顾客,从国外回来的旅行者在行李中带着他们从国外买来准备在国内出售的东西。这些昔日市场的参与者并没有完全消失,甚至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存在,但他们已不再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他们的位置很大程度上被市场的现代形式所取代。但市场在几十年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已经消失殆尽,当它只能以这种原始的中世纪“巴尔干半岛”或“亚洲”形式重新出现,如何区分改革体制下的私营部门市场与发达的市场呢?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机制下,更小的经济单位被许多的分散组织联系在一起:批发商、商品交易所、仓储和搬运公司以及广告代理商。房地产经纪人是房地产和住房市场机制运作所必须的;股票交易所、股票经纪人、共同基金和投资银行是买入与卖出财产权利所必须的。市场的平稳运行还涉及广泛分散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中介等金融部门。

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些组织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即使存在于某些部门,也只是以公有和官僚的形式运作。它们通常只服务于公共部门,不对私营部门开放或者只是有限开放。

现代的市场协调要求有现代化的技术:分布广泛且高效的电话服务、快捷可靠的邮递、个人计算机、复印机,等等。

即使是占支配地位的政府部门也没有充分配备这些现代化的技术,私营部门就更加落后,许多私营企业连电话都没有。即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欧国家,私营企业也是依靠那些极为原始落后的技术相互联系。

即使从改革一开始就对私人领域充分运用市场协调机制,但要建立现代市场,仍然需要经过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何况根本就不可能没有约束。历史的残余和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反市场传统只是部分地解释了刚才所描述的落后状态,另一部分原因便是政府不仅对私有制而且对与之相伴的市

场机制始终抱有敌意。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不仅不鼓励,甚至阻碍建立市场协调所必须的私营组织网络基础的原因,同时也造成了技术装备供给的严重不足。

## 19.5 民(私)营部门与政府

如前所述,在改革阶段中,政府对私营部门的行为总是自相矛盾的。有时候它会帮助私营部门恢复信心并施以援助,而有时候又会破坏它的信心并阻碍其经营发展。矛盾的行为可能采取如下形式:某个政府部门在支持私营部门,而另一个部门却在阻碍它的发展;或者有时候支持,有时候又不支持,变化无常。

这两种矛盾行为都各有原因。前文已经提到过政府允许私营部门经营发展的动机何在。尽管在政府的脑子里一边意识到需要私营部门,另一边却压抑着对私有制和个人活动的反感和仇恨。之所以反感,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源于意识形态[→19.3],另一个原因则与权力有关。国有企业和类似国有的合作社领导是官僚等级制度中的中坚力量;企业经理和合作社主席都是政府的人。可以这样说,政府从内部统治公共部门,而它只能从外部限制私营部门的经营和收入。它不能任命任何人担任个体农场主和私人手工业者,它也不能将人们从这些职位上解雇。哪怕仅仅是部分自治都是极权主义政府所无法容忍的。

本章前面曾提及私营企业并不是通过有意识的行政手段建立的;它自发地产生于个人自愿的主动行为。政府对它的抵制也可以这样描述:进行改革的国家的中央行政机关通常并不指示下级机构阻碍私营部门的活动。政府对私营部门的抵制同样是自发的,它产生于权力利益和官僚意识形态。

政府与私营部门间的联系之要点如下所述:

1. *私人财产安全性*。根据他们自身(或上一代人)的记忆或者历史教训,人们回想起先前的国有化行为以及多少人的房屋财产和个人财富被充公。他们回忆起土地是如何从农民手中被拿走的。他们觉得他们现在占有的私人财产是不安全的。尽管已经得到再三保证,他们仍然看不到对私人财产安全性的任何法治保障。

2. 合法性;经营许可。自由企业经济意味着任何人都有机会创办任何性质的私营企业,无须从当局取得特别许可证。这个原则即使在以自由企业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例外。大多数国家也对某些具有外部性的社会公用事业发放经营许可证,比如创办私营医院或学校,公共交通企业(经营航空、铁路或公共汽车)等等。

但即便在进行改革的更为宽松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上述比例也是颠倒的。只有相当少的生产活动不需要经营许可。改革阶段与传统体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可以更自由地签发许可证,而不在于放弃了审批权。这是它试图控制私营部门的另一种方式。

在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中已经存在"黑色"经济:即未经许可就提供的工业或商业服务[→5.9]。在这个方面,改革带来了两种变化。一种是某些先前被禁止的活动得到准许,虽然从事这类活动必须从有关当局取得经营许可证。例如,使用私有车辆提供出租车服务在过去是被禁止的。这么做的人都冒着被告发的危险,现在私有出租车只须经许可审批后就可以运营。在这种情况下,某一活动的市场颜色已经彻底改变:"黑色"市场变为"白色"市场。另一个可能的变化是某些私人活动仍然被禁止,但禁令在实际中却无法执行。例如,个人在没有向当局声明或支付税金的情况下,兼职给别人做修理工作就是被禁止的。政府自己也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它熟视无睹。在这里,市场颜色的改变就不太彻底:从"黑色"变为"灰色"。后一种变化在进行改革的国家中普遍存在。有很多人从事着当局容忍的半合法、非正式的经济活动。①

在非正式的、半合法的领域工作大大地有助于改善公众服务供给并提高了那些劳动者的收入。但这份收入是非常不确定的;没有人知道何时法律将严厉地指向那些在"阴影经济"中工作的人们。这是私营部门可以最大限度摆脱官僚控制的领域,但它高度依赖政府的仁慈之心。

3. 增长限制。政府有意识地限制私营部门的增长,不仅在宏观水平上

---

① "第二类经济"这个术语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著作中非常普遍[→5.6],但如前所述,没有关于这一术语的通用概念。有些作品将此术语限定于非正式的私营部门及其"灰色"或"黑色"活动,其他作品将合法的"白色"私营部门也包含在内。本书使用后一种解释,将第二类经济定义为所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私营部门。

保证私营部门整体不能超过经济的既定比例，而且在微观水平上也试图控制每个单位的规模。这与前面讨论过的不让小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是紧密相关的。在控制过程中部分使用法律措施，例如设置私营企业可以雇佣的付酬员工的上限。[①] 当然也采取了其他方法：征税，收回发展"过大"的企业的经营许可证或威胁它们。

4. *私人合同的执行*。发达国家的市场协调是自发产生的，但它发展的每一步都有立法和法律实践的支持。有许多明确的法律制度来保护分散的私人交易，强制遵守合同，保证公平竞争，排除自由进入障碍，提供"退出"的有序通道以及维护债务人和债权人的权利。当然，法律也不能提供百分之百的保证；它无法防止欺诈。即便如此，因为有了法官、律师、再加上法律的有效执行，它能够为市场的平稳运行提供法律基础。[②] 然而，在改革社会主义体制下刚刚开始运行的市场却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法律基础。

虽然进行改革的国家在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们还远远达不到履行这些职责的水平。

5. *政府对私人财产和私人企业的法律保护*。如果政府行为方式对私人所有者或企业家造成了损害，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得到补偿。任何私人或私营企业都可以向他的上级当局或者另一个政府机构（检举办公室或所谓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控诉，但他们都不可能向法院起诉政府。政府更容易变得专断。

6. *税收*。在对私营部门的税收问题上也是自相矛盾。一方面，税收管理制度经常变化，并且常常以专断的方式应用于经济。通常某个人应支付的税额都是预先决定了的。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时期，向私营企业征收非常

---

① 人员数量根据国家和时期的不同而不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私营企业雇佣员工限额在匈牙利是7个，在中国是8个。苏联1986年通过的"个体劳动法"活动的第一款规定："使用雇佣劳动力以榨取非劳动所得为目的的或者损害其他社会主义利益的个体劳动活动是不容许的。"《真理报》，1986年11月26日。顺便提一句，上述措辞生动地证实了前面部分有关官方意识形态的评论。

② 现代资本主义的买卖过程由市场协调占主导的复杂机制加以协调；还有以下协调方式的支持和补充：国家提供政府担保和法律秩序，主要由商业信誉和守信原则构成的道德机制，立法机制以及特定利益组织活动所产生的自治机制。

重的税,以致于根本无法获得利润。[1] 另一方面,对税收管理制度进行随意解释,再加上大范围的半合法和"灰色"活动,人们很容易逃税。这些不确定性不利于公众形成诚实纳税的道德风气。

7. 能否获得信用、外汇、物资并进入国家权力阶层。政府在分配资源时,往往歧视私营部门,支持公有部门。这主要体现于银行体系,它成了官方信用(包括对外贸易中的外汇)的分配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合作伙伴。政府在分配短缺物资时也同样如此。国有企业自己或依据法律,或直截了当地表现出对私营部门的歧视。

私营部门在上述列举的所有领域中都处于不利地位,究其原因是因为不存在相应的政党或运动团体来坚决捍卫它们的利益。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权力通常都掌握在代表私营企业利益的政党或运动团体手中。即使当前当权的政党代表其他利益,也会有强大的反对党保护私营企业的根本利益并保证捍卫私人财产的法律的一贯性。而与此相反,即便是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私营部门也不能指望在政治舞台上听见它们的声音,它只能听任政府通过征税或其他限制办法强加各种束缚。私营部门往往也得不到反对派运动的支持。一些持不同政见的政治趋向显然都是反资本主义的。[2] 另外一些反对派可能带有自由化倾向,但他们也不希望招致试图"恢复资本主义"的指责。

由于外部环境对私营部门表现得摇摆不定,私营部门自身也就变得非常矛盾。一方面,私营企业显示出了它特有的优点:勤奋、密集生产、节约成本、迅速捕捉商业机会以及很大的灵活性等等。另一方面,私营企业不满足于缓慢的整体发展,以及只能逐步取得消费者的信赖和自身的良好声誉。大规模的生产性积累和经营扩张不是他们的目的。它们的时间标尺被缩短,它们的行为表现出目光短浅的利润最大化特征。它们尽可能在最短的

---

① 当1988年推出新的税收规定时,匈牙利的私人手工业者和商贩们成群结队地退还他们的营业执照。

② 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共产党统治瓦解之前,在政治反对派中拥有很强的凝聚力,但任何人都不可能期望代表雇员的组织支持私人雇主的利益。匈牙利和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也存在一定的反对力量,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再度唤醒过去的农民,但他们同样蔑视并厌恶美国式的"商业"投机、挣钱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时间内追求最多的利润，然后把它们全部花掉。[①] 于是，当合适的时机来临时，它们却已经退出了。大多数私营部门的设备和厂房都相当落后，而且不注重维修。在持续短缺的领域，私营部门很快学会了迎合高高在上的政府部门，而对购买者却漠不关心。私人企业家必须经常借助于贿赂来对抗歧视，他们常常试图欺骗购买者和政府。上述行为都使得私人企业家很不受欢迎。

不仅私营部门的经济环境处于矛盾状态，经营者的社会地位也同样如此。如果成功了，他们在招人妒忌的同时，还受到仇恨和蔑视，因为其他社会成员自幼就被灌输了强烈的平等主义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许多人认为取得高收入将博得他人的尊敬，因为人们假定这是对出色工作的奖赏。但对社会主义社会而言，高收入是可疑的；人们立即会认定这是通过肮脏的手段获得的。[②] 无论如何，“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世界里是轻蔑的称呼，而“资产阶级”更是如此。私人企业家相当清楚他们周围的不信任和蔑视的气氛。因此，成为私营企业家的人未必是最适合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这个人不仅要冒经济风险，而且要冒政治和社会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下，吸引的是冒险家而不是冷静勤俭的企业家。

因此，改革体制下的私营部门就陷入了恶性循环。政府摇摆不定，再加上社会偏见，这导致私人所有者和企业家内心充满了不安全感。他们经常表现出资本主义最坏的一面，而不是最好的一面。这更加深了人们对他们的反感，因此，政府就采取了更为敌视的态度，而这又使得他们活动的负面特征越发明显。社会主义体制需要私营部门，私营部门不得不承认敌视他们的政府权力。但结果却是一种非常痛苦的共存状态，充满了相互猜疑与冲突。

---

① 浪费的消费行为在参与私营部门的人及其家庭成员当中普遍存在。此外，投资中还具有以下倾向：利润的大部分用于仅仅是为了使积蓄（不动产、贵金属、珠宝和美术）保值的投资，而不是为了企业的发展。

② 经济的不均衡性越严重，供给与需求结构之间的差距越大，生产者或卖方在真正的市场机制下通过努力满足过度需求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些人赚取了很高的收入，这恰恰是他们有效发挥作用的体现。但在改革体制下他们却被当作“投机商”，受到公众的最大敌视。

## 19.6　家庭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这里有必要转一下话题,谈一下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家庭的经济作用。这一问题与刚刚讨论过的私营部门紧密相关并有部分重叠。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我们把家庭协调当作一种协调机制来讨论。由家庭协调的领域比社会主义革命前[→6.7]狭窄得多。社会主义体制的内在逻辑试图更严格地限制家庭的经济作用。相比较而言,在改革期间有了显著变化,它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改革的内在推动力又促使家庭的作用日益提高。下面让我们来考察其中最具特色的现象。

最重要的变化是: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几乎已经被彻底摧毁的家庭企业开始在经济生活中重新发挥重大作用。相对于农业私有制和其他部门的私有化,它走在了最前列。家庭企业在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方面发生了惊人的飞跃;家庭"驱使"自己更遵守纪律,干更多的工作。由于私人合同的法律框架以及在此框架内个人提供信贷和捐助资本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由家庭关系保证的相互信任就显得尤为重要。家庭可以掌握自己的财富、资本和金钱。这与私营部门发展背后的另一个动机有关:企业家渴望不受政府的制约,并防止外人窥探他的工作。

住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理想的居住方式是人们集中住在大的和易于管理的公共住宅区里。[1] 改革进程中发生了有利于家庭私人房屋和住宅的变化。少数国家(如匈牙利和中国)开始实行国有租用住宅的私有化。

从狭义的角度看,"私有房屋与国有住宅"的两难选择有几个方面的经济含义,从房屋建筑和维修到对家庭和政府预算的影响,但在此我们只考虑社会影响。许多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持有英国人"家是他们的城堡"的观点。大多数家庭生活发生在家里。对许多人而言,家庭住宅是自主权的体

---

① 罗马尼亚在20世纪80年代,只是通过暂时达成的妥协才让合作社的农民住在他们自己的房屋里,而且已经开始摧毁村庄并逼迫农民住进国有房屋。

现,也是有机会退回私人生活的物质保证。① 在对私营生产部门的讨论中曾提到过私人企业家背后的动机之一是渴望当家作主。同样的愿望导致许多家庭努力争取自己的住宅。②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交通的重点是发展公共交通(政府要员可以享有公共机构所有并配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小车[→13.5])。改革导致公众对私人汽车的需求猛增。③ 但这一需求并不是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因为对多数家庭来说,拥有一辆车比使用政府补贴的公众交通要昂贵得多。此外,短缺经济意味着买到汽车之前的漫长等待,而且维修极不方便,道路也相当拥挤。拥有汽车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当家作主和独立的感觉。就某种程度而言,汽车就像家,也是一座“城堡”,主人可以自己决定允许谁进入以及何时离开。

改革改变了家庭在照顾老弱病残中所扮演的角色。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以其家长主义的作风,许诺政府将平稳地接管这些职责。为此确实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特别是在建立儿童保育机构方面(日间托儿所、幼儿园、课外中心),而且也在朝着为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保健和老年人养老金(或社会的绝大部分)的方向努力。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却根本无法履行诺言,因为它缺少资源来支付这些巨额分配,况且还有需要优先处理的其他事情:很多工作被认为是更重要的[→9.4]。在改革期间,政府承认或暗示它不能实现这些基本承诺,而且开始将照看老弱病残的任务转给(或者不如说是强行退回)家庭。

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许多家务活由商业领域来提供,这就是所谓的家庭劳动机械化。就吃的来说,不同价格水平的餐馆和小吃店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与此同时,不断增多的家庭设备使烹调、冷冻和食物储藏等等变得越来越便利。洗衣店和干洗服务也变得非常普遍;家庭装上了洗衣和

---

① 一名住在莫斯科郊区的普通知识分子业主曾在1989年给出如下讽刺性的描述:“在莫斯科住宅街区,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停水。我在这里的花园有口井,如果必要我至少可以维持数周。”

② 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动机,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在不少国家的许多地区,这是基本必需品:居民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拥有自己的家。

③ 赫鲁晓夫曾在苏联第一次改革浪潮中猛烈抨击汽车私人所有权。

干洗机器。家庭现在可以选择是自己做家务活,购买节省劳动的设备,还是从外部购买服务。

经典社会主义很少提供家务劳动的商业替代方式。缺乏商业化运作的餐馆和洗衣店,没有冰箱、洗衣机以及现代厨灶。只有一个趋势是可预见的:消费集体化[→6.7],但即便是这样也不够分配。改革扭转了这一趋势。出于挣钱的目的的大众部门飞速发展。这些部门的国有企业也增长迅速;而这恰恰发生在私人企业出现最快的领域(除农业外)。同时,公众也开始拥有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和许多其他种类的耐用消费品和设备等。[①]

由于无法获得有关国民财富所有权分布状况的资料,因此,我们对改革方向的观察稍作调整:将私营部门的生产资本,建筑物、汽车、家庭拥有的家庭设备,连同其他个人所有的有价物品都加在一起,那么掌握在私人手中的国民财富的比例会略高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这表明不仅在生产领域,而且在消费领域和生活领域,整个社会都在朝着私有化方向发展。

可以从很多方面解释家庭经济作用的提高,其中包括财富和生活领域的私有化。有必要通过类似的因果分析来更清楚地揭示随上述变化而来的冲突。

家庭经济作用的提高与公众消费的增长相关。家庭现在能够买得起他们从前收入无法负担的东西。更多的家庭能够暂时或者长时间地承担放弃妻子和母亲的定期收入。许多家庭经过详细计算后发现,如果让女性配偶呆在家做家务并且照顾老弱病残,这比花钱购买这些服务要更节省。这些财务上的动机同样得到了道德上的支持:恢复对妻子和母亲传统角色的尊敬;家庭独立性的加强;降低家庭在面对政府服务机构和短缺经济时毫无防备的危险。

对政府而言,家庭的这些自愿性动机来得正是时候。在所有的改革经济中都存在严重的预算赤字[→23.3];财政当局几乎是急不可耐地要摆脱补贴性投资、公共交通和消费性劳务。他们将这些重担卸下留给公众的速度,比家庭愿意或者能够承担的速度要快得多。

作为最后的堡垒,家庭(尤其是妇女)既是社会变革的赢家,也是改革的

---

① 匈牙利改革之初,变迁的新左派评论家轻蔑地称这一体制为“冰箱社会主义”。

输家。改革导致了收入的重新分配，那些加入到高收入行列中的人确实可以从中受益。因为可以购买家庭住宅、公寓、汽车和家庭设备，他们对此非常开心。但那些落在后面的人却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从前的父爱主义政府已经停止供养他们，政府预算不足以支付补贴，而且房屋和大量公众服务的价格开始快速攀升。他们收入太低，根本无法为自己买一套公寓，购买汽车就更是难以实现的奢侈。工资是在政府制定工资政策时固定下来的，而那时几乎不用花钱购买房屋或设备。许多妇女发现自己处于尤为困难的境地：那些只能依赖自己的收入，或者即使有另一个挣钱人、但整个收入太低以至于还不能放弃妇女那部分收入的家庭发现，让公共机构照看小孩和老人变得越发困难（或昂贵）。公有制和父爱主义政府相继没落，而私有制和市场又与之无缘，社会的下层群众往往是两头落空。这是改革进程中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

但即使家庭的负担加大，但这毕竟是导致极权主义放松，以及为最小的社会单元——家庭赢得更大自主权的趋势之一。

## 19.7 预演：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民（私）营部门

在谈了家庭之后，让我们回到本章的主要话题——私营部门。本章可以以开头提出的观点作为结束：私营部门的复苏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进程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但改革体制的权力结构对私营部门的增长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当共产党保留着未分割的权力时，私营部门不可能成为经济中的支配部门。这将发生在、也只可能发生在共产党失去垄断权力和革命到来之时。

在后社会主义体制下，公开并合法地支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政党成为了政府的参与者，并是以竞选胜利者的身份出现的。[1] 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被提上议事日程；为此创立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构。将国有财富转让到私人手中最合适的办法究竟是什么，对此仍有争论。与此同

---

① 由于这一信条让习惯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听起来不太顺耳，所使用的术语也趋向于间接表达：政治家更倾向于提到“市场经济”或“西方经济”，而不用资本主义。

时,私有化已经开始付诸实践,有时比较快,有时比较慢,私营部门以其他形式进行的扩张也在加速。

在这方面,改革体制的遗产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正式和非正式的私营部门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发展的程度越深,体制转变后私营部门的推进也就越快。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革命开始之前发生了改革的国家,比那些直接从经典社会主义跳到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国家来说,起步的条件要好得多。

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不是对称的。私营部门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被政府命令所废除,但私营部门的创建却不能通过政府的命令来实现,这只能依靠参与其中的人的自由意志。即便政府尽其所能促进私营部门的快速增长,但它的发展却无法在一夜间完成。毫无疑问,在私营部门占据经济生活的支配地位之前,我们还要等待很多年。

# 第二十章　自主经营

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另一个重要趋向是将自主经营(管理)引入公有企业。前面的章节里所讨论的趋向都是与社会主义对立的因素——私人财产,而自主经营却完全具有社会主义特色:它预示着对公有制的重新解释。与私营部门相比,自主经营带来的变化相对平缓,但这一变化也相当重要,它使我们能够区分是否在进行真正的改革。

自主经营是产权和协调机制的一种特定组合(换句话说,是对15.1图解中第二和第三层的修正),其基本原则是企业,领导由企业的工人选举产生(c类产权),而不像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自上而下任命产生的[→5.1]。在扣除费用和税收之后,工人可以获得剩余收入(a类产权)。

第6章考察了各种协调机制,其中曾谈到过自治协调机制[→6.5]。到目前为止,在企业中引入自主经营最多也只是在生产层面上进行实验和探索。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其吸引力在于它既不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政府协调,也不是与资本主义的市场协调,而是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上述两者的特殊的第三条道路。

## 20.1　作为思想和政治趋势的自主经营

自主经营的思想先驱是欧文(1771—1858年)、傅立叶(1772—1837年)

和蒲鲁东(1809—186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喜欢把这三位思想家称作"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者一词的创始人。有关自主经营的思想在工会组织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合作社会主义运动中都有所体现。

在此我们不打算对这些伟大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观点进行详细阐述,[①]只是挑选出一些共同的观点加以讨论,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强烈谴责政府的作用并拒绝各种各样的"国家社会主义"。最理想的状态是根本不存在政府的社会,[②]只需要经济民主和工人的自我组织。应该由工人的生产集体自治。在本书所使用的术语中,自主经营机制[→6.5]应该取代官僚机制成为主要的经济协调方式。

知识分子们所宣扬的部分观点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例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1917年俄国革命早期的苏维埃,[③]以及匈牙利1956年革命中时间不长的工人委员会。这些历史事件都与自主经营的思维模式有相似之处。

南斯拉夫(1950年)是第一个普遍采用自主经营的国家,[④]直到现在它还是公共部门的主导形式。自主经营的某些原理也通过法律于1982年在波兰以及1985年在匈牙利得以推行(虽然不如南斯拉夫稳定和普遍),最近也传入了苏联。

自主经营的观点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改革的争论中也反复出现。此外,自主经营所包含的思想也已成为美国和西欧近二、三十年内激进的新左派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

现在我们转向对自主经营实践情况的分析,主要是从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历史中汲取重要教训。按照本书的计划,我们不打算对南斯拉夫的经

---

① 有关自主经营思想发展的全面论述和分析可参见B. Horvat(1982)。

② 在政治哲学中,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三种完全不同的思潮都赞成政府的消亡或者至少降低它的作用。"左翼"工团主义希望用工人的自我组织来替代政府;"右翼"奉行自由主义哲学,试图将政府的作用降到最低,以此保护个人自由。参见R. Zozick(1974)。

③ 只有在苏维埃时期,才保留了工人革命中的权力机构。后来,当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逐步发展并日益僵化之后,苏维埃本身就成了政府的一部分。

④ 推行自主经营的决策背后有几个动机:一个动机是表明,从今以后南斯拉夫走的道路将不同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以及其他跟随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动机是通过加强"工厂是工人们自己的"的观点来巩固大众的支持。

关于南斯拉夫的政治历史,可参见D. Rusinow(1977)。

济情况进行特定的历史描述，①而是在更一般的层面上来探讨这一问题。即使会多次提到南斯拉夫的情况，但仅限于那些如果采用自主经营也将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类似现象的事例。②

考虑到要进行抽象以及前提特征，我们没有使用在理论分析中完全可用并确实有用的两种分析方法。③

在此并不打算进行总体概括，即设计出一种无须考虑政治和社会环境就能对自主经营企业行为进行描述的理论模型。因此，以下观点并不适用于以色列的基布兹、被工人从资本家手中夺过来的意大利工厂，或是美国的律师合伙人制。我们只是研究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体制中的自主经营。

在此不能假定自主经营企业所处的环境与社会主义体制无关。例如，我们不能认为这类企业可以通过自由市场竞争与别的经济单位发生联系，或者政府可以不干涉市场或企业的运行。④ 同本书以后的章节一样，下面的讨论旨在得出符合实际的实证性报告和结论，而不是构建一个规范理论去虚构一套想像中的体制。

## 20.2 政治关系

让我们从分析自主经营的引进入手。在南斯拉夫，自主经营并不是首先由一些企业的工人自愿采用，然后其他人加入，最后逐步普及的。正确的顺序是：自主经营的思想出现在最高领导层的头脑中，而当它被党的领导人

---

① 关于这些有一大批文献资料可供参考，J. Prasnikar 和 J. Svejnar(1990)提供了简要评述；还可参见 J. P. Burkett(1989)、H. Lydall(1984)、D. D. Milenkovitch(1984)、S. R. Sacks(1989)和 R. Stojanovic, ed.(1982)。

② 在此不会涉及那些与南斯拉夫独特环境相关的现象（例如，由于七个南斯拉夫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问题）。

③ 自主经营的问题给经济界提出了思维挑战。已经出现了大量引人注目的著作，其中包括许多建立在形式化理论模型基础上，对自主经营企业行为进行研究的论文。最早的文章可参见：B. M. Ward(1958)和 J. Vanek(1970,1972)。进一步的阐述见 J. P. Bonin 和 L. Putterman(1987)、J. H. Dreze(1976)、S. Estrin(1983)和 J. E. Meade(1972)。

④ 例如，J. Vanek(1970,1971)曾在关于自治民主和自主经营的规范理论的开创性研究中做过这样的假设。

铁托所接受之后，就变成一项强制性措施。[①] 南斯拉夫没有经历过所有制和协调机制的自然选择过程，即各种形式并存发展，然后那些被人们主动拒绝和/或经济上不能独立发展的形式被逐步淘汰。[②] 情况恰恰相反，南斯拉夫正是通过国家权力将集中化的政府财产转变成了“非政府”（南斯拉夫的官方用语）的社会财产。

在南斯拉夫，自主经营成为了不容置疑的禁忌，是非私人所有权的唯一形式。直到最近（带来了多多党制的革命初期），反对自主经营的论调都是被禁止的，这种说法就如同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建议废除国家所有制的主导地位一样。

自主经营带来了很多宏观和微观的经济问题，我们将对此进行简要考察。但最重要的考虑似乎应该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影响，而在不是经济领域。许多自主经营的支持者希望这种所有权形式能够结束工人对工作的冷漠态度，因为选举领导将使他们积极地行使控制权即 c 类产权。不过如果共产党的垄断权力在外部世界盛行，那么企业就不可能自由地享有民主自治的权利。[③] 这是南斯拉夫（以及后来的波兰、匈牙利和苏联）在尝试自主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内在矛盾。

党和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企业领导人的选举。潜在的候选人是经过筛选的，而且投票人也受到控制，如果有官僚政府不喜欢的领导当选，那么他/她迟早都会被解除职务。企业的工人心里非常清楚，选举一名与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党保持良好关系的领导对自己有利，因为只有这样的人

---

① M. 吉拉斯曾描述过这种思想是如何进入他的脑海、铁托是怎样接受自主经营的观点以及最后是如何达成决策共识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曾经迫不及待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搜寻引语将这一观点神圣化，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个引语，这时铁托才真正放心。见 M. 吉拉斯（1988），G. Urban 所做的访谈。

②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看看有多少处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们自愿选择某些自主经营形式，或者自愿进入真正的合作社，会更富有启发意义。例如，苏联在 1928 年开始实行强制性集体化之前，以合作社形式经营的农业土地的比例只占 1.2%。见 A. Nove（1969，p. 150）。

③ 南斯拉夫并不使用“企业”一词，其他的形式也采用了不同于“西方”和“东方”术语。以后我们也会使用这样一些术语[→20.5]。这里的分析将使用“东方”或“西方”的同义词来代替，或者如果不存在，就使用意义上最相近的词语。

才能在贷款、税收、投资资金、外汇方面得到优惠其他利益等等。①

在任何机构中实行真正的自主经营的前提是:各个团体有权提名不同候选人。必须允许候选人以及支持他们的团体组织竞选活动,并相互批评彼此的计划,这些行为就等于拥有了基本的言论和社团自由。除非上述行为在社会所有领域中都得到充分保证,否则它们也无法扎根于企业的自主经营之中。

在真正的议会民主中,政治团体、组织和党派并存并相互竞争,换句话说,存在防止权力垄断的制度保证,并赞成言论和社团自由,这样工人才更倾向于接受这项制度安排,即他们必须将权威赋予企业或办公室里的上级领导。他们也会要求结社权利,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在生产事务中取得发言权,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坚持在企业中实行集体决策和领导选举。②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也有全心全意信仰自主经营的人,他们真诚地相信,这是比“形式化的”和“资产阶级性质的”议会民主更全面、更具实质意义的民主形式。但在改革运动中也出现了另一类自主经营的支持者,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把它当作有实用价值的战术步骤,是真正议会民主暂时的“强制性替代”。他们认为部分或完全实行自主经营要优于完全保留党政体制下的权力统一。它开辟了新的政治舞台,这样反对派力量就可以开始为企业中的地位而努力,换句话说,这也就是自下而上的斗争。

我们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上层为了实现其操纵的目的,希望自主经营能够逐步发挥强制性替代的作用。这些人希望通过引入自主经营引发以打破党的权力垄断为目标的运动。几十年以来,自主经营与严格限制政治自由在南斯拉夫始终并存。

---

① 关于南斯拉夫在这方面的经验,可参见J. Prasnikar 和 J. Svejnar(1988,1990)的研究。关于匈牙利选举企业领导的经验,见K. Bossanyi(1986)的研究。G. K. 波波夫(1988,p. 631)撰写了在苏联实行管理者选举的可能结果:“肯定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使管理者选举变得毫无意义;一切都得听政府部门的,必须选举能让它接受的人物。”

② 另一种需求出现在以私有制和议会民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即工人参与决策的权利。当然,关于参与的程度和具体形式还存在政治斗争和政治争论。见A. L. Thimm(1980)有关瑞典和德国共同决策机制的历史以及对其他西欧国家情况的简短叙述。有关德国的争论见R. Judith, ed.(1986)。以德国为中心,对不同国家中共同决策机制的效果的经验比较可参见B. Wilpert 和 J. Rayley(1983)。

## 20.3 经济影响

自主经营的经济影响与上述政治问题紧密相关。在此并不打算详尽阐述,只探讨以下五个问题:①

1. 对上级的纵向依赖。在从属性的权力结构下,指望自主经营的经济单位真正独立于政府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上文曾提到的对企业领导人的挑选进行干预就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他因素也使企业必然受制于上级机构;②他们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如果企业亏损能得到什么样的财政补贴,税收如何拟定,企业是否能得到投资贷款,以及是否有权使用硬通货、使用多少等等。企业还受制于非私有银行,自治企业仍然具有预算软约束特征。③ 不存在私人资本市场、私有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资本和信贷市场上充斥着缺乏商业和利润动机的官僚机构。④ 与对市场的横向依赖相比,企业对党、国家、地方政府以及非私人的、非市场导向的金融部门的纵向依赖丝毫没有减弱。

2. 管理者对下级的依赖。很显然,企业的工人并不是真正的统治集体,但它相对于企业领导的地位有所加强。从这个意义上讲,管理者对下级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并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要保证下属服从领导,维持工作纪律,而与此同时却又要避免不合理的工资上涨和实物利益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够采取强硬措施来对付那些让他再次当选的人呢?⑤

---

① 在进行抽象分析时,本书将分别讨论自主经营[→20]的趋向和旨在实现市场社会主义[→21]的趋向。事实上,前者通常与引进市场社会主义相联系。因此,这里的讨论只是简单触及一些将在下一章里更详细加以考察的问题。当然,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重复和交叉。

② 见J. P. Burkett(1989)。

③ 有关南斯拉夫预算软约束的经验研究,可参见P. R. Knight(1984)、V. Konovalov(1989)、J. Mitchell(1989)和L. D. Tyson(1977,1983)。

④ 关于这一点,南斯拉夫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在最近十几年以来,其信贷体制都是在非常高的负实际利率下运行。

⑤ M. L. 威茨曼(1984,1985)勾勒了"分享型经济"的轮廓。在分享型经济下,工人对提高利润有兴趣,也就是说,他们得到了部分a类产权,但他们并不分享b类和c类产权。这些依然掌握在先前的所有者手中,至少在威茨曼所描写的资本主义环境中是这种情形(或部分c类控制权可以由所有者指定的管理者来行使)。

但威茨曼式的激励体制所激发的企业行为与社会主义国家自主经营产权形式下出现的企业行为完全不同。

这导致了“车间民主”这一口号所带来的基本问题。曾经有过能够约束自身的成员共同体:他们自愿抑制自己的财务需求,而且每个成员都竭力从事高强度的工作;成员们将纪律强加于彼此,比如说通过暴力(如果需要也可以通过同级评价)。有人可以在天主教会或者在以色列基布兹中,甚至是在社会主义早期的生产队当中找到这种类似的共同体。这种经营模式通常在具有强烈的共同意识形态信仰的小团体中起作用,其成员很容易进行相互间的密切监督,逐出那些不能够全身投入共同事业并严格遵守纪律的人。

一些左翼思想流派坚持认为上述行为能够加以普遍推行。但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始终对此心存疑虑。无私、自觉遵守纪律、为此进行训练以便培养灌输这些观点,所有这一切虽然值得赞赏,但对于今天的社会生产而言,它们永远是空中楼阁。[①]

3.短视。自主经营的单位成员缺乏b类产权,即转让权,[②]这是非常重要的所有权判断标准。[③] 如果工人已经长期地将自身的最好能力奉献给了企业的发展,但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离开它,他们却不能将这份“投资”带走。因此他们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没有任何兴趣,这使他们完全不同于真正的所有者。当面对经济上基本的两难问题即“当前收入与未来收入”和“消费与积累”时,每项利益都驱使他们将当前收入和消费最大化。[④] 他们对只能在很长时期之后方可产生经济收益的任何付出和努力都没有兴趣,如大规模投资、研发或者专业训练等。这时他们会问自己:当这些付出能有所回报时,而我却已经不再为企业工作,那该怎么办?在这方面,他们与私人股东的立场完全不同,只有私人股东才会关心公司的“净值”,即公司实物资产、财务资本和智力资本的增长。

4.通货膨胀压力。在改革体制下,有许多因素会促使通货膨胀不断加

---

① 在自主经营和企业的决策参与权或决策前的咨询权之间必须做出明确的区分。后面两项权利增加了企业工人对企业活动实施影响的机会,但这些权利甚至在形式上都没有赋予他们实际的控制权或相应的责任。因此这种相对有限的解决方案不会导致加强纪律等严重问题。

② 另一个问题是集体是否拥有转让权。换句话说,工人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是否有权出售整个工厂?这个问题将在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提上议事日程[→20.6]。

③ 关于所有权的自由转让权,见A. A. 阿尔钦和H. 德姆塞茨(1972)。

④ 见J. Prasinkar和J. Svejnar(1988,1990)。

强，自主经营并非其必要条件。中国、越南和苏联这些没有推行自主经营的国家也同样发生了通货膨胀，而且自主经营也不是通货膨胀的充分条件。在南斯拉夫，通货膨胀是通过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出现的[→23.5]。只能说自主经营的企业往往倾向于引发某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又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自主经营降低了企业领导对名义工资上涨的抵制。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的工资规定[→7.3,10.3]。自主经营废除了这种官僚强制行为，但它未能用所有权的利益机制作为替代来限制工资上涨。在资本主义企业里，所有者和作为代理人的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反对工资上涨，因为它会降低企业利润。从另一方面看，在短期内获取尽可能多的收入完全符合自主经营企业的所有者和工人的利益。任何想继续得到工人爱戴的管理者都不会反对努力提高工人工资。如果这种工资上涨压力伴随着宽松的财政政策，那么就必然会形成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涨机制。

5. 失业。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倾向于导致就业的迅速增长[→10.1,10.2]。前面曾提到过这种扩张动力，即当劳动力充足（至少直到供给完全被耗尽）时，它鼓励进行持续生产。不存在任何节约劳动力的诱发因素。

在社会主义体制推行自主经营模式时，（就业）扩张动力仍然存在。但大部分扩张行为并不是由企业自身的储蓄来提供资金支持。企业一般将其资源作如下划分：将尽可能多的净收入作为名义收入为工人的当期消费提供基础保障，同时设法从政府和银行体系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投资资金。银行贷款承担着负的实际利率，这实际上也就包含了免费的补贴。

而对资本主义企业而言，只要扩大劳动力能够提高利润时，它才会增加工人。① 与之相比，自主经营企业的利益不在于获取利润，而在于提高企业工人的个人收入。因此，如果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就业水平要求将每个工人的收入降至最大值之下，那么企业很可能避免达到这样一个就业水平。

第4、5点所描述的情况最终可能会促使企业尽可能以政府预算、信用体系和最终不得不由公众承担通货膨胀为代价进行资本密集型投资，而且几乎不需要额外的劳动力。所有这些产生了引发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机制。

---

① 换句话说，直到工人的边际生产率等于支付给他的工资。

总之,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推行自主经营导致出现了许多负面特征。它是改革进程的死胡同之一。虽然在自主经营所有权形式下经营的企业与国有企业已经大大不同,但它们有着基本的同一性,或者至少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即都深陷于官僚体制之中。

## 20.4 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自主经营带来了企业管理层与职员之间新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相似的变化甚至在自主经营还没有推行之前(但其他改革趋向已出露端倪)已经出现。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包括政治结构的自由化和传统意识形态不断受到侵蚀[→18.4,23.1]。管理者变得不太愿意再强制遵守劳动纪律,也不再抵制工人提高名义工资的要求。

有很多原因导致了上述变化,其中包括工会代表性的加强,也与罢工合法化或者至少被容忍有关。在劳动力持续短缺、甚至不断恶化的同时,劳动力的流动性却大大提高。改革体制已经无法采取有力的行政手段对付自愿变动工作的人。因此,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对企业的管理也越来越依赖于工人的融洽合作。

另一个变化产生了更明显的影响。如果管理者采取不受欢迎的行动,那么他/她就不能指望得到强大的官僚阶层的全力支持,也不会得到当地政党和工会的无条件支持。事实上,如果工人们对管理者极为反感甚至仇恨的话,那么他们完全能够让上级机关解雇企业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管理者就更加依赖工人。由于政府"钢铁般的纪律"不断放松,管理者越来越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而且在一个日益倾向于"民粹主义"的环境下,不仅管理者的个人行为,而且他们的经济决策也都极容易遭人指责和非议。这也意味着在与上级的谈判过程中,管理者担任的角色之一便是代表工人的利益。虽然这样的角色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管理者并非全然不同,但这种行为在改革体制下却显得尤为突出。

## 20.5 道德协调

在本章的引言中曾提到,自主经营的思想为那些既想结束经典社会主

义体制，又想抗拒资本主义的人提供了走向第三条道路的可能。类似的思考和政治考虑使得某些社会主义流派将注意力转向道德协调[→6.6]。自主经营的政策许诺要建立自治机制，这就有必要提一下社会主义的传统意识形态。许多人希望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组织和其他机构能够无私地彼此自动协调，而不需要依靠政府强制或者物质利益刺激。[①] 集体组织的代表们可以通过协商形成一致的计划意见。

但事实上，苏联或许多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都未曾真正认真地去尝试应用这一概念，它们都毫不犹豫地把协调职能交给了官僚机制。在中国，对自发式的相互协调机制的憧憬曾是毛泽东时代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柱之一。[②] 不过，中国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也很少将这一观点付诸实践。

在改革体制下，作为先驱者的南斯拉夫就出现了下列情形：在20世纪70年代，经典社会主义下关于自发方相互协调的各种观念与自主经营一起蜂拥而至。改革的设计师们认为自下而上建立自发性的经济单位联盟是非常重要的。最小的单元是"联合劳动者基层组织"以及由它们组成"联合劳动者组织"，然后再由此构成更高水平的"联合劳动者综合组织"。最后一层将聚集为"工人委员会"，然后依次再放置在更高水平的"商会"中（通常是每个共和国都有一个这样的商会）。[③] 不过，完全相同的结构、甚至是完全相同的名称，再加上生产单位只能合并到这些组织中，一切就其本身而言，会让人们得出以下结论：它们不可能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发成立，而且结构设计还要由中央来规划。所有这些明确表明：尽管在新机构所采用的术语反映了自发形成联盟的观念，但它与真正的自发性联盟毫无关系。[④]

赞成改革的观点认为自治单位以及由它们组成的各种联合和联盟之间能够在各个层次上彼此密切协商，并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任务共识。这样一个最全面的协议还有个专门的名称叫："社会契约"。因此，它能够创

---

① 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蒲鲁东，他曾这样写到（1867－70，2:414，6:92－93）：当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被唤醒后，他就不再需要外部的纪律约束。经济结构可以建立在相互依存（mutuel-lisme）之上。马克思为此对蒲鲁东进行了强烈批评。

② 这是毛泽东思想吸引西方新左翼知识分子的观点之一。比如见J. Robinson（1969）。

③ 见L. D. Tyson（1980）和J. P. Burkett（1989）的研究著作。

④ 关于南斯拉夫这一方面最好的描述和评论可参见A. Ben－Ner和E. Neuberger（1990），副标题是"南斯拉夫看得见的手和协商编制计划"

造出一种独特的协调模式。协议的产生既不是通过中央指令(就这个意义来说,没有官僚特征),也不是基于价格和买卖条件洽谈(从这个意义来说,没有市场特征),而是由社会责任和相互自愿帮助所推动的。因而,这种社会各层级最广泛的谈判过程应当被视为是一种道德协调机制。

事实上,很少通过法令将这一人为观念强加于社会实践。几乎没有人理会所谓的"社会契约",在它的背后,上级机关和买卖双方通过官僚机制和市场力量对经济活动施加着巨大的影响。与官僚和市场协调机制的强大相比,道德协调的软弱便显露无疑。

让我们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道德协调在其中出现)来做个鲜明的对比:20 世纪 70、80 年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慈善运动和协会。它们在经典社会主义下是被禁止的[→6.6],而且不是通过政府或官方群众组织成立的。它们是自下而上、主动自发产生的,藉以履行明确的特定任务。举例来说,匈牙利数十年来都否认贫穷的存在,一些知识分子团体在 20 世纪 70 年代意识到,其实社会中有很大比例的人都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因此,成立了半非法的慈善组织——扶贫基金会,并且发现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匈牙利还出现了帮助匈牙利人逃离罗马尼亚的慈善行动。第一种慈善组织如今在苏联也已经出现。①

此外,还出现了各种从事慈善事业之外的其他社会工作的组织团体:如环境保护、安排停车场和帮助老年人等等。每个社会都蕴藏着潜在的自治力量,只要消除了官僚阻碍,人们愿意为了崇高的道德事业而献身。道德协调机制无法履行基本的社会(包括经济)控制职能,但它们可以发挥必要的辅助作用,从而使经济更平稳地运转,让人们更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 20.6 预演: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自主经营

在改革阶段引入自主经营的国家带着这一特有的遗产进入了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在匈牙利和波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问题,而当南斯

---

① 所谓的合作社,如同在 19 章所描述的,事实上是私人企业,它们是主要的组织者和捐助者。尽管在 1989 年还处在启动阶段,合作社已经将其总收入的 50% 捐献给慈善事业。见《莫斯科新闻》,1990 年 4 月 1 日。

拉夫进行转轨时,这一问题就得更加迫切。在这些国家里,不少人坚持认为自主经营体制应该加以保留,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也都支持这一观点。[1] 如果真要这么做的话,那么前面我们所提到过的所有障碍和危险也将继续存在。事实上,它们还将遇到新的困难。这里,只谈一下另外两个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与政治状况有关。在这些国家里,多党制才刚刚起步。为了争夺社会上每个机构的每一个选举职位,政党之间一定进行激烈的竞争。如果企业领导当选某个职位,那么企业本身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党政治斗争的舞台。当管理者岗位被政治精英占据后,只有经过很长一段时期后,才会出现人们所真正期待的东西:商业和生产的"非政治化"以及把专业和才干作为挑选管理者的标准。

另一个问题与私有化进程相关。自主经营企业的当选领导觉得有权决定有关公司未来的事务,包括出售企业。然而这方面的法规往往模糊不清;虽然可能没有明确赋予管理者这么做的权力,但也并不包含明确禁止的条款。

不过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关于自主经营的宣传总是设法向工人传达这样一个概念:工人集体是企业的控制者。

在私有化期间,这是某些策略行为重要的法律和意识形态支持力量。在企业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的帮助下,掌握信息的管理者与潜在的国内外所有者对私有化的有关条件达成一致。管理者希望得到的是:这些条件应该给予他/她以及企业的职工诸如职位、薪酬和就业等短期利益,即使就长期而言转让所有权是有害的,他们也在所不惜。

听起来也许有些令人奇怪:在进行自主经营的地方,消灭这种所有权形式,以及某些公共部门的初步国有化在后社会主义体制下被提上议事日程,因为这为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私有化开辟了道路。

① 例如,K. A. Soos(1990,p.68)就曾提出以下建议:"当前充满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和剧烈变动,而自主经营的实践毕竟已经被我们的社会所接受,它可以作为有价值的东西保留下来。"

# 第二十一章　市场社会主义

本章所讨论的隐含在政治与思潮背后的基本观点是：让市场作为中央计划方式的补充，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协调机制（或者至少在地位上等同于官僚机制），但公有制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所有权形式。

在这一比较广泛的思潮中，不同流派之间在许多方面还是有区别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它们希望朝着建立市场机制的方向究竟要走多远。但它们共同的理念都是信任市场，因此，将整个思潮描述为迈向市场社会主义的运动还是比较恰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者们，尤其是在改革的初期，一般都强调他们希望将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因此，也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来合理描述这一思潮：计划—市场经济的观点。①

这些观点对经济的运行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关注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市场的实际变化构成了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运动的主要趋势之一。

本章的主题是国有部门中出现的市场社会主义现象，不涉及市场在其他经济部门中承担什么角色。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并没有充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市场在社会主义改革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第19章讨论了私营部门和市场的关系）。

---

①　本书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计划视为官僚协调的要素之一，因此“官僚协调机制与市场协调机制”成为我在有关改革进程的讨论中表述自己观点时的一对概念。

但在说明启动并伴随改革进程的有关思想趋向时，应坚持争论中实际参与者所使用的术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章所提到的是那些“计划—市场”观点的支持者。

## 21.1 思想先驱

包含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是无法相容的。马克思欣赏流行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工厂内部的组织形式,并将其与工厂外部明显缺乏有效组织的企业间的关系进行了对比,他在《资本论》中这样写道:"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极端的无政府状态…… 作为商品占有者的资本家自已处于对立状态之中。"①《资本论》里还有另外一段话:"在集体生产中,不再存在货币资本。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可以获得纸质凭证,以此从社会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与他们劳动时间相当的量。但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也不流通。"②恩格斯写到,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商品价值所代表的"间接的、毫无意义的"表达形式。它直接计算隐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③ 马克思经典著作反复强调市场是运行很差的协调机制,必须被有意识的计划所取代。卡尔·考茨基这位马克思思想的伟大阐释者对此做出了如下总结:"关键问题就是要改变这种组织形式,正是这种在参与者背后运行的无意识的组织形式带来了摩擦、悲痛、灾难、破产和危机。因此需要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把它调整为有意识的体制,通过事先计算所有调整因素来取代由供求关系进行的追溯性调整。"④。考茨基在此反对的事情之一恰恰被亚当·斯密视作市场的首要优点:市场正是通过在参与者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对那些已经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融入骨髓的人来说,不论是理性的辩论,还是超乎理性的感觉,都将导致他们带着怀疑、反感、嫌恶和轻蔑的情绪来看待市场,认为危机和无政府状态、投机、可怕的广泛竞争,以及所有的正确比率都只会在事后才出现。废除私有制的历史使命之一正是要结束这种盲目的、无计划的生产协调方式,并且要用有意识的计划来取代它。那些试图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相结合的人必须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

---

① 卡·马克思[1867—1894](1978,第51章,p. 1021)。

② 同上,第18章,p. 434。

③ 弗·恩格斯[1978](1975,pp. 294 - 295)。

④ 卡·考茨基(1910,p. 151)。

因为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最忠实的追随者而言,社会主义与市场是水火不容的。①

最先精辟阐述社会主义市场观点的先驱之一是奥斯卡·兰格(1936—1937)的经典著作。西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展开了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② 巨大的挑战来奥地利自由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20](1935)的著名研究,他声称在缺乏私有财产和市场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没有能力进行理性计算。兰格不同意这一观点并概括出了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公有制企业要么利润最大化,要么遵从最优化的相关规则。由中央计划办公室来设定市场,结清均衡价格,事实上可以通过模仿市场机制来做到这一点:当它发现需求过度时就提高价格,当发现供给过度时就降低价格。兰格的一系列论证说明这种体制有能力平衡供给与需求。

在这场争辩中,有人曾提出有意识的中央计划无法令人信服地处理和协调与数百万产品供需有关的庞大计算体系。兰格反驳说,这种大量的计算是不必要的:社会主义可以采取市场运行原则。中央计划者通过对过度供给(需求)的信号做出反应来不断调节价格。在此之后,买卖双方将对价格信号做出响应,最终他们的活动将趋于均衡。兰格的著作没有提供详细的实际改革建议,但其中包括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的许多基本观念:愿意增加利润和降低成本的企业自主权,价格信号的基本作用以及集权与分权之间的特定联系。

辩论中对兰格思想路线最尖锐的批判是来自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35),他的主要论点如下:社会主义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它是否能够设定均衡价格,而是建立怎样的激励,然后可以迅速用于隐藏在许多不同地方且需要传播的信息。在这方面,市场、竞争和自由企业是必不可少的。当50年之

---

① 《新德意志报》(东德共产党机关报)在昂纳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坍塌的前几个月写道:"我们应该接受市场经济的这些恩赐吗?退回到生产资料私有制?退回到人剥削人的社会?退回到自由竞争、自由劳动力市场?不,决不能回到资本主义。不管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有什么优点,它都不能公平对待社会主义的本质,即竭尽全力为人们谋取福利。这就要求有统一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因此只有一个基础得以存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我们使它变得越有效和越完美,对所有人而言也就越有益处。"1989年1月5日,p.5,社论。

② 西方20世纪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综述在A. Bergson的研究著作中有记载(1948,1967)。关于现在的评论,见A. de Jasay(1990)、D. Lavoie(1985)和G. Temkin(1989)。

后回顾这场争论时，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所有关键的问题上，哈耶克都是正确的。循着兰格路线朝着市场社会主义摸索的改革者们，通过自己国家的惨痛教训也认识到，兰格所提出的希望是美梦一场。

虽然最后通常都会醒悟过来，但是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迷住这么多人，是因为它的观念必然拥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产生影响力的秘密之一就在于思想领域。对于那些在政治思想方面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支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人而言，市场社会主义的观念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简单且从容的出路。①

现代西方著作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超越了把市场理想化的幼稚阶段：它认识到市场机制也有其阴暗面，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过程无法奖励好的外部效应和惩罚有害的外部效应，无法保证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或者保证将社会公正原则应用于收入分配。同时，对计划的有益批判也指出了它许多不好的方面。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市场的思想提出了两种机制互为补充的可能性，即它们彼此都可以弥补对方的缺陷。当市场由于社会福利的原因需要纠正时，中央计划和控制将进行干预。与此相对，市场会让那些掌权者从协调经济活动的日常繁琐之事中解放出来，并在中央计划者做出损害买卖双方利益的错误决定时，增加发出信号的能力。这种趋势的提倡者希望最终能出现一种结合两种机制优点并使各自缺点最小化的体制。②

政治上的辩论又加强或补充了上述经济上的论证。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它需要进行重大变革。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体制却取得了无数的经济成功。资本主义的“秘密”是：它的活动由市场来协调。资本主义这方面的东西可以并且必须接收过来，但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有关的更深层次的其他所有事物则必须加以保留。权力结构和公有制

---

① 在此出现了与早期数学计划先驱者思想的奇特对称。这两种思想都将马克思主义和瓦尔拉斯联系在了一起。在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领域中，集权和公有制与在瓦尔拉斯原理基础上运行的价格决定过程和分权生产共存。在数学计划的领域里，规划模型的结构遵循了瓦尔拉斯原理。瓦尔拉斯厚理著名的拍卖人就是价格控制办公室；在数学计划构架中，它包含在模型和计算机中。

② 在更早阶段我也倾向于这种观点(1965,1971)。

的主导作用必须保留并且要与市场相结合。[①] “社会主义”(意味着一党制、权力垄断和公有制的主导作用)加上“市场”(企业自主、企业间的契约制度以及价格信号对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影响):这就是用于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组合形式。[②] 接受这一观点意味着,在关键之处摆脱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束缚,但同时承诺在更深刻和更本质的领域仍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在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市场”范围内出现了各种思想,这些思想影响了每一个进行改革的国家。有些学院派经济学家回过头来求助于兰格,有些人则独立地完成了“重新发现”的工作。也出现了不少在很多重要方面都不同于兰格的观点。虽然设计改革方案的专家不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塑造这些想法主要还是上文介绍过的那些思想动机。[③] 在接受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时,社会主义改革国家的统治集团有意或无意地被如上简单概括的政治思路所支配。所有这些动机相互融合并同时出现。能够肯定的是: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市场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革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经典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与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最明显和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拒绝而后者信服并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经共产党修正过的

---

① 这种观点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决议中这样表达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1984 年,中共十二大三中全会决议,引自 J. Wu 和 R. Zhao(1987,p.312)。

② “简言之:计划的优势就将越来越多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的刺激因素相结合。但所有这些将只在社会主义主要目标和管理原则之中发生。”戈尔巴乔夫这样写道。米·谢·戈尔巴乔夫(1987,p.91)。或者是稍后的这句话:“市场的优越性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如今的问题只是在市场条件下是否能够确保高度的社会安全。答案是:不但可以保证,而且事实上正是有管理的市场经济才使得国民财富增长到使每个人的生活标准都提高的程度。而且无疑疑问,国家权力仍然掌握在我们的手中。”米·谢·戈尔巴乔夫,《消息报》1990 年 7 月 11 日。

③ 在此有几篇开拓性的研究著作,它们按国家分组分别是:南斯拉夫:B. Kidric(可以在 1985 年的出版物中参阅他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的作品);匈牙利:G. Peter(1954a,1954b)和雅·科尔奈[1957](1959);波兰:W. Brus[1961](1972);捷克斯洛伐克:O. Sik(1966);苏联:E. G. 利伯尔曼[1962](1972);中国:孙冶方[1958 - 1961](1982)。

参阅 L. Szamuely(1982,1984)对更早期争论的详细论述。想了解对改革思想的突出看法,包括对其缺点的批判,可参阅在改革思想和各类关于市场失灵的西方经济理论分支(比较经济体制、委托代理和激励理论以及产权学派)之间建立联系的 I. Grosfeld(1989b)的著作,此外还有 J. M. Kovacs 的著作(1988 和 1990 年简装版)。关于苏联,第一次尝试论述由公开性释放出来的大量改革思想的是 A. Nove(1989)。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观点,见 V. Klaus(1989,1990)。

官方意识形态之所以答应实行市场社会主义(这本身就充满了内部矛盾)是因为它力图调和无法共存的成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对市场的尊重。

## 21.2　来自历史实践的总结

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市场的思想并不仅仅停留在政治和经济思想领域内,它们还通过说服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当权者采取许多实际变革,从而产生切实的效果。尽管不打算一一列举,但我们还是根据市场社会主义类型改革变迁的顺序挑选出了长期使用(或在写作本书时仍在继续使用)这种控制机制的几个国家:南斯拉夫(1950—)、匈牙利(1968—1989)、中国(1978—),波兰(1981—1989)、越南(1987—)和苏联(1985—)。

对这六个国家的讨论仅限于国有部门的控制。在南斯拉夫,还包括"社会所有制"下自主管理的单位;在其他国家,则包括国有企业和"类似国有"的合作社。

本书不打算逐一详细介绍这种变迁趋向在每个国家如何扩张、前进和后退的历史。本章在后面部分将概括出前面六个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时期"的一般模型。我们还是想在此再次重申本书其他地方曾反复强调过的观点:描述是非常抽象的;它将忽略国家之间的许多差异,也会忽略特定国家瞬息万变的具体情况。它只是挑选出这六个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时期的主要特征、内在倾向和特定趋势。①

南斯拉夫在某些方面是一个特殊案例,因为市场社会主义在南斯拉夫从一开始就与引入自主经营密切相关,这在本书中是作为一个单独变革趋向进行讨论的[→20]。当然,与本章及下一章所讨论的内容相类似的许多现象也同样出现在南斯拉夫。

上述六个国家国有部门在市场社会主义时期的运作模式在下文中被简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可能会反对这种说法,因为当这些思想应用于上述国家时,它们都被扭曲了。事实确实如此,但有什么理由说这种思想在

---

① 其他一些国家也宣布了要进行迈向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

实际运用时,其偏离市场社会主义远景和希望的程度就大于经典社会主义偏离"原教旨社会主义者"梦想和希望的程度呢?正如斯大林、毛泽东和拉科西的社会主义是现实存在的经典社会主义,那么铁托、卡达尔、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和拉科夫斯基的社会主义就是当代的市场社会主义。有鉴于此,使用"市场社会主义"一词也就并无不妥。

## 21.3 放松管制的其他替代战略分类

立足于经典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经济领导人开始向想像中的市场社会主义迈进,但他们究竟能走多远,则取决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①]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出现了特定的放松管制过程。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放松管制"一词专门指使采取改革措施,从而使经济现象摆脱指令经济,即以命令为基础的直接官僚控制。根据这种狭义上的定义,我们不能假定放松管制的经济过程不再受中央的控制或者说摆脱了官僚协调的影响。在讨论中,放松管制一词只意味着经济规模不是由中央指令强制决定的。[②]

放松管制的替代战略可以根据不同标准进行分类。第一个问题是相对于从前被中央指令控制的某些特别重要的经济变量而言,放松管制走得有多远?即放松管制的程度如何。我将在后面讨论它[→21.4]。

第二种分类标准是放松管制的范围,即放松管制替代战略所延伸的范围。南斯拉夫以及后来匈牙利的放松管制从一开始就涵盖了所有领域的国

---

① 在大量研究国有部门变化的著作中,我们挑选出了下列文献以供参考:南斯拉夫:J. P. Burkett(1989)匈牙利:《比较经济学》杂志(1983年秋季,有关匈牙利改革话题专刊),J. Kornai(1986b)、G. Revesz(1990);中国:B. Balassa(1987)、W. A. Byrd(1990)、H. Harding(1987)、D. Perkins(1988)、E. J. Perry 和 C. P. W. Wong, eds. (1985)、C. Riskin(1989)、M. Xue(1982);波兰:L. Balcerowicz(1988)、Z. M. Fallenbuchl(1988)、P. Marer 和 W. Siwinski, eds. (1988);苏联:E. A. Hewett(1988)、A. Aslund(1989)、M. L. Goldman(1987);越南:G. Porter(1990)。

②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这个概念的解释不同于目前人们所谈到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放松管制。即使在所谓的管制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曾发生过政府向企业(通常是私人所有)发布命令的现象,最多是规定某些价格以及采取行政限制。不过,虽然就其内容而言,本书所讨论的放松管制过程与当今西方世界的放松管制不是一回事,但它们都指向了同一方向:减少国家的直接干预。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使用放松管制一词也就显得更为合理了。

有企业。中国和苏联首先是选定“试验企业”来使用新的控制机制，而且按新旧不同机制运行的部门处于分割状态并长期共存。后来，按新机制运行的企业数目分阶段不断增加。①

然后我将引入第三种分类标准，即放松管制的先后顺序。在不同控制方式下同时运行的各部门所占比重的变化意味着放松管制是分阶段实施的，而不是一个统一的行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战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决定放松管制的部门，在短期决策中就废除了指令经济——快速执行并一举完成（但即使是这两个国家，其他部门放松管制的行动也是分阶段进行的）。相比之下，中国和苏联即使是在放松对投入产出的管制方面也是逐步推进的。

局部的放松管制措施会产生强烈的相互影响作用。因此，理论经济学家和经济部门里坚定的改革者指出放松管制的措施不应渐渐地逐一应用，而是需要“组合打包”并立刻开始实行。没有人否认“打包”原则，但包裹究竟要装哪些东西，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匈牙利的改革过程在这方面走得最远：1968 年 1 月 1 日推行的新经济机制包含了在大范围同时并行的改革措施。虽然改革中确有突出事件（立即推行较大的打包措施），但这些措施最终还是无法囊括所有的控制过程。

## 21.4 企业的纵向依赖

在指出放松管制的程度、范围和先后顺序会依国家和时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之后，我们将开始忽略这些差异，然后概括出处于半放松管制状态中的国有企业的主要特征。为了防止无数的细节模糊主要特征，有必要进行这种抽象。②

---

①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在此可以列举中国的经济特区作为例证。上文所提及的试验为某些企业提供了与经济中其他企业大为不同的特别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为特定区域提供特殊的经济控制环境。

其他国家，如苏联也表达了建立类似特区的思想。

② 读者马上就可以看到，此处得出的结论是：官僚协调机制仍然占主导地位。由于这个原因，在用模型总结基本特征时，我们将主要考虑放松管制过程走得更远的国家，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改革国家（如匈牙利和中国，而不选择苏联）。如果结论支持放松管制程度更高的经济，那么它也一定支持放松管制程度较轻的国家。

企业处于双重依赖的状态之中。从纵向来看，它依赖于政府当局；从横向来看，它依赖于卖方和买方。①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样形容任何体制下的企业：每个企业被政府所影响，而且每个企业都依赖于其投入的供应商和产品的消费者。因此，需要从这种双重依赖中分离出不同体制所特有的要素。

下面将逐一介绍企业活动各个方面的情况，借此来分析在经历了放松管制之后，企业的纵向依赖程度。我们希望尽可能对相关问题加以充分说明，因此会简单重复在本书其他地方已经详细讨论过的一些内容。用多长的篇幅来论述某一观点并不能代表它所描述的现象的重要性；有些极其重要的内容也只是简要提及。只是当某些问题在本书的其他部分没有涉及时，我们才进行详细讨论。

1. *进入*。通常仍然要由政府来决定建立新的独立的公有制企业，进口竞争或私营企业的进入也必须由政府来批准。

2. *退出*。仍由政府来决定是否关闭公有制企业，这一问题与预算软约束现象密切相关[→21.5]。

3. *兼并与拆分*。企业发起兼并或进行拆分的机会有所增加，但政府仍然拥有最终决定权。

4. *企业领导的任命*。在领导人的任命、选拔以及批准方面，政府要么是直接决定，要么对此发挥决定性影响。表 21.1 根据中国的数据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调查。

总的来说，上述 1—4 点意味着该体制还没有摆脱经典社会主义的特征，也就是说，自由企业的原则未能在国有部门加以应用。企业间的竞争无法带来企业之间或者企业领导人之间的自然选择。选择完全是人为的：政府决定企业的存活以及企业高层领导人的提升或解雇。接下来还有十个要点，但前面所提到四点是最为重要的。只要上述结论成立，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说：在纵向和横向依赖中，纵向依赖占据着主导地位。

5. *产出*和 6. *投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分别在 1950 年、1968 年完全放弃了通过控制国有企业的短期生产来强制实行指令经济。

---

① 还存在第三种依赖：企业领导对企业雇员，即企业工人的依赖。在讨论自主经营趋势时，我们曾涉及这一问题[→20.4]。

表 21.1 中国管理者的提升,1985

| | 管理者的不同提升渠道的分布[a]（占总量的百分比） |
|---|---|
| 政府任命 | 60.1 |
| 经过磋商后政府任命 | 30.7 |
| 直接选举 | 4.4 |
| 直接雇用 | 1.8 |
| 其他 | 3.0 |

来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86,p.173),转引自 Y. Huang(1988,p.6)。这组数据的英文出版物可见 B. L. Reynolds,ed.(1988,表 5.10)。

a 基于对 900 个企业的调查,其中 19.9% 的数据来自集体企业。

中国在 1984 年开始放松管制,但程度比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要低。中国引入了所谓的“双轨制”:国有企业接受强制分派的产出任务,而且多数情况下它没有束缚企业的整个生产能力。在完成上述强制分派的产出后,企业有权生产更多产品并且可以自由出售多余部分。强制产出的投入配额由政府通过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习惯方式定量配给,但企业本身必须获得强制计划之外自由产出所需的投入;定量配给机构不会为它们提供这类投入:背后的思路是,它们应该从别的企业超出强制计划的自由产出中获得。① 如果不考虑技术细节,1987 年苏联企业法及其实践与中国的中间道路解决方案在内容上十分相似。虽然企业可以自主决定其产出的剩余部分,②(见表 21.2)但是相当大比例的企业产出事实上都受到具有强制力的政府定购(ГОСЗАКАЗ)的约束。

即使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这些产出不被指令所控制的国家,上级组织仍然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方式干预产出的决定。要求企业尽快交货的巨大压力不但来自消费者,还来自各种政党和政府组织。如果消费者和当局的愿望相互冲突,那么后者的力量肯定更强大。在只是部分废除强制指令的国

① 无法得到放松管制程度的详尽数据。零星数据显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强制计划束缚了企业生产能力的 30 - 100% 左右。

② 有关苏联政府定购更为详细的讨论,见 L. Voronin(1989),V. Sletsiura(1989)和 E. Gaidar(1990)。

家里,官僚对产出决策的干预更为显著。

**表 21.2　苏联政府定购所占份额**

| 政府部门 | 政府定购在生产总值(计划)中所占份额(百分比) | |
|---|---|---|
| | 1988 | 1989 |
| 机器制造业 | 86 | 25 |
| 燃料能源 | 95 | 59 |
| 冶金 | 86 | 42 |
| 化工和木工行业 | 87 | 34 |
| 轻工业 | 96 | 30 |
| 建筑材料 | 66 | 51 |

**资料来源**:E. Rudneva(1989,p. 27)

中央对生产资料的管理虽然没有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全面,但仍然存在大量的采购许可和配给。此外,如果在获得投入上有困难,政府干预则可以提供有效帮助。这种对投入的干预通常落后于产出方面的非正式干预。放松管制加大了买卖方关系中自愿合同的作用。但当对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发生争论时,所求助的仲裁人是某个上级机关,而不是法院。

7. *进出口*和 8. *外汇*。生产企业在进出口交易中所起的作用显著扩大。但即使企业获得了从事国外贸易的正式权利,因而无须再和专业贸易公司公司打交道,上级组织仍然会继续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干预:如设定出口任务、对企业施加压力要求它完成一定数量的定单、优先考虑某些市场而避开其他市场,等等。就进口而言,有配额管制,或是每次交易都必须经过一套许可程序。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严格的中央外汇管理制度。

9. *技术与产品开发的选择*。上级组织经常干预企业技术和新产品引进的选择。企业的补贴、信用能力、进口许可以及其他类似问题一般都与上述选择相关。

10. *价格*。部分放松了定价管制,但大部分价格仍然由政府决定,而且政府还对买卖双方名义上享有的自主定价权进行干预。计算方法是上面规定的,利润率是上面决定的,如果价格被认为定得太高,企业还将受到指责。

11. 工资和就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措施阻碍着企业和雇员就工资达成自由协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设定就业上限和下限，以此对就业进行经常性的干预。

12. 税收和补贴。从表面上看，现行的税收制度或多或少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但事实上，为特定部门或特定企业制定的税收政策普遍存在。因此，有关税收额和最后支付期限的特定优惠政策同样广泛存在。

13. 信贷支持与借款偿还。官僚特征继续支配银行部门的运行。银行和企业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横向的商业关系，其中银行只关心自己的利润水平。银行是政府的部门分支，目标是设法将企业置于其控制之下。预算软约束综合症仍然存在于要点 10、12 和 13 所涉及的领域[→21.5]。企业的纵向依赖力量在此再次凸显出来。

14. 投资。放松了对投资决策的全面管制。在所有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可独立决定的投资比例都大大增加，而且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企业自身从净利润中积累的储蓄。源自国家预算无须偿还的资金所涵盖的投资比例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银行信贷的作用不断增大。（见表 21.3 和 21.4）

**表 21.3　中国的投资资金来源**

| 年份 | 基本建设（人民币亿元） | 源自国家预算的部分（%） |
|---|---|---|
| 1976 | 376.44 | 83 |
| 1977 | 382.37 | 78 |
| 1978 | 500.99 | 78 |
| 1979 | 523.48 | 76 |
| 1980 | 558.89 | 54 |
| 1981 | 442.91 | 50 |
| 1982 | 555.53 | 42 |
| 1983 | 594.13 | 50 |
| 1984 | 743.15 | 48 |
| 1985 | 1,074.37 | 35 |
| 1986 | 1,176.11 | 35 |
| 1987 | 1,343.10 | 33 |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8,p. 498)

表 21.4 匈牙利的投资资金来源

| | 国家启动的投资 | | | 企业投资 | | |
|---|---|---|---|---|---|---|
| | 融资渠道比例 | | | 融资渠道比例 | | |
| | 政府 | 企业 | 信贷 | 政府 | 企业 | 信贷 |
| 1980 | 83 | 14 | 3 | 10 | 68 | 22 |
| 1981 | 72 | 23 | 5 | 8 | 71 | 21 |
| 1982 | 69 | 27 | 4 | 8 | 73 | 19 |
| 1983 | 69 | 28 | 3 | 9 | 75 | 16 |
| 1984 | 81 | 19 | 0 | 10 | 73 | 17 |
| 1985 | 75 | 25 | 0 | 10 | 72 | 18 |
| 1986 | 61 | 39 | 0 | 11 | 76 | 13 |
| 1987 | 57 | 43 | 0 | – | – | – |

**资料来源**:Ko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中央统计局,布达佩斯)(1982,p. 78;1984,p. 77;1987,p. 75;1988,p. 58)

虽然企业投资资金中由自身财力提供的比例已经大大提高,但正如表中所示,分权的实际水平要低得多。规模较大的工程所要求的额外资金远远超出了企业的自身财力,这就为国家通过国家预算或高度集中的银行体系提供资金,从而为干预投资决策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中央机构不干预投资的实际比例要远远低于表中所列出的比例。

上述 14 点基本涵盖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主要联系。上级组织对企业日常活动的干预只有部分由正式条例来加以规定,即政府有权批准企业行为或对企业下达命令。法律规定之外还存在着无数非正式的“无形”手段:企业领导被会议、个人谈话、电话和书信所支配;有时靠“糖衣炮弹”,有时则靠隐蔽的或公开的威胁。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有正式的指示和汇报体制,结构非常清晰。但在半放松管制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混乱的非正式沟通日益盛行。企业与上级组织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充斥着谁也弄不清楚的潜规则,用各种暂行规定、特殊处理和私人关系来规避官方“路线”。在一家企业中,各种机构都有发言权,而目标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冲突的现象。聪明的管理者学会了对许多上级耍花招,挑拨离间,然后从中获利。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军事

型强制秩序逐步让位于松散易变的联系，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

虽然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上下级之间也经常要讨价还价，但最终结论还是由上级组织来定夺。而现如今，讨价还价已经变得更为普遍；下级在谈判中占据着更有利的地位，使用误导性信息也变得非常普遍。[①] 当然，讨价还价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企业过去常常是去争取更少的产出任务和更多的投入配额，而现在谈得更多的是官方许可价格、工资、税收、补贴、信贷条款、进口许可和外汇津贴。[②]

上述所有干预方式都可以被视为间接控制手段。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之间的根本区别可以这样总结：在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部门受到直接的行政控制；而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它们受到间接的行政官僚控制。一个处于半放松管制状态的经济逐步形成了。

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设计师们希望部分放松管制也能够带来国家计划和中央经济管理的角色转变。这种想法的基本思路是：经济计划要避免卷入短期计划的详细分解细节之中，或一味纠缠于执行相关指令。这样才能有更多的精力进行经济分析、编制宏观层次上的短期目标以及制定长期经济战略。由此，经济计划就可以与中央经济管理相互连接，中央经济管理将集中于实现主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以及稳定基本的金融指标参数（如利率和汇率）。

这一想法在现实中失败了。中央经济领导并没有去学习宏观管理，他们还是继续对无数的微观管理进行干预。国民经济计划的声誉和影响力慢慢地被侵蚀。在经典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下发展起来的计划模式根本无法应对新的情况。与此同时，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央决策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制定政府决策时，未能学会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家在经济管理部门运用的现代专业技能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经济当局对财政和

---

① 见 L. Balcerowicz(1988)。

② “管制调节器”一词在有关匈牙利的经济文献中用来形容那些由上级组织设定的财务或价值指标参数。一般是这样来描述改革：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所习惯的计划谈判已经让位给了“管制调节谈判”。见 L. Antal(1979,1985)。

G. Tidrick(1987)、M. I. Blejer、G. Szapary(1990)和 P. Bowles 以及 G. White(1989)对中国的“管制调节谈判”进行了详细讨论。

货币政策一窍不通。[①] 虽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统计中仍然被称作"中央计划经济",但是它们对经济的管理和重组并不是真正的计划,而更像是一系列的即席之作。

## 21.5 预算约束的软硬程度及企业对价格的敏感性

在所有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官方文件都强调需要让企业对增加利润感兴趣。这是进行以下改革的原因:建立管理者报酬和奖金体制;与工人一起分享利润;企业福利支出的规模将取决于它的利润。企业从净利润中积累的储蓄成为它投资的资金来源之一。在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规划中,它们假定企业将对价格和成本作出反应,这样价格就能够成为中央管理的控制工具之一。

尽管有了上述原则规定和相应的法律措施,但企业的利润激励依然很弱(即使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相比已经略有加强)。由于预算约束仍然相当软,对于企业而言,获利能力未能成为决定生死的头等大事或者中心目标。[②] 价格对企业的行为确实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仍然没有实现真正的突破。

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继续使用着四种导致预算软约束的方法:[③](1)

---

① 对宏观控制缺乏基本的理解和经验是导致经济管理机构转向微观管理的因素之一。工作人员更熟悉如何催促交货、通过建立奖金制度来鼓励出口或者投资行为、发放特别许可证或特许权,或者强加禁令。这才是他们游刃有余的拿手好戏。

上述问题在苏联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显得特别尖锐,中央经济管理缺乏基本的宏观经济知识。对形势的曲解使得金融政策错误百出,这是导致货币和财政问题日益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② 硬和软是一个连续体中的两个极端。硬和软的程度可以有所不同[→8.4]。预算约束的软硬程度依国家、时期、部门和企业类型的不同而不同。预算约束相对较硬的企业具有较强的价格和成本敏感性。

如果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忽略细微差别,相信不会有太多误差,而且为了简单起见,在不加限定的地方,我们主要是指软预算约束以及较弱的价格敏感性。

③ 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文献证明,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部门的企业都存在软预算约束,例如可参见如下著作:中国:M. I. Blejer 和 G. Szapary(1990)、P. Bowles 和 G. White(1989)、B. Naughton(1985)和 C. P. W. Wong(1986);匈牙利:J. Kornai 和 A. Matits(1987,1990);波兰:L. Balcerowicz(1988)和 M. E. Schaffer(1989a);南斯拉夫:S. J. Gedeon(1985-86,1987)、P. T. Knight(1984)、L. D. Tyson(1977,1983)。

软的补贴,(2)软的税收,①(3)软的信贷提供②和(4)软的管理价格③[→8.4]。

这组现象的某些典型表现形式是:

**表 21.5　中国亏损企业的救助情况(1988)**

| | 企业数目 | 百分比 |
|---|---|---|
| 被调查的企业总数目 | 403 | 100 |
| 被救助的企业 | 203 | 50.4 |
| 延迟最后还款期限 | 60 | 14.9 |
| 免除债务 | 3 | 0.7 |
| 提供新贷款偿还旧贷款 | 24 | 6.0 |
| 税前偿还贷款[a] | 98 | 24.3 |

**资料来源**:与董辅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直接交流。

a 贷款应该在税后从利润中偿还,税前偿还并计入成本将改善企业的赢利状况。

**表 21.6　南斯拉夫亏损企业的救助情况(1980-81)**

| | 经济单位的数目[a] | 有关的工人数目(千) |
|---|---|---|
| 总计 | 13,667 | 4,848 |
| 1. 1980 年度财务报告未弥补亏损的单位 | 1,303 | 277 |
| 2. 正在复苏的单位 | 178 | 51 |
| 3. 开始启动破产程序的单位 | 20 | 2 |

**资料来源**:P. T. Knight(1984,pp. 5,78)。

a 劳动者联盟的基层组织(BOAL)[→20.6]。大企业可以由几个劳动者联盟基层组织。

国家货币经常用来解救一直亏损的企业,见表 21.5 和 21.6。在党和政府的决议和领导讲话中,反复承诺将停止救助亏损企业。④ 在所有进行改革

---

① 在 M. I. Blejer 和 G. Szapary(1990)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中清楚地表明这一过程。

② 关于这个现象,匈牙利的研究见 E. Varhegyi(1987),中国的见 P. Bowles 和 G. White。

③ 波兰经济顾问委员会曾做出这样的结论:"企业无须密切注视成本或成本的各种要素……因为这些参数的任何变化都可以通过'合理成本'机制自动地转化到他们所生产商品的价格上涨之中。"引自 Z. M. Fallenbuchl(1988,p. 125)。

④ 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说法,中国每年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国有企业亏损。《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 年 10 月 10 日。"中国已经花费 400 多亿(相当于中国工业总利润的一半,或者国家总基本建设的三分之二)来救助那些国有企业。"《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 年 8 月 18 日。

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都制定了或者准备制定有关破产程序方面的法律,但这些措施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

对一直亏损的企业而言,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仅仅依靠补贴或者软信贷生存;它们的生产能力确实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企业过去和未来(期望)的赢利能力与它的投资、增长和技术发展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弱。

纵向的谈判过程一如既往。企业可以就补贴、税收、关税等问题与财政和对外贸易机关进行协商,就贷款问题与银行进行协商,就价格与价格管理办公室进行协商。存在着大量的"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的规定,以便应付特定部门或者特定企业的财务困难。

在规则普遍适用的地方,部分情况下完全可以个别情况个别解释,[①]或者是作为例外事件处理。而且规则总是在变化;企业根本无法确定政府将制定什么措施来影响它们下一年的利润(更不用说更遥远的将来了)。

企业利润的很大部分通过财政再分配,以各种各样的名目从企业拿走,然后又以其他名目分发给企业。各级组织都试图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影响企业,通过奖励和惩罚的方式强制企业执行它的目标,其中包括补贴和利润扣减。(另一个问题是:无数正面和负面的激励最终都相互抵消了。)

有时候钱从一个口袋取出后,又被放入同一企业的另一个口袋里。但经过再分配后总有赢家和输家。产生巨额利润的企业遭到过度盘剥,拿走的钱则传递给其他企业(见表 21.7 和 21.8 中匈牙利和波兰企业的例子)。平等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应有之义,但将它应用于利润再分配无疑是对平等主义不可思议的歪曲。然而这正是现实中所发生的故事:均等化趋势贯穿于利润再分配的过程。[②]

上述经历都深深地扎根于企业领导的脑子里并塑造了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主要结论是:企业的利润不是生产中或者市场上产生出来的,是行政官僚们在办公室里决定的。

---

① 在这方面,一个奇特例子就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所得税。每个企业的税率都在与上级个别签订的合同中加以规定,见 M. I. Blejer 和 G. Szapary(1990)。

② 钱颖一(1990)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对国有企业利润均等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和理论阐述。

**表 21.7 匈牙利的利润平均化**

| 从原来的赢利水平转向 | 最终赢利水平 | | | |
|---|---|---|---|---|
| | 亏损企业 | 低赢利 | 中等赢利 | 高赢利 |
| 亏损企业 | 0.233 | 0.500 | 0.122 | 0.145 |
| 低赢利 | 0.038 | 0.853 | 0.103 | 0.006 |
| 中等赢利 | 0.000 | 0.734 | 0.206 | 0.060 |
| 高赢利 | 0.008 | 0.394 | 0.515 | 0.083 |

**资料来源**:J. Kornai(1986b,p.1697),基于与 A. Matits 的共同研究。见 J. Kornai 和 A. Matits(1987,1990)。

注:"最初"向"最终"赢利能力的转变是指从税前和补贴前的地位转向税后和补贴后的地位。企业被划分为四类:"亏损"意味着赢利水平低于 -2%;"低赢利"指介于 -2% 和 +6% 之间;"中等赢利"指介于 6% 和 +20% 之间;"高赢利"是指高于 20%。表中数据是指在进行财政再分配之后,处于最初赢利水平的企业转变成为最终赢利水平的企业所占的比例。

**表 21.8 波兰的利润平均化**

| 从原来的赢利水平转向 | 最终赢利水平 | | | |
|---|---|---|---|---|
| | 亏损企业 | 低赢利 | 中等赢利 | 高赢利 |
| 亏损企业 | 0.000 | 0.161 | 0.625 | 0.214 |
| 低赢利 | 0.000 | 0.706 | 0.279 | 0.015 |
| 中等赢利 | 0.000 | 0.084 | 0.817 | 0.099 |
| 高赢利 | 0.000 | 0.011 | 0.413 | 0.576 |

**资料来源**:M. Schaffer(1990,p.188)

注:此表采用了 1988 年的数据。对"转变"的解释见表 21.7 的注释。企业被划分为四类:就原始赢利水平而言,"亏损"意味着负赢利水平;"低赢利"指介于 0% 和 6.8% 之间;"中等赢利"指介于 6.8% 和 +22.7% 之间;以及"高赢利"是指高于 22.7%。针对最终赢利水平,类别是这样划分的:"亏损"意味着负赢利水平;"低赢利"指介于 0% 和 3.2% 之间;"中等赢利"指介于 3.2% 和 10.5% 之间;"高赢利"是指高于 10.5%。

事实上,许多人也都在问,为什么经济领导层不强制推行更严格的财务纪律? 为什么那些再三强调的决议和措施没有被执行? 这时候,支持走市场社会主义道路的激进改革者们就会严厉指责党的领导和政府高层机构,批评他们为何如此前后矛盾。在下面的分析里,我们将解释为什么即使是

认真接受分权、市场机制、利润刺激以及硬预算约束等概念的统治精英同样无法做到协调一致。

其中有以下几个相互密切相关的因素：

1. *政治权力*。企业的管理者只是统治集团中层干部，而官僚们却在每个层次上都掌握着权力。位于等级制度中的上层人员无法将这些管理者视为局外人，也不能在企业亏损或者面临财务危机时宣称这是管理者的责任。上层领导负责挑选并任命管理者，让他们成为企业的负责人、代理人并作为其权力的主要支撑力量。

另一个主要的政治考虑也在起作用：企业清算可能在工人当中造成强烈抗议，这会削弱本来就极不稳固的群众基础和权力合法性。

2. *意识形态*。官僚集团也面临着道德危机。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倡效率，并宣称利润最大化就是它的目标。但这一目标与某些社会主义传统价值是相互冲突的：必须与弱势人群结盟、保证工人的安全、社会平等的要求以及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和团体的利益。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官僚集团不是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所有者。进行改革的共产主义者内心充满了矛盾，他们一方面支持市场、企业自主和利润动机，但另一方面又受到经典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的强大束缚：他们不得不援助陷入困境的企业；当然也不能将工人扔到大街上；他们有责任使企业维持一定的收入水平。父爱主义是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不相信“看不见的手”可以协调好企业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而且他觉得企业利润无论有多重要，仍然是第二位的。所有这些无疑都鼓励了预算软约束行为。①

3. *所有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私人所有者和作为雇员从事经营活动的经理，他们的社会角色都相互分离。就财务而言，所有者（个人所有者或者公司的股东）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增加利润，这是他自己的事业：根本不需要政府的诱导或指令。如果他的资本在某个领域没有产生预期收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必然会退出。他付给管理者报酬，而且如果他们的工作没有增加利润，就可以解雇他们。利润也同样激励着商业银行和

---

① 中国的银行高层管理者们曾很好地说明了上述病症：银行的任务是“奖励好的和帮助差的[企业]”，他们这样说道，“这是公有经济。我们不能关闭企业；我们不得不帮助它们生存。”见 P. Bowles 和 G. White（1989，pp. 489，492）引用的评论。

其他金融中介。市场以盲目、无政府主义的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强制推行财务纪律。

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具备上述任何一点。[①] 国内外建议者呼吁市场社会主义应该有强有力的政府并能够坚决执行财务纪律,但无疑是缘木求鱼:当公有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时,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中央无法建立有效的权威;企业也不畏惧这些措施真的能够加以执行。[②] 功能的分离在此并不适用。你能期望集国家、所有者和管理者于一身的官僚机构进行自我约束吗?企业的预算约束只有当企业真正与政府分离后(在出现困难时,企业只能依靠自己)才能变硬。保证这种分离自发形成的唯一途径就是私有制。[③]

在经济中创造活力的企业家们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出现:是否生产不再由政府武断决定,而是依靠企业家自身的积极性以及能够在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获得融资。一边是自由企业,一边是私人产权,市场竞争只有与这两者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才能够有真正的财务纪律。[④]

4. 协调和控制。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是上级组织执行微观管理职能[→21.3]并对企业活动进行多方面的干预。因此,上级组织也要分担责任。如果随之发生失败,企业的管理人员完全有充分的证据并理直气壮地说,他们采取的任何一个重要行动都与上级党和政府组织进行过讨论,或者这类活动完全就是上级组织的命令。他们可以继续找借口说,之所以造成

---

①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部门中同样存在预算软约束综合症,如以色列、印度、希腊、巴西和阿尔及利亚的国有部门都是这样。

② 这种现象——威胁和承担责任的"可信度"——在有关预算软约束的博弈论模型中从许多角度都进行了分析,见第8章,注21。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 M. Dewatripont 和 E. Maskin(1989)所进行的研究,其中他们考察了预算软约束综合症的原因。该研究使用博弈论模型证明了,如果信用扩张采用了中央集权模式,那么银行就不可能执行事前的威胁;它必须追讨贷款并且还要继续为没有经济效益的投资方案提供资金。但当银行部门实行真正的分权时,威胁就会变得可信,从而能够使预算约束变硬并且吓跑那些提不出具有经济收益投资方案的人。

③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如果公有企业不多,而且被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私有企业所包围,那么就能够人为地保证公有企业的预算硬约束。这样,为数不多的国有部门的行为将类似于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私有企业的行为。

④ 根据 P. Murrell(1990a,1990b),按照市场社会主义构思的改革实验,最严重的缺陷恰好是它们无法提供熊彼特式企业发展所必须的机会或激励。

损失是因为错误的价格、税收或缴费、政府下令涨工资以及上级采取的其他措施。任何濒临破产的企业都有许多高官位居其上,他们与企业领导占有同样的事前信息,也参与了错误决策,因此,完全有动机掩饰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期望严格的纪律?官僚控制越是占据主导地位,预算约束变硬的可能性就越小。①

在关于预算软约束的辩论中,经常出现会这样的问题:是否有可能让公有制企业的预算约束在不断完善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变硬?鉴于上述四点,可以毫不含糊回答:不,不可能。②

人们经常用预算软约束理论来批评市场社会主义,对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澄清。预算软约束并不是导致改革乏力和失败的最深层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权力结构,以及试图根据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来进行改革的所有制关系和协调机制。预算约束只是这些更深层次原因所产生的综合影响的外在表现,尽管一再强调预算约束,但在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它根本不可能变硬;利润激励仍然很弱。因此,价格未能在市场机制的运行中发挥核心作用。就这个意义而言,预算软约束的程度更为关键:各类其他问题和复杂的现象(如企业需求失控、投资和进口饥渴、效率低下)都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归结到预算软约束这一病症。③

让我们把改革者头脑中的想像(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市场流派)与实际情况进行一下比较。市场机制与其他协调机制的首要区别是使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对价格起反应。即使预算约束不是非常软(它甚至能够在很

---

① 如前所述,微观管理是预算约束软化的原因之一,因为它阻碍了彻底的职责分权并且为上级组织提供了掩盖错误的动机。但它同时也是预算软约束的结果,因为金融控制不足以为中央组织提供充足有效的传递手段。

② 我在文章中从未建议说:在国家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企业的预算约束可能变硬。后来的研究更加深了我对这种可能性的怀疑。此后,我与我的同事一起做了一些详细的经验分析——见 J. Kornai 和 A. Matits(1987,1990)——同时也参考了其他的调查研究资料(见注 25)。我也尝试过从理论上重新评价上述关系。本书概括了作者的理论思路。所有这些都导致我非常直率地给出了这一否定回答。

③ 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在有关软预算约束理论的评论文献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错误理解。正如文中评论所解释的,这一现象在我的思想路线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这与它在整个体制解释理论的因果关系链条中所处的位置并不矛盾。在图 15.1 所介绍的概念框架中,预算软约束综合症是第四层次的特征之一[→15.1]。

大程度上抑制所有的需求和供给反应),市场仍然无法发挥作用。

虽然企业对价格的反应非常迟钝,但它对成本和价格也并不是完全不在意。它利用容易获得的机会来削减成本,但它并不会用心去抓住所有机会。它抓住每个机会来提高价格,这往往比玩弄使预算约束软化的其他方法更简便。在不违反其他利益(如满足政府某些相反的期望)的情况下,有些企业也会对产出或投入方面明显的价格变化作出反应。但所有这些都是不常发生的,与真正的市场机制相比,这类反应往往是粗糙的、被扭曲的和缓慢的,而市场所要求的是经常的、有效的、具体和快速的反应,正是这种对价格的敏感反应,才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很高的效率。

有人可以补充说,也许价格信号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价格不敏感以及造成这种不敏感现象的预算软约束也影响了价格。如果当企业的利润水平总是很低或者为负时,它仍然能够生存甚至继续发展,此时使用任何调节价格的方法都是不必要的。这种价格机制导致了对自身错误的默许。①

准备朝着市场社会主义方向进行改革的人希望企业对价格作出灵敏反应,这样经济就可以通过所谓的财务调节器来进行中央管理,从而取代原来投入产出方面的数量指令。提高利率,投资就会减少;货币贬值会带来出口增加,进口减少;提高产品 A 对 B 的相对价格,企业就会用 A 来替代 B 等等。但这些都是必将落空的期望:如果企业几乎不理会这些所谓的财务调节器,那么中央试图通过调节器来施加影响根本就是徒劳的。这就像当传感器还没有装进电视机,却想通过遥控器改变电视频道和音量一样,除了用手完成之外,你别无选择。

前文已经明确指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一个半货币化经济[→8]。在改革产生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部门仍然是半货币化经济,尽管货币发挥的积极作用有所增加。

## 21.6 公有制与官僚协调之间的亲和力

前面的部分将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市场所包含的思想与改革进程中

① 劳动力市场对相对工资水平具有很强的影响,因为雇员家庭的预算约束是硬的。如果雇员的工资达不到他们认为的合理水平,他们不会顺从地默许。

国有部门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比较。于是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现实与期望会相差这么远?

改革的设计者们希望通过废除或遏制指导体制和指令经济能够创造一个可以立刻“引进”市场协调机制的真空,但却事与愿违。真空中充斥着官僚协调机制的修正形式。直接的纵向控制首先让路给间接的纵向控制,其次才是市场横向协调以微弱的(并且经常被歪曲)[→21.7]形式占据少许空间。

多数观察者都认识到官僚影响仍然非常强大,但在情况描述和因果关系分析方面还是存在意见分歧。有些人强调说,虽然企业想要引入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但保守的官僚们反对这样做,这些保守官僚在党的领导集体中有它的代表,甚至有煽动分子(“强硬派”)。根据这种分析,官僚的抵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来自上层。另一个版本的诊断认为保守派受到了两面夹击:来自上层的改革意识坚定的最高领导要求更彻底的改革,而来自地方和企业层级的领导要求独立。不过顽固的保守官僚们始终固执己见。

另外还有一些人看到了这些诊断中确有合理成分,但认为它们都未能令人满意地描述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益和行为,我便是其中一员。

本书所定义的官僚是指具有科层等级结构的社会群体。它没有“超出”社会之外,它存在于社会的每个细胞之中。平均起来,每八个和十个家庭中就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官僚成员,他的日常生活、收入、社会地位和职业都与官僚体制紧密相关。每个官僚机构都想要生存并继续发挥作用。这种行为根本不需要来自上面的命令或鼓励:官僚机构中的所有人员都希望官僚协调机制能够继续存在,因为正是这种体制赋予了他们权力。当然,这也不是他们唯一的动机。他们坚守自己的权力领域是因为他们认同自身的工作,并且相信这样做有用。价格机关里的人想要制定价格,工资机关里的人想要决定工资,投资分配者想要分配投资,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想要分配劳动力,等等。如果这些领域出了差错,每个人都在想:应该通过更全面的干预来恢复秩序。[1] 在其自身领域的每个人都会不断增强完善官僚控制的趋

---

[1] 一旦在经济中出现了任何严重问题,直接控制的办法会立刻死灰复燃,这足以说明官僚机构持续繁殖和撤退后仍能卷土重来的能力。举例来说,经常项目平衡的问题往往促使当局使用更严格的外汇配给和进口许可等行政管理手段,见 J. Gacs(1980)。

势。换句话说,要努力防止官僚们不希望出现的东西从一系列规定、指示和禁令组成的严密网络中泄漏出去。

企业领导在要求自主时也只是半心半意。当周围情况一切良好时,他们宁愿息事宁人,也不用费心琢磨如何获得由于再分配而被拿走的利润、资源和工资基金。但当问题或障碍出现时,他们期望有人干预,甚至要求干预。如果在获得投入方面存在困难或者银行不提供信贷时,他们会请求政府部门或者当地党委书记来协调。企业经理们曾花费了一生的心思来建立他们的"关系",现在如何让他们突然失去以这种方式积累起来的"财富",而处于没有"关系"或"上级主管"的状态呢?如果遭受财务损失,难道他们必须面对预算硬约束、破产和失去管理职位吗?通过游说获得适当的官方决策支持、走后门、精明地与上级组织讨价还价,这些才是他们游刃有余之处。市场中的竞争和无情淘汰则是陌生和令人畏惧的东西。

在市场中,独立自主的经济体之间彼此发生相互关系。官方在宣传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时,强调它能够协调好中央控制和企业自主。① 然而中央控制和企业自主在逻辑上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余地去摆弄诸如"独立自主"这种词的含义。一个企业只有当它和其他企业都不附属于行使真正统治权的共同上级组织时,它才能真正独立自主。只有一个企业真正与别的企业相互分离时,它才是独立的;因为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所有者(或者说,就公司制而言,有不完全相同的几类股东)。

所有这些也解释了公有制和官僚协调之间的亲和力是怎样产生的。各式各样的官僚协调方法会自发地不断复制自身,无须特别强制,这根本不需要中央的指令;相反,即使在一些中央决议文件中一再强调要减少官僚协调,它还是能够死灰复燃。

在此,我必须回到体制要素之间的亲和力这个问题上。在本书两个更早的地方曾讨论过[→15.2,19.4]的两条线路现在可以结合起来看了。经

① 苏联总理尼·雷日科夫 1985 年 2 月 2 日曾这样说过:"我们工作的目标是详细阐述管理我们庞大经济体的有效方法,并且在计划框架内给予企业和社团广泛的经济自主。"

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 1968 年为启动改革所做的重要决议中是这样表达的:"中央计划控制与市场机制运行的结合将大大增加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独立性和决策范围,同时提高它们的积极性和责任感。"H. Vass, ed. (1968, p. 313)。

典社会主义是一个有凝聚力的体制,除别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公有制和官僚协调之间存在一种亲和力,这些体制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彼此加强。资本主义同样也是一个有凝聚力的体制,因为私人所有与市场协调之间存在亲和力,它们也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彼此加强。但是在尝试建立市场社会主义体制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一个没有凝聚力的体制,其中的体制要素相互排斥: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与市场机制的运行是不可能共存的。

这也不是什么新观点。冯・米塞斯[→21.2]在那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中曾有力地强调过这一点。G・沃伦・纳特(1968)把在不存在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的想法称为“一个美妙的幻想”。A. A.阿尔钦、H.德姆塞茨以及“产权流派”其他成员再次吸引了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经济学家。[①] 尝试建立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幸实践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连串的争论。

## 21.7 公有制企业的横向联系

自放松管制以来,公有制企业之间的横向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官僚干预依然大量存在,但买方和卖方企业之间现在可以对很多事情达成一致。它们订立买卖合同,经过双方同意后就可以更改合同,形成一致同意的价格,彼此提供信用等等。这些联系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也存在,但它们的作用在改革体制下大大加强。

不过上述现象需要进行认真评估。如果将市场一词进行严格定义的话,那么这些横向联系几乎不可能被称为市场协调。一个真正的市场是由价格、可获得的货币利润以及对手之间的竞争来推动运转的。这些推动力在半放松管制的国有部门中非常微弱。官方在宣传改革之初就劝说管理者要表现出“市场是他们心中的上帝”:在新闻界、电视上、政治家的讲话中都催促管理者们要重视消费者的需求,重视质量和适应国内外需求。但管理者的行为并不受劝说的影响。事实上,并不是市场控制企业的出生、成长、衰退

① 见A. A.阿尔钦(1974)和A. A.阿尔钦与H.德姆塞茨(1972)。有关进一步的讨论,见D. Lavoie(1985),G. E. Schroeder(1988),G. Temkin(1989)和J. Winiecki(1991)。

或者死亡。企业开始考虑利润水平、工资和支付给工人的利润分配额、福利开销或投资规模，但这些都依赖于上级机关的决策，而不是依赖于市场。

除了设法劝说企业更重视市场外，经济管理者还开始通过巧妙的激励机制和精心设计的价格安排[→21.2]来模拟市场。问题在于，市场机制运行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生活着的人们是否对价格、供需和买卖有个人兴趣，而不是什么公式在左右着价格运动。当价格上涨时，与价格有利害关系的那些人根据这一信息行动：有些人不能实现他们的买入意图，然后自动从生产者的行列中退出；而其他人则抓住机会加入产品生产，从而赚取更高的利润。当价格下降时，情况正好相反。然而在人为模拟的市场中，价格所提供的信息与供需决策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却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前一部分指出了公有制与官僚协调之间的亲和力。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公有制和市场协调之间是不存在亲和力的。市场关系不会自发地与公有制并肩出现；市场社会主义只是试图在协调过程中把它人为地强加其中的参与者。

在市场得以正常运转之前，一个重要条件是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合同应该兑现。而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合同违约通常是不受惩罚的。存在支付困难的公有制企业只要采用向供应商付款的办法就能轻松渡过难关。这种强制信贷成为软化预算约束的主要方式之一。于是就产生了乘数效应：产出没有得到补偿的企业无法向供应商付款，然后供应商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它自己的供应商，如此类推。这一现象用财务术语来说就是“排队”：债权人在债务企业那里排成一列，它们期待着总有一天会轮到他们。如果“排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结果将是一场真正的流动性危机。[①] 每个企业可以公然拒绝支付账单，因为它确信自己不会受到惩罚，也不会因为财务危机而陷入破产；国家和国家银行体系总会通过某种方式来解救它。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不会出现这种强制信用和排队现象，因为中央银行会自动地将相应金额借记入买方企业账户和贷记入卖方企业账户。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类似于市场”，恰恰在于它允许企业间的商业信用。

---

① 举例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南斯拉夫企业间债务的年增长率大约为30—50%。详细分析可参见S. J. Gedeon(1985－86)和L. D. Tyson(1977)。E. Varhegyi(1989, 1990b)对发生在匈牙利的类似现象进行了研究。

但它同时容忍大量违背支付义务的行为，这与真正的市场经济精神和法律实践形成了鲜明对比。

就横向联系这一问题而言，有必要提一下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另一重要分支：在社会主义体制的框架内建立国家资本市场。[①] 这一提议的出发点是对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现状的批判。最初设想的改革计划的主要缺点之一是它仅仅试图创建商品市场，然而事实上需要一个包含资本市场在内的更为广泛的联合市场。[②] 迄今为止推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只允许公有制有三种资本配置方式：(1)中央政府组织分配的预算资金投资；(2)国家银行体系允许延期偿还投资贷款；(3)公有制企业通过自身积累获得投资资金即"内部"自我融资。

因此，应允许另外一种方法：(4)公有制企业可以向另一个公有制企业提供资本。如果想发展资本市场，那么国有企业的法律地位必须改变，即把它们变为股份公司。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可以自己发行股票，另一家企业也可以购买这些股票。这样就会出现交叉所有权：一家国有企业成为另一家国有企业的部分所有者。

根据这一计划，不仅生产企业可以相互购买股份，国有银行也可以购买企业的股份，反之亦然：企业可以购买银行的股份，银行也能像股份公司那样运作。国有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也可以将它们的资本投资于企业的股份。[③] 地方的政府组织(如市和乡政府)和非赢利性的机构(如大学和医院)也可以购买股份。[④]

这一改革方案假定上述所有者都可以将股份自由转让。相关的交易将

---

① 这一观点在匈牙利的改革经济学家中相当普及，创始人是匈牙利经济学家 M. 塔多斯(1986,1990)。类似的观点出现在其他改革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波兰。对这个观点更详细的说明可参见 W. Brus 和 K. Laski(1989)，他们为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辩论提供了许多重要观念。

② 提出这种观点的那些人通常会补充说，劳动力市场也是必要的。

③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改革最深入的那些国家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整个养老金体制也都是由一个单一的国家垄断机构进行管理。保险业务要么被一家国有垄断公司所控制，要么集中于一些处于寡头垄断地位的国有公司手中。

④ 多数提倡引入国家资本市场的经济学家对公司股份能否向私人出售都避而不答，虽然有关股票的提议即便在潜在的国家所有者范围内都未能实现，但却引入了债券制度。尽管只是触及了总资本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但至少可以说私有债券的自由买卖是建立真正的资本市场的前奏。

在国家运营的股票交易所进行。建议者希望国家资本市场能创造出流动性比以前更强的新的公有制形式。

在写作本书时,这一提议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得到实施。在处于后社会主义阶段的东欧国家,提上议事日程的是首先通过私有化将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然后将公司股份出售(或自由转让)给国内外私人所有者[→19.7]。人们希望私有产权能在银行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私人保险公司也迟早会建立起来,再加上分散经营的养老基金,这些机构会将它们的部分资本投资于股票。但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不是在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中,而是在私人部门将平稳地占据主导地位的后社会主义体制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用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来评估国家资本市场的实际效果是缺乏说服力的。

很难说那些仍然沿着市场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国家是否会建立国家资本市场,例如中国。如果真的建立起国家资本市场,那么那里的经验将提供更好的判断依据。在缺乏实际经验的情况下,只有凭猜测来支持对上述提议的评价。

我自己对此深表怀疑。即便在与商品有关的交易中,通过人为手段模仿真正的市场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完全有理由担心国家资本市场将是更拙劣的模仿,它只会导致国家所有权从国家的一只手转到国家的另一只手,而不管另一只手是被命名为“企业”、“银行”还是“保险公司”。事实上,每个新的所有者都是具有预算软约束特征的企业,即或多或少带有官僚性质的组织。没有资本主义的私有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资本市场。

## 21.8 两种依赖的比例

半放松管制经济概念的建立是在官僚协调与市场协调可以以任何比例相结合这一前提假设之上的,比如说,以 50: 50 的比率。经验表明,这一前提假设是错误的。当然,市场的有效运行可以与政府干预并行不悖,只要政府不频繁介入市场当事人之间的自由协议。但官僚干预却能够达到摧毁市场生命力的临界规模。无数针对国有部门的干预都必定会超越这一临界规模。

有必要回到在**21.4**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企业在任何体制下都有双重依赖,它纵向依赖于政府机关,横向依赖于市场。但这种双重依赖对处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下的国有部门,又显示出了什么样的体制特征呢?横向市场依赖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相比有所加强,但它仍然是次要的。纵向依赖发生了变化,间接官僚控制取代了传统的直接官僚控制,但纵向依赖依然保持着主导地位。脱胎于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革趋向带来了协调与控制实际方法的许多改变,但它们并没有引发彻底的变革。

对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双重依赖所导致的管理者职位、动机和行为的变化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管理者的装扮、词汇和举止越来越像他/她西方的同事们。管理者再也不把自己称为派驻在生产前线的党的战士。

事实上,这种变化只是流于表面。他们当然可以像西方管理者那样成为拿工资的雇员,但却不是自担风险的企业家。他们被授予c类产权,即部分控制权,他们不拥有其他产权。但资本主义企业管理者的短期和长期利益与企业所有者在利润和资本净值上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们认同利润目标,并且认为自身的命运将取决于他们在市场上所取得的成绩。[①] 而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者的命运却与等级制度中职位高于他们的那些人紧密相连。虽然他们一只眼睛盯着市场,另一只眼睛却要盯着他们的上级,事实上更重要的是向上的眼睛一定要看清楚:他们现有的奖惩和未来的提升都取决于上级领导。所有者,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官僚机构的总和。但这完全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经典社会主义的既定模式依然没有改变:公共所有权既属于所有人,又不属于任何人[→5.3]。所有权模糊不清是企业管理者利益模糊不清,充满矛盾的最终原因。

许多人期望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能够创造出新的"管理者阶层",这些人一般而言独立于党和政府,并组成社会团体来制衡官僚政府。同时,他们独立于雇佣劳动力,作为"雇主"的化身与"雇员"形成对比。然而这些期望几乎都没有实现。

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依然是被任命的人员[→3.2,18.1]。事实上,市场

---

① 不少著作都研究了资本主义股份公司中所有者和管理者,以及所有权与控制权相互分离的关系。见 A. D. Chandler(1977)、E. S. Herman(1981)、S. J. Grossman 和 O. D. Hart(1986)以及 E. F. Fama 和 M. C. Jensen(1983)。

社会主义中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行为反映出他们扮演了如下角色：他们是 1. 等级制度中的中层官僚，依靠上级领导，同时自己管理自己；[①]2. 作为部分所有人，获得充足的剩余收入；[②]3. 技术官僚，除了具体职务之外，主要关注生产和技术发展；4. 选举产生的自主经营型领导，他们代表雇员的利益。

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管理者对角色 2、3、4 的认同程度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要强。就管理者的行为而言，角色 1 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 21.9　国有企业与民(私)营部门的关系

许多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市场"思想的倡导者将下列现象视为理想状态：

国有部门应该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但它需要转变为市场行为。同时也应该存在私营部门，但只是处于补充和次要的地位。在参与市场竞争时，上述两个部门还应该相互合作。按照这一改革方案，本章和 19 章所讨论的两种趋势能够结合在一起了。

上述理想状态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凑巧实现。比如说，在匈牙利农业生产中，某些大的合作社在很长时期内通过提供种子、运输和其他服务，有效地帮助了成为它们会员的家庭农业。但就整体而言，经济改革在较长时期内还是令人非常沮丧。下面我们将逐一分析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

私营部门吸收了一些劳动力(通常是最好的白领和脑力劳动者)，这使国有企业深感不安。私营企业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有无数的官方规定限制了公有企业决定工资的权利，而私营部门却可以支付高得多的工资。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公有企业管理者被数不清的规章制度所牵制，他们也非常羡慕私营企业的独立自主权。

与此同时，私人企业家认为，公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享有许多

① 从另一方面来看，管理者向下与雇员进行协商的地位有所削弱。有一些原因可以解释这个变化[→20.4,23.1]。

② 管理者贪污得越厉害，他们从剩余收入中攫取的数额就越大。如果他们一丝不苟、认真工作，那么只能获得根据有关规定允许发放的领导工资和定额奖金。在许多国家，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特权是不公平的:公有企业在信贷、材料进口、外汇配给以及投资的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方面占有很大优势。公有企业依赖党和群众组织的支持,而且还和政府的每个部门和每个层级都维持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全职受雇于私营部门的人也羡慕国有部门员工在许多方面享有的特权以及工作保障。

除了投入方面的竞争之外,还有产出方面的问题。真正的"卖方之间的竞争"只存在与少数领域,如食品或餐饮业。但进入限制维持着垄断,或者说至少让公有企业占据着统治地位。持续的短缺依然在大范围内存在,因此无论是公有性质还是私有性质的生产—销售商都享有卖方对买方的优势。在这个方面,两个部门倒是可以和平共处。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企业家从别的私人企业家那里获得部分原材料、半成品和机器。但他们只能从国有企业那里获得剩余的部分,这将他们置于被剥削的地位。私人企业家常常采取贿赂官员的办法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投入品。

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即公有企业购买私有企业的产品,但这一做法受到各种行政禁令的限制。对私营部门而言,国有部门作为买方则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赢利市场,但这个市场对它们基本不开放,主要留给了别的国有企业。

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没有形成"公平"的竞争条件。每个部门都感到环境对它不利而对竞争对手有利,考虑到不同的影响因素,而这两方面又都是正确的。

## 21.10 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变革的评估

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市场思想的一个关键要点就是希望官僚协调和市场协调能够融洽相处并弥补各自的缺陷,从而成为互为补充的协调机制[→21.2]。上述期望几乎没有实现。下面我简要地评估一下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所带来的变化。

对国有部门部分放松管制缓和了经典社会主义直接官僚控制的极度僵化,从而允许企业管理者更灵活地适应当时的情况。尽管进步不大,但毕竟

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在许多企业，产品质量得到了提高了，产品范围也有所拓宽、新产品的推出更为频繁。与过去的指令经济相比，企业更加重视购买者的需求。这些变化缓和了许多领域的短缺状况。①

也许在社会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效果要比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更为重要。在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经济氛围要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更人性化。部分或者全部取消指令经济有助于解除那些生硬的命令，并削弱了对违反纪律者进行严厉报复的军人心态。② 管理者不再生活得胆战心惊，因为在传统体制下，即使最轻微的错误都会被当作蓄意破坏而被处以监禁、劳改或死刑。这使得其他领域的镇压有所减轻。在经济关系领域，人们有了更大的活动范围：同事、友谊和乐于助人，换句话说，即有了道德协调。

但这些积极的方面并不能说明部分放松管制和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基本上达到了人们的预期。在进行改革的国家里，仍然无法根治国有部门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染上的痼疾。最初的成就并没有伴随着平稳的业绩增长，反而出现了退步和减速。一旦稍有增加的企业决策权达到极限，效率的提高必将与体制限制发生冲突。大量短缺现象继续存在，质量和技术的发展无法实现持续突破，于是出口方面的严重困难就随之而来。这些只是最突出的问题。除此之外，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犹豫不决还造成了新的紧张：不平衡导致旧的传统宏观紧张更为复杂。③ 随后我们还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一问题[→23]。

国有部门的改革摇摆不定，其结果便是官僚协调和市场机制的缺点非但没有互相纠正，反而趋向于彼此加强。国有部门两头落空，所谓的相互协

---

① 尤其当部分放松管制发生在相对有利的宏观环境下的时候，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会自我强化，就像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改革早期的情况。如果宏观环境紧张且其他形势也不利时，部分解除指令经济本身对情况的改善起不了什么作用。随后我还会谈到这个问题[→23]。

② 间接控制的一种形式是：部长不命令企业领导做某些事情，而是礼貌地要求他这么做。毫无疑问，企业领导完全依赖于部长，于是他通常会把礼貌当作指令一样来执行。尽管如此，也不能说变化完全不相关的。毕竟"文如其人"，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更文明的形式，这一点增强了下级的尊严感。最后也使得他更容易对上级领导说"不"。

③ 有许多迹象表明，市场社会主义类型的改革往往削弱而不是提高生产效率，大概是因为宏观不平衡的影响结果。R. S. Whitesell 的研究(1989—1990)用基于生产函数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来比较匈牙利和西德工业的效率，结论是匈牙利的相对劣势随着改革进一步加大。

调只是徒有虚名,事实是"既非计划又非市场。"①

没有纪律就没有协调。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强制推行严格的纪律:它下达命令、奖励顺从的行为并且报复那些蔑视纪律的人。没有人可以不受惩罚地背离计划指令,忽视公开宣布的优先投资的最后期限,或者超出工资基金或规定工资率来发钱。如今这种纪律被解除了,虽然还下达指令,但不遵守指令并不会带来多少危险(或者说,多半可以敷衍了事)。中央再也不能强加它的意志了。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同样强制推行纪律。竞争对手是无情的,在买方市场经营失败的卖方只有被迫退出。有时失败是非常悲惨的,尽管不时会有各种救济,但那毕竟是真正的破产。银行坚持要求贷款必须偿还,如果有必要,无力偿还房屋抵押借款的破产债务人连自己的屋顶都保不住。雇主会强制雇员遵守工作纪律和工资纪律。处于半放松管制状态的国有部门完全缺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严格的市场纪律。

在此有必要暂时偏离正题,谈一谈改革期间公有经济的道德观。如果想让市场真正运转,就不仅仅需要物质刺激、遵守法律(要求商业合作者订立公平契约并且严格遵守),而且需要有商业诚信(丧失"商誉"、信任和声誉将意味着严重的损失)。就这点而言,先前讨论过的道德协调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6.6],否则,在律师、法院和收取罚金方面就会耗费巨资。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商业诚信未能成为普遍的行为准则,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全都违背诚信原则。

半放松管制的国有部门很少有与私有制、市场和竞争紧密相连的勤奋和节俭,它所表现的是非常低级的商业精神。这种精神渗入了整个社会肌体: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家在生产方面都借助于与政府官员的私交,在个人事务上也同样如此,贿赂更是平常行为。② 遭受短缺之苦的买方,不论是企业、自己经营的手工业者,还是消费者都设法去做同样的事情。国家财富在公众的眼里是没有价值的,人们并没有感觉到它是从公民的税收和贡献中产生的,或者说掌管国家财富的那些人能对此负责。许多公众不会谴责欺

---

① 这一简明的形容词语是由 T. Bauer(1983)创造的。

②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贪污腐化现象的理论研究,可参见 P. Galasi 和 G. Kertesi(1987,1989)。

骗或盗取国家财产的行为。

上述现象明显地出现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建立在计划指令和企业自由决策[→21.4]基础上的双轨制几乎是在怂恿操纵行为。在计划指令控制体制下,企业在进行讨价还价时,总是设法获得最大的投入配额,接受最小的产出任务。这在双轨制下继续存在,而企业又有了一个新特征,即自己不使用按照很低的官方价位分配给它的原材料或机器,而是以市场价格将它们卖给另一家国有企业或者私营部门。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几乎不干别的,而是专门利用关系获得廉价的政府配给,然后再高价出售。[①] 这种企业名义上是公有制,但事实上它或多或少已经变成了管理者的私人财产,他们将大部分利润装入自己的腰包。[②] 这是官僚机构与私营部门相互渗透的开始,这包括法律形式上的合资企业和私下的个人交易。私人企业多是由党和政府高级官员或企业管理者的家属成立的,因为他们知道该如何"走后门"。[③] 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极为罕见,但它与社会主义的反资本主义传统产生了激烈冲突,因此,很难得到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可。

高收入阶层的出现与上述现象紧密相关。有些人致富是得自真正的市场成功,但有的人却是凭借歪门邪道:贿赂、欺骗国家或者消费者。一般人不会去做严密的经济分析或者警方调查。他的内心一片茫然,他甚至不能确定到底是对改革不满,还是对私营部门或者官僚机构不满。他捞到的钱里可能既有自己的努力也有特权所赐,在赚取市场利润的同时也有来自贪污腐败的收入。于是,对"投机者"和"贪污腐败"的憎恨情绪迸发出来。[④] 改革自己绊倒了自己,陷在半途,离群众越来越远。

上述现象可以让我们对源自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市场思想的改革方

---

① 对双轨制的批评,见 J. Wu 和 R. Zhao(1987)的研究。

② 引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一篇文章来说:"这些企业集行政管理和经济权力于一身,他们将政府职责和经济生活结合在一个机构中;正是他们为了利润倒买倒卖,由此导致中间人的盘剥;他们因此攫取了高额利润。"《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 年 3 月 7 日。

③ E. Hankis(1989)将改革体制下的这种相互渗透称为"大勾结"。

④ 有时,在斯大林的统治力量中会形成联盟,如拒绝重商主义和市场的新左翼、民粹主义的空想分子,以及坚持平等主义的保守官员同盟,这些人就曾是匈牙利 1972—1973 年第一次反改革运动中的同盟军。

案的实际运行看得更清楚。市场社会主义在狭义的经济逻辑上似乎无可辩驳:你完全可以设想这样的体制,其中有独立自主的国有企业,有一个目标明确、利益中立的中央机关,两者相互结合就构成了市场。可问题在于,隐含在这一理论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假定是不符合实际的。面对社会主义体制的真实结构,残留的旧意识形态以及所有权关系,市场社会主义是注定不会成功的,它也无法建立起充满活力的社会经济体制。

不过,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改革实践也产生了一些有益的影响,这不仅仅包括本部分开头所提到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就总体而言,它带来了更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尤其影响了那些有启蒙思想的社会领导阶层。[①] 在传统体制下,人们以为指令经济、全能的中央集权和无所不包的计划方式就是经济控制的最高形式,而市场社会主义动摇了这一盲目信任。它开始鼓励独立自主的经济单位,希望它们能够自发自愿地建立联系;它开始恢复曾被旧教条摧毁的市场和自由企业的名誉。一旦人们接受了国有部门同样需要市场的观点,他们就会带着更少的偏见和更多的同情来看待私有企业。所有这些变化都为更深层次和更彻底的社会运动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

## 21.11 预演: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部门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出发点是国有部门的主导作用。在革命之前,对国有部门即存在像捷克斯洛伐克或东德那样实施的传统控制模式,也有如匈牙利或波兰根据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变化的控制形式。如今应该怎么做呢?

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国有部门未来究竟该占多大比例?很显然,这是我们在**19.7**部分所提及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一般情况而言,公共所有权私有化和发展私营部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速度?市场社会主义辜负了人们对它的期望。这是导致社会转型的领导力量尽可能地加速私有化进程的因素之一。

---

① 根据图15.1,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主要带来了第三层次(协调)和第四层次(行为)的变化(虽然不是持续的激变,但也是非常关键的变化)。与此同时,它对第一层次(政治权力的结构和意识形态)也产生了反馈作用。

私有化进程的起点是国有部门比例为70—95%，现在就研究这一进程将在哪里结束为时尚早。当然，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哪些领域可以保留公有产权，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在本书范围之内。

即使以非常快的速度推进私有化，国有部门占相当比例的阶段还将持续一个时期，而且这一比例会比转轨结束并最终稳定下来时它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于是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国家应该对国有部门的运行采取什么控制方式？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再三考虑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即那时是采取什么形式控制国有部门的？有何成败得失？

最近东欧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市场社会主义的复兴。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出现在抱定决心要改革社会主义体制的共产主义者当中，而现在的第二次浪潮却影响着一些东欧的非共产主义者（事实上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那些曾经在野而现今已经能影响国家职能的政党和作为顾问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及经济学家都持有如下观点：旧的党政体制无法在国有企业中引入真正的市场行为，新的民主体制必须表明它是能够做到的。这种观点在西方的评论家和顾问当中同样存在。这种期望在实践中既可能被证实，也可能被否定。但我个人却对其现实性充满怀疑。我坚信，只要国有部门在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那么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行为就仍将充满矛盾。除非情况发生根本转变，否则他们仍将是半商半官，而且会继续利用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来捍卫这些企业受保护和享有特权的地位（包括他们自己的管理者地位）。只有当私营部门逐渐发展成为有威胁的竞争者时，继续存在的国有企业管理者才能更像真正的商人。最后我想说的是，当且仅当市场机制的真正社会土壤——私营部门——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主导力量时，市场协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 第二十二章　价格改革

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运动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对价格体系的修正。这与前面讨论过的两个趋势——私营部门的兴起和在市场社会主义迈进的过程中改革国有部门的控制方式密切相关。因此,本章与第19章和第21章所阐述的内容有非常紧密的关系。①

作者通常使用“价格改革”这一说法来表示一组复杂的变化。因此,我将所研究的现象分解为不同的构成要素,具体分类如下所示:

1. *确定价格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政府保留了价格控制权? 在多大程度上它把价格制定让位于市场机制? 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区分:确定产品价格的方法和确定要素价格的方法[→22.1,22.2]。

2. *政府制定价格的原则*。在政府保留价格制定权的领域,价格制定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原则? 在改革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这些原则的影响有所改变[→22.3]?

3. *税收和补贴制度的改变*。这些是怎么与价格发生联系的[→22.3]?

在分别研究了价格改革中的这些因素之后,将讨论局部改革过程中一些共同的问题[→22.4]。

本章所分析的价格改革改变了协调机制(图15.1中的第三层次)和经济中参与者的行为(即第四层次),但并没有引起激进的变革,然而这是改革

① 对于价格改革与第20章中所讨论的自立经营的关系,将不再进行专门探讨。因为这与市场社会主义与价格改革方面的内容有部分重叠,本章都将有所涉及。

进程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 22.1　产品价格的确定

根据价格的制定方式，首先需要对三种类型的价格加以区分：行政价格、虚假行政价格和市场价格（）[→8.6－8.8]。改革导致上述三种价格类型所适用的范围比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①

行政价格（administrative prices）的适用范围不断缩小。虚假行政价格（pseudoadministrative prcies）的应用领域逐步扩大：行政价格的强制效果越来越弱，生产商—销售商对形式上由权力机构制定的真实水平价格的影响程度日益提高。虽然明确的价格计算规定，但也允许生产商自己计算的价格，由于对价格计算规定很容易进行变通处理，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虚假行政价格。② 与此同时，公开宣布大范围放开价格。虽然这些都是一般性的共同趋向，但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时期），发展的程度和导致变化的原因还是存在着显著差异。

其中一个原因是：私营部门在国民生产和营业额中的份额不断提高。私人企业家当然希望以买卖双方自愿签订合同的形式来确定价格。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私营部门的权重越大，市场价格所应用的领域也就越广。

导致变化的另外一个原因与中央经济领导层逐步放松管制有关。南斯拉夫在这方面最为彻底：大部分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在改革早期就已经放开，行政价格影响的范围非常有限。

在匈牙利，行政价格所影响的范围也不断收缩，但在1989年（即改革社

---

① 关于匈牙利的价格制定，可参见B. Csikos－Nagy（1985）和W. Swaan（1990）。

苏联对此进行了广泛争论，可以参考下列著作：O. Bogomolov（1987）、A. Komin（1988）、V. Pavlov（1987）、N. I. Petrakov（1987a，1987b）和N. P. Shmelev（1988a，1988b）。争论中特别强调了价格改革的必要性、通货膨胀风险以及改革的社会后果。西方对苏联价格问题的分析，可参见M. Bornstein（1987）和E. A. Hewett（1988）。

有关中国在这方面的大规模争论，可参考G. Liu（1986，1989）的著作。相关研究，可参见J. S. Prybyla（1990，第11、12章）。

② 在匈牙利，每年都需要制定各种价格。例如，1985年曾做过14，311个份调查。其中只有24%的企业被征收了巨额罚金。L. Hubner，figyelo杂志，1986年8月14日，第5页。此外，对企业征收罚金对参与其中的管理者的个人财务利益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会主义体制的最后一年),国有部门产品和服务的很大比例仍然服从于行政价格。这种严格的价格控制覆盖了许多领域,其中包括原材料、生产和消费服务以及大众消费品。因此,行政价格的制定对其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家庭预算和工资都产生了广泛的外溢影响。

中国则推行了双轨制[→21.4]:对强制产出和配给投入实行行政价格,而自由投入和经买卖双方自由协商确定的产出部分,其价格则依据市场原则确定。这就形成了大多数产品的价格双轨制,主要表现为较低的行政价格和较高的市场价格。生产企业不仅可以充当生产者,而且可以作为中间人把廉价的配给投入以市场价格卖给其他生产企业;后者会发现相对于可自由售出的产出而言,以市场价格买入投入品仍然有利可图。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由官僚协调和市场协调杂交而成的混合体:隐藏在配给投入价格补贴之中的租金被中间企业据为己有,或者被中间企业和买方共同瓜分。①

南斯拉夫、匈牙利和中国的价格制定体现了三种典型情况,它们的各种组合分别被应用于其他改革国家。

这里要特别注意政府价格机关对私营部门价格所采取的措施。在他们的默许下,逐步放松了对私营部门价格的管制,其程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而有所不同。在某些他们想要施加影响的情况下,他们仅仅是规定计算方法或者确定"公平利润"的边界。在其他情形下,他们会设法制定官方的强制价格。这样,到底会形成虚假行政价格还是真正的行政价格要取决于政府机关政策的连贯性。如果政府机关的目标是更加严格地执行行政价格,那么就需要有更多的检察人员并对蔑视官方价格管制的行为处以更严厉的惩罚。当然,执行这种政策也并非不可能,但所引起的反应却不会仅限于有更多的人遵守规定价格。许多私人企业家可能对此已深为反感,干脆交回自己的营业执照。于是他们退回到非法状态,或者停止经营活动。毫无疑问,几乎很少有私营部门会始终听从行政价格的摆布,因为私有产权与

① 有不少中国和外国专家期望双轨制下的自由价格领域能够使市场机制逐步对管制领域产生影响。但根据上述情形来看,它是以严重扭曲的形式发挥作用的;而实际上双轨制在许多方面既没有摆脱官僚机制的问题,又带来了市场机制的缺陷。

行政价格在本质上就是对立的。①

中国的价格双轨制，以及所有改革国家里价格机关对私营部门的干涉都有力地证明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改革经济中都存在着平行价格体系。②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也出现了上述迹象，但在改革体制下这一现象变得非常普遍。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任何产品的标准价格都具有特定的体制特征。只有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才可能存在统一的价格；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所要求的价格必然会有很大差别。但这里所描述的现象与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必然存在的价格差异无关，我们看到的是官僚控制机制和市场机制并存而带来的混合现象。举例来说，就某个具有特定面积和质量的公寓住宅而言，假如允许房东和租户在没有政府干涉的情况下达成自由协议，那么可能存在真正的"白色市场"(white market)租金。当然也会有另外一种行政式"白色"租金，这是政府机关为了保证国家配给住宅而制定的租金。这种租金通常带有大量补贴并远远低于达到供需平衡时的市场租金。但还可能存在大量的"灰色市场"租金和"黑色市场"租金，这些租金往往隐藏在租赁协定的背后，只是违反法律的程度有所不同。举例来说，搬进国家公寓住宅的人要向搬出去的人支付转让实际使用权的"钥匙费"，然后由房屋办公室通过一定的供给程序予以确认。或许还需要贿赂住宅管理官员，如果有的话，贿赂金额当然也应计入租赁成本。

取代官僚、扩张市场协调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平行价格运行体制，形成差别价格。在表22.1和22.2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差别价格的典型例子。

人们通常对那些从平行价格体系的较高价格中赚取利润的人非常愤慨。从心理学上来说，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在经济学上却站不住脚。我们不

---

① 制定价格是个很好的例子，它清楚地表明了政府对私营部门模糊暧昧的行为特征[→19.5]。首先政府需要私营部门，但又无法容忍看到私人企业家在自由市场上自主确定价格并且获得很高的收入。它更愿意看到他们消失，让他们的收入"蒸发掉"或者彻底从生产领域退出。

② 关于平行市场的运行及其效果的数学分析模型可参见 M. Alexeev(1987,1990)、W. W. Charemza、M. Gronicki, R. E. Quandt(1989)、R. Ericson(1983)、B. G. Katz 和 J. Owen(1984)以及 J. Kornai 和 J. W. Weibull(1978)。

能站在道德的基础上评判市场价格。很高的市场价格(白色、灰色或黑色市场)主要意味着供不应求。此外,风险溢价也有助于形成较高的价格,这取决于违犯法律的程度和受到惩罚的可能性。价格不会被道德谴责压低,而只能依靠更多的供给,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自由企业的合法化以及可以自由进入生产领域。

**表 22.1 苏联食品的行政价格和市场价格**

| 项目 | 市场价格作为行政价格的百分比 | |
|---|---|---|
| | 1980 | 1987 |
| 土豆 | 360 | 345 |
| 水果 | 238 | 230 |
| 肉 | 239 | 259 |
| 乳制品 | 323 | 410 |

**资料来源**:由 P. Mihalyi 在苏联统计报告的基础上为本书编辑整理。

**表 22.2 波兰汽车的行政价格和市场价格**

| 年份 | 市场价格作为行政价格的百分比 | | |
|---|---|---|---|
| | 波兰菲亚特 126 | 波兰菲亚特 125 | 波罗尼滋 |
| 1980 | 190 | 190 | 180 |
| 1981 | 210 | 190 | 170 |
| 1982 | 220 | 160 | 150 |
| 1983 | 230 | 200 | 180 |
| 1984 | 200 | 150 | 140 |
| 1985 | 190 | 140 | 140 |
| 1986 | 250 | 170 | 180 |
| 1987 | 300 | 210 | 280 |
| 1988 | 350 | 340 | 470 |

**资料来源**:根据 Z. Kapitany(1989b)的访谈以及在波兰统计资料基础上为本书进行的整理和编辑。

注:在本书的研究期间,波兰不存在新车的自由市场。超出中央配给范围的汽车销售价格通常通过在所谓的汽车交易所进行拍卖来确定。

## 22.2　生产要素价格的确定

生产要素(简称要素)的价格确定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要素价格包括利率、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价格、外汇汇率和工资。

所有改革国家的经济管理部门都力图避免要素价格受到放松管制趋势的影响,而且对它们进行严格控制。要素分配始终处于官僚协调机制的控制之下。但只要存在平行市场(白色、灰色或黑色),就必然会出现规避要素价格控制的现象。

1.利息。大部分信贷供给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分配,同时强制执行由中央确定的利率。表22.3以波兰为例说明实际利率的变动。尽管资本严重不足,但实际利率却非常低甚至为负。稍后我们将研究这一现象[→23.4]。值得一提的是,仅仅这一现象就足以证明市场协调机制还远没有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如果实际利率在长时期内为负,那么就无法控制投资分配,而且当决策者通过比较现在和未来的收入与支出进行决策时,必然会传递给他们错误的信息。单单是负实际利率的外溢影响就会严重扭曲整个价格体系。

**表22.3　波兰实际利率的变化**

| 年份 | 通货膨胀率 | 利率 | |
|---|---|---|---|
| | | 名义 | 实际 |
| 1982 | 104.5 | 29.2 | -75.3 |
| 1983 | 21.4 | 8.2 | -13.2 |
| 1984 | 14.8 | 8.4 | -6.4 |
| 1985 | 15.0 | 7.8 | -7.2 |
| 1986 | 17.5 | 8.2 | -9.3 |
| 1987 | 25.3 | 8.7 | -16.6 |
| 1988 | 61.0 | 22.5 | -38.5 |
| 1989 | 244.1 | 160.0[a] | -50.0 ~ -60.0[b] |

**资料来源**:1982-1988年的数据:G. W. Kolodko(1989,p. 16);1989年数据:与G. W. Kolodko的个人交流。

a 1989年12月份的数据。

b 年平均实际利率的估计。

私营部门内部的信用交易很常见,所要求的利率大多与官方利率相差甚远(远高于官方利率)。但在改革阶段仍然没有成立私有银行的迹象。在某种程度上说,存在私人信贷市场,但它的颜色是"灰色的"或者"黑色的";私人信贷在大多数国家都是违法行为。贷款人不能指望有法律保障的合同。因此,在这个领域也存在着一个平行价格体系,但与国有银行部门的信用交易额相比,私人信贷市场几乎微不足道。

2. 工资。平行的工资体制正逐步发展。① 有很多机会让人们在私营部门挣到比公有部门多得多的收入。在此暂不考虑那些独立地、在正式或非正式私营部门工作而无须付薪雇员帮助的人的收入。这里只关注拿工资的雇员。他们的工资通常比在国有企业从事类似工作的人所能获得的报酬要高出很多,这包括很多原因:

◆私人雇主尽最大努力来规避税收义务,而受到严格控制的国有企业即便想这么做,也不可能实现。被节省下来的税收有一部分可以用来支付较高的工资。

◆私营企业的工作强度更高:雇员们更为勤奋并严格遵守工作纪律,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挣得更多,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督。此外,管理成本和其他日常费用要低得多。因此,即使产品价格与国家价格相同,私营企业不仅能够保证企业家的利润,而且能支付较高的工资。

◆在多数情况下,私营部门的定价要高于国有企业,这进一步保证了企业能够支付较高的工资。

◆私人企业家基本不受政府强制性工资限额的约束,或者说即使有这些行政规定,他们也可以很容易加以规避。一般而言,劳动力市场机制影响了工资的制定。由于缺少优秀的、可信赖的劳动力,私人雇主准备支付相应的工资以便把他们吸引过来。后者既可以选择放弃公有部门的工作,也可以保留那份工作,利用工作之余在私营部门干活。②

---

① 见 R. I. Gabor 和 G. Kovari(1990)。

② 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人面临着如何分配精力的问题。他们通常会在国有企业工作时少干些活,因为他们认识到不管你多努力,都只能获得很少的报酬。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私营部门的额外工作中,因为它支付得更多,而且从私营部门得到的收入与所付出的努力紧密相关。

从另一方面看,前面所描述的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10.5]相关的所有事物仍然适用于公有部门的劳动力市场:[1]人们能清楚地感觉到同时受到官僚协调和市场协调的双重影响。[2] 上级组织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工资,而且企图阻止工资上涨的趋势。然而他们也不能完全避开市场影响。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相比,劳动力市场对工资的影响已经不断增强,而且往往受到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一个因素我们曾提到过:私营企业的扩张趋势加大了对劳动力需求,同时推动了国有企业和合作社的工资不断上涨。另一个因素是放松管制的趋势,它试图废除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管理工资的职能(一项或两项),这符合建立市场社会主义的目标。

虽然市场的影响(特别是不同行业、工作和地域的相对工资)变得越来越强,但国有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受到政府的控制。官僚机制的影响越强,私营和国有部门工资水平之间的鸿沟也就越大。

不久我们会再探讨这一现象的宏观经济后果[→23.1]。不过,有必要在此把迄今为止讨论过的两类价格因素结合起来进行一些研究:国有部门的利息和工资支出。根据规范的微观经济学,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应该或多或少体现出这两种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因此,如果在做投资决策时适当关注这种价格比率,投入组合将趋向于达到资本和工资组合的理想状态。在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中,又出现了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私人手工业者雇佣了一些人,他与雇员在自由劳动合同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并通过私人借款来购买节省人力的机器。私人手工业者必须进行利息和工资的比较,但国有企业或者合作社却没有必要做这种比较。因为对他们而言,投资资金的预算约束是软的,即使计算有误,企业仍能够生存。事实上也根本不需要关注这两种要素价格之间的比率,因为它根本无法提供关于资本与劳动力相对稀缺程度的任何信号,这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状况并无二致。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价格都是专断确定的,它们之间的比例没有任何合理的经济含义。

3. 土地价格和租金。[3] 对于公有土地而言,价格和租金通常都由地方政

---

① 这一分析仅仅与国有和半国有企业有关;在此不讨论自主经营企业的问题[→20.3]。

②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 K. Fazekas 和 J. Kollo(1990)。

③ 这包括从事农业生产和其他目的(例如建筑物)的土地价格或租金。

府机关制定。国有企业或公有机构使用的土地价格和租金或多或少都是专断确定的。

部分土地(各国有所不同)在私人手中,它的价格或租金是由市场确定的。影响市场价格的因素之一,是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导致改革国家中的许多人将储蓄投资于房地产,以便起到保值作用。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因为几乎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投资保值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出现由于两种协调机制而产生的扭曲混合体:做得最好的是那些通过个人影响廉价地获得政府的定量配给土地,并且把它当作保值型私人财产的人。

4. 汇率。中央银行除了有权定量配给外汇之外,还保留着制定汇率的权力。大多数改革国家一般都公然高估本国货币,这再次严重扭曲了整个价格体系。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时期就存在的外汇黑市,在进行改革的国家黑市则急剧扩张。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越深入,对西方越开放,平行外汇市场就会在公众领域中越宽。如果此时再遇到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必然会出现资本外逃。人们不仅设法将储蓄投资于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而且开始关注外币的日常交易。表22.4比较了一些国家官方和黑市汇率。

**表22.4 黑市与官方汇率:国际比较**

| 年份 | 对美元的黑市汇率/官方汇率(%) | | | | |
|---|---|---|---|---|---|
| | 中国 | 匈牙利 | 波兰 | 苏联 | 南斯拉夫 |
| 1985 | 109.4 | 137.0 | 401.0 | 723.6 | 111.2 |
| 1986 | 109.1 | 133.7 | 442.8 | 611.8 | 120.3 |
| 1987 | 120.4 | 134.8 | 412.0 | 915.6 | 110.9 |
| 1988 | 268.8 | 156.1 | 636.8 | 1,195.0 | 117.1 |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分析**,1990年第426、620-621、657-658、699、712页。

注释:资料中引用的数据是年末的黑市汇率(国家货币/美元)与有效官方汇率的百分比。

当然,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包括工资)是密切相关的。当局也可以通

过要素价格对产品价格施加强大的间接影响。那些试图建立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规划者们希望这些由中央制定的要素价格能够帮助他们间接地控制生产,但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

## 22.3　政府制定价格和财政再分配的原则与实践

这一部分只研究国有企业的行政价格。[①] 行政价格的制定与对价格—成本差额管理具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差额为正,那么国有企业[→8.2]就能够赢利,财政就可以通过各种税收拿走大部分盈余。如果企业出现赤字,损失或者损失的很大一部分通常会得到弥补。在财政再分配的框架里,国有企业的收入通过各种方式被纳入国家预算或者由国家预算中加以补充[→8.6,21.5]。[②] 即便在旨在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趋势下,上述作用也没有被削弱。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政府机关在确定价格、税收和补贴的时候都会严格遵循一系列的原则。下面只将这些原则简单出来(前文已经有过论述)。[③]

A. 价格应该反映社会成本。

B. 价格、税收和补贴应该是经济管理部门鼓励生产者执行特定任务的手段。

C. 价格、税收和补贴应该是稳定的。

D. 价格、税收和补贴应该以领导认为理想的方式影响公众需求。

E. 价格、税收和补贴应该为了收入再分配的目的而使用。

所有列出的原则出现在改革的官方文件中;政府曾尝试过在不同程度上应用每个原则,但由于它们彼此冲突,实际上没有一个原则能够始终如一地加以贯彻。这些矛盾本身就使得价格和财政再分配体系必然是专断制定的和不

---

① 价格机关也设法将下述的价格制定原则应用于虚假行政价格领域。顺便提一句,在这种情况下,原则之间的冲突以及原则和实践之间的差异就更加明显。

② 相关内容可参见21.5部分的注释。

③ 原则A—E在前面讨论价格制定时曾进行过论述[→8.6,8.7],这里我们在分析时加入了财政再分配原则。

合理的。现有原则之间的冲突还很可能由于加入了新的原则而变得更为复杂。

F 价格应该有利于形成供求平衡。根据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市场出清必须成为定价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原则,但到头来没有任何一个改革国家的价格办公室能够确保原则 F 发挥主导作用,它很难在实践中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经常会出现某一产品的持续过度需求(很少有持续过度供给的情形),即使价格办公室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它仍然不会去调整价格。

这里有必要再次回顾一下奥斯卡·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式,兰格的模式要求政府价格办公室应该模仿市场,并根据收到的过度需求和过度供给信号提高或降低价格[→21.1]。没有一个改革国家(包括奥斯卡·兰格所在的波兰)开始着手实验去接近这个理论模式的理想状态,甚至根本没把这个模式作为行动目标,这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与制定价格所必须遵循的其他原则存在冲突,那些原则大部分都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管理实践紧密相关;另一个原因是所面临的技术难题。谁能够观察到数百万种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别呢?市场之所以能够成为有效的协调机制,原因之一就是分散化过程会自动完成上述目标。

从这个观点来看,匈牙利的短暂实验还是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匈牙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曾尝试引入一种价格控制体系并使用了复杂的公式,以便让某些国内价格逐步向国际价格靠拢。[①] 结果实验失败了。在真正的市场上,外贸交易中的进出口价格,以及国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有效价格是以极为复杂的方式逐步形成的。真正影响供求决策并影响供求价格的是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并最终支配着参与者相互签订私人合同。任何由命令所规定的计算方案都无法替代这种充满活力的合作机制。

坚持原则 F 要求价格对供求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这与原则 C 对稳定的要求相冲突。由于官僚控制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制定长期保持不变的固定价格才能保持稳定。

这里有必要单独提一下原则 E(即收入再分配)的应用情况,这一原则与财政再分配是连在一起的。改革经济激励机制的设计者们通常从以下一

---

① 见 B. Csikos - Nagy(1985)、R. Hoch(1980)、W. Swaan(1990)和 L. Zelko(1981)。

系列的争论出发:必须区分企业通过良好业绩而赚取的利润和不劳而获的利润(例如,继承了引入利润激励机制之前留下来的优质设备,遇到了市场上的好运气,或者价格机关为其产品制定了有利的价格)。他们还认为拿走这些不劳而获的利润是公正的。而相反的意见是,企业或许不应该对自己的损失负责,它可能继承了劣质的设备,在市场上运气不佳,或者价格机关为其产品制定了不利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补偿企业的损失是公正的。这种根据原则 E 进行的公正分配可以被称作补偿原则。

如今,补偿原则与市场协调发生了强烈的本质性冲突。市场并不"公正";它奖励好工作和好运气,而且用同样的方式惩罚坏工作和坏运气。但从长远观点来看,它使所有市场参与者习惯于适应这一普遍存在的状态:利用有利的机会,通过自身努力来抵御坏运气。然而,补偿原则教给企业的是:从长远观点来看,根本不值得抓住有利的机会,因为利润终将被拿走。如果企业碰到坏运气,最好的办法是吵着闹着要求得到父爱主义政府的帮助[→表 21.5,21.6]。补偿原则 E 和平衡原则 F 相互冲突。

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觉到价格体系和财政再分配体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几乎是彼此的镜像。如果出于某个原因,价格办公室制定的价格远远高于"成本加上正常利润",那么根据补偿原则,行事的税收办公室就将拿走企业得到的额外收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税收就无法更改,即便提高价格的最初原因已经不存在,但税收已经"嵌入"价格之中(在相反的情形下,补贴嵌入价格)。上述链条也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出于某个原因,税收办公室对某一产品征税;价格办公室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并因此提高行政价格。在相反的情形下,如果价格办公室提前注意到补贴的可能,它将首先会把价格制定在"成本加上正常利润"的水平之下。

这一系列的争论又把问题带回到软预算约束。当普遍适用的价格体系完全是扭曲的、专断的和不合理的,那么赢利能力也就无法反映企业的经营效率。价格体系中的每个错误不但为财政补偿提供了借口,而且为它提供了动听的理由。问题在于财政补偿导致根本无法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这三组现象——专断的价格体系、专断的财政再分配、预算软约束——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它们是彼此的先兆,而一旦出现,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在其他两个没有发生彻底改变的情况下单独被改变。

这把我带入下一个主题:全面价格改革的范围和限制条件。

## 22.4 价格改革的范围和限制条件

在改革过程中,价格体系的发展有两种可以观察到的趋势。一个是整体自发地朝着真正的市场价格发展。另一个是专断的、不合理的行政价格和虚假行政价格始终负隅顽抗。第一种趋势与私有制和市场协调机制的扩张有关,而第二种趋势则与公有制和官僚协调机制依旧占据着关键领域密切相关。

上述两种趋势都普遍存在,谁也无法将对方永久地挤出去。两者之间还相互影响。一方面,许多官僚机关以及部分公众对全面推行市场价格充满愤怒。另一方面,专断制定的产品和要素的行政价格所产生的外溢效果还影响了基本上由市场机制控制的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如果被管制的利率、土地价格、外汇汇率以及国有部门的名义工资都是专断的和不合理的,再加上许多能源、原材料、公共服务的价格也都具有这样的特征,那么这种扭曲的价格必然会传递给市场价格,因为前者的价格影响着后者的成本计算。当旧的价格体系依然牢固地占据着经济活动的核心领域(即国家控制的领域)时,我们无法在某些经济领域(即政府直接控制范围之外的那些领域)建立令人满意的价格体系。

在那些被行政价格和财政再分配严格控制的领域里,由于担心会出现无法控制的结果,从而导致局部变革始终步履维艰,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立刻遭到遏制。没有迹象表明,一系列的局部变革将逐步向合理的价格体系靠拢,从而建立供需平衡。此外,每次局部价格调整的影响都会被通货膨胀所抵消。如果 A 类产品的价格因为中央所采取的措施而上涨了 50%,那么为了保持更合理的相对价格,B 类、C 类等等各种产品的价格很快都会涨上去(也许不会太明显,但肯定要上涨)。问题不仅仅是通货膨胀抵消了局部价格调整的效果,还存在一种相反的关系:在存在普遍短缺以及公开的或被压制的通货膨胀[→23.5]的条件下,改善相对价格本身就会产生通货膨胀。要想改变价格关系,通常必须在提高特定产品价格的同时,抑制住其他产品价格的下降趋势。因此,一系列的提高局部价格措施必然推动平均价格水平的上涨,也就是说,将导致通货膨胀。

不过，经济改革的领导人并不担心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后果。[1] 他们害怕突然引入这种全面的价格改革可能会造成的痛苦创伤。事实上，虽然有可能带来一段时期的通货膨胀，但全面的价格改革并不一定会持续地引发通货膨胀。

通往全面价格改革的道路困难重重。在第一阶段，全面改革就受阻于上文曾提到的恶性循环，即产品价格、要素价格（包括工资）、税收和补贴需要同时进行改革。把先前纸面上的理论付诸实践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要进行真正的改革，就必须全面放开价格，如果仍然广泛保留着行政价格，那就无法实现让市场逐步发挥作用。如果只是对所有制关系进行局部微小的变革，而且要保留混合协调机制，那么想在这一阶段推行全面彻底的价格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这两个目标无法调和。

在第二阶段，彻底的价格改革又受阻于公众情绪对改革后果的预期。即便价格改革的设计者们真心希望改革可以不降低人均实际消费水平，但事实上大规模的再分配是不可避免的，总会有赢家和输家。如果是那样的话，赢家将会保持平静，而输家将满腹牢骚甚至愤然反抗。那些由于预算约束变硬而被暂时剥夺了工作的人肯定是输家，改革前享受某些商品和服务补贴的消费者也是输家。

这里我们触及到了改革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内在两难状况，即越是强权压制的体制，就越容易完成彻底的经济变革，而由此必然带来巨大的震动，甚至大规模的暴乱。镇压越缓和，权力阶层的精英们就越是需要考虑群众抗议所产生的政治上的不安定影响。但公众的不满只有在经济问题解决之后才会停止，而经济问题却只有在废除了专断的价格体系和财政再分配体系之后才能够解决。

到了这个阶段，价格改革进程被“锁住”。即使对每个国家的当权者而言，前途都是一片茫然，但他们仍然选择了小步走、渐进的和局部修正行政价格的政策。改革道路上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力建立有序的价格体系。然而如果没有全面的价格改革，其他的变革也就不可能完全成功。私营部门的运行效率之所以依然达不到理想状态，除了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之外，价格体

---

① 设计改革方案的一些经济学家非但没有被通货膨胀风险所吓倒，反而认为适度的通货膨胀对一系列局部的价格调整非常有利。

系发出扭曲的信号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国有部门无法呈现出真正的市场特征,因为价格、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有效运作,价格体系的扭曲是原因之一。本章的最终结论需要补充到关于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是否可行的批判分析之中[→21.10]。国有企业无法对价格和成本作出反应,但无论如何都不值得太在意所谓的价格,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们都传递着错误的信息。

## 22.5 预演: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价格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出发点是原有体制遗留下来的扭曲的价格体系,而且它还继承了同样的两难选择:是进行彻底的改革实验以及市场的全面自由化,还是去尝试渐进的价格调整呢?它是否准备接受伴随着第一种选择而带来的巨大痛苦呢?或者,如果它决定支持第二种方案,它会不会造成类似于社会主义改革实验所同样遇到的失败?不仅无法消除扭曲的价格,而且局部的价格改革措施和自由化还将加速通货膨胀。

在写作本书时,采纳第一种方案的转型已经发生,或者说正在发生,至少有三个国家是这么做了。

波兰政府从 1990 年 1 月 1 日开始着手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措施之一就是除了少数特例之外,几乎放开了所有产品的价格,把价格的制定权让位于市场。通过推行内部可兑换及进口的自由化来促使国内价格体系密切关注世界市场价格。在放开产品价格的同时,开始严格限制国有部门的工资支付。至于别的要素价格,如国有银行体系的利率以及外汇汇率仍然服从行政管理规定。

在德国发生了彻底的变革。1990 年 7 月 1 日,西德马克在东德变成法定货币。东西德经济体的合并迫使东德的价格必须向西德的价格体系靠拢。

捷克斯洛伐克在 1991 年初也开始了包含大多数产品在内的全面价格自由化改革,这立即导致了价格体系的迅速重组。

在其他国家,如匈牙利,在完成体制革命之后,继续实行渐进的价格自由化改革以及逐步取消价格补贴的政策。

对未来经验的认真观测和比较分析将会揭示出这两种政策的优劣所在。

# 第二十三章　宏观矛盾

在经历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能够观测到宏观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显著变化。在此仅限于讨论与前面章节中提及的改革趋向有密切关系的那些现象。首先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当私营部门重新兴起[→19]，出现了自主经营的经济成分[→20]，根据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协调机制[→21]进行局部价格改革时[→22]，会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产生哪些矛盾呢？这里我们并不认为，只有当上述四种趋势发展成熟之后，才能讨论这个问题。决定性因素是，经济是否已经从经典社会主义在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如果转变已经开始，那么就完全可能出现本章中将要谈到的宏观矛盾。其他三个趋势也促成了宏观矛盾的出现，我们也将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以作为补充，但这三个趋势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必要或充分条件。宏观矛盾与政治领域的变化密切相关[→18]。

改革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无法解决的矛盾，这在波兰20世纪80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从现在起我们就将之命名为“波兰综合症”）。[1] 虽然那一时期的波兰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波兰综合症”的症状可能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南斯拉夫、匈牙利、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波兰”一词只是用来形容综

[1] “波兰综合症”一词由P. Wiles(1982,p. 7)提出。政治领域的半自由化、由团结工会领导的大罢工运动和半心半意地转向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这三者混在一起使整个社会充满了内部矛盾。当Wiles于20世纪80年代初写他的文章时，已经出现了灾难临近的信号。

合症的术语，在讲到其他国家的例子时也会使用这个词。在写作此书时，“波兰综合症”在苏联大规模爆发。将来也许有充分的理由把它重命名为“苏联综合症”，因为苏联的例子比波兰更清楚地阐明了上述联系。①

与第三部分所有章节一样，这里也侧重讨论趋势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某个趋势可能只是以潜伏的形式存在着，但当情况发生变化时就会突然爆发。它也可能在某个地方被有效地抑制着，而在另一个地方却几乎不存在任何抗击它的力量，甚至没有抗击它的愿望。当然由于国家和时期的不同，情况也会有所变化，但本书不打算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作者在此不打算对有关国家进行全面的宏观经济分析，也不想在对所有成就和问题进行对比之后，就改革进程所带来的宏观后果进行综合评价。唯一的目的对“波兰综合症”（即各类宏观矛盾的典型组合）进行描述并阐述其中的因果关系。

## 23.1 就业与工资

就业。就处于改革过程中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而言，其特点是充分就业和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公开失业在比例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② 尽管迫切需要进行经济结构的彻底转型（这必然带来失业），但却没有

① 关于波兰综合症，见 D. Lipton 和 J. Sachs(1990)；还有 Z. M. Fallenbuchl(1989)、R. Frydman、S. Wellisz、G. W. Kolodko(1990)、S. Gomulka 和 A. Polonsky(1990 年版)、B. Kaminski(1989)、G. W. Kolodko(1989,1991)、G. W. Kolodko D. Gotzkozierkiewicz 和 E. Skrzeszewska - Paczek(1990)、D. M. Nuti(1990)和 J. Rostowski(1989b)。

关于苏联综合症，见 A. Aslund(1989)、K. Kagalovsky(1989)和 R. I. McKinnon(1990b)。此外还有国际组织的有关研究和评价，例如欧共体(1990)的研究，以及七国集团(G7)(1990)委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开展的联合研究。

② 南斯拉夫是个例外，它存在相当多的失业[→20.3]。

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由于软预算约束,企业可以继续生存,而且也保障着大部分工作岗位。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实现宏观水平上的充分就业,而且劳动力储备还很富裕。[①] 虽然也不存在大量失业,但是农村却存在着大量隐性的劳动富余。与此同时某些部门和岗位又存在局部的劳动力短缺,这主要是发生在城市里。完全可以像评价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描述中国的国有部门:一旦某人变成企业的雇员,他/她的就业甚至工作场所就得到了保障。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制定了严格的就业计划。在改革阶段,就业计划背后的强制性命令或被废止或被削弱,把雇员束缚在工厂的官僚镣铐也放松了很多。劳动力短缺连同上述强制约束的放松,雇员自愿离开工作岗位的现象日益增加。企业领导不得不重视来自这方面的威胁,同时也改善了雇员确定工资时的谈判地位。

工资。在经典社会主义下,确实存在工资压力:雇员设法推动工资上涨[→10.5]。当劳动力短缺加剧时,工资压力也随之加大,但官僚坚决反对,因此就发生了冲突。最高层领导想要把消费置于控制之下,从而能够完成严格的投资计划并防止消费者市场上出现更为严重的短缺(由此将形成超出正常状态的更大不满)。它坚决要求各级经济管理部门维持工资纪律[→10.3]。

比较而言,正是改革导致了上述关键变化:工资压力加大,而官僚又竭力反对。雇员越来越敢于说出不满并更加大胆地提出要求。于是开始建立起真正的组织并出现了罢工活动。这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政府必将对第一次行动进行彻底镇压,而且雇员们也了解其后果意味着什么,这样也就组织不起来任何行动了。

声势最浩大的运动出现在波兰,团结工会的形成意味着政治反对派运动,以及代表工人利益并追求自身经济目标的独立工会运动同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虽然时常出现罢工(例如南斯拉夫,包括几十年后苏联出现的大规模罢工行动),但如此全面的群众性运动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工人组织是镇压缓和的结果,同时也证明了镇压有所收敛,工人组织通过破

① 在改革过程中,苏联中亚地区的隐性失业已经变得非常明显。

坏镇压机制也抑制了镇压行动。[1]

罢工和工会性质的组织并不是雇员自下而上施加更大压力的唯一手段。雇员及其代表在所有有关工资、劳动定额和利益的讨论的态度(不论是在车间还是在企业层面,也不论是单个人还是结成一群)都变得更加积极有力。不仅是意识到罢工可能发生就能够增强工人的谈判地位,同时也削弱了生产管理者的谈判地位。劳动力市场上的状况只是提供了改变谈判力量的经济条件。政治气候的变化对双方的行为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另一个因素是直接面对雇员的中层管理者认为更高层组织并不支持他们,这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分权措施。越是宣称企业是独立的(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如此),企业领导就变得越依赖于雇员[→20.4],其极端形式是在企业中推行雇员选举管理者的自主管理模式。但即使在只是部分推行自主管理或根本没有推行自主管理的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对企业的领导人而言,在雇员中享有多高的声望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点又与迈向自由化的趋势紧密相连:更高层的领导没有什么动力把令下属反感和仇恨的老板强压给工人。如今获取声望最直接的途径是增加工资,这才是消除任何紧张关系最简单的办法。

企业领导更加可以采用增加工资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因为上面要求执行工资纪律的命令远不如从前强硬。在指令经济完全或部分废止的地方,强制推行的工资计划也同时被完全或部分地废止了。人们日益强烈要求在制定工资方面享有充分的管理自治权。[2] 由于企业可以轻易规避对工资的间接控制,因此这种办法也没有什么作用。但官方的工资指令管理却没有被任何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所取代,利润动机未能鼓励严格控制成本(包括节约与工资相关的支出),因为很容易就能找到其他办法来弥补由于工资成本上涨所带来的任何损失(见软预算约束现象[→21.5])。

虽然这里谈到的主要是企业,但非企业部门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被置于次要部门的工人发出了越来越洪亮的声音,教

---

① 在政治权力占据着优势地位时,如果政府机构觉得工会组织已经"做得太过火了",它就将设法进行镇压。1981 年波兰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形,军队取得权力而团结工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这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波兰团结工会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并且建立了政府。

② 举例说,关于苏联可参见 E. Gaidar(1990)。

师和卫生工作者同样提出了工资方面的要求。

名义工资无法控制的趋势也逐步显现出来。当通货膨胀加速和工资—物价的螺旋形上涨开始时[→23.5],这一趋势也就随之加强(见表23.1中所列的数据)。在波兰和匈牙利,大多数时间里名义工资的上涨都超过了生产力的提高。名义工资失控并不是因为计划者对合理的名义工资水平判断失误,其根源是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和社会条件。由官僚机构强制推行的工资纪律已逐步失效,但需要由私有制、市场竞争和失业来维持的工资纪律还没能建立起来。经济改革缺乏任何社会力量或机制来执行工资纪律。

**表23.1 匈牙利和波兰的名义工资及产出变化**

| 年份 | 年平均变化率 | | | |
|---|---|---|---|---|
| | 匈牙利 | | 波兰 | |
| | 人均产出 | 名义工资 | 人均产出 | 名义工资 |
| 1971 | 4.6 | 4.6 | 7.2 | 5.5 |
| 1972 | 1.6 | 4.6 | 6.1 | 6.4 |
| 1973 | 4.8 | 7.2 | 6.5 | 11.5 |
| 1974 | 2.4 | 6.7 | 4.9 | 13.8 |
| 1975 | 1.3 | 7.4 | 3.4 | 22.8 |
| 1976 | -1.2 | 5.6 | 0.6 | 9.4 |
| 1977 | 5.9 | 8.1 | 0.7 | 7.3 |
| 1978 | 3.0 | 8.5 | 3.4 | 6.3 |
| 1979 | 0.7 | 6.1 | -2.4 | 9.0 |
| 1980 | 0.1 | 6.0 | -4.4 | 13.3 |
| 1981 | 0.1 | 6.3 | -7.8 | 27.3 |
| 1982 | 3.4 | 6.4 | -2.1 | 51.2 |
| 1983 | -0.5 | 4.8 | 4.5 | 24.4 |
| 1984 | 1.4 | 12.2 | 1.1 | 16.3 |
| 1985 | 0.2 | 9.8 | 2.8 | 18.8 |
| 1986 | 2.4 | 7.2 | 2.2 | 20.4 |
| 1987 | 0.8 | 8.2 | -2.8 | 21.1 |
| 1988 | 2.0 | - | 0.7 | 81.9 |
| 1989 | -1.1 | 18.4 | -2.2 | 286.1 |

来源:名义工资:联合国(1990a,p. 389);1971-1985,GDP:由P. Mihalyi在R. Summers和A. Heston(1984)的基础上计算;1986-1989,GNP:P. Marer等人(1991,国家表格)。

## 23.2 增长与投资

增长政策。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增长政策是非常明确的:中期必须不计成本或代价来获得尽可能快的增长。强制性增长战略的[→9]实施次序及方法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思路。

在改革过程中,这种明确的增长政策却日益模糊不清,多数情况下甚至演变成了彻底的精神分裂:部分领导人想要继续实施强制性增长,而另一些领导人又倾向于放慢增长速度以改善生活水平,修正以前的不均衡状态。

上述两种冲突态度受到了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不少国家的领导人为增长率的放慢而苦恼,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他们遏止下降趋势的决心。[①] 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原因之一就是早期获得快速增长的粗放式方法的潜力正在被耗尽。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劳动力剩余已经被耗尽。[②] 领导层再三宣布必须转向集约式增长,即"增长的新路子",但在现有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实施所谓集约式增长战略。因此为了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社会主义国家就尝试用最直接的方法来集中实现增长,这种方法就是加大投资。这样就把我们直接带到了稍后将论述到的造成宏观矛盾的推动力之一:投资过热。

在讨论为什么要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时[→16.1],第一个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增长放缓,其逆向反应便是刚刚概括的"不惜代价求增长"。但改革背后同样重要的一个动机是公众的不满。这给经济政策该如何做出反应造成了严重的两难境地:一方面积累对消费的比率应该朝着有利于消费的方向转变,这样实际消费的增长才能最终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不仅仅由商品消费流所支配,而且还取决于直接供应消费品部门的资本积累(机器和建筑物的存货)。在强制增长的几十年里,住宅部门、医疗保健、国内贸易、餐饮业、维修服务、道路运输和旅客运

---

① 在宣布改革和公开性之前,苏联的改革就始于戈尔巴乔夫把加速增长定为目标口号。匈牙利、波兰和中国也时常以相似的方式把加速增长确定为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

② 造成增长减速也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匈牙利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就是外债的高速增长。

输等许多部门的发展都被忽视了。由于不断拖延上述部门的必要发展,因此积压了大量工作。如果在改革初始阶段就尝试处理这些积压下来的工作,那么巨额投资就是必不可少的。住宅和运输部门尤其需要资本密集型投资,但想加速任何一个被忽视的部门的发展都需要投资。因此,这种两难境地似乎越来越难以解决:要想实现消费的快速增长就需要降低投资份额,而与此同时又必须对直接影响生活质量的部门增加投资。在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性两难困境中,又出现了如何对各部门进行投资再分配的具体两难问题。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优先发展次序的传统受益者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但现在这一部门觉得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就施加更多压力来获得它惯有的投资"津贴"。如果真正开始发展先前被忽视的部门,那么其所需的高额投资将从直接诱导增长的"内螺旋"中[→9.4,优先权 1]抽取投资资源,这必然导致增长率放慢。于是两难境地变得更为严峻:投资比率是否应当缩减,资源应该转移给什么部门?

这个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它类似于向一个人提出了相互矛盾的两个要求:结果只能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加剧矛盾,甚至爆发危机。投资加速和投资减速交替进行,服务部门之间的投资再分配更是摇摆不定。[①]但如果高层领导中出现了这种精神分裂症的任何一个倾向,那么就可能导致一种模糊不清的强制增长政策。这种行为已经成为官僚机构的条件反射。经过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决策者已经形成了增长越快体制就越强大的感觉。强制增长是一种自发倾向,而一般常识却不断提出需要在支持消费,以及增加消费投资方面做出让步(这可能是由于决策者担心看到群众不满)。因此,政府总是不断从提高生活水平的态度(自我强加的态度)退回到根深蒂固的增长优先行为模式。对此,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

投资决策的分散化。以市场社会主义精神构想的改革增加了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权限。虽然在实践中各国和各时期都有所不同,有两种情形在经济改革中相当普遍。一个是提高了企业的利润留存比例(不需再要移交给国家预算),并且可以将这部分利润用于企业自身的投资;另一个是在企

① 在 M. Lacko(1984)关于匈牙利的例子中表明,服务领域占总投资额的比率是如何作为有利于或不利于全面经济形势发展的变量而不断变化的。

业的外部资金来源内,减少了无须偿还的国家预算补贴,同时增加了必须偿还利息的银行贷款。[①]

改革的设计者们希望分权措施能够使赢利能力的考虑在投资决策中发挥重大作用,企业因此将避免进行可能遭受损失的投资。但是由于下列一些原因,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在每个进行改革的经济体中,实际利率都是负的[→22.2]。[②] 因此,如果不考虑别的原因,那么对投资贷款的过度需求将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贷款总是带有赠与的含义,即这也是来自国家的补助。支付利息的义务对投资决策几乎起不了任何作用。企业的扩张冲动及其投资饥渴仍然可以畅行无阻。即使投资计划产生了亏损,软预算约束又保证了完全可以弥补亏损。

决策权不完整的银行、干涉企业运营的上级机关以及半自治的企业领导之间形成了一个内部网络关系。银行不会拒绝信贷申请,而且即使企业未能履行它们偿还债务的义务,银行也往往是急于为它们提供帮助,而不是对它们采取严厉措施[→23.4]。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市场社会主义下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可以根本不考虑利润因素。表23.2的数据(匈牙利)表明:投资活动与企业投资前后的赢利能力之间几乎不存在相关性。

总之,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央计划的决策机制可以有效地使用政府配额来限制能够用于投资的额度。改革过程放松了外部的政府限制,但没有通过利润动机或者对财务困境的担心建立起任何自我控制机制。改革往往加重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固有的投资领域过热倾向[→12.2],而并非使之有所降低。我曾描述过增长政策中的精神分裂症现象,即强制增长的渴望伴随着消除强制的愿望。投资领域的动机和行为导致强制增长倾向在上述两种精神人格中占据主导地位。[③]

---

① 前面已经论述过[→21.7]国家资本市场和交叉所有权的问题。在匈牙利的改革后期,这些新的形式给企业带来了获得资本和投资资源的机会。

② 1989年苏联的长期名义利率为0.82%,见E. Gaidar(1990,p. 24)。这意味着可以在非常高的负实际利率水平下得到投资贷款。

③ 这些现象在中国的增长政策中表现地极为突出,见G. Peebles(1990)。

表 23.2 赢利能力与投资活动的相关性(匈牙利)

| | 1980—1982 年最初的赢利能力平均水平 | 1980—1982 年财政再分配之后赢利能力平均水平 | 1980—1982 年投资活动的平均水平 |
|---|---|---|---|
| 1976—1979 年的平均赢利能力水平 | +0.83 | +0.16 | -0.06 |
| 1976—1979 年财政再分配之后的平均赢利能力水平 | +0.17 | +0.07 | -0.07 |
| 1976—1979 年投资活动的平均水平 | -0.01 | -0.06 | +0.18 |

来源:J. Kornai 和 A. Matits(1987,p. 115)。

注:以所有的匈牙利国有企业数据为基础。

## 23.3 国家预算与财政政策

在进行改革的经济中通常都存在巨额预算赤字,而且不少国家的赤字还在不断增长。① 很多改革国家的政府直到很晚才承认曾利用各种财务手段向议会和公众隐瞒了预算赤字,这至少说明以前确实存在大量赤字。② 这个问题公诸于众也是政治生活变得更公开的信号。③ 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秘密真相大白的问题,改革过程本身也推动了预算赤字的增长,或者说加强了扩大预算赤字的倾向。在其他类型的经济体制中也会出现预算赤字,有时候也非常严重而且难以应付,例如美国长时期内存在的预算赤字。因此,首要任务是辨别与体制相关的特征,更准确地说就是要辨别社会主义改革过

① 比如,1985 年苏联预算赤字大约为 2%,到 1988 年已经上升到了 11%,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1990,第 10 页)。

② I. Birman(1980)最先提醒人们重视苏联隐瞒预算赤字的问题。

③ K. Kagalovsky(1989,p. 450)是苏联最早专注于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他这样说到:"在那时候(1986),预算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是由预算赤字提供资金的,根据我们的估测,预算赤字提供了大约 15—17% 的预算收入。在"公开性"的时代里,没有必要再玩捉迷藏了。仅仅是公开承认预算赤字的存在是不够的,而且还必须同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由于精心地隐瞒了预算赤字,因此在有关苏联的研究文献中,也没有人能说清楚它对经济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

程所引起或加剧的那些特征。

1. *消费者补贴*。根据经典社会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父爱主义政府必须照顾其公民的福利[→4.4]。在进行改革后，官方意识形态开始放弃这种观点，而且在经济政策方面，也希望逐步把消费成本更多地转嫁给个人、家庭和住户[→19.6]。政府想从先前所做的承诺中摆脱出来，因为这些承诺根本不可能完全履行；[1]政府无法成为一个“福利政府”，当然它也不愿意再去制造“福利国家”的形象了。官方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的转变也在财政体系和其他领域中反映了出来。

官方一再做出决议，要取消食品及其他大众消费品补贴，同时减少对严重亏损的国有住宅部门、运输和其他公共生活福利设施的预算支持。当执行这些决定时，往往会在群众中造成不满、引起不同激烈程度的抗议、罢工和示威；有时当官方遇到了强烈的抵制时，就不敢再按照决议行动。被这种“废除父爱主义”措施剥夺了既得利益的人会引用社会主义做出的福利承诺，对取消现行补贴的计划表达愤慨之情。某些措施使得最贫穷者和社会最弱势群体心情沉重，甚至达到了悲惨的境地，因为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政策，这类人至少能够获得少量救济和补贴，例如食品、大众消费品、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宅和医疗保健。[2] 在某些情况下，政府设法通过发放货币来补偿价格补贴的减少。当然在这种情形下，废除补贴也部分减少了预算负担。

但是，继续存在的补贴仍然是预算支出的主要项目。

2. *对公有制亏损企业的补贴*。尽管价格主管部门设法阻止产出价格的上涨，但名义工资的失控和其他投入品的较高价格还是带来了成本的增加。再加上其他许多价格体系的扭曲和另外一些有损效率的因素，从而导致很大一部分的国有企业经常亏损[→21.5,21.6]。亏损部门的实际产出增长同时加大了预算压力。

---

① 如前所述，中国中央政府预算中的福利支出水平比苏联和东欧低。即使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住宅、卫生和养老金支出的一部分转嫁给了企业，而剩下的(尤其在农村)仍然由家庭负担。

② 取消补贴也损害了社会的中上层人士。在某些方面，分界线不在“穷”“富”之间，而在特定补助的受益者和非受益者之间(如享受国家补贴获得了廉价住宅的租户与花费自己稀缺资源建造了造价昂贵的公寓和房屋的所有者)。因此，特权群体也可能反对废除某些特定补贴。

但在政府各个层级都会发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尽管当局再三下决心要解散亏损企业,但最终几乎每次都在企业的威胁下不得不给予政府补贴。[①] 预算压力不断加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预算软约束。

3. 出口补贴。高层的经济领导人想鼓励出口,其中主要是那些能带来硬通货收入的产品出口。一旦贸易和经常项目恶化,外债负担变得更加严重的时候[→23.6-7],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来促进出口。出口补贴成为预算日益繁重的负担。[②]

**表 23.3　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用于投资和补贴的预算支出**

| | 投资 | 补贴 | 投资 | 补贴 |
|---|---|---|---|---|
| | (占 GDP 的百分比) | | (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比) | |
| 匈牙利 | | | | |
| 1970 | 11.2 | 26.2 | 21.3 | 49.7 |
| 1980 | 9.6 | 27.9 | 16.3 | 47.1 |
| 1987 | 3.5 | 18.4 | 6.5 | 33.8 |
| 波兰 | | | | |
| 1982 | 4.8 | 20.5 | 9.1 | 39.0 |
| 1988 | 5.5 | 15.1 | 11.2 | 31.1 |
| 苏联 | | | | |
| 1985 | 8.2 | 8.7 | 16.5 | 17.5 |
| 1989 | 8.9 | 9.3 | 17.1 | 17.9 |
| 越南 | | | | |
| 1984 | 5.9 | 7.5 | 23.1 | 29.5 |
| 1988 | 5.6 | 8.2 | 20.3 | 30.0 |

**资料来源:**匈牙利:L. Murakozy(1989,pp. 105,113,115);波兰:D. M. Nuti(1990,p. 174);苏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1990,p. 10);越南:D. Gotzkozierkiewicz 和 G. W. Kolodko(1990,p. 12)。

---

① 举例说,波兰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减少地非常缓慢:1982 年占预算支出的 47%,这个比例在 1985 年仍然有 38%。见 Z. M. Fallenbuchl(1988,p. 126)。

② 第 2 和第 3 点有部分重叠。在某些情形下,企业开始亏损是因为它被迫在价格不利的时候提供出口。

4. 政府投资项目。前面已经讨论过投资过热的问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它所带来的预算后果。虽然改革使得由国家预算支持的投资项目比例急剧减少,但患有投资饥渴症的企业仍然想方设法从预算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资金支持。

从表23.3可以看出,补贴和由国家融资支持的投资在政府支出中占有很大的份额。

5. 政府机关和军队开支。尽管做出了一系列决议来精简党政机关和群众组织,但这些决议几乎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每个机构都坚持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及相应的员工水平。如果必须要撤消某个组织,那么也会有另外一个取而代之。因此,这类做法丝毫没有减少预算支出。

由于公开出版的数据无法清楚地显示出军队的支出规模,所以在这方面没有做过令人满意的研究。① 根据西方战略专家的判断,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改革国家的军事支出在20世纪80年代末基本陷于停滞或者倾向逐步下降。即使这一判断成立,军队的需求仍然是造成预算紧张的一个经常性原因。

6. 外债偿还。在改革期间,对外国债权人负债一直呈上升趋势[→23.6]。少数国家不得不以不断恶化的条款来筹措信贷资金。偿还债务(到期应偿付金额及利息)开始成为预算的沉重负担,而且在许多国家,外债负担还处于不断上升过程中。

第1—6点所涉及的趋势都与预算支出相关,现在我们转向收入方面的趋势。

7. 营业税。这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主要税收收入来源。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条件下,税收的征收非常简单,几乎所有的营业额都要经过政府的交易体系,因而很容易进行核对检查。在改革体制下这种征税形式变得非常成问题,因为相当大比例的营业额转移到了私营部门,对它的控制变得

①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宣称军队开支共计773亿卢布(真理报,1989年5月31日),即GNP的8.8%。这是先前公布的数字的两倍,但仍然比美国的估计低15%。

更为困难或者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①]

8. 来自企业和地方机构的税收收入。分权增加了企业无须上交预算的利润留存比例。从扩大企业自治范围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重大成就,但它同时也大大减少了国家预算收入。地方机构也出现了类似变化:它们可以更多地保留自己区域内征集的税收收入。如果支出与收入的分权能够结合在一起,上述事项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如果收入的分权快于支出,那么这一过程很可能导致出现预算赤字。

9. 通货膨胀的影响。关于通货膨胀本身的问题我们稍后再做讨论,这里只谈一下通货膨胀过程对预算的影响。[②] 当通货膨胀开始不断上升时,预算支出的增长率与预算收入的增长率通常会有所不同:税收的支付和征收都需要花费时间,因此,收入增长会落后于支出增长。负的实际利率使情况更为恶化:即使对延迟缴税征收利息,它也不能补偿由于通货膨胀而造成的价值损失。

虽然上述列举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但有可能维持或增加预算赤字的9个因素都已略有提及。经济决策当局没有能够精心设计财政政策以应付这些困难,甚至在很长时间之后,领导人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政府已经习惯于通过对投入和产出的实物数量做计划来决定所有重要问题。唯一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公众手中所掌握的钱按照固定消费价格计算可以购买多少产品。融资过程并不重要,因此无须给予关注。但是在改革体制下,突然加入了像预算赤字这样的问题。只懂得实物计划和直接官僚控制的政府(只知道如何经营一家全国性"工厂")便手忙脚乱,一知

---

①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也存在与工资相关的税收,但国有部门的雇主会自动进行扣除。居民没有注意到他们在缴税,因为营业税和与工资相关的税收两者都是背着他们进行的。作为改革过程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也尝试过模仿西方模式引入收入税,第一个将它付诸实施的国家就是匈牙利。

匈牙利新的税收制度带来了各种矛盾。虽然它宣布新税制的目的之一是克服收入分配中的不公正,但它未能做到这一点。它未能与逆所得税相结合,也没有帮助那些陷入财务困境的人,事实上有些不少人比以前的情况更糟糕。新税制也未能削平高收入者的收入。许多不能或者不愿隐瞒他们收入的人宁愿少干活、从事利润较少的工作或者放弃他们从前所追求的事业。于是,税收对努力和成绩产生了负激励,对供给来说也是如此。其他一些人则把从前公开进行的活动变成了"灰色"或"黑色"领域,在这些领域税收机关往往无能为力[→19.5]。

② 互为影响也同样重要:预算赤字在造成通货膨胀中所起的作用[→23.5-6]。

半解地开始应付财政问题(不久以后,他们也将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货币问题)。

行事草率的现象比比皆是:出台的措施都是临时抱佛脚,[①]常常是一个规定刚刚宣布就很快被撤消。当政府最后意识到预算赤字的危险时,它又表现出一种可称之为“预算贪婪”的情绪。企业和家庭都发觉公共财政的管理者不放过任何可以提高额外收入的最微小机会,或者是力图避免任何支出项目,而根本不考虑任何政治和社会后果,或者首先受影响的人是否有能力应对。

虽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精简机构,但金融部门的人员仍在增加,采取了越来越多的财政措施,税收和补贴体系也变得愈加复杂。在改革国家中,财政机关成为了官僚机构里最有影响力的部门之一。

处理公共财政事务的机构使用什么样的协调机制呢?在任何体制下,当国家预算制定完成并经立法机关通过后,都存在某种官僚协调机制来执行国家预算,通过行政手段征税和开支。但预算决策是一件事,相应的协调机制则与特定的体制紧密相关。

在议会政治结构中,预算中的所有支出和收入项目最终都要通过自治机制(self - governing mechanism)决定。这个说法也可以倒过来说:只有当公共支出和收入由整个共同体决定,或是由经自由选举的代表机构来决定时,才可能在共同体内实行真正的自治。

自治机制在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中只是表面文章。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下,国家预算最终是由同一个官僚统治集团(或者更精确地说它的最高领导层)做出决定,而且他们还将继续实施这些决定。相比较而言,在改革体制下,自治成分(包括议会的作用)有所加强。[②] 不过,所有关于预算的指导性原则仍然由官僚高层决定,这方面几乎没有改变。因此,预算赤字仍然是少

---

①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后推行的禁酒措施,这不仅无助于打击酗酒行为,反而鼓励了非法的大规模家庭制作并且导致了巨额的财政收入损失。

② 当议会开始对预算的通过开始真正负起责任时,会出现一些清晰可辨的迹象:以精确数据为基础对下列问题展开了争论:军队开支、维持党和群众组织的预算支持以及政府机关的工作;在辩论中听到了与政府的意见有重大不同的观点。这些现象意味着体制已经达到了政治结构发生改变的临界线(革命性转型即将开始)。

数圈内人士处理的问题，与公众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 23.4　信贷体制与货币政策

**制度**。经济改革国家银行体系的协调机制是什么，或者说协调机制是怎样组合在一起的呢？[①] 回答这个问题比回答刚才提出的关于财政体制的类似问题要困难得多。现代资本主义下的银行体系是由行政与市场的特定组合来加以协调的。中央银行为国家所有，而按照商业原则运行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接受政府监管。经济改革国家的银行体系乍一看似乎与此相似。政府的集中影响力——纵向联系——是非常强大的，但给人的印象是管理者和官员在与货币打交道；接受银行存款、发放贷款、经常账户往来、开支票和转账凭证、计算利息、管理债券和股票，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有商业交易、横向联系和"买卖"，换句话说，存在市场协调。

在改革进程中，银行体系经历的结构变化加强了上述印象。出现了分权的趋势，其中有些与区域自治的发展有关；[②]每个地区都成立了单独的银行。除此之外，则以双层银行体系替代从前的单一银行体系，即中央银行在上层运行而相互独立的商业银行作为下层运行。因此，给人的印象是分权已经伴随着商业银行之间竞争而出现了。[③]

表面上"市场化"的程度很高，但实际上却远非如此。为了支持这一结论，我们必须认真考察经济改革过程中银行的所有权关系、银行领导的动机以及银行与体系内其余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考察南斯拉夫或者中国地区性银行或匈牙利商业银行的活动，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对利润有直接的兴趣。国有银行就像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其他国有企业一样，既属于每个人又不属于任何人。管理者的

---

① 详细描述可参考下列著作中：南斯拉夫：L. D. Tyson(1980)、S. J. Gedeon(1985－86, 1987)；匈牙利：M. Tardos(1989)和 I. Szekely(1990)；中国：L. Wulf(1985)、F. Levy 等人(1988)以及 X. Zhou 和 L. Zhu(1987)。

② 南斯拉夫和中国通过分别建立国家一级和省级银行网络完成了重要变革。

③ 1988－1989 年匈牙利是完全地实行双层银行体系的第一个国家，见 M. 塔多斯(1989)。

薪水很高,但他们的命运并没有与银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可能不会像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银行家那样对银行利润漠不关心,但他们的职业生涯仍然由政府所控制,而且他们无须赢得并维持真正的银行所有者的信赖。因此,他们经常不得不屈服于来自官僚部门的压力,不得不遵从党和政府的中央及地方组织以及最有影响力的企业领导的意愿。

虽然存在显著区别,但这里不可能对经典社会主义单一银行制在改革条件下以及局部分权之后出现的各种状况进行个别讨论。[①]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除非有特别说明,“银行”和“银行体系”都是指整个银行部门。

在真正的信贷体系里,利息是信贷的价格。贷款者提供贷款以便通过利息交易来创造利润;借款者请求贷款时所依据的是将需要支付的利息考虑在内后,是否还值得使用贷款。在真正的信贷市场上,实际利率 0.4 个百分点的变动都将影响商业交易。[②] 然而经济改革国家却一直人为地维持负实际利率[→23.2]。这导致经济改革中的银行体系基本上成了分配信贷,收集和存储货币的办公署,而不是依照商业和市场原则运行的机构网络。

在实际利率为负的地方,从银行接受贷款的任何人都可以把贷款作为政府的捐赠从而据为己有。切合实际的论点是负债越多越好。[③] 来自家庭的信贷需求,特别是来自公共部门的需求总是远远超过信贷供给。[④] 利率未能在信贷分配中起到任何平衡作用。[⑤] 银行不是根据商业原则来“销售”贷款以期通过利息来获取利润;它是依照非商业的官僚标准进行信贷分配。问题不仅仅在于这是一个事先就加以明确宣布的公开标准,其他因素——

---

① 当局部分权已经发生时,对中央银行而言强制推行其思想变成一个非常棘手的过程,不再像从前命令它自己的分支机构处理某些事务那么简单。在这种条件下,信贷供给失控的趋势日趋严重,下文我们将会谈到这个问题。

② E. Varhegyi(1990a)在计量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在匈牙利经济改革中,国有企业的信贷需求对实际利率的变动根本不敏感。

③ 这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也可能发生。事实上,这是市场协调失衡的迹象。

④ 在有关商品市场的讨论中,也出现了同一现象[→11.2]:需求适应于期望供给。企业与银行之间有许多非正式的关系,如果觉得没有机会,就不会提交信贷申请。因此,尽管需求总是会略微超过供给,但过度的信贷申请数额始终有限且差额数量也不会太大。关于这点,可参见 M. Lacko 的研究。

⑤ 在缺少利率的平衡作用时,使用“信贷市场”一词似乎并不完全合理。

疏通、纵向谈判、个人关系和贿赂——都在幕后起作用。

对参与者行为及其背后推动力加以澄清将有助于理解经济改革中所出现的货币紧张现象。信贷需求总是超出信贷供给并不是信贷供应者所面对的唯一问题，因为权力的压力和个人关系的影响也会带来信贷供给的增长。[①] 与此同时，由于不存在所有权利益、真正的利润动机或者对任何企业倒闭的担心，因此根本无法限制信贷供给。至多会有中央银行设法通过行政手段停止或抑制信贷供给的过度增长，但这几乎从未成功过。原因是对从事商业贷款的机构而言，在缺少内部动机的情况下，要限制其信贷分配活动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资本主义信贷体系有着数百年的经验，逐步发展出一套复杂的机制来协调中央国有银行与私人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后者的自主权也并非不受任何限制。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严格的法律规定（官僚协调）、利润为基础的私人合同（市场协调）和无瑕疵的商业品行（道德协调）的特定组合，它为中央银行提供了影响商业银行运作的有效手段。[②] 这种以特定所有制关系和权力结构为基础有机发展的微调控制机制无法被“复制”，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应用于中央指令性的社会主义国有银行体系。

迄今为止，我们的讨论已经涉及到了银行体系的内部信用交易。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在单一银行体系之外提供信贷是被禁止的；企业不允许相互提供信用。在改革体制下，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不断增长。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基于两个企业之间的自愿信用协议，大多数都是强制性信用：买方企业就是不付款给卖方企业。出现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前者没有收到它自己企业的付款。它可能把从拖欠货款企业取得的期票作为债务解决手段。延迟支付和强制贷款链条很可能使大部分生产部门产生流动性危机。一旦发生流动性危机，就需要银行体系不断干预，提供银行信贷来

---

① 一个南斯拉夫银行的高级管理者在私人会谈中告诉我，共和国（或者地方）总理或地方内阁成员曾不止一次地亲自干预，要求批准某个企业的信贷申请。他觉得不可能拒绝这样的一再要求。

② 顺便说一下，这个机制的运转也存在大量的错误和摩擦，而且它不止一次被证明没有能力避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部门是最容易出现软预算综合症的领域。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美国储蓄与信贷协会的倒闭。为了救助这些协会，美国政府花费了大量预算资金，给纳税人带来了高昂的成本。

使无偿债能力的企业变成有偿债能力的企业。而与此同时,期票作为“准货币”在企业部门流通,这就妨碍了银行体系控制货币供给。[①]

**货币政策**。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相比,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中央银行也同样无法制定自己的货币政策:它还是要屈从于官僚压力;它是中央行政管理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实体;它的领导是由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来任命的。中央银行的活动必须受到中央的控制。

这里我们还需要回到预算赤字的问题[→23.3]。很显然,预算赤字不得不由信贷资金来弥补的。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理想的过程应该是企业、公众和家庭自愿地向国家提供信贷资金。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上述债权人把购买附有利息的政府债券作为投资。而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几乎不使用这种方法,而是依靠中央银行向预算借出资金,这完全是长期隐瞒公众视听的信贷手法,而且还有着充分的理由。因此,事实已经很清楚,预算赤字最终是通过仁慈的中央银行直接印刷钞票来弥补的。毫无疑问,这是通货膨胀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与前面关于财政政策的讨论一样,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同样是非常复杂的专业技能。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根本没有机会去学习和掌握这一技能,因此,会频繁出现极为严重的错误。

在改革进程中,货币政策在两种行为之间摇摆不定:有时严格,有时宽松。它有时候会抵制来自上面和下面的信贷要求,有时又会屈服于上述压力。但即使制定了限制货币供给的政策,仍然会存在许多缺口。如果政治一官僚的压力非常强大,银行体系无法抵制,便只好批准信贷要求(即使这与它一直执行的限制性政策相矛盾)。

在上述两种相互对立的行为中,通常是宽松的政策占上风。这样,在宽松的阶段,就会有过多的信贷(最终是过多的货币)被投入到经济中,创造出远远超过实际供给的需求。

---

① 在 L. D. Tyson(1977)、S. J. Gedeon(1987)和 E. Varhegyi(1989,1990b)[→21.7]的作品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例如在匈牙利,企业间的强制性信贷总额占 1989 年未偿还短期贷款总额的 1/3 以上。以上信息来自 E. Varhegyi。

强制贷款在企业间普遍存在,究其原因,除了与前面所提到的之外,还因为在这种经济中只是依赖横向合同,而在合同背后起重要支撑作用的经济、法律和道德基础都未能出现。

## 23.5 短缺与通货膨胀:内部经济关系

在此,我想尝试着对改革经济中的宏观紧张及其综合效果进行一次全面的回顾。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本部分不讨论外部经济联系以及外贸和国外信贷对改革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而集中讨论内部经济联系。在后面的两个部分里,我们再引入外贸和国外信贷。

讨论的出发点是第11、12章的主题: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短缺和通货膨胀。那两章所得出的大多数结论同样适用于处于改革过程的经济,这里不再赘述。现在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在经历了改革之后,情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改革体制已经偏离了从前的正常状态;需求失控的现象日益严重,宏观层面的过度需求不断累积并越发严重。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所有的机制都具有刺激需求的作用,但官僚控制手段和各种障碍都试图限制需求。走向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大大削弱了这些限制手段的作用。工资上涨的压力一再被突破,这推动了家庭需求的增长。企业的投资饥渴变得更为强烈,这又提高了来自企业部门的需求。过度增加货币供给的动机变得更加有力。在此必须特别提到预算赤字,中央银行通过发行更多的货币来为它提供资金。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宏观过度需求容易引发价格上涨趋势,但行政价格管理方式可以有效地抑制这一趋势。在改革阶段,则有以下几种可选择的干预方式:

1. 它可以继续把行政价格管理作为主要干预手段来抑制价格上涨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会强制性储蓄并由此导致未用完的和无法用完的货币不断积累,即形成所谓的“货币积压”。抑制性通货膨胀因此产生并逐步发展,在1990—1991年它以最极端的方式在苏联发生。

2. 部分或全部废除价格的行政管理方式[→22.1,22.4]。这样,价格上涨的力量就被释放出来,并由此带来了全面的价格水平变动。抑制性通货膨胀部分或者全部转变成为公开的通货膨胀。这在波兰、南斯拉夫和越南发生时表现出了惊人的力量(匈牙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这种情况,但没有上述国

家剧烈)。有关公开的通货膨胀突然爆发的数据可以在表23.4中找到。

**表23.4，改革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率**

| 时期 | 中国 | 匈牙利 | 波兰 | 南斯拉夫 | 越南 |
|---|---|---|---|---|---|
| 1960-1980 | - | 3.7 | 5.0 | - | - |
| 1965-1980 | 0.0 | 2.6 | - | 15.3 | - |
| 1966-1970 | - | - | - | - | 2.3 |
| 1971-1975 | - | - | - | - | 0.7 |
| 1976-1980 | - | - | - | - | 21.2 |
| 1980 | 6.0 | 9.1 | 9.1 | - | - |
| 1981 | 2.4 | 4.6 | 24.4 | 46 | - |
| 1982 | 1.9 | 6.9 | 101.5 | 30 | - |
| 1983 | 1.5 | 7.3 | 23.0 | 39 | 74[a] |
| 1984 | 2.8 | 8.3 | 15.7 | 57 | - |
| 1985 | 8.8 | 7.0 | 14.4 | 76 | - |
| 1986 | 6.0 | 5.3 | 18.0 | 88 | 487 |
| 1987 | 7.3 | 8.6 | 25.3 | 118 | 316 |
| 1988 | 18.5 | 15.5 | 61.3 | 199 | 308 |
| 1989 | 17.8 | 17.0 | 244.1 | 1,256 | 96 |

**资料来源**:第一行:F. L. Pryor(1985,p. 123);第二行:世界发展报告(1988,pp. 222-223);中国:1980-1989,T. Sicular(1990,表1);匈牙利:1980-1986,M. Bleaney(1988,p. 122),1987-1989,Ko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中央统计办公室,布达佩斯)(1990,p. 223);波兰:1980-1986,M. Bleaney(1988,p. 122)、1987-1989,G. W. Kolodko、D. Kotz-Kozierkiewicz和E. Skrzeszewska-Paczek(1990,p. 47);南斯拉夫和越南:G. W. Kolodko、D. Kotz-Kozierkiewicz和E. Skrzeszewska-Paczek(1990,pp. 23、77、79)。

a 1981-85期间的平均数。

企业的利润动机还没有强大到成为决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但也不是毫无作用。对企业而言,利润还是有好处的,毕竟谁也不喜欢挨家挨户地乞求补贴、优惠税额和软贷款。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利润计划在一系列目标中只居于次要地位,而且也不值得去努力完成利润目标。然而在改革体制下,情况就大大不同了,企业有强烈的动机尽其所能提高价格。

中央的价格政策是想通过两种方式调整相对价格。一方面,中央不断

提高行政价格。另一方面,一个接一个地放开某些产品和服务政府控制价格,任由其价格上涨。不管是使用其中的一种方法,还是上述两种方法的任意组合,一连串的局部价格上涨未能达到调整相对价格的原有目标。与此同时,这个过程成为了价格水平普遍持续上涨的推动力之一。

3. 虽然出现了通货膨胀式的价格上涨,但它的速度和规模仍无法恢复宏观需求和宏观供给之间的平衡。均衡价格的迅速提升都受阻于各种限制措施和刚性条件。此外,国有企业仍然没有真正对价格作出反应,因此,价格的提高无法抑制它们的投入需求。于是,公开的通货膨胀和短缺并存,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波兰。所以本章所讨论的这种现象又被称作"波兰综合症"。

方案1和2从未真正得以彻底实施,只能说抑制性通货膨胀和短缺在某些国家处于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国家则是公开的通货膨胀。方案3即通货膨胀和短缺并存的现象在所有改革经济中都非常明显,至少有这种迹象。有时是某些部门出现了严重短缺的迹象,而整个经济却处于严重的通货膨胀状态。

改革因摇摆不定而自食其果。不仅需求失控的诱因无法根除(尤其是软预算约束),而且又增加了新的因素,如更强大的工资压力。与此同时,价格已经或多或少地放开。因此,在持续性短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稳定的价格和工资体系就已经被摧毁。事实上,如果改革措施设计得很糟糕(如波兰或苏联),通货膨胀和短缺并存的情况将越来越恶化。

价格上涨促使雇员更积极地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1] 投入价格的上涨以及工资的提高大大提高了成本,这又造成价格进一步上涨。于是就出现

---

① 在这方面,波兰走得最远。在波兰团结工会上台之前,曾设法使工资与生活指数挂钩;价格上涨自动地带来了工资的上涨,这使得通货膨胀不断加速,并最终发展成为恶性的通货膨胀。

改革社会主义国家最后一届政府的合法性及政治可信度非常脆弱,根本无法抵挡工资指数化的要求。在本书中,工资上涨压力增加以及行政性管理逐步失效都是以非常极端的形式发生的。

波兰进入后社会主义时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波兰团结工会接管了政府及其相应的经济职能。于是,它对从前为之斗争的工资指数化政策表现出了180度的大转弯。不久之后,它开始实施由国家执行的严格的工资控制。

了可怕的螺旋式通货膨胀:价格上涨导致工资和其他成本的上升,而这又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短缺的自我再生机制使这一情况变得愈加复杂。当人们预感到短缺时,便会导致囤积,企业和家庭都设法储备供给不足的物品。[①]在表23.5中,就能够看到这种现象,它和表11.7结构相似,并且表明了投入存货与产出存货之间的比率是如何导致短缺的。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上述比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3—4倍,但在苏联的改革时期,几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6倍。

**表23.5 苏联投入产出存货比率的变化**

| | 时期 | 投入—产出存货比率 |
|---|---|---|
| 苏联 | 1980 | 4.8 |
| | 1981 | 4.9 |
| | 1982 | 4.6 |
| | 1983 | 4.6 |
| | 1984 | 4.7 |
| | 1985 | 4.7 |
| | 1986 | 5.2 |
| | 1987 | 5.6 |
| | 1988 | 5.8 |
| | 1989 | 6.2 |
| 资本主义国家 | 1981—1985年的平均水平 | |
| 澳大利亚 | | 1.4 |
| 加拿大 | | 0.9 |
| 美国 | | 1.0 |
| 西德 | | 0.8 |

**资料来源:**苏联的数据来自A. Aslund(1991,p. 27),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数据见表11.7。

① 虽然方案1——公开的通货膨胀——在南斯拉夫处于支配性地位,但也出现了短缺。南斯拉夫的库存也在显著增加,部分是因为担心进口产品出现短缺,部分是由于通货膨胀预期。见J. H. Gapinski,B. Skegro以及T. W. Zuehlke(1987)和J. P. Burkett(1989)。

两种螺旋相互缠绕。虽然局部的价格上涨无法阻碍短缺的再生机制，但短缺本身却始终为价格上涨提供了理由和借口，这推动了通货膨胀的加速发展。反过来说，价格上涨的可能性以及通货膨胀预期导致囤积，从而又使短缺状况进一步恶化。这两种动态变化过程纠缠在一起，每一个都很危险，完全有可能将经济推向危机。①

我们简要回顾了因为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所引发的新的紧张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影响。在此需要补充的是，在逐步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可以抵抗紧张趋势的力量。由于私有部门已经发展起来，它可以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弥补国有部门所无法满足的部分需求，这提高了整个经济的适应能力。私营部门的复苏还能促使整个经济在宏观水平上更加接近供需平衡状态。私营部门变得越强大，不利于形成市场出清价格的行政障碍就越小，而私营部门在吸收过度需求方面也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 23.6 对外贸易与外债

几乎所有改革国家都开始陷入对资本主义国家负债的过程之中。少数几个国家的负债规模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比例，②这成了最令人头疼的宏观矛盾之一。

这里我们需要避免那些过于简单和片面的解释。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的十几年内都曾债台高筑。但同样的结果——负债——可能产生于不同的原因。

负债不断累积的一个共同原因是20世纪70、80年代债权人愿意慷慨贷款。本书不打算探讨隐藏于这种意愿背后的原因。当然，当大范围的国际

---

① 生活消费品的短缺在苏联变得尤为严重。如果挑选近千种食品、衣服和家庭用品来检验，那么会发现只有11%比较容易获得。一家研究机构在消费者民意测验中发现，如果供应加大的话，超过70%的人回答将购买更多的肉、肉类制品、水果、蔬菜和奶酪。见A. Voronov(1990,p. 27)和T. M. Boiko(1990,p. 85)。

②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债务问题，有大量的研究文献中，其中可参见下列文章：W. Malecki和G. W. Kolodko(1990)、R. McKinnon(1990b)和I. Zloch - Christy(1987)。

信贷运动开始时,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将是可信的债务人。毕竟过去在提供给社会主义国家的信用额还很小的时候(因为西方不愿意借出而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愿意借入),它们总是准时和可靠的。

信贷来源十分充足,这是个很大的诱惑。但为什么处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未能抵制住这种诱惑呢?需要做出判定的是,在负债与改革所引起的变化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负债倾向早已成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一部分[→14.3],但它大体上还有抵制的意愿和能力。可在改革阶段,这种抵制力已经大大削弱,甚至完全被瓦解了。

另一个解释是外交政策的变化。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将自身隔离于资本主义之外,认为后者怀有敌意,并且心存恐惧。它也担心,当人们更加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并与本国情况进行比较的话,可能对本国居民造成的煽动性影响。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政治要素就是部分放弃这种孤立状态,或者用中国改革宣传者们的说法是,向西方开放。

这种开放包含着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和金融方面的联系。人们必然会感受到以下互惠效果:

◆从西方进口产品并进行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的期望之一就是要熟悉和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组织、管理方法,以及能带来大范围的生产技术流入。

◆西方贷款被看做扩大对外贸易和补充国内融资渠道的手段。外国信贷提供了灵活和易于控制的外部资金来源,而且能马上为进口交易提供资金。

◆从资本主义市场进口产品有利于扩大对该市场的出口,这意味着可以连续不断地支付进口。人们认为长期外国贷款有利于提高具有自我偿付的出口能力,从而可以偿还贷款并进一步扩大进口。

◆根据市场社会主义进行的分权化改革加强了所有上述互惠效果。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应该包括与外国商家建立直接的联系,从而可以避开那些过去拥有垄断权的外贸企业。无论如何,企业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之后,它们就能够在进口和出口方面更灵活地适应外部市场。

但上述期望中能够真正实现的却很少。与此同时,负面的趋势出现了,它们相互影响并引发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负债不断地加速累积。

失败显而易见：改革经济无法通过出口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然而从资本主义市场进口产品的压力却不断加大。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讨论过为什么半官僚、半市场的改革经济缺乏效率和灵活性。这里我们将研究那些主要与对外贸易有关的内容，对改革经济的特征进行补充说明。

虽然生产企业拥有了部分的对外贸易自主权，但它们仍然缺少强烈的动机以更高的效率向资本主义市场出口产品，或者节俭地使用进口设备。外汇汇率与实际情况不符：高估本国货币，从而使进口便宜而出口却赚不到钱。这正好与想要鼓励的行为背道而驰（当然首先要假定汇率和外贸价格还是有影响的）。事实上，当谈到汇率和进出口价格的影响时，所谓的价格敏感性就更差了。在软预算约束的"军火库"里，有许多武器可以用来抵挡外来影响。如果进口材料的价格上涨或者出口价格下跌，这就为外贸企业或者生产企业要求损失补偿提供了正当的借口。[①] 补偿可以通过改变关税、使用特定乘数改变外汇汇率、税收减让、价格补贴等等来完成。好企业并不会得到太多奖赏，如果失败了，也不会遭到太多惩罚。

取消官僚限制和增加企业自主权，其中包括批准进口自主权，更容易满足企业对进口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依然没有强烈的利润动机、市场竞争和硬预算约束，缺少了这些东西，企业并不把找到自己产品的买主当作生死攸关的大事。因此，大多数企业都不会在产品出口上花太多精力。即使那些努力想在资本主义市场干好的企业，也会遇到诸多困难，从无数的官僚干涉到投入品的短缺限制（其中包括进口材料、半成品和设备）。结果通常是进口大于出口，而且用于补偿贸易赤字的贷款总额不断增长。

当上述一切发生时，债务增长会进入一种危险的自我繁殖状态，而且很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一个国家的债务越高，它筹措新贷款时被迫接受的条款就越苛刻。如果在偿还债务时出现困难（支付到期款项及利息），它的信用等级就会恶化，进一步筹措贷款将变得更为困难，贷款条件也就更加不利。尽管最初债务的增加是由于进口超过了出口，但人们却希望现在能够

---

①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经典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进行改革的国家，都无法很好地适应能源价格的上涨。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6个较小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1美元产值生产上所花费的能源是西欧国家的两倍多。东欧近一半钢铁是通过极其耗费能源的"平炉炼钢"技术生产的，这一技术在西方差不多已经被淘汰了，见 B. de Largentaye(1990)。

产生固定的贸易盈余以偿还债务。很少有改革经济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即使它们做到了，也只能是短暂维持。这一过程通常是以严重的支付危机而告终，而且即使国家没有彻底陷入无力偿还债务的状态，它也只是设法停在危机的边缘。

上述一系列的思维逻辑论证及其他许多因素都说明：处于改革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更容易陷入债务危机。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不仅允许而且鼓励了借债行为。[①]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观测上的支持。表 23.6 和 23.7 比较了两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在 1988 年的债务负担：走改革之路的匈牙利和波兰；坚守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②] 很显然，改革国家的债务负担更严重。

**表 23.6 净债务：国际比较**

| | 净债务与向市场经济出口的比率(%) | | | | |
|---|---|---|---|---|---|
| | 1984 | 1985 | 1986 | 1987 | 1988 |
| 改革社会主义国家 | | | | | |
| 匈牙利 | 221 | 307 | 374 | 396 | 349 |
| 波兰 | 433 | 503 | 534 | 545 | 458 |
| 经典社会主义国家 | | | | | |
| 捷克斯洛伐克 | 42 | 50 | 53 | 66 | 62 |
| 罗马尼亚 | 93 | 97 | 100 | 70 | 33 |

**资料来源：**联合国(1990a，p. 206)。

① 罗马尼亚在 1981 年承担了 100 亿美元的巨额外债，直到在 1989 年前才通过采取强制性出口和严格限制进口的政策才全部还清，这两种措施都严重损害了国内消费，也只有像齐奥塞斯库那样的极权镇压式管理才能做到。任何宽容和温和的改革社会主义经济都无法这样做，可参见 A. Teodorescu(1990)。

② 这里没有把东德考虑在内，因为与西德的贸易和金融联系为它创造了特殊条件。关于西德对东德的帮助，可参见 J. Lisiecki(1990)。

表 23.7　净利息支出：国际比较

| | 净利息支出与向市场经济出口的比率（%） | | | | |
|---|---|---|---|---|---|
| | 1984 | 1985 | 1986 | 1987 | 1988 |
| 改革社会主义国家 | | | | | |
| 匈牙利 | 17.5 | 19.0 | 21.0 | 20.2 | 18.8 |
| 波兰 | 43.1 | 43.7 | 43.2 | 42.4 | 36.8 |
| 经典社会主义国家 | | | | | |
| 捷克斯洛伐克 | 5.1 | 4.3 | 4.6 | 4.3 | 4.3 |
| 罗马尼亚 | 10.1 | 10.0 | 10.2 | 5.2 | 2.8 |

**资料来源**：联合国（1990a，p. 206）。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很大一部分的外债偿还责任都是由私人企业来承担的。政府只负责偿还它自己的借款，或是它所拥有的企业的借款，以及为私营部门提供担保的借款。[①] 因此，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债务问题（以及负债管理），政府和私营部门会各负其责。与此相对比，虽然改革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进行了部分分权，但在批准外国贷款和偿还外债方面仍然实行严格的集权管理。这意味着与此相关的所有问题都落在高层领导肩上，而且会直接指派银行机构完成这项任务。国有企业与严重的国家外债问题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也不会卷入其中。即便整个国家到达了破产的边缘，任何的国有企业都不可能倒闭。尽管如此，其严重后果最终还是被分散化，因为是公众承担着偿还债务的成本。

私营部门对由政府控制的外债增加或减少起不了什么作用。改革经济在法律上不承认私人对外贸易和私人主体间的外汇交易。但这样的活动仍然存在。作为政治自由化和向西方开放的结果，有更多的人出国旅行，与国外亲戚和熟人保持联系变得更加容易；更多的人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这使得阻止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在国内或国外购买或者售出硬通货、在国外出售国内的货物、在国内出售在国外得到的货物变得愈加困难。这已经不再

① 不少拉丁美洲国家拥有非常庞大的国有部门，正是这些国有部门带来了大量外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拉美国家负债不断累积的起因与社会主义国家相类似。

是在进行商务旅行或在国外度假期间偶然发生的临时交易了,"购物旅行",尤其是带有商业目的的"购物旅行"大量出现。很多人都变成了外汇和外贸生意上半职业性的交易商。

这一领域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官方宣传与接受市场机制之间是多么的矛盾。即使在多数情形下私人外贸和私人主体间的外汇交易对社会是有帮助的,但仍被视为投机,而事实上,这类活动最终增加了国民收入,也正因为如此,国家的实际外汇供给要远远好于官方贸易和消费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情况。甚至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也要比官方金融报告所显示的好得多,因为家庭非法保存的外币事实上构成了国家储备的一部分。在购物旅行最普及的匈牙利和波兰,很多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部分从事对外贸易活动,他们仔细地盘算,在哪儿可以购买以及什么值得购买,然后在别处以更高的价格售出。

问题是这种非常有益的私人活动却处于严重的冲突状态之中,浪费着人们的精力和时间。人们总是担心不知什么时候官方就会发出禁令:官员们有时会严格执行命令,有时又熟视无睹。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不知消耗了多少聪明才智和进取之心。

## 23.7 短缺、通货膨胀与负债

第**23.5**部分研究了宏观矛盾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综合影响:短缺和通货膨胀的相互制约。迄今为止还没有考虑经济的对外联系,下面将对此进行分析,其核心就是短缺、通货膨胀和负债三者之间的关系。

1. *短缺导致更多进口*。短缺经济吸引着经济管理者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的进口来弥补特定的缺口。不管是需要缓和公众的不满,还是消除生产和投资的障碍,这都是可以利用的最方便和最快捷的方法。改革经济的领导人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领导人更倾向于求助于这种方法,因为他们更害怕来自公众或企业领导的不满,而在举借外债的问题上却可以毫无顾忌。

2. *短缺导致更差的出口表现*。在卖方市场,生产者并不完全依靠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寻找买主。如果他没有找到买方,只要国内经济和其他社会主义贸易伙伴继续存在短缺,他仍然可以轻易地找到销售机会。长期的短缺经济

使市场失去了活力，在改革经济的所有部门中始终是卖方市场居于主导地位。

3. 负债导致短缺。当看到债务不断累积时，经济管理者倾向于用行政手段来抑制进口，扩大出口，一般都采取发布政府指令或安排政府定购的方式，有时也会直接施压。经常账户的平衡问题是力图恢复改革前的机制并保留微观控制[→21.4]的主要动因之一。官僚干预始终与短缺相伴而行，特别是当过去进口的产品发生短缺时更是如此。另一方面，短缺现象还可能因为产品由国内消费转向出口而变得更为严重。

4. 负债导致通货膨胀。这里存在两种因果性联系。一个是如果领导层对贸易和经常账户赤字以及不断增长的负债做出合理反应，那么他们不得不将本国货币贬值，这就使得进口更加昂贵，进而造成成本—物价的螺旋式通货膨胀。

另一个因果联系是偿还债务需要大量的预算支出和/或中央银行控制外汇。预算支出通常用印刷更多的货币来弥补，也就是利用通货膨胀来解决债务问题。

上述研究并不是很全面，但它足以表明短缺、通货膨胀和负债这三个经济问题本身就很严重，而且还相互影响。一旦它们相互纠缠，乱成一团，经济就可能处于危机状态。1988—1989 年间波兰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通货膨胀变成恶性通货膨胀，[①]短缺无处不在而且十分严重，债务负担将国家推到了破产的边缘。

波兰出现的情况，就像本章的前言所强调的那样，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在出现短缺、通货膨胀和负债问题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这三种危险趋势的相互影响并不断加强。

## 23.8　生活水平

改革以及伴随而来的宏观矛盾对生活水平的影响，对不同国家和不同

---

① 波兰的恶性通货膨胀在 1990 年采取稳定措施之前出现了非常极端的比例：消费者价格在 1988 年 12 月到 1989 年 12 月之间上涨了 636（见 D. Lipton 和 J. Sachs(1990, p. 105)。

苏联经济在 1989—1990 年也陷入通货膨胀的漩涡之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注释 2 中提到的文献以及 E. Gaidar(1990)的文章。

时期以及特定国家特定时期的不同社会阶层是不同的。因此,这里我们仅限于研究某些一般性现象。

主要的赢家是那些加入私营部门而获得额外收入的人。在中国,就是好几亿农民,参与农业之外私人活动的好几千万居民(或是专职从业人员,或是在国有部门工作而到私营部门打零工的人)。在写作本书时,苏联已经有几百万人在“合作社”(事实上是私营的)工作。其他改革经济也都有类似的情况,这些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改善。

某些改革国家的供给状况有所改善,这使全体居民都受惠。供给的改善有以下几个来源:一个是私营部门的复活和扩张。例如,中国农业的迅速增长不仅使农民过上了好生活,而且也很快改善了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状况。那些接受正式或非正式私营部门服务的人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公有部门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私营部门通过交换消费者产品或服务所获得的每一个卢布(或福林)收入都意味着相应提高了一个卢布(或福林)的大众消费水平。

全体居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政策优先发展次序的改变,只要增加公众消费或服务部门的投资(住宅、卫生)就可以实现[→23.2]。生活消费品的进口增长发挥了有利影响。生活质量改善的另一个原因是,旨在建立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措施提高了公有企业的自主权、拓宽了横向市场联系的范围,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产品的质量,增加了商品的种类。

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国家是匈牙利。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在近十五年内获得了持续的重大改善。南斯拉夫和中国也是如此,而且其他改革国家也都略有改观或者至少是局部的改善。

但即使在相对而言最成功的改革国家,生活水平逐步改善的趋势也迟早会中断,对那些不太成功的国家来说,还未出现真正的改善趋势。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摆脱本章所探讨的宏观矛盾。可能存在三种情况:矛盾还处于潜伏状态;领导层有意识地将矛盾隐藏起来;或者更糟糕的是:采取了短期措施,但结果只是拖延时间,但从长远观点来看,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消费是宏观分配最后考虑的变量。一旦出现麻烦,政府就会毫不犹豫地强制降低生活水平,但投资和军事开支将不会受到影响,更不会去申请外国贷款。政府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对极权统治

和强硬镇压整个社会根本不可能有抗议的声音。

在改革社会主义下,上述解决办法就不再完全适用了。由于自由化和公开的程度不断提高,公众可以表达不满。管理国家的人们认为有必要避免出现不满情绪。在改革开始的时候,领导层曾承诺一定会结束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所带来的苦难,而且生活也将得以改善。因此,当经济开始布满乌云的时候,领导层不会自动地采取原有的办法来限制,它可能会尝试其他方法。

通常不会削减军费开支。[1] 这样就剩下了两种可能性:抑制投资或者举借外债。这两种方式可以暂时维持实际消费继续增长(即使速度有所放慢)。即使无法再增长,至少也不会下降。或者即使下降,至少也不会暴跌。与生活水平有关的承诺变得越来越少,但即使在那时,任何时候的承诺总是高于最终发生的结果。

当领导层采取以上两种方法设法防止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时,它们最终会相互干扰。减少投资损害了未来发展的基础,而且迟早将导致生产的停滞或下滑。当继续对投资进行行政限制时,投资领域的矛盾会不断加深。投资项目所需要的资金总是高于不断减少的资金供给。投资任务的积压日益严重;在那些没有得到充足投资资金份额的部门和地区,当地官僚也加入不满的行列。

如果投资与消费的总和(总支出)能够借助于外国资源来保持增长,那么就可以避免上述两难境地。举例来说,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成功实现了看似持久的福利增长的部分原因,再三提到的所谓"土豆加牛肉共产主义"或者"冰箱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资金来支撑的。外国贷款通过类似的方式帮助了其他改革国家,防止了其国内宏观矛盾大幅度降低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就像本章前面所提到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只会更加严重:债务开始不断累积,然后加速增长。最终偿还债务的账单还是

---

① 20世纪80年代也开始削减军费。日益恶化的国内经济迫使苏联表示出更强烈的意愿来达成协议并从前线撤退。除了别的原因以外,主要是因为它需要减少军事上的经济资源投入。只要东欧在军事方面仍然严重依赖于苏联,那么它们在减少军事支出之前就需要取得苏联的同意。因此,可以大致这么说,这种再分配在苏联和与其有军事联盟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同时发生。

事实上,在削减军事支出与把释放出来的经济资源转为民间消费之间有很长的时滞。

要落到公众门口的台阶上，随后他们就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缩减消费。

宏观矛盾的缓和还具有另一个特征。当限制实际消费或减少消费时，使用的方法从来都不是降低名义工资。领导人更愿意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提高消费者价格，其中一个原因便是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仍然是个位数——比公开降低名义工资更容易从政治上加以控制。

通货膨胀既可能与人均实际消费水平的停滞共存，也可能与后者的微弱增长共存。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必然会造成实际收入的再分配：部分人口能够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然而有些人（像领取养老金者、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领取固定工资的雇员）却经历了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社会矛盾被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所激化。[①]

本章所涉及的宏观矛盾是体制特征的直接后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由改革所带来的。在现行体制之内，没有什么神奇的药方能够消除矛盾所产生的根源。每一种办法（如减少投资、筹措信贷资金等等）都只起到延缓的作用。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在日后将以更具破坏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那些在改革体制下管理国家的人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些相互作用的影响。主要问题不是缺乏专业知识，[②]而是意识形态的桎梏。一个人越是坚定地信仰社会主义体制，他/她就越难发现日益恶化的问题正是体制本身所带来的。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在改革过程之初承诺改善生活，可在看到困难后，又再三延迟兑现承诺的最后期限。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认定他们打心眼里就是想欺骗人民。他们确实真诚地相信（也许信念也在逐步减弱）问题只是暂时的。[③]

公众的感觉越来越差，但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状况本身很糟糕，对领导人承诺梦想的破灭让人们更加沮丧。每个不能兑现的承诺都对信心造成了破坏。宏观矛盾的加剧、生活水平的停滞或下降，以及领导人威信的丧失都

---

① 有关改革社会主义下的社会紧张和不平等的分析，可参见 T. Zaslavskaya（1990），特别是 pp. 86 - 153 和 Z. Ferge（1988）。

② 在特定时期和某些国家里也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官方教条培养起来的经济领导人无法理解金融过程和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宏观联系，而且许多问题都是他们自己行动的结果。

③ 戈尔巴乔夫的新年讲话里有这样一段话："经济改革还未能全面展开，已经取得的成绩不能令我们满意。仍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短缺现象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困难……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任重而道远，还要为使经济状况好转而继续努力。这些改变终将到来。"（《真理报》，1989 年 1 月 1 日）。

为革命性变革奠定了基础。

最后，当掌权者对自己是否具有解决众多问题的能力丧失信心时，革命将不可避免。另一种可能爆发革命的情况是，群众日益不满并且决定放弃这一体制，而此时领导人已经无力抵抗。

## 23.9 预演：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宏观矛盾

一旦后社会主义体制取代了经历了改革的社会主义体制，它同时也就继承了本章所描述的宏观矛盾。国有部门面临着工资上涨的压力；投资领域状况紧张；政府预算出现赤字；对信贷的需求超出供给；存在着货币供给过度增长的巨大压力；通货膨胀还在持续，还有可能加速；短缺在许多领域依然非常严重；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平衡情况很不理想；债务负担沉重而且还在不断上升。

在体制革命后的数月中，政治形势的好转让公众为之欣喜，但他们的经济状况却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突变。过去的时代已经使公众极为疲倦，很难再相信新的承诺，即使这些承诺是在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做出的。

新的民主体制继承了从前体制的宏观矛盾，并且从一开始它就面临着体制本身无法解决的两难境地。是应该采取一系列的局部变革并延续很长一段时期？还是应该坚决地采取一揽子措施，全面实现持久的宏观稳定，以便恢复工资并控制秩序、消灭预算赤字、限制信贷供给、放开价格并同时引入可兑换机制？

如果在革命之前没有经历改革，并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存活到了最后一刻，那么在体制变化的出发点，本章所讨论的宏观矛盾有些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以不太强烈的形式存在。就像前面看到的那样，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通过镇压和官僚控制比半放松、半镇压的改革体制更好地抵制了上述大部分趋势。必须认真对待由齐奥塞斯库、济可夫和胡萨克等前政府使用强硬办法压制住的宏观矛盾，这些矛盾很可能在革命结束后在这些国家里逐步显现。[①] 正是因

① 在此没有提到东德。虽然前提环境是相似的（从经典社会主义跳跃到后社会主义阶段），但它所面临的转轨环境存在于德国统一的整体框架内，这是独一无二的。

为政府管理职能将掌握在民主政府的手中,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抵制那些危险趋势的出现,因为国有部门仍然占据着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些国家,同样可能出现工资上涨压力、加速的通货膨胀以及不断上升的外债负担。

还可以预期会有大量的失业,社会对此并没有做好准备。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雇员认为充分就业或者接近充分就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旦出现问题,对他们而言,那将是一个极大的冲击,无论在财政上还是在心理上。此外,后社会主义社会缺乏处理失业的制度和机构,例如,失业人员登记、向他们支付救济金、对失业人员进行再培训或者引导他们找到新工作。

在此只是希望引起人们对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危险的注意,而且我们所关注的只是作为前政权遗产而出现在后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宏观经济矛盾。至于新体制如何去克服这些矛盾,则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

# 第二十四章　结束语

前面的章节已经依次介绍了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趋势，现在对这些趋势之间的联系做一些评论。我们将从不同角度对改革过程进行总结和评价，最后将以展望取代旧体制的转型来结束这本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书。

## 24.1　变迁的深度、彻底程度以及主要因果关系

要解释接下来的内容，希望读者还能记得图15.1（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主要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和**16.2**部分中有关偏离经典社会主义过程的两种标准：变迁的深度和彻底程度。利用这种分析工具，表24.1对前面章节所讨论过的主要趋势进行了探讨。

**表24.1　变迁的深度和彻底程度**

| 趋势 | 深度（图15.1中的排序） | 彻底程度 |
|---|---|---|
| 0.“完美”控制 | 第三层次：协调 | 没有什么变化 |
| 1.政治改革 | 第一层次：权力和意识形态 | 适度或温和 |
| 2.私营部门复兴 | 第二层次：所有权 | 彻底的，但只在狭窄的领域发生 |
| 3.自立经营 | 第三、四层次：协调和行为 | 温和 |
| 4.市场社会主义 | 第三、四层次：协调和行为 | 适度或温和 |
| 5.价格改革 | 第三、四层次：协调和行为 | 适度 |
| 6.宏观矛盾 | 第四、五层次：行为和持续的经济现象 | 温和 |

"完美"控制被列在顶端,编号为趋势0。在深度方面,它指向因果链条的中部,即对协调和控制进行修正,但即使这样,它也没有改变经典社会主义初期的主要特征。因此,即便这一趋势在官方宣传中被认为是改革,其效果也只是为了保存现存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

在此之后,表中接下来列出了真正的改革过程,编号为1—6,然后依据改革的深度对它们进行了排序。

趋势1即政治改革影响了因果链条的深层次:经典社会主义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不仅仅就其本身而言非常重要,而且是所有其他领域发生任何变化的必要条件。只要共产党当权,那么只有政党自身发起改变或者至少容忍改变,体制才能逐步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于是政治改革或是将上述改变纳入到体制内的官方意识形态中,或是做出意识形态上的让步并忽略与其思想观念发生冲突的现象。

改革过程在权力结构上的变化很小:自由化并非连贯一致,而且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当旧的传统结构的主要特征即共产党的权力继续存在时,其他领域就不可能出现全面和始终如一的彻底转型。虽然权力垄断被动摇,而且官方意识形态也开始淡化,但它们依然足够强大,可以阻止体制内其他要素发生任何连贯一致的全面变革。

趋势2即私营部门的复兴造成了第二层次的彻底剧变:尽管只是发生在狭窄的领域,但所有权关系(第二层次)的变化是与经济改革相关的诸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带来了真正的而不是假的、编造的变迁。

在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从事私人活动的领域里,出现了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不同的要素,它无法与体制内的其他部分完全融合。虽然当下的政治体制已经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自由得多,但还是无法也不愿容忍私营部门的自由发展,并且对其运作和扩张施加严格限制。

趋势3即自立经营也给所有权关系(第二层次)带来了变化,但远不如私营部门复活所导致的变化彻底。在第三层次,自立经营的推行引起了协调形式的较大变化,并导致部分放弃了中央的集权化控制。

它的起源(由中央官僚指令强制推行)及其日常运营都使它与权力结构紧密相连,这一点与经典社会主义版本差别不大。

趋势4得益于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它导致了第三、四层次上的重大改变。

事实上，这一改革"蓝图"既没有质疑第一层次的主要特征即共产党的权力垄断，也没有质疑第二层次的主要特征即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在现行政治结构中将公有制与市场协调联系起来，全部或部分地取消指令经济，提高公有企业的自主权。

市场社会主义蓝图毕竟还是实现了，这应该归功于人们不情愿地放弃了官方意识形态中经典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关键思想：计划、官僚协调优于市场协调并且可以替代它。这还要归功于官僚们被迫抛弃了它最得心应手的武器（即指令），而且等级制度中的高层官僚开始允许低层官员在某些领域拥有决策权。

但在此有必要进行一些补充性的说明。官方意识形态始终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政府的高层官员既不能也不愿放弃他们对公有部门的统治。在现行政治结构下，不可能逃脱官僚的微观控制、对企业行为持续不断的干涉，而且相对于纵向从属关系而言，市场的横向依赖关系完全处于劣势。只要第一、二层次的特征依然基本保持不变，就不可能在第三、四层次中发生彻底的变化。市场社会主义的蓝图不可能连贯一致地向前推进，它的实施方式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

趋势 5 即一系列局部的价格改革带来了第三、四层次的变化。趋势 1—4 的综合影响推进了价格改革的实施。这里我不想对此事无巨细地加以描述，只谈一些典型的因果关系。意识形态的变化导致一些影响价格的"父爱主义补贴"被废除，私营部门复活也使得某些经济部门中出现了市场价格。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激起的变化使企业在价格制定中发挥了更大作用，它们进一步要求形成市场出清价格。

和趋势 4 一样，这里也需要做一些补充性说明。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很多东西还是没有改变，这意味着仍然保留着诸如定价、税收等旧的非市场原则。政府不想放弃在广泛领域进行中央定价的政策，也不愿放弃由政府制定大部分价格的权力。价格机关和企业在价格上的纵向谈判变成了公有部门中经常发生的事，而私营部门的运行（这样形成的市场价格才是价格的自然形式）仍然局限于狭窄领域。

即便是局部的政治自由化，往往也能够让公众表达他们的不满。政治

气候使得领导层不得不下决心推行价格的全面自由化,或者至少是开始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如果当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管理价格的制定)。这已经充分说明,为什么这一趋势仅仅限于一系列局部的、有通货膨胀倾向的价格改革措施,而不是迈向一个理性的市场出清价格体系。

趋势6即宏观矛盾是伴随着改革过程的其他特征一起出现的,它发生在第四、五层次上即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和长期经济现象。有些宏观矛盾(如通货膨胀、负债)也出现在其他体制下。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改革过程通过特定渠道加剧了某些矛盾:如工资压力、投资失控、预算赤字、通货膨胀、持续短缺和负债。把它转化为图15.1的语言之后,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一、二、三层次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改革过程中第四、五层次中的主要特征。

这7种趋势的概括研究增强了关于[→15.5]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推论,即主要的因果链条是从第一层次推进到第五层次,也就是从权力和意识形态推导出经济现象。从根本上说,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是决定性的。这为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基因图谱"[→15.3],而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在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为了尽可能维持传统的所有权形式,可能会强烈抵制第一层次的彻底变化,有时甚至会竭尽全力加以抵制。只有当上述"基因图谱"被修正时,深入、彻底和持续的变化才会在整个有机组织内发生。对第一层次状态的理解将为把握其他层次的问题,以及揭示改革过程的进步和局限提供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从上述讨论也可以看出所有权在解释改革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尽管是第二位的)。

在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进行研究即将进入尾声时,人们不免要问:如何能证实第15章中所阐述的因果解释?回答是:主要的检验标准是体制的变化是否遵循了上述理论所做出的预测。即使改革过程和后社会主义转型还远远没有结束(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但根据迄今为止的观测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历史经验已经证实了本书有关因果关系主要链条的理论陈述。

虽然因果关系的主要链条从第一层次向第五层次依次进行,亦即从较深的原因推进到较浅的原因,但其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反馈、反应以及相互作用的现象。下面仅挑选其中三个重要关系作为例证。

一个相互作用是改革趋势提高了个人、团体和组织在各方面的自主权。

这其中包括独立政治运动、社会团体、私人企业、自治地方机构、自主经营的企业、按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变得更独立的国有企业,等等。自治与“服从听指挥”同时并存,但由于改革自治的比重已大大提高,而且正是由于自治力量的不断壮大,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不断降低。在多民族国家里,民族独立运动逐步发展,势头越来越猛烈。一旦自治力量增长到一定程度,它就会进入自我繁殖过程,于是政府赖以随意驱使每个组织和个人的缰绳必将从它的手中滑落。

产生反应的一个例子是宏观矛盾为私营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由于能够获得巨额利润,私人企业家进入了公有部门不能满足需求的领域(至少不再受到干预)以解决短缺问题。

第三个尤为重要的反应是:通货膨胀、短缺和生活水平的停滞或下降增加了公众不满。经济紧张导致了政治紧张,这完全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活动。最终,经济危机可能导致政治危机,从而启动彻底的和革命性的变革。

就总体而言,尽管这些关系非常重要,但它们并没有构成因果关系的主要链条,并且只能称之为对主要因果影响的反应或者相互作用。在下一部分中会谈到一些反作用。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趋势 1—6 的排列顺序(这在有关章节的安排和总结表 24.1 中已经有所体现)与因果关系的逻辑结构密切相关。改革事件发生的真正历史顺序与上述排列顺序完全不同。就像前面所强调的[→16.4],研究改革国家历史进程时,几乎没有规律性可言。举例来说,在中国,影响了好几亿农民的所有制改革就发生在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运动的最初期,但在那个时期,政治领域几乎没有变革。而在苏联,政治领域的巨变已经持续好些年,但所有制关系的改革却依然是走走停停。

还是可以发现一个规律,而且这一规律可以从上述一连串思想推导出来。在执政党的领导层下决心偏离经典社会主义道路(或至少听任这种状况的发生)之前,其思想必定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无论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从哪里开始,其出发点都会落在第一层次上,并且受到自上面的措施和自下面的自发行为或压力的综合影响。如果执政党顽拒绝所有变化,那么结果或是它成功地镇压了所有指向变革的努力(例如古巴或北

朝鲜在1990年的情形),或是爆发真正的革命,从而完全跳过渐进改革阶段(例如198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罗马尼亚)。[1]

## 24.2 缺乏连贯性的改革趋向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15.2],各种要素之间具有一种凝合力,相互补充而又彼此吸引。至少作为纯粹的理论原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就像是一座所有砖块都紧密粘合在一起的建筑物。

改革破坏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环环相扣的特征,而且没有能力建立新的秩序来替代旧体制。旧的规律只是部分适用,而且新的结构性规律还未能凝合在一起。一切都在流动着,或者说只有一点凝胶。社会充满了没有凝合力的各类要素:它们相互排斥而非彼此吸引。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介绍过许多这类内部矛盾。这里我们会有所重复,以此作为在改革阶段出现矛盾和缺乏连贯性的实际例证。我们将研究几对现象,看一看每对现象中两项内容相互吻合的程度,以及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凝合力(或出现了什么冲突)。每对现象中的第一项内容均按照图15.1中逻辑顺序进行排序。

当体制对事件的控制逐步减弱时,对思想的控制也减轻了。在对僵化教条进行改革的第一个浪潮期间,党仍然可以自圆其说地提到马克思和列宁:他们并非僵化的教条主义者,他们也反对其他人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奉为神谕。但问题是,很难再命令人们停止觉醒。过去真诚信仰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并且已经成为"训练有素的马列主义者"(党的术语)的官员开始怀疑斯大林犯了错误,或是在他的一两本书里,或是在他提出的某些主张里。于是官员们开始认为斯大林错误地运用了列宁的正确教导,甚至可能是以一种罪恶的方式运用了列宁的思想。在随后的浪潮中,同一批官员们开始怀疑列宁主义的基础。

自由化趋势的一个表现形式是它鼓励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和科学研究人员独自思考并且客观诚实地分析现实。但这会将人们引向何方呢?他

---

①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权力集团对改革的顽固抵制最终被来自苏联领导的明确信息所打破。戈尔巴乔夫告诉他们,不能再指望苏联坦克帮助他们镇压任何起义;以前那种对东欧的军事干涉不会再出现。

们开始追寻探讨所有有害现象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认知的过程是漫长的,第一个阶段从个人身上找出错误的根源。此时,斯大林和全国形形色色的小斯大林们被认作是坏蛋,他们应该承担全部罪责。下一个阶段是:问题不能只是归咎于个人,也要归咎于特定时期所采取的错误政治路线。再后来,即便这样也不能提供充足的解释。社会主义是好的体制,但迄今为止它所应用的特定版本(特定“模式”)是错误的。放弃的并不应该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社会主义”(南斯拉夫20世纪50年代的官方观点)、旧的“指令机制”(匈牙利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官方态度)或者“行政命令体制”(苏联20世纪80年代末的官方看法)。“模式变革”而不是体制改变是必不可少的。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意识形态有着相当严密的逻辑体系,它依赖于没有丝毫挑战余地的公理,并且由于是公理,也无须证明。举例说,其中一个公理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出现的任何负面现象都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或者特定个人的错误,或者阶级敌人蓄意破坏的结果,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体制的问题。另一个类似公理是党的领导作用(即党的垄断权力)。党的路线不管发生什么变化,都没有理由去怀疑上述公理的正确性。事实是:愿意改正自身错误才是党英明的标志。但是当进行改革时,却容许怀疑公理,而恰恰导致经典社会主义精心设计的逻辑结构受到挑战。

任何旧原则和旧道德的原理都不可能永远不变。如果意识形态没有出现混乱,那么一个信仰公有制的人怎么可能容忍私营部门甚至鼓励其发展?怎么会一边对计划大肆吹捧同时又决定逐步彻底抛弃它?历来竭力贬低市场却又公开声称要代表市场的利益?从前人们被规劝要做出牺牲和遵守纪律,而在改革过程中,物质主义、“没有报酬连肌肉都懒得动一下”的习惯、享乐主义和接纳“消费社会”的价值观越来越成为普遍接受的东西。公开立誓的革命者所信仰的清教徒主义和禁欲主义此时完全被当成一个奇特的时代错误。

另外两对缺乏连贯性的现象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过:即官僚和私营部门的共生现象[→19.5]以及政党政治权力、国有制与市场社会主义市场协调机制之间的关系[→21.6]。这里仅仅需要指出这两对关系,以及它们在引发改革过程的内部矛盾时起到的重要作用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研究改革国家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任何内部矛盾都不可能被彻底清除,也无法逐步得到解决。与此相反,每对矛盾又产生了新的冲突。每个改革国家的历史都充斥临时抱佛脚的急躁情绪:创造新事物的试验在进行,但总有某些领域会出现倒退的现象(或是向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复归),当然它再也无法完全恢复到最初的形式了。由于问题不断增多,领导层总是试图通过否认问题的存在来解决问题,或是在任何其他方法都行不通的情况下,就用强制的方式来解决。

总之,只要还保留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它本身就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和能量。但经历过改革的体制却天生不稳定,在有的地方它只能存在很短的时间,而在某些特定环境下也会允许它存在更长一段时间。

## 24.3 改革与公众的情绪

对于某些社会变迁而言,我们能够轻易地确认社会中的哪些群体支持改革,以及哪些群体反对改革。而在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似乎不可能做出一般性的明确判断:谁是改革的拥护者,而谁又是它的敌人。

人们很容易接受以下的老套说法:所有的人都支持改革,其中包括政府机构中的开明官员,当然也存在来自党内的保守派成员、秘密警察和军队领导的抵制。但事实上情况要复杂得多。

在南斯拉夫,长期存在的凝聚力是民族感情,它赞成与苏联断绝关系,包括不采纳苏联的社会模式。在匈牙利,血腥镇压1956年革命导致了广泛的社会公识:大部分人们要求和平和安宁、“不关心政治”的生活以及生活水平的切实改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满足于小范围的政治让步,人们对官方容忍从第二类经济中赚取收入的态度也表示支持。但即使在这两个改革平衡相对而言持续最久的国家里,公众对变革的态度也是处于矛盾之中[→18.7]。这也适用于其他改革国家。始终坚决反对任何变化的社会阶层相当有限,剩下的人常常是既欢喜又悲伤,既有信心又感到不安。

在进行改革之后,在一般情况下,对不同意见采取更为温和的形式。人们批判和抗议的领域有所拓宽,但也有人不满足于这些自由。此时,他们要

求言论与社团的更大自由。

大多数人欣喜地看到他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而且权力机构也不再随意干涉他们的生活。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担心失去父爱主义所提供的保护。企业领导确实害怕真正的市场竞争和买方市场体制;工人们也担心失去有保障的工作,以及充分就业的保证从此结束。

价格体系以及财政再分配体制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纯粹以经济分析为基础来理解,任何人都会认为必须恢复正常的价格秩序。但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混乱的价格及税收体系。大多数人都是食品、其他大众消费物品以及国有住宅补贴的受益者,如果停止上述补贴,这些受益人群将会感到他们是输家。

在进行了局部分权的地方,自主权得到提高的人们会感到高兴。但这意味着减少了曾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人的权力,而失去权力的人就未必开心。

私营部门的发展对活跃其中的人有利,但即便如此,当这些人开始从事经营后,也会抱怨各种各样的官方限制、税收负担以及其他缺陷。购买私营部门产品的人对供给有所改善的情形自然觉得满意,但同时也会埋怨价格太高。

无须再继续罗列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我们就能够看到:由于关于改革过程的思想本身就存在内在矛盾,也无怪乎群众未能在这些思想背后站成一列。群众运动可能在某个国家的某个时期爆发以支持特定的改革观点。在波兰、南斯拉夫和苏联,爆发了抗议食品短缺和价格上涨的罢工运动。虽然罢工运动不是什么反改革的示威活动,但也不能说它们有精心的策划,用以支持改革或者一些具体的局部改革计划。真正把人们调动起来的是对先前承诺的失望和对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强烈不满。

罢工以激烈的方式表达了一些不太容易凸显出来而又广泛存在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最初的改革热情逐渐消退。虽然改革赢得了新的支持者,即那些已经意识到旧状态再也无法维持的原保守派官员,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幻想破灭,或者甚至感到被愚弄了。在20世纪80年代末改革的最后阶段,情形就是如此。那时波兰和匈牙利已经到达转向革命的关口,苏联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苦痛和觉醒越来越普遍地蔓延开来,而且政治紧张程度在1989—1990年间也不断增长。不管改革可能给日

常生活带来多少好处,人们已经不那么相信改革了。他们更强烈地感到改革承诺与他们自身不断上升的期望之间有了越来越大的鸿沟。

## 24.4 未来:旧体制的遗产与新体制的建立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实证分析,它没有采用规范的方法来论述后社会主义体制;也不打算向正在进行转轨的国家提出实际政策建议。[①] 作者仅仅根据本书的论证提出了一些大胆的预测。

社会生活中的确出现了革命性转型。在某些国家,重要的政治事件浓缩在相当短的时期里,而且几乎是以突然爆炸的方式发生:持续几天或几周的群众示威活动,共产党政府在一片动荡之后下台,然后是包括反对派在内的新政府取而代之。这正是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发生的情形。但政府的更替并不是体制的变迁,而仅仅是后者的政治先决条件之一。体制的变迁是看起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期的历史过程。它的出发点是新体制从旧体制那里接受的遗产。在第17—23章中,每章的结尾处都有一节文字分别介绍了旧体制遗产的不同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些遗产进行一下总结和概括(当然不可能毫无遗漏)。

新体制接受了状况不佳的**国民财富**,其中包括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对国民财富的扭曲、改革未能或者没有尝试去改善的部分,特别是落后的技术水平,已经严重老化并且保养不善的机器库存和建筑物。商业网络、运输、住宅和医疗机构等方面的情况更加糟糕。处理善后工作的任务总是被长时间拖延,如今每个人都认定进一步拖延将带来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从过去到现在都在不断损害自然环境,如果再不考虑环境保护问题,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与物质财富贫乏相伴的还有从旧体制那里继承下来的匮乏的**人力资本**。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许多领域的劳动专业技术已经极为落后,而且劳动纪律松散,管理者和白领工人都不熟悉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替代他们的年轻一代,其技能水平也无法令人乐观,因为数十年来在教育方面同

① 有关政策建议的文献请参见附录。

样存在严重缺陷。即便是整个经济以合理的速度发展,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来完成被拖延和忽略的各项任务。事实上,新的政权通常是在停滞或者衰退的危急状况下开始掌权的,因此,在经济中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必然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

新体制继承了严重的**宏观矛盾**,尤其是在金融领域:通货膨胀、短缺、过度的需求以及花不出去的货币存量。不少国家都存在着不断累积的巨额外债负担。有些矛盾与体制有关——继承了社会主义政治结构与所有制关系——而且这些矛盾很可能由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而加剧。从旧体制继承而来的宏观矛盾很可能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政权是否打算彻底实施宏观稳定计划,以及是否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

新体制继承了旧的**组织网络**:国家机构的特定结构和科层(官僚)等级体制以及一整套的法律规章等等。所有这些机构和制度都经历了数十年的渐进演变过程,是旧体制根据其需要从可能的形式中精挑细选并逐步发展起来的。新政权不想运用列宁主义的行为模式:通过无情摧毁旧世界来建立一个新世界,新政府致力于进行和平稳妥的转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旧机构很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阻碍新体制的发展。新机构的成长仍需要时间。

新体制也继承了旧的**所有制关系**: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有部门,一部分自主经营机构,以及半公开、半隐蔽的弱小的私营部门。存在很多经济私有化方案;有些建议提出了加速解决方案。但不管采纳哪个方案,为资本主义提供广泛社会基础的新所有者和企业家阶层不可能在几天或几周内就出现。

新体制接收了旧体制的**专业人士**。由于本书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讨论问题,因此这里的有关评论将仅限于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政治转变必定对许多个人产生影响。与旧政权联系紧密的那些人在职权再分配中的机遇会比较差,而与当前新当权的政治力量关系紧密的人则会有较好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在进行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国家里已经不存在政治迫害。从前身居要职的人要么继续在位,要么就转向其他领域(例如政府官员可能成为

私营企业里拿高薪水的管理者)。[①] 边境的开放鼓励许多人移民国外或者在国外就职,从而加大了对留在国内的专家人员的需求。专家的职位分配稍微有了些变化,但原来的人基本继续留任。这提高了旧政权和新政权之间的连续性,但与此同时,旧体制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和规范也就有更大的机会继续生存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后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将在长期内继续保持一种奇特的**双轨体制**。[②] 这是许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要素同时并存而又彼此缠绕的一种"混合"体制。[③] 如果实际发展过程的确像取得政权的党和运动所宣称的那样,资本主义将取得普遍优势。这完全可能发生,但即便如此,社会主义秩序的遗产仍将在很长时间内继续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双轨制特征将成为各种冲突的来源。[④] 这里只提一个可能出问题的领域——居民所接受和尊重的道德价值观可能发生的转型,不过我们只想将讨论限于几个问题。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渴望什么? 国家应该让他们最终获得安宁,不要再被成千上万的条例和规章所侵犯,不再被各种义务和职责所限制? 或者他们要求一个积极的政府,采取明智措施,照顾被社会遗弃的人,保护环境并且控制价格的任意上涨? 还是他们接受甚至欢迎所有人都可以尽其所能地去赚钱,亦或他们痛恨高收入并强烈要求对此课以重税?

如果政治领域能够平稳发展,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都能学会运用适度和微调的方法去干预社会和经济的运行方式,而不是使它们乱成一团并剥夺它们固有的激励作用。但即使能够实现上述情形,人们的态度仍然是矛盾

---

① 经常有人对旧的掌权者(包括那些名字上刻有原罪的人)提出抗议,这些人往往在新的环境下也获得拥有高薪的显赫工作,从而获得了"自我救赎"。在某些特定领域,抗议行动的确抢先一步制止了这类所谓"救赎勾当",但这类现象仍然相当普遍。

② 在以前的书里,我就曾对这一状况做出过预言。P. Murrell(1990a,1990b)也依据完全不同的理论思路,独立对这一状况有过类似的预言,甚至在两部作品中,作者都使用了大致相同的措辞。

③ 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过程中,社会主义和私营部门共存[→19.5]几乎是上述现象的前奏,但在那时,私营部门处于从属和被许可的地位。可以预期,在后社会主义体制下权力关系会发生变化,私营部门迟早会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并且重新获得国家权力的幕后支持。

④ 在前面的章节里,各章最后都论述后社会主义时,也都在不同地方指出导致冲突的可能来源。

的:他们希望政府进行明智的干预,但他们对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仍抱有怀疑态度,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消除人们的这种怀疑。

可以预期,许多居民坚信团结、正直、同情弱者以及社会理性,正是这些把无数诚实的人吸引到了社会主义思想领域。但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许多人常常会旧病复发,重新回到早已声誉尽失的官僚统治、国家社会主义、父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很难预测价值观体系变革与清晰起来的速度有多快,或者说其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波折。除了公众情绪以外,我们也无法对所有其他社会特征的深刻转型做出时间上的预测。如果转轨的参与者,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职的人能够充分认识到转轨从哪里开始,以及给新政权留下深刻痕迹的旧体制的特性是什么,那么转轨过程肯定会变得更容易一些。正是这个想法促使我写一本分析社会主义体制的书,提到这一点也是想让读者放心:从头到尾读完本书终有所值。

# References
# 参考文献

Abraham, Katharine G., and James L. Medoff. 1982. "Unemployment, Unsatisfied Demand for Labor, and Compensation Growth, 1956–80," in *Workers, Jobs and Inflation*, edited by Martin Neil Bail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p. 49–88.
Adam, Jan. 1984. *Employment and Wage Policies in Poland, Czechoslovakia and Hungary since 1950*. London: Macmillan.
——. 1989.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since the 1960s*. London: Macmillan.
——, ed. 1982. *Employment Polici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Adirim, Itzchak. 1989. "A Note on the Current Level, Pattern and Trends of Unemployment in the USSR," *Soviet Studies*, July, *41* (3), pp. 449–61.
Afanas'ev, M. P. 1990. "János Kornai: argumenty defitsita" (János Kornai: The arguments of the "Economics of shortage"). Moscow: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SSR. Manuscript.
Aganbegian, Abel G. 1989. *Inside Perestroik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Alchian, Armen A. 1950.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 (3), pp. 211–21.
——. 1965. "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Il Politico, 30* (4), pp. 816–29.
——. 1974. "Foreword," in *Th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edited by Erik G. Furubotn and Svetozar Pejovich. 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pp. xiii–xv.
Alchian, Armen A., and Harold Demsetz. 1972.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62* (5), pp. 777–95.
Alessandrini, Sergio, and Bruno Dallago, eds. 1987. *The Unofficial Economy. Consequences and Perspectives in Different Economic Systems*. Aldershot, England: Dartmouth, and Brookfield, Vt.: Gower.
Alexeev, Michael. 1986. "Factors Influencing Distribution of Housing in the USSR," *Berkeley-Duke Occasional Papers on the Second Economy in the USSR*, December, no. 8.
——. 1987. "Microeconomic Modeling of Parallel Markets: The Case of Agricultural Goods in the USS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December, *11* (4), pp. 543–57.
——. 1988a. "Markets vs. Rationing: The Case of Soviet Housing,"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0* (3), pp. 414–20.
——. 1988b. "The Effect of Housing Allocation on Social Inequality: A Sovie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une, *12* (2), pp. 228–34.
——. 1990. "Retail Price Reform in a Soviet-Type Economy: Are Soviet Reform Economists on a Right Track?" *Berkeley-Duke Occasional Papers on the Second Economy in the USSR*, February, no. 19.

Alton, Thad P. 1977. "Comparative Structure and Growth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Eastern Europe," in *East European Economies Post Helsinki.*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199-266.

——. 1981. "Produc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Eastern Europe: Performanc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East European Assessment, Part 2.*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348-408.

Alton, Thad P., et al. 1979. "Official and Alternativ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in Eastern Europe, Selected Years, 1960-78," *Working Papers,* L. 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search, Inc., New York, September.

——. 1984. "Money Income of the Population and Standard of Living in Eastern Europe, 1970-1983," *Occasional Paper,* no. 83, Research Project on National Income in East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L. 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search.

Amalrik, Andrei. 1970. *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Amann, Ronald, Julian M. Cooper, and Robert W. Davies, eds. 1977. *The Technological Level of Soviet Indust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mann, Ronald, and Julian M. Cooper, eds. 1982.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6. *Technical Progress and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Andorka, Rudolf. 1988. "A magyarországi társadalmi mobilitás nemzetközi összehasonlítása: A férfiak nemzedékek közötti társadalmi mobilitása" (Hungarian social mobility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Male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Szociológia* (3), pp. 221-40.

Antal, László. 1979. "Development—with Some Digression. The Hungarian Economic Mechanism in the Seventies," *Acta Oeconomica, 23* (3-4), pp. 257-73.

——. 1985. *Gazdaságirányítási és pénzügyi rendszerünk a reform útján* (The Hungarian system of economic control and finance on the way of reform).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Arendt, Hannah. 1951.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Arrow, Kenneth J. 1964. "Control in Large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Science,* April, *10* (3), pp. 397-408.

Árvay, János. 1973. *Nemzeti termelés, nemzeti jövedelem, nemzeti vagyon* (National production, national income, and national wealth).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Ash, Timothy G. 1990. *The Magic Lantern: The Revolution of 19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 New York: Random House.

Åslund, Anders. 1985. *Private Enterprise in Eastern Europe. The Non-Agricultural Private Sector in Poland and the GDR, 1945-83.* Oxford: Macmillan, in association with St. Antony's College.

——. 1989. *Gorbachev's Struggle for Economic Reform. The Soviet Reform Process, 1985-88.*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0. "How Small Is Soviet National Income?" in *The Impoverished Superpower: Perestroika and the Soviet Military Burden,* edited by Henry S. Rowen and Charles Wolf.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pp. 13–62.

——. 1991. "The Soviet Economic Crisis: Causes and Dimensions," *Working Paper,* no. 16. Stockholm: Stockholm Institute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Economics.

Augusztinovics, Mária. 1965. "A Model of Money Circulation," *Economics of Planning, 5* (3), pp. 44–57.

Ausch, Sándor. 1972.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MEA Cooperation.*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Azicri, Max. 1988. *Cub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Balassa, Béla. 1987.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11* (3), pp. 410–26.

Balázs, Katalin, and Mihály Laki. 1991. "A pénzben mért magángazdaság súlya a magyar háztartások bevételeiben és kiadásaiban" (The share of private economy in monetary terms in Hungarian household income and expenditure), *Közgazdasági Szemle,* May, *38* (5), pp. 500–22.

Balcerowicz, Leszek. 1988. "Polish Economic Reform, 1981–1988: An Overview," in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Europea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pp. 42–51.

Baló, Görgy, and Iván Lipovecz, eds. 1987. *Tények könyve, 1988. Magyar és nemzetközi almanach* (The book of facts, 1988. Hungarian and international almanac). Budapest: Computerworld Informatika Kft and Móra Ferenc Ifjúsági Könyvkiadó.

Banerjee, Abhijit, and Michael Spagat. 1987. "Productivity Paralysis and the Complexity Problem: Why Do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Become Prematurely Gray?" in M. Spagat, "Supply Disruption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p. 2–20.

Bannasch, Hans-Gerd. 1990. "The Role of Small Firms in East Germany,"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December, *2* (4), pp. 307–11.

Barone, Enrico. [1908] 1935. "The Ministry of Production in the Collectivist State," in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edited by Friedrich A. Hayek.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p. 245–90.

Barro, Robert J., and Herschel I. Grossman. 1971. "A General Disequilibrium Model of Income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61* (1), pp. 82–93.

——. 1974. "Suppressed Inflation and the Supply Multiplier,"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January, *41* (1), pp. 87–104.

Bársony, Jenő. 1982. "Tibor Liska's Concept of Socialist Entrepreneurship," *Acta Oeconomica, 28* (3–4), pp. 422–55.

Bauer, Tamás. 1978, "Investment Cycles in Planned Economies," *Acta Oeconomica, 21* (3), pp. 243–60.

——. 1981. *Tervgazdaság, beruházás, ciklusok* (Planned economy, investment, cycle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1983. "The Hungarian Alternative to Soviet-Type Plann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7* (3), pp. 304–16.

——. 1987. "Reforming or Perfectioning the Economic Mechanism,"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March, *31* (1–2), pp. 132–38.

Bek, Aleksandr. 1971. *Novoe naznachenie* (New appointment). Frankfurt am Main: Possev.

Belyó, Pál, and Béla Drexler. 1985. "A nem szervezett (elsősorban illegális) keretek között végzett szolgáltatások" (Services supplied within nonorganized, mainly illegal, framework). Budapest: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Manuscript.

Benassy, Jean-Pascal. 1982. *The Economics of Market Disequilibriu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Ben-Ner, Egon Neuberger. 1990. "The Feasibility of Planned Market Systems: The Yugoslav Visible Hand and Negotiated Plann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December, *14* (4), pp. 768–90.

Berend, Iván T. 1979. *A szocialista gazdaság fejlődése Magyarországon, 1945–1975*.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in Hungary, 1945–1975). Budapest: Kossuth.

——. 1990. *The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resford, Melanie. 1988. *Vietnam: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Bergson, Abram. 1944. *The Structure of Soviet Wag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48. "Socialist Economics," in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 edited by Howard S. Ellis. Homewood, Ill.: Irwin, pp. 1412–48.

——. 1961. *The Real National Income of Soviet Russia since 192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7. "Market Socialism Revisite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75* (5), pp. 655–72.

——. 1974. *Soviet Post-War Economic Development*. Stockholm: Almquist and Wicksell.

——. 1978a. *Productivity and the Social System: The USSR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8b. "Managerial Risks and Rewards in Public Enterpris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2* (3), pp. 211–25.

——. 1978c. "The Soviet Economic Slowdown," *Challenge*, January/February, *20* (6), pp. 22–27.

——. 1979. "Notes on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in Soviet Postwar Growt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une, *3* (2), pp. 116–26.

——1983.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Soviet Economy: Toward the Year 2000*, edited by Abram Bergson and Herbert S. Levin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pp. 34–78.

——. 1984."Income Inequality under Soviet Soci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September, *22* (3), pp. 1052–99.

——. 1987. "Comparative Productivity: The USS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Wes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77* (3), pp. 342–57.

Bergson, Abram, and Simon Kuznets, eds. 1963. *Economic Trends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rle, Adolf A., and Gardiner C. Means. [1932] 1968.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Berlin, Isaiah. 1969.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I.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18-72.

Berliner, Joseph S. 1957. *Factory and Manager in the USS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6. *The Innovation Decision in Soviet Industry*. Cambridge: MIT Press.

Bettelheim, Charles. 1987. "Les grands cycles de l'économie cubaine, 1959-1985," in *Régulation, cycles et crises dans les économies socialistes*, edited by Bernard Chavance. Paris: Éditions de l'EHESS, pp. 241-62.

Beznosnikov, V. N. 1990. Participant in a conversation in *Individual'no-kooperativnyi sektor* (The individual cooperative sector), edited by Abel G. Aganbegian et al. Moscow: Ekonomika, p. 25.

Bialer, Seweryn. 1980. *Stalin's Successo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bó, István. [1945] 1986a. "A magyar demokrácia válsága" (The crisis of Hungarian democracy), in I. Bibó, *Válogatott tanulmányok. Második kötet, 1945-1949* (Selected studies. Second volume, 1945-1949). Budapest: Magvető, pp. 13-79.

——. [1946] 1986b. "A magyar demokrácia mérlege" (An evaluation of Hungarian democracy), in I. Bibó *Válogatott tanulmányok. Második kötet, 1945-1949* (Selected studies. Second volume, 1945-1949). Budapest: Magvető, pp. 119-83.

Birman, Igor. 1980.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USSR," *Soviet Studies*, January, *32* (1), pp. 84-105.

Birta, István. 1970. "A szocialista iparosítási politika néhány kérdése az első ötéves terv időszakában" (Selected issues of the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policy in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Párttörténeti Közlemények*, *16* (4), pp. 113-50.

Bleaney, Michael. 1988. *Do Socialist Economies Work? The Socialist and East European Experience*. Oxford an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Blejer, Mario I., and György Szapáry. 1990. "The Evolving Role of Tax Policy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14* (3), pp. 452-72.

Bogomolov, Oleg. 1987. "Skol'ko stoiat den'gi" (How much does money cost), *Literaturnaia Gazeta*, September 16 (38), p. 12.

Boiko, Tatiana M. 1990. "Nash potrebitel'skii rynok" (Our consumer market), *EKO*, April (4), pp. 84-86.

Bond, Daniel L., and Herbert S. Levine. 1983. "An Overview," in *The Soviet Economy: Toward the Year 2000*, edited by Abram Bergson and Herbert S. Levin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pp. 1-33.

Bonin, John P. 1976. "On the Design of Managerial Incentive Schemes in a Decentralized Planning Environ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66* (4), pp. 682-87.

Bonin, John P., and Louis Putterman. 1987. *Economics of Cooperation and the Labor-Managed Economy*. New York: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Bornstein, Morris. 1985. "Improving the Soviet Economic Mechanism," *Soviet Studies*, January, *37* (1), pp. 1–30.

———. 1987. "Soviet Price Policies," *Soviet Economy*, April/June, *3* (2), pp. 96–134.

Bossányi, Katalin. 1986. "Economy on the Way of Democratization," *Acta Oeconomica*, *37* (3–4), pp. 285–304.

Bottomore, Tom, ed. 1983.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wles, Paul, and Gordon White. 1989. "Contradictions in China's Financial Refor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s and Enterpris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December, *13* (4), pp. 481–95.

Boyd, Michael L. 1990. "Organizational Reform and Agricultural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Bulgarian Agriculture, 1960–198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March, *14* (1), pp. 70–87.

Brabant, Jozef M. van. 1980. *Socialist Economic Integration.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 Problems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ern Europe. A Handbook*.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 1990. "Socialist Economics: The Disequilibrium School and the Shortage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Spring, *4* (2), pp. 157–75.

Brada, Josef C. 1985. "Soviet Subsidization of Eastern Europe: The Primacy of Economics over Polit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March, *9* (4), pp. 21–39.

———. 1986. "The Variability of Crop Production in Private and Socialized Agriculture: Evidence from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3), pp. 545–63.

Brecht, Bertolt. 1967. *Gesammelte Werke* (Collected works). Vol. 10.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Bródy, András. 1956. "A hóvégi hajrá és gazdasági mechanizmusunk" (Rush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and our economic mechanism), *Közgazdasági Szemle*, July/August, *3* (7–8), pp. 870–83.

———. 1964. *Az ágazati kapcsolatok modellje. A felhasznált absztrakciók, azok korlátai és a számítások pontossága* (Input-output tables: The abstractions used, their limitations,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calculations).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 1969a. *Érték és ujratermelés. Kisérlet a marxi értékelmélet és újratermelési elmélet matematikai modelljének megfogalmazására*. (Value and reproduction. An attempt at formulating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Marxian theory of value and reproduction).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1969b.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n Hungary, 1924-65," in *Is the Business Cycle Obsolete?*, edited by Martin Bronfenbrenner. New York: John Wiley, pp. 312–27.

———. 1979. *Prices, Production and Planning*. Amsterdam: North-Holland.

Brooks, Karen M. 1990. "Soviet Agriculture's Halting Reform,"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rch/April, *39* (2), pp. 29–41.

Brus, Wlodzimierz. [1961] 1972. *The Market in a Socialist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Brus, Wlodzimierz, and Kazimierz Laski. 1989.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Socialism 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ryson, Phillip J., and Manfred Melzer. 1987. "The *Kombinat* in GDR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The East German Economy,* edited by Ian Jeffries and Manfred Melzer. London: Croom Helm, pp. 51–68.

Brzezinski, Zbigniew. [1961] 1967. *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acmillan.

Brzezinski, Zbigniew, and Carl Friedrich. 1956.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1987. *Materialien zum Bericht zur Lage der Nation im geteilten Deutschland 1987.* Bonn.

Bunge, Frederica M. 1985. *North Korea: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C.: Foreign Area Studies,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Burkett, John P. 1988. "Slack, Shortage and the Discouraged Consumers in Eastern Europe: Estimates Based on Smoothing by Aggreg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July, *55* (3), pp. 493–505.

———. 1989. "The Yugoslav Economy and Market Socialism,"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Models and Cases,* edited by Morris Bornstein. Homewood, Ill.: Irwin, pp. 234–58.

Burkett, John P., Richard Portes, and David Winter.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and Foreign Trade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Working Paper,* no. 736. Cambridge, Mas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urnham, James. 1941.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John Day.

Byrd, William A. 1990.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ese Industry.* Armonk, N.Y.: M. E. Sharpe.

Byrd, William A., and Qingsong Lin, eds. 1990. *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

Calvo, Guillermo A., and Stanislaw Wellisz. 1978. "Supervision, Loss of Control, and the Optimum Siz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86* (5), pp. 943–52.

Campbell, Neil A. 1987. *Biology.* Menlo Park: Benjamin-Cummings.

Campbell, Robert W. 1978. "Economic Reform and Adaptation of the CPSU," in *Soviet Societ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edited by Karl Ryavec.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pp. 26–48.

———. [1974] 1981. *The Soviet-Type Economies: Performance and Evolu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ao-Pinna, Vera, and Stanislaw S. Shatalin. 1979. *Consumption Patterns i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An Economic Comparative Approach. A Collective Study.* Oxford: Pergamon Press.

Carr, Edward H., and Robert W. Davies. [1969] 1974.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New York: Macmillan.

Ceausescu, Nicolae. 1978. *Speeches and Writings*. London: Spokesme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89. *Handbook of Economic Statistics, 1989*. Washington, D.C.: CIA.

Chamberlin, Edward H. [1933] 1962.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ndler, Alfred D. 1977.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ng, Hsin. 1984. "The 1982-83 Overinvestment Crisis in China," *Asian Survey*, December, *24* (12), pp. 1275-1301.

Chapman, Janet G. 1963. *Real Wage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2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7. "Soviet Wages Under Socialism," in *The Socialist Price Mechanism*, edited by Alan Aboucha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246-81.

——. 1989.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e Soviet Union,"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Spring, *31* (1), pp. 14-45.

Charemza, Wojciech W. 1989. "Disequilibrium Modelling of Consumption in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in *Models of Disequilibrium and Shortage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edited by Christopher Davis and Wojciech W. Charemza. New York: Chapman and Hall, pp. 283-315.

Charemza, Wojciech W., and Subrata Ghatak. 1990 "Demand for Money in a Dual-Currency, Quantity-Constrained Economy: Hungary and Poland, 1956-1985," *The Economic Journal*, December, *100* (403), pp. 1159-72.

Charemza, Wojciech W., Miroslaw Gronicki, and Richard E. Quandt. 1989. "Modelling Parallel Markets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The Case of the Automobile Market in Poland," in *Models of Disequilibrium and Shortage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edited by Christopher Davis and Wojciech W. Charemza. New York: Chapman and Hall, pp. 405-25.

Chavance, Bernard. 1987. "Fluctuations et cycles économiques en Chine," in *Régulation, cycles et crises dans les économies socialistes*, edited by Bernard Chavance. Paris: Éditions de l'EHESS, pp. 263-83.

Chen, Kuan, et al. 1988. "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ese Industry: 1953-198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December, *12* (4), pp. 570-91.

Chinese Institute for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1986. *Gaige: women mianling de tiaozhan yu xuanze* (Reforms: Our challenges and options). Beijing: Chinese Economic Press.

Chow, Gregory C. 1985. *The Chinese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Close, David. 1988. *Nicaragu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Clower, Robert W. 1965. "The Keynesian Counterrevolution: A Theoretical Appraisal," in *The Theory of Interest Rates*, edited by F. H. Hahn and F. P. R. Brechling. London: Macmillan, pp. 103-25.

Coase, Ronald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ovember, *4* (16), pp. 386-405.

——.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3*, pp. 1-44.

Cochrane, Nancy J. 1988. "The Private Sector in East European Agriculture,"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rch/April, *37* (2), pp. 47-53.

Cohen, Stephen F. [1973] 1980.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888-1938.* New York: W. W. Norton.

——. 1984. "The Friends and Foes of Change: Reform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Soviet Polity in the Modern Era,* edited by Eric P. Hoffman and Robbin F. Laird. New York: Aldine, pp. 85-103.

——. 1985.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lier, Irwin L. 1986. "Effective Purchasing Power in a Quantity Constrained Economy: An Estimate for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February, *68* (1), pp. 24-32.

Colton, Timothy J. 1986. *The Dilemma of Reform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onn, David, ed. 1979. "The Theory of Incentives,"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3* (3).

Connor, Walter D. 1975. "Generations and Politics in the USSR,"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ember/October, *24* (5), pp. 20-35.

——. 1979. *Socialism, Politics and Equality. Hierarchy and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USS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onquest, Robert. [1968] 1973. *The Great Terror. Stalin's Purge of the Thirties.* New York: Macmillan.

——. 1986. *The Harvest of Sorr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rnelsen, Doris. 1990. "Die Wirtschaft der DDR in der Honecker-Ära," *Vierteljahreshefte zur Wirtschaftsforschung*, DIW, no. 1.

Csaba, László. 1990. *Eastern Europe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sákó, Mihály, et al. 1979. "Közoktatási rendszer és társadalmi struktura"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étegződés, mobilitás és egyenlőtlenség* (Stratification, mobility, and inequality), edited by K. P. Kálmán. Budapest: MSZMP KB Társadalomtudományi Intézet, pp. 85-164.

Csikós-Nagy, Béla. 1985. *Árpolitikánk időszerű kérdései (1985-1988)* (Timely issues in our price policy, 1985-1988).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Culbertson, William P., and R. C. Amacher. 1972. "Inflation in the Planned Economies: Some Estimates for Eastern Europe,"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45* (2), pp. 380-93.

Dahl, Robert A., and Charles E. Lindblom. 1953. *Politics, Economics and Welfar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Dahrendorf, Ralf.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Dallago, Bruno. 1990. *The Irregular Economy: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and the Black Labor Market.* Aldershot, England: Dartmouth, and Brookfield, Vt.: Gower.

Dániel, Zsuzsa. 1975. "The 'Reflection' of Economic Growth: Experimental Computations to Revise Synthetic Value Indicators of Output," *Acta Oeconomica, 15* (2), pp. 135–55.

——. 1985. "The Effect of Housing Allocation on Social Inequality in Hungar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December, *9* (4), pp. 391–409.

——. 1989. "Housing Demand in a Shortage Economy: Results of a Hungarian Survey," *Acta Oeconomica, 41* (1–2), pp. 157–80.

Dániel, Zsuzsa, and András Semjén. 1987. "Housing Shortage and Rents: The Hungarian Experience," *Economics of Planning, 21* (1), pp. 13–29.

Davies, Robert W. 1980. *The Socialist Offensive: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Soviet Agriculture, 1929–3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avis, Christopher. 1988. "The Second Economy in Disequilibrium and Shortage Models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Berkeley-Duke Occasional Papers on the Second Economy in the USSR,* July, no. 12.

——. 1989. "Priority and the Shortage Model: The Medical System in the Socialist Economy," in *Models of Disequilibrium and Shortage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edited by Christopher Davis and Wojciech W. Charemza. New York: Chapman and Hall, pp. 427–59.

——. 1990. "The High Priority Military Sector in a Shortage Economy," in *The Impoverished Superpower: Perestroika and the Soviet Military Burden,* edited by Henry S. Rowen and Charles Wolf.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pp. 155–84.

Davis, Christopher, and Wojciech W. Charemza, eds. 1989. *Models of Disequilibrium and Shortage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Dembinski, Pawel H. 1988. "Quantity versus Allocation of Money: Monetary Problems of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Reconsidered," *Kyklos, 41* (2), pp. 281–300.

Dembinski, Pawel H., and Waclaw Piaszczynski. 1988. *The FOF Matrix Methodology.* Geneva: Cahiers du Département d'Économie Politique, University of Geneva.

Demszky, Gábor; György Gadó, and Ferenc Kőszeg, eds. 1987. *Roundtable: Digest of the Independent Hungarian Press.* 2 vols. Budapest: Beszélő, A Hírmondó, and Demokrata.

Deng, Xiaoping. 1987. "The Party's Urgent Tasks on the Organizational and Ideological Fronts," in Deng Xiaoping, *Fundamental Issues in Present-Day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pp. 24–40.

——. [1962] 1989. "How Ca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e Recovered," in *Deng Xiaoping wenxuan*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1938–65). Beijing: People's Press, p. 305.

Denison, Edward F. 1962.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lternatives Before Us.* New York: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 1967. *Why Do Growth Rates Differ? Post-War Experience in Nine Western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Dervis, Kemal; Jaime de Melo, and Sherman Robinson. 1982.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for Development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sai, Padma. 1976.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Postwar Soviet Industry: A Reexamin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66* (3), pp. 372–81.

——. 1986a. "Soviet Growth Retard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76* (2), pp. 175–80.

——. 1986b. *The Soviet Economy: Efficiency, Technical Change and Growth Retard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87. *The Soviet Econom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89.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The Design and Dilemmas of Soviet Refor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eutscher, Isaac. 1966.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watripont, Michel, and Eric Maskin. 1990. "Credit and Efficiency in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Economies," *Discussion Paper,* no. 1512. Cambridge: 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Djilas, Aleksa. 1991. *The Contested Country. Yugoslav Unity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1919–195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jilas, Milovan. 1957.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Praeger.

——. 1988. "Between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Djilas on Gorbachev. Milovan Djilas and George Urban in Conversation," *Encounter,* September/October, *71* (3), pp. 3–19.

Dobb, Maurice H. [1948] 1960.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Domar, Evsey. 1989. "The Blind Men and the Elephant: An Essay on Isms," in E. Doma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Serfd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9–46.

Drejtoria E Statistikes (Directorate of Statistics). 1989. *Vjetari Statistikor I R.P.S. Të Shgipërisë.*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Albania). Tirana.

Drèze, Jacques H. 1976. "Some Theory of Labor Man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Econometrica,* November, *44* (6), pp. 1125–39.

Dunmore, Timothy. 1980. *The Stalinist Command Economy: The Soviet State Apparatus and Economic Policy, 1945–53.* London: Macmillan.

Dyker, David A. 1990. *Yugoslavia: Socialism, Development, and Debt.* New York: Routledge.

Echeverri-Gent, John. 1990. "Economic Reform in India: A Long and Winding Road," in *Economic Reform in Three Giants,* by Richard E. Feinberg, John Echeverri-Gent, and Friedemann Müller,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pp. 103–33.

Eckstein, Alexander. 1980. *Quantitative Measures of China's Economic Outpu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Ehrlich, Éva. 1981. "Comparison of Development Levels: Inequalities in the Physical Structures of National Economies," in *Dispar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ited by P. Bairoch and M. Lévy-Leboyer. London: Macmillan, pp. 395-410.
———. 1985a. "The Size Structure of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s and Enterprise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9* (3), pp. 267-95.
———. 1985b. "Infrastructure,"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1919-1975,* vol. 1, edited by M. C. Kaser and E. A. Rad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323-78.
———. 1985c.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Proportions and Structures." Budapest: MTA Világgazdasági Kutatóintézet. Manuscript.
———. 1990. "Országok versenye" (Competition among countries), *Közgazdasági Szemle,* January, *37* (1), pp. 19-43.
Ellman, Michael. 1971. *Soviet Planning Today. Proposals for an Optimally Functioning Economic 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3. *Planning Problems in the USSR: The Contribution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to Their Solution, 1960-197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2. "Did Soviet Economic Growth End in 1978?" in *Crisis in the East European Economy: The Spread of the Polish Disease,* edited by J. Drewnowski. London, Croom Helm,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p. 131-42.
———. 1985.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Convergence.* London: Academic Press.
Engels, Friedrich. [1894] 1963. "Nachwort (1894) [zu 'Soziales aus Russland']," i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 Vol. 22, Berlin: Dietz Verlag, pp. 421-35.
———. [1847] 1964. "Principles of Communism," in K. Marx and F.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the Principles of Commu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p. 67-83.
———. [1878] 1975. "Anti-Dühring," in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pp. 5-309.
Ericson, Richard. 1983. "On an Allocative Role of the Soviet Second Economy," in *Marxism, Central Planning, and the Soviet Economy: Economic Essays in Honor of Alexander Erlich,* edited by Padma Desai. Cambridge: MIT Press, pp. 110-32.
———. 1984. "The 'Second Econom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under Central Plann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March, *8* (1), pp. 1-24.
———. 1990. "The Soviet Statistical Debate: Khanin vs. TsSU," in *The Impoverished Superpower: Perestroika and the Soviet Military Burden,* edited by Henry S. Rowen and Charles Wolf.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pp. 63-92.
Erlich, Alexander. 1960.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Debate, 1924-2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strin, Saul. 1983. *Self-Management. Economic Theory and Yugoslav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ucken, Walter. 1951.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History and Theory in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Re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uropa Publications. 1980–87. *The Europa Yearbook*. London.
European Community. 1990. *Stabilization, Libe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Brussels.
Fallenbuchl, Zbigniew M. 1982. "Employment Policies in Poland," in *Employment Polici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edited by Jan Adam. London: Macmillan, pp. 26–48.
——. 1988. "Present State of the Economic Reform," in *Creditworthiness and Reform in Poland. Western and Polish Perspectives,* edited by Paul Marer and Wlodzimierz Siwinsk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115–30.
——. 1989. "Poland: The Anatomy of Stagnation," in *Pressures for Reform in the East European Economies*. Vol. 2.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102–36.
Fama, Eugene F., and Michael C. Jensen. 1983.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June, *26* (2), pp. 301–25.
Fazekas, Károly, and János Köllő. 1990. *Munkaerőpiac tőkepiac nélkül* (Labor market without capital market).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Fedorenko, Nikolai P., ed. 1975. *Sistema modelei optimal'nogo planirovanii* (The system of optimal planning models). Moscow: Nauka.
Fehér, Ferenc. 1982. "Paternalism as a Mode of Legitimation in Soviet-Type Societies," in *Political Legitimation in Communist States,* edited by Thomas H. Rigby and Ferenc Fehér. Oxford: Macmillan, pp. 64–81.
Fehér, Ferenc, Ágnes Heller, and György Márkus. 1983.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Feige, Edgar L., ed. 1989. *The Underground Econom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inberg, Richard E., John Echeverri-Gent, and Friedemann Müller. 1990. *Economic Reform in Three Giant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Ferge, Zsuzsa. 1988. "Gazdasági érdekek és politikák" (Economic interests and policies), *Gazdaság, 12* (1), pp. 47–64.
Finansy i Statistika (Finance and Statistics). 1977. *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 v 1977*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77). Moscow.
——. 1985. *SSSR v tsifrakh v 1984 godu* (The USSR in figures in 1984). Moscow.
——. 1987. *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 za 70 let*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USSR for seventy years). Moscow.
——. 1988a. *SSSR i zarubezhnye strany 1987* (The USSR and foreign countries, 1987). Moscow.
——. 1988b. *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 v 1988.*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88). Moscow.
——. 1989a. *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 v 1989.*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89). Moscow.
——. 1989b. *Statisticheskii ezhegodnik stran-chlenov Soveta Ekonomicheskoi Vzaimopomoshchi* (CMEA statistical yearbook). Moscow.
Fischer-Galati, Stephen, ed. 1979. *The Communist Parties of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reixas, Xavier, Roger Guesnerie, and Jean Tirole. 1985. "Planning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d the Ratchet Effec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April, *52* (2), pp. 173-91.

Frydman, Roman, Stanislaw Wellisz, and Grzegorz W. Kolodko. 1990. "Stabilization in Poland: A Progress Report." Revised version of 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Exchange Rate Policies of Less Developed Market and Socialist Economies, Berlin, May 10-12. Manuscript.

Furubotn, Eirik G., and Svetozar Pejovich. 1972.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Theory: A Survey of Recent Liter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December, *10* (4), pp. 1137-62.

Gábor, István R. 1979. "The Second (Secondary) Economy. Earning Activity and Regrouping of Income Outside the Socially Organized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cta Oeconomica*, *22* (3-4), pp. 291-311.

Gábor, István R., and György Kővári. 1990. *Beválthatók-e a bérreform ígéretei?* (Can the promises of the wage reform be fulfilled?).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Gács, János. 1980. "Importszabályozás és vállalati viselkedés" (Import regulation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firm). Budapest: Konjunktura és Piackutató Intézet. Manuscript.

Gács, János, and Mária Lackó. 1973. "A Study of Planning Behaviour on the National-Economic Level," *Economics of Planning*, *13* (1-2), pp. 91-119.

Gaidar, Egor. 1990. "Trudnyi vybor" (Tough choice), *Kommunist*, January, (2), pp. 23-34.

Galasi, Péter, and Gábor Kertesi. 1987. "The Spread of Bribery in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Acta Oeconomica*, *38* (3-4), pp. 371-89.

——. 1989. "Rat Race and Equilibria in Markets with Side Payments under Socialism," *Acta Oeoconomica*, *41* (3-4), pp. 267-92.

Galasi, Péter, and György Sziráczki, eds. 1985. *Labour Market and Second Economy in Hungary*.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Gapinski, James H., Borislav Skegro, and Thomas W. Zuehlke. 1987. "Modeling, Forecasting, and Improving Yugoslav Economic Performance." Tallahassee, Fla.: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and Zagreb: Economics Institute Zagreb, October. Manuscript.

Garetovskii, N. V. 1989. "Voprosy sovershenstvovaniia bankovskoi sistemy" (Issues in perfecting the banking system), *Deng'i i Kredit*, (11), pp. 8-16.

Garvy, George. 1966. *Money, Banking and Credit in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ank.

——. 1977. *Money, Financial Flows and Credit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Gati, Charles. 1984. "The Democratic Interlude in Post-War Hungary," *Survey*, Summer, *28* (2), pp. 99-134.

Gedeon, Shirley J. 1985-86. "The Post Keynesian Theory of Money: A Summary and an Eastern European Example,"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Winter, *8* (2), pp. 208-21.

——. 1987. "Monetary Disequilibrium and Bank Reform Proposals in Yugoslavia: Paternalism and the Economy," *Soviet Studies*, April, *39* (2), pp. 281-91.

Gerschenkron, Alexander.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New York: Praeger.

——. 1968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Glowny Urzad Statystyczny.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1990. *Rocznik Statystyczny 1990* (Statistical yearbook, 1990). Warsaw.

Goldfeld, Stephen M., and Richard E. Quandt. 1988. "Budget Constraints, Bailouts, and the Firm under Central Plann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December, *12* (4), pp. 502-20.

——. 1990a. "Rationing, Defective Inputs and Bayesian Updates under Central Planning," *Economics of Planning, 23* (3), pp. 161-73.

——. 1990b. "Output Targets, Input Rationing and Inventories," in *Optimal Decisions in Market and Planned Economies*, edited by Richard E. Quandt and Dusan Trisk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pp. 67-81.

Goldman, Marshall I. 1987. *Gorbachev's Challenge. Economic Reform in the Age of High Technology*. New York: W. W. Norton.

Goldmann, Josef. 1975. *Makroekonomická Analyza—a Prognóza* (Macroeconomic analysis—a prognosis). Prague: Academia.

Goldmann, Josef, and Karel Kouba. 1969. *Economic Growth in Czechoslovakia*. White Plains, N.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Gomulka, Stanislaw. 1985. "Kornai's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nd the Shortage Phenomenon: A Criticism and Restatement," *Economics of Planning, 19* (1), pp. 1-11.

——. 1986. *Growth, Innovation and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Brighton: Wheatsheaf.

Gomulka, Stanislaw, and Anthony Polonsky, eds. 1990. *Polish Paradoxes*. London: Routledge.

Gomulka, Stanislaw, and Jacek Rostowski. 1988.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Material Intensit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December, *12* (4), pp. 475-501.

Gorbachev, Mikhail S. 1987. *Perestroik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Gössmann, Wolfgang. 1987. *Die Kombinate in der DDR*. Berlin: Arno Spitz.

Götz-Coenenberg, Roland. 1990. "Währungsintegration in Deutschland: Alternativen und Konsequenzen," *Berichte des Bundesinstituts für ostwissenschaftliche und internationale Studien*, no. 20. Cologne.

Gotz-Kozierkiewicz, Danuta, and Grzegorz W. Kolodko. 1990. "Stabilization in Viet Nam," *Working Papers*, no. 11. Warsaw: Institute of Finance.

Granick, David. 1954. *The Red Executiv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75. *Enterprise Guidance in Eastern Europe. A Comparison of Four Socialist Econom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regory, Paul R. 1990. "The Stalinist Command Economy," *Annals of the AAPS*, January, *507*, pp. 18-26.

Gregory, Paul R., and Irwin L. Collier. 1988. "Unemployment in the Soviet Union: Evidence from the Soviet Interview Projec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78* (4), pp. 613-32.

Gregory, Paul R., and Robert C. Stuart. 1980.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1974] 1986. *Sovie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Griffiths, Franklyn, and Gordon H. Skilling, eds. 1971.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roenewegen, Peter. 1987.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nomics'," in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edited by 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and Peter Newman. London: Macmillan, and New York: The Stockton Press. Vol. 3, pp. 904–7.

Grosfeld, Irena. 1986. "Endogenous Planners and the Investment Cycle in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Spring, *28* (1), pp. 42–53.

———. 1989a. "Disequilibrium Models of Investment," in *Models of Disequilibrium and Shortage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edited by Christopher Davis and Wojciech W. Charemza. New York: Chapman and Hall, pp. 361–74.

———. 1989b. "Reform Economics and Western Economic Theory: Unexploited Opportunities," *Economics of Planning, 22* (1), pp. 1–19.

Grossman, Gregory. 1966. "Gold and the Sword: Money in the Soviet Command Economy," in *Industrialization in Two Systems,* edited by Henry Rosovsky. New York: John Wiley, pp. 204–36.

———. 1977a. "The 'Second Economy' of the USSR,"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ember/October, *26* (5), pp. 25–40.

———. 1977b. "Price Control, Incentives, and Innovation in the Soviet Economy," in *The Socialist Price Mechanism,* edited by Alan Aboucha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129–69.

———. 1983. "Economics of Virtuous Haste: A View of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xism, Central Planning, and the Soviet Economy. Economic Essays in Honor of Alexander Erlich,* edited by Padma Desai. Cambridge: MIT Press, pp. 198–206.

———. 1985. "The Second Economy in the USSR and Eastern Europe. A Bibliography," *Berkeley-Duke Occasional Papers on the Second Economy in the USSR,* September, no. 1.

———, ed. 1968. *Money and Pl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rossman, Sanford J., and Oliver D. Hart. 1986.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94* (4), pp. 691–719.

Groves, Theodore. 1973. "Incentives in Teams," *Econometrica,* July, *41* (4), pp. 617–31.

Hammond, Thomas T., ed. 1975. *The Anatomy of Communist Takeov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ankiss, Elemér. 1989. "A 'Nagy Koalició' avagy a hatalom konvertálása" (The 'great coalition' or the conversion of power), *Valóság,* February, *32* (2), pp. 15–31.

———. 1990. *East European Alternatives: Are There A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nsen, Bent. 1951. *A Study in the Theory of Inflatio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Hanson, Philip. 1971. "East-West Comparisons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Soviet Studies*, January, *22* (3), pp. 327–43.
——. 1981. *Trade and Technology in Soviet-Western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isty Press.
Hanson, Philip, and Keith Pavitt. 1987. *The Comparative Economics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in East and West. A Survey*. New York: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Haraszti, Miklós. 1978. *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Harcourt, Geoffrey C., ed. 1977. *The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Hardin, Garett.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December 13, *162* (3859), pp. 1242–48.
Harding, Harry. 1981. *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7.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Harrison, Mark. 1985. "Investment Mobilization and Capacity Completion in the Chinese and Soviet Economies," *Economics of Planning, 19* (2), pp. 56–75.
Hart, Oliver, and Bengt R. Holmström. 1987. "Theory of Contracts," in *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 Fifth World Congress*, edited by T. Bewl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71–155.
Hartford, Kathleen. 1990. "From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o Food Policy." Manuscript.
Havel, Václav. 1975. "Letter to Dr. Gustav Husak,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zechoslovak Communist Party," *Survey, 21* (3), pp. 167–90.
——, ed. 1985.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London: Hutchinson.
Hayek, Friedrich A.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London: Routledge, and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1973.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d. 1935.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eal, Geoffrey M. 1973.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lanning*. Amsterdam: North-Holland.
Hedlund, Stefan. 1989. *Private Agriculture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Routledge.
Herman, Edward S. 1981. *Corporate Control, Corporate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wett, Ed A. 1980. "Foreign Trade Outcomes in Eastern and Western Economies," in *East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East-West Trade*, edited Paul Marer and John M. Montia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41–69.
——. 1988. *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 Equality versus Efficienc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Hinton, Harold C., ed. 1980.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A Documentary Survey.* 5 vols.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Hirschman, Albert O. 1958.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lavácek, Jirí. 1986. "Homo se assecurans," *Politická ekonomie, 34* (6), pp. 633–39.
———. 1990. "Producers' Criteria in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in *Optimal Decisions in Markets and Planned Economies,* edited by Richard E. Quandt and Dusan Trisk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pp. 41–52.
Hlavácek, Jirí, and Dusan Triska. 1987. "Planning Authority and Its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Theorem Homo Se Assecurans," *Ekonomicko-Matematicky Obzor, 23* (1), pp. 38–53.
Hoch, Róbert. 1980. "A világpiaci árak és az árcentrum" (World market prices and the price center), *Közgazdasági Szemle,* October, *27* (10), pp. 1153–58.
Hoeffding, Oleg. 1959. "The Soviet Industrial Reorganization of 195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49* (2), pp. 65–77.
Holmström, Bengt R. 1979. "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Spring, *10* (1), pp. 74–91.
———. 1982a. "Design of Incentive Schemes and the New Soviet Incentive Model,"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17* (2), pp. 128–48.
———. 1982b. "Moral Hazard in Team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utumn, *13* (3), pp. 324–40.
Holmström, Bengt R., and Jean Tirole. 1989. "Theory of the Firm," in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edited by Richard Schmalensee and Robert Willig. New York: Elsevier, pp. 61–133.
Holzman, Franklyn D. 1955. *Soviet Tax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0. "Soviet Inflationary Pressures, 1928–1957: Causes and Cur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74* (2), pp. 167–88.
———. 1976. *International Trade under Communism. Politics and Econom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3. "Dumping by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The Polish Golf Cart Case," in *Marxism, Central Planning, and the Soviet Economy: Economic Essays in Honor of Alexander Erlich,* edited by Padma Desai. Cambridge: MIT Press, pp. 133–48.
———. 1986a. "The Significance of Soviet Subsidies to Ea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Spring, *28* (1), pp. 54–65.
———. 1986b. "Further Thought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Soviet Subsidies to Ea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Fall, *28* (3), pp. 59–63.
———. 1989. "A Comparative View of Foreign Trade Behavior: Market versus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Models and Cases,* edited by Morris Bornstein. Homewood, Ill.: Irwin, pp. 463–84.
Holzmann, Robert. 1990. "Unemployment Benefits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 Background, Concept and Implementation." OECD conference paper. Vienna: Ludwig Boltzmann Institute für Ökonomische Analysen.

Horvat, Branko. 198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A Marxist Social Theory*. Armonk, N.Y.: M.E. Sharpe.

Horváth, M. Tamás. 1988. "Kisvárosok politikai viszonyai" (Political relations in small towns), *Valóság*, July, *31* (7), pp. 89–98.

Hough, Jerry F. 1969. *The Soviet Prefects: The Local Party Organs in Industrial Decision-mak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2. "The Soviet System: Petrification or Plur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Social Science Theory*, edited by Jerry F. Houg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ugh, Jerry F., and Merle Fainsod. [1953] 1979.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xha, Enver. 1975. *Our Policy Is an Open Policy, the Policy of Proletarian Principles*. Tirana: "8 Nëntori" Publishing House.

Hrncir, Miroslav. 1989. "From Traditional to Reformed Planned Economy: The Case of Czechoslovakia," *Czechoslovak Economic Papers, 27*, pp. 25–45.

Hsin, Chang. 1984. "The 1982-83 Overinvestment Crisis in China," *Asian Survey*, December, *24* (12), pp. 1275–1301.

Huang, Yasheng. 1988. "'Web' of Interests and Patterns of Behavior of Chinese Local Economic Bureaucracies and Enterprises During Reforms," lecture at the conference on Social Implications of Reforms, Fairbank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y.

Hungarian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1959. *Statistical Yearbook, 1957*. Budapest.

Hungarian Market Research Institute. 1978. "A lakossági személygépkocsi piac egyes időszerű problémái" (Present-day problems on the private car market). Budapest. Manuscript.

Hunter, Holland. 1961. "Optimal Tautness in Development Plan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July, *9* (4), part 1, pp. 561–72.

Hutchings, Raymond. 1983. *The Soviet Budge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Ickes, Barry W. 1986. "Cyclical Fluctuations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A Critique of the Literature," *Soviet Studies*, January, *38* (1), pp. 36–52.

———. 1990. "Do Socialist Countries Suffer a Common Business Cycl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ugust, *72* (3), pp. 397–405.

Illyés, Gyula. 1986. *Menet a ködben* (March in the fog). Budapest: Szépirodalmi Kiadó.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Union. 1988. *Yearbook of Common Carrier Telecommunication Statistics*. Geneva: Union Internationale des Télécommunications.

International Currency Analysis, Inc. 1990. *World Currency Handbook*. Brooklyn, N.Y.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1987.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1950–2025*. Geneva.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84.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Supplement on Output Statistics*. Supplement series, no. 8, Washington, D.C.

———. 1987. *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7*.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BRD, OECD, EBRD. 1990. "The Economy of the USSR: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 a study undertaken in response to a request by the Houston Summit, Washington, D.C.

Ismael, Tareq Y., and Jacqueline S. Ismael. 1986. *The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London: Frances Pinter.

Jánossy, Ferenc. 1963. *A gazdasági fejlettség mérhetősége és új mérési módszere* (The measurability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a new method for its measurement).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Jasay, Anthony de. 1990. *Market Socialism: A Scrutiny. 'This Square Circle'.*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Jeffries, Ian, and Manfred Melzer, eds. 1987. *The East German Economy.* London: Croom Helm.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9. *Pressures for Reform in the East European Economies.* 2 vol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ones, Derek C., and Mieke Meurs. 1991. "On Entry of New Firms in Socialist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Bulgaria," *Soviet Studies, 43* (2), pp. 311-27.

Judith, Rudolf, ed. 1986. *40 Jahre Mitbestimmung: Erfahrungen, Probleme, Perspektiven.* Cologne: Bund Verlag.

Judy, R., and R. Clough. 1989. "Soviet Computer Software and Applications in the 1980s." Bloomington: Hud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HI-4090-P.

Kagalovsky, Konstantin. 1989. "The Pressing Problems of State Finances in the USSR," *Communist Economies,* (4), pp. 447-54.

Kahan, Arcadius, and Blair Ruble, eds. 1979. *Industrial Labor in the USSR.*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Kalecki, Michal. 1970. "Theories of Growth in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Scientia,* December, *105* (5-6), pp. 311-16.

———. 1972. *Selected Essay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Socialist and Mixed Econom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minski, Bartlomiej. 1989.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Forms of Government Controls in Poland in the 1980s," in *Pressures for Reform in the East European Economies.* Vol. 2.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84-101.

Kant, Immanuel. [1793] 1970. "On the Common Saying: 'This May Be True in Theory, but It Does Not Apply in Practice'," in *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Hans Rei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1-92.

Kantorovich, Leonid V. [1937] 1960. "Mathematical Methods of Planning and Organizing Production," *Management Science, 6* (4), pp. 366-422.

———. 1965. *The Best Use of Economic Resourc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apitány, Zsuzsa. 1989a. "Kereslet és kinálat a 80-as évek autópiacán" (Demand and supply on the Hungarian car market in the 1980s), *Közgazdasági Szemle,* June, *36* (6), pp. 592-611.

———. 1989b. "Elosztási mechanizmusok Kelet-Európa autópiacain" (Allocative mechanisms on the Eastern European car markets). Budapest: Institute of Economics. Manuscript.

Kapitány, Zsuzsa, and László Kállay. 1989. *The East European Motor Industry: Prospects and Developments.* London: The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 1991. *The Motor Industry of Eastern Europe: Prospects to 2000 and Beyond.* London: The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Kapitány, Zsuzsa, János Kornai, and Judit Szabó. 1984. "Reproduction of Shortage on the Hungarian Car Market," *Soviet Studies,* April, *36* (2), pp. 236–56.

Kaser, Michael. 1965. *Comecon. Integration Problems of the Planned Econom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tsenelinboigen, Aron. 1977. "Coloured Markets in the Soviet Union," *Soviet Studies,* January, *29* (1), pp. 62–85.

Katz, Barbara G., and Joel Owen. 1984. "Disequilibrium Theory, Waiting Costs and Saving Behavior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A Queueing-Theoretic Approac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8* (3), pp. 301–21.

Kautsky, Karl. 1910. *The Social Revolution.* Chicago: Charles H. Kerr.

Kendrick, John W. 1981.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Recent Productivity Trends," in *Essays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 Problems. Demand, Productivity and Population,* edited by William Fellne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pp. 125–70.

Kenedi, János. 1981. *Do It Yourself.* London: Pluto Press.

Keren, Michael. 1972. "On the Tautness of Plan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9* (4), pp. 469–86.

——. 1973. "The New Economic System: An Obituary," *Soviet Studies,* April, *24* (4), pp. 554–87.

Keren, Michael, Jeffrey Miller, and James R. Thornton. 1983. "The Ratchet: A Dynamic Managerial Incentive Model of the Soviet Enterpri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December, *7* (4), pp. 347–67.

Keynes, John Maynard.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Khanin, Grigorii. 1988. "Ekonomicheskii rost: al'ternativnaia otsenka" (Economic growth: An alternative assessment), *Kommunist,* November, (17), pp. 83–90.

Khrushchev, Nikita S. 1959. *Let Us Live in Peace and Friendship. The Visit of N. S. Khrushchev to the USA.*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 1960. "Report to the Congress," in *Current Soviet Politics: The Documentary Record of the Extraordinary 21th Congress of the CPSU,* edited by Leo Gruliow and the Staff of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41–72.

Kidric, Boris. 1985. *Sabrana Dela* (Collected works). Belgrade: Izdavacki Centar Komunist.

Kis, János. 1989. *L'Egale Dignité.* Paris: Seuil.

Klacek, Jan, and Alena Nesporová. 1984. "Economic Growth in Czechoslovakia—Application of the CES Production Function," *Czechoslovak Economic Papers, 22,* pp. 83–100.

Klaus, Václav. 1989. "Socialist Economies, Economic Reforms, and Economists: Reflections of a Czechoslovak Economist," *Communist Economies, 1* (1), pp. 89–96.

——. 1990. "Policy Positions Toward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World Bank by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that Are Not Members of Those Organizations," in *Economic Reforms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edited by Jozef M. van Braba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Social Affairs, pp. 315–27.

Knight, Frank. [1921] 1965.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Knight, Peter T. 1984. "Financial Discipline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Yugoslavia: Rehabilitation and Bankruptcy of Loss-Making Enterprises,"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s,* no. 705.

Kolakowski, Leszek. 1978.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olodko, Grzegorz W. 1989. "Stabilization Policy in Poland—Challenges and Constraints," *Working Papers,* no. 3. Warsaw: Institute of Finance.

——. 1991. "Polish Hyperinflation and Stabilization, 1989–90," *Most, 1* (1), pp. 9–36.

Kolodko, Grzegorz W., Danuta Gotz-Kozierkiewicz, and Elzbieta Skrzeszewska-Paczek. 1990. "Hyperinflation and Stabilization in Postsocialist Economies." Warsaw: Institute of Finance. Manuscript.

Komin, A. 1988. "Perestroika tsenovogo khoziaistva" (Restructuring of pricing management), *Voprosy Ekonomiki,* March, (3), pp. 107–14.

Konovalov, V. 1989. "Yugoslav Industry: Structure, Performance, Conduct." Washington, D.C.: Industry Development Division, World Bank. Manuscript.

Konrád, György, and Iván Szelényi. 1979.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Kontorovich, Vladimir. 1986. "Soviet Growth Slowdown: Econometric vs. Direct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76* (2), pp. 181–85.

——. 1990. "Utilization of Fixed Capital and Soviet Industrial Growth," *Economics of Planning, 23* (1), pp. 37–50.

Koopmans, Tjalling C., and John Michael Montias. 1971. "On the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of Economic Systems," in *Comparison of Economic System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edited by Alexander Eckste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7–78.

Korbonski, Andrzej. 1981. "The Second Economy in Polan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ring/Summer, *35* (1), pp. 1–15.

Koriagina, Tatiana I. 1990a. "Tenevaia ekonomika v SSSR (analyz, otsenki, prognozy)" (The shadow economy in the USSR: Analysis, estimates, prognoses), *Voprosy Ekonomiki,* (3), pp. 110–20.

——. 1990b. *Platnye uslugi v SSSR.* (Paid services in the USSR). Moscow: Ekonomika.

Kornai, János. [1957] 1959.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5.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as a Tool in Drawing Up the Five-Year Economic Plan," *Economics of Planning*, *5* (3), pp. 3-18.

——. 1971. *Anti-Equilibriu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1972. *Rush versus Harmonic Growth*.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1980.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1984. "Bureaucratic and Market Coordination," *Osteuropa Wirtschaft*, *29* (4), pp. 306-19.

——. 1986a.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Kyklos*, *39* (1), pp. 3-30.

——. 1986b.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December, *24* (4), pp. 1687-1737.

——. 1990.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Shifting from a Socialist System: The Example of Hungary*. New York: W. W. Norton.

Kornai, János, and Tamás Lipták. 1965. "Two-Level Planning," *Econometrica*, January, *33* (1), pp. 141-69.

Kornai, János, and Béla Martos, eds. 1981. *Non-Price Control*.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Kornai, János, and Ágnes Matits. 1987. *A vállalatok nyereségének bürokratikus újraelosztása* (The bureaucratic redistribution of firms' profit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1990. "The Bureaucratic Redistribution of the Firms' Profits," in J. Kornai, *Vision and Reality, Market and State: New Studies on the Socialist Economy and Society*. Budapest: Corvina;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Wheatsheaf;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54-98.

Kornai, János, and Jörgen W. Weibull. 1978. "The Normal State of the Market in a Shortage Economy: A Queue Model,"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80* (4), pp. 375-98.

——. 1983. "Paternalism, Buyers' and Sellers' Market," *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 *6* (2), pp. 153-69.

Kotlove, Barry. 1986. "Soviet Housing Expenditure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Soviet Emigrant Families." Cambridge, Mass.: Economics of Socialism Workshop, Harvard University. Manuscript.

Kovács, János Mátyás. 1988. "Compassionate Doubts about Refonomics in Hungary." Budapest: Institute of Economics,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Manuscript.

——. 1990. "Reform Economics: The Classification Gap," *Daedalus*, Winter, *119* (1), pp. 215-48.

Köves, András. 1983. "'Implicit Subsidies' and Some Issues of Economic Relations within the CMEA; Remarks on the Analyses Made by Michael Marrese and Jan Vanous," *Acta Oeconomica*, *31* (1-2), pp. 125-36.

——. 1985. *The CMEA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conomy: Turning Inwards or Turning Outwards*.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 1986."Foreign Economic Equilibriu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Policy in the CMEA Countries,"' *Acta Oeconomica*, *36* (1-2), pp. 35-53.

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1965. *Nemzetközi statisztikai évkönyv, 1965*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yearbook, 1965). Budapest.

——. 1971. *Statisztikai évkönyv, 1970* (Statistical yearbook, 1970). Budapest.

———. 1973. *Statisztikai évkönyv, 1972* (Statistical yearbook, 1972). Budapest.

———. 1975. *Statisztikai évkönyv, 1974* (Statistical yearbook, 1974). Budapest.

———. 1980a. *Statisztikai évkönyv, 1979* (Statistical yearbook, 1979). Budapest.

———. 1980b. *Közlekedési és hírközlési évkönyv, 1979* (Transport and news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979). Budapest.

———. 1982. *Statisztikai évkönyv, 1981*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1). Budapest.

———. 1984. *Statisztikai évkönyv, 1983*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3). Budapest.

———. 1985. *Statisztikai évkönyv, 1984*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4). Budapest.

———. 1986. *Statisztikai idősorok a Kinai Népköztársaságról.* (Statistical time series 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dapest.

———. 1987. *Statisztikai évkönyv, 1986*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6). Budapest.

———. 1988. *Beruházási statisztikai évkönyv, 1987*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investments, 1987). Budapest.

———. 1989. *Nemzetközi statisztikai évkönyv*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yearbook). Budapest.

———. 1990. *Statisztikai évkönyv, 1989*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9). Budapest.

Kravis, Irving B., Alan W. Heston, and Robert Summers. 1978. "Real GDP Per Capita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June *88* (350), pp. 215-42.

———. 1982. *World Product and Incom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Kritsman, L. N. 1926. *Geroicheskii period velikoi russkoi revoliutsii—opyt analiza t.n. voennogo kommunizma.* (The heroic period of the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An attempt at analysis of so-called War Communism). Moscow: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Krueger, Anne O. 197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64* (3), pp. 291-303.

Kuron, Jacek, and Karel Modzielewski. 1968. *An Open Letter to the Party.* New York: Merit Publishers.

Kuznets, Simon. 1964. *Postwar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1.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uznetsova, T. 1989. "Kooperatsiia: kakova taktika—takovo i praktika" (The cooperatives: As are the tactics, so is the practice), *Voprosy Ekonomiki,* March, (3), pp. 149-53.

Lackó, Mária. 1975. "Consumer Savings and the Supply Situation," *Acta Oeconomica,, 15* (3-4), pp. 365-84.

———. 1980. "Cumulating and Easing of Tensions," *Acta Oeconomica, 24* (3-4), pp. 357-77.

———. 1984 "Behavioral Rules in Distribution of Sectoral Investments in Hungary, 1951-1980,"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8* (3), pp. 290-300.

———. 1989. "A beruházási hitelpiac feszültségeinek újratermelődése Magyarországon" (The reproduction of tension on the investment credit market in Hungary), *Közgazdasági Szemle,* November, *36* (11), pp. 1323-41.

Ladányi, János. 1975. "A fogyasztói árak és szociálpolitika" (Consumer prices and social policy), *Valóság*, *18* (2), pp. 16-29.

Laffont, Jean-Jacques. 1989. *Economics of Uncertainty and Inform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Laki, Mihály. 1980. "End-Year Rush Work in the Hungarian Industry and Foreign Trade," *Acta Oeconomica*, *25* (1-2), pp. 37-65.

Lange, Oscar. 1936, 1937.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October, February, *4* (1, 2), pp. 53-71, 123-42.

Lardy, Nicholas R. 1986. "Overview: Agricultural Reform and the Rural Economy," in *China Looks Towards the Year 2000. Vol. 1.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325-35.

Largentaye, Bertrand de. 1990. "The Response of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o the Transformations in Eastern Europ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lloquium for executive directors on socialist economic reform, World Bank, April 19.

Laulan, Yves M., ed. 1973. *Banking, Money and Credit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Brussels: NATO, Directorate of Economic Affairs.

Lavoie, Don. 1985.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consider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e, Peter N. 1986. "Enterprise Autonomy Policy in Post-Mao China: A Case Study of Policy-Making, 1978-83," *China Quarterly*, March, *27* (105), pp. 45-71.

Leijonhufvud, Axel. 1968. *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nin, Vladimir I. [1918] 1964. "Can the Bolsheviks Retain State Power?" in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6. Moscow: Progress, pp. 87-186.

———. [1920] 1966.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in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31. Moscow: Progress, pp. 17-118.

———. [1917] 1969a.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5. Moscow: Progress, pp. 381-492.

———. [1918] 1969b. "Immediate Task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in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7, Moscow: Progress, pp. 235-77.

———. [1921] 1970. "To the Heads of All Central Soviet Establishments," in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45, p. 423.

Leontief, Wassily. 1953a.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Economy, 1919-193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d. 1953b. *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919-1939.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planations in Input-Output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ptin, Gerd, and Manfred Melzer. 1978. *Economic Reform in East German Indus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vcik, Friedrich. 1986. "The Czechoslovak Economy in the 1980's," in *East European Economies: Slow Growth in the 1980's*. Vol. 3.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March, pp. 85-108.

Levine, Herbert S. 1966. "Pressure and Planning in the Soviet Economy," in *Industrialization under Two Systems,* edited by Henry Rosovsky. New York: John Wiley, pp. 266-86.

Levy, F., et al. 1988. *China: Finance and Invest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ountry Studies.

Lewin, Moshe. [1968] 1974.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wis, Arthur W.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May, *22* (2), pp. 139-91.

——. 1955.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Homewood, Ill.: Irwin.

Lewis, John W., ed. 1970. *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berman, Evsey G. [1962] 1972. "The Plan, Profit and Bonuses," in *Socialist Economics,* edited by Alec Nove and Domenico M. Nuti.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pp. 309-18.

Lichtheim, George. 1961. *Marxism: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Praeger.

Lieberthal, Kenneth, and Michael Oksenberg. 1988. *Policy-Making in China: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ndbeck, Assar. 197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Left: An Outsider's View.*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Lindbeck, Assar, and Jörgen W. Weibull. 1987. "Strategic Interaction with Altruism—The Economics of Fait Accompli," *Seminar Paper,*, no. 376. Stockholm: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Lindblom, Charles E. 1977.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Lipinski, Edward. 1976. "An Open Letter to Comrade Gierek," *Survey, 22* (2), pp. 194-203.

Lipton, David, and Jeffrey Sachs. 1990. "Creating a Market Economy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pp. 75-133.

Lisiecki, Jerzy. 1990. "Financial and Material Transfers between East and West Germany," *Soviet Studies,* July, *42* (3), pp. 513-34.

Liska, Tibor. [1964] 1988. *Ökonosztát* (Econostat).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Liu, Guoguan. 1986. "Price Reform Essential to Growth," *Beijing Review,* August 18, pp. 14-18.

——. 1989. "A Sweet and Sour Decade," *Beijing Review,* January 2-8, pp. 22-29.

Liu, Pak-Wai. 1986. "Moral Hazard and Incentives in a Decentralized Planning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une, *10* (2), pp. 91-105.

Lopinski, Maciej, Marcin Moskit, and Mariusz Wilk, eds. 1990. *Konspira. Solidarity Undergrou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s, Maria, ed. 1990. *The Second Economy in Marxist Stat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Lucas, Robert E. 1987. *Models of Business Cycl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ucas, Robert E., and Thomas J. Sargent. 1981. "After Keynesian Macroeconomics," in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Econometric Practice,* edited by R. E. Lucas and T. J. Sargent. Vol. 1.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259-319.

Lukács, Georg. 1971. "Lukács on His Life and Work. Interview," *New Left Review* (68), pp. 49-58.

Lydall, Harold. 1984. *Yugoslav Soci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ddison, Angus. 1989.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0th Century.* Paris: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ECD.

Malecki, Witold, and Grezegorz W. Kolodko. 1990. "The Indebtedness of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Working Papers,* no. 12. Warsaw: Institute of Finance.

Malinvaud, Edmond. 1967. "Decentralized Procedures for Planning," in *Activity Analysi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and Planning,* edited by M. O. L. Bacharach and Edmond Malinvaud. London: Macmillan,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p. 170-208.

——. 1977. *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 Reconsider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Mao, Zedong. [1938] 1967. "Problems of War and Strategy," in *Selected Works.* Vol. 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pp. 267-81.

——. 1977.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in *Selected Works.* Vol. 5.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pp. 284-307.

Marer, Paul. 1985. *Dollar GNPs of the USSR and Eastern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

Marer, Paul, et al. 1991. *Historically Planned Economies. A Guide to the Data* (tentative titl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Marer, Paul, and Wlodzimierz Siwinski, eds. 1988. *Creditworthiness and Reform in Poland. Western and Polish Perspectiv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arglin, Stephen A. 1976. "What Do Bosses Do?"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edited by André Gorz. Hassocks: Harvester Press, pp. 15-54.

Markish, Yuri. 1989. "Agricultural Reforms in the USSR: Intensification Programmes of the 1980s," *Communist Economies, 1* (4), pp. 421-45.

Marrese, Michael. 1981. "The Bureaucratic Response to Economic Fluctuation: An Econometric Investigation of Hungarian Investment Policy," *Journal of Policy Modelling,, 3* (2), pp. 221-43.

——. 1983.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Performance in Hungar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7* (3), pp 329-45.

Marrese, Michael, and Jan Vanous. 1983. *Soviet Subsidization of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 Soviet Perspective.*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tos, Béla. 1990. *Economic Control Structures: A Non-Walrasian Approach.* Amsterdam: North-Holland.

Marx, Karl. [1871] 1940.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875] 1966.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Moscow: Progress, and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864] 1975a. "Inaugural Addres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in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0.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pp. 5–13.

——. [1870] 1975b. "Confidential Talk," in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pp. 112–25.

——. [1867–94] 1978. *Capital*. London: Penguin.

McAuley, Alistair. 1979. *Economic Welfare in the Soviet Un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cIntyre, Robert J. 1988. *Bulgari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London: Frances Pinter.

McKinnon, Ronald I. 1990a. "Liberalizing Foreign Trade in a Socialist Economy: The Problem of Negative Value Added." Stanfor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tanford University. Manuscript.

——. 1990b. "Stabilising the Ruble," *Communist Economies, 2* (2), pp. 131–42.

McLellan, David. 1973. *Karl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 New York: Macmillan.

——. 1980.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 London: Macmillan.

Meade, James E. 1972. "The Theory of Labour-Managed Firms and of Profit-Sharing," *Economic Journal,* March, *82* (325), pp. 402–28.

Medvedev, Roy A. 1989. *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erson-Aksenov, M., and B. Shragin, eds. 1978.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Religious Thought of Russian Samizdat. An Anthology*. Belmont, Mass.: Nordland.

Meisner, Maurice. 1986.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Mejstrik, Michal. 1984. "Economic Effects of Export and Their Dependence on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Czechoslovak Economic Papers, 22*, pp. 57–82.

——. 1991. "Transition Measures and External Shocks in Czechoslovakia in 1991." Prague: Institute of Economic Sciences, Charles University. Manuscript.

Merkur Car Trading Co. 1980. "Merkur adatgyüjtemény, 1979" (Merkur data collection, 1979). Budapest. Manuscript.

Mesa-Lago, Carmelo. 1981. *The Economy of Socialist Cuba*.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Michels, Robert. [1911] 1962.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Free Press.

Michnik, Adam. 1985. *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ihályi, Péter. 1988. "Cycles or Shocks: East European Investments, 1950–1985," *Economics of Planning, 22* (1–2), pp. 41–56.

Milanovic, Branko. 1989. *Liberaliz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Dynamics of Reform in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Armonk, N.Y.: M. E. Sharpe.

Milenkovitch, Deborah D. 1971. *Plan and Market in Yugoslav Economic Thou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4. "Is Market Socialism Efficient?"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An Assessment of Knowledge, Theory, and Method,* edited by Andrew Zimbalist. Boston: Kluwer-Nijhoff, pp. 65-107.

Ming, Wu. 1990. "The Chinese Economy at the Crossroads," *Communist Economies, 2* (3), pp. 241-313.

Mirrlees, James A. 1974. "Notes on Welfare Economics, 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ty," in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Analysis. Essays on Economic Behavior under Uncertainty,* edited by Michael S. Balch, Daniel L. McFadden, and S. Wu.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p. 243-58.

——. 1976. "The Optimal Structure of Incentives and Authority within an Organiz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Spring, *7* (1), pp. 105-31.

Mises, Ludwig von. [1920] 1935. "Economic Calculations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in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edited by Friedrich A. Hayek.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p. 87-130.

Mitchell, Janet. 1989. "Credit Rationing, Budget Constraints and Salaries in Yugoslav Fir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une, *13* (2), pp. 254-80.

Molotov, Viacheslav M. [1937] 1950. *A japán-német trockista ügynökök kártevésének, diverziójának és kémkedésének tanulságai. Beszámoló az SzK(b)P Központi Bizottságának 1937. február 28-i teljes ülésén* (Lessons drawn from the damaging covert and diversionary activities of Japanese-German Trotskyite agents. Report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b)SU on February 28, 1937). Budapest: Szikra.

Montias, John Michael. 1962. *Central Planning in Po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oore, Geoffrey H. 1983. *Business Cycles, Inflation, and Forecasting.* Cambridge: Ballinger, published for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oroney, John R. 1990. "Energy Consumption, Capital and Real Output: A Comparison of Market and Planned Econom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une, *14* (2), pp. 199-220.

Morrisson, Christian. 1984. "Income Distribution in East European and Western Countr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une, *8* (2), pp. 121-38.

Muellbauer, John, and Richard Portes. 1978. "Macroeconomic Models with Quantity Rationing," *Economic Journal,* December, *88* (352), pp. 788-821.

Muraközy, László. 1985. "Hazánk költségvetéséről—nemzetközi összehasonlításban" (Hungary's budget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énzügyi Szemle, 29* (10), pp. 745-54.

——. 1989. "A látható kéz" (The visible hand). Debrecen, Hungary: Kossuth Lajos Tudományegyetem. Manuscript.

Murrell, Peter. 1990a. *The Nature of Socialist Economies. Lessons from Eastern European Foreign Tra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0b.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Reform of the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es." College Park: University of Maryland. Manuscript.

Nachtigal, Vladimir. 1989.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ive Labour," *Czechoslovak Economic Papers, 26,* pp. 73-97.

Nagy, András. 1979. "Methods of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Proje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tudies,* no. 13. Budapest: Institute of Economics.

———. 1985.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and Intensity of East-West Trade," *Acta Oeconomica, 35* (3-4), pp. 359-75.

———. 1990. "Részérdekek az összeomlásban és a felemelkedésben" (Partial interests in periods of collapse and take-off), *Közgazdasági Szemle,* September, *37* (9), pp. 1012-24.

Nagy, András, and Péter Pete. 1980. "A világkereskedelem változásainak összefoglaló elemzése" (Summary of changes in the world trade), in *A világkereskedelem szerkezeti változásai 1955-1977 között, Vol. 1,* edited by András Nagy. Budapest: MTA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pp. 4-57.

Nagy, Tamás. 1966. *A gazdasági mechanizmus reformja és a politikai gazdaságtan kategóriái* (Reform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and the categ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udapest: TIT kiadvány.

Naughton, Barry. 1985. "False Starts and Second Wind: Financial Reforms in the Chinese Industrial System,"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edited by Elizabeth J. Perry and Christine P. W. Wo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3-52.

Nee, Victor, and David Stark, eds. 1988.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Nelson, Harold D., ed. 1985. *Mozambique: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C.: Foreign Area Studies,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Nemchinov, Vasilii S., ed. 1965. *Primenenie matematiki v ekonomicheskikh issledovaniakh Tom. 3*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in economic researches. Volume 3). Moscow: Izdatel'stvo Sotsial'no-Ekonomicheskoi Literatury.

Neuberger, Egon. 1966. "Libermanism, Computopia, and Visible Hand: The Question of Informational Effici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56* (2), pp. 131-44.

Neumann, von John. 1956. "Probabilistic Logics and the Synthesis of Reliable Organisms from Unreliable Components," in *Automata Studies,* edited by C. E. Shannon and J. McCart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43-98.

Niskanen, William. 1971.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icago: Aldine.

Nordhaus, William D. 1990. "Soviet Economic Reform: The Longest Roa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no. 1, pp. 287-308.

Nove, Alec. 1964.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Soviet Politics or Was Stalin Really Necessary?* New York: Praeger.

———. 1969.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London: Penguin.

———. 1983."Has Soviet Growth Ceas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anchester Statistical Society, November 15.

———. 1989. *Glasnost' in Perspective.* Boston: Unwin and Hyman.

Novozhilov, Viktor V. 1926. "Nedostatok tovarov" (Shortage of commodities), *Vestnik Finansov,* February, (2), pp. 75-96. Republished in *EKO,* 1988, (12), pp. 10-31.

Nozick, Robert.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Nuti, Domenico Mario. 1986a. "Hidden and Repressed Inflation in Soviet-Type Economies: Definitions, Measurements and Stabilization,"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March, *5*, pp. 37–82.

———. 1986b.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the Socialist System," *Working Papers*, no. 156. Florenc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 1990.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Monetary Disequilibrium in Poland," i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Hungary and Poland, European Economy*.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no. 43, March, pp. 169–82.

Nutter, Warren G. 1968. "Markets Without Property: A Grand Illusion," in *Money,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N. Beadles and L. Drewry.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pp. 137–45.

Odom, William. 1976. "A Dissenting View on the Group Approach to Sovie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July, *28* (4), pp. 543–67.

Ofer, Gur. 1987. "Soviet Economic Growth: 1928-1985,"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December, *25* (4), pp. 1767–1833.

———. 1988. "Productivity,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 Jerusalem: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and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nuscript.

———. 1990. "Macroeconomic Issues of Soviet Reforms," *Working Paper*, no. 222. Jerusalem: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April.

Olson, Mancur.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0. *Historical Statistics, 1960–1988*. Paris.

———. 1991.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Vol. 1*. Paris.

Orlov, B. P. 1988. "Illiuzii i real'nost' ekonomicheskoi informatsii" (The illusions and reality of economic information), *EKO*, 1988 (8), pp. 3–20.

Osband, Kent. 1987. "Speak Softly, but Carry a Big Stick: On Optimal Targets under Moral Hazard,"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December, *11* (4), pp. 584–95.

Pacsi, Zoltán. 1979. "A megvalósulási idő szerepe és alakulása a beruházásokban" (Construction periods of investment projects), *Pénzügyi Szemle*, August/September, *23* (8-9), pp. 628–38.

Pareto, Vilfredo. [1916] 1935. *The Mind and Society*, edited by Arthur Livingst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Patocka, Jan. 1977. "Letter from Prague: The Philosophy of 'Charter 77'," *Encounter*, June, *48* (6), pp. 92–93.

Pavlov, V. 1987. "Vazhnaia sostavnaia chast' perestroiki" (An important constituent part of perestroika), *Kommunist*, September, (13), pp. 14–26.

Peebles, Gavin. 1990. "China's Macroeconomy in the 1980s," *China Working Paper*, no. 5, National Center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erkins, Dwight. 1988. "Reforming China's Economic Syste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June, *26* (2), pp. 601–45.

Perry, Elizabeth J., and Christine P. W. Wong, eds. 198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Péter, György. 1954a. "Az egyszemélyi felelős vezetésről" (On management based on one-man responsibility), *Társadalmi Szemle,* August/September, *9* (8-9), pp. 109-24.

——. 1954b. "A gazdaságosság jelentőségéről és szerepéről a népgazdaság tervszerű irányításában" (On the importance and rol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in the planned control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Közgazdasági Szemle,* December, *1* (3), pp. 300-24.

Pető, Iván, and Sándor Szakács. 1985. *A hazai gazdaság négy évtizedének története, 1945-1985* (Four-decade history of the Hungarian economy, 1945-1985).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Petrakov, Nikolai Iu. 1987a. "Planovaia tsena v sisteme upravleniia narodnym khoziaistvom" (The planned price in the system of administer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Voprosy Ekonomiki,* January, (1), pp. 44-55.

——. 1987b. "Prospects for Change in the Systems of Price Formation, Finance and Credit in the USSR," *Soviet Economy,* April/June, *3* (2), pp. 135-44.

Petschnig, Mária. 1985. "Fogyasztói árindexünk—a kritika tükrében" (Our consumer price index in the mirror of the critics). Budapest and Pécs: Institute of Economics. Manuscript.

Phelps, Edmund S., et al. 1970.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heory.* New York: W. W. Norton.

Pipes, Richard. 1984a. *Survival Is Not Enough: Soviet Realities and America's Futur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1984b. "Can the Soviet Union Reform?" *Foreign Affairs,* Fall, *63* (1), pp. 47-61.

Podkaminer, Leon. 1988. "Disequilibrium in Poland's Consumer Markets: Further Evidence on Intermarket Spillover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March, *12* (1), pp. 43-60.

Podolski, T. M. 1973. *Socialist Banking and Monetary Control: The Experience of Po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lá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 1957.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dited by K. Polányi, C. M. Arensberg, and H. W. Pearson. Glencoe: Free Press, pp. 243-70.

Politicheskaia Ekonomiia Sotsializma. Uchebnik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Textbook). 1954. Moscow: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

Popov, Gavril Kh. 1987a. "S tochki zreniia ekonomista: O romane Aleksandra Beka 'Novoe Naznachenie'" (From 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 Bek's novel "New Appointment"), *Nauka i Zhizn',* April, (4), pp. 54-68.

——. 1987b. "Fasadi i kukhnia 'velikoi reformy'" (The facade and the kitchen of the "great reform"), *EKO* (1), pp. 144-75.

——. 1988. "Perestroika upravleniia ekonomikoi" (The restructuring of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in *Inogo ne dano,* edited by Yu. Afana'siev. Moscow: Progress, pp. 621-33.

Popper, Karl. 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Porter, Gareth. 1990. "The Politics of Renovation in Vietnam,"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y/June, *40* (3), pp. 72-88.

Portes, Richard, et al. 1987. "Macroeconomic Planning and Disequilibrium: Estimates for Poland, 1955-1980," *Econometrica*, January, *55* (1), pp. 19-41.

Portes, Richard, and David Winter. 1980. "Disequilibrium Estimates for Consumption Goods Markets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January, *47* (1), pp. 137-59.

Powell, Raymond P. 1977. "Plan Execution and the Workability of Soviet Plann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March, *1* (1), pp. 51-76.

Poznanski, Kazimierz Z. 1987. *Technology, Competition, and the Soviet Bloc in the World Market*.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1988. "The CPE Aversion to Innovations: Alternativ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Economics of Planning*, *22* (3), pp. 136-45.

Prasnikar, Janez, and Jan Svejnar. 1988. "Economic Behaviour of Yugoslav Enterprises," in *Advances in the Economic Analyses of Participatory and Labor Managed Firms*, edited by Derek Jones and Jan Svejnar. Vol. 3.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pp. 237-311.

——. 1990.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vs. Social Ownership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Yugoslav Lessons for Transforming Socialist Economies," *Working Paper*, no. 264.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okopovich, Sergei N. 1918. *Opyt ischisleniia narodnogo dokhoda 50 gub. Evropeiskoi Rossii v 1900-1913gg* (An attempt at calculating the national income of the fifty provinces of European Russia from 1910-1913). Moscow: Soviet Vserossiiskikh Kooperativnykh S'ezdov.

Proudhon, Pierre J. 1867-70.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Lacroix.

Prybyla, Jan S. 1990. *Reform in China and Other Socialist Economies*. Washington, D.C.: Published for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ryor, Frederic L. 1973. *Property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Nati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77. "Some Costs and Benefits of Markets: An Empirical Stud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1* (1), pp. 81-102.

——. 1985. *A Guidebook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conomic System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Qian, Yingyi. 1986. "Kornai's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 Neo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Manuscript.

——. 1988. "Profit Levelling and Incentives in Socialist Economies." Cambridg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Manuscript.

——. 1990. "Incentives and Control in Socialist Economies."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Qian, Yingyi, and Chenggang Xu. 1991.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in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Economies." Cambridg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Manuscript.

Quandt, Richard E. 1986. "Enterprise Purchases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Rationing," *Economics Letters*, March, *21* (1), pp. 13-15.

Quandt, Richard E., and Dusan Triska. 1990. *Optimal Decisions in Markets and Planned Economi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Rákosi, Mátyás. [1950] 1955. "Legyen a DISZ pártunk biztos támasza!" (Let the Democratic Youth Organization be a firm foundation of our party!), in M. Rákosi, *A békéért és a szocializmus építéséért.* Budapest: Szikra, pp. 234-46.

Reynolds, Bruce L., ed. 1988.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Challenges and Choices.* Armonk, N.Y.: M. E. Sharpe.

Révész, Gábor. 1990. *Perestroika in Eastern Europe: Hungary'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1945-1988.* Boulder: Westview Press.

Rigby, Thomas H., and Ferenc Fehér, eds. 1982. *Political Legitimation in Communist States.* Oxford: Macmillan.

Rimler, Judit. 1986. "Economic Obsolescence and Employ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Hungarian and Dutch Economies)," *Acta Oeconomica, 36* (1-2), pp. 123-40.

Riskin, Carl. 1989. "Reform and System Change in China," *WIDER Conference Paper,* Helsinki, March.

Robinson, Joan. 1933.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London: Macmillan.

——. 1969.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Harmondsworth: Penguin.

Roland, Gérard. 1987. "Investment Growth Fluctuations in the Soviet Union: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une, *11* (2), pp. 192-206.

——. 1990. "On the Meaning of Aggregate Excess Supply and Demand for Consumer Goods in Soviet-Type Econom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March, *14* (1), pp. 49-62.

Ronnas, Per. 1989. "Turning the Romanian Peasant into a New Socialist Man: An Assess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Romania," *Soviet Studies,* October, *41* (4), pp. 543-99.

——. 1990. "The Economic Legacy of Ceausescu," *Working Paper,* no. 11. Stockholm: Stockholm Institute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Economics.

Rosen, Sherwin. 1982. "Authority, Control,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utumn, *13* (2), pp. 311-23.

Ross, Stephen A. 1973.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ency: The Principal's Proble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63* (2), pp. 134-39.

Rostowski, Jacek. 1988. "Intra-year Fluctuations in Production and Sales: East and West," in *The Soviet Economy on the Brink of Reform. Essays in Honor of Alec Nove,* edited by Peter Wiles. Boston: Unwin Hyman, pp. 82-111.

——. 1989a. "The Decay of Socialism and the Growth of Private Enterprise in Poland," *Soviet Studies,* April, *41* (2), pp. 194-214.

——. 1989b. "Market Socialism Is Not Enough: Inflation vs. Unemployment in Reformed Communist Economies," *Communist Economies, 1* (3), pp. 269-85.

Rostowski, Jacek, and Paul Auerbach. 1986. "Storming Cycles and Economic Syste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10* (3), pp. 293-312.

Ruble, Blair, and Alex Pravda, eds. 1986. *Trade Unions in Communist States.* Boston: Allen and Unwin.

Rudneva, E. 1989. "Instrument gosudarstvennogo regulirovaniia ekonomiki" (The tool of state regulation of the economy), *Planovoe Khoziastvo*, June (6), pp. 25-34.

Rusinow, Dennison. 1977. *The Yugoslav Experiment 1948-1974*. London: C. Hurst and Company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acks, Stephen R. 1989. "The Yugoslav Firm,"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Models and Cases,* edited by Morris Bornstein. Homewood, Ill.: Irwin, pp. 213-33.

Sakharov, Andrei D. 1968. *Progress, Coexistence,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 New York: W. W. Norton.

——. 1974. *Sakharov Speak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1975. *My Countr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1979. *Alarm and Hope*. London: Collins and Harvill Press.

Sanders, Alan J. K. 1987. *Mongoli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Savezni Zavod za Statistiku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1988. *Statisticki godisnjak jugoslavije 1988*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Yugoslavia, 1988). Belgrade.

Scarf, Herbert. 1973. *A Computation of Economic Equilibr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chaffer, Mark E. 1989. "The 'Credible-Commitment Problem' in the Centre-Enterprise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 *13* (3) , pp. 359-82.

——. 1990.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Poland: Taxation, Subsidization, and Competition Policies," *Eastern Europe,* March, p. 188.

Schama, Simon. 1989. *Citize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Schelling, Thomas C. 1978. *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 New York: W. W. Norton.

Schnabel, Claus. 1991.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Privatization of the East German Economy," in *Economic Aspects of German Unification,* edited by Paul Welfens. Heidelberg: Springer, forthcoming.

Schnytzer, Adi. 1982. *Stalinist Economic Strategy in Practice: The Case of Alban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roeder, Gertrude E. 1979. "The Soviet Economy on a Treadmill of 'Reforms'," in *The Soviet Economy in a Time of Chang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312-40.

——. 1983. "Consumption," in *The Soviet Economy: Toward the Year 2000,* edited by Abram Bergson and Herbert S. Levin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pp. 311-49.

——. 1985. "The Slowdown in Soviet Industry, 1976-1982," *Soviet Economy,* January/March, *1* (1), pp. 42-74.

——. 1988. "Property Rights Issues in Economic Reforms in Socialist Countri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Summer, *21* (2), pp. 175-88.

———. 1990a. "Measuring the Size and Growth of Consump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Relative to Western Countrie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Manuscript.

———. 1990b. "Soviet Consumption in the 1980s: A Tale of Wo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Manuscript.

Schumpeter, Joseph A. [1912] 1968.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Business Cycl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hweitzer, Iván. 1982. *Vállalatnagyság* (Firm size).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Scitovsky, Tibor. [1951] 1971. *Welfare and Competition*. Homewood, Ill: Irwin.

———. 1985. "Pricetakers' Plenty: A Neglected Benefit of Capitalism," *Kyklos*, *38* (4), pp. 517–36.

Scott, Chris. 1990. "Soft Budgets and Hard Rents: A Note on Kornai and Gomulka," *Economics of Planning*, *23* (2), pp. 117–27.

Screpanti, Emilio. 1986. "A Model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s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EUI Working Paper*, no. 85/201. Florenc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Selden, Mark. 198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Socialism*. Armonk, N.Y.: M. E. Sharpe.

Seliunin, Vasilii, and Grigorii Khanin. 1987. "Lukavaia tsifra" (The cunning figure), *Novyi Mir*, February, *63* (2), pp. 181–201.

Sen, Amartya. 1973. *On Economic Inequ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81. "Ethical Issue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Past and Prospects*, edited by Sven Grassman and Erik Lundberg. London: Macmillan, pp. 465–94.

Sen Gupta, Bhabani. 1986. *Afghanista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London: Frances Pinter.

Shafir, Michael. 1985. *Romani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London: Frances Pinter, and Boulder: Lynne Rienner.

Shmelev, Nikolai P. 1988a. "Novyi trevogi" (New worries), *Novyi Mir*, April, (4), pp. 160–75.

———. 1988b. "Rethinking Price Reform in the USSR," *Soviet Economy*, October/December, *4* (4), pp. 319–27.

Shulman, Marshall D. 1966. *Beyond the Co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cular, Terry. 1985. "Rural Marketing and Exchange in the Wake of Recent Reform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edited by Elizabeth Perry and Christine P. W. Wo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pp. 83–110.

———. 1990. "Plan, Market and Inflation: Potential Problems with China's Two-Track System." Cambridg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Manuscript.

Sigg, Hans. 1981. *Grundzüge des sowjetischen Bankwesens*. Bern: Paul Haupt .

Sik, Ota. 1966. *Economic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Czechoslovakia*. Prague: Orbis.

Simon, András. 1977. "A lakossági fogyasztás és megtakarítás vizsgálata ökonometriai módszerrel" (Examination of the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of the population with econometric methods), *Szigma, 10* (4), pp. 249-64.
Simonovits, András. 1981. "Maximal Convergence Speed of Decentralized Control,"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February, *3* (1), pp. 51-64.
——. 1991a. "Investment Limit Cycles in a Socialist Economy," *Economics of Planning, 24* (1), pp. 27-46.
——. 1991b. "Investment, Starts and Cycles in a Socialist Econom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5* (3), pp. 460-76.
Singleton, Frederick B., and Bernard Carter. 1982. *The Economy of Yugoslavia*. London: Croom Helm,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killing, H. Gordon. 1966. "Interest Groups and Communis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April, *18* (3), pp. 435-51.
Sláma, Jiri. 1978. "A Cross-Country Regression Model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edited by Zvi Griliches et al.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Verlag, Halsted and Eiley, pp. 306-23.
Sletsiura, V. 1989. "Kroki ekonomicheskoi reformy" (The cracks of economic reform), *Planovoe Khoziaistvo*, September, (9), pp. 23-33.
Solomon, Susan, ed. 1983. *Plur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olow, Robert M. [1970] 1988. *Growth Theory: An Expos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olzhenitsyn, Aleksandr I. 1974-78. *The Gulag Archipelago*. 3 vol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Somerville, Keith. 1986. *Angol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Soós, Károly Attila. 1975. "Causes of Investment Fluctuations in the Hungarian Economy,"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Winter, *14* (2), pp. 25-36.
——. 1984. "A Propos the Explanation of Shortage Phenomena: Volume of Demand and Structural Inelasticity," *Acta Oeconomica, 33* (3-4), pp. 305-20.
——. 1986. *Terv, kampány, pénz* (Plan, campaign, and money).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1990. "Privatization, Dogma-Free Self-Management, and Ownership Reform,"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Summer, *28* (4), pp. 53-70.
Sorokin, V. 1985. *Ochered'* (The line). Paris: Sintaksis.
Spence, Andrew M. 1974. *Market Signall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taar, Richard F. 1987. "Checklist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1986,"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rch/April, *36* (2), pp. 40-56.
Stahl, Dale O., and Michael Alexeev. 1985. "The Influence of Black Markets on a Queue-Rationed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April, *35* (2), pp. 234-50.
Stalin, Josef V. 1947. *Problems of Leninis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1952.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and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927] 1954. "Political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15th Congress of the CPSU, Dec. 2-19, 1927," in J. V. Stalin, *Collected Works*, vol. 10.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pp. 277-382.

Staniszkis, Jadwiga. 1989. "The Dynamics of a Breakthrough in the Socialist System: An Outline of Problems," *Soviet Studies*, October, *41* (4), pp. 560-73.

——. 1991. *The Dynamics of Breakthrough in Eastern Europe*.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5.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198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7. *A Statistical Survey in 1987*. Beijing: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New World Press, and China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ncy Service Centre.

——. 1988.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8*.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ncy Service Centre.

Statistisches Amt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71. *Statistisches Jahrbuch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Berlin: Staatsverlag.

——. 1990. *Statistisches Jahrbuch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Berlin: Rudolf Haufe Verlag.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1970.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tuttgart: Kohlhammer.

——. 1990. *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89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tuttgart: Metzger Poeschel Verlag.

Statistika. (Statistics). 1977. *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 za 60 let* (The Soviet national economy for sixty years). Moscow.

Stiglitz, Joseph E. 1974. "Incentives and Risk Sharing in Sharecropp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April, *41* (2), pp. 219-55.

——. 1976. "The Efficiency Wage Hypothesis, Surplus Labo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L.D.C.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July, *28* (2), pp. 185-207.

——. 1987. "Principal and Agent," in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edited by 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and Peter Newman. Vol. 3. London: Macmillan, and New York: The Stockton Press, pp. 966-72.

Stiglitz, Joseph E., and Andrew Weiss. 1981.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71* (3), pp. 393-410.

Stojanovic, Radmila, ed. 1982. *The Functioning of the Yugoslav Economy*. Armonk, N.Y.: M. E. Sharpe, and Nottingham: Spokesman Books.

Stoneman, Colin. 1989. *Zimbabw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Streeten, Paul. 1959. "Unbalanced Growth,"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ew series, June, *11* (2), pp. 167-90.

Stuart-Fox, Martin. 1986. *Lao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Summers, Robert, and Alan Heston. 1984. "Improve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Real Product and Its Composition, 1950-1980,"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June, *30* (2), pp. 207-61.

——. 1988. "A New Set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Real Product and Price Levels: Estimates for 130 Countries, 1950–1985,"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March, *34* (1), pp. 1–43.
Sun, Yefang. 1982. "Some Theoretical Issues in Socialistic Economic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period 1958–1961, in *Social Needs versus Economic Efficiency in China,* edited by K. K. Fung. Armonk, N.Y.: M. E. Sharpe.
Sutela, Pekka. 1984. *Socialism, Planning and Optimality: A Study in Soviet Economic Thought.* Helsinki: The Finnish Societ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
——. 1991. *Economic Thought and Economic Reform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tton, Anthony C. 1968. *Western Technology and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1917 to 1930.* Vol. 1.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 1971. *Western Technology and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0 to 1945.* Vol. 2.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 1973. *Western Technology and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1945 to 1965.* Vol. 3.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Swaan, Wim. 1990. "Price Regulation in Hungary, 1968–87: A Behavioural-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September, *14* (3), pp. 247–65.
Swain, Nigel. 1987. "Hungarian Agriculture in the Early 1980s: Retrenchment Followed by Reform," *Soviet Studies,* January, *39* (1), pp. 24–39.
Szabó, Judit. 1985. "Kínálati rugalmatlanság, elszaladó kereslet, készletek és hiány" (Inelasticity of supply, runaway demand, stocks, and shortage), *Közgazdasági Szemle, 32* (7–8), pp. 951–60.
——. 1989. "Book Review. T. Liska: Ökonosztát (Econostat)," *Acta Oeconomica, 41* (1–2), pp. 237–52.
Szabó, Kálmán. 1967. "A szocialista gazdaságirányítási rendszer" (The socialist system of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in *A szocializmus politikai gazdaságtana. Tankönyv,* edited by Andor Berei et al. 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 pp. 248–294.
Szalai, Erzsébet. 1982. "A reformfolyamat és a nagyvállalatok" (The reform process and the large enterprises), *Valóság, 25* (5), pp. 23–35.
——. 1989. "See-Saw: The Economic Mechanism and Large-Company Interests," *Acta Oeconomica, 41* (1–2), pp. 101–36.
Szamuely, László. 1974. *First Models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s. Principles and Theories.*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 1982. "The First Wave of the Mechanism Debate in Hungary (1954–1957)," *Acta Oeconomica, 29* (1–2), pp. 1–24.
——. 1984. "The Second Wave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Debate and the 1968 Reform in Hungary," *Acta Oeconomica, 33* (1–2), pp. 43–67.
Székely, István. 1990. "The Reform of the Hungarian Financial System," i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Hungary and Poland, European Economy,*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no. 43, March, pp. 107–23.
Szelényi, Iván. 1983. *Urban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 Soc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6. "The Prospects and Limits of the East European New Class Project: An Auto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Politics and Society, 15* (2), pp. 103–44.

———. 1988.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Taigner, Stefan. 1987. "Polens Second Economy," *Osteuropa-Wirtschaft,* June *32* (2), pp. 107-21.

Tallós, György. 1976. *A bankhitel szerepe gazdaságirányítási rendszerünkben* (The role of bank credit in our system of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Budapest: Kossuth.

Tanzi, Victor, ed. 1982.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in the U.S. and Abroad.*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Tardos, Márton. 1981. "The Role of Money: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Enterprises in Hungary," *Acta Oeconomica 25* (1-2), pp. 19-35.

———. 1986. "The Conditions of Developing a Regulated Market," *Acta Oeconomica, 36* (1-2), pp. 67-89.

———. 1989. "The Hungarian Banking Reform." Budapest: Pénzügykutató Részvénytársaság. Manuscript.

———. 1990. "Property Ownership,"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Spring, *28* (3), pp. 4-29.

Tedstrom, John B., ed. 1990. *Socialism, Perestroika, and the Dilemmas of Soviet Economic Refor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Temkin, Gabriel. 1989. "On Economic Reform in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Debate on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 Revisited," *Communist Economies, 1* (1), pp. 31-59.

Teodorescu, Alin. 1990. "The Future of a Failure: The Romanian Economy," *Working Paper,* no. 12. Stockholm: Stockholm Institute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Economics.

Thimm, Alfred L. 1980. *The False Promise of Co-Determinatio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European Workers' Participation.*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Thornton, James R. 1978. "The Ratchet, Price Sensitivity, and Assortment Pl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March, *2* (1), pp. 57-63.

Tidrick, Gene. 1987. "Planning and Supply," in *China's Industrial Reform,* edited by Gene Tidrick and Chen Jiyu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75-209.

Timár, János. 1985. "A társadalmi újratermelés időalapja" (The total of man-hours available for social reproduction). Budapest: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Manuscript.

Toranska, Teresa. 1987. *"Them": Stalin's Polish Puppet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Treml, Vladimir G. 1987. "Income from Private Services Recognized by Official Soviet Statistics," in M. Alexeev et al., *Studies on the Soviet Second Economy, Berkeley-Duke Occasional Papers on the Second Economy in the USSR,* no. 11, December, pp. 4.1-4.27.

———. 1990. "Study of Employee Theft of Materials from Places of Employment," *Berkeley-Duke Occasional Papers on the Second Economy in the USSR,* June, no. 20.

Trotsky, Leon. [1937] 1970. *A Revolution Betrayed.*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Tsapelik, V., and A. Iakovlev. 1990. "Kolichestvennye kharakteristiki monopolii"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monopolies), *Voprosy Ekonomiki,* June, (6), pp. 38-46.
Tucker, Robert. 1973.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New York: W. W. Norton.
——. 1990. *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8-1941.* New York: W. W. Norton.
Tyson, Laura D'Andrea. 1977. "Liquidity Crises in the Yugoslav Economy: An Alternative to Bankruptcy?" *Soviet Studies,* April, *29* (2), pp. 284-95.
——. 1980. *The Yugoslav Economic System and Its Performance in the 1970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1983. "Investment Allocation: A Comparison of the Reform Experiences of Hungary and Yugoslavi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7* (3), pp. 288-303.
Ulam, Adam. 1973. *Stalin: The Man and His Era.* Boston: Beacon Press.
Ungvárszky, Ágnes. 1989. *Gazdaságpolitikai ciklusok Magyarországon, 1948-1988* (Economic policy cycles in Hungary, 1948-1988).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Union Internationale des Télécommunications. 1980. *Annuaire statistique des télécommunications du secteur public.* Geneva.
——. 1982. *Annuaire statistique des télécommunications du secteur public.* Geneva.
——. 1986. *Annuaire statistique des télécommunications du secteur public.* Geneva.
United Nations. 1977. *Comparisons of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and the System of Balanc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Part 1. Studies in Methods, series F, no. 20. New York.
——. 1981. *Annual Bulletin of Transport Statistics for Europe, 1980.* Vol. 32. New York.
——.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1986a. *Human Settlements Situation in the ECE Region around 1980.* New York.
——. 1986b.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4.* New York.
——. 1986c. "Investment in the ECE Region: Long-term Trends and Policy Issues," *Economic Bulletin for Europe, 38* (2).
——. 1987. *Environment Statistic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n Experimental Compendium.* New York.
——. 1989. *Economic Bulletin for Europe.* Vol. 41. New York.
——. 1990a. *Economic Survey of Europe in 1989-1990.* New York.
——.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1990b.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1989.* New York.
Vanek, Jaroslav. 1970. *The General Theory of Labour-Managed Market Econom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71. *The Participatory Economy: An Evolutionary Hypothesis and a Strategy for Develop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72. *The Economics of Workers' Management: A Yugoslav Case Stud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Várhegyi, Éva. 1987. "Hitelezési mechanizmus és hitelelosztás Magyarországon." (The mechanism of crediting and the allocation of credit in Hungary). Candidate's thesis. Budapest.
——. 1989. "Results and Failures of Monetary Restriction. Some Lessons of Hungarian Financial Policy in 1988," *Acta Oeconomica, 41* (3-4), pp. 403-20.
——. 1990a. "The Nature of the Hungarian Credit Market, Lessons of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cta Oeconomica, 42* (1-2), pp. 73-86.
——. 1990b. "Pénzfolyamatok a kormányzati törekvések ellenében" (Monetary flows against government objectives), *Külgazdaság, 34* (8), pp. 30-45.
Varian, Hal R. 1978. *Micro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W. W. Norton.
Vass, Henrik, ed. 1968. "Az MSZMP Központi Bizottságának irányelvei a gazdasági mechanizmus reformjára" (The directive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Hungaria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for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in *A Magyar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 határozatai és dokumentumai, 1963-1966.* 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 pp. 301-450.
Vickery, Michael. 1986. *Kampuche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Voronin, L. 1989. "Razvitie optovoi torgovli"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sale trade), *Planovoe Khoziaistvo,* March, (3), pp. 3-13.
Voronov, A. 1990. "O problemakh preodeleniia defitsita i metodakh regulirovaniia potrebitel'skogo rynka" (On the problems of eliminating shortage and methods for the regulation of the consumer market), *Voprosy Ekonomiki,* January, (1), pp. 26-32.
Voszka, Éva. 1984. *Érdek és kölcsönös függőség* (Interest and mutual interdependence).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1988. *Reform és átszervezés a nyolcvanas években.* (Reform and reorganization in the 1980s). Budapest: Közgazd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Ward, Benjamin M. 1958. "The Firm in Illyria: Market Syndicalis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48* (4), pp. 566-89.
Wasilewski, Jacek. 1990. "The Patterns of Bureaucratic Elite Recruitment in Poland in the 1970s and 1980s," *Soviet Studies,* October, *42* (4), pp. 743-57.
Watson, James D. 1968. *The Double Helix.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 New York: Atheneum.
Weber, Max. [1904] 1930.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 [1925]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edited by Gu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Weibull, Jörgen W. 1983. "A Dynamic Model of Trade Frictions and Disequilibrium in the Housing Market,"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85* (3), pp. 373-92.
——. 1984. "A Stock-Flow Approach to General Equilibrium with Trade Frictions,"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14* (1), pp. 63-76.
Weitzman, Martin L. 1970. "Soviet Postwar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Labor Substit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60* (4), pp. 676-92.

———. 1976. "The New Soviet Incentive Model,"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Spring, *7* (1) pp. 251-57.
———. 1980. "The 'Ratchet Principle' and Performance Incentive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Spring, *11* (1), pp. 302-8.
———. 1983.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The Soviet Economy: Toward the Year 2000*, edited by Abram Bergson and Herbert S. Levin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pp. 178-90.
———. 1984. *The Share Econom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5. "The Simple Macroeconomics of Profit-Shar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75* (5), pp. 937-53.
———. 1987. "On Buyers' and Sellers' Market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Cambridg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Manuscript.
Wellisz, Stanislaw, and Ronald Findley. 1986. "Central Planning and the 'Second Economy' in Soviet-Type Systems," *The Economic Journal*, September, *96* (383), pp. 646-58.
Whitesell, Robert S. 1989-90. "Estimates of the Output Loss from Allocative Inefficiency. A Comparison of Hungary and West Germany,"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Winter, *28* (2), pp. 95-125.
Whitney, Thomas P., ed. 1963. *Khrushchev Speak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Wiles, Peter. 196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8.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82. "Introduction: Zero Growth and the International Nature of the Polish Disease," in *Crisis in the East European Economy. The Spread of the Polish Disease*, edited by Jan Drewnowski. London: Croom Helm,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p. 7-17.
Williamson, Oliver E. 1967. "Hierarchical Control and Optimum Firm Siz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75* (2), pp. 123-38.
———. 1970. *Corporate Control and Business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Wilpert, Bernhard, and Jörg Rayley. 1983.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der Mitbestimmung*. Frankfurt: Campus.
Winiecki, Jan. 1984. "Central Planning and Export Orientation," *Oeconomica Polona*, *10* (3-4), pp. 295-312.
———. 1986. "Are Soviet-Type Economies Entering an Era of Long-Term Decline?" *Soviet Studies*, July, *28* (3), pp. 325-48.
———. 1988. *The Distorted World of Soviet-Type Economie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1989. "Larg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Soviet-Type Economies: The Ruling Stratum's Main Rent-seeking Area," *Communist Economies*, *4* (1), pp. 363-83.
———. 1991. *Resistance to Change in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A Property Rights Approach*. London: Routledge.

Wolf, Thomas A. 1988. *Foreign Trade in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New York: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Wong, Christine P. W. 1986. "The Economics of Shortage and Problems of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December, *10* (4), pp. 363-87.

World Bank. 1985. *China: Long-Term Issues and Options*. Washington, D.C.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6*. 198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8*. 198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

Wu, Jinglian, and Renwei Zhao. 1987. "The Dual Pricing System in China's Industr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11* (3), pp. 309-18.

Wulf, Luc de. 1985. "Financial Reform in China,"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December, *22* (4), pp. 19-22.

Xue, Muqiao. 1982. *Current Economic Problems i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Yeltsin, Boris N. 1990. *Ispoved' na zadannaiu temu*. (Confession on a given theme). Sverdlovsk: Sredne-Ural'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Zafanolli, Wojtek. 1985. "A Brief Outline of China's Second Economy," *Asian Survey,* July, *25* (7), pp. 110-32.

Zaleski, Eugene. 1980. *Stalinist Planning for Economic Growth. 1933-1952.* London: Macmillan, an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Zarnovitz, Victor. 1985. "Recent Work on Business Cycl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Review of Theories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June, *23* (2), pp. 523-80.

Zaslavskaya, Tatiana I. 1990. *The Second Socialist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Zauberman, Alfred. 1975. *The Mathematical Revolution in Soviet Planning.* London: 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6. *Mathematical Theory in Soviet Plann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elkó Lajos. 1981. "A versenyárrendszer elméleti és gyakorlati problémi"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the competitive price system), *Közgazdasági Szemle,* July/August, *27* (7-8), pp. 927-40.

Zhou, Shulian. 1981. "Sanshi nianlai wouguo jingji jiegou de huigu" (Chinese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e recent thirty years: A survey), in *Zhonqquo Jingji Jiegou, vol. 1,* edited by Ma Hong and Sun Shangqing. Beijing: People's Press, pp. 23-55.

Zhou, Xiaochuan, and Li Zhu. 1987. "China's Banking System: Current Status, Perspective on Refor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11* (3), pp. 399-409.

Zhuravlev, S. N. 1990. "Potrebitels'kie Tseny: ikh sootnoshenie s zatratami, vliianie na dokhody naseleniia i narodnokhoziaistvennye pokazateli" (Consumer prices: Their relationship to costs, influence on the income of the population, and on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Seriia Ekonomicheskaia,* (1), pp. 80-96.

Zimbalist, Andrew, and Claes Brundenius. 1989. *The Cuban Economy: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Socialist Performa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Zinov'ev, Aleksandr. 1984. *Homo Sovieticus*. London: Polonia.

Zloch-Christy, Iliana. 1987. *Debt Problems of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wass, Adam. 1978. *Money, Banking, and Credit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 Appendix
# 附　录

## Bibliography on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 关于后社会主义转型的参考书目

Allison, G., and G. Yavlinsky, eds. 1991. "Window of Opportunity: Joint Program for Western Cooperation in the Soviet Transformation to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Economy." Cambridge: Joint Working Group of Harvard University, and Moscow: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search. Manuscript.

Berg, Andrew, and Jeffrey Sachs. 1991.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Cambridg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Manuscript.

Blanchard, Olivier, et al. 1991.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MIT Press.

Blue Ribbon Commission. 1990. "Action Program for Hungary in Transformation to Freedom and Prosperity." Manuscript.

Charap, Joshua, and Karel Dyba. 1991.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The Case of Czechoslovakia,"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April, *35* (2-3), pp. 581-90.

Collier, Irwin L., and Horst Siebert. 1991.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Post-Wall German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81* (2), pp. 196-201.

Collins, Susan M., and Dani Rodrik. 1991.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Dhanji, Farid. 1991. "Transformation Programs: Content and Sequenc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81* (2), pp. 323-28.

Dornbusch, Rudiger. 1990a. "Economic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Priorities and Strategy." Cambridge: MIT, November. Manuscript.

——. 1990b. "Priorities of Economic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CEPR Occasional Paper*, no. 5.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Dyba, Karel, and Jan Svejnar. "Czechoslovakia: Re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81* (2), pp. 185-90.

Fischer, Stanley. 1991. "Privatization in East European Transformation." *Working Paper* 3703. Cambridg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Fischer, Stanley, and Alan Gelb. 1990. "Issues in Socialist Economy Reform." *Working Paper* WPS 56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Freeman, Richard B. 1992. "Getting Here from There: Labor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Bertram Silverman, Robert Vogt, and Murray Yanowitch, eds., *Labor and Democracy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U.S. and Soviet Perspectives.* White Plains, New York: M.E. Sharpe, 1992.

Frydman, R., and A. Rapaczynski. 1990.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in Large Scale Privatizations." *Economic Research Report* 90-420.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Grosfeld, Irena. 1991. "Privatization of State Enterprises in Eastern Europe: The Search for a Market Environment,"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Winter, *5* (1), pp. 142-61.

Hare, Paul, and Irena Grosfeld. 1991. "Privatization in Hungary, Poland and Czechoslovaki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544.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Havrylyshyn, Oleh, and David Tarr. 1991.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Working Paper* WPS 70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ewett, Ed. A. 1990-91. "The New Soviet Plan," *Foreign Affairs,* Winter, *70* (5), pp. 146-67.

Hinds, M. 1990. "Issue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Market Forces in Eastern European Socialist Countries." *Internal Discussion Paper,* Report No. IDP-0057.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olzmann, Robert. 1991. "Budgetary Subsidies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Working Paper* 91/11.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BRD, OECD, EBRD. 1990. "The Economy of the USSR: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 study undertaken in response to a request by the Houston Summit, Washington, D.C.

Jasinski, Piotr. 1990. "Two Models of Privatization in Poland. A Critical Assessment," *Communist Economies,* Fall, *2* (3), pp. 373-401.

Kawalec, Stefan. 1990. "Employee Ownership, State Treasury Ownership: Dubious Solutions," *Communist Economies,* Spring, *2* (1) pp. 83-93.

Klaus, Vacláv. 1990. "A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zechoslovakia and Eastern Europe,"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pp. 13-18.

Kolodko, Grzegorz W. 1991.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nd Stabilization Policies: The Polish Experience," *Rivista di Economica Politica,* forthcoming.

Kopits, George. 1990. "Fiscal Reform in Europea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Working Paper* 91/43.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July.

Kornai, János. 1992. "The Principles of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De Economist, 140,* forthcoming.

——. 1990.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Shifting from a Socialist System: The Example of Hungary.* New York: W. W. Norton.

Lewandowski, Janusz, and J. Szomburg. 1989. "Property Reform as a Basis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form," *Communist Economies, 1* (3), pp. 257-68.

Lipton, David, and Jeffrey Sachs. 1990. "Creating a Market Economy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pp. 75–133.

——. 1990.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pp. 293–333.

McKinnon, Ronald. 1990. "Stabilising the Ruble," *Communist Economies, 2* (2), pp. 131–42.

——. 1991. *The Ord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Ministry of Finance, Hungary. 1991a. "Experiences of and Further Steps in the Tax Reform," in *Public Finance in Hungary,* Budapest.

——. 1991b. "State Budget," in *Public Finance in Hungary.* Budapest.

Móra, Mária. 1990.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and Ownership Form of State Enterprises, 1987–1990," *Economic Papers.* Budapest: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Murrel, Peter. 1990.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Reform of the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es." College Park: University of Maryland. Manuscript.

Murrell, Peter, and Mancur Olson. 1991. "Devolution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5* (2), 239–65.

Nuti, Domenico Mario. 1990a. "Privatization of Socialist Economies: General Issues and the Polish Case." Verona: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September. Manuscript.

——. 1990b. "Stabilization and Reform Sequencing in the Reform of Socialist Economies." Paper presented at EDI seminar, March.

Peck, Merton J., and Thomas J. Richardson. 1991. *What is to be Don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ortes, Richard. 1990.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Eastern Europe after 1992," *CEPR Occasional Paper,* no. 3.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Schaffer, Mark E. 1990. "On the Use of Pension Funds in the Privatization of Polis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Manuscript.

Shiller, Robert J., Maxim Boycko, and Vladimir Korobov. 1991.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 Free Market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e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81* (3), pp. 385–400.

Siebert, Horst. 1991. "The Integration of German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April, *35* (2–3), pp. 591–602.

Stark, David. 1990. "Privatization in Hungary: From Plan to Market or from Plan to Cla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4* (3), pp. 351–92.

Tirole, Jean. 1991.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Incentives and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991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Cambridge: MIT Press.

Triska, Dusan. 1990. "Privatization in Post-Communist Czechoslovakia," Stockholm, October. Manuscript.

Voszka Éva. 1991. "Tulajdonreform vagy privatizáció" (Reform of ownership or privatization), *Közgazdasági Szemle,* February, *38* (2), pp. 117–33.

Williamson, John. 1991a. *The Economic Opening of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1991b. *Currency Convertibility in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iniecki, Jan. 1990. "Post-Soviet-Type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the Polish Transition Programme in its First Year?"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26* (4), 765–90.

Working Group formed by a joint decision of Mikhail S. Gorbachev and Boris N. Yeltsin. 1990.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Part 1. The Concept and Program" (The Shatalin Plan). Moscow, Avkhanagel'skoe: Cultural Initiative Foundation, August.